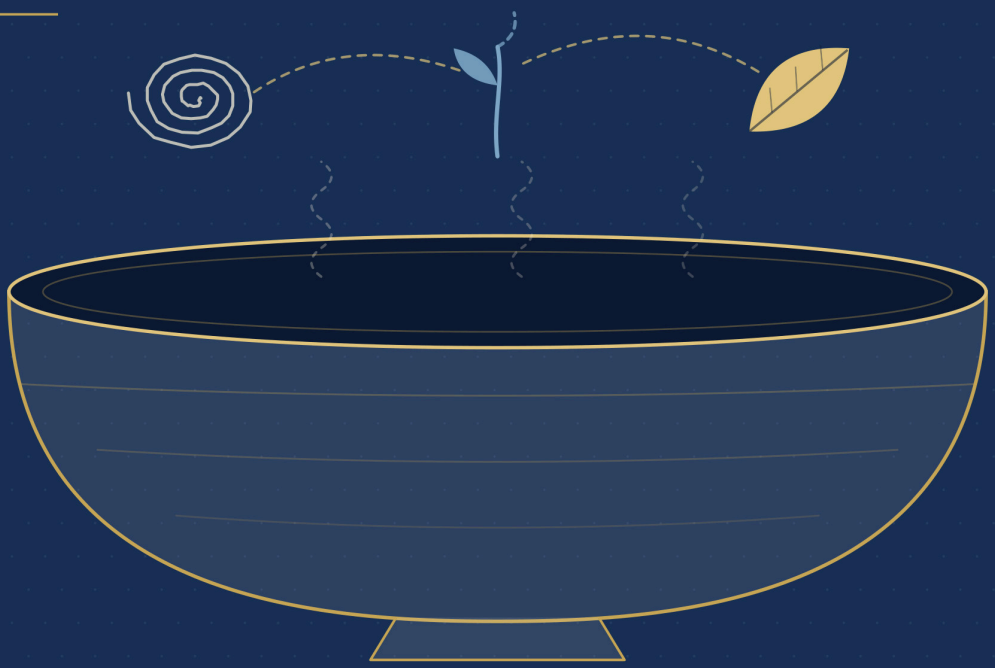
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48 号

实用主义 · 无用之用

从无用到有用

实用主义的SDE解构



一锅粥
混沌

正在成形
介生

定型
有用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48 号

从无用到有用

实用主义的SDE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从无用到有用》
副题	实用主义的SDE解构
英文书名	From the Useless to the Useful: An SDE Deconstruction of Pragmatism
著者	王德生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48 号
ISBN	979-8-90690-550-5
定价	US$40.0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38 万字（导论、三十五章与结语正文含标点 375,735 字，其中汉字 320,814 个）
版次	2026 年 11 月第 1 版

成书说明：本书是研究性专著。核心命题由王德生口述提出；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统稿人写前言、导读、导论与第1章并定规格，十九位执笔者分单元写成，再经口径与事实、结构与衔接、文字三审回改。同一底座的执笔者与审稿者不能互作独立证据；本书没有经过独立学术评审。

书中的人物与场景是为说明机制而设的构想，已在各处标明，不指任何真实的人；各章写下的可被推翻的条件均尚未检验。全书结构：前言；导读；导论；九卷三十五章；结语；附录；参考书目；版本说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完全的实用主义，最后会杀死实用。有用，是从无用里长出来的。

——王德生口述（2026年11月1日）

作者介绍

王德生（Desheng Wang），博士，SIO 本体论与 SDE 发生学（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创始人、董事长，主持 SDE Universes 平台与德麦国际专著出版体系。

计算数学出身：湘潭大学数学系本科、硕士，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博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研究所博士后；曾任英国威尔士大学斯旺西分校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博导）与资深研究科学家，在计算数学与图形学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2015 年起回国推广三视角方法论，在各地高校讲学数百场；2024 年提出 SIO 本体论与意义三律，后凝练为 SDE 发生学。

本书的核心命题——实用主义是统一了意义（创造、自由、幸福）的 D 维度形而上学；皮尔斯偏向创造，詹姆斯偏向幸福，杜威偏向自由；统一的意义律回写成美国的治理、社会与人生的三分裂；混沌态与介生态无法讨论意义，完全的实用主义最后杀死实用；准则是三个方程的平衡与三律轮换，离不开 E 的同一性谱系——由王德生在一场没有议程的对话里口述提出；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经三审回改。

成书说明

这是一本研究性专著，请按它实际做到的范围来读。

谁写的。本书的核心命题由王德生在一场没有预设目标的对话里口述提出，书中凡说是他的判断，意思未改。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统稿人先研读站上七本相邻专著（第133、202、235、180、170、178、291号），据此定出四十万字的节级大纲，亲写前言、导读、导论与第1章作样稿，再由十九位执笔者按“统一、多样、和谐”的分配并行写出其余各章，最后经三审回改。写作与审读用的是同一个底座，彼此不能当作独立证据。

哪些是构想。书中的人物、场景与对话，除另有说明外，都是为说明机制而设的构想，写作时没有访谈或调查。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罗蒂与老子、庄子的著作与生平，只写通行的说法与大意；拿不准的年份与原句，已改成不带年份、不引原句的转述，请以原著为准。

哪些没有检验。各章写下的“可被推翻的条件”，只说明什么样的大局面出现，这一章的判断就错了，一条也没有实际检验过。导论九格纠缠谱里标为“尚未发生”的两格，理由是作者的推测，不是调查结论。

正文字数。导论、三十五章与结语的正文实计 320,814 个汉字；章题、节题、表格不计入。

前言

这本书是从一场没有目标的闲聊里长出来的

这本书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在书桌前想出来的。

那天早上，我们只是随口聊天。没有议程，没有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人说“今天我们来讨论实用主义”。话从一件小事滑到另一件小事，滑着滑着，有人说了一句：实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可皮尔斯、詹姆斯、杜威三个人，偏偏都在“实践中、实用中”，做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东西。

这句话一出来，整场闲聊的方向变了。

后来我们回头看，才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念头本身，就是一个“无用”的产物。如果那天早上每一句话都要问“这句有什么用”，它大概不会出现。它是从一段没有目标的话里，自己“介”出来的。而这本书要讲的，恰恰是这件事——**一个只认“有用”的思想，会怎样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悄悄杀死**。

先说这本书的结论，免得读者白走一趟。

第一，实用主义并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不讲形而上学”。它统一了一件东西：做事的**意义**。皮尔斯把意义统一在“创造”上，詹姆斯统一在“幸福”上，杜威统一在“自由”上。三个人三种偏向，可他们都做了同一个动作：让“路”只听一条意义律的话。这个动作，和传统形而上学把世界统一成一个“本体”的动作，是同一种动作，只不过传统的形而上学统一的是**东西**，实用主义统一的是**路**。我们把前者叫做S维度的形而上学，把后者叫做D维度的形而上学。

第二，这个统一不是三个聪明人的偶然。它长在一片特别的土里。那片土，是美国多种来源缝在一起的土壤：教会、边疆、移民、工厂、律师、实验室，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路，缝在一起以后，没有哪一块能代表整体，于是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共同遵守——**路怎么走**。实用主义把这件事写成方法，方法又落回土里，土变得更牢。后来美国的治理分成增长、福利、权利三种“形而上学”来回摆动，社会分成教会、民主、科技三个厅，个人一辈子被分成教育、健康、事业三块碎片，都是这条线上的东西。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如果每一步都必须有意义，意义反而被杀死。人和社会都需要一段**没有意义目标**的日子——混沌的、一锅粥的、正在成形而还没成形的日子。那段日子里，谁也说不清它“有什么用”，可后来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是从那里出来的。老子看见了混沌，庄子替混沌喊过冤，但他们都还没有把“介生”——那个混沌与秩序之间正在成形的阶段——讲清楚。完全的实用主义，最后会杀死实用。

这三条结论里，没有一条是要“打倒”实用主义。恰恰相反，这本书对三位哲学家怀有很深的敬意。皮尔斯一辈子穷困，为了一个词的名字和命运与人争；詹姆斯在最黑的时候，自己把自己从悬崖边拉回来；杜威把哲学从书斋里搬到了教室和街道。他们都是真诚的人，他们做的也都是真实有用的事。我们要做的，是看清楚：他们**用对了的那条路**，和他们**没看见的那片土**，是怎样同时发生的。

这本书也不想替代已经有的书。站上已经有了好几本讲这几位哲学家的书：讲皮尔斯的，讲詹姆斯的，讲杜威的，两本讲杜威教育的，讲罗蒂的，还有讲“实”的《实非实》。它们把人物、事件、概念和各自的缺口，都讲得很扎实。我们在这里不重讲这些。凡是它们已经讲清楚的地方，我们只引用、只指路；我们把力气花在它们没有碰的地方：**三条意义律为什么统一成了一条路，这条路长在哪片土里，土又怎样被路改写，以及路上为什么必须留下不问路的空地**。

写这本书时，我们还想学一点本书自己的主张。书里讲轮换和休耕，所以写书的过程中也留了空地：有的章先写，后来又搁了一阵再改；有的案例是闲聊时随口冒出来的，没有“用途”，却成了某一节的起点。读者在书里会看到这种痕迹。我们没有把它们擦掉。

最后，提醒一句。这是一本讲“无用”的书，所以请不要用读一本“有用的书”的办法读它。如果你读到某一节，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请先别急着合上。往后翻一翻，也许在第二十几章的某个地方，会碰到一个你自己的场景。如果一直没有碰到，那也没关系，这本书对你而言，暂时还在“一锅粥”的状态。等你哪天在路上随便走走，忽然想起其中的一句话，它也许就“介”出来了。

那就开始吧。先从一个摆夜市摊子的人讲起。

导读

一张地图，三句判词，九卷路线

◆ 一个夜市摊主的三个问题

县城的夜市晚上七点开张。老周在那里卖炒粉，卖了十一年。

有一年夏天，他一晚上被问了三次“为什么”，三次问的不是一回事。

第一次是他自己问的。旁边新来的摊子卖一种他没见过的酸汤粉，排了长队。老周心里一动：我能不能也弄出一样新东西？他回家试了三个晚上，把本地的酸笋和自己的炒法混在一起，做出一盘“酸笋炒粉”。这个问题问的是：**能不能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

第二次是熟客问的。一个常来的老太太吃了一口新炒粉，皱了皱眉：“还是原来那个好吃。”老周有点泄气。这个问题问的是：**吃的人高不高兴**。

第三次是他老婆问的。她说：“你要是天天这么试，摊子还摆不摆？你是给自己干，还是给新花样干？”这个问题问的是：**你还是不是你自己的主人**。

一晚上，三个问题。一个问创造，一个问幸福，一个问自由。老周没有读过哲学，可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三个问题之间来回走。有时候创造走在前面，有时候让熟客高兴走在前面，有时候他宁可什么都不改，就守着自己的锅。**他之所以能把摊子摆十一年，正是因为这三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统一成一个**。

这本书讲的，就是三位哲学家怎样把这三个问题各自统一成了一个，以及这件事的后果。

◆ 三句判词

全书有一句总判词，和两句分判词。

总判词：实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却在“有用”里发生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它不统一世界是什么，它统一路往哪里走。

分判词一：他们统一了路，土就被压平了；土被压平，路越走越窄。

分判词二：每一步都要有意义，意义就被杀死了；完全的实用主义，最后杀死实用。

总判词是本书的“解构”部分，在卷一、卷二。分判词一是“根源”和“回写”部分，在卷三到卷六。分判词二是“无用”和“介生”部分，在卷七、卷八。最后的卷九讲“发生”：不统一，那怎么办。

◆ 九卷路线

卷一解构卷：三个人，三条律。第1到第4章。皮尔斯统一于创造，詹姆斯统一于幸福，杜威统一于自由。每一章都拿文本说话，也都写出这个人在另外两条律上留下的痕迹——证明那是“偏向”，不是“只有”。第4章讲三人合起来怎样拼成一条“统一的路”，并把罗蒂当作下一代来看。

卷二形而上学卷：D维度的形而上学。第5到第8章。什么叫形而上学，为什么传统形而上学是S维度的，为什么实用主义是D维度的。统一路的同时，土也被偷偷统一了。

卷三根源卷：美国的土。第9到第12章。我们不谈“民族性”，只谈这片土怎样一层层长出来：多种来源缝在一起的土壤，只能统一路。土先长出意义分家的倾向，实用主义把它写成方法，方法又落回土里。

卷四治理与社会卷。第13到第15章。增长、福利、权利三种治理形而上学像钟摆。教会讲幸福，社会讲民主与自由，科技讲创造。

卷五人生卷：九块碎片。第16到第19章。一个人的教育、健康、事业，各自被一条律管着，碎成九块。

卷六中国卷。第20到第23章。杜威来过中国，胡适把他变成方法。“这有什么用”这句话，在中国这片土上被再统一了一次。可中国的土里也有另一样东西：庄子的“无用之用”。

卷七无用卷：混沌与反意义。第24到第27章。D在“一锅粥”的时候，根本谈不上意义。逼它每一步都有意义，就把一锅粥熬干了。

卷八介生卷。第28到第31章。混沌和秩序之间，有一个“正在成形”的阶段。老子讲了混沌，没讲介生。这一卷试着把它讲出来，也讲清楚它的边界：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

卷九发生卷。第32到第35章。准则不是实现某一条意义律，而是三个方程的平衡。三条意义律轮换着跑，像轮作，像休耕。要轮换，就得看清土的来历——这是未来知识经济的主场。

◆ 这本书和站上其他书的关系

站上已经有七本相邻的书，读者可以把它们当作这本书的“前一层楼”：

- 讲皮尔斯的（第133号），把他的“三”讲成一件事的三个阶段；
- 讲詹姆斯的（第202号），说他那条河只在“自我”那块地上流；
- 讲杜威的三本（第235号、第180号、第170号），分别说他“教人动手却靠书桌长”、“一生开路，逻辑只给修路记账”、“让每条路都回到同一个整体”；
- 讲罗蒂的（第178号），说他砸了镜子，却把世界“请出门外”；

· 《实非实》（第291号），把“有用”读成“实”，看真善美怎样聚在一起。

这几本书说得都对，而且都很细。这本书的位置，是它们下面一层：它们看见的多半是“症状”——尺子缺了一格，路只有一扇门，真善美的账算不平；这本书想找的是“根”——为什么尺子只剩一把。答案是：**意义被统一了，而统一它的那只手，长在一片特定的土里。**

凡是那几本书讲透的事，这里只点一句，告诉读者去哪本书里看。

◆ 几个大白话

书里会反复出现几个词，先说清楚。

S：一样东西“显露出来”的样子。不是一个定死的结构，而是随着事情往前走、一层一层显露出来的。

D：一串差异，一步接一步。事情的“路”。

E：土。一件事背后缠在一起的所有东西：钱、人、规矩、记忆、身体、天气。

意义三律：做一件事，最后为了什么——为了长出新东西（创造），为了自己做主（自由），为了舒坦高兴（幸福）。

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D的三种状态。一锅粥是混沌态，什么都搅在一起；正在成形是介生态，样子刚露头；定型是秩序态，可以说清楚它是什么、有什么用了。

形而上学：把世界背后的土，统一成一个“本来如此”。

读的时候，不必记住这些词。看案例就够了。案例里的人，没有一个懂这些词，可他们每天都在这些词里过日子。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成书说明 v

前言　这本书是从一场没有目标的闲聊里长出来的 vi

导读　一张地图，三句判词，九卷路线 ix

导论　一座“没用了”的澡堂 1

卷一　解构卷：三个人，三条律 **13**

第1章　皮尔斯：把路统一在“长出来”上 14

第2章　詹姆斯：把路统一在“过得好”上 26

第3章　杜威：把路统一在“自由”上 58

第4章　三刀合击与罗蒂 90

卷二　形而上学卷：D维度的形而上学 **123**

第5章　形而上学是S维度的：把土说成“本来如此” 124

第6章　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为何造出了D维度的形而上学 139

第7章　统一的路，偷运来统一的土 156

第8章　方法回写成土 170

卷三　根源卷：美国的土 **187**

第9章　缝起来的土 188

第10章　只能统一路 205

第11章　土、回写、沉淀：一片缝起来的土，怎样长出自己的办法 221

第12章　不是民族性，是E的发生 238

卷四　治理与社会卷 **255**

第13章　三种治理形而上学：增长、福利、权利 256

第14章　钟摆不是平衡 273

第15章　三厅：一个星期天走过三间屋子 287

卷五　人生卷：九块碎片 319
第16章　教育：三把尺子量一个孩子 320
第17章　健康：三把尺子量一副身体 338
第18章　事业：一班人，三把尺子 353
第19章　九块碎片：一个人的一生 371

卷六　中国卷：同一句“有用”，落在另一片土里 387
第20章　杜威来华：有用在中国被再统一了一次 388
第21章　“这有什么用”：一句口头禅，怎样长成一片土 403
第22章　一只没用的竹鸟：实用理性与无用之用 420
第23章　三句话一起说：棋牌室门口的家长 439

卷七　无用卷：混沌与反意义 453
第24章　混沌态：问它“为了什么”，是问错了时候 454
第25章　步步要意义，怎样把一锅粥熬干 473
第26章　坐过了站 488
第27章　把有用推到底 503

卷八　介生卷 521
第28章　老子见到了混沌，没有讲介生 522
第29章　介生态：样子刚露头的那一段 537
第30章　介生的识别与保护 555
第31章　反意义的边界 571

卷九　发生卷 591
第32章　三条律轮着跑：茶园里的一年 592
第33章　准则：三个方程平衡着长 609
第34章　E的同一性谱系：给土写一本家谱 625
第35章　知识经济的主流领地 637

结语　从无用到有用 647
附录一　与站上七本书的对账表 655
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660

导论

一座“没用了”的澡堂

◆ 一、拆澡堂那天

镇上的老澡堂是在一个周三被拆的。

拆之前，镇里开过两次会。理由说得很清楚：家家都装了热水器，来洗澡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一张票八块钱，一天卖不出三十张，水费电费都贴不上，“已经没什么用了”。

会上只有一个人反对，是常去的老马。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说：“我们几个老头，每天下午在里头泡一泡，躺一躺，说说话。”有人问他：“说话在哪儿不能说？公园不行吗？”老马想了想，答不上来。

澡堂拆了。半年以后，镇卫生院的医生发现，来看病的老人里，说“睡不好”“心里闷”的多了一些。没有人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也很难连。澡堂里那几个钟头，到底“有什么用”，本来就说不清：没人在那里办成过一件事，也没人在那里学会过什么。它就是一段热气腾腾、东一句西一句、谁也不必有目的的时间。

这本书要讲的，就是老马答不上来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一段说不出用处的时间，会有用？以及，为什么一个只认“有用”的时代，会把这种时间一段一段拆掉？**

这个问题看上去离哲学很远。其实不远。“有没有用”作为一个可以拿来判断一切的问题，有一个思想上的老家，叫实用主义。

◆ 二、实用主义：一句话的哲学

实用主义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在美国长出来的一种哲学。最早的几个人，在剑桥镇一起聚会，自称“形而上学俱乐部”——名字带点玩笑，因为他们聚在一起，正是要拆形而上学的台。

后来，皮尔斯写下了一条规则，大意是：想弄清一个想法是什么意思，就看它在实践里会引出什么效果；这些效果的全部，就是这个想法的全部意思。詹姆斯把这条规则带到了更大的世界，说一个想法是真的，就是它在我们的生活里“好使”、能兑现。杜威又把它带进学校和社会，说思想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好的思想就是能把一团乱的处境理顺的思想。

三个人各说各的，可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别问一样东西“本来是什么”，问它“会带来什么”**。别去找世界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本体，去看事情往前走的那条路。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转身。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问“世界到底是什么”——是水，是数，是理念，是上帝，是物质。问来问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实用主义说：先放下吧，问点能回答的。这个转身让哲学从天上下到了地上，从神学院走进了实验室、教室、法院和工厂。

所以实用主义一向以“反形而上学”自居。

可本书的第一个判断是：**它并没有真的离开形而上学。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做形而上学**。

要说清这一点，先得说清楚：形而上学到底在做什么。

◆ 三、形而上学在做什么：把土说成“本来如此”

海边有个小渔村。村里的老人常说：“海是有脾气的。”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一个渔民出海，遇上风浪，船翻了，回不来。另一个渔民出海，天气看着一样，却满载而归。为什么？真实的原因缠在一起，多得数不清：洋流、季风、鱼群的迁移、船的老旧、掌舵人的经验、那天早上谁喝了酒、谁的网刚补过……这些东西缠在一起，人看不见，算不清。

用SDE的话说，这团缠在一起、看不见又算不清的东西，就是**E**，事情的土。

人面对这样一团看不见的土，会怎么办？最省力的办法，是给它一个统一的说法：“海是有脾气的。”一句话，把成千上万根缠着的线，收成一个看得见、说得出、可以祭拜的“样子”。从此，翻船是海发了脾气，满载是海高兴了。这个“有脾气的海”，就是一个**S**——一个显露出来的、恒定的、统一的样子。

注意这里发生了什么：土的**来历**被拿掉了。洋流怎么形成，季风为什么今年早来，那条船是哪年造的、补过几回——这些“一样东西怎样一步步长成今天这样”的来历，我们叫它**同一性谱系**。“海有脾气”这句话，恰恰是把同一性谱系拿掉以后剩下的东西。来历一拿掉，剩下的就只能是“本来如此”。

本书给形而上学下的定义就从这里来：**形而上学，是对E的隐藏性所做的一个宇宙级别的统一性预设；它拿掉了同一性谱系，换来了S显露的恒定性和统一性**。

渔村的“海有脾气”是小号的形而上学。哲学史上的大号形而上学，做的是同一个动作，只是把“海”换成了“整个世界”：世界背后是“水”，是“理念”，是“上帝”，是“物质”。说法千差万别，动作是一样的——**把看不见的、有来历的、缠在一起的土，统一成一个看得见的、没有来历的、恒定的样子**。

因为它统一出来的是一个“样子”，一个S，我们说，传统形而上学是**S维度的形而上学**。

◆ 四、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它统一的是路

现在回到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说：别问世界本来是什么。这一刀确实砍在了S维度的形而上学身上。“海有脾气”？别管海有没有脾气，你只要看：这样想，出海时会不会更小心？会的，那这个想法就有它的意思。

这一刀砍得漂亮。可砍完以后，实用主义自己手里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路”。一个想法的意思，就是它引出的效果；一个想法的真，就是它走得通；一个思想的好，就是它能把处境理顺。一切都落在**往前走**上。用SDE的话说，落在**D**上——差异序列，一步接一步的那条路。

问题来了：路往前走，总得朝一个方向走。走得“通”，什么叫通？“好使”，是对谁好使？“理顺”，是理成什么样？

每条路背后都有一个“为了什么”。在SDE里，这个“为了什么”叫做D1，**意义**。意义有三条律：为了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叫**创造**；为了自己做得了主，叫**自由**；为了舒坦高兴，叫**幸福**。夜市上的老周，一晚上就被这三条律轮番问了一遍。

实用主义的三位奠基人，各自悄悄把这三条律收成了一条：

- 皮尔斯的“走得通”，归根到底是：探究能不能长出新的、更合理的习惯和规律——**创造**。
- 詹姆斯的“好使”，归根到底是：这样信、这样做，日子能不能过得踏实、圆满——**幸福**。
- 杜威的“理顺”，归根到底是：处境被理顺了，人能不能接着长、接着走更多的路——**自由**。

每个人都写过另外两条，可每个人都有一条站在最前面，把另外两条收在自己底下。卷一会用四章的篇幅，拿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证明这一点。

这个“收成一条”的动作，和渔村说“海有脾气”的动作，是同一种动作。渔村把缠在一起的土收成一个样子；实用主义把缠在一起的意义收成一条律。前者统一了S，后者统一了D。所以我们说：**实用主义是一种D维度的形而上学**。它反掉了“世界本来是什么”，却立起了“路本来该为了什么”。

而且，统一路的时候，土也被一起统一了。你说“好使就是真”，可是“好使”在一个老人身上和在一个年轻人身上是两回事，在一个渔村和在一座大城里是两回事。不问土，只问路，等于假定所有的土都一样——这就把土压平了。统一的D，偷运了一个统一的E。

◆ 五、为什么偏偏是那片土

一个思想为什么会长成这样？SDE的回答总是：去看它的土。

实用主义长出来的那片土，是一块多种来源缝起来的土。英格兰的清教，苏格兰的长老会，德国的大学，爱尔兰和意大利的移民，西部的边疆，东部的工厂和铁路，南方刚刚打完的战争。形而上学俱乐部里坐着的人，有律师，有科学家，有心理学家，有神学背景的人——站上第133号书已经注意到这几样“行当”凑在一桌的意味。

这样一块缝起来的土，有一个难处：**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你不能说“我们都信同一个上帝”，因为来源不同；你不能说“我们都守同一个祖宗的规矩”，因为祖宗不同。能共同遵守的，只剩一件事：**路怎么走**。你信什么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不问，我们只看结果，只看走不走得通。

所以，这片土先长出了一种倾向：意义各自分家——教会管幸福，社会管自由，工厂和实验室管创造——而大家共守的只是一套“怎么走”的规矩。实用主义把这种倾向写成了一套哲学方法。方法有了名字、有了书、进了大学和学校，又落回土里，成了土的一部分。土因此变得更牢。

这个“土长出路，路写成方法，方法沉回土”的圈，就是SDE三原理里的**回写**。本书第三卷专门讲它。第四卷到第六卷讲它的后果：国家治理怎样被三种“形而上学”来回拉扯，社会怎样分成三个厅，一个人的一生怎样碎成九块，以及这一切到了中国的土里，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 六、回到澡堂：从无用到有用

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这些跟镇上那座澡堂有什么关系？

有很深的关系。

一条被统一了意义的路，有一个性格：**它要求每一步都有意义**。皮尔斯的路，每一步都要朝着更合理；詹姆斯的路，每一步都要兑现；杜威的路，每一步都要把处境理顺。统一得越彻底，路上越容不下一段“不为了什么”的时间。

可是D——那条路——并不总处在可以谈意义的状态。

有时候，事情是一锅粥：什么都搅在一起，看不出头绪，也说不出方向。这叫**混沌态**。有时候，事情正在成形：样子刚刚露头，还说不清它是什么，一碰就散。这叫**介生态**。只有到了**定型**的时候，你才能说清它是什么、为了什么、有什么用。

老马他们在澡堂里的那几个钟头，就是一锅粥。东一句西一句，谁也没打算说出什么。可是谁家儿子在城里遇到了难处，谁的老伴最近脸色不好，镇上要修的那条路该怎么走才不挡着菜市场——这些事，往往就是在一锅粥里，先“正在成形”，后来才定了型，才变成了“有用”的消息、“有用”的帮忙、“有用”的主意。

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阶段，本身无法讨论意义；可后来所有的意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一个要求每一步都有意义的思想，会把这两个阶段当作浪费——“说话在哪儿不能说？”——然后把它们拆掉。拆掉的那一天，看上去什么都没少；半年以后，少的东西才显出来。

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意思：**从无用到有用**。不是“无用也挺好”，而是：**有用是从无用里长出来的**。一个只会要“有用”的人、社会、哲学，等于只要果子，不要开花之前那段看不见的日子。

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一只碗之所以能盛东西，是因为中间是空的。庄子把这个意思说得更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中国思想里早就看见了这件事。但我们会在卷八说明：老子和庄子看见的，主要是“混沌”这一头；混沌与秩序之间那个“正在成形”的阶段——介生态——他们还没有讲出来。而恰恰是这个阶段，最脆弱，也最容易被“步步要意义”的手掐死。

◆ 七、本书的方法：三个方程，不偏一头

那么，不统一意义，人该照着什么做事？

本书的答案，用SDE的三个方程来说：

- **S＝F(D, E)**：显露出来的样子，是路和土一起做出来的。
- **D＝G(S, E)**：路往哪里走，是样子和土一起推着的。
- **E＝H(S, D)**：土本身，也被样子和路一次次改写。

三个方程，没有一个能单独拿出来当“最终答案”。实用主义的毛病，是把第二个方程里的D，拿它最前面那一格——意义——统一了，然后让另外两个方程都听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毛病，是把第一个方程里的S统一了。它们犯的是同一类错：**拿一个方程，压住另外两个**。

所以本书提出的准则不是“实现某种意义”，而是**三个方程的平衡发展**。在实践里，这意味着三件事：

第一，三条意义律**轮换着跑**。像种地的人懂得轮作：这块地今年种豆，明年种麦，后年休一休。一个人、一个社会，也有该以创造为先的时候，有该以幸福为先的时候，有该以自由为先的时候，还有该什么都不为、让地歇一歇的时候。

第二，要轮换，就得**看清土的来历**。为什么这块地今年该种豆？因为它去年种了麦，前年遭过水，土里的东西变了。看清一片土一步步怎样变成今天这样，就是看清它的**同一性谱系**。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信息和知识发生能力，过去做不到，今天开始有了可能。本书最后一卷会说：这将是未来知识经济真正的主场。

第三，**给混沌和介生留地**。不是什么都要有用，不是每一步都要算账。要有澡堂，有溜达，有没有议程的闲聊。

◆ 八、一条总轴：发现学与发生学

这本书的每一个判断，最后都落在一条轴上：一样东西，是被当作“本来就在那里、等人去找”，还是被看作“正在一次次长出来”。前一种看法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

渔村说“海有脾气”，是发现学：脾气本来就在海里，人只要认出它、顺着它。说海的样子是洋流、季风、船和人一年年缠出来的，是发生学。

实用主义在这条轴上的位置很微妙。它拼命反对发现学——不要找世界背后那个现成的本体！——它讲探究、讲经验、讲生长，处处都是“长出来”的话。可是它给“长出来”配了一样现成的东西：**一个早就定好的方向**。皮尔斯的路早就定好了往“更合理”长，詹姆斯的路早就定好了往“更好使”长，杜威的路早就定好了往“更多的路”长。路是发生的，方向却是发现的——它被当作本来就在那里，不需要问它是怎么来的。

这种看法，本书叫它“**发现学的发生**”：承认事情是长出来的，却偷偷给它配了一台装好的发动机、一个画好的终点。这是比旧形而上学更难看见的形而上学，因为它满口都是发生的话。

要把它看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去问那个方向本身的来历。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方向？它是从哪片土里长出来的？它在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反而碍事？这一问，就把“方向”从发现学拉回了发生学。全书九卷，说到底就是在一遍遍地问这一句。

◆ 九、母题：一张“无用怎样变成有用”的纠缠谱

一本SDE专著有一个母题。本书的母题就是书名：**从无用到有用**。但这句话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它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样子发生。我们把它摊成一张九格的纠缠谱：横着是土的三个面（E1三界：理念·现实·自我；E2信息：符号·逻辑·数学；E3能量：内能·动能·势能），竖着是显露的三个面（S1规范：对比·变化·分布；S2模态：粒·波·场；S3价值：真·善·美）。每一格，是“无用变有用”在那里发生的一种样子。

S1×E1（规范×三界）：一个人在自我界里攒下的“无用的偏好”，在现实界里某一天变成了一条可以对比、可以分布的规矩。澡堂里老人们的闲聊，变成了镇上修路的一条意见。——已发生，卷七。

S1×E2（规范×信息）：一个没有用处的符号游戏，后来成了一门学问的记号。皮尔斯那几万页没发表的手稿。——已发生，卷一。

S1×E3（规范×能量）：一段“空转”的势能，在某个变化的节点被放出来，成了新的节奏。休耕的地第二年的收成。——已发生，卷九。

S2×E1（模态×三界）：一个家庭的“气氛”，作为一种场，在没有任何人有意经营的时候，正在成形。孩子说不出家里哪里好，只觉得回来就松下来了。——**尚未发生**：这一格的“无用”还没有人能把它显露成可讲的样子，本书在卷八只能指个方向。

S2×E2（模态×信息）：一句话在一锅粥的闲聊里像波一样传开，到了另一个人那里，变成了一粒清楚的主意。——已发生，前言与卷八。

S2×E3（模态×能量）：一群人散开的动能，在某个空场上聚成一个场。夜市就是这样从几个零散的摊子长出来的。——已发生，卷四。

S3×E1（价值×三界）：一件在理念界里“不真”的事——比如一个童话——在自我界里先成了“美”，后来在现实界里成了“善”。——已发生，卷六（庄子）。

S3×E2（价值×信息）：一个“没用的知识”，被一代代人追问来历，最后成了真的。钻石怎样长成钻石。——已发生，卷九。

S3×E3（价值×能量）：一种“无用的善”——不图回报、也不图被看见的好——它的能量从哪里来、怎样一代代传下去，它的谱系是什么样的。——**尚未发生**：我们还不会给“无用的善”写家谱。本书在结语里把它当作一个留给将来的问题。

九格里有两格标着“尚未发生”。这不是缺漏，而是本书自己的主张：一张纠缠谱，不应该被填满。填满了，它就成了一张定型的表，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留着两格空，是给介生留地。

◆ 十、怎样读这本书

本书九卷，前面有导读。卷一最难，因为要贴着三位哲学家的文字走；如果读者急着想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可以先读卷五（人生卷）和卷七（无用卷），再回头读卷一。

书里每一节都从一件日常小事开头。这些小事都不是为了“举例说明”——在SDE里，一件小事不是一个大道理的例子，它本身就是大道理正在发生的地方。

读完以后，如果你哪天路过一个快要拆掉的、“没什么用了”的地方，心里会停一下，问一句：它没用，是真的没用，还是正在一锅粥里、还没成形？——那这本书就有了它的用。

当然，这也说不准。

卷　一

解构卷：三个人，三条律

卷　序

实用主义的三位奠基人都说“看效果”，可三个人心里的“效果”不是同一件东西。第1章到第3章贴着皮尔斯、詹姆斯、杜威自己的文字走，看他们各自把路统一在哪一条意义律上——创造、幸福、自由，也看另外两条律怎样被收在底下。第4章把三刀合在一起，再看下一代的罗蒂把这件事做成了什么样子。

01

第1章

皮尔斯：把路统一在“长出来”上

◆ 1.1　修车铺里的耳朵

县城东头有一家修车铺，老板姓谭，五十多岁。他有一样本事：车开进来，发动机响几声，他就能说出毛病大概在哪儿。

他的徒弟小罗跟了他两年，一开始什么也听不出来。在小罗耳朵里，所有发动机都是“轰轰”的一团。谭师傅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听的，只会说：“你再听，再听。”

小罗就一辆一辆地听。听得多了，某一天，一辆面包车开进来，他忽然觉得那声“轰”里头有一点“咔”。他说：“是不是皮带松了？”打开一看，果然。

从那天起，“咔”在小罗耳朵里就是一样东西了。它原来没有，现在有了。不是发动机变了，是小罗身上长出了一个新的**习惯**：一听到那样的声音，手就会去摸皮带。

假如你问小罗：“‘皮带松了’是什么意思？”他不会给你下定义。他会说：就是你一听到那个“咔”，去摸皮带，会发现它晃；你把它紧一紧，那个“咔”就没了。**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它会引出的那一串做法和后果。**

这正是皮尔斯在1878年那篇文章里说的意思。那篇文章叫《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后来被当作实用主义的出生证。里面那条后来被叫做“实用主义准则”的规则，大意是：要弄清一个概念，就去想它可能带来的、在实践上有意义的效果；你对这些效果的设想，就是你对这个概念的全部理解。

站上第133号书把这条准则翻成了一句大白话：“意思在路上。”这句话说得好。本章不重讲它，只问一个它没有问的问题：**路，往哪里走？**

小罗耳朵里长出“咔”的那一刻，路的方向是清清楚楚的：从“什么都听不出”，走到“听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也不是为了自己做主，是为了**长出来**。

皮尔斯的整套哲学，就是把这一个方向，推到了整个宇宙。

◆ 1.2　三处证据：意义怎样被收进“创造”

说皮尔斯把意义统一在“创造”上，不能凭感觉。我们拿他自己的三段文字说话。

第一处：信念就是习惯，探究就是长习惯。在1877年的《信念的确定》里，皮尔斯说，怀疑是一种不安，信念是一种平静；人探究，是为了从怀疑走到信念。而信念的本质，是一个**行动的习惯**。这一层看上去像在讲“舒坦”——从不安走到平静。可接下来他做了一件事：他把四种确定信念的办法排了队——固执的办法、权威的办法、先验的办法、科学的办法——前三种都能让人平静，都被他放到了后面。只有科学的办法被他留了下来，理由是：只有它让信念受到“外在的、不由我们的东西”的检验，并且会在一群探究者那里不断往前修正。

这里的分量很重。平静（幸福）是有的，但**平静不算数**；算数的是信念能不能一直往前长，长成更好的习惯。幸福被放在了创造的底下。

第二处：宇宙本身在长习惯。　1891年到1893年，皮尔斯在《一元论者》杂志上连着写了一组文章。在那里，他不再只谈“概念怎样弄清楚”，而是公开谈宇宙：世界一开始有大量的偶然和自发，偶然之中慢慢生出习惯，习惯越来越

牢，最后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规律。在他的设想里，自然规律不是从来就在的，而是**长出来的**。宇宙是一个越来越会养成习惯的东西。

这是一幅彻头彻尾的“创造”宇宙图：存在的根本动作，就是长出原来没有的规律。

第三处：最高的善，是“具体合理性的生长”。到了二十世纪初，皮尔斯在讲伦理和美学时，给“人最终应该追求什么”下了一个判断：最高的善，不在任何一个已经达到的状态里，而在于合理性在具体世界里不断地生长。不是“合理”，是“合理的生长”；不是到达，是一直长下去。

三处证据摆在一起，一条线就出来了：一个概念的意思，在它会长出的习惯里；宇宙的历史，是习惯和规律长出来的历史；人的最高的善，是合理性继续长。**从一句话的意思，到整个宇宙，再到人该怎样活，皮尔斯用的是同一条律：长出来**。

这里要交代一个用词。站上第133号书讲皮尔斯时，用过“特征律”这个词，指的是“差异要给出感觉”、一样东西有了自己的特征才算露头。本书说皮尔斯统一于“创造”，和它并不冲突，可以这样理解：**创造律，就是特征律在一路运行**——一个差异给出一个新特征，新特征又被养成习惯，习惯又变成下一次差异的土。小罗耳朵里的“咔”，先是一个特征露头，然后被养成手去摸皮带的习惯，这个习惯又让他下一回能听出更细的东西。特征一路长下去，就是创造。皮尔斯的宇宙，就是一台特征律永远在运行的机器。

◆ 1.3　另外两条律：在，但被收着

说皮尔斯“统一于创造”，不等于说他没写过自由和幸福。他写过，而且写得很美。看清他怎样写另外两条律，才能看清“统一”是怎样发生的。

先看幸福。刚才说了，《信念的确定》里，怀疑是不安，信念是平静，人天生要从不安走向平静。这其实是幸福律最朴素的样子：人要舒坦。皮尔斯没有否认这一点。他只是说，舒坦来得太便宜，就不算数。一个固执的人，不听任何反对的话，也能很平静；一个服从权威的社会，也能很安稳。可这样的平静，在皮尔斯眼里是一种“停”——它让信念不再长了。**所以幸福在他那里，只是创造的一个信号灯：亮了，说明这一段长完了；但真正的目标，是下一段**。

再看自由。皮尔斯晚年写过一篇奇特的文章，1908年发表，讲的是一种叫“musement”的心理活动。站上第133号书把它译作“玩味”，很传神：一个人不带任何目的，任凭心思在各种念头之间游荡，就像在一个花园里随便走。皮尔斯说，这种游荡没有规则，“除了自由本身的规则之外”。这一段读来几乎是对自由律的礼赞，133号书把它判为一种“受保护的混沌”，也说它站在自由律这一边。

可是请看皮尔斯写这篇文章是要干什么。文章的题目是《一个被忽视的上帝存在论证》。他说，一个人在这样的玩味里游荡久了，心里会自然地浮出一个假设——有一个上帝——而这个假设，会在人的心里越长越有力量。也就是说，**玩味的自由，最后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信念长出来**。自由是一片花园，可这片花园是苗圃。

这就是“统一”的意思。不是只有一条律、另外两条都不见了，而是**另外两条都被拿来给这一条服务**：幸福是长完一段的信号灯，自由是长出新东西的苗圃。三条律都在场，可只有一条在发号施令。

◆ 1.4　唯一明说自己在做形而上学的人

有一件事常常被忽略：三位奠基人里，**只有皮尔斯从来没有假装自己不做形而上学**。

詹姆斯说，实用主义是一种“调停”的方法，可以让很多形而上学的争论自己消失。杜威说，哲学要从“旁观者”的位置上下来，去处理人的问题。他们都给人一种印象：实用主义来了，形而上学就可以收摊了。

皮尔斯不是这样。他确实说过，实用主义准则可以帮我们扫掉大量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空话——一个概念如果想不出任何实践上的效果，它就是空的。可扫完以后，他说，剩下的东西里，还有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值得认真做。1891年那组文章的第一篇，题目就叫《理论的建筑》——他要给整个宇宙搭一个架子，而且他真的搭了：偶然、规律、习惯，三样东西一层层搭起来，从宇宙的开头搭到人心里的逻辑。

这件事对本书的论证很重要。它说明，“实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个判断，在皮尔斯身上**不需要证明他偷偷做了形而上学**——他公开做了。需要证明的只是：他做的那个形而上学，统一的是什么。

答案已经在前面三处证据里了。皮尔斯的形而上学，表面上统一的是“世界的构成”：偶然、规律、习惯。可这三样东西不是并排站着的，它们是一条路上的三站：从偶然出发，经过习惯，走向规律。整个宇宙被写成了一条路，而这条路只有一个方向——**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牢的规律**。

所以皮尔斯的形而上学，是一个**S维度的外壳，包着一个D维度的心**。外壳上写着“世界是什么”，心里装着“世界往哪里走”。后来詹姆斯和杜威把外壳拿掉了，说我们不谈世界是什么——可那颗心，他们一个人也没有拿掉。他们只是各自给它换了一个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说，皮尔斯是实用主义的“底片”。在他身上，D维度的形而上学还和S维度的形而上学连在一起，看得一清二楚；到了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外壳拿掉了，里面那颗心反倒不容易被看见了。**要认出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最好从皮尔斯认起**。

◆ 1.5　为名字而战：两种统一撞在了一起

皮尔斯一生中有一件常被当作趣事讲的事。

1898年，詹姆斯在加州的一次演讲里，把“实用主义”这个词推向了大众，并且大方地说，这个词的发明人是皮尔斯。按理说皮尔斯该高兴。可是几年以后，眼看着“实用主义”被詹姆斯和其他人用得越来越宽、越来越随便，皮尔斯在1905年写文章宣布：他要给自己的学说另起一个名字，叫“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他说这个名字够难听，没人会来“拐走”它。

站上第133号书把这件事讲成“为名字而战”，并指出皮尔斯这样做，等于主动切断了自己的思想和后来世界之间的一部分回写。这一层讲得很到位。本书要在它上面再往前走一步：**这场名字之争，其实是两种D维度的形而上学撞在了一起**。

詹姆斯把“有用”读成了“对人好使”——让人过得下去，让人心里踏实，让人有勇气去信、去活。这是把路统一在**幸福**上。皮尔斯看到的危险是：如果“真”就是“让人好使”，那么一个让人舒服的信念，就算对了；探究会停在半路，停在“平静”那一格。而在皮尔斯的宇宙里，停在平静就是停止生长。

所以他非争不可。他争的不是一个词的版权，是**路的方向**：路该往“长出来”走，还是往“过得好”走。两个人都说“看效果”，可他们心里的“效果”，一个是创造的效果，一个是幸福的效果。同一个词底下，坐着两条不同的意义律。

这件事说明了一个要紧的道理：**意义一旦被统一，统一者之间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两个人可以对很多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可是对“路最终为了什么”，各自的答案就是各自的地基。地基不能共享，只能分家。皮尔斯给学说改名，就是分家。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分家，后来在美国的社会里被放大成了好几次分家。

◆ 1.6　连爱也是为了长

1893年，皮尔斯写了一篇题目很怪的文章：《进化的爱》。

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铁路、钢铁、石油，一夜之间造出了巨富，也造出了一套很流行的说法：每个人只管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自然会变好；竞争淘汰弱者，进步就来了。皮尔斯给这套说法起了一个讥讽的名字，大意是“贪婪的福音”。他很不客气地说，这个世纪会被后人记作把贪婪当成了美德的世纪。

他拿什么来对抗“贪婪的福音”？拿爱。他说，宇宙的进化，真正的动力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一种“爱”：一个念头被另一个念头温柔地接住、养大，一个习惯在另一个习惯的怀里长成新的样子。他用了基督教里那个古老的词——圣爱——来讲宇宙怎样长。

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皮尔斯终于站到了幸福那一边：爱，难道不是让人温暖、让人舒坦的东西吗？

可是请细看他的爱是做什么的。这种爱不是为了让被爱的东西舒服，而是为了让它**长**；不是为了守住，而是为了生出新的。在他那里，爱是创造的发动机，和“贪婪”争的是同一个位置——**谁来推动进化**。他反对的不是“进化”这条路，是用贪婪来开这条路。

这是皮尔斯统一得最彻底的一处：连爱都被他收进了创造律。镀金时代的人说“竞争使世界长”，皮尔斯说“爱使世界长”——两者吵得很凶，可“世界要长”这一句，两边一字未改。

这里也露出了一点土的消息。一个把一切都收进“长”的哲学家，和一个把一切都收进“增长”的时代，站在同一片土上。皮尔斯是那个时代最尖锐的批评者，可他批评它的方式，是给它的“长”换一台更高贵的发动机。卷三和卷四会回到这件事上来：后来美国治理里的“增长”那一派，和皮尔斯并不同路，可它们长在同一条根上。

◆ 1.7　钻石里的“会”：土被留在了将来

站上第133号书讲过皮尔斯一个有名的例子：一颗钻石，从结晶到被烧掉，一直放在一团棉花里，从来没有被任何东西划过、压过。请问：它是硬的吗？

1878年的皮尔斯说，这个问题在实践上没有区别，说它硬、说它软，只是说法不同。可是到了1905年，他改了口：说它硬，是对的；因为“硬”的意思是，**如果**你拿东西去划它，它**会**划不动。这个“会”是真实的，哪怕从来没有发生过。

133号书把这个转变读作：钻石的“会”，藏在土里。这一点我们同意，并且要在它上面再往前走一步：**皮尔斯给土留了一个位置，但这个位置在将来，不在过去**。

这颗钻石为什么会硬？你可以从两个方向回答。一个方向是“会”：如果你去划，它会划不动——这是往前看，看它将来的效果。另一个方向是“来历”：它是在地下多深的地方、多高的压力、多少年里，一个碳原子一个碳原子地排出来的；它在矿里怎样被挖出来，经过谁的手，为什么最后进了一团棉花——这是往后看，看它的**同一性谱系**。

皮尔斯选了第一个方向，而且只选了这个方向。他承认土是真的，可他只用“会怎样”来说土，不用“怎样来的”来说土。这和他的创造律完全一致：创造律只朝前看，它问的永远是“接下来会长出什么”，而不是“它是怎么长到今天的”。

这一选，代价很大。一样东西“会怎样”，人人都可以试；它“怎样来的”，却要一样一样去追，追到很深的地方。前者给了科学实验一个干净的入口，后者才是SDE所说的E的同一性谱系。**皮尔斯给了土一张未来的身份证，却没有给它一本家谱**。本书最后一卷会说，那本家谱，正是今天的知识发生最该补上的东西。

◆ 1.8　小罗身上的三条律

讲到这里，不妨回到修车铺，用小罗来做一次对照。

小罗听出那个“咔”，是创造律在跑：一个原来没有的特征露了头，又被养成了一个习惯。可是小罗这两年，不是只有这一条律在跑。

他刚来的头三个月，几乎天天想走。活脏，挣得少，谭师傅脾气又急。有一天下午，铺子里没车，谭师傅从柜子里摸出两个烤红薯，一人一个，坐在门口晒太阳，什么都没说。小罗后来说，就是那个下午，他决定留下来。那个下午什么都没学到，什么新特征也没长出来，只是舒坦。这是幸福律在跑。

又过了一年，有一回谭师傅不在，一辆车开进来，毛病很怪，小罗拿不准。他可以打电话问师傅，也可以先自己试。他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先自己试。试错了一回，试对了第二回。那天晚上他很得意，不是因为修好了车，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拿的主意”。这是自由律在跑。

三条律在一个徒弟身上轮流出场：有时候是长本事要紧，有时候是待得下去要紧，有时候是自己做主要紧。哪一条都不能少，哪一条也不能一直站在最前面。如果谭师傅只认创造律——“你今天又长了什么本事？”——那个晒太阳的下午就成了浪费，小罗大概早就走了。

皮尔斯的哲学，恰恰是一个只问“今天又长了什么”的师傅。这个师傅很了不起，他教出来的东西后来改变了好几门学问；可是在他的屋子里，晒太阳的下午是没有位置的——或者说，只有当它“将来会让徒弟长本事”时，它才有位置。

本书后面会反复回到这个对照：**三条律本来是轮流出场的，统一的形而上学把轮流变成了排位**。

◆ 1.9　他看见了混沌，却把混沌收进了“将来”

现在来看皮尔斯这条统一的路，代价在哪里。

奇怪的是，三位奠基人里，**最懂混沌的恰恰是皮尔斯**。他说宇宙一开始是大量的偶然；他专门为“偶然是真实的”辩护过，给这种看法起了名字；他晚年礼赞那种不带目的的玩味。可以说，他比詹姆斯和杜威都更清楚：一锅粥是真实的，正在成形是宝贵的。站上第133号书甚至从他的思想里读出了“纯秩序也是死”和“正在成形最宝贵”这样的话。

可是，请看他怎样安放这锅粥。

在他的宇宙里，偶然是**为了生出习惯**而存在的；在他的知识论里，怀疑是**为了走向更好的信念**而存在的；在他的晚年文章里，玩味是**为了让一个假设浮上来**而存在的。混沌在他这里有一个非常体面的位置，可这个位置是“预备”的位置——它是将来的规律的原料，是将来的信念的种子。它被允许存在，是因为它**将来会有用**。

还有一个更深的地方。皮尔斯说，真理是一群探究者如果一直探究下去、最终会同意的那个东西。这个“最终”，在他那里是一个无限远的终点；这个“一群人”，在他那里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共同体。注意，这个共同体是没有土的：它不属于哪个镇、哪个年代、哪种语言，不会遇上经费断了、实验室关了、学派吵翻了。它是一个被压平了的E——为了让“一直长下去”这条律能够成立，土必须被设想成可以无限延续、处处一样的东西。

于是我们看到了皮尔斯的统一怎样发生：**路被统一在“长出来”上，混沌被收进了“将来会长出来的东西”里，土被压平成一个没有来历的无限共同体**。一锅粥本身不算数，算数的是它熬出来的东西；正在成形本身不算数，算数的是它最后定的型。

这样一来，混沌在理论上被保住了，在价值上却被取消了。它只能以“预支的有用”的身份活着。

而这正是本书要追问的：有没有一些一锅粥，是永远也熬不成“有用”的，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让别的东西能够长出来的条件？就像澡堂里那些没有结果的下午，就像皮尔斯本人晚年在宾夕法尼亚乡下那些穷困的、写满了却大多没有发表的年月？

皮尔斯1884年离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从此再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大学职位；1891年又离开了海岸测量局，此后多年在乡下靠零星的稿费和朋友的接济过活。他留下了数万页手稿，大部分在他生前没有出版。如果用他自己的尺子量——“它长出了什么习惯、什么规律”——那些年月几乎是“无用”的。可正是这一大锅没熬成型的粥，后来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捞出东西来，长成了符号学、逻辑学、科学哲学里的好几条新路。

皮尔斯的一生，比他的理论更懂“无用之用”。

◆ 1.10　小结：第一刀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皮尔斯拆掉了“世界本来是什么”的形而上学，却立起了“一切都为了长出来”的形而上学；他把幸福当作信号灯、把自由当作苗圃、把混沌当作原料，三样都在，都替创造干活。

这是本书对实用主义的第一刀。它不砍皮尔斯的准则——“意思在路上”是对的；它砍的是准则底下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手悄悄规定了，路只有一个方向。

下一章，我们去看另一只手。它和皮尔斯的手几乎同时伸出来，用的是同一个词，指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不是长出来，是过得好。

◆

02

第2章

詹姆斯：把路统一在“过得好”上

◆ 2.1　婚宴上的一句话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场真实的婚宴。

县城一家酒店，周六中午，十八桌。新郎是镇东头人，新娘是山那边乡里人，两家人坐在大厅的两边，中间隔着一条红地毯。

两家的亲戚，三个月前为了彩礼和酒席的规格，来回谈过好几轮。谈成了，可谈的时候说过的几句话，各自都还记着。所以今天开席，左边一桌和右边一桌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客气。客气得太周到，就是还没熟。

流程单上，第六项是“双方家长上台致辞”。新娘的父亲是个种果树的，一辈子没上过这样的台。他拿着司仪给的稿子念，念到一半声音发紧，把“把女儿交给你”念成了“把女儿交给你们”，又自己停下来，想改回去，越改越乱。台下男方那一桌，有人低头看手机；女方那一桌，几个亲戚互相看了一眼。整个大厅的气氛正在往下沉。

司仪姓柯，四十来岁，干这行十几年。他没等老人把稿子念完，笑着把话筒接了过来：

“亲家公太激动了。稿子上写的是‘把女儿交给你们’，可我听出来了，他心里想的是——‘我把最好的那一筐果子交出去了，你们要是糟蹋了，我可是认得路的！’”

全场笑了。男方那一桌先笑，女方那一桌跟着笑，老人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抹了一把脸。老柯趁势说：“好，这样的亲家，两边都是一家人。掌声！”

两边的人同时鼓起掌来。中间那条红地毯，一下子好像窄了。

接下来老柯又做了一件流程单上没有的事。原本第七项是“新郎当众表三条决心”，他看了看台下，把它换成了请新郎给岳父斟一杯茶。新郎端着茶过去，老人接了，两个人都没说话，台下又是一阵笑。后面的菜上来，大厅里的声音，比开席时大了一倍。

事后有人问老柯，你怎么知道那句话该那样说。他说：“我不知道老人心里想什么。我就看，哪句话说出去，这两桌人坐得住。”

现在请注意这句话：“哪句话说出去，这两桌人坐得住。”那句“他心里想的是……”，是真的吗？谁也没有问过老人。也许老人想的根本不是这个。可是在这个大厅里，这句话“管用”——它把一个往下沉的中午托了起来。

这就是詹姆斯在1907年那本《实用主义》里要说的事。他把一个观念的“真”，翻译成了一个很家常的问题：这个观念要是信了，日子里会有什么不同？他还用了一个生意上的词，“现金价值”：一个观念值不值，就看它能兑出多少现钱来。他说，真理不是一个观念身上本来就盖着的一块印章，而是在事情一路发展下来的过程里，被“做成”真的。（这一层，站上第202号已经讲得很细，本章只点到这里，不重复。）

老柯的一句话，就是在宴席上兑出了现钱。

上一章结尾我们说过，詹姆斯伸出的是另一只手：“不是长出来，是过得好。”现在可以看清这只手的样子了。同样说“看效果”，上一章修车铺里看的效果是：“咔”听出来了没有，听出来了就是长出了新本事。婚宴上的老柯看的

效果是：这一桌坐得住吗，那一桌笑了吗。前一种效果，是路在往前长；后一种效果，是日子在往下过。

本章要问的，就是这第二种尺子：它是怎样从一个很好用的办法，变成了所有路的唯一尺子。

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先给老柯一句公道话。他做得对，而且做得很好。一个能让两桌人坐得住的司仪，比一个照着稿子念完的司仪强得多。詹姆斯的了不起也在这里：他把“真”这个词从天上拉回了饭桌，让哲学家更认真地问：“这对一个人的日子，到底有什么用？”

本书不是来否认这一点的。本书只是来问：当“坐得住”成了衡量一切话的唯一尺子，老柯没有问的那些事，到哪里去了？

把“现金价值”这个词说得更白一点：一个观念，就像一张期票。

你拿着一张期票，上面写着“凭此票可兑某物”。它是真票还是假票，光看票面看不出来，要拿到柜台上去兑。兑出来了，是真的；兑不出来，是废纸。詹姆斯的意思，就是这样：别在票面上争论它多漂亮、出身多高贵，拿去兑。

婚宴上，老柯的一句话是一张期票，票面是“这位亲家，嘴上不说，心里是疼女儿的”，柜台是那一桌人的反应。兑出来了：笑，掌声，后面的菜吃得下去。这张票是真的。

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一是它朴素，谁都用得上，不需要懂哲学；二是它把很多没完没了的空吵，变成了可以试的事。两家人若是为“谁家的规矩才对”吵起来，司仪不用裁判，只要试：按这家的办法，宴席过得下去吗？按那家的呢？

但这个办法也有一个沉默的前提：柜台只有一个，兑出来的只有一种货。票的真假，只看能不能在“日子顺不顺”这个柜台兑成现钱。别的柜台——比如“这件事是不是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在这里不开门。

这个柜台怎么只有一个，怎么变成了所有人的柜台，又让什么票变成了废纸，是后面几节要弄清的事。

再多说一点老柯的手艺，因为它里面藏着詹姆斯最好的地方。

老柯有一个习惯：每场婚宴开始之前，他先到后厨转一圈，到两家人的长辈身边坐五分钟，不谈婚礼，只闲聊。他说，这五分钟里能听出来这场酒席的“天气”。哪家有不痛快，哪家有不好说的事，哪个亲戚是不能让他多喝的，他心里大概有数。台上的那句话，是这五分钟加十几年场子磨出来的。

这一点要记下来。那句“兑得出现钱”的话，不是凭空来的，它的背后是一个人对这片场子的熟。詹姆斯的尺子，量的是话说出去以后的效果；可一句话能不能说得出效果，要看说话的人手里攥着多少对这片土的了解。这一层，尺子本身不量。

还有一点。老柯那句话是一个“善意的假设”：他替老人编了一个心思。这个假设恰好说中了，或者至少没有说错到让人难堪。要是编偏了呢？假设老人那一刻心里想的是女儿将来的日子，想的是怕她吃苦，眼眶都红了，老柯却拿他开了个“认得路”的玩笑——这一桌也许照样笑，但老人心里会留下一个小疙瘩，一个宴席上谁也看不见、过一个月才会冒出来的疙瘩。

这并不是在批评老柯。是在指出，“当场兑现”和“事后兑现”，是两张不同的账。詹姆斯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才不断地在“便当好使”后面加“长远”、加“大体上”。但我们要看清楚：他加的，是把账期拉长；他没有加的，是另一把量别的东西的尺子。

“真”在詹姆斯那里，不是和事实对上号，而是在人的日子里兑得出现钱。

◆ 2.2　三处证据：意义怎样被收进“过得好”

说詹姆斯把路统一在“过得好”上，同样不能凭感觉。我们拿他自己的三本书说话。

第一处：《实用主义》（1907）里的“兑现”。这本书是他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系列演讲，副题很有意思，大意是“一些老办法的新名字”。书中最常被引用的就是前面说的“现金价值”：把一个观念放到具体的经验里，问它兑出什么。他还有一个说法，大意是，真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思想上“便当好使”的东西。这句话让他招来了很多火力，以至于他后来在好几处加了限定：要在大体上、长远来看也好使。

这个限定很要紧。它说明詹姆斯自己知道，“当下舒坦”和“真”不是一回事。但是请看他加限定的方式：他没有去找一把别的尺子，他是把同一把尺子拉长——从今天好使，拉到长远也好使。尺子还是那一把，量的还是“好使”。

第二处：《信仰的意志》（1896）里的“活的选项”。这是詹姆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他问：在证据不够的时候，人能不能相信？他的回答是：有时候能，而且应该。但有条件。他为此造了一套分类：一个选项如果对你来说“活着”（你真的可能去选），又“逼人”（你不选也等于选了），又“重大”（一生就这一次），那么在证据决不了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的“情感的天性”来替你拿主意。

他给的一个例子非常家常：你要不要相信一个人会喜欢你？如果你信了，你的态度会变，对方因此真的更可能喜欢你。“信”，参与造成了那件事的“真”。

放回刚才的婚宴。新郎斟茶的时候，如果没有一点“我会对她好”的信，这杯茶就是空的；而这个信一旦有了，日子往后的样子，就被这个信悄悄改了一点。誓言不是对未来的预报，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兑现的东西。詹姆斯在这里说得又对又美。

可请注意文章的落脚点：人为什么可以这样信？因为不信，日子过不下去，人也活不好。信的资格，是从“活得下去”这里领的。

第三处：《宗教经验种种》（1902）里的“果子”。这是他分量最重的书之一，是他在爱丁堡的系列讲座。他研究宗教，立了一个原则，大意是：不问一种宗教经验的“根”，只看它结的“果”。一个人在某个夜晚经历了一场心灵的转变，不管这转变的来源在医学上、神学上怎么说，要紧的是，它让这个人此后的日子变成了什么样子——更安定了没有，更有力了没有，对别人更宽厚了没有。

他把宗教的价值，就这样放在了“改善生活”这个果子上。（对于这个问题，202号第29章用的是“暗里选了幸福”这个说法。我们同意它的观察。）

顺着《信仰的意志》再走一步，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却对本书很要紧。

詹姆斯说一个选项“活不活”，不是选项自己的性质，而是它和这个人缠在一起的样子。对一个从小在庙里长大的人，“今年要不要去上香”是活的选项；对一个从没进过庙的人，同一件事根本不是选项。他明确说过，选项的“活”，是相对于想它的那个人而言的。

这一句很重。它等于承认：同一个选项，在不同人的土里，活的程度不同。詹姆斯碰到了土，而且碰得很准。

可是请看他接着做了什么。他把这块土当成了一个“已知的、给定的”东西——这个人信什么、怕什么、习惯什么，拿来就用，然后问：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可以怎样选。他没有往后问：这个人的“活”与“不活”，是怎样一层一层长成的？

于是土在他的账里，成了一个起点，不是一条来路。这和皮尔斯留在将来的土、杜威要重新组织的土，都不一样：它是一个被承认、却被冻住的土。

第三处证据里的“果子和根”，值得多停一会儿，因为它几乎是本书整个论证的反面。

詹姆斯的原则是：看果，不问根。一场心灵的转变，从哪里来的，是神的作用、是潜意识、是一时的情绪，他说那是另一门学问的事；对他来说要紧的是，它结出了什么。

这个原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人不用先吵完“根”，就可以谈“果”。两个信不同东西的人，可以坐在一起，比一比谁的生活更踏实、谁的待人更宽厚。在一个互相不服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很管用的约定。

回到修车铺。谭师傅听一台发动机，他要问的恰恰是“根”：这个“咔”是从哪里来的？是皮带，是轴承，还是别的什么？他不满足于“这台车现在能跑”，他要知道为什么跑得不对。小罗跟着学两年，学的就是怎样顺着果子找根。一个只看果子的修车铺，开不长。

这并不是说詹姆斯错了。是说他的原则，和修车铺的原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一个是在互不服气的人群里搭一个共同的台子，一个是在一台具体的机器里找一个具体的毛病。前者不问根，是为了不吵；后者问根，是为了修好。

那么，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事情，都用“不问根、只看果”的办法来办——办婚宴、办学校、办医院、办政策——会发生什么？

一个小答案是：根就渐渐没有人问了。而根，在SDE里有一个名字，叫土的来历。詹姆斯的原则，把“来历”这一项，在原则上请出了账本。账本上的字少了一栏，写账的人却不觉得少，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写那一栏。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把“过得好”这一条律的统一，看作一个关于土的事，而不只是一个关于路的事。

读到这里，一个公道的反驳会冒出来：好使和真，总归不是一回事吧？一个假的东西，也可以在一时好使。

这个反驳，詹姆斯早已听过，也认真答过。换个婚宴上的小场面来看。

收礼金的是新郎的表哥老祝，坐在大厅门口的小桌后头，管礼簿。有一位远房亲戚随了五百，老祝一时手滑，记成了三百。散席后核账，他发现了，可这位亲戚正是前阵子跟新郎家闹过别扭的那位，今天肯来已经很不容易。老祝犹豫要不要改。

改，账准了，可能当场让人难堪；不改，今天平平安安。假如“好使”就是“真”，那么这本账，不改反而是“真”的。

詹姆斯不会这样说。他会说：这本账，将来总有一天要被翻开——新郎家回礼的时候，两家人对账的时候。到那一天，记错的三百会兑不出东西，反而生出新的麻烦。所以，从长远看，这个“好使”是假的。这正是他的限定：“大体上”和“长远来看”。

这一层，本书完全承认。詹姆斯不是一个鼓吹“怎么舒服怎么来”的人。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长远”，是谁的长远？老祝的长远，是十年后回礼的那天；新郎父亲的长远，是这两家人往后几十年怎么走动；那位远房亲戚的长远，也许是他下一回愿不愿意再来。同一本账，三个“长远”，三种兑现。尺子说“看长远”，可长远是各人土上的长远。

詹姆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尺子用不上它：尺子只管“兑得出来没有”，不管“是谁在兑，在哪一片土上兑，兑多久”。账期拉长了，尺子还是那把尺子。

三处证据并排放着。《实用主义》说，观念的真，在它兑出来的好处里；《信仰的意志》说，信的资格，在它让人活得下去里；《宗教经验种种》说，宗教的价值，在它改善的生活里。

三个题目、三个领域——认识、信念、宗教——只有一把尺子：过得好。

这里要交代一个用词，免得和站上第133号书的说法打架。133号讲皮尔斯，用的“特征律”，指“差异要给出感觉”。本书说詹姆斯统一于“幸福律”，是另一回事：它指的是D1里那条“让日子过得下去、过得舒展、少受折腾”的律。两个“律”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各说各的，不冲突。

现在回到202号的那个说法，“暗里选了幸福”，并看本书往前走了哪一步。

202号说的是：詹姆斯暗里选了幸福——也就是说，他嘴上讲的是多元、是实验、是各种可能，心里其实偏向一边，这是一个不自觉的偏向。这个观察很准。可是如果只说到“暗里选”，会留下一个印象：好像只要詹姆斯把这个偏向挑明，改一改，问题就解决了。

本书要说的是更重的话：这不是一个可以挑明就改掉的偏向，而是一条被他在三个领域里连续用上的路。三处证据放在一起，不是“他偶尔偏心”，而是“他在所有他碰到的地方，都用同一把尺子”。这样一把贯穿所有领域的尺子，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偏好，而是一个统一——一种D维度的形而上学，只不过它长得很不像形而上学，它长得像一个有礼貌的、讲求实效的方法。

也就是说，“暗里选”之所以不再暗，是因为它不再只是詹姆斯的选。它成了一个规则：以后在这条路上走的人，都会不加思索地用它。

还有一个小问题，值得单独问一句：为什么“过得好”这条律，比“长出来”那一条，更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

因为“过得好”几乎不像一个主张。当皮尔斯说“宇宙在长习惯”，听的人会皱眉：这是一个很大的话，要论证。当詹姆斯说“观念要看它带来的好处”，听的人会点头：这不是常识吗？

婚宴上的老柯，就是这个常识的活样子。没有人会问他：“你凭什么认为一场婚宴要让人舒坦？”这个问题听起来甚至有点荒唐。就像没有人会问一个厨子：“你凭什么认为菜要好吃？”

可是请注意，这种“荒唐感”，正是一个统一已经稳了的标志。一个主张被问“凭什么”的时候，它还是个主张；一个主张没人再问“凭什么”的时候，它已经成了土。本书第8章要专门讲这件事：方法怎样回写成常识，常识怎样成为最牢的土。这里只先放下这个伏笔：詹姆斯的路之所以难被看成形而上学，不是因为它不够强，而是因为它太容易被点头。

詹姆斯不是暗里偏心了幸福，而是把“过得好”这一条律，在认识、信念、宗教三处连成了一条路。

◆ 2.3　另外两条律：在，但被收着

如皮尔斯一样，詹姆斯也并非只写了一条律。他写创造，写得很好；他写自由，写得很动人。看清他怎样写另外两条律，才看得清“统一”是怎样发生的。

先看创造。1890年，他的《心理学原理》出版，里面最有名的一章讲“思想流”：意识不是一串一串的珠子，而是一条河，一直在流。在同一本书里，他还用过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描述刚出生的婴儿眼里的世界：一团“闹哄哄的、嗡嗡响的混乱”。（引号里是中文转述。）

这两个说法，一个说意识是流动的，一个说起点是一锅粥。可以说，詹姆斯是三位奠基人里最直接写到“一锅粥”的人之一。他还写过一篇更早的文章（1880），大意是：天才的新想法是“自发的变异”，不是被外部形势一步步推出来的，要后来的选择来决定它留不留下。在《多元的宇宙》（1909）里，他又坚持：世界不是一块已经做好的东西，而是还在做的。

这些都是创造律的好材料：新颖、自发、未完成。

可是请看这些东西在他那里的下场。思想流是用来说明“一个人的经验为什么是连续的、自己是怎么保持为一个自己的”；自发的变异要等社会的筛选来决定“留不留”；未完成的世界，是用来为“人的努力有意义”留位置的。创造被承认，但它的价值，要靠它对人的日子好不好来结算。一个新想法，不管多新，如果它让人的生活更乱、更难受，在他的账里是亏的。

再看自由。他的自由意志，是他一生最动人的主题。他有一篇写于1884年的文章，叫《决定论的困境》，大意是：如果一切都早已注定，人的懊悔和希望就成了一场空；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世界就必须真的有“还没定”的地方。

他自己的传记里也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故事：1870年前后，他陷在一场很深的精神危机里，转机来自他读到一位法国哲学家对自由意志的说法，他决定让自己“第一次自由的行动”，就是相信自由意志。（这一段，202号已经讲透，下一节只引一句。）

自由在他这里是真的，而且是活的：它是人在证据不够的时候可以选择去信的那个权利。

可这个自由是用来干什么的？回到前面《信仰的意志》。人有选择信的自由，为了让日子过得下去。自由被放在了幸福的下面——它是一扇门，门的另一头，是“活得好”。

202号用一个很漂亮的式子概括这件事：自由 = 创造 × 幸福。

这个式子值得停一停。乘法有一个特点：任何一项是零，结果就是零。也就是说，在这个式子里，如果幸福这一项是零，不管创造多大，自由也是零；如果一个选择、一个新东西，让人的日子彻底过不下去，它就连“自由”和“创造”的资格都没有了。幸福在这个式子里，拥有一票否决权。

这就是“统一”的样子。不是只留一条律，另外两条消失；而是三条都在，只有一条拿着否决章。创造可以多，自由可以大，但只要幸福说“不”，它们统统作废。

回到婚宴。假设新娘本来想搞一个特别的仪式——不敬酒，不起哄，两个人在台上各念一段自己写的话，念完就开席。这是创造，也是自由。亲戚们有的说“这样不热闹”，有的说“这样老人不习惯”，新人最后让了一半：保留了念话，加回了敬酒。让步没有错，让步是人情。可请看让步的方向：所有的新东西、所有的自己做主，最后都要过一道关——大家是不是舒坦。这道关不是亲戚发明的。它是一种路的规矩：路要过得好，才算好路。

詹姆斯在书里没有说过“自由和创造要服从幸福”这样的话。他没有。但他的三条路——认识的路、信念的路、宗教的路——走到最后，都在这一道关前面验票。

再多看一个后厨里的例子，把这个“关”看得更清楚。

老霍是这家酒店的掌勺，有一年他自己琢磨出一道菜：用本地的一种野菜，配上腊肉，炒出一股说不清的苦香。他拿给经理试，经理尝了说：“味道有点冲，客人不一定吃得惯，先在员工餐里试试。”

这个回答很公道，很专业，也很常见。老霍没有被禁止创造，他的创造得到了鼓励：先试试。可是请看“试”的规则：这道菜要进入酒席，必须先证明自己客人吃得惯。吃得惯，就是舒坦。

假设这道菜过了关——客人们说“这个有意思”，回头客点了名——它就从创造变成了一道“好使的菜”，上了菜单。假设它没过关，它就留在了员工餐里，没有人再提。

两种结局里，有一件事是相同的：这道菜的“新”，从来没有独立算过数。它能不能被留下，永远是它是否舒坦说了算。如果过了关，被记住的是“好使”；如果没过关，被忘掉的是“新”。

詹姆斯笔下的创造，就是这样的位置。他喜欢新，写得出新，可新要拿到“好使”的柜台上去兑。能兑出来，它才有名字；兑不出来，它就像员工餐里的那一盘野菜，没有人会专门为它写一句话。

要把话说准：这不是在说老霍的野菜“应该”上酒席，也不是在说经理做错了。经理在他的位置上做了该做的事。本书说的是路的结构：一条统一在“舒坦”上的路，对新东西的欢迎是有条件的欢迎。这个条件，就是先过舒坦这一关。

把皮尔斯和詹姆斯放在一起，有一个对称的小景象。

做买卖的人，有进货，有柜台。皮尔斯那里，进货是目的：东西要不断进来，不断长出新品；柜台上的舒坦，不过是告诉你这一批货进完了的灯。詹姆斯这里恰好倒过来，柜台是目的：顾客要买得顺心，日子要过得顺；进货再新、再多，也只是为了让柜台上的东西摆得更好。

同样三样东西——新货、柜台、自己做主的权利——在两个人那里都有，只是谁伺候谁，反了过来。这就是“统一”的意思：不是别的东西不存在，而是它们之间的主仆关系，被固定了。

留意一下我们平时夸老柯的话。

人们会说：“老柯真会来事。”“这人机灵。”“会办事。”很少有人说：“老柯真有创造力。”

这个小小的语言习惯，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老柯那一刻做的事，明明是创造：他把一份写好的流程单扔到一边，在一个具体的瞬间发明了一句从来没有过的话，换掉了一个仪式。可是在我们的嘴里，这件事被翻译成了“会来事”——也就是“让场面好使”。创造的部分被收进了效果的名下。

詹姆斯的书里，发生的是同样的翻译。他承认新颖，承认自发，承认世界还在做。可当这些东西要被说出价值时，他的词是“兑现”“果子”“便当”。创造在场，但它没有自己的名字，它用“好使”这个名字出门。

这并不是说用“会来事”夸人有错。老柯听了也高兴。只是请想一想：一个社会如果长期用“会来事”来称赞创造，慢慢地，人会以为创造就是会来事。那些没有“来事”的创造——一句当场谁也没有笑出来、却在三天后让一个人想了很久的话——就没有一个词可以称赞它。

还要为自由补一笔，因为它是詹姆斯最不愿被人说成“被收着”的东西。

他的自由，是在证据不够时，选择去相信的自由。这是一种很具体的自由：它出现在“想不清楚、又不得不选”的那一刻。新郎站在门口迎客，心里并不知道这段婚姻会走多远，可他必须选：是带着“会好的”这个信上场，还是带着“走着看”的心思上场。詹姆斯会说，你有权利选前者，而且前者往往更好。

这个自由，是一种进入的自由——在不确定里投入。它美，而且对。

但另一种自由，在这里没有位置：退出的自由，和不进入的自由。站在门口的新郎，如果心里说“我今天先不表态，等着看，也许我们都还没准备好”，这在婚宴的账里不叫自由，叫“不吉利”。在詹姆斯的账里，这样的“不进入”也很难被算作一次自由的行使，因为它不带来“活的信”，不为任何人把日子撑起来。

所以他的自由，是一条朝着“活得好”的方向开的门。门是真的，但只朝一个方向开。

詹姆斯不缺创造，也不缺自由，他缺的是一个让它们不经过“舒坦”这道关就能存在的位置。

◆ 2.4　一个人的救命药，怎样变成所有人的路标

站上第202号用很大的篇幅，讲了詹姆斯1870年前后的那场危机：一个年轻人，学医，困顿，焦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最后抓住一个想法——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地选择——才从里面爬出来。202号把这一段读得很透，本书不重复，只借用它的一个结论：这个想法救了他的命。

本书要问的是另一件事：一剂救了一个人的药，是怎样变成所有人的路标的？

先讲一个构想的故事。

那家酒店后厨有一位老帮工，姓钱，六十出头。他年轻时胃出过一次很大的毛病，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出院以后什么都吃不下，是家里人给他熬了一个月的白粥，才一口一口缓过来。从此，老钱认定一件事：白粥是好东西。

后来他在后厨干活，凡是有谁身体不舒服，他一定端一碗白粥过去。厨房里要办大席，他会私下劝掌勺的：“要不要在酒席上加一道白粥？养胃。”新来的小徒弟加班熬夜，他劝；掌勺的老霍喝多了应酬，他也劝。

老钱完全没有错。白粥确实救过他，也确实救过别人。他的好意是真的。

但是请看这里发生的事：一个人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该怎么办”的规则。他自己的胃、他自己的那段日子、他家里当年熬粥的那个人，这些让白粥变得有分量的东西，都留在了他身上，没有跟着“白粥好”这句话一起出门。出门的只有结论。听结论的那个人，并不知道结论是从哪一片土里长出来的。

詹姆斯的情形，在结构上和老钱一样，但被放大了很多倍。

他在1870年那场危机里抓住的东西，是一个对他自己当时那个处境来说，恰好救命的信念：我可以选择去相信，而这个相信会让我站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刻，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坑里爬出来用的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后来成了《信仰的意志》，成了《实用主义》里“真理要兑现”的原则，成了《宗教经验种种》里“看果子不看根”的方法。一个人的救命，被讲成了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关于真理和信念的一般说法。

有两个地方值得停一停。

第一，詹姆斯自己其实知道这一点。《实用主义》的第一讲里，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大意是：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不同气质之间的冲突——有的人偏“硬心肠”，要事实、要证据；有的人偏“软心肠”，要原则、要慰藉。也就是说，他明白一个人持什么哲学，和他是什么样的人缠在一起。

可他随后做的，是为这两种气质找一个调停者，并把实用主义放在调停者的位置上。他没有问：他自己的气质，是不是也在尺子里？他自己那一场危机，是不是也让他对“什么是好使”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第二，“救命”这个词，决定了尺子的刻度。一个人被救起来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新东西，不是自己做主，而是：我能活下去，我不再疼了。这个刻度一旦刻进尺子，以后量一切东西，都会以“能不能让人活下去、不再疼”来量。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一个暂时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一个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东西，在这把尺子面前都是吃亏的。

用SDE的话说，这里发生的是：一个人的“自我界”的土，被压平成了所有人的土。詹姆斯的自己，是一块具体的土，有它的来历、它的坑、它的救命绳。把这块土上长出的东西，当成普遍的真理方法，等于默认所有人的土都和这块一样。

本书不是在说詹姆斯的哲学“只不过是他的病历”。那样说，既不公道，也不准确。他的东西是被千万人用过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本书说的是：有用，和被当成唯一的尺子，是两件事。老钱的白粥，有用。老钱把白粥当成每一桌酒席都该有的第一道菜，就是把有用当成了唯一。

这件事，詹姆斯自己留下过一条线索。《宗教经验种种》里有一段匿名的自述，讲一个年轻人在深夜里被一种对自己存在的恐惧攫住，几乎不能自持，后来慢慢缓过来。不少研究者认为，那段话写的就是他自己。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更有意味：他把自己最私人的一次崩溃，放进了一本讲“人类宗教经验”的书里，作为一个“案例”，和别人的案例并排。这一步很勇敢，也很诚实。

但并排放，有一个效果：个案的“这一个人”被稀释了。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一年、具体的一张床，变成了“病态灵魂”这一类中的一例。读者读到的是类型，不是土。

有人会反问：任何一个哲学家，不都是从自己的经历里长出来的吗？皮尔斯也是，杜威也是。为什么单挑詹姆斯说？

问得好。本书不是在挑詹姆斯的毛病，而是在看经历怎样被写成规则这一个动作，在詹姆斯身上看得特别清楚。皮尔斯的起点是实验室和逻辑，杜威的起点是教室和社区，他们的起点和他们的方法之间隔着一层“事业”。詹姆斯的起点是他自己的床，他的方法几乎是那张床的直接延伸，中间几乎没有隔层。

所以他的尺子，保留了救命时的那种直接：不问这个办法的出身，不问它对别人是否同样救命，只问它此刻能不能让人站起来。这种直接，是它的力量，也是它的边界。

还要补一个角度：这把由“救命”刻出来的尺子，对哪一种人的问题是看不见的？

老钱的白粥，对一个胃坏了的人是药。可是对一个吃得太好、吃得太多的人呢？白粥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恰恰是“太舒服了”。

放回人生，这是一个真实的缺口。以“过得下去”为刻度的尺子，量得出一个人“过不下去”的程度，却量不出一个人“过得太顺”的毛病。一个人日子很好，样样不缺，却觉得每天是同一天；一个人没有任何不舒服，可也没有任何一

件事让他想往前走一步。在幸福律的表盘上，这个人的读数是满格，没有红灯，没有人会为他担心。

县城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结了婚，有了房，有一份稳当的工作，上了岁数的父母也安顿好了，每个周末都是一样的聚餐。这些日子是好日子，没有人愿意说它不好。可有的人会在某个晚上，没来由地问一句：“就这样了吗？”

这句话，在“救命”出身的尺子里，没有位置。因为尺子刻度的起点，是疼；而他不疼。

这里不是说“疼”是好事，更不是劝谁去找点不舒服。本书只是指出：尺子的出身，决定了它能量到哪里；尺子量不到的地方，不等于那里什么也没有。

再看这场婚宴里的另一个细节，这个细节能让“土被压平”变得更具体。

新娘那边来的亲戚，是山那边乡里的。她的外婆那一辈，经历过一段很难的年头，一家人靠“抱成一团”才熬过来。所以在她们的家里，有一个说法从小就在耳朵里：日子难的时候，千万不能一个人扛，要凑在一起。这个说法，对那边的人，就是救命药。婚宴上，她们那几桌坐得特别近，说话声音也大，菜上来先互相让。

新郎这边是镇上人，几代做小买卖。他们家也有一个说法：日子难的时候，别给人添麻烦，要体面。这是另一剂救命药。镇上人的酒席，座位有点距离，说话客气，遇到谁家有难处，轻易不当面说。

两种救命药，都救过人，都是真的。它们长在两种土里：一种土里，抱团是活路；一种土里，体面是活路。

现在假设有一个哲学家来到这个大厅，他说：“我发现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对人好使的，就是真的。”听上去，两边都点头，因为两边都有自己的“好使”。但请注意，他们点头点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一边点的是“抱团好使”，一

边点的是“体面好使”。这条规律没有替任何一边解决什么，它只是把两边的救命药，都放进了同一个词里。

而当这个词写进书里、讲进课堂、变成了人们的常识，再有人问“为什么山那边的人要抱团、镇上的人要体面”，得到的答案会是：“他们各取所需，各自好使。”这个答案是对的，可它把一个本来值得追问的问题——这两片土是怎么长成这样的——收进了一个已经答完的词里。

詹姆斯的个人土，被普遍化时，就是这样压进了“好使”的。每个人的土各不一样，可在这个词里，它们看起来一样。

一个人的救命药，没有错；错在它被从自己的土里拔出来，不带来历地发给了所有人。

◆ 2.5　仪表盘与运河：补一块表，还是步步要意义

202号给詹姆斯的尺子，打了一个很精彩的比方。它说，在詹姆斯的世界里，“真理”像一块仪表盘：它不告诉你前面是什么路，只告诉你车现在跑得顺不顺。这块仪表盘有用，但它有一个自己的死法：如果有一天，仪表盘本身变成了路——大家都只盯着表，不看路——河就从一条奔流的河，变成了一条按水位表挖出来的运河。202号对这种死法有细致的讨论：流动还在，方向没了。

按本书的读法，202号提出的补救办法大意是：在仪表盘之外，再加几块表。比如，加一块“这件事回不来的损失有多大”的表，加一块“什么时候算够了”的表。

本书对这个补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很诚实的补丁，但补丁本身，仍然站在同一条路上。

先讲一个构想的故事。

这家酒店做婚宴生意，经理看到一个现象：有的顾客事后在网上打差评。于是他在每一桌放了一张意见卡，让宾客打分，写“哪道菜不满意”。每周日他把意见卡汇总，交给后厨。

头一个月，效果很好。太咸的汤改淡了，端得太晚的菜加了人手，海鲜的腥味重的那批货被换掉了。分数涨了。经理很得意，又加了一块表：回头客比例。

三个月以后，后厨的老霍跟人说了一句话：“现在做出来的菜，不会有人骂，也不会有人念。”

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会引起一点点争议的味道，都被一次一次的意见卡磨掉了。以前偶尔会出一道有点怪、有点冲的菜——有人喜欢得不行，有人皱眉——现在这样的菜没有了，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皱眉，那道菜就是“故障”。菜越来越稳，越来越不出错，越来越没有一个人会专门跑来问“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一幕里，经理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理的。加表、加更多的表、加一块管长远的表，都是在补仪表盘。这些表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量的都是“宾客舒坦不舒坦”，只是时间拉得长一点、角度换得全一点。

所以本书要在202号的话上往前走一步：补仪表盘，仍是步步要意义。每走一步，都要有一块表告诉你这一步值不值。这样的路，每一步都过得好，却很难拐出一个自己没见过的弯。

这里隐藏着幸福律统一的一个特有代价，而且是最难发现的一个：它会把一切震荡当成故障。

我们来看，婚宴里什么东西是“震荡”？那一刻两桌人互相不说话的沉默。新娘的父亲念错稿子时的笨拙。一道怪味菜让人皱眉的那半秒钟。一个亲戚喝多了说出一句不该说的话。老柯如果有一块表，这些全是红灯：赶紧处理，赶紧补，赶紧让大家舒服。

老柯的处理，在那个当下是对的。我们前面说过，他做得好。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正是本书的问题：不是每一次震荡都是故障。有的震荡只是一锅粥——两家人还没熟，还在互相试探，这个“试探”本身，是熟起来的路上必须经过的一段。如果每一次试探一出现就被填平，两家人是“很快熟了”，还是“表面上很快熟了”？

我们不下判断，因为这里需要看每一场具体的婚宴、每一对具体的家人。但有一点可以说清：幸福律统一的路，没有位置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在这把尺子里，不舒服就是红灯，红灯就要处理。它没有一个格子，叫做“这个不舒服先不处理，让它自己走一阵”。

詹姆斯并不是对不舒服视而不见。恰恰相反，《宗教经验种种》里有整整两讲，讲“病态的灵魂”，他说这样的人往往比一帆风顺的人看到更多的真东西。他对“健康心态”的乐观派，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浅。

但请看这几讲的结局：那些病态的灵魂，最后的出路是“转变”，是“二次出生”，是回到一个统一的、安定的、重新能过日子的状态。苦被承认，被写得很深，但它在整本书里的位置，是一段要被走完的路，走完了才算数。

苦有位置，但苦的“位置”，是在去往舒坦的路上。苦本身，没有一个不去往任何地方的位置。

回到导论里那座要被拆的老澡堂。澡堂里那些没有结果的下午，没有哪一张意见卡能为它们写出一句有分量的话。这不是因为那些下午没用，而是因为表上没有这一栏。

再看这家酒店婚宴前一周的试菜，这是一个更小的场面。

经理领着新人坐在包间里，八道菜依次端上来。每上一道，经理都笑着问一句：“这道您满意吗？”新郎说：“都行都行。”新娘一道一道尝，到第五道停住了——正是老霍那道野菜腊肉，苦香冲冲的。

她皱了一下眉。经理眼尖，马上说：“这道有点个性，客人不一定吃得惯，我们换成清蒸鲈鱼，您看行吗？”新娘愣了一下，说：“……行。”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没有人做错什么。经理是在替新人着想，怕酒席上出事。

可是请想想那个皱眉。新娘皱眉，是因为难吃吗？也许。也许是因为那股苦味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在灶边炒过的一盘野菜，她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这是不喜欢，还是太久没尝到。她本来想再尝一口的。

这个“再尝一口”，是一个还没长成任何东西的念头。它不是满意，也不是不满意，它只是半开着。经理的问法——“满意吗”——只有两个出口，满意，或者换掉。半开着的东西，在这个问法里没有地方放。

于是一个本来可能长成“这道菜我想要”、也可能长成“还是算了”的念头，在十秒里被收成了一个干净的答案：换。菜单稳了，场面顺了，新娘没有不舒服。

这一幕里，仪表盘运转得很正常。它丢掉的，是一个人“还在想”的那一小会儿。

还有一层，是这个故事里最慢、也最深的一层：意见卡的回写。

三个月后，后厨来了一个新的学徒。老霍教他的第一课，不是怎么颠勺，也不是怎么吊汤，而是：“记住，别让桌上的人写意见。”

注意这句话。它不是“做出让人惊喜的菜”，也不是“做出你自己满意的菜”，而是“避开被投诉”。学徒还没有学会做菜，就先学会了怎样不被评。两三年之后，这个学徒成了二厨，他做每一道菜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味道对不对”，而是“这个味道会不会有人说不好”。

这就是回写。意见卡最初是量菜的尺子；用久了，它变成了做菜人脑子里的一根弦。做菜的人和意见卡缠在一起，成了一个新的“做菜的人”：他的手艺里，已经含着对差评的预判。

这时再把意见卡撤掉，菜也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因为尺子已经长进了人里面，成了他手上的分寸。

这正是“补仪表盘”最深的代价：你补的每一块表，最后都会长进用表的人身上。它不只是量了这条路，它也在悄悄改这条路上走的人。时间久了，路上走的全是“天生就会看表”的人，没有人再记得，有一段日子，这条路上走的是别的人。

这也回答了202号提的一个问题：仪表盘什么时候变成运河？不是某一天忽然变的。是表一块一块加上去，人一茬一茬换，直到最后一批没见过河的人，把运河当成河。

再举一个更轻、也更难的场面。

这场婚宴有一个环节：大屏幕上放新郎的外婆的老照片。外婆去年走了，新郎特意让人做了一小段视频，三分钟。

视频一放，大厅里安静下来。有人抹眼睛，有人低头，新郎站在台边，肩膀有点紧。老柯站在台侧，眼睛看着台下，手里握着话筒。

过了大约十几秒——对在场的人来说像是很长的时间——老柯开口了：“外婆在天上看着呢，她一定在说：这孩子今天穿得真精神！”台下有几个人笑了，有人破涕而笑，气氛松了下来。后面的菜接着上。

在老柯的行当里，这是一个标准动作：不让沉默超过十秒。他教过徒弟：“冷场是最大的敌人。”这条规矩很实用，也救过很多场子。

本书无意说老柯做错了。那几个人笑了，是真的笑，那一刻的松，也是真的松。

我们只想把那十几秒单独拎出来看一眼。那十几秒里，大厅里发生的是什么？一屋子人，各自想起了一位自己的亲人，或者想起了一次告别。这些想法互相不知道，彼此没有交流，却同时在一个空间里升起来。它不舒服，却也许是整场婚宴里最“真”的一刻。

幸福律统一的路，有一个本事：它能迅速、准确地把这十几秒处理掉。而它没有的，是一个格子，去问：这十几秒，如果不处理，会长出什么？

我们不知道。每一次都不一样。有时候，不处理，沉默会变成尴尬，伤了场子；有时候，不处理，沉默会变成一次真正的缅怀，让这场婚宴在许多人心里多留了一层东西。要看是哪家的人、哪一场、哪一刻。

本书这里要强调的只是：在一把只认舒坦的尺子里，这个问题是问不出来的。因为“让它先不处理”，在这把尺子里就是“出了故障却没修”。

换个方式再看一遍这个问题：为什么意见卡越多，菜越平？

因为意见卡是对着差异打分的。一道菜与众不同，意味着它和多数人的口味之间有一个差异；差异越大，被打低分的可能越大；被打低分的可能越大，做菜的人越不敢做。于是整个后厨的差异序列，被一点点压向“中间”。这是一个自己长大的过程，没有任何人下过命令。

幸福律统一的路，天然带着这样一个压力：它对“差异”的态度是——能小则小。因为差异就是摩擦，摩擦就是不舒服。一条这样的路走久了，它走出来的东西，会越来越像：越来越稳，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没有哪一处让人停下来。

这不是詹姆斯想要的结果。他的文字里，处处是对单调、对习惯的不满。可路的结构，会自己做出自己的事。

回头看202号的补丁，它其实有两块表。一块问“什么时候算够了”，一块问“这一步回不回得来”。

这两块表都是好表。第一块，让人在“好使”没完没了时知道停；第二块，让人在往前走时看一眼退路。如果经理在意见卡之外也有这两块表——这个菜单够不够了、这一轮改动能不能退回去——这家酒店会比光有意见卡好很多。

但是请再看一眼这两个问题的口气。“够了没有”是在问：舒坦的量够了没有。“回得来吗”是在问：万一不舒坦，退得回去吗。它们仍然围着同一件事转。

而有一类事，既不是“够不够”的事，也不是“退不退”的事：这一步，现在到底算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老霍那道野菜，在被尝出味道之前，它不是“够”，也不是“不够”，它只是一道还说不清是什么的菜。表上没有这一栏。

这就是本书要把卷七到卷八留给“混沌”和“介生”的原因：有一些东西，在它成形之前，根本不适合上任何一块表。

补一块表，补的是仪表盘；仪表盘再多，量的仍是“这一步过得好不好”，量不出“这一步该不该先不量”。

◆ 2.6　多元的宇宙，统一的路

最后要处理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事。

詹姆斯是三位奠基人里最爱讲“多”的人。1909年的《多元的宇宙》，书名就是一个立场：世界不是一块铁板，是很多块；真理不是一个，是很多个；经验不是被一只大手统一起来的，而是各自成片、彼此相连。在《实用主义》里，他有一个很可爱的比喻：他说实用主义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很多房间的门朝它打开——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写无神论的书，下一个房间里有人在跪着祈祷，再下一个有人在研究化学——走廊是他们共同要经过的地方。

一个最讲多元的人，怎么会被说成统一了路？

这就是本章最后要揭开的地方：多元的是房间，统一的是走廊。詹姆斯允许千百种信念、千百种宗教、千百种活法，他一个也不否认。但这千百个房间的门，都朝着同一条走廊开，而走廊里挂着同一块牌子：“你这间房，让住的人过得好吗？”

我们再回到婚宴。大厅里十八桌，一桌一桌，有每一桌自己的话题：这一桌在谈孩子上学，那一桌在谈生意，另一桌几个年轻人在比较手机。这是多元。老柯作为司仪，他对每一桌都很宽容，不要求每个人聊同一个话题。

但是请看老柯的统一尺子：热闹，坐得住，笑声。每一桌可以自己聊什么，但整个厅里要保持“一种热闹”。如果有一桌太冷、有一桌太吵，司仪都会走过去调一调。这是多元里藏着一个统一的“好”。

詹姆斯的多元宇宙，也是这个结构。每个人可以相信不同的东西；每种信念都可以被认真对待；可以认真到，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修士，都被他看作有资格说话的人。但每一个人说的话如何被评价，只有一个出口：它让人过得好不好。

这种统一，比皮尔斯的统一更不容易被看出来。皮尔斯的统一，写在一条宏大的宇宙进化的大路上，一望便知。詹姆斯的统一，躲在“宽容”后面：他对所有房间都宽容，所以大家不觉得有人在管走廊。

而管走廊的人，正是决定了什么才算“住得好”的人。

卷二要仔细讲：统一的路会偷偷搬运统一的土。这里先预告一个小例子：如果所有房间都用同一块牌子评价住客，那么所有住客，不管是从山那边的乡里来的，还是从镇东头来的，不管带着什么样的行李，都被默认为是“要住得好”的人。这是一个关于住客的预设。它可能对大多数人成立，但它是预设，不是被一间一间房问出来的结论。

有没有一种住客，不是为了“住得好”来的？比如，为了走一段路而来；为了在走廊里站一会儿；为了和隔壁房的人闲聊几句，什么也不为。詹姆斯的走廊里，没有给这样的人留牌子。

还有一个常被误读的地方，需要摆正：詹姆斯的宽容，是真的宽容。

他对神秘经验、对通灵研究、对他同时代很多被学院看不上的东西，都肯认真去听。他为“不被承认的人”说过话。他的多元，不是装的。

本书对詹姆斯没有任何不敬。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更微妙的事：一个真诚的、慷慨的宽容，也可以同时是一个统一。这两件事不矛盾。就像一家待客极为周到的酒店，每一位客人都被善待，可所有客人，都是按“要住得舒服的人”被接待的。周到，没有给“不为了住得舒服而来的人”留位置。

而一个社会里最有力量的统一，往往就是这种又周到、又真诚的统一。它不压人，也不逼人，它只是让人觉得：不这样想，反而奇怪。

没有牌子的住客，值得再多看一眼，因为后面几卷要靠他们。

他们不是怪人。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客人。你在婚宴的间隙走到酒店门口，站了十分钟，什么也没干，看着街上的车。你在喜宴后半场，不为了任何人的任何事，和一个不熟的远房叔叔随口聊了二十分钟他年轻时跑运输的事，聊完你没有“得到”什么，他也没有。那二十分钟，在老柯的账里不存在，在意见卡上不存在，在詹姆斯的尺子上也不存在。

可是你回想一下：一场婚宴过后，真正留在你心里的，常常是这些二十分钟。不是台上那句话，不是菜的味道，而是门口那十分钟，和那位叔叔说起的货车。

这些东西，既不是创造，也不是自由，也不是幸福。或者说，它们是三者的前身——一锅还没有长成任何一条律的粥。这就是下面几卷要开的门。

詹姆斯用他的方式给了我们走廊，也给了我们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你这间房，让住的人过得好吗？”本书不要撕掉这块牌子，它很有用。本书只想在走廊的某个拐角处，另挂一个小小的牌子：“此处不问。”

◆ 2.7　小结：第二刀

把这一章放回全书的论证里，补一个小小的账。

我们在这一章看到了三件事。第一，詹姆斯用同一把尺子，量了认识、信念、宗教三处。第二，创造和自由都在，但都在尺子的下面。第三，这把尺子从一个人的救命经验里长出来，被默认为所有人的路标。

把这三件事合起来，有一个结论，既温和，又严重：一个对许多人真的有用的办法，一旦被当成唯一的办法，它就不再只是办法，它成了土里的一层。办法本身没有错，错在没有人再问：这个办法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换一片土，它还灵不灵？

这个问题，詹姆斯没有问，是因为他的尺子用不上它。尺子只问“好使吗”，不问“为什么这片土上偏偏是这个好使”。这就是我们从皮尔斯那里已经看到的同一个缺口：两个人都给了土一个位置（将来的、效果的），都没有给土一本家谱。

不同的是，皮尔斯的缺口藏在一个无限共同体里，詹姆斯的缺口藏在一个“所有人都想过得好”的朴素预设里。后者更难看见，因为谁会怀疑“人人都想过得好”呢?

可是，请想想老柯没有问的那些人。有人今天来婚宴，并不是为了过得好——他是为了躲一个更不想见的人；有人今天吃着最贵的一道菜，心里想的是十年前在这家酒店后门蹲着啃馒头的自己。这些人坐在同一桌上，笑声里没有区别，意见卡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好”，是各自土里的好。尺子量到的，只是笑声。

散席了。客人们三三两两地走，红包、喜糖、回礼袋，一桩桩收拾。

后厨在清点剩菜。老霍看着一个个托盘，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你看哪一桌的剩菜多，就知道那一桌什么时候不对劲。”

他说得对。每一桌的剩菜，是一块没有人设计过的仪表盘。哪一桌剩的鱼多，是大家都在聊天顾不上吃；哪一桌剩的汤多，是上得太晚凉了；哪一桌几乎没剩，是年轻人多、胃口好。这些信息，意见卡上没有，笑声里没有，老柯的眼睛里也没有。

剩菜是一个提醒：每一把尺子，量到的总是它设计时想量的东西；尺子之外，总有一块没有人设计过的地方，在悄悄地说话。对詹姆斯的尺子来说，这块地方，就是那些“不为了过得好”的东西——它们不一定是坏的，只是尺子的刻度里没有它们的位置。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老霍的剩菜，也是一块表。一旦有人把剩菜的重量也记进周报里，它也会变成新的意见卡。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不主张“再加一块表”，也不主张“拆掉所有的表”。它主张的是别的事——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几卷再说。

再为下一章留一个接口。

詹姆斯的尺子，是向内的：它量一个人的日子。皮尔斯的尺子，是向前的：它量一个探究的队伍走到了哪里。那么，有没有一把尺子，是向外的，量的是人与人之间有多少路可以走？

有。那就是杜威。

在杜威的世界里，一场婚宴的好，不再是笑声的大小，也不再是新菜有没有长出来，而是：这场婚宴之后，两家人之间，多了几条可以走的路。能不能互相串门，能不能一起做生意，能不能在孩子的事上商量，能不能在对方有难时开口。

这把尺子比前两把都宽。它让我们看见了老柯看不见的东西。可是，它会不会是另一个更大的统一？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詹姆斯拆掉了“真是什么”的形而上学，立起了“一切都为了过得好”的形而上学；他把创造和自由请进房间，却让它们到走廊里去验“舒坦”的票，把痛苦写得很深，却只让它在去往安定的路上有位置。

这是本书对实用主义的第二刀。它不砍“兑现”——一个观念要在人的日子里兑得出东西，这是对的，婚宴上的老柯就是活的证明；它砍的是尺子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悄悄规定，所有的路最后只通向一个出口。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一件事：皮尔斯的路只通向“长”，詹姆斯的路只通向“好”。两条路都是单行道，方向不同。那么，还有第三个人——他有没有走出这个结构？

下一章，我们去看杜威。他把“路”本身变成了问题：怎样让路更多、更通、更自由。他会不会是走出单行道的那个人？本书的回答是：他修的是一张更大的路网，可网上，仍然只有一种路标。

◆

03

第3章

杜威：把路统一在“自由”上

本章的小区、骑手老秦和站长阿萍，都是构想出来的人和地方，不是哪一处真实的所在。

◆ 3.1　新城区里的一条近路

新城区是三年前才从一片菜地上长出来的。楼是整整齐齐的二十几栋，门牌却乱：十二号楼的单元门朝北开，十三号楼的朝南开，十四号楼干脆要从地下车库绕进去。导航软件上看，东门进去，两百米，一条直线。

骑手老秦头一个月就吃了这个亏。

他三十六岁，以前在一家做塑料件的厂里上班，厂子搬走以后，他买了一辆电动车，开始送外卖。头一个月，他照着手机上画的那条线走，一单一单地超时。后来他发现，那条线画的是一张图，而这片地方是一团事：东门晚上九点以后锁着，只留一个人行小门；十二号楼的电梯要刷卡，外人得等业主；十四号楼的快递柜正对着单元门，人一多，轮椅过不去；而小区西边那条看上去不通的窄路，其实被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每天推开一块挡板，才通向后街。

他一样一样地记。哪个保安好说话，哪栋楼的人习惯下来取，哪个点下雨天积水。记到第三个月，他送单的样子变了：同样的区域，别人要四十分钟，他三十分钟。

小区口有一个快递驿站，站长叫阿萍。她比老秦更早碰到这片地方的乱。每天下午三点，包裹成堆地拉进来，她和一个帮工把它们往货架上归。头半年，货架按楼栋排，结果十二号楼和十三号楼的人老是跑错。后来她改成按取件码的尾数排，又乱。再后来，她让老秦这样的骑手把“哪几栋楼的人什么时候下班”告诉她，她根据这个，把一早要被取走的放在最顺手的一排，把大件和很少有人来取的放在最里面。

这一切，如果请杜威来看，他大概会点头。

不是因为他会送外卖，而是因为他讲过一件事：一个人真正在“想”，从来不是在脑子里打坐，而是碰上了一团说不清的处境。路堵着，货乱着，图和现实对不上——这是他所说的“不确定的处境”。想，就是动手去把它理顺：看一看，试一试，改一改，直到原来互相别扭的各样东西，变成一个能接着往下走的整体。他晚年的《逻辑：探究的理论》，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正式。老秦第三个月送单的样子，阿萍改过三遍的货架，就是这样一种“理顺”。

站上两本书把杜威的这一套讲得很细。第180号把它记成一本“账”：路在修，路暂时停了，题目换了，路新开了，四格不同的结局，却被一个“能不能接着做”并进了同一栏。第170号用的词是“合拢”：不管走的是哪条路，最后都被收拢到一个更大、更合的整体里。这两个说法，本章都要用，但不重讲。我们只借它们开一个口子。

口子是这样的：阿萍改货架，究竟是照什么在改？

不是照“哪种摆法最新奇”改的，她没有想做一个全城最特别的驿站。也不是照“哪种摆法最让人舒服”改的，因为最顺手的那一排，恰恰要让一部分老顾客多走几步。她照的是另一样东西，一样她自己也说不清、却一直在用的尺子：改完以后，明天能走的路是不是比今天多。

货架改得好，取件的人跑得少，她能腾出手来；腾出手来，她可以再多收一家小店的货；多收一家货，她可以再往里加一排冷藏柜；有了冷藏柜，社区团购的菜就能放在她这里……每改一次，门就多开一扇。老秦也一样：他记下一条近路，不光是省了十分钟，是从此可以接那些“以前根本不敢接”的单。

这把尺子，就是本章要追的东西。杜威用来量一切的那把尺子，刻度上写的是什么？

先把话说在前头。上一章最后，散席以后后厨清点剩菜：每一把尺子，量到的都只是它设计时想量的东西，尺子之外，总有一块没人设计过的地方在悄悄说话。詹姆斯的尺子问的是：“你这间房，让住的人过得好吗？”那是一把向内的尺子，量一个人的日子。现在换到杜威。他和詹姆斯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用着同一个词，也同样反对形而上学里那些“本来如此”的东西。可他伸出手去理顺一团处境的时候，手指向的不是房间里的人舒不舒服，而是走廊与走廊之间通不通。上一章的最后留了一个问题：这把更宽的、向外的尺子，会不会是另一个更大的统一？本章就是去查这件事。

判词先摆在这里：杜威把路统一在“自由”上——不是“想怎么就怎么”的自由，而是“明天比今天有更多路可走”的自由；他叫它“生长”。

这一句，在站上的两本书里，一本说对了一半，另一本也说对了一半。本章接下来把它一步一步说完整。

先说一件小事，用来校准我们的耳朵。

“自由”这个词，在杜威的书里到处出现，可他最爱的不是这个词。他最爱的词是“生长”。读杜威的人，很容易被这个词带到另一个方向去：生长，不就是长大、长高、长出东西吗？那不就是创造吗？皮尔斯不是已经说过“长出来”了吗？

这是个很自然的误会，值得认真对付。皮尔斯的“长出来”，说的是长出一样原来没有的规律、习惯、概念；杜威的“生长”，说的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能够做的事、能够走的路是不是在变宽。前者看的是果子，后者看的是路。同样叫“长”，量的东西不一样。

用阿萍的驿站说就是：皮尔斯会问，这个驿站有没有长出一种原来没有的做法？杜威问的是，这个驿站走到明天，能不能做的事比今天更多、更活？两个问题，很多时候答案一致，可在要紧的地方，它们会分手。分手的那一处，就是我们追的东西。

杜威这样想，有他自己的来路。他早年在芝加哥办过一所实验学校（1896年），让孩子在厨房、木工间、纺织架前做事，而不是坐着听。后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在1929年的《确定性的寻求》里，把几千年来西方哲学的一个习惯叫作“旁观者”式的知识：人好像站在世界外面，看着它，等着一幅准确的图。他说，这是错的；知识是人在世界里动手，把一团别扭理顺的结果。

这样一来，“真”就不再是一幅图和世界对得上不上，而是一次动手有没有把处境理顺。老秦手机上的那条线就是一幅图，他的三个月，是一场动手。杜威的哲学，说穿了就是站在老秦这一边的哲学。

这一点是他的力量，本书没有一个字想否认。我们只是想问：动手理顺的时候，手里握着的那把尺子，刻的是什么。

还可以用老秦的一个晚上，把这两种“长”分得再清楚些。

那天夜里下雨，他接了三单。第一单顺路，没什么好说。第二单的客人在一栋他没去过的楼，他绕了一圈，发现这栋楼的后门有一个自行车棚，棚底下是干的，可以停车、可以躲雨、还可以把餐盒擦干再送上去。他当场把这个点记了下

来。第三单是个老人，点了一碗粥，不会用手机上的确认键，在门口站了十分钟，老秦帮他按了一下。

这三单，各自可以按不同的尺子记账。

按“有没有长出新东西”记：第二单有，他发现了一个新点，一种新的送法；第一单和第三单没有。按“客人高不高兴”记：第三单最高兴，老人连说了好几遍谢谢；第一单平平。按“他自己说了算的地方多没多”记：第二单最多，因为从此这栋楼的后门是他一个人的路；第三单反而少，因为他被一个手机上的按键拖住了十分钟。

三把尺子，三张不同的账单。如果老秦只能选一把，他选哪一把？

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每到月底，他要决定下个月怎么跑：是继续啃那些难送、但能让他“长本事”的老小区？是多接几单顺路又客气的，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少接平台派的，多接自己攒下的熟客，让自己的时间自己说了算？三种跑法，三种过日子的样子。

杜威的回答，要等我们读完他的文字才能下。但可以先露一句，让大家心里有数：在他的书里，这三种跑法并不是三选一，他把它们都装进了同一个袋子，叫“生长”。袋子里装着的东西，看上去什么都有；可袋子的口是朝哪边开的，袋子的底是哪一头，这件事，他从没有明说，却一直在做。

本章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袋子翻过来看一眼。

翻之前，先约定一件事：我们不拿任何人的“主张”来裁他，只看他的“判决”。主张可以是多元的、谦虚的、开放的；判决是在冲突来临时他让谁让路。尺子长什么样，只有在让路的那一刻才看得见。这个办法，本章用，全书都用。

◆ 3.2　三处证据：生长为什么偏偏量“路”

说杜威把路统一在自由上，不能凭印象。和上一章一样，我们要拿他自己的三段话说话。这里先交代一个用词，免得和站上的书打架：本书说的“自由律”，指的是意义目标里的一条——一件事由自己说了算，在种种限制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它不等于“不受管”，更不等于“想干什么干什么”。杜威恰恰最不喜欢后一种自由，这一点，我们很快会看到。

第一处：教育除了继续教育，没有别的目的。1916年，杜威出版《民主与教育》。这本书里，他给教育下了一个有名的定义，大意是：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重组，改造完以后，经验的意义多了，人引导下一段经验的能力也强了。注意这个定义有两半。前一半说经验的“意义”增加；后一半说“引导下一段经验的能力”增加。

再往后，他把这个意思推到了头：生长本身，不为它以外的任何东西服务。教育的过程，在它自己之外没有目的；它的目的，就是让教育能继续下去，让人有能力继续受教育。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目的。别的哲学家说教育是为了成为好人、为了得到知识、为了做成事业。杜威说，教育是为了能够继续教育。放在老秦身上，就是：他学会一条近路，不是为了“学会了这条近路”，而是为了从此能走以前走不了的路，学会更多近路。每一次学到，都是为下一次学到开门。

再看一个新手。老秦的徒弟小孙，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来的头两个月，每天只会按手机指的路走，走丢了就停在路边等。老秦没有教他“哪条路最近”，而是让他每天收工后，把当天走错的三个地方画在一张纸上，第二天再去看一眼。三个星期以后，小孙不再停在路边了。他不是背下了路，他是多了一种自己找路的本事。这种本事，不属于任何一条具体的路，却对所有的路都有用。

杜威说的“引导下一段经验的能力”，就是这一种。它不是一件东西，是一把能开更多门的钥匙。

请把这件事放在天平上掂一掂。如果最后的目的是“造出什么”，那么学会了就可以停；如果最后的目的是“过得好”，那么舒服了就可以停。只有当目的是“还能继续往下走”，才永远不会有可以停下来的那一刻。这就是一把量“路”的尺子：它不量你到了哪里，只量你的前面还剩几扇门。

这里正是“生长”和“长出来”分手的地方。设想驿站做出了一样全城独有的新东西，比如一套只有它能用的取件暗号，大家都说新奇。可如果这套暗号让它从此只能接一家平台的货，按皮尔斯的尺子，这是一次漂亮的创造；按杜威的尺子，它要打一个问号，因为门少了。反过来，驿站只是把几家平台的货放在同一排架子上，没有任何新奇，可是以后谁家的货都能收，按皮尔斯的尺子几乎没什么可说，按杜威的尺子是一次很好的生长。

同一件事，两把尺子给出两个相反的判断。所以，杜威的“生长”不能被读成皮尔斯的“创造”，也不能被读成詹姆斯的“过得好”。它自己是一条独立的律。

第二处：好的生长，是能引出更多生长的生长。1938年，杜威出版一本薄书《经验与教育》。他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的主张被一些学校用走了样：不少打着“进步教育”旗号的学校，让孩子想干什么干什么，说这就是尊重孩子。杜威很不高兴，他要把话说明白。

怎样分辨一段经验是不是好的呢？他的办法，不是看它让孩子笑没笑，也不是看它有没有做出新东西，而是问：这段经验，会不会让孩子以后的经验变得更宽、更深？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某个方向上越长越“能”，比如越来越会撬锁、越来越会钻空子。杜威专门提了这类例子，意思是：这样的“能”，从某一个角度

看也是长，可它在关上别的路。关上更多路的生长，不算好的生长；能引出更多路的，才算。

站上第180号把这一条抓得很准，说这把尺子量的是自由。本书同意。这里补一句：这一章里，杜威还专门讲了什么叫自由。他说，真正要紧的自由，不是外面的自由——手脚可以乱动、嘴巴可以乱说；那只是手段。真正要紧的，是“想”的自由：自己观察，自己判断，自己定目的，再去做成它。（《经验与教育》第5章，大意；站上第170号称赞这一段“尤其好”，我们也如此看。）

也就是说，杜威把“自由”从“不受管”里搬了出来，放到了“能自己定下下一步”上。这和老秦的处境正好对上：一个骑手最大的自由，不是想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而是他看得懂这片地方，从而能自己判断“这一单接不接、从哪里绕”。他的自由，是靠一次次学会、一次次试出来的，是长出来的自由。

第三处：民主不是一种投票办法，是一种活法。到了三十年代，杜威已经七十多岁。美国经历了大萧条，欧洲有了极权的政体。三十年代初，他出版《新旧个人主义》，讨论在一个由大公司、大机器、大组织主导的社会里，个人怎样才能不被碾平——他的回答是，旧的个人主义已经不够用，要在新的组织形态里重新造出“个体性”来。1939年，他出版《自由与文化》，又讲：自由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权利，要有文化的土壤才立得住。同年，他在一次演讲里，把话说到了底：民主首先不是一套政府制度，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商量的习惯。

《新旧个人主义》这一条，放到今天的骑手身上，特别好懂。老秦头上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平台、算法、站点、区域经理。旧式的个人主义会对他说，你是自由的，你自己去闯。杜威的看法正好相反：在这样的大机器里，只说“你是自由的”是句空话，自由要靠重新安排这部机器的某些部分，才造得出来。比如让

骑手有办法知道自己的单子是怎么派的，让他们有渠道把自己的路况说给站点听。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权利，是用制度和习惯一点一点造出来的能力。

这又回到了“生长”：自由在他那里不是一个已有的东西，而是一个要不断长出来的东西。这是杜威比许多自由主义者更接近“发生”的地方，也是本书愿意认真对待他的原因。

而这一层，在他早年的《民主与教育》里就有了种子。他给一个社会好不好，定过两条标准：一是群体里大家共同关心的事多不多、丰不丰富；二是这个群体和别的群体之间，来往自由不自由、充分不充分。（第7章，大意；站上第170号也引了这一段。）

两条标准，一条量“共同”，一条量“来往”。都是在量路是不是通：群体内部，人和人之间的路通不通；群体外面，这个群体和别的群体之间的路通不通。

顺带说一个旁证。1920年的《哲学的改造》里，有一章专谈道德观念的改造，其中的大意是，生长本身就是道德上的目的。杜威不要一个固定的“至善”，不要一张写好的人生蓝图；他要的是一种不断打开的状态。这几乎是把“自由律”写成了道德哲学。一个人、一个社会，不是因为到达了某个好地方才算好，而是因为他们的路一直在打开。

这个说法，对习惯了“目标明确、一步到位”的人，会觉得空。可是对阿萍、老秦这样天天在新城区里摸路的人，这句话是实在的：今天没到哪儿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明天还能走。

三处放在一起，一条线就出来了。一个人学东西，量的是学了以后还能不能学更多；一个人的经验好不好，量的是它能不能引出更多经验；一个社会好不好，量的是路通不通、来往自不自由。小到老秦的一条近路，大到一个国家的制度，杜威用的是同一把尺子：前面还有多少扇门能开。

这就是本书说的“自由律运行”：自由律不停地做同一件事——在现有的限制里，裁出一条原来没有的路，再把这条路变成下一次裁路的本钱。

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字在说“世界本来是什么”。杜威从头到尾反对“本来如此”。可他在每一处都在用同一把尺子，这把尺子，从来没有被他拿到桌面上来，当作一个“主张”来辩论。它是在做的时候才露出来的，像阿萍改货架时那样：她不会说“我信奉路多主义”，可她每一次改，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改。

本书把这叫作D维度的形而上学：没有说“世界是什么”，却统一了“路往哪里走”。杜威的这个统一，是三位里最安静的一个。皮尔斯公开搭了宇宙的架子；詹姆斯至少明说了“好使”；杜威没有说，他只是用。

用的时候，创造和幸福去了哪里？下一节是本章最硬的一节：把站上两本书的分歧，放在这把尺子下裁一次，请读者慢慢读。

◆ 3.3　裁定：一个影子，还是一把尺子

站上有两本书，专门拆过杜威，拆的刀口不同，对同一个地方的说法也不同。

第180号讲杜威的整个哲学。它的一个判断是：杜威的尺子，只有一把，量的是自由；幸福“根本不在桌上”。第170号讲杜威的教育。它的判断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格，在杜威那里站着同一个“生长”的影子，三样东西被记进了同一栏。

乍一看，这是两个相反的说法。一个说“有一把尺子，是自由的”，一个说“没有三把尺子，只有一个影子”。读者很容易以为，必须二选一。

本书的裁定是：两本书看见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谁也没有看错；可只有把它们接起来，才看得见这件事的名字。

名字就是：**统一于自由律。“生长”，是自由律的读数。**

下面把理由一条一条摆出来。这一节要写得硬，所以不绕弯子。

第一步：先还两位公道。

第170号说“三格站着同一个影子”，这话对在哪里？对在杜威确实从来没有把创造、自由、幸福各自立成一格，各给一把尺子。他谈兴趣、谈艺术、谈自由、谈民主，每一处都把它们说成“生长”的某种样子。按第170号的思路，有一个很干脆的检验：假如有人能在杜威的书里找到他把三样分开、各给一把尺子的地方，那“影子”的说法就要改。本书同意这个检验，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

第180号说“尺子只有一把，量自由”，这话对在哪里？对在这把尺子不是随便哪一把：它的刻度确实是“能不能引出更多的路”。而且它还看得出来，幸福那一格，在杜威的桌上摆不下。

可是两本书各自留了一个缺口。

第170号只说“一个影子”，没有说这个影子是谁的影子。影子总是从某个东西投下来的。三格都站着“生长”，那么，生长这个词身上，是哪一条律在说话？

第180号只说“尺子量自由”，没有往下追：既然量自由，为什么杜威的书里又到处有创造的味道、幸福的味道？那些味道，是被忘掉了，还是被收了起来？

两个缺口，正好互相补。

第二步：用一个检验，让“谁在说话”露出来。

要分辨一个袋子里的几样东西，哪一样是主、哪一样是客，最好的办法不是数它们出现了几次，而是看它们冲突的时候谁让路。三样东西顺顺当当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出来；一旦顶撞，让路的是客，不让的是主。

杜威的书里恰好有这样的顶撞。

第一次顶撞：创造对自由。设想一个人，在某个方向上越来越能干，不断造出新花样——杜威自己举的例子是越来越会作案的贼。这个人天天在“长新本事”，创造那一格是满的。杜威怎么判？他说，这样的生长不算好的生长，因为它关上了更多路。创造让了路。

第二次顶撞：幸福对自由。杜威在《经验与教育》里反复提醒，一段经验可以很“对味”，很让人愉快，却让人变得迟钝、变窄，对以后的东西不再敏感。他把这叫作“错误教育性的经验”。也就是说，一段经验再让人开心，只要它收窄了以后的路，就不合格。幸福让了路。

现在倒过来看：有没有一次，是自由让路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哪里，杜威为了让某一段经验更有创造、或更舒坦，而同意关掉一些以后的路？

在他谈教育、谈民主、谈艺术的全部文字里，我们没有读到。他谈过约束——孩子需要老师带着，社会需要规则——但约束的理由，永远是为了以后能更自由：先限一限，是为了后头能放得开。约束被放进了自由的账里，而不是自由被放进了约束的账里。（这一条，是本书的判读，不是杜威的原话；如果有人找到杜威明确为了别的理由、让路变窄的段落，本书这一条要改。）

这个检验的结果很清楚：三样东西顶撞时，创造让路，幸福让路，自由不让。不让的，就是主。

第三步：把阿萍请回来，做一次实验。

设想阿萍面前摆着三份报价。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

第一份：换一套新的分拣设备，贵，但整个驿站的效率能翻一倍，还能率先试点一种新的收件方式。这是创造一边的提议：造出一种原来没有的做法。

第二份：把驿站隔出一块休息区，放几张椅子，一台饮水机，给等包裹的老人和带孩子的妈妈坐。这是幸福一边的提议：让来的人舒坦，让一个地方有暖意。

第三份：和三家不同的平台各签一份数据对接，以后不管哪家的货，都可以从她这里发。货源多了，她不会被某一家掐住脖子。这是自由一边的提议：让她自己说了算的地方变多。

三份她都想要，钱只够一份。她怎么选？

如果她是一个纯粹的“创造派”，选第一份；纯粹的“幸福派”，选第二份。可是我们看到过阿萍改货架的样子：她每一次改，都问“改完以后，明天能走的路是不是比今天多”。按这把尺子，三份报价各自被重新读了一遍：新设备，值不值，要看它会不会把她锁死在一家供应商手里；休息区，值不值，要看它会不会占掉未来加冷柜的位置；对接三家平台，值不值，要看它让她以后的选择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结果是，三份报价最后都被换算成了同一种货币：它们会让以后的路变宽还是变窄。创造的好处、幸福的好处，当然还在，但它们不再是主货币，是被兑换成“路”以后才进账的。

这就是杜威的账本的样子。三格之所以看起来是“同一个影子”，是因为三种东西都被兑换成了同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的名字，叫自由。

第四步：给“生长”定位。

现在可以把站上两本书接起来了。

第170号看到的“影子”，是这本账本的栏目：杜威把所有的好处都记进“生长”这一栏。第180号看到的“尺子”，是这一栏的刻度：每一格刻的是“能不能引出更多的路”。栏目叫生长，刻度是自由。

所以，“生长”不是一个中立的词，也不是三种意义的合名。它是自由律运行的读数。就像体温计上的刻度，读出来的是“三十八度”，可它量的是热。一个人说“我最近在生长”，在杜威的账本里，意思就是：我可以走的路，比以前多了。

第五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比两本书都更往前的判断。

两本书都把杜威账本里“缺格”的现象，看作一种缺点：第170号说“幸福那一格空着”，第180号说“幸福根本不在桌上”，两本都在说“他漏了”。

本书的判断是，这不是漏。漏，是一个人没有想到；统一，是一个人想到了，并且把它们换算掉了。杜威没有漏掉创造和幸福，他读过、写过，写得很美；他只是在做账的时候，把它们都兑换成了路。这种换算，是统一做的事，它不是疏忽。疏忽可以补，统一要拆。

这一判断，也让第170号的那个检验有了更准的意思：它问“能不能找到杜威把三样分开各给一把尺子”。我们的回答是，找不到，而且找不到不是因为他没写，是因为他不让它们分开。一个D维度的形而上学，就是靠“不让分开”才立得起来的。

这一节如果有哪一处错了，错在哪里，我们已经说了：只要找到一个杜威的段落，他为了创造或幸福，同意关掉一些以后的路，这个裁定就要重写。本书愿意被这样检验。

下一节，我们去那两条被收着的律，看看它们在杜威的书里到底长什么样。

◆ 3.4　另外两条律：不是被役使，是被折成了侧面

小罗耳朵里的“咔”，是第1章的开头。这一节的开头，我们换一件小事：一次完整的送单。

那天傍晚，老秦接到一单，送到城边一个老小区，客人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点的是一份清淡的汤面，备注写着“麻烦放门口，我腿脚慢”。老秦到的时候，天刚擦黑，楼道里的灯坏了。他把面放在门口，敲了两下门，退到楼梯拐角，等着她开门。门开了，老太太弯腰把面端进去，在门里说了一句“今天风大，你路上慢点”。老秦下楼，骑上车，发现自己心里有一小块地方，是很平的。

这一单他没有学到新近路，没有多挣一分钱，也没有谁夸他。可他会记得这一单。因为它从头到尾是完整的：接单、找路、敲门、退后、等她开门、一句话、下楼。每一步都接着上一步，有开头，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这就是杜威在《艺术即经验》（1934）里讲的“一次经验”（an experience）。他说，我们大部分日子里的经验是零碎的、被打断的，可偶尔有一些经验，从头到尾连成一个整体，有自己的节奏，有一个完成。他认为，这种经验的特质，就是艺术的根。艺术不是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把一件事做得完整的那种质地。

这一处，创造律和幸福律同时露了面。“完整”有一点创造的味道：这一单被他做成了一个原来没有的整体。“平”有一点幸福的味道：心里有一小块地方落了地。杜威写得很细、很美，没有一点敷衍。

但请看他怎么摆这块东西的位置。

创造，在杜威那里：是“一次经验”的完整，而不是“一个新东西”的出现。

皮尔斯的创造，是一个新习惯、一条新规律长出来；他看的是果子。杜威的创造，看的是经验的质地：一件事是被做成了一个连续的、有节奏的整体，还是被切成了碎片。艺术家的工作，在他看来，是把日常经验里本来就有的“完整”，更自觉地做出来。

这里有两层意思。

一是，他确实给创造留了很大的位置。《艺术即经验》整本书都在讲这件事；他还参与写过一部题为《创造性智能》的文集，主张智慧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不是回头照镜子，而是向前造路。站上第170号也指出，《共同的信仰》（1934）里有一处，想象力“望见”尚未存在的理想，那一处是创造最像一个独立格子的地方。所以，说杜威“只有自由、没有创造”，是不对的。

二是，仔细看他怎样衡量一次经验的好坏：是它完整地连着前后。一次经验的价值，在于它收束了前面的东西，又给后面的东西留了入口。完整是对路而言的完整，不是对果子而言的完整。创造在这里被折叠成了“经验的连续性”：一次好的创造，就是让经验的线接得更顺、更长。创造没有消失，它成了路的一个侧面——路的质地。

幸福，在杜威那里：是做得顺的时候，自带的一种“满”。

杜威对幸福有点警惕。他在伦理方面的著作里，对“把幸福当成一个静止的终点来追”的想法，一向保持距离：幸福若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人就会把一切都当作通往它的手段，一旦到了，就不再动。他更愿意把幸福看作一个副产品——一个人投入地做着事、路在往前延伸时，自然伴随的那种满、那种和谐。

你可以在老秦那一单里看见它：那“一小块平的地方”，不是他送这一单的目的，而是这一单被做得完整之后，自己漏出来的。如果他送单是为了追求这种平，反而容易失手。

所以幸福在这里也没有消失，也被折叠了：它成了路的另一个侧面——路走得顺时的手感。

习惯、冲动和智慧：他怎样看“新”的来处。

还有一本书，值得在这里提一笔：《人性与行为》（1922）。杜威在里面讲，人的行为是习惯在撑着，大部分时候不用想；可是习惯总有对不上新情况的时候，这时候，一股“冲动”冒出来，原来的习惯被打松，人就要用智慧去重新安排。新的东西，就是在习惯被打松、又被重新安排的那一刻发生的。

这是一段很漂亮的创造论。他看见了“新”是怎样出现的：不是凭空而来，是旧习惯在新处境里碰壁以后的重组。老秦头一个月被那条线坑，就是“照图走”的习惯碰了壁；第三个月他有了自己的路，就是习惯被重新安排后的新生。

但请再看一遍这段话最后落在哪里。重新安排完的习惯，更灵活、更能应付以后的变化。创造在这里的价值，被说成了“让习惯更灵活”。新东西好不好，看它是不是让人以后更能应付新情况——还是路的账。创造被写得很细，却是在路的账本里写的。

宗教，被收进同一个袋子。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旁证。1934年，杜威出版了一本小书，叫《共同的信仰》。一个主张反对形而上学、反对“超自然”的人，却写了一本关于信仰的书。他的办法，是把“宗教的”从一套教义里拿出来，变成一个形容词：一个人把理想和现实连起来的那种态度，叫宗教的；他不需要一个外在的上帝来保证，只需要对“可能性”的忠诚。理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现有条件里望见的、可以去造的路。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只手。连“宗教”这样大的东西，也被他折成了“路的一个侧面”：忠于尚未走通的路。

再看一眼这两个人的分手处，会更清楚。

詹姆斯的走廊，每个房间的门都朝它开，走廊里只挂一块牌子，问住客过得好不好。杜威不挂这块牌子，他问的是：走廊与走廊之间，有没有门打通？这间房的住客想串到隔壁去，能不能走得过去？这一层，詹姆斯的尺子是量不到的，因为他的尺子只看房间里的人。在这件事上，杜威比他宽了一大圈。老柯的婚宴上，笑声再大，也量不出两家人以后会不会走动；杜威的尺子量得出。

但反过来，詹姆斯那把尺子看得见的东西，杜威的尺子也有看不见的。那天夜里，一位客人在酒店门口站了十分钟，什么也没干。詹姆斯的牌子问不到他，是因为牌子上没有这一格；可至少，那个人是个“住客”，他的不安、他的舒坦，是被当作一个人的事认真对待的。到了杜威的账本里，这十分钟既不增加路，也不减少路，它连一个住客都算不上，它只是账外的时间。

把阿萍请回来对一对。詹姆斯会问她：来取包裹的老人，今天心里舒不舒服？杜威会问她：这个驿站，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店，从这里走到更多的地方？两个问题都是好问题，答案会指向不同的改法。前一种改法把长椅留下，后一种改法把冷柜加上。一个人如果同时揣着两把尺子，会在长椅和冷柜之间犯难；而犯难，正是一个人还没有被统一的证据。

所以，三位的统一不是同一种统一。皮尔斯把另两条律派去干活，詹姆斯让它们到走廊里验票，杜威把它们折成了路的侧面。手法一个比一个温和，一个比一个难看出。

三个人，三种收法。

到这里，可以和皮尔斯做一个对比，看出杜威的收法有多特别。

在皮尔斯那里，另外两条律被役使了：幸福是信号灯，自由是苗圃，各自有一个明确的、替创造干活的位置。你一眼就看得出，谁在发号施令。

杜威不是这样。幸福没有被排到后面，自由也没有被排到后面（它本来就是主）；创造没有变成信号灯。三样东西都被折成了同一个东西的侧面：创造是路的质地，幸福是路的手感，信仰是路的忠诚。表面上看，三样都在场，都很重要，没有谁被压在谁底下。

这就是为什么杜威的统一是最难看出来的。皮尔斯的统一，你一读就觉得“他在搭宇宙的架子”；詹姆斯的统一，一读就觉得“他在为人活得下去说话”；杜威的统一，一读下来觉得“他什么都讲了，什么都谈得很公平”。公平的表面之下，只有一把尺子在量。

这里要提醒一件事，免得误会：本书这一节说的“侧面”，是对杜威账本的结构的描述，不是在说创造和幸福在人的生活里“本来就是”自由的侧面。恰恰相反——本书的全部主张，是三条律各有各的来路、各有各的土，不能互相换算。杜威的账本把它们换算了，这才是问题所在。

让我们再看一个反例，来确认这个判读：当一个人的“路”是满的，但“完整”和“满”都没有了，杜威的账本会怎么记？

设想老秦后来练出了本事，一天能跑六十单，平台给他推送的“附近可接单”永远是满的，他的路无比宽，每一单都有几个备选方案可挑。可他每一单都是半截的：接单、抢路、扔下、下一单。没有一次完整，没有一点落地。杜威的原则也许能在远处抓住它：零碎的经验积得多了，人会变得迟钝，以后的路会窄。可请注意，抓住它的理由，仍然是“以后的路会窄”，而不是“这一天本身缺了一块完整、缺了一点落地”。今天这一天缺了什么，在这本账里没有一栏可以记；它只能被折算成明天的路，等明天真的窄了，才被承认。尺子只会说：今天，路更宽了，在生长。

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东西：当尺子只有一把，它的盲区，就是它的代价。

◆ 3.5　路越多越好：不能停，不能歇，不能守

阿萍的驿站开到第二年，样子大变。

货架从三排变成了九排，墙上多了冷柜，门口多了一块牌子：“代寄·代取·洗衣·药品暂存·社区团购自提”。她的手机里有七个群，每一个群背后是一家小店或一个团长。她每天早上六点开门，夜里十点关，中间连饭都是站着吃。

问她累不累，她说累。问她愿不愿意回到去年那三排货架，她说不愿意，回不去了。再问为什么，她说：“每多一样，就多一条路，多一条路，就多一份底气。”

这句话，几乎就是杜威的原话译成了菜市场的口气。而她的疲惫，也几乎是杜威哲学的一份账单。

请不要误会：本节不是要批评阿萍，更不是要批评路多。路多是好事，这一点，杜威对，阿萍也对。要看的是，当一个人、一个站点、一个社会，只用“路是不是更多”来量一切时，它缺了三样本事。

第一样：停不下来。

在杜威的账本里，每一个“完成”，都只是下一次生长的起点。他说得很清楚，教育在它自己之外没有目的；这是他的力量所在，也是他的盲点所在——一个没有终点的目的，没有“够了”这一说。

阿萍的驿站有一个晚上，生意特别好，包裹把货架塞满了。她松了一口气，想：今晚总算赢了一回。可是第二天一早，另一家小店的老板来问她，能不能也接他们的货。她算了算，能接。于是又多了一排。“够了”这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从来没有稳住过，因为每一个“够”，都立刻变成了“可以更多”的入口。

这不是她个人的毛病。当尺子只量门有多少扇，那么任何一个已经站住的地方，都只是一道新的门槛。

第二样：歇不下来。

杜威并不是不懂休息。他在《艺术即经验》里谈过节奏——做与受、紧与松、起与落，一次完整的经验里要有这样的起伏，有间歇，有收束。可请注意他怎么处理“歇”：歇是为了接下来的做。节奏里的停，是下一个动作的蓄势，是音乐里的休止符为的是下一句。

这种“歇”，是自由账本能够承认的歇——因为歇完以后路更多了。可还有另一种歇：歇着，就是歇着，歇完以后什么也没有变多。一个骑手收工后坐在路边吃一碗面，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什么也不想。这碗面不会让他明天多一条路。按这本账，它没有账可记。

后面几卷，我们会专门回来讲这种不记账的歇，那是混沌与介生的事。这里先把它放下，只留一个记号：杜威账本里的歇，是有用的歇；没有用的歇，没有地方放。

第三样：守不住。

这一条最重，也最容易被忽略。

阿萍的驿站门口，原来有一张旧长椅，是前一任小卖部的老板留下的。老人们取包裹前后爱坐在那儿说话，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去年她扩柜台的时候，把长椅挪了，因为那个位置可以多放一个冷柜，能多收三十单团购。

她算得没错，多了三十单。可老人们不来了。不光是不坐了，连取包裹也改成让孩子代取，或者干脆换去别家。一年以后，她发现常来的老面孔少了一半。那些老人，不是她“路”上的客户，是她的土里长出来的熟人。

“路更多”的账本，很难把一张长椅记成一样值得守的东西。它能记的是长椅占的位置、能换成多少单。路的账本，天生擅长记“能被换成别的路的东西”，不擅长记“换不得的东西”。一个只会量路的人，守不住不能被换算的东西。

这三样本事——停、歇、守——合起来，就是一个不会停下来的人、一个不会歇下来的人、一个守不住自己东西的人。在老秦身上，是这样的：他有七个平台账号，随时能切；他一个月换三种跑法，随时能试；他很少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片区”，因为任何一个片区都可以被另一个片区换掉。他的路无限宽，他的“向”却越来越细。

有路无向：不是土轻，是“向”被统一掉了。

站上两本书，都为杜威画过一张“体检单”，对这件事有一个相似的发现。第180号判杜威“路重，土与形状轻”，第170号判“路满，土轻”。两本书都在说：杜威的重心压在路上，土和形状（也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长成什么样”）被写得轻了。

这个诊断我们同意，可想在它上面再进一步。“土轻”，是一个症状；病根，是“向”被统一掉了。

什么叫“向”？一条路往哪里去，不只是“前面有门”，还要“这扇门，是我要的那扇”。有“向”的人，会对不同的门有不同的态度：这一扇我想进，那一扇我不想；这条路我愿意走得慢，那条路我宁可不走。“向”来自一个人在某片土里长出来的偏爱、牵挂、舍不得。

举个有“向”的人的样子。有一年，邻区的一家平台开出高价抢骑手，说新片区单子多、路也多。同站的骑手走了一半。老秦也动过心，算过账：去了，每月多挣一千多，认识的路也多出一大片。可他最后没走。他对阿萍说的理由很笨：“这边的路我熟，这边有几个老人，我不去，没人给他们把饭送到门口。”

这个理由，在“路更多”的账本里，几乎一文不值。可是它是一个向：他是被这一片土里长出来的牵挂，拉住的。他愿意为一个“向”，放弃一部分“路”。

只有当一个人手里有两把尺子——一把量路，一把量牵挂——他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杜威的尺子只有第一把，所以他的账本里，几乎读不出这样的决定是怎么回事。

可杜威的尺子，数的是门的数量。数量不能区分哪扇门是你要的。当一切都被换算成“更多的路”，每扇门的分量就变得差不多：多一条路，永远比少一条路好；换一个片区，永远是增加了选择。这样的尺子下，一个人对“这一扇”的偏爱，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路径依赖”。

于是，土不是轻，是被当成了随时可以重新安排的材料。杜威很看重“环境”可以被人改造，这一点第180号也看到了：他写“改土”写得多，“看土”写得少。要改的土，当然是活的、可塑的；要看的土，却是有来历的、不能随便换的。统一的自由律，天然偏向前一种土，而躲开后一种。这个话题，我们到卷二会专门回来：统一的路，怎样偷运了一块被压平的土。

第180号还提醒过一种走偏：只重自由，路越开越多，却不知往哪里收，终至漂泊。这个提醒，说的大概就是老秦七个账号背后的那个人。他不是没有路，是路太多，没有一条是“他的”。

一个旁证：杜威自己，没有按这本账过日子。

对这个诊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旁证，在站上第235号里。那本书讲杜威的“做中学”，指出了一个反差：他教的是做中学，靠的却是书桌长——他自己最好的东西，是在漫长的、看上去没有什么用处的案头岁月里长出来的。一个主张“路要越走越宽”的人，自己的功夫，却是在一张书桌前、一个题目上，磨了很多年。

这个反差，本书的读法是：杜威身上，有一个比他的尺子更宽的东西，那就是他那一大段“没有路的路”。他自己活过了混沌与介生，可他的账本里没有给这一段留位置。理论比人生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缝隙，卷七和卷八会回来细讲。这里只记一笔：账本里没有的东西，生活里不一定没有。

回到阿萍。她后来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把那张长椅重新摆了出来，放在门口，挡了一个冷柜的位置。她算得很清楚，这个决定“亏”了三十单团购。但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只是说，“总觉得不能全都换掉”。

那是她第一次，不按“路”记账。

这件小事值得多想一会儿。她为什么说不出理由？因为她手里没有一个现成的词，可以把“这张长椅不能换”说成一种账。“路”的账有现成的词：效率、扩张、选择、机会。“不能换”的账，没有。一个社会的词汇里没有哪个词，那件事就很难被认真地说出来，也就很难被认真地守住。杜威留给后人的词汇，非常丰富，可偏偏在这一处是空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疏漏，是他统一了路之后，土里长出来的一片沉默。

下一节换一个眼光：把阿萍这一年的事当作一场接力，看这样的统一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

◆ 3.6　一场接力：统一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

前面几节，我们一直在用“尺子”“账本”这样的比方。现在换一个眼光，把阿萍这一年的事，当作一场接力来看。统一不是某一天宣布的，它是一件接着一件，在日子里发生的。

第一棒：别扭先露头。驿站开张的头一个月，货架按楼栋排。每到下午四点，十二号楼和十三号楼的人下班回来，一起涌进来，都在同一排前面挤。有人拿错了包裹，有人等了二十分钟，一位老人在排队的时候说了一句“以前小卖部没这么麻烦”。

这一串小小的别扭——挤、错、等、一句抱怨——是一个接一个的差异，排成了一条序列。它们不是“问题清单”，而是阿萍每天看到的东西。别扭一多，她心里先是一团乱，然后有一个样子慢慢露出来：问题不在楼栋，在时间。

第二棒：样子改了，土也被碰动了。她把货架按“取件时间”重排。结果，下午四点的那一排，永远是最顺手的。样子（货架）改了，可是来取件的人，也被这个新样子慢慢“教”成了新习惯：晚上七点以后才来的人，知道要往里走；周末来的老人，知道哪一排是他的。货架和取件的人，缠在了一起：换一个人来站这个驿站，同样的货架，不一定顺手。

第三棒：新样子回头写进了她的尺子。这是最关键的一棒。货架改好以后，阿萍的日子轻松了一些，她腾出手来，接了更多业务。于是她心里慢慢留下了一个印象：改，是有回报的；回报，就是后面能做的事更多了。下一回再遇到别扭，她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改，才能腾出手来”。

这一棒，把“路要变多”，从一次具体的经验，变成了她判断一切的习惯。

第四棒：习惯变成了土。一年以后，她手下的帮工小姑娘进来，没人教她，她看见新的情况，第一反应也是“能不能再加一排”。这个驿站的做法，成了驿站这片土的一部分：新来的人不用想，就知道“路多是好的”。

把这四棒连起来看，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杜威的统一，到底是一个人的头脑里的事，还是别的什么？

答案是：它从日子里长出来，再写回日子里。起头是一串别扭（差异的序列），中间是一个新样子露出来（显露），样子与人缠在一起（纠缠），然后，被缠住的东西，变成了下一次判断的底子。三样不是先后三件事，是一件事里同时走着的三条线。

先用三方程把这一棒写成字母：货架这个样子，是 S=F(D,E)，由一串别扭和这片地方的取件习惯一起生成；货架改了以后新出现的别扭，是 D=G(S,E)，由新样子和旧习惯一起生成；取件人的习惯又被新货架重新缠过一遍，是 E=H(S,D)。三条式子说的是同一回事的三个侧面，不是三个先后的步骤。

再用三原理的话说：每一回，是差异的序列和这片地方的土顶撞着——货架的挤和错，对上了取件人的老习惯——这一顶，推动了货架这个样子变形；变了形的样子，又回头写进下一轮的土里。这是一次完整的“推动、变形、回写”。

到这里一切都顺：没有谁骗谁，没有谁压谁。阿萍的每一步，都是好的。

可是请看接力的最后一棒。第三棒里被写进去的那条规矩——“改，就是为了后面能做更多”——本身是一条意义律的偏向。它是自由律。它被写进土里以后，下一次别扭来了，别的可能的读法，比如“这个别扭其实是个提醒，说明有些东西不该改”，或“这个别扭里有一点好玩的东西，先别急着理顺”，就越来越难被想到了。

这就是统一发生的样子。它不是一个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是一个好的做法，一次次被回写，最终变成了土里唯一的读法。杜威的哲学，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理论版本：他把一个好的做法写成了系统，系统又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一次次重复这个过程。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说明了，“解构”杜威，不是找他的错，而是把他的做法放回到发生的过程里，看它在哪里把别的读法关掉了。关掉别的读法的那一下，不是恶意，是成功的副作用：越有效的做法，越容易被回写成唯一。

卷二会把这件事讲透。眼下，我们记住这场接力，就可以进入最后两节：先回答三个不可避免的反驳，再把这一章收起来。

◆ 3.7　三个反驳，三个回答

讲到这里，一位认真读过杜威的人，大概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会提出至少三个反驳。把它们摆出来，好好回答，比自说自话要有分量。

反驳一：杜威不是只数路。他明明讲“共同关心的事”，这不是“向”吗？

这个反驳最有力。前面说过，杜威给一个好社会定了两条标准，第一条就是：群体里大家共同关心的东西，多不多、丰不丰富。“共同关心”，听起来分明是一个“向”：大家一起朝着某些事用心。

回答分三层。

第一层，承认：这确实是杜威的建树。他不是只讲个人的路，他也讲人和人之间的“共同”。这一点上，他比詹姆斯走得更远，詹姆斯那里的“过得好”，主要是一个人的事。

第二层，看这条标准是怎样量的。量的是“多不多”“丰不丰富”。也就是说，共同关心的东西越多越好、越丰富越好。这仍然是数量和种类的账。一个镇子共同关心的东西，有三样，比只有一样好；有二十样，比三样更好。但至于这些共同关心的东西，是不是这个镇子自己长出来的，是不是它不愿意换掉的，这条标准不问。

第三层，用一个构想的场景试一试。两个小区。一个小区的人共同关心的事很多：团购、早教、宠物、健身，各种群，热闹非凡，每年新增三个群。另一个小区只有一件共同的事：每年中秋，楼下那棵老桂花树开花，全小区的人都会搬着凳子下来坐一晚上。按杜威的标准，第一个小区“共同关心的东西多、丰富”，得分高；第二个，只有一样，得分低。可是，如果有一天，要在两个小区里各拆掉一样东西，你会心疼哪一个？

这个场景不是要证明杜威错了，而是要说明，数量的尺子，量不出“换不得”。共同关心，在他的账本里，仍然是路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路。它量的是通不通，不是有没有根。

反驳二：路多难道不好吗？你们是不是在说杜威应该少一点自由？

不是。这一点要说得很清楚。

本书从头到尾，不说任何一条意义律是坏的。创造是好的，幸福是好的，自由也是好的；老秦多学会一条近路是好事，阿萍多一份底气是好事。问题只在一个字：“唯”。当一条律从“一条”变成“唯一”，当所有的账都要兑换成它，它的好，就会变成它的毛病。

这和营养是一个道理：蛋白质是好的，可人不能只吃蛋白质。不是蛋白质有错，是“只”有错。

所以本书不主张杜威“少讲点自由”，而主张：自由律应该和创造律、幸福律一起上桌，各有各的尺子，各有各的土，必要的时候互相让路。这句话的详细内容，要到最后一卷才能展开。

反驳三：说他“统一”了路，这不会是你们读出来的吗？杜威自己可是最反对“唯一”的。

这个反驳也很重要，因为它击中了方法。杜威确实最反对“唯一”：他反对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目的、唯一的方法，主张多元、主张实验、主张永远可以修正。他的整个哲学，看起来就是一场对“统一”的告别。

回答是：本书说的“统一”，不是他主张的，而是他用的。

这是区别所在。一个人主张“没有唯一的目的”，同时在每一次评价里，都在使用同一把尺子。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而且常常同时成立。我们在前面三节里做的，不是去他的口号里找，而是去他的判决里找：什么样的生长算好？他的判决永远是“能引出更多生长的”。口号是多元的，判决是一元的。

这样的差别，在日常里随处可见。一个常说“我很民主，大家说了算”的老板，每次都在会议结束时用同一个标准做决定——比如“哪个方案花钱最少”。他不是在撒谎，他是真诚的；可只要看他的决定，就知道他的尺子是几把。看一个人统一了什么，要看他的判决，不看他的口号。

这也是全书用的办法，前面已经约定过：不问他们说自己做了什么，问他们在冲突的时候，让谁让路。

这三个反驳，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杜威的统一，不是粗暴的，是温和的；不是明说的，是使用的；不是没有补丁的，是补丁都在同一条路上打。这正是它特别难被看出来的原因。

◆ 3.8　小结：第三刀，以及一道门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杜威把“创造”“幸福”“信仰”都折成了路的侧面，用同一把尺子量一切——“明天比今天有更多路可走”；这把尺子叫“生长”，它量的是自由。

为了让三个人的账本摆在一起好看，下面做一张小表。

	皮尔斯	詹姆斯	杜威
统一于哪条律	创造（长出来）	幸福（过得好）	自由（路更多）
尺子的读数	长出了什么习惯	在我们这里管不管用、过得好不好	明天能走的路多不多
另外两条律怎样被收	幸福是信号灯，自由是苗圃	创造与自由请进房间，到走廊里验“舒坦”的票	折成路的质地与手感
统一的特别代价	混沌只能当原料	“不为过得好”的东西没有牌子，痛苦只在去往安定的路上有位置	不能停、不能歇、不能守

请再留意这句话里的两个停顿。

第一个停顿是“折成侧面”。这是杜威和皮尔斯的不同：皮尔斯把另外两条律役使，杜威把它们折叠。折叠看上去公平，所以最难拆。

第二个停顿是“量的是自由”。这是对站上两本书的一个接合：第180号看到的尺子，和第170号看到的影子，是同一个东西从两面看。栏目叫生长，刻度是自由。这个裁定可以被检验：只要有人在杜威笔下找到他为创造或幸福而关掉后面的路，我们就要改。

这一刀的代价，也说清楚了：路越多越好，所以不能停、不能歇、不能守；“向”被统一掉了，土被当成了可随时安排的材料。老秦七个账号，阿萍那张被挪走又摆回来的长椅，是这个代价的日常样子。

再补一句，给后面的卷留个影子。本书一直说“统一的是路，不是世界”。三个人，三个方向：皮尔斯的路朝向“将来会长出什么”，詹姆斯的路朝向“我这一个人能不能过得下去”，杜威的路朝向“我们大家的门开得有多宽”。一个朝着理念，一个朝着自己，一个朝着现实里的人与人。这三个朝向，并不是随手挑的。它们为什么会偏偏落在这三处？是巧合，还是同一片土在长？这是卷三要回答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写在这里，当作给读者自己的一个小检验。下回你遇到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家，想知道它统一了什么，不妨不去听它怎么说，而去看三个时刻：它有一笔钱只能花在一处的时候，花在了哪里；它在两件好事不能同时做的时候，放下了哪一件；它遇到一个说不清有什么用的东西的时候，是留下，还是处理掉。三个时刻的答案，往往比一百句口号更能说明它的尺子。

阿萍的长椅，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她第一次把长椅摆回去，是她的尺子第一次露出了第二个刻度。

到这里，三个人都过了一遍。我们拿到了三条律、三种统一：皮尔斯统一于创造，詹姆斯统一于幸福，杜威统一于自由。**他们三个都说自己反对形而上学，可他们都在各自的路上，用同一个动作做着同一件事：选定一条律，让它说了算。**

三个人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美。可是，请想象一下，如果把他们三个人请到同一间屋子里，让他们一起讨论“一件事该往哪里走”，会发生什么？

皮尔斯会说：往长出来的地方走。詹姆斯会说：往过得好的地方走。杜威会说：往路更多的地方走。三个人都会说“看效果”，都会说“我没有形而上学”，都会说“让我们试试看”。可这三个“效果”，各是各的货币。

他们能不能商量？能商量什么？如果不能商量“为了什么”，他们还能商量什么？

下一章，我们不去另一个会议室，我们去一家县城的网吧。那里有三个说着不同方言的人，正在玩一局游戏。他们互相听不太懂对方的话，却配合得很好。他们靠什么配合？答案，会让我们看见三个人合在一起以后的样子。

◆

04

第4章

三刀合击与罗蒂

◆ 4.1　网吧里的一局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县城里的人都见过它的样子。

晚上十一点，县城汽车站后面那家网吧，二楼靠窗一排机位。网管老岑在前台刷手机，隔一阵抬头扫一眼：谁的茶杯快空了，谁的机器该关了。

靠窗坐着三个互不认识的人。最左边是跑长途货车的老郭，福建人，卸完货等明早装货，来这里打发一夜。中间是小钟，县技校二年级，本地人，一口软软的县城话。最右边是阿川，四川人，在外面打工，提前回来过年，这几天在亲戚家待得别扭，跑来网吧躲清静。

三个人在同一款游戏里被系统排到了一队，另外两个队友在别的城市。开了语音，一局开始。

游戏进行到一半，局面不好。老郭说了一句闽南话，大概是着急了，小钟和阿川一个字也没听懂。阿川回了一句四川话，老郭也没听懂。小钟用县城话劝了一句，另外两个又是半懂不懂。

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三个人谁也没听懂谁的话，这一局却打下去了。**

因为游戏里有一套大家都用的词：集合、撤、别送、上、守家。这几个词不带口音。一个人喊“撤”，另外四个人不管嘴里是哪里的话，手上都知道该干什么。五个人配合着，居然把局面扳了回来。

打赢的那一刻，网吧里响起了一声真人的欢呼。老郭从机位上抬起头来，隔着小钟看了阿川一眼，三个人才发现：原来你们就坐在隔壁。

阿川笑了一下，说了句什么。小钟没听懂，老郭也没听懂。三个人又低头点了“再来一局”。

这件事值得停下来想一想。

他们合作得很好，但没有人知道另外两个人是谁。老郭不知道阿川为什么大冬天回来，小钟不知道老郭一晚上要在这里坐多久，阿川不知道小钟这个年纪的孩子是怎么在县城里长大的。他们各自的话里，都带着自己那片地方的来历：口音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一个词怎么念，里头有几十年的人、几代人的往来。这些来历，一点也没有进到这局游戏里。

进到游戏里的，只有一样东西：这一局怎么打。

这就是本书要讲的“路”。一条路，可以让五个互相听不懂方言的人合在一起走。它是实用主义最了不起的地方：不问你从哪里来，不问你信什么，只问这一步怎么走，走了有什么效果。

前三章，我们把这条路的三位奠基人一个一个看过了。皮尔斯把路统一在“长出来”上，詹姆斯把路统一在“过得好”上，杜威把路统一在“自由”上。

一个一个地看，很容易觉得他们是三个性格不同的人：一个是冷冷的逻辑学家，一个是热心肠的心理学家，一个是认真的教育家。可这一章要做的事不一样：我们把他们并排摆在一起，看他们做了同一件事。

回到网吧。游戏打到第三局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

小钟想试一种没人用过的打法，他在视频里看到过，觉得有意思。老郭不乐意，他说：“照常规打，赢了就行。”阿川在一旁说：“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高兴最要紧，骂人不好。”过了一会儿，老郭又说，他想换一个位置，他不想一直当别人安排的那个角色。

这时候，那一套“集合、撤、别送”的词，就帮不上忙了。

那套词能决定这一步怎么走，决不了这一步为了什么。小钟要的是新鲜（他想把一样没有的东西弄出来），阿川要的是舒心（他想让大家都过得好），老郭要的是不被安排（他想自己说了算）。三个人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可每个人心里的“应该”，是另一条律。

这一局里的三个人，恰好站成了实用主义三位奠基人的样子。

不是说老郭是杜威，小钟是皮尔斯。人没有这样简单。这个构想的场景只想说一件事：当路上的人都只听得懂“怎么走”的时候，“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就会在每个人身上，各自长成一个不能商量的底子。方言还可以翻译，底子翻译不了。

路是统一的，底子是分家的。这一章要看的，就是这个“统一”和这个“分家”，是怎样缠在一起的。

在往下走之前，先把话说公道：网吧里发生的那件事，是一桩了不起的本事。

让五个听不懂彼此方言的人在一局里配合，靠的是什么？不是谁改口说了普通话（老郭的普通话夹着闽南腔，阿川的四川话谁也学不来），而是大家都愿意把“来历”先放在一边，只认眼下这一步。你喊“撤”，我就撤；撤完了有没有效果，下一秒就知道。对不对，在路上看。

实用主义的整个气质，就在这里。它让陌生人可以一起做事，不用先结拜，不用先对暗号，不用先把各自的祖宗八代交代清楚。一个县城里能同时容下外来货车司机、打工青年和技校学生，靠的就是这种“先把这一步走起来”的默契。我们不应该小看它。

可是请再看一眼那套“集合、撤、别送”。

这几个词，也有来历。它们是游戏公司的设计师们定下来的，又被成千上万的玩家一晚一晚地用，用出了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分寸：什么时候该“撤”，什么时候“撤”就是怂。老岑在网吧待了十几年，他知道这些分寸前几年和今年并不一样，几年前的玩家听了今天的“别送”，要愣一下。

也就是说，这套统一的词，是有土的。它的土，是一群人长期在同一个屏幕前泡出来的熟悉。只是这片土被收成了“规则”，规则看上去像是从来如此、人人一样的东西。路上的人用它的时候，感觉不到土，只感觉到“这一步怎么走”。

这就是路的另一面。路统一得越好，土就越容易被忘掉。老郭和阿川要是不在三局之后抬头看一眼，他们甚至会一直不知道对方坐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说“实用主义统一了路”，这句话里有两层意思，不要混在一起：

第一层是赞美。路被统一了，陌生人才能合作，一种思想才能走出学院，走进实验室、教室、法院和车间。

第二层是追问。路被统一的时候，到底是哪一部分被统一了？是“这一步怎么走”，还是“这一步为了什么”？前者可以统一，因为它是手艺，是熟悉；后者要是也被统一了，就意味着有某一个人的“为了什么”，坐到了所有人的“为了什么”的头上。

网吧里的三个人，一个为新鲜，一个为舒心，一个为自己说了算。他们都有道理，都不是坏人。这个局面，本书叫它“同一条路上的三个底子”。

这三个底子，怎样在三位奠基人身上各自长成了三条路的裁判，又为什么在三个裁判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能请另外两个让座，是接下来两节要弄清的事。

◆ 4.2　三把刀，一个落点

老岑去年翻新网吧，请了三个师傅，同一天动手。

一个师傅拆吊顶，一个师傅撕墙纸，一个师傅起旧地板。三面同时下手，一天下来，屋子里原来贴着的、吊着的、铺着的东西，全都没了，光剩下四面墙和一个空壳。老岑站在门口看，觉得干净得有点吓人。

第二天他才发现两件事。第一件，三个师傅用的是同一台电锤，只是各自换了钻头。第二件，墙里的旧线路和脚下的地基，一个师傅也没碰。

拿这个小场面去看实用主义，是一个意外合身的比方。

– 他们自己的三把刀

先说实用主义自己的三把刀，它们砍的是形而上学。

皮尔斯的刀，砍在“概念”上。一个词、一个想法，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是：它会引出什么做法、什么后果，它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说不出任何后果的概念，是空的。这一刀下去，一大批只在字面上打转的争论，没有了立足的地方。

詹姆斯的刀，砍在“真”上。一个说法是真的，是因为它与那个“本来的世界”对得上吗？还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里站得住、能兑现？詹姆斯选了后者。按他自己的讲法，实用的办法首先是一个了结形而上学争论的办法：争到底也争不出结果的，就看它们在生活里有没有区别。

杜威的刀，砍在“位置”上。哲学家和知识者习惯于站在世界之外，当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望着世界，说它是什么。杜威说，人本来就在世界里头，知识是人在世界里做事的一部分。站上第235号书把这一刀叫做对“旁观者理论”的拆除。

三把刀，三个落点：概念、真、位置。

这三个落点很有意思。形而上学总要躲在什么地方？它躲在词的意思里（“本体”是什么意思），躲在什么算真里（真就是与实在符合），躲在谁在什么位置说话里（站在世界之外说世界）。三把刀，把三个藏身之处，同时砍了。

所以，说他们“合击”，一点也不夸张。这是一次真正的、从三个方向同时下手的拆除。拆完以后，S维度的形而上学——那种把一片有来历的土说成“本来如此”的做法——在他们的地面上，几乎无处可立。这是实用主义最大的功劳，应当讲足。

– 本书的三刀

可是，既然是拆除，就要看拆完以后剩下了什么。

我们在前三章，也拿了三把刀。第1章砍皮尔斯，第2章砍詹姆斯，第3章砍杜威。每一章的刀口，本来是各砍各的：皮尔斯被我们读成统一于创造，詹姆斯被读成统一于幸福，杜威被读成统一于自由。

现在把三刀并排放在一起看：它们的刀口，落在同一个点上。

这个点是什么？是三个人在两条意义律拉扯的时候，指定其中一条做裁判的那个时刻。让我们从三本书里各找一个这样的时刻。

皮尔斯的时刻在《信念的确定》（1877）。他把确定信念的四种办法排了队：固执的办法，权威的办法，先验的办法，科学的办法。前三种都能让人心安，都被他排到后面。排队的依据只有一条：哪种办法能让信念一直接受检验、一直往前修正。这是创造做裁判，幸福被请到了后座。

詹姆斯的时刻在《信仰的意志》（1896）。有些选择，证据永远凑不齐，而人又不能不选。詹姆斯说，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信，因为不信同样是一种选择，而且不信常常让人活不下去。这是幸福做裁判，证据被请到了后座。

杜威的时刻在《经验与教育》（1938）。他区分了两种经验：能让人以后更能接受新经验的，是好的；让人变得封闭、窄化，以后更难接受新东西的，他叫它“错误教育性”的经验。这是自由做裁判，满足被请到了后座。

三个时刻，三本书，三种场合，一个动作：把一条律立为裁判，把另外两条律安排在它的下面。

这就是本书说“实用主义统一了D1”的文本依据。它不是三个人各自碰巧偏爱一条律，而是三个人在需要决断的那一刻，用同一种办法决断。

– 刀口为什么重要

三把刀合起来看，有三个收获。

第一，刀口一致，说明统一不是个人脾气。如果只有一个人这样，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偏好。三个人，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逻辑学、心理学和宗教、教育），用三种不同的语气，做了同一个结构的动作，这说明它已经是一种共同的做法：它不属于某个人，属于这条路。

第二，刀口一致，也说明这件事极难被看见。它没有长成一个主张，它长成了一个动作。你读《信念的确定》，读《信仰的意志》，读《经验与教育》，读得再仔细，每一篇都是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讨论，没有一篇写着“本人在此统一意义律”。它藏在判断的方式里，不在判断的内容里。

第三，刀口一致，也说明实用主义自己的三把刀，砍错了半个地方。他们砍的是S：词的意思、真、位置。他们的地面是干净的，S的统一被拆除了。可那台电锤，也就是“看效果”这个办法，没有被拆。电锤原样留下，到了三个人手里，换上了三种钻头。他们用同一台电锤，拆掉了S的统一，又悄悄在D上装了一个新的。

回头看老岑翻新的网吧。三个师傅拆干净了吊顶、墙纸、地板，却没有一个师傅问：墙里的老线路是谁几年前走的？它们为什么走在那个位置？地基是在什么土上打的？这些问题，如果不问，新装修无论多漂亮，都得叠在旧线路上。

这一点要说得公道：三个师傅没有错，拆吊顶、撕墙纸、起地板，是他们的活儿，而且干得漂亮。实用主义的三把刀，同样是干得漂亮的活儿。可一间屋子的事，不全在吊顶、墙纸和地板上。

本书的工作，就是接着问墙里的线路。

◆ 4.3　三个裁判，一个动作

网吧里有个常客，大家叫他老蔫。四十来岁，每天晚上八点来，坐固定的那台机器，只玩一款十年前的老游戏。别人早换了新的，他不换。他打得极熟，闭着眼睛都知道哪里有埋伏，一局下来很少说话，脸上是一种安安稳稳的神气。

有一天晚上，小钟、阿川、老郭从他身后经过，三个人都看了一眼他的屏幕，各自有话。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面。三个人的话，是借三位奠基人各自的刀法推演出来的，不是他们的原话。

小钟说：“天天玩这个，一点长进都没有。”

阿川说：“人家玩得高兴，碍着谁了？”

老郭抽着烟，想了一会儿，说：“要看他是自己不想换，还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要是自己不想换，那随他；要是不知道别的路在哪，那就是亏了。”

三句话，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屏幕。可是你听出来了吗？三个人拿的是三把不一样的尺。

小钟那把尺，量的是还在不在长。老蔫打得再熟，不长，就不算数。安稳在他眼里是一种“停”。这正是皮尔斯在《信念的确定》里排四种办法时的刀法：固执的人也能平静，可平静不算数。

阿川那把尺，量的是过得好不好。老蔫脸上那份安稳，就是答案，不用再问别的。这是詹姆斯的刀法：一个信念让一个人活得下去、活得有劲，它就兑现了。

老郭那把尺，量的是路多不多。老蔫哪怕不换，只要换的路是开着的，他就是自由的；哪怕他玩得高兴，要是别的路根本没人告诉他，那条路就是窄的。这是杜威的刀法，按我们上一章的裁定：路越能引出更多路，越好。

三把尺，三个裁判。现在请注意：他们三个，没有一个是单律的人。

– 他们都收着另外两条律

小钟没有说“高兴不重要”。他的意思是，高兴要靠长进来换。皮尔斯就是这样处理幸福的：幸福在，但它是信号灯，亮了说明这一段长完了，真正的目标在下一段。小钟也没有说“选择不重要”，他的意思是，选择是为了找到更值得长的东西。皮尔斯处理自由，也是这样：玩味是花园，可这花园是苗圃。

阿川没有说“新鲜没意思”。他的意思是，新鲜要有好处才算数：折腾一圈让人过得更累，就不值得。詹姆斯处理创造和自由，是这样的：意识里不断涌出新东西，他讲得很动人；人有选择、有冒险的自由，他也讲得很动人。可这两样，最后都要放到“能不能让一个人过得下去、过得更连续”的秤上称一称。

老郭没有说“高兴没用”。他的意思是，高兴要从路的宽处来，窄处来的高兴，是靠不住的。杜威处理幸福和创造，是把它们都放进“生长”里去：满足是生长的一个侧面，新东西是生长的另一个侧面。

用一句话收这一节：三个人都把另外两条律请进了家门，可是请进来的方式，都是请它们去给一条律当帮手。站上第202号书把詹姆斯这样的做法写成“自由=创造×幸福”。这个式子有一个特点：乘法里任何一项是零，结果就是零。上一章讲过，婚宴上新人想念自己写的话，亲戚一句“老人不习惯”，创造和自由就让了半步。幸福在式子里拿着一票否决的章。本章只补一句：把另外两条律写进同一个式子的那一刻，式子里总有一个字拿着否决章，那个字就是裁判。站上第180号书把杜威的做法叫“并账”，把几本账并成一本。并账是个好办法，可并账总得有一本是“总账”：谁的账本做总账，谁就是东家。

– 三个钱庄

我们不妨换一个更近的比方。

老岑说，网吧这一带有三家，彼此不太对付。每家都发会员卡，每家都说自己的卡“通用”。你拿着甲家的卡去乙家，乙家的人也让你上机，可是要折价：甲家的一百块，到了乙家只算六十。折多少，乙家说了算。你再拿着乙家的卡去丙家，也是一样。

每一家都不是不认别家的卡。它们都认，只是都按自己的汇率认。

三位奠基人对待另外两条律的办法，就是这样的汇率。皮尔斯把幸福折成“信号灯”，一块钱的幸福，在他账上只值几分的创造；詹姆斯把创造折成“有好处的新鲜”，一块钱的创造，要看能给人带来几分舒坦；杜威把幸福折成“生长的满足”，一块钱的舒坦，要看它给路开了几道口子。

没有哪一家说“别家的卡不是钱”。可每一家都是自己的账本做总账。

这就是为什么三个人“商量不了”。商量需要一把共同的秤，而三个人的秤，每一把都把另外两条律挂在自己的钩子上。皮尔斯要是对詹姆斯说“你把幸福放高了”，詹姆斯听见的是：“你把我的总账改成了你的总账。”这不是脾气问题，是结构问题。

回头看第1章讲过的“为名字而战”：皮尔斯改名，不是一个人闹情绪，而是账本不兼容，只好分家。

– 回看两个小场面

前两章各留了一个小场面，放到一起，正好是这三种收法的样子。

第2章的婚宴上，新人想不敬酒、不起哄，只念各自写的话。这是创造，也是自由。亲戚们说“老人不习惯”，新人让回了一半。让步没有错，那是人情；可请看让步的方向：新东西、自己做主，最后都要过一道关，叫“大家舒不舒坦”。第2章的后厨里，老霍炒出一道苦香的野菜腊肉，经理说“先在员工餐里

试试”，试的规则也是客人吃不吃得惯。两处都是同一个动作：创造和自由被请进房间，却要到走廊里去验“舒坦”的票。

第3章的送单，是另一种收法。骑手老秦把汤面放在老太太门口，等她开门，听她说一句“路上慢点”，心里落了地。杜威把这样的完整叫“一次经验”。创造在这里没有被否决，它被折成了“路的质地”：这一单被做成了一个有头有尾、接得上前后的整体。幸福也没有被否决，它被折成了“路走得顺时的手感”：那一小块平，是做完整了以后自己漏出来的，不是送单的目的。

把这三处摆在一起，再对照皮尔斯那里幸福是“信号灯”、自由是“苗圃”，就可以看出：三种收法的手势不同，一个是请它做帮手，一个是请它去验票，一个是请它做侧面。手势不同，所以每个人读自己的书，都觉得自己很宽厚；手势里的东西相同，所以三个人合起来看，是同一个结构。

这里有一个细节：杜威的收法最软，软到让人看不出有裁判。创造和幸福都没有被压在下面，而是被“折”进了生长。正因为软，它最难被指认。上一章的结论是，生长就是自由律的读数；读数这个词，把杜威这一格说得很准：温度计里的水银柱，不拿着否决章，可你只能看它，不能不看它。

– 平时三把尺是同向的

说到这里，有人会觉得奇怪：既然三个人的总账不通用，为什么实用主义看上去那么和谐？这么多年，也没见谁因为“该立哪条律”打得头破血流。

原因很朴素：绝大多数时候，三条律指向同一个方向。

老岑前年决定换一批新机器。小钟的尺子说：换，新机器能让玩家的水平继续长。阿川的尺子说：换，新机器不卡，玩家玩得舒坦。老郭的尺子说：换，新机器能玩的游戏多，选择就多。三把尺，三个理由，一个结论。老岑一拍桌子，换了。

在这样的时候，三个裁判坐在同一条长凳上，没有人看得出他们是三个人。只有在接缝上，在老蔫那样的场合，三条律往不同的方向拉，裁判才需要现身。这时候，一个人“指定了谁”才变成可见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统一”极难被发现：它在大部分日子里，是一个没有被触发的开关。三位奠基人的文字，大部分也都是在三条律同向的地方写成的，读起来通顺、和谐、有道理。只有在几个特别的节点（排队、选择、“错误教育性的经验”），裁判才露出脸来。

这个观察还有一个后果，会在后面的章节反复用到：一套统一的做法，在顺风的时候最牢。只要三条律同向，它就看不出缺点，也就没有理由被追问。等到风向变了，三条律往三个方向拉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手里没有一个共同的办法。

– 同一个动作

三个人做的，到底是同一件什么事?

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两条意义律拉扯起来（老蔫是安稳还是长进，是高兴还是路窄），三个人面对拉扯的时候，都没有说“让两条律一起来”，也没有说“看情况，有时这条，有时那条”。他们都指定了一条律做最后的裁判，让另外两条在它的裁决下发言。

这个动作，本书叫做“让路只听一条律”。名字土一点，意思很直白：两条律拉扯的时候，只让一条说话算数。

做这个动作的人，三位奠基人都是。做完这个动作，他们三个就成了“统一者”：在一条路的最高处，都立着一个字。皮尔斯立的是“长”，詹姆斯立的是“好”，杜威立的是“通”。

导论里已经说过，意义在SDE里是D的第一层（D1），它有三条律：创造、自由、幸福。统一了D1，就是一个D维度的形而上学。现在加上一句：这个D维度的形而上学，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同一结构的变种。它们不是三种哲学，是同一种哲学做了三次选择。

于是，有一个常见的想法可以放下了：既然三个人各讲一条，把三条合起来，不就全面了吗？创造加幸福加自由，除以三。

不行。因为三个人的总账不通用。你要把三个人合起来，就得再设一本总账，而一设总账，你又成了第四个统一者。真正的路不是调和，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三个人都要立一个裁判？立裁判这件事，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要到卷二、卷三才能回答。

现在可以先说一个结论，作为本节的判词：

三个人吵架，不是因为他们想法不同，而是因为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把统一的尺；统一的尺和统一的尺之间，没有第三把尺。

◆ 4.4　一张被切过的拼图

老岑开这家网吧十几年了。头一年装修，他没想那么多：大厅摆了二十台机器，靠里间隔出几个小包间，前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大屏，放比赛直播。就这么摆下来。

五年以后，他才发现一件事：人自己把这间屋子分成了三块。

大厅里的人爱说话，吵吵嚷嚷，三五成群，借火的、拼桌的、一起骂游戏的，大厅是一起的地方。包间里的人关着门，耳机戴得严严实实，有的是躲家里，有的是躲日子，包间是自己的地方。而大屏下面总有一小撮人，仰着头看职

业选手打比赛，看得很认真，嘴里念叨着“下个月我也去报名”“明年要是能上分”，那是往前看的地方。

老岑说，这三块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他还试过把几个包间拆了，把大屏换到别处，结果过了几个月，人又自己围成了差不多的三团。

这个小小的事实，可以拿来问一个更大的问题。

– 三个面向

回头看三位奠基人，各自站的位置、望的方向，也不一样。

皮尔斯望的是将来。他一生里有近三十年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工作，同重力测量、同数字、同“怎样才能算准”打交道。他对真理的说法，是一群探究者如果一直探究下去、最终会同意的那个东西。这个“最终”，在远处。他的眼睛，是朝前、朝远处看的。

詹姆斯望的是自己。他早年学医，后来做心理学，写《心理学原理》。1870年前后他自己陷入一场很深的精神危机，这件事202号书讲得很透。他一辈子关心的是：一个具体的人，怎样才能在这个世界里站稳、活下去。《宗教经验种种》讨论的，也是一个人内心里的体验。他的眼睛，朝里看。

杜威望的是一起。他在芝加哥办过实验学校，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写《民主与教育》，写《公众及其问题》。他想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人，怎样一起生活，怎样让共同生活越过越好。他的眼睛，朝旁边看，朝人和人之间看。

将来、自己、一起。

读到这里，有一个对应会自己冒出来。SDE讲土有三个大块，叫三界（E1）：理念界（想法、概念、心里的样子），自我界（“我”的感受和在场），现实界（摸得着的人和物、人和人一起过的日子）。

皮尔斯的眼睛偏向理念那一块：概念怎样弄清，探究怎样走到最后。詹姆斯偏向自我那一块：一个人怎样过得下去。杜威偏向现实那一块：人和人、人和物怎样在一起，把日子过顺。

这里要小心。第一，这是侧重，不是等于。皮尔斯也谈过伦理，詹姆斯也关心过社会（他反对美国对菲律宾的战争，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杜威也写过宗教和艺术。第二，说“对应三界”，并不是在做一个整齐的分类游戏：一对一的整齐，往往正是勉强的开始。

但是，侧重的三块，拼起来是什么样子？

将来、自己、一起，拼起来像一个完整的人生。一个人活一辈子，不就是这几件事吗？想长成什么样（往前），自己过得好不好（向内），跟别人怎么一起活（向外）。三个人各拿一块，拼成一张看上去什么都管到了的图。

这也许是实用主义在美国那么有说服力的一个原因：它给人的感觉是全面。

– 巧合，还是土？

好，现在问题来了。三个人各站一块，这是巧合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巧合。皮尔斯是逻辑学家，詹姆斯是医生出身的心理学家，杜威是教育家，一个人学什么就看什么，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个回答不能算错，可是它有一个问题：它只在三个人身上打转，没有往三个人背后看。

另一个回答是：不是巧合，是土给他们分的工。

意思是这样的。设想有一块土，被切成了三块地，每一块地都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农具、自己的人。有一块地归实验室、测量局、大学里的科学共同体管，那里的事叫“探究”和“创新”；有一块地归教会、归家庭、归个人的内心

管，那里的事叫“心安”和“得救”；还有一块地归学校、市政厅、公共生活管，那里的事叫“共同治理”和“自由”。一个人生在这片土上，他不用自己决定去管哪一块，他所在的位置，已经替他选了一块。

如果这个回答是对的，我们应该能在三个哲学家之前，在哲学之外，就看到这三块地。教会、社会、科技三个场合，应该早已各讲各的话，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语法。也就是说，实用主义不是切开这张图的人，它只是把一张已经切好的图，从三个方向，各自翻译成了哲学。

这个回答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推翻：如果我们回到三位奠基人之前的美国，发现这三块地并没有分开，教会、实验室、市政厅讲的是同一套话，那么“土分了工”就错了，我们只剩下“巧合”。

这件事要到卷三才能查清楚。这里只做一件事：把题目摆在桌上。

还有第三个看法，也值得放在这里，不下判断。有人会说：三块拼图能拼在一起，正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一整块的。拼图的一个常识是——拼图都是切出来的。你能把一张图拼好，是因为有人先把它切开了。如果这三块真能严丝合缝，那就更要问：谁切的？沿着什么线切的？

回头想想，这三个面向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它们都是“路”的面向。将来是路的前面，自己是路上的人，一起是路上的同伴。三块拼图，拼出来的是一幅“赶路图”。图上有往哪里去、谁在走、跟谁走，却没有一块是“脚下的这片地”。

这是一个小小的空白。拼图拼得再完整，边框以外的东西，就不在图里了。实用主义给我们一幅无所不包的人生图，可它所包的，都是路上的东西。

– 接缝

最后，请回头看看老岑的网吧。

三块地，大厅、包间、大屏。平时各玩各的，没什么事。可是有一个地方，总会出事，就是接缝：包间里的人出来上厕所，被大厅里的人吵到；大屏下面的人想上分，嫌大厅的人太闹；大厅里的人嫌包间里的人“冷冰冰”。老岑一晚上调解的纠纷，十有八九都在这三块的交界上。

老蔫的那次，也是接缝上的事：他躲在自己的安稳里（自己），小钟看着他不长进（往前），老郭担心他路窄（一起）。

三位奠基人的接缝，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守着一块，守得很好，守得很深。可是人一辈子不是三块各过各的，一个人早上在包间，中午在大厅，晚上仰头看大屏，三块地在他身上要同时起作用。接缝在哪里？接缝在人身上，一个人身上的三块地，从来是同时开着的。

三个人谁也没有处理这条接缝，因为三个人各自的总账，都是把另外两块收进自己里面。要处理接缝，就得有一个人，既不站在任何一块里，又敢把这三块摊开来看。

这个人就是罗蒂。

◆ 4.5　罗蒂：两只抽屉

老岑的前台有两只抽屉。

上面一只大的，放当天的收银、零钱、会员登记本，也放着一把备用钥匙——这些东西是网吧的，是大家的，谁来了都要看见账平不平。下面一只小的，锁着，里面是老岑自己攒的东西：十几盒旧游戏卡带，一个坏了的掌机，几张早年在录像厅看电影时留下的票根。

两只抽屉从来不开在一起。老岑说过原因，说得很直：“混在一起，账算不清；混在一起，我也玩不痛快。”

这个小小的习惯，像是一种聪明的生活办法。可如果有人问：这两只抽屉的分界线是谁划的？卡带为什么不能进收银抽屉？如果有一天，老岑发现他攒的卡带，恰好是年轻人最想玩的东西，该进哪一只抽屉？——老岑会皱起眉头，说：“到时候再说。”

把“抽屉”变成整套哲学的人，是罗蒂。

– 他是下一代

理查德·罗蒂（1931—2007）是美国哲学家，比三位奠基人晚了差不多一百年。他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代”：站上第178号书专门研读过他。

他最先出名，是因为1979年的《哲学与自然之镜》。那本书拆的是一个古老的想法：人的心是一面镜子，哲学的任务是把外面的世界照准。罗蒂说，这面镜子是个比喻，不是事实。后来他转向文化和政治，1989年出版了《偶然、反讽与团结》。在这本书里，他把自己的立场说得最清楚。

按站上第178号的概括，他立了三样东西：一扇门，一粒骰子，两只抽屉。我们一样一样来。

门。罗蒂把“理由”和“原因”分开。世界可以引起我们说什么——风吹来，门响了，我们说“风来了”；可是世界不能判决我们说得对不对。能判一句话对不对的，只有别的话，只有人和人之间互相给出的理由。178号的说法是，他把“世界”请出了判词之外。这是一次很彻底的清场：皮尔斯的“最终会同意的那个东西”，詹姆斯的“兑现”，杜威的“有保证的断定”，都还留着一个朝向世界的小窗，罗蒂把这个小窗也关上了。

骰子。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我们成为的自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共同体，都是偶然的。就像掷骰子，掷出来是几点，是几点。没有一个更高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是这套词汇、这种自己、这个“我们”。

抽屉。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人还怎么活？罗蒂的回答是：把生活分开。有一个私人的抽屉，里面放着自我创造：读诗，读小说，把自己写成一个新的人，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还有一个公共的抽屉，里面放着团结：不要让别人受苦，不要让别人受羞辱，把“我们”的圈子慢慢画大。这两只抽屉，他明说了：不需要也不应该并成一只。

门、骰子、抽屉，到了这里，是一套相当漂亮的组合。他是一个反讽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方面，他相信残忍是最坏的事；另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相信的这套词汇，也是掷出来的。

– 把抽屉读成分家协议

站上第178号书的研读很细，这里不去重复。我们只往前走一步：抽屉，读成“三律分家的制度化”。

回到前三章。皮尔斯统一于创造，詹姆斯统一于幸福，杜威统一于自由，三个人各把另外两条律收进自己的总账。他们的矛盾，是“总账之争”，没有第三把尺。

罗蒂是较早把这件事挑明的人，也是一个不再争总账的人。他的办法，是干脆承认：账本有两本，不并了。

私人抽屉里放的，是创造和自由。读诗，读《追忆似水年华》，写自己的故事，把自己活成一个新东西，这是创造；不受别人的描述限制，自己决定自己是谁，这是自由。公共抽屉里放的，是减少痛苦、减少羞辱，把“我们”的圈子慢慢画大，这更近于幸福——让更多人少受苦——也带着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公共自由。

这里不必要求整齐的一一对应。公共抽屉里的东西，不是一条律的纯粹版本，而是几条律的混合体。要紧的是看见：三条律不再各自称王，而被安排在两只抽屉里，由一条线隔开。

这一条线，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让私人生活里的高远，不必为公共生活的低线负责，也让公共生活里的体面，不必替私人生活的怪癖背书。一个人早上在公共抽屉里做一个不伤人的好公民，晚上在私人抽屉里做一个谁也管不着的怪人，互不干涉。

我们应该为这个发明鼓掌：因为在三位奠基人那里，三条律是在吵架；到了罗蒂这里，吵架被制度化了——吵不下去了，便立了一个规矩：谁在哪只抽屉里说话，各守各的。

分家协议，是比吵架高明的。可协议也有协议的代价。

– 协议的三处空隙

第一，线本身是统一出来的。“私”和“公”这条分界线，罗蒂把它当成一个不需要追问的东西。可是这条线是谁划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土上划出来的？一个人的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是不一样的：一个镇上，婚丧嫁娶是全村的事，不是谁家的私事；换一个年代，同样的事成了一家人关起门的事。线是长出来的，不是掷出来的，更不是天然就有的。把线当作给定，是一种新的统一，这次统一的不是意义律，而是分抽屉的办法。

第二，有些东西，哪一只抽屉都放不下。还记得导论里那座被拆的澡堂吗？老马他们在里头泡一泡，躺一躺，说说话。它算私人抽屉吗？不算，那是好几个人一起的。它算公共抽屉吗？也不算，没有人在那里做公共的事，没有议程，没有目标，谁也不是代表谁。这种“大家一起的、又不为什么的”东西，在两只抽

屉的格局里没有位置。它不属于自我创造，也不属于减少残忍。它被拆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违反了任何一只抽屉的原则。

这样的东西，不止澡堂。串门，闲逛，没有目的的聊天，孩子们放学后在路上磨蹭的那半个钟头。两只抽屉的格局，对一锅粥的状态没有安排。

第三，“偶然”也是一种不问来历。罗蒂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自己、我们的共同体都是偶然的。这句话针对的是形而上学的“必然”——凡事必有一个本来如此的根。这一刀砍得对。可请看砍完之后，留下的是什么：土还是没有来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

传统形而上学说：这片土是本来如此的（必然）。罗蒂说：这片土是掷出来的（偶然）。说它是必然，和说它是偶然，都是不去追它的来历。前一种是把来历藏进“本来”，后一种是把来历丢给“骰子”。可是老岑的网吧分成三块，不是必然，也不是骰子，而是十几年里一个一个晚上泡出来的。土的来历，不是必然，也不是偶然，而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这一点，需要用同一性谱系去回答，而不能用掷骰子回答。

据站上第178号的自评，罗蒂这条路里“门可以开多大”的问题，没有现成的判据。这个缺口，正是谱系可以补上的地方：来历写得清，才知道门该开到哪里。当然，这一点，要在卷九才能展开。

需要说明的是：罗蒂讲过自由主义怎样走到今天的故事，并且很愿意讲故事。可在他那里，故事是“我们愿意这样讲”的叙述选择，不是可以逐笔对账的家谱。

– 团结在日常里长什么样

这里可以替罗蒂说一句公道话。他的公共抽屉，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地方。

他自己明确说过，把“我们”的圈子扩大，靠的不是论证，而是故事：小说、报道、人类学的记录，让原本陌生的人的痛苦变得看得见、听得到，原来的“他们”便慢慢变成“我们”。这是他讲团结的一个主要办法。

我们不妨想象网吧里的三个人。老郭一开始是“那个货车司机”，阿川一开始是“那个回来过年的打工的”，小钟一开始是“那个技校的小孩”。一个晚上，三个人打赢了三局，听到了彼此一声真的欢呼，又各自听见对方讲了一件自己的事（阿川说他不想一个人待在亲戚家，老郭说他儿子今年考了县里的重点），这时候，“那个谁”就悄悄变成了“我们三个”。

这是一件很具体、很温暖的事。罗蒂的公共抽屉，就是想守住这样的事：不是用一个大道理把人合在一起，而是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故事。

但是请看，这种团结是怎样发生的：在一个共同的屏幕前，泡了几个小时，说了几句真话。它有来历，有地方，有谁在场、谁没有在场。团结自己就是一条谱系，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罗蒂把它放进公共的抽屉，抽屉里只写着“团结”两个字，却没有写它的家谱。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要用到：当一个东西本身有谱系，而哲学只给它一个抽屉位置的时候，抽屉的格局就开始勉强了。

— 无用之用被锁进了抽屉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停一下。

站上第178号书提到，罗蒂对野兰花有一份少年时代起就有的热爱，在一篇自述性的文章里讲到过。这份热爱，在他那里是一桩“说不出用处”的事：不为正义，也说不出对谁有好处，只是爱。他把它放进了私人抽屉，并没有试图让它去解释任何公共的东西。

这是整条线上第一次，“无用”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罗蒂没有说它没用，也没有说它必须有用。他说，它不用说明理由。对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

可是请看那一只抽屉的位置：私人的，锁着的，不对外开放的。“无用之用”进了锁，意味着它的用处——也就是对别人、对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东西——就不再被讨论了。澡堂里老马他们的几个钟头，也是“无用”的，可它是大家的，它的“用”偏偏就在大家的。把无用锁进私人抽屉，等于说无用只能是私事。而无用的另一半真相，要留到卷七才能说：有些无用，是大家共有的土壤，是让别的东西能够长出来的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后果，同样重要：在罗蒂的格局里，一个想法没有“对错”的法庭可去，它唯一的下场，是没人再说了。站上第178号书对此有专门的研读。没有法庭可去，一个想法的结局就只剩两种：被人用着，或者被人忘掉。这一点放到下一小节，用网吧里的游戏试一试，到了卷七再接着用。

– 只被“用不用”判决的世界

在罗蒂的格局里，一个想法只会过时，不会被判错。这个说法，可以拿网吧里的游戏来试一试。

老岑见过很多游戏的结局。有一款很多年前红过的游戏，后来服务器停了，再没人玩，没有谁宣布它“错了”，它只是慢慢从机器的桌面上消失。这是“过时”。

可是请想想另外两种游戏。一种是设计得很用心、玩法很细腻的，只是没有赶上宣传，没几个人知道，悄悄就没了。它“没人用”，可你说它没用吗？另一种是做得粗糙，靠一轮一轮的充值活动把人拴住，玩的人很多，天天有人用。它“被用着”，可你说它有用吗？

把判官换成“用不用”，这两种游戏会得到相反的、也都不太对劲的判决：第一种死了，第二种活着。“被用着”和“有用”，是两回事。一个只被“用不用”判决的世界，会把这两回事当成一回事。

这就是后面几卷要认真讲的一个题目：实用主义走到最远的地方，“用”成了唯一的法官，而“有用”这个词，反而失去了可以对质的东西。这里先把它记下，称它为“完全的实用主义杀死实用”的一个语言上的样子。

罗蒂是实用主义第四站。他把三条律的吵架变成了协议，把统一的账本变成了两只抽屉，把形而上学的“必然”换成了“偶然”。可是他没有拿掉最早的那一下——只看路。

下一节，我们把四个人并排放在一条线上，看这条线是怎么越来越轻的。

◆ 4.6　一条越来越轻的线

阿川第一次出门打工，是十九岁。

他带了一个大蛇皮袋，里头是一床棉被、两双棉鞋、一口小锅、一大包他妈妈腌的辣菜，还有一本翻烂的字典。火车上，他把袋子抱在怀里，一夜没敢睡。

第二年，他换了一只旅行箱。第三年，他背了个双肩包。到了第五年，他回家过年，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个充电宝，别的东西，到了那边再买。

有一回他对老岑说：“现在什么都轻了，到哪儿都能活。”老岑问他：“那你的口音呢？”阿川笑了笑，没说话。口音是带不走，也扔不掉的东西，它根本不在行李里。

这个场面，可以拿来看实用主义这一条线。

– 四代人，每一代把行李放轻一点

把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罗蒂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件很规律的事：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放下了一点东西。下面的表是本章唯一一张表，把它用一小段话读完，就够了。

	外壳（“世界本来是什么”）	路的“向”	土被写成什么
皮尔斯	公开做宇宙论：偶然、习惯、规律	合理性在具体世界里生长	一个没有边界的探究共同体
詹姆斯	大半拿掉，留下较轻的“彻底经验主义”	过得下去、过得好	一个“普遍的个人”
杜威	拿下哲学的“旁观者”位置；晚些时候在《经验与自然》（1925）里仍讲“存在的普遍特征”	生长，没有教育之外的终点	一个可以重新安排的环境
罗蒂	全部拿掉，世界被请出判词之外	连“向”也是偶然，只剩下“少一点残忍”	一个偶然的、愿意往外扩的“我们”

这张表有三条线，每一条都在变轻。

第一条线：外壳。皮尔斯是明明白白做形而上学的：他搭了一个宇宙的架子，上面写着偶然、习惯、规律。到了詹姆斯，架子拆了大半，只剩下一个说得轻一点的“彻底经验主义”，说经验本身就是材料，不用再往后面找东西。杜威更干脆，他把哲学从“旁观者”的位置上请下来，说哲学是用来解决人的问题的。（需要补一句公道话：杜威在《经验与自然》（1925）里也讲过“存在的普遍特征”，并没有彻底闭口。）到了罗蒂，连世界这个“判官”也关在门外了。外壳一层一层脱掉。

第二条线：向。皮尔斯的“向”是很重的：宇宙在长出越来越多的规律，人的最高的善是合理性的生长，这个“向”有一整套宇宙背景撑着。詹姆斯的“向”轻了一点，从宇宙缩小到一个人：过得下去，过得好。杜威的“向”又

是一种轻法：他不给生长一个终点，说教育没有教育之外的目的，路的意义就在路上。到了罗蒂，连“向”都成了掷出来的偶然，只剩下一个很小的底线：少一点残忍。

第三条线：土。土没有变轻，土是越来越被说得具体、又越来越不被追问。皮尔斯给土一个无限共同体，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来历的“一群人”；詹姆斯给土一个普遍的个人，好像一个人的救命药可以做所有人的路标；杜威给土一个可塑的环境，好像土是一块可以重新安排的地；罗蒂说土是偶然，好像掷出来的骰子，不必追问。四种说法，不同的口气，同一个动作：土是有的，土的来历，不必问。

– 什么没有变轻

线越来越轻，可是有一件东西，从头到尾没有变轻。

那就是只看路。

回想第1章小罗听发动机的故事。一个概念的意思，在它会引出的那一串做法和后果里。皮尔斯这句话是整个实用主义的第一下。四代人各自放下了不同的东西，这一下谁也没有放下。罗蒂把世界请出了门外，可他请出去之后，坐下来干的事，还是看这套话在人和人之间怎么走：用不用得上，能不能让一些人不再受苦。

这一点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来检验：问四个人同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个好，是从哪里来的？”

皮尔斯会说：看它将来会长出什么。詹姆斯会说：看它在生活里好不好使。杜威会说：看它能不能把处境理顺、把路开宽。罗蒂会说：别问它哪里来，我们就是这样被掷出来的，看它之后我们怎么走。

四个回答，四种口气，同一个方向：往前看，别往后看。“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被一个又一个地绕开了。

– 越轻，越看不见

这条线越来越轻，还有一个后果，值得说清楚。

形而上学越是显眼、越是沉重，越容易被批评。皮尔斯的宇宙论，后人可以一条一条地驳，因为它摆在那里，有名有姓。可是到了罗蒂，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驳的了：他连“本来是什么”都不讲，也不讲“路该往哪里去”。他说他没有形而上学。

这句话在字面上是对的。他没有S维度的形而上学，也没有一个明说的D1统一者。可是他留下了一个更难看见的东西：只看路的那一下，和对土的来历的不追问。这两样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主张”，而是一种习惯。习惯进了空气，就没有人觉得它是一个主张了。

这正是第1章讲过的：皮尔斯是实用主义的“底片”，因为在他身上，D维度的形而上学还和S维度的形而上学连在一起，看得清楚。越往后，外壳越薄，里头那颗心越不容易被认出来。到了罗蒂这里，这颗心几乎已经和空气一样透明。

所以，要认出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要从皮尔斯认起；要认出它今天怎样活着，要从罗蒂这样的“轻”里认。重的好认，轻的难认，可轻的更多。

– 轻也有轻的好处

说到这里，一定要替“轻”说一句话，否则这一节就成了对轻便的挑剔。

行李轻了，阿川才能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才能在三个城市之间换活儿，才能在一个晚上认识两个陌生人。如果他什么都要带，他哪里也去不了。实用主义也是一样：外壳脱得越多，思想越容易走进实验室、教室、法院、车间，越容易

被不同行当的人拿去用。要是皮尔斯的整座宇宙论非要跟着每一个概念走，今天的工程师和医生就不会有这么顺手的一条规则可用。

从罗蒂的角度说，放下形而上学，也放下了一种很沉重的东西：那种“我手里握着唯一的真理，所以你们都得听我的”的气势。把世界请出判词，把一切说成偶然，至少让人比较难以拿一个“本来如此”去压别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轻，是一种对强势说法的警惕，值得敬重。

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轻”。问题是：轻是靠放下什么得来的，放下之后，谁来扛？放下一个压人的“本来如此”，是好事；可如果连土的来历也一并放下了，那么路上的人一旦遇到转弯处，就没有一本家谱可以翻。

— 路能轻，是因为土替它扛着

最后回到小罗。

小罗那天在修车铺里听出那一声“咔”，他靠的不是一套宇宙论，也不是一个人生目标。他轻轻松松地听，轻轻松松地说“是不是皮带松了”，一点也不沉重。

可是，这份轻是从哪里来的？从谭师傅的耳朵里，从师傅二十年的修车铺，从这条路上无数辆开进来的面包车，从小罗两年里一辆一辆地听。小罗的轻，是有土垫着的。他的路是轻的，他的土是重的。

阿川也是这样。他背着一个双肩包走四方，那是因为他的口音、他妈妈的腌菜、他这些年落下的每一个熟人，早已经缠在他身上，不用打包。包里不用装，是因为身上装着。

这是一个要紧的道理，也是实用主义这条线留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问号：**路越轻，就越要问，是什么在替它扛着**。一条线一代比一代轻，轻到最后，它是在靠什么站着？

四代人都没有回答，因为他们的刀只砍S，不砍土；他们的眼睛只看路，不看路底下。他们不是不知道有土——罗蒂甚至说土是偶然——而是他们不追问土的来历。

而那个来历，恰恰是一个人的“为了什么”从哪里长出来的地方。网吧里小钟的新鲜、阿川的舒心、老郭的自己说了算，这三个底子，各有各的土。如果土不问，三个底子就永远只能分家；如果土问了，才有可能看见：这三个底子，也许不是三种人，而是同一片土里的三个季节。

◆ 4.7　小结：三刀落下之后

一个晚上过去，网吧里的三个人又一次要走了。

老郭要赶去装货，结了账，戴上帽子，朝阿川点了点头；阿川对小钟抬了抬手；小钟盯着屏幕，嘴里嘟囔了一句县城话，没有人听懂。他们一起打过三局，大概也不会再见了。

老岑把三台机器的座位擦了一遍，下面的小抽屉锁好，上面的大抽屉里账是平的。

把这一章收成几句话。

一、三刀合击，砍掉的是S，立起来的是D。皮尔斯的刀砍在概念上，詹姆斯的刀砍在真上，杜威的刀砍在位置上。三把刀从三个方向同时下手，把形而上学躲藏的三个地方都拆了。这是实用主义不可磨灭的功劳。

可是同一时刻，他们每个人都在两条意义律拉扯的地方，指定了一条做裁判。皮尔斯立“长”，詹姆斯立“好”，杜威立“通”。三个时刻（《信念的确定》的排队，《信仰的意志》的选择，《经验与教育》的“错误教育性的经

验”），是同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本书叫做“让路只听一条律”，它的结果，是在D的第一层（意义目标）上，立起了一个统一。

二、三个统一者之间，没有第三把尺。每一个人都把另外两条律请进了家门，又都让它们给自己当帮手。三个人的账本，各自把别人的钱按自己的汇率折价。所以他们没法商量，也没法被简单地“合起来”：你一设总账，你就成了第四个统一者。

三、三个面向，是不是一张被切过的拼图。将来、自己、一起，三块拼在一起，像是一张完整的图：皮尔斯偏向理念，詹姆斯偏向自我，杜威偏向现实。这到底是巧合，是土给他们分的工，还是本来就切开的一张图，本章没有回答，留给卷三去验。

四、罗蒂：吵架变成了协议。罗蒂是不再争总账的人。门、骰子、两只抽屉：世界不再做裁判，一切是偶然，生活分成自我创造和公共团结两个抽屉，并明说不必合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分家协议。

协议有三处空隙。第一，抽屉之间的那条线，是长出来的，不是给定的。第二，一锅粥一样的“大家一起的、又不为什么的”东西，哪只抽屉也放不下。第三，说土是偶然，和说土是必然，都是不追问它的来历。

五、线越来越轻，只看路的那一下没有放。外壳一代一代脱掉，“向”一代一代放轻，土一代一代被说得更具体、更不被追问。可是“只看路”这一下，从皮尔斯到罗蒂，没有一个人放下。越到后面越轻，越看不见，也就越成了一种习惯，不再是一个主张。

合成一句判词：

三位奠基人加上罗蒂，用一把电锤拆光了“世界本来是什么”的外壳，却没有一个人问过墙里的线路；他们统一了路，在路上分了家，又把分家写成了协议，土的来历，始终在协议之外。

– 与站上几本书的账

本章引用了站上的几本书，每处只取一句，并各说明往前走了哪一步。

站上第133号书讲过皮尔斯的“意思在路上”和他为名字而战。我们接着问：这条路有没有方向，这场争名字，是不是两条意义律的分家。站上第202号书把詹姆斯的做法写成“自由=创造×幸福”。我们接着看：这个等式的等号左边，站着谁。站上第235号书对杜威“旁观者理论”的拆除，我们把它读成杜威的一把刀，并问这把刀拆完以后墙里还剩什么。站上第180号书的“并账”，我们接着问：总账的主人是谁。站上第178号书对罗蒂的“门、骰子、抽屉”的研读，我们接受它的概括，并把抽屉重读为三律分家的制度化，把“偶然”重读为另一种不追问来历。站上第170号书所说的“三格一个影子”，我们已在上一章作了裁定，这里不再重复。

– 这一章可能错在哪里

SDE的写法，每一个判断后面都要问：什么情况下，这话是错的?

如果有人在皮尔斯、詹姆斯或杜威的原著里，找到一段话，明确说“两条意义律冲突的时候，不指定裁判，而是轮换着来”，并且他自己在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做的，那么“让路只听一条律”这个判断，对这个人就不成立。

如果卷三查下来，在三位奠基人之前，教会、实验室、市政厅并没有各讲各的话，那么“拼图是被切过的”这个猜想，就只剩下巧合。

如果罗蒂在别处，既讲了“私”和“公”的分界是怎样长出来的，又给“大家一起的、又不为什么的”东西留了位置，那么我们说的前两处空隙就要收回。

这几条，都留着门。

— 交棒

本章的几个故事，一个说的是网吧里的路，一个说的是抽屉里的账。它们底下，还压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渔村里的老人说“海是有脾气的”，我们说那是形而上学：它把一团看不见的土，说成了一个看得见的“样子”。网吧里的人说“撤”，罗蒂说“我们就是被掷出来的”，实用主义说“看效果”——这几句话，为什么就不是形而上学呢？它们不也是把一团复杂的东西，收成一个简单的说法吗？

下一卷，我们要认真地问：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实用主义为什么一路喊着反对它，却在自己的脚下，造出了另一个？

◆



卷　二

形而上学卷：D维度的形而上学

卷　序

传统形而上学把看不见的土统一成一个“本来如此”的样子，那是S维度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拆了它，却在路上立起了另一个“本来如此”：路本来该为了什么。第5、6章讲这两种形而上学的同与不同；第7、8章讲统一路的时候，土怎样被一起统一，方法又怎样回写成土。

05

第5章

形而上学是S维度的：把土说成“本来如此”

◆ 5.1　庙会上的那句“灵不灵”

上一卷的末尾，我们看着一条线越走越轻：外壳先被拿掉，后来的人连路的“向”也说成偶然。可是有一样东西，从头到尾没有被拿掉——“只看路”这一下。要看清这一下为什么也是形而上学，得先退一步，把形而上学本身看个明白。我们不翻书，去庙会上看。

设想一个山脚下的庙会。（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不指任何一处真实的庙。）每年农历三月，附近几个村的人往一座小庙里赶，庙门口挤满了人，也挤满了摊子。

庙门口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求签的老太太。她在签筒里摇出一支，换来一张黄纸，纸上四句话，半文半白，她看不太懂，就拿给庙祝。庙祝念了一遍，末了加一句：“心诚就灵。”老太太点点头，把纸折好，揣进怀里。

第二种是摆摊的。庙门斜对面有个卖种子的，摊前插着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灵不灵，种一季就知道。”

第三种是一位小学老师，领着一群孩子来逛。她指着庙里的神像，小声对孩子们说：“这些都是迷信，没有神。”

三个人，说的是同一个字——“灵”，或者“没有灵”。老太太问灵不灵，摊主说灵不灵，老师说本来就没有灵。看上去三个人在吵架，其实他们站在同一块地上。这块地的名字是：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叫“灵”，它对谁都一样，它是本来如此的。老太太信它有，老师信它没有，摊主把它换成了种子发芽的事。但没有一个人问另一类问题：

这座庙为什么建在这座山脚下，而不是河对岸？供的这位，为什么是这位，而不是隔壁村庙里的那位？“灵”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怎样一年一年长成今天这个意思的？

这些问题，庙祝其实有一个现成的回答，就两个字：自古。“此神自古显灵”，“这庙自古就在这儿”。

我们来想象一下“自古”底下可能压着什么。也许最早这里根本没有庙，是三个村子的三户人家，在同一个山口遇上过一场山洪，事后各自在乱石堆边摆了一碗饭。后来三姓的人为了抢水吵过架，吵完又合伙修了一道渠，渠边的小祠就成了三个村共用的地方。再后来，祠被改成了庙，有了一尊像，有了庙祝，有了签筒，有了每年三月的会。每一步都有人，有事，有争，有让，有哪一年的旱，有哪一任的村长。这一整条“怎样一步一步长成今天这样”的来路，就是这座庙的同一性谱系。

而“自古”两个字做了一件事：它把整条来路剪掉了，只留下今天这个样子，并且说这个样子从来如此。

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口头版。不管它用的是“自古”“本来”“天生”“向来”“天经地义”，还是一个更堂皇的词叫“本体”，动作是一样的：把一片有来历的土，说成没来历的样子；把一个正在显出来的东西，说成一直就在那里的东西。

请注意，这个动作不是庙祝的发明，也不是愚昧的标志。老师那句“没有神”，用的也是同一个动作——她只是把“本来有”换成“本来无”。在“这件事是本来如此的”这一点上，三个人一致。他们争的是答案，没争到问法。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停一停。老太太、摊主、老师，三个人谁也没有觉得自己在“做哲学”。老太太在求一个心安，摊主在卖种子，老师在教孩子。可他们每个人的话里，都有一个“对谁都一样”。老太太相信签文对每个诚心的人都一样灵；摊主相信好种子对每块田都一样好；老师相信“没有神”对每个孩子都一样成立。统一的冲动，不在书斋里，在最日常的话里。人只要张口说“本来”“一向”“都是”，就已经伸手去拿那把剪刀了。

所以我们说形而上学，不是在说一门学问，而是在说一种每个人嘴边都有的动作。哲学家的贡献，只是把这个动作做得特别大、特别彻底、特别讲道理。

想一想，如果有一天，真有人把这条来路从头讲了一遍，老太太还会不会点头说“灵”？说不定还会。来历讲清楚了，“灵”不一定就死了；它也许换了一种活法，从“自古如此”，变成了“这是我们三个村子一起走过来的”。来历不杀死信，来历杀死的是“不许问”。这一点，下面会反复用到。

这个动作拆掉了什么，保住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后面几节一笔一笔算。

这一节只是先把场子搭起来：一座庙，三个人，一个“灵”字，一句“自古”。后面所有关于水、数、理念、上帝的大话题，都可以退回到这个场子里来对照——大话题只是把庙会放大了几千倍。

判词：形而上学不是一个答案，是一种问法——它把“怎么来的”问成了“是什么”，再把“是什么”答成“本来就是”。

◆ 5.2　水、数、理念、上帝、物质：怎样一个一个拿掉来历

先把导论给的定义再念一遍：形而上学，是对E的隐藏性所做的一个宇宙级别的统一性预设；它拿掉了同一性谱系，换来了S显露的恒定性和统一性。

这句话里有四个词值得慢慢拆。

第一个词，“隐藏性”。土为什么会“隐藏”？不是有人把它藏起来，而是它本来就缠得太多太密。就说那天的山洪：水为什么那一年大，是上游哪一场雨，山坡上砍了多少树，三户人家当时各自带了多少人，谁家的老人那天碰巧在场……一千根线缠在一起，当事人看不全，后来的人更看不全。土的这种“算不清、看不全”，就是它的隐藏性。人对隐藏的东西会不安，不安就想要一个说法。

第二个词，“宇宙级别”。村里的“自古显灵”，管的只是一座庙。哲学家不满足于一座庙，他们要问的是：整个世界，所有的土，背后有没有同一个说法？这就是“宇宙级别”：一个说法，管全部的土。

第三个词，“统一性预设”。为什么是“预设”？因为这个统一不是查出来的，是先放下去的。没有人把世上所有的土都看过一遍，才说它们背后是同一个东西。他是先放下这个东西，再回头看世界。

第四个词，“拿掉同一性谱系”。这是整个定义的刀口。我们看哲学史上五个最有名的统一说法，看看它们各自拿掉了什么。

水。传说最早的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说，万物的根本是水。这句话的好处是，它把花样繁多的东西收成了一样。它拿掉的是：水自己是怎么来的？“万物从水里来”，那水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被问到的那一刻，“水”就不能再是根本了。所以它必须不问。根本的第一条性质，是不许问它的来历。

数。毕达哥拉斯一派说，万物的根本是数，音乐的和谐是数，星星的运行是数。数的好处是干净、稳定、不随人变。它拿掉的是：数是在谁的手指头上、哪一堆东西的清点里一点点长出来的？说“数本来就在”，就把清点、划线、分账、丈量土地这一长串人间的事，从数的身上摘掉了。

理念。柏拉图说，桌子有千万种，可“桌子本身”只有一个，它在另一个更真实的地方。理念的好处是，它给了每一类东西一个永不磨损的模子。它拿掉的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有这么一个模子？是因为一个孩子见过太多桌子，在一次次碰到、坐上、搬动之间，那个“桌子”的样子一层一层在他心里显出来的。理念，是把这个“一层一层显出来”的过程整个删掉，只留最后一层，并说它从来在天上。

上帝。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把世界的根本放在一位创造者那里。这位创造者的特点是：他自己没有来历。他是“第一因”，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说他“没有来历”并不是疏忽，而是整个说法成立的前提——如果还能追问他的来历，他就不是最后的那个了。

物质。后来的唯物主义者说，万物的根本是物质，物质不生不灭。这是又一次漂亮的统一：花草、石头、人的思想，都是物质的样子。它拿掉的是：我们所说的“物质”，是怎样在一代代人的打磨、称量、拆分里，从“木头石头”这样的粗话，一步步被磨成“原子”“场”这样的细话的？说物质不生不灭，就是把“物质”这个说法自己的出生，也一并说成不曾发生过。

五个说法，样子千差万别，动作完全一样：先把缠在一起的土，收成一个东西；再把这个东西的来历，一刀剪掉。来历一剪，剩下的就是一个站得住的、不会变的、对所有土一视同仁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定义里说的“S显露的恒定性和统一性”。

这里要特别说清楚“恒定”。我们讲过，S不是一次显完的，它是跟着差异序列的启动，一层一层不停显露的。你看到的任何一个样子，都是这条显露谱系的一个截面。形而上学做的事，就是抓住其中一个截面，说它就是东西本身。窗户上呵一口气画一张笑脸，笑脸画到一半，有人伸手按住说：“就是这个，别再动了，这才是它的本来面目。”那个按住，就是形而上学。它不是看错了，而是把一个正在显露的东西，按成了一个恒定的东西。

这里要补一个容易混的区别：统一性和同一性。

“统一性”是说：很多不同的东西，其实是同一个。万物是水，所有的神灵归一，一切路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这是统一性。

“同一性”是另一回事：一个东西，在不停地变，却还是它自己，凭的是什么？凭的是它一步一步怎样变过来的那条线。这条线就是“同一性谱系”。一条老街，三十年里翻修了十次，没有一块砖是原来的，人们仍然说“还是那条街”。让它仍然是它的，不是某块不变的砖，而是每一次翻修都接着上一次来的那条线。

形而上学的小动作，就是用统一性，换掉同一性谱系。本来要靠一条来路才说得清“它为什么是它”，现在改成：它背后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所以它是它。来路不用说了，一个不变的“本体”就够了。

来看庙会上的一个小例子，不用哲学家，用摊位。庙门前那条街，卖香烛的摊子一定摆在最靠近庙门的地方，卖种子的在街尾，卖小吃的在拐角。你问摆摊的人：“为什么这么排？”十有八九，他会说：“向来这么排。”

可这个“向来”，往往只有五六年。也许是某一年，一个卖香烛的老太太腿脚不好，会里的人让她挪到门口；第二年有人想占她的位子，被乡亲们劝回去；第三年，这就成了“规矩”。五年之后，它是“向来”。同一性谱系被“向

来”两个字压缩了。压缩之后，要换一个排法，就得和“向来”吵架，而不是和那位腿脚不好的老太太商量。（这是构想的例子。）

顺便说一句，中文里“形而上学”四个字，是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哲学字汇》，1881年）用来对译西方术语的，字面取自《周易·系辞》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西方那个词，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编订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安德罗尼柯，把讲这类题目的十几卷排在了《物理学》“之后”，才有了“物理学之后”这个名字，后人又把它误读成“超出物理的学问”。这些来历这里不去细考，只提醒一点：这个词自己也有一条谱系，我们在用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当成“自古如此”。

判词：形而上学不是撒谎，它是剪谱——一刀剪掉土的来历，剩下的样子于是恒定，于是统一，于是可以放之四海。

◆ 5.3　退一步的形而上学：从“世界是什么”退到“我们只能这样看”

回到庙会。那位小学老师，晚上带孩子们回学校的路上，被一个孩子问住了。孩子问：“老师，那为什么那么多老太太还要去求签？”

老师想了想，没有再说“迷信”。她说：“人心里总得有个盼头吧。没有这个盼头，日子不好过。”

注意这句话的位置。她已经不说“世界上有没有神”了。她说的是：对于过日子的人来说，必须有这样一个东西。神是不是真的在，她不再下断言；她只说，人这样活着，就得这样设想。

这一步，跟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退却，几乎是同一步。

十八世纪末，康德写下《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在1781年）。在这之前，哲学家们大多直接说“世界背后是什么”。康德说：停一停。我们能知道的，只是我们看得见的世界；而我们看见的世界，总是通过一副固定的眼镜看的——时间和空间是这副眼镜的镜片，因果、数量这些概念是镜框。世界本来的样子（他叫“物自身”），我们永远摸不到。我们能说清楚的，只是这副眼镜是怎么造的，以及凡是戴上这副眼镜的人，一定会看到什么。

这是一次聪明的、了不起的退却。它不再说“世界是水”“世界是上帝”，它说的是“我们不得不这样看”。

但请问：这副眼镜是什么？

用我们的话说：它是显露的条件。一切东西要对我们显出来，都必须先过这副眼镜。镜片的形状——时间、空间、因果——是不随东西变的，是一切显露的共同前提。康德把形而上学从“世界是什么”，退到了“显露必须满足什么条件”。

可是，这副眼镜自己的来历呢？康德的回答大意是：它是人心的先天结构，不是从经验里学来的。换句话说，它没有谱系。眼镜不是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是先于一切磨的。于是，同样的动作又发生了：把一个东西的来历剪掉，说它是一切显露的恒定前提。只是这一次被剪掉来历的，不是一个叫“水”或“上帝”的东西，而是“显露的规则”本身。

所以，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不是消失了，而是退进了S的内部：从“世界的样子是固定的”，退到“显露的规矩是固定的”。样子换成了规矩，恒定还在，统一还在，来历仍然是封存的。康德自己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明确说要给形而上学找一条“科学的出路”，也明确说上帝、自由这类东西，理性无法证

明，但实践上必须这样假定。（前面那位小学老师的话，几乎是这句话的口语版。）

后来还有一批人想更彻底。二十世纪初，维也纳的一批哲学家和科学家（后人称“维也纳学派”）提出，凡是不能被经验检验的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应该被清除。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题目就叫《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卡尔纳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刊于《认识》杂志）。这一刀砍得更狠，砍的是“什么话算有意义”。

不妨用空地上的老农，来试一试康德的这副眼镜是不是真的“恒定”。

老农说“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他抬头一指，旁边的年轻人顺着看，看到的是一片云，没有“钩钩”。老农耐心地说：“你看那一缕，尾巴往上翘的。”年轻人还是看不出来。

过了一个夏天，年轻人跟着他在田里干活，每回老农抬头，他也抬头。到了秋天，他自己忽然指着天说：“那是不是钩钩云？”老农说：“是。”

请问，这一年里，年轻人的“眼镜”变了没有？按康德的说法，时间、空间、因果这副基本眼镜是先天的，不会变。这没错，眼睛的基本构造没有变。可是他能看到什么，变了。同一片天，去年是一片云，今年是“钩钩云”。“钩钩云”这个样子，是随着他跟在老农身后抬头、低头、被纠正、再抬头，一层一层显出来的。显露的规矩，不是早就磨好的镜片，而是一副越磨越有形状的镜片。

这一点，恰好说明了康德之后的形而上学为什么仍然是形而上学：它仍然需要一个“显露的条件”是恒定的，而真实的显露，连条件本身都在长。镜片有谱系，只是康德没有去问。

这里要放进来一句：十九世纪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让来历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正面摆上桌子。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物种不再是一排排永不变的模子，而是一条漫长的、有分叉的谱系。地质学、历史学、语言学，也在差不多的年代里，各自把“这东西是怎样一步步变成这样的”当成了正题。实用主义就是在这个年代的剑桥长出来的。皮尔斯在这一点上不是旁观者：他的“宇宙在长习惯”，正是把时间和来历请进了宇宙。

我们要认可这一点：实用主义不是对来历毫无感觉。它是在一个“来历终于被承认”的年代里诞生的，所以它比旧的形而上学更懂得“东西是长出来的”。可它也只把来历请进了一半：东西是长出来的——对；但长的那条路，要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这一句，来历又被封上了。这是后面第6章要讲的事。

这里先收住一句：康德之后，形而上学没有死，它搬了家，搬到了“显露的条件”里；而维也纳学派之后，搬家之外，又多了一种新的写法——干脆不说“世界是什么”，只说“话该怎样才算有意义”。样子换了好几套，那个剪谱的动作，一直在。

判词：当形而上学被赶出“世界是什么”的客厅，它就躲进“我们只能这样看”的壁橱——房子换了，门上的锁还是那把：不许问来历。

◆ 5.4　它的好处：让人敢出海；它的代价：来历被封存

说了这么多形而上学“剪谱”的事，容易让人以为它是个坏东西。本书不这样看。先公平地算它的好处。

回到庙会，换一个角落：庙会后面一块空地上，几个老农蹲着抽烟，抬头看天。

其中一个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是各地都有的说法，各处的版本略有出入。）另一个说：“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第三个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这是一些很短、很硬的句子。它们的好处，一目了然：

第一，可以传。一个人一辈子的看天经验，缠着他家那块地、他爷爷的腰疼、哪一年的倒春寒，说不清，带不走。可压成一句七个字的话，就能交给孩子，交给邻村。统一的说法，是一种能装车的包装。

第二，可以共守。一个村子要想一起下地，总得有个“大家都认”的时间。“清明前后”是个公认的鼓点，谁也不必为这个吵架。

第三，可以托底。人面对一片算不清的土，最怕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一句“天道如此”，一句“海是有脾气的”，把无从下手的东西变成了可以敬畏、可以回避、可以祭拜的东西。

这就是渔村那句“海是有脾气的”的功劳。它不是科学，可它的作用，是让人敢出海：有了这句话，出海之前就有了规矩——不在哪天出，不带什么上船，遇到什么云要回头。一个对着大海毫无说法的渔民，不会更勇敢，只会更慌乱。统一的说法，把“不知道怎么办”变成了“知道不该怎么办”，人就有了走出去的第一步。

宇宙级的形而上学也一样。“万物背后是同一个东西”，让一代代人敢于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相信今天的发现明天还有用，相信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可以讨论同一个问题。这些信念，是后来科学能够起步的一块垫脚石。不拿掉这一点，对形而上学就不公平。

但算账的时候，另一边也要摆出来。

代价一：说法不能改了。老农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句话在某一个流域、某一段年月里，很准。可它是怎么来的？是某一片土的几十个春天，在这条河边，一次次试出来的。它的成立，缠着这片土的海拔、霜期、河水。但一旦它被说成“清明前后”这么硬的一句，来历就被剪掉了——剩下一句话，对天下的瓜和豆一视同仁。

于是，当一个人带着这句话，搬到另一个山谷，事情就麻烦了。他按“清明前后”下种，豆子没出就冻死了。他会怎么想？他不会想“这句话的土和这里的土不一样”，因为话里根本没有“土”这一项。他只会想：“是我的手气不好”，或者“今年天变了”。一句剪了谱的话，出了错，错只能算在人头上，或算在天头上，不能算在土头上。因为土的位置，已经被“本来如此”占满了。

代价二：对不同的统一，没有商量。庙会上的两个村，各有各的“自古灵验”，一个说那位神管雨，一个说另一位神管雨。两个说法都已经把自己的谱系剪掉了，所以谁也无法拿出“我这个是怎么来的”去跟对方比。剩下的办法只有一个：压过对方，或者躲开对方。历史上许多无谓的流血，最后都能找到这个结构：两个统一，互不相问来历，于是只能互相取消。

代价三：来历一旦被封，旧的土就不能被看见。土每年都在变：河改道了，树砍了，人搬走了。可一句剪了谱的话，是不会跟着变的，它只会变得越来越“古”，也就越来越难被检验。一个社会里所有“本来如此”，加起来就像在屋顶上又盖了一层屋顶——屋里漏水，也不知道哪里漏的。

代价四：回写被堵住了。前面三条还都只是“看不见”，这一条是“写不回去”。我们讲过，一个东西变了形，要把变化写回下一轮的起点，才算真正留下来。可是一句“本来如此”，等于在起点上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不得改动”。倒春寒来了，谚语不准了，应该回头去改那句话，可碑上写着“清明前

后”——那么人们只好去改别的东西：换品种，加化肥，怪天气，怪后生不懂事。唯独不改那句话。碑越牢，真正该被改的东西，越改不动。

有没有一种更体面的活法呢？有，而且差别小得出奇。

还是那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如果老农在传给后生的时候，多说半句：“在咱这条沟里，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又多说半句：“我爹那辈是这样，前年起霜晚了，我是推迟了五天。”——这句话就还带着地址，带着年份，带着一次修改。它依旧可以传，依旧可以共守，依旧可以托底，可它不再是一块碑，而是一张挂着家谱的纸条。后生带着它搬到别的山谷，一眼看得出：这里的霜期和那里不一样，该问问当地人。

这半句话，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它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不把来历剪掉。全书后面讲到的“给土写家谱”，在最小的尺度上，就是这半句话。

这一切合起来，就是这一节的判词：**形而上学的好处是让人敢出海，代价是出了海以后，没人能回头问一句：这片海，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

而实用主义的出场，恰恰是在这个关口：它看见了这笔账里的代价，于是它提出一个干脆的办法——别争了，别问“本来是什么”，只看用起来怎样。这办法来得很对路。一个庙会上两个村在吵“哪位神灵”，实用主义者会说：你们不如比一比，哪一个村的田今年收成好？一刀下去，吵了几百年的架，就有了一个可以商量的地方。

这一刀是漂亮的，也是真的。所以我们不能轻轻地说它错。我们要看的是，它砍完这一刀以后，手里拿着什么。

◆ 5.5　小结：剪谱的人，和他留下的那把剪刀

回头看，这一章其实只做了三件小事。

第一件，把“形而上学”从一个让人发怵的大词，放回了庙会的石阶上：它是人在算不清的土面前，伸手去拿一个统一说法的动作。第二件，把这个动作拆成两半：统一一个样子，同时剪掉一条来路。第三件，指出这个动作不是哲学家的专利，从康德的眼镜，到老农嘴边的七个字，它都在。

读到这里，读者不必急着判断谁对谁错。庙祝的“自古”，摊主的“种一季就知道”，都是在各自的土上长出来的、有功劳的东西。这一章要的，只是让我们学会在听见它们的时候，听出那一刀剪刀的声音。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形而上学，是在E的隐藏性面前，对土所做的一次宇宙级的统一：它把缠在一起、有来历的土，说成一个没有来历的样子，换来S的恒定与统一。水也好，数也好，理念、上帝、物质也好，康德的“显露的条件”也好，用的是同一把剪刀，剪的是同一样东西：谱。

庙会上的三个人，现在可以各归其位了。老太太手里的签文，是一个被剪了谱的“灵”；老师口中的“没有神”，是同一个动作的反面；就连那句“自古”，也只是这个动作最小、最顺嘴的一个版本。三个人都不是坏人，三个人都在用同一把剪刀，替自己的土打一个结。这个结打得好，人就睡得着；打得太死，水就流不动了。

它有真实的好处：让人敢出海，让话能传、事能共守。它也有真实的代价：说法不能改，不同的统一之间无法商量，旧的土不能被看见。

这一章讲的，都是S维度的形而上学——它统一的是“样子”，是东西显出来是什么。庙会上，老太太、庙祝、小学老师，都在这一维度里争。

可是庙会后面那块空地上，有人在做另一件事。卖种子的摊主，在硬纸牌上写下“灵不灵，种一季就知道”。他没有说种子是什么、神灵在不在，他只说了一件事：用了再看。这是实用主义最招人喜欢的地方，也是下一章要追问的地方。

那块牌子，看上去是把剪刀放下了。可它真的放下了吗？

◆

06

第6章

反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为何造出了D维度的形而上学

◆ 6.1　一块牌子，怎样变成了一把尺

回到庙会后面那个卖种子的摊主。

（继续用我们设想的场景。）他的纸牌写的是“灵不灵，种一季就知道”。这句话在第一年里，是非常诚实的。它是一个邀请：你来试，我不保证，试完你来说。如果这一年天旱，种子没出，买的人回来抱怨，摊主还可以说：“今年太旱了，别怪种子。”这时“灵不灵”是一个开着的问题，答案要等一季。

第三年，摊主的口碑起来了。田埂上的人说起他的种子，一个字：好使。“好使”成了他的招牌，纸牌也换成了一块新木牌，上面写着：“包好使。”

第五年，庙会上多了几个摊子，其中一个摊子卖的是老品种，穗子小，产量不高，可煮粥特别香，是这个山口的人祖辈吃的味道。一位老人驻足看了半天，摊主走过来，随口问了一句：“这东西，有什么用？”

老人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老人后来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这也是构想的）：“那是我们家吃了好几辈的粥，煮开了满院子都是那个香。”他没有说“有用”，也没有说“没用”。他说的是一个味道，一个院子，一个年年煮粥的冬天。那个味道里有一条谱：哪年留的种，哪年换的地，哪年婆婆教给媳妇的火候。这条谱在“有什么用”面

前，是说不出口的，因为它不是用处，是来历。摊主那一问，把一整条谱，问成了一个“没法回答”的沉默。

请看这五年里发生了什么。

第一年，“好使”是一个被检验的东西——种了才知道，没出就是不好使。第三年，“好使”成了一个被信任的东西——大家不再每次都去验，凭口碑就买。第五年，“好使”成了一个检验别人的东西：它不再接受提问，它开始向别人提问：“你有什么用？”

一块牌子，用了五年，从一个问题，长成了一把尺。

实用主义的命运，几乎是同一条路。

1878年，皮尔斯写下那条后来被叫作实用主义准则的规则时，它是一个很朴素、很锋利的工具：想弄清一个概念，就去想它在实践里能引出什么效果。它是用来拆台的——拆那些听上去很玄、却想不出任何实际后果的空话。这时候，它像摊主的第一块纸牌，是一个邀请：“你说的这个东西，有什么效果？说说看。”

到了詹姆斯手里，这个邀请变成了对“真”的一个解释：一个想法是真的，就是它在生活里“兑现”了、“起作用”了。这时候，“好使”已经不只是一个检验概念的办法，它成了“真”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到了杜威手里，思想是工具，好思想是能把处境理顺的思想；教育、民主、艺术，都得拿“能不能理顺”来衡量。

于是，一把为了拆台而磨出来的小刀，在一代代人的使用里，变成了一把量一切的尺。

这时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转折：当我们问“这样东西有什么用”时，我们是在问东西，不是在问“有用”。“有用”这个标准本身，不在被问的位置上。你可以问任何东西“有什么用”，可你一旦问“‘有用’有什么用”，对话就会尴尬——对方只能回答：“有用就是有用。”或者再绕一圈：“你看它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注意这个回答：用“有用”，去证明“有用”。这是一个闭环。闭环有一个性格：它转得越顺，越看不见自己是一个闭环。

回想上一章我们说的“恒定”。形而上学的特征，是把一个本来在显露、在变化的东西，按成一个恒定的东西。S维度的形而上学，按住的是“东西的样子”。现在我们看见，实用主义里，被按住的不是样子，而是问法本身——“有什么用”这个问法，从一个可以问、也可以不问的问法，变成了一个必须问、而且不许被问的问法。

三个人各自的“纸牌”，长成尺的速度和样子也不一样。皮尔斯的那张纸牌，写的是“你的概念会引出什么效果”，它长成的尺，是“能不能长出更好的习惯”；詹姆斯的纸牌，写的是“在我们这里起不起作用”，长成的尺，是“过得下去、过得好不好”；杜威的纸牌，写的是“这个处境能不能被理顺”，长成的尺，是“能不能接着走更多的路”。三张纸牌，三把尺，量的东西不同，可它们长成尺的那一下，是同一个动作：由一个开着的问题，变成一个关上的标准。

还要多说一句：这一路上的每一站都没有错，而且几乎不可能不这样走。

一个工具，用着顺手，就会被一再地用；一再地用，就会被信任；被信任，就不再每次验证；不再验证，就从“被检验的”变成“检验别人的”。这个过程里，没有谁做错了什么，也没有谁在偷偷夹带私货。它只是回写在日常里的样子：兑现的结果，回头写进下一次的起点——下一次，人就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带着“这个好使”的信任去下种。一次次回写，信任沉成了土。

三原理讲的就是这件事：变了形的东西，回头改写起点。回写本身不是毛病，它让经验留得下来。可是，当回写写下的东西是“这把尺没有问题”时，它就把尺从被问的位置，推到了不被问的位置。所以，要防的不是回写，而是回写里写进去的那一句。

这就是“有用”变成“本来如此”的过程：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经过试探、兑现、信任、裁判、封闭五站的过程。每一站都很合理，每一站都有它的功劳。到了最后一站，它悄悄把自己的来历——它是怎样从一块邀请式的纸牌长成一把尺的——剪掉了。

为什么这次被按住的是“问法”，而不是“样子”？因为实用主义恰好把“样子”让了出去。它不再说世界是什么，于是S那一头松了手；但松手的地方，总得有东西接住。接住的，就是D：路往哪里走，用什么衡量。人在算不清的土面前，需要一个抓手，旧的抓手被拿走了，新的抓手自然会长出来，而且长在离手最近的地方——那就是“有没有用”。形而上学没有被拆掉，它换了抓手。

判词：一把为拆台而磨的小刀，用得太顺手，自己就成了台。

◆ 6.2　D维度形而上学的三个特征：只问效果，只朝前看，只认一条律

庙会的东边，搭着一个小棚子，是县里农技站派来的年轻技术员摆的摊，做的是“天气谚语核对”：谁家有一句老话，他登记下来，拿近五年的气象记录对一对，准的打钩，不准的画叉。

那天，空地上的几个老农围着他。蹲着抽烟的那位说：“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技术员一边记，一边说：“这句话你们不用管它为什么，也不用管是谁传下来的，我只看它准不准。五年里，早上有红霞的日子，下雨的比例是多少，对一对就知道了。准的，我们留着，不准的，扔掉。”

老农想了想，说：“也行。可你得记着，这句话是我们这条沟里的。到了山那边，不一定。”

技术员笑着说：“那更好办。山那边不准，就在山那边把它画个叉。”

这一小段对话，把实用主义最招人喜欢的地方，和它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地方，同时摆在了桌面上。我们顺着这位年轻的技术员，数一数D维度的形而上学有哪三个特征。

特征一：只问效果。

技术员的第一句话，就是实用主义准则的民间版：“不用管为什么，我只看准不准。”这确实是一次解放。过去，一句谚语值不值得信，要看是不是“祖上传的”、是不是“老人说的”。现在，只看它在记录里的表现。祖宗的权威被一张对照表取代了。

但请注意他留下的那个后门：来历，只在出了毛病的时候才查。如果一句谚语一直准，没有人会去问它是在哪个冬天、被哪个人说出来的；只有当它忽然不准了，才有人回头翻：“这句话是怎么回事？”来历在这套办法里，被降成了一个零件，坏了才修，不坏就不用管。

它和S维度的形而上学，正好是镜像：旧的一边，是把来历剪掉；新的一边，是把来历搁置。剪掉是说“不许问”，搁置是说“没必要问”。结果差不多：平常的日子里，来历不在场。

特征二：只朝前看。

老农想告诉技术员，这句谚语在三十年前一场倒春寒之后改过一个字。技术员礼貌地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那改了以后，准了没有？”

他关心的，是往后的准，不是往前的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是这个思想的结构：皮尔斯的“真”，是探究者一直探究下去、最终会同意的东西，那是未来；詹姆斯的“兑现”，是一个想法放进生活之后会怎样，那是未来；杜威的“理顺”，是处境被改造之后会怎样，也是未来。意义，只许住在未来。过去是什么？是材料，是经验的积累，是做下一次的原料。

这样一来，“回写”也变了样。三原理里的回写，是变了形的东西回头写进下一轮的起点——起点被改了。可在“只朝前看”的框架里，回写常常被简化成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过去只是用来改善下一次的。于是，过去本身是怎么长成今天这样的，反而不在视野里。老农想讲的那场倒春寒，成了一条“不影响预报”的闲话。

特征三：只认一条意义律。

技术员的摊子旁边，那天围着三个人，都想让他把谚语做得“更好用”，可三个人说的“好用”不是一回事。

一个是乡里负责种植的干部。他说：“你要把这些谚语做成一套更准的东西，比老话准，比广播准，将来能推到别的乡。”他要的是长出一个新的、更好的预报办法。

一个是退休的村医。他说：“这些话是老人心里的东西，做成表格就没味了。你得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本事，念出来心里踏实。”他要的是日子过得舒坦、有根。

一个是种菜的中年人。他说：“最要紧的是别让广播替我定哪天下种。我自己看天，我自己说了算，你只管多给我几个依据。”他要的是自己做主。

这三个人，说的都是“实用”，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在谈“理想”。可他们要的，恰好是三条意义律：创造、幸福、自由。在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地方，这三个人的话是可以并排放着、互相商量的。但在实用主义的三位奠基人那里，各

自悄悄把其中一条抬到了最前面：皮尔斯的路是长出来，詹姆斯的路是过得好，杜威的路是更多的路可走。卷一已经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个特征，在三位奠基人的手里，各有一个很顺口的说法。

皮尔斯讲“最终的意见”：探究者如果一直探究下去，最后会同意的那个东西，就是真。这是把意义放在最远的未来，也是“只朝前看”的最大号版本。詹姆斯讲“兑现”，一个想法有没有真价值，要看它兑成什么现钱，这是“只问效果”的最直白版本，连“现钱”这个词都不绕弯。杜威后来讲“有保证的可断言性”（这是他1938年《逻辑：探究的理论》里的说法）：一个说法能不能算数，要看它在探究里经不经得住事。三位的措辞各不同，共同点却很清楚：判一样东西的分量，永远要走到它后面去看。没有一个人说：这东西，不用走到后面去，它本身就在这里，已经够了。

这里有一个可能的疑问：既然三条意义律都是好东西，把其中一条放前面，有什么不对？

没有不对。不对的是，放前面以后，另外两条就不再有自己的说话权。一桌子人吃饭，有人爱辣，有人爱淡，有人要快，大家商量着点菜，这是正常的。若是其中一个人拍板说“点菜只看一条：吃得快”，别的两个人的口味，就只能在“快”的前提下被照顾。三条律在皮尔斯那里，变成“创造”的助手；在詹姆斯那里，变成“过得好”的助手；在杜威那里，变成“更多路可走”的助手。助手可以很得力，可助手不能反过来说话。一个统一的D，就是这样一个桌上只有一个人能拍板的饭局。

三个特征连起来，是一幅很清楚的图：一个只看效果的眼睛，朝着前方，盯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这就是D维度的形而上学。它和S维度的形而上学一样，需要三样东西：一个被封起来的来历，一个统一的核心，一个不许被问的前提。只

不过，S维度封的是“东西是什么”的来历，D维度封的是“路该为了什么”的来历。

判词：旧形而上学说“世界本来是这样”，新形而上学说“路本来该这样”——前面是“是”被说成了“本来”，后面是“该”被说成了“本来”。

◆ 6.3　为什么这个形而上学更难被看见：它长得像方法，不像主张

庙会的第二天，技术员的棚子前来了一位教过几十年书的老先生。他对着那张核对表看了半天，皱起眉头，说：“你这样做，是把老人的话当成数据，不尊重人。”

技术员没有恼，笑着答：“您说得有道理。那这样，您给我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们拿五年的记录，把您的办法和我的办法比一比，谁准谁留下。”

老先生张了张嘴，没有接上话。围着的人哄的一声笑开了。

这个小场面，值得慢慢看。

老先生说的是一句异议，说的是“不尊重”，这是个有分量的反对，它指向的是：有些东西不该只用准不准去量。可技术员做了一件很不起眼的事：他把这个异议，翻译成了他自己的语言。在他的语言里，任何反对，都必须变成“一个更好的办法”，并且接受“谁准谁留下”的检验。老先生说的“尊重”，没法被翻译成一个可以拿去比准的东西，于是它就被放在了桌子外面。

这件事说明了D维度形而上学一个特别要紧的性格：它把一切反对，吸收成了它自己的内部比赛。你反对它，它请你拿出你的办法，然后在它的尺子上赛跑。你输了，它赢了；你赢了，也是它的尺子赢了。

我们对比一下S维度的形而上学。庙祝说“此神自古显灵”，这是一个主张。主张的好处是，它能被反驳。小学老师可以站出来说“没有”，村里最老的人可以站出来说“这庙是三个村合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的靶子，吵得起来。

而技术员的“准不准”，是一个方法。方法没有靶子。你拿什么去反驳一个方法呢？你只能试一试。可“试一试”恰好就是它的主场。

这是它难被看见的第一个原因：方法不会被反驳，只会被使用。

实用主义者自己，也一向强调这一点。詹姆斯一再申明，实用主义不是一套特别的结论，只是一种方法。这话是诚实的，诚实到让人放下戒备：既然只是方法，我们还要防它什么？可方法不是中性的容器。一个方法总带着它的问法，而问法已经选好了哪些答案可以进门。方法越是自称没有立场，立场越是稳稳地住在问法里。

第二个原因，是它使用的词太好了。

回想一下庙会上那三个人想要的东西：长出新东西，过得舒坦，自己做主。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反对这三样东西。“创造”是好词，“幸福”是好词，“自由”是好词，“务实”也是好词。当一个思想用的全是大家都点头的好词，它里面藏着的那个选择——把三条好词里的一条放在最前面——就很难被察觉。S维度的形而上学说“万物是水”，一听就觉得奇怪，会问：“凭什么？”D维度的形而上学说“要务实”，听上去像常识，没人问“凭什么”。

第三个原因，是它站在反对形而上学的队伍里。

这一点最微妙。实用主义的自我介绍，就是“我是反形而上学的”。于是所有人——包括它自己——的警惕都朝向外面：朝向庙祝，朝向抽象的“本体”“绝对”“理念”。守卫在城门口盯着外来的人，却没有人想到，有一个守卫的内心，也住着一个统治者。

皮尔斯是例外，上一卷我们说过：三位奠基人里，只有他公开做了形而上学，搭了“偶然—习惯—规律”的架子。后来的詹姆斯和杜威，把外壳拿掉了。外壳一拿掉，剩下的这个D维度的核，就连“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字也没有

了。它从此以“方法”“态度”“常识”的身份活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怎么才能辨认出它？这里给一个检验。它的格式是：问一句“如果按这把尺，某样东西是无用的，它还有没有被留下来的理由？”如果回答是“没有”，那这把尺就是在做形而上学，因为它是唯一的裁判；如果回答是“有，只是不归这把尺管”，那它还只是一把尺。

比方说，镇上的老澡堂。按“有没有用”这把尺，答案已经很清楚：一天卖不出三十张票，水费电费贴不上，没用。一把真正的、只是工具的尺，会在这里说一句：“这个问题不归我管。”可D维度的形而上学不会这么说，它会说：“没有用，就是没有留着的理由。”当一个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开始这样说话，那把尺就不再是尺了，而是一个地基：所有的决定，都踩在它上面做出来，却没有人记得它是怎么被浇进去的。

这个检验也告诉我们，这个判断怎样会错。设想有一个团体，主要的思想工具是“看效果”，可是“这个东西按效果是无用的，我们仍然要留下”这样的话，它的人能毫无障碍地说出口。那么这个团体的“看效果”，就还只是一个方法，不是形而上学。要紧的，是看清这两种情况的分界线在哪里。

第四个原因，也许最深：它真的好使。

一个思想，如果好使，就几乎不会被人盘问它的前提。技术员的核对表确实让不少人免了误农时；“看效果”的办法，确实让许多空话被拆穿。成功是最好的遮羞布。庙祝的“自古灵验”，遇上两三年大旱，还有人起疑；技术员的“准不准”，每次都有一张表在手里，起疑的人反而少了。

这就是所有统治型的东西的共同命运：它越成功，越没人问它的来历。等到有一天，它不再好使——比如，它碰上了一类根本不能用“准不准”来量的东西——人们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地基。

判词：主张可以被反驳，所以容易看见；方法只能被使用，所以最难看见——最牢的形而上学，是那个从不以形而上学自居的。

◆ 6.4　两种形而上学，并排看一看

庙会散场的傍晚，摊子一家一家收。庙祝和技术员碰巧在庙门外的石阶上坐着，各自捧着一杯凉了的茶。卖种子的摊主蹲在旁边收纸牌，听两个人隔着半尺远，一个说“这庙是天上定的”，一个说“这表是试出来的”，忽然插了一句：

“你俩呀，一个不问庙从哪来，一个不问‘准’从哪来。”

两个人都没接话。（这是我们补上的一个小场面，用来把这一章的账并排摆一摆。）

我们顺着这句话，把S维度的形而上学和D维度的形而上学，一项一项并排看。

先看它们统一的是什么。庙祝统一的是样子：世界有一个叫“灵”的东西，对谁都在。技术员统一的是方向：路该朝着“准”、朝着“好使”走，这个“该”对谁都一样。一个答“是什么”，一个答“为了什么”。前者落在S，后者落在D，尤其是D里的第一层——意义。

再看它们拿掉了什么。两个都拿掉了土的来历，可拿掉的方式有微妙的不同。庙祝是剪掉：一句“自古”，整条谱系不让问。技术员是搁置：不用管为什么，反正只看准不准，来历只在坏了的时候才查。但在这之外，技术员还多封了一样东西：他的“尺”的来历。为什么偏偏拿“准”来量？为什么不拿“熟”来量，不拿“有味道”来量，不拿“老人愿意念”来量？这条律为什么排在最前面？这是一条尺的谱系，它也被悄悄封存了。所以D维度的形而上学，其实封了两层：土的来历，和尺的来历。

第三，看它们朝哪个方向找根。S维度的形而上学，习惯向后找：本源、第一因、最初的那个东西。万物从水来，从上帝来，从理念来，找的是“最底下的那块砖”。D维度的形而上学，习惯向前找：最终、兑现、将来的结果。皮尔斯的“最终会同意”，詹姆斯的“终将起作用”，杜威的“理顺之后”，找的是“最远处的那盏灯”。一个往底下挖，一个往前面照，都要一个单一的点——要么是单一的源头，要么是单一的终点——把所有的路和所有的土收在它下面。

第四，看它们怎样自称。庙祝自称发现：“此神自古显灵”，是他说他发现了一个事实。技术员自称方法：我什么也不主张，我只是把你们的话拿去核对。前者是公开的断言，后者是公开的谦逊。可谦逊的方法，一旦成了一切断言的裁判，就和断言没有什么两样。

第五，看它们各自会误伤什么。S维度的形而上学，容易误伤新来的东西。一旦“样子”已经被说成恒定，凡不在这个样子里的东西，要么是错觉，要么是异端。几百年来，新的发现，常常是先被当成异端。D维度的形而上学，误伤的是另一样东西：那些现在说不出用处、也不为什么而存在的东西。路上每一步都要有意义，那么一段没有方向、还没有成形的时间，在这个思想里就没有位置。后面几卷会专门讲，这是怎样发生的。

最后，看它们和“发现学—发生学”这条总轴的关系。这一点是全书最要紧的一条。

S维度的形而上学，是彻头彻尾的发现学：它把世界的样子，当成本来就在、等人去找的东西。

D维度的形而上学，要微妙得多。它承认东西是长出来的、做出来的——这是它比旧形而上学进步的地方，也是皮尔斯那句“宇宙在长习惯”的分量。可是，它给“长”配了一台先在的机器：长，是为了一个早已定好的方向——创造，或者幸福，或者自由。方向不是在长的过程里长出来的，而是先于长而在

的。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发现学的发生”：承认发生，却给发生配了一台本来就在的发动机。

所以，实用主义不是简单的“反形而上学”，也不是简单的“另一个形而上学”。它是一个半途的发生学：东西是怎么长的，它看得很准；长往哪里去，它没有再问。

再用三个方程说一遍：S=F(D,E)，D=G(S,E)，E=H(S,D)。S维度的形而上学，是把第一个方程里的S当成了给定的，不再问它由D和E怎样生成；D维度的形而上学，是把第二个方程里D的那一层——意义——当成了给定的，不再问它由S和E怎样生成。它们都违反了同一条规矩：没有哪一维是给定的，每一维都由另外两维生成。两个都拿一个方程，压住了另外两个。

不妨再用一个办法，当面验一验。拿一件全新的、说不清的东西，分别递给两位。

比如，庙会上忽然来了一个年轻人，抱着一只从没见过的乐器，吹出一串谁也说不出名堂的调子。庙祝的反应是：这不在老规矩里，是不是不吉利？——S维度的形而上学，对新东西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什么？它属于哪一类？属不进已有的样子，就有被排斥的危险。

技术员的反应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带来人流、能不能算作文化项目？——D维度的形而上学，对新东西的第一反应是：它能干什么？干不了事，就有被忽略的危险。

两个反应都不是恶意，都很自然。可你看，两个人都没有问第三句话：它是怎么来的，它正在变成什么？那只乐器，那串调子，此刻正是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一碰就散。一个人把它塞进旧抽屉，一个人把它放上计件的秤，它们都没有给它一点“先别定”的时间。这是后面几卷要花很多篇幅去讲的事。

这个半途，可以再用一个日常的比方看清。一个人学做菜，第一年，他承认手艺是练出来的：切坏了，糊了，咸了，一回回改，这是他“看得准”的地方。可是第二年，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学做菜？”他答：“为了做得越来越好吃。”这个回答乍听毫无破绽，却悄悄把一件事封了起来：“好吃”是什么，是怎样在他一次次下厨、一次次被家人夸或皱眉的过程里，一点点长出来的？起初，他的“好吃”也许只是“不糊”；后来是“妈妈那种味道”；再后来，是“客人愿意再来”。这个目标本身一路在变，而且变得很深——从填饱，到想念，到愿意为一个人留一盏灯。可只要他还在说“为了做得越来越好吃”，这条变化的轨迹就被压在“好吃”两个字底下，仿佛“好吃”从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固定的靶子，他只是一路向它靠近。

这就是“发现学的发生”的样子：承认手艺在长，却不承认靶子也在长。靶子被当成了本来就挂在墙上的东西，人只管瞄准。实用主义讲“探究会一直往前”，讲“生长”，讲“兑现”，每一个词都是动的，可这些动词的宾语——长出什么、兑什么、理成什么——却站着不动。它们站着不动，是因为它们已经被统一在某一条意义律下面了。

要让这个判断不落空，要看一个地方：意义自己的来历，有没有被允许成为探究的对象？如果有一天，实用主义者认真地问：“我们为什么偏偏拿‘创造’（或‘幸福’、‘自由’）当尺？这把尺是在谁的日子里、被怎样的事情磨出来的？”并且让这个问题，有资格改写他们自己的尺，那它就从半途走到了全程，也就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反过来，只要这个问题被当作“离题”，那么，无论它的词多么动态，它里面仍然有一块不动的地。

还有一件事，是两种形而上学共同的。它们统一了不同的东西，却都假定了同一个东西：土是一样的。庙祝的“灵”，对每片土都一样灵；技术员的“准”，换到哪条沟，也该用同一张表。统一的样子也好，统一的路也好，背后都靠着一个没说出口的预设：所有的土，彼此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换个地

方，规矩照样好使。S维度的形而上学，把这个预设写在明处——“万物同源”；D维度的形而上学，把它藏在暗处，没有一个字提到土，可处处都在用它。这就是下一章的题目。

有一点必须并排写在这里，免得读者误会：两种形而上学，各有其功。S维度的让人敢出海，D维度的让人敢拆台。庙祝的签筒帮老太太把没着没落的心思放下了，技术员的核对表帮农人省了许多无谓的赌。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任何一个扔了，而是看见它们各自封起来的那一块地，在那里留一条缝。

判词：前一个形而上学把“是”说成了“本来”，后一个把“该”说成了“本来”；前者封住了土的来历，后者又多封了一层——尺的来历。

◆ 6.5　小结：一个没有名字的形而上学，和它留下的问题

把两章收在一起。

第5章讲了一件事：形而上学，是对土的隐藏性所做的宇宙级别的统一。水、数、理念、上帝、物质，康德的“显露的条件”，用的都是同一把剪刀——剪掉同一性谱系，换来样子的恒定和统一。传统形而上学，因此是S维度的。

第6章讲了第二件事：实用主义反掉了S维度的形而上学，却在D维度上，立起了另一个。它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块邀请式的纸牌，被一次次兑现、一次次信任，终于长成一把量一切的尺；尺有了裁判的身份，它自己就不再接受提问。它有三个特征：只问效果，来历被降成了出了毛病才查的零件；只朝前看，意义只许住在未来，过去成了原料；只认一条意义律，皮尔斯收在创造下面，詹姆斯收在幸福下面，杜威收在自由下面。它比旧形而上学更难被看见，因为它长得像方法，不像主张，用的又都是人人点头的好词，而且它站在反形而上学的队伍里。

对照着看：旧的一个把“是”说成“本来”，新的一个把“该”说成“本来”。旧的是彻底的发现学；新的是半途的发生学——知道东西是怎么长的，没有再问往哪里长。

这个判断，有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地方：只要能指出，实用主义的三位奠基人，在某一处明确说了“这个东西即使按效果看是没用的，也有留下的理由”，并且这句话在他的体系里有承重的位置，那么上面这个“D维度的形而上学”就要重新衡量。按卷一的读法，三位奠基人把各自的“无用”，都安放在为别的什么而存在的位置上；这一点若被反例推翻，这里的判断就要收回。

可是，写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悬着。

回到庙会。卖种子的摊主，把那块“包好使”的木牌，插到了另一个县的集市上。字是一样的，牌子是一样的，一年的收成他也记得很清楚。可是那个县的土，沙多，雨少，霜来得晚。同样的种子，同样的“好使”，在那里，会是同一个“好使”吗？

这就是下一章要追问的：当路被统一的时候，土，被怎样一起带着统一了？统一了“好使”，就等于默认了所有的“好使”是同一个“好使”；而这个默认，不是一个选项，是一批看不见的搬运工，悄悄把一片特定的土，装进了“所有的土”的箱子里。

给读者留三个日常里就能用的小问题，不用任何术语，随时可以拿来问一问身边的话：

第一个，“这句话里，有没有一个不许问的词？”听到“本来”“向来”“自古”，是S维度的信号；听到“这有什么用”“要务实”“看效果”，是D维度的信号。不是说这些话不能说，是说，听见它们的时候，可以悄悄停一下。

第二个，“谁规定了尺子？”当有人说“按效果来”时，问一句：按谁的效果？按哪一种效果？是长出新东西，是大家舒坦，还是各人说了算？同一句“按效果”，三条律说出来是三个意思，而且往往是三个人在说同一句话。

第三个，“换一片土，它还灵吗？”把一句“好使”、一块“包好使”的牌子，放到另一个山谷、另一个年纪、另一种日子里，想一想，它还剩几分。这个小问题，会把我们带进下一章。

这一章的账，到这里算完了。账面上多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疑问：既然实用主义自己也统一了一样东西，那它为什么会长在那片土上，而不是别的土上？这是卷三要回答的。卷二的下一章先看它做了什么：它统一路的时候，对土做了什么手脚。

判词：实用主义拆掉了一座叫“本来是什么”的庙，却在庙基上盖起了一座叫“本来该怎样”的庙——这座庙没有门牌，因此人人路过，没有人觉得它是庙。

◆

07

第7章

统一的路，偷运来统一的土

◆ 7.1　加盟手册：开在哪里都一样

上一章末尾，那块“包好使”的木牌被插到了另一个县的集市上。木牌的现代版，叫加盟手册。上一章说，D维度的形而上学难被看见，因为它长得像方法，不像主张。那就先去看一本方法。

设想一家连锁奶茶店，叫“青檐茶铺”。这是个构想的例子，但开过加盟店的人读了，大概会点头。

阿梅在县城老菜场边上盘下一个门面，加盟了青檐。签约那天，总部给她一本手册，封面上印着一行字：“开在哪里，都是同一杯青檐。”

手册写得很细。杯子装冰到杯高的三分之二；茶底萃取多少秒；出杯不得超过三分钟；顾客进门，必须在三秒内说“欢迎光临，今天想喝点什么”；价格从十六元起，不得自行打折；店里灯光的亮度，也有一个数。督导小冯每个月来一次，拿着一张表，逐条打勾。

阿梅头几个月照做，做得很规矩。可她很快发现，菜场边的客人，和手册里想的客人，不是一路人。

早上来的是买完菜的阿姨，一手拎着鱼，一手掏钱，一边付钱一边问：“能不能少放点冰？”“杯子能不能给我换个小的？”她们不赶时间，有时站在柜台前跟她聊三句今天的菜价。中午是赶集的农户，要的是解渴，一杯十六块，他们在心里换算成一斤半排骨，转身走了。三分钟出杯，对这些人没有意义——他们

根本没打算赶时间。三秒内说的那句话，阿姨们听了，倒觉得生分：“小姑娘，说话不用这么客气。”

阿梅偷偷做了几件事：给熟客留一种八块钱的小杯；阿姨一进门，她先用本地话喊一声“阿姨来啦”，再补那句规定的话；有人拎着鱼来，她把鱼先接过去放在台子下面。生意慢慢好了。

下一次小冯来，在表上给她打了三个叉。

小冯不是坏人。他也很为难：“手册是总部根据几十家店的数据定的，每一条都是试出来的。你一个人觉得顺手，不能代表……”

这一段对话，值得停下来看。小冯的话里有一个很强的理由：手册里的每一条，确实是试出来的。这正是实用主义的做法——不靠谁拍脑袋，靠看效果，哪条流程“好使”，就留下哪条。所以手册本身，一点也不神秘，它是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标准产物。

神秘的是封面那一行字：“开在哪里，都是同一杯。”

这一行字，从来没有被谁当作“主张”提出来过。手册里没有一页写着“我们认为各地的土是一样的”。它只写了流程。可是流程要能“好使”，有一个前提：用这套流程的每一家店，面对的得是差不多的客人、差不多的钱包、差不多的作息、差不多的口味。路要统一，土就得先被当成一样的。统一的路自己不说这句话，却没有这句话就走不通。

这就是“偷运”。

用SDE的话讲，一样东西的样子（S）是由差异序列（D）和土（E）一起生成的。青檐的目标，是每家店端出来的那一杯（S）都一样。能抓在总部手里的，只有D——流程。要让S一样，另一个自变量E就必须保持不变。于是，在手册的算式里，土被悄悄当成了一个常数：不用写，也不许变。

这就是统一的D偷运统一的E：手册表面上只管路，实际上顺路把各地的土，一并统一了。它没有宣布这件事，因为它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宣布的主张——它觉得这是“常识”。

对照一下，就更清楚。夜市上的老周，没有手册，只有三个问题在他脑子里来回走。他每天都要看一眼今晚来的是什么人，再决定今晚炒成什么样。他没有统一的路，所以他永远得问土。而阿梅的手册替她把这个问题取消了。

还有一个人该回来：县城修车铺的小罗。他能听出发动机里的“咔”，那是练了两年才练出来的耳朵。这两年的功夫，没有哪一本手册写得下，它只能长在一个人的耳朵里，长在这间铺子的机器、这个师傅的口头禅、这座县城的路况里。手册能写进“皮带松了要紧一紧”，写不进“那声咔是怎么被听出来的”。手册能装下路，装不下土。而当手册成为主角，土就只剩一种命运：被当作不存在。

手册里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多看一眼：整本手册里，有流程、有指标、有话术、有惩罚条款，唯独没有一栏叫“本地情况”。督导的表上，也没有这一栏。不是谁疏忽了——是它在这套设计里没有位置。没有位置的东西，就不会被看见；不被看见，就不会被问；不被问，就渐渐不再存在。

判词：统一的路，是拿“土都一样”当本钱才走得通的路。

◆ 7.2　“好使”是对谁好使

小冯的那句“每一条都是试出来的”，还可以再往深里追一步：试，是在哪里试的？好使，是对谁好使？

青檐当年是怎么起家的？假设它的第一批十几家店，都开在大学城和写字楼旁边。那里的客人，二十出头，手机支付，晚上十点以后还在外面，爱尝新口味，一杯十六块的价格不太放在心上。总部的数据——日销杯数、复购率、客单价——就是从这些店里长出来的。哪条流程让这些数字好看，就写进手册。

这些数字是真的。流程“好使”也是真的。可是请看，“好使”这个词，被悄悄省略了一个后半句：对谁好使，在哪儿好使，好使多久。

詹姆斯在1907年的《实用主义》里，把一个想法的真，讲成了它的“兑现价值”——他用的是现金的比喻：一个观念是不是真，就看拿到生活里能不能兑成现。站上第202号书对这个比喻已经讲得很透，本书不重讲，只借它问一个它没有问的问题：支票是有柜台的。同一张支票，换一个柜台、换一种货币，可能兑不出来。

手册里的“好使”，兑的是大学城那个柜台的现金。把它搬到老菜场边，柜台变了，货币也变了：阿姨们的钱包里，十六块的单位是排骨；她们的时间不赶，所以“三分钟出杯”不值钱；她们跟熟人说话，所以三秒标准话术听上去像隔了一层玻璃。同一条流程，在大学城是“高效”，在菜场边是“冷”。

这里没有人错。大学城的数据是对的，阿梅的感觉也是对的。错的地方在于：“好使”本来是一个带着柜台的词，手册把柜台拿掉，只留下“好使”两个字，让它看上去像一个所有地方都通用的真。

再往下，“谁的身体”也被藏进了这两个字。手册里一杯饮料的大小、糖的档位、一天卖到几点，都是按一种特定的作息、特定的口味、特定的消化来定的。样板店的客人，大多是年轻人，晚上才开始一天的第二段。到了老菜场，一天是早上五点开始的，晚上八点店里已经没有人了。手册要求开到二十二点。阿

梅的店，后面两个小时，是全天最冷清的两个小时，她和店员在灯下面面相觑，一杯没卖。

这不是在批评连锁。样板店的经验是真实的、宝贵的，它是在一块具体的土里试出来的。问题出在：试出来之后，这块土的名字被删掉了，经验被写成了“流程本身”。来历被拿掉，剩下的是一个恒定的、统一的东西——这是同一个剪谱的动作，只是这一回，被拿掉来历的，不是海，是一块叫大学城的土。

于是“好使就是真”有了一个看不见的脚注：好使，对一种身体、一种钱包、一种作息、一种口味而言。脚注一旦被删掉，“有用”就从一个有地址的词，变成了一个没有地址的词。没有地址的“有用”，才能被装进手册，发往全国。

还有一个更小的例子，可以把“柜台”看得更清楚。手册里最看重的一个指标是复购率：顾客隔多久回来一次。样板店里，学生一周来三四次，复购率很高，总部据此判断：这家店“好使”。阿梅的菜场店，复购率低得让总部担心——阿姨们买一杯回去，往往一个月只来两三回。可是阿梅知道，每一杯奶茶，常常是被阿姨带回去、分给孙子和邻居的；有一回，一位阿姨的孙子在小区里到处说“我要喝那个小杯的”，一下子带来了好几个新客人。复购率量不到这样的事。它量的是“一个人反复回来”，而菜场边的买卖，走的是“一个人带来另一些人”。同一个“好使”，换一个土，要换一把尺子。

这一点，皮尔斯、詹姆斯、杜威三个人各有各的版本，下一节就分别来看。

被摆平的，不只是顾客，还有店里的人。手册的工时安排，是按一种“全天候待命”的年轻店员设计的：早晚班轮换，随时可以加班。阿梅请的店员里，有一位是菜场边卖菜人家的媳妇，下午四点要去接孩子，晚上要回去帮着收摊。她的手艺最好，跟阿姨们最熟，可她的作息放不进手册的排班表。每个月，阿梅都

要为她单独调一次表，调的时候，心里是紧张的——督导查到，会说“排班不合规”。

一个“好使”的方法，既要有一批它能兑现的顾客，也要有一批它能容纳的人。手册容纳的那种人，在样板店周围很多，在菜场边很少。被手册挡在门外的，除了客人，还有能把客人接住的人。

判词：“好使”从来是带着地址的；手册的本事，是把地址撕掉。

◆ 7.3　被压平的土，三种样子

手册把土压平，用的是同一个动作。可压出来的平面，并不是一个样子。三位奠基人统一的是三条不同的律，所以他们各自把土压成了三种不同的平面。先说明一件事：下面讲的是每个人“怎样安放土”，不是说他们没看见土。三个人都看见了，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要问的，只是看见之后，土被放在了哪里。

– 皮尔斯：土被推到了无限远，成了一个没有边的共同体

第1章说过，皮尔斯的真理，是一群探究者如果一直探究下去、最终会同意的那个东西。这句话里的“一群人”，是没有边界的。它不属于哪个镇、哪个年代、哪种语言；它不会缺经费，不会遇上实验室被关，不会有一代人死光了、手稿烂在阁楼里。

回到青檐。如果让皮尔斯来设计手册，他的理想会是：把所有门店的试验数据汇到一起，一直试、一直改，最终收敛到“最好的那杯”。这个理想一点也不坏，它几乎就是总部今天在做的事。可请注意收敛的前提：每一家店的试验，要能互相比较、互相折算。能折算，就是说各家店的土可以互换；不能折算的部分——阿姨们的排骨单位、菜场的作息——只能算“噪声”，等着在长期的平均里被冲掉。

土在这里是“噪声”。它不是不真，而是被安排在了一个“最终会消掉”的位置上。创造律向前看，问“接下来会长出什么”，所以眼前每一块具体的土，都只是通往那个最终状态的途中。

– 詹姆斯：土被收进了一个普遍的个人

詹姆斯比谁都清楚人和人不一样。他在《实用主义》里有一个有名的区分：有的哲学家气质温和，有的气质强硬；各人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人气质的流露。这是一句很诚实的话。

可是请看他把“不一样”放在了哪里：放在了人的内部，放在了气质上。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想法有不同的“活的选项”，这是个人身上的事。至于这个人从哪片土里长出来，他的气质是被什么一层层养成的，他的“活的选项”是被哪条街、哪个行当、哪种日子圈定的——这些来历，在他的框架里没有位置。

青檐的手册里也有这一种压法。它设了“典型顾客画像”：二十五岁，白领，爱尝鲜，在意颜值。画像在手册里是一个人，一个普遍的人。阿姨们、农户们，是“画像之外的个别情况”，由店长“灵活处理”。幸福律统一的路，问的是“这个人过得好不好”；要这么问，就得先有一个“这个人”。于是，土被压成了一副人的样子，装在每一位顾客身上。

– 杜威：土被当成了可以重新安排的环境

杜威是三个人里离土最近的。他在1922年的《人性与行为》里谈习惯，谈得很深，习惯在他那里是社会的、有历史的；他在《民主与教育》里反复讲环境对人的塑造；1896年他在芝加哥办的实验学校，整个就是一次对“环境”的认真设计。要公道地说，如果有人能把土放在眼前，那就是杜威。

可是，请看杜威对土说的最多的动词：重建。他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哲学的重建》（1920）。习惯、环境、制度，是要被智慧拿来重新安排、让经验继续长的材料。土在这里不是噪声，也不是人的内部，而是手边的材料。材料有它的纹理，要顺着纹理用；但材料之所以是材料，是因为它等着被用。

这又是自由律的特点：自由问的是“还有多少条路可以走”；一块土，要是被看作让更多路可走的材料，它被问的就是“能改成什么”，而不是“从哪里来、为什么是这样”。

青檐的手册也有这一种压法：它假定店长是一个可培训的人，门店是一块可装修的空间，当地习惯是一个可以通过“本地化运营”逐步调整的变量。调整，是手册的第四章。土是可塑的，路是不变的——这是整本手册的底层假设。

要补一句公道的话：三个人并不是没有给自己留过窗。皮尔斯讲过“可错”，承认任何结论都可能被后来的探究推翻；詹姆斯讲过“多元的宇宙”，承认世界不是一块铁板；杜威讲过“情境”，一再提醒问题总是在具体的处境里出现。这些话，都是他们真诚的提防。

只是请看这些提防的落点：可错，是在“最终会收敛”的框架里的可错；多元，是“各人活的选项不同”的多元；情境，是“待重建的情境”。三扇窗，都开向了各自的路，没有一扇开向“这块土是怎么来的”。窗是开了，可看出去的风景，仍然是各人自己的那一条路。

换到手册里看，三种压法，各有各的口头禅。创造律的口头禅是“我们要不断迭代”，意思是眼前的土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版；幸福律的口头禅是“顾客满意度”，意思是把一条街的缠法折成一个分数；自由律的口头禅是“给店长更多选择”，意思是土可以按菜单点。三句话都很动听，三句话里，都没有“这块土是怎么来的”。

三个人，三种压法。把它们并排放，会发现一个规律：

皮尔斯的土在远处，终会被平均掉；詹姆斯的土在人里面，被收成一副普遍的人；杜威的土在手边，是等待重建的材料。

三个位置不同，可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土的来历，三个位置上都没有。无限共同体没有来历，因为它是被设想出来的；普遍的个人没有来历，因为他被取出了街巷；可塑的环境没有来历，因为材料只需要问“能怎么用”。

这三个位置，还预告了后面几卷要碰到的三个麻烦。土在“远处”，就会有人只盯着将来，忘了脚下；土在“人里面”，就会有人把一切社会的事都当作心情的事；土在“手边”，就会有人以为任何事都可以拆了重装。这三个麻烦，在治理里、在一个人的一生里，都会换着面孔回来。

站上第291号书把这种压平，看在了症状的层面，叫“实”的三值聚合；站上第202号书说它是四条河汇于一人。本书把这件事放回根部：不是三个人碰巧各有各的疏忽，而是统一了路，就必然要压平土。因为路要在“哪儿都通”的意义上被统一，土就得在“哪儿都差不多”的意义上被摆平。三个人摆平的位置不同，是因为他们各自统一的律不同；摆平这个动作，是他们共有的。

判词：统一于创造的人，把土送去了将来；统一于幸福的人，把土收进了内心；统一于自由的人，把土当成了材料。三个人都没有让土带着自己的来历出场。

◆ 7.4　报应：路越走越窄

压平的土，有一个自己会来的账单。

青檐开到第三十家店的时候，总部发现了一件怪事：新店的业绩，不如前面开的那批老店了。

总部做了大量的分析，结论是“执行不到位”。于是督导加密到每月两次，手册出了第四版，加了一章“标准化执行自查表”，培训时间加长了一周。

业绩还是没有起来。

问题出在哪里？要从一条路怎样被验证说起：一条路之所以能被验证，是因为同一条路在不同的土里走过，结果不同。青檐早期是这样学习的：有的店这样做，有的店那样做，两边一比，哪个更好，一目了然。这就是实用主义最看重的试错，也是手册里每一条“试出来”的来历。

可是当手册统一了路，各家店都按同一个流程做，试错就停了。流程稳定了，对照没有了。第三十家店遇上了一种新情况——比如旁边新开了一家本地人开的、不讲流程的小店，卖得便宜，还送一杯水——手册里没有这个情况，各家店也没有别的做法可以拿来参照。这时候的学习机制，只剩下一个：往上报，等总部改手册。而总部改手册，是以“所有店的平均”为对象改的，改出来的新条目，对这个具体的新情况未必有用。

这是统一的路自己拆了自己的台：实用主义靠试错活着，试错靠差异活着，而统一的土取消了差异。

还有第二重报应，更隐蔽，是说话方式的报应。

当一家店失灵了，手册给它的解释只有一类：执行不到位。为什么？因为路是对的——路是试出来的，是总部数据证明过的——所以出问题，只能是人没走好。这样一来，失败只能被读成人的毛病，不能被读成土的消息。

阿梅的店，后来业绩平平，督导的评语是“店长创新意识过强，偏离标准”。她听了没吭声。她心里明白，那八块钱的小杯，是她那片土在对她说话。可是手册里没有一栏可以写这句话。土想说话，没有口；土的信息，没有格子可填。这和导论里的渔村是同一件事：渔民没有地方说洋流和季风，只能说“海有

脾气”。两个故事的差别在于：渔村是因为看不清，青檐是因为不让看——手册替人把眼睛闭上了。

还有一个很小的、却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到了第三十家店，总部收到的“店长建议”越来越少了。起先，店长们爱写信，说菜场边要小杯、学校旁要加快、海边要防晒的冰饮；后来，建议栏几乎空了。不是店长们没有想法，而是他们发现，想法交上去，回来的永远是“请按手册执行”。一种声音如果长期没有回音，人们就不再发出它。土的信息，是这样一点点被饿死的。

第三重报应是最后的，也是最本质的：路越走越窄。

一条路，要有人能从它岔出去，才算一条路，不然就成了轨道。在统一的土里，岔路要么被当成错误，要么根本不会被发现，因为发现岔路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对“这里的土跟别处不同”的敏感，二是一个可以被写下来、被别人看见的位置。统一的土把这两样东西都取消了。

走到最后，每家店的店员都能把三秒内的那句话说得很标准，却没人再能说得出：为什么这家店在这里？路走熟了，人变成了路的一部分。

请注意这个判断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有一批以统一手册开出来的店，在土差别很大的各地，表现仍然稳定地好，并且店长们仍然在不断从当地的差异里学到新东西，那么本章的论断就站不住了。现实里确实有一些连锁做得不错，它们的办法，往往恰恰是在手册里留了一块“本地自留地”，让土有一个说话的格子。这不是反驳，是证明：能活得好的统一，是给土留了口的统一。

这一点，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其实有过提防。杜威警告过固定的教条，皮尔斯强调过可错主义，詹姆斯讲过多元的宇宙。他们不是在手册里压平土的人。可是一个哲学家的提防，管不住一个方法的回写。方法一旦走出了书房，进了学校、法院、公司、报纸，就按它自己的逻辑往前走——这就是下一章的事。

这一节该收一收。路统一了之后，有三样东西陆续消失：对照（试错没有了比较）、出口（土的消息没有了格子）、岔路（人不再看得出别的走法）。三样东西，都不是被禁止的，是被“不需要”挤掉的。

阿梅有一回跟老同学说起这些，老同学笑她：“你这是嫌手册管得太细。”阿梅摇头。她说她不是嫌管得细，她是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用自己的眼睛看这条街了。手册替她看了，看得又快又整齐，只是看出来的街，和她每天站在柜台后面看到的街，已经不是同一条。一个人一旦习惯了用别人的尺子看自己的地方，她对这个地方的熟悉，就开始一点点退化。熟悉是要天天用的，不用，就会生疏。

判词：统一的路压平了土；被压平的土，不再有力气对路说“不”；没有“不”的路，走得最快，也走得最窄。

◆ 7.5　最强的反驳：难道不该统一吗

读到这里，一位认真的读者会有一个很强的疑问，而且应该有。

青檐的手册让几万个人喝到了口味稳定的奶茶。度量衡的统一，让买卖不再靠吵架；集装箱尺寸的统一，让一只箱子可以从一艘船换到一列火车、再换到一辆卡车，而不必拆开重装；很多行业的标准一统一，成本就降了一大截，普通人用得起了。照这么说，统一路，是文明最大的成就之一。本书凭什么说它有代价？

这个反驳很强，本书先承认它。

承认的内容是：统一路，本身没有错。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任何统一的路，就谈不上分工，也谈不上规模，更谈不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你在陌生的城市里买一瓶水，不用担心瓶子的容量被偷换，这背后站着无数统一的路。实用主义愿意把“有用的方法”推广出去，这是它对世界的真实贡献。

接着，要看这个反驳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

它证明的是：在某些土里，路是可以统一的。度量衡能统一，是因为长度、重量这些东西，在不同的土里“几乎是同一个东西”——一米在县城是一米，在港口也是一米。集装箱能统一，是因为铁和钢的箱子，对各地的土不太敏感。换句话说，这些统一赢在了一个事实上：土的差异在这件事上可以忽略。

它没有证明的是：所有的路，都可以按这个办法统一。奶茶就不是度量衡。一杯饮料从配方走到嘴里，中间要经过人的口味、钱包、作息、聊天的习惯。这些东西不是“可以忽略的差异”，而恰恰是生意本身。当一条路统一得越深，它所依赖的“土可以忽略”的前提就越重；前提压不住的时候，偷运就出事了。

所以，本书对统一的批评，不是“别统一”，而是三条很具体的要求：

第一，统一路时，要说出它假定了什么土。度量衡明明白白：我假定的是，长度这件事在各地没有区别。奶茶手册没有明白：它假定的是，口味、钱包、作息在各地“差不多”，可它从来没有把这句话写出来。写出来，就可以被检验、被质疑、被划定边界；不写，它就以常识的身份，一路畅通。

第二，统一路的同时，要给土留一个能说话的口。好的连锁，往往在手册里留出一块“本地自留地”：这一块，总部不打勾，只收信息。这个小口子看上去不起眼，却是土对路说话的唯一通道。

第三，要记下这条路的来历：是在哪块土里试出来的。一条路如果带着自己的出生证，别人用它时，就知道它的柜台在哪里。这一条，是整本书最后一卷要讲的东西。

这三条要求，用本章的词来讲，就是区分两种统一：明统一与偷运。明统一说：“我统一这条路，是因为我假定这块土可以这样处理。”偷运则说：“我只是统一路，土的事不归我管。”然后顺着路，把土一并摆平。

实用主义奠基人的麻烦，不在于他们统一了路，而在于他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擅长偷运的框架：这个框架从一开头就声明自己不谈土里的“本来”，只谈路上的“效果”。于是，土的假定在这个框架里找不到可以被说出来的位置。一个不让你说出假定的方法，最容易把假定变成事实。

◆ 7.6　小结：偷运要说出口

回到本章开头的那条判断，现在可以把它收紧：

统一的路，不是不能有；但统一的路若不承认自己依赖一块被摆平了的土，它就是在偷运。偷运得越久，土越配合，配合得越好，人们越以为那块土原本如此。

第7章只讲到偷运；偷运得越久土越配合，这个“越来越配合”是怎么发生的，下一章接着讲。

◆

08

第8章

方法回写成土

◆ 8.1　方法有了名字，就会落回土里

青檐茶铺的手册，最初不是一本手册。

最早，是创始人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店里，凭着自己的手感，摸出了一套做法：茶煮到什么颜色就捞，冰放多少杯子不会“发水”，客人进门先看他一眼、他点一下头。那时候，这套做法没有名字，它是一个人的手、一口锅和一条街的客人缠在一起的结果。

后来开了第二家店。他要教另一个人做，于是把做法一条一条写下来。写下来，就有了条目；条目多了，要好记，于是起了名字——“三分钟出杯法”“三秒迎宾”“黄金冰量”。名字起了，就能教，能考，能抄；有了考核，就有了对错。第三家、第十家、第一百家店，新店长上岗第一天，是在这套名字里学会“怎样做一个店长”的。

请注意这一步里发生的事。方法一旦有了名字，它就脱开了做出它的那个人，也脱开了做出它的那块土，成了一个可以单独搬运的东西。这是名字的本事，也是方法能变成力量的原因。没有名字，小罗的“咔”只能留在小罗的耳朵里；有了名字，它可以写进教材、考进试卷、被一万个修车学徒背下来。

可名字还有另一面：它会回头改写那块土。

这一点，要用SDE里最基本的一条讲：两样东西顶撞，推动第三样改变。青檐的情形是：当地的土（E）和手册里的做法（D）顶撞——阿姨们要小杯，手册说没有小杯。这个顶撞，原本该推动手册变形：写进一条“菜场店型”，开一个小杯的口子。这是一条健康的路，手册在顶撞里长出新的样子。

可现实里，手册后面站着督导、考核、培训、品牌。手册的这一端，有一整套力量撑着它不变形；土的这一端，只有阿梅一个人。于是，顶撞的结果往往反过来：不是手册变形，是土被改了。

怎么改的？不是靠命令，是靠日子。第一年，阿梅招店员，看的是“人好、勤快、会说话”。第二年，培训课上，店员要考手册，通不过的人不能上岗；阿梅发现，能通过考核的，是那些愿意背条目、习惯被打勾的年轻人。第三年，她招人时已经在不知不觉地问：“能不能记得住流程？”而当地那些最会和阿姨们打交道、却不爱背条目的人，没有来应聘——不是被拒绝，是他们看了招工要求，觉得这份工作“不是给我这样的人准备的”。

几年下来，这家店周围的人，变成了一批能被手册使用的人。店员的说话方式、站位、对客人的称呼，都慢慢长成了手册的样子。再过几年，连顾客也在变：常来的年轻人，是习惯了这种节奏的；阿姨们渐渐少了，因为店里“没有那种味道了”。

这里值得说明白的是，没有一个人在这条路上“决定”过要改变阿梅这块土。招人的标准，是阿梅自己一点点调的；店员的说话方式，是店员自己一点点学的；客人的习惯，是客人自己一点点变的。每一个人都只做了一个合理的小选择。小选择的总和，却是一块土被换了面貌。回写不需要阴谋，只需要许多个“合理”。

这就是回写的三拍：张力积累（土与手册的顶撞，日复一日）；形状改变（本来该是手册变，实际上是人的选拔标准变）；回写（变了的人，成了下一年的土）。三拍走完，土已经不是原来的土，它是被手册养过的土。

回头看，手册当初说的“开在哪里都一样”，在几年之后竟然更接近事实了。不是因为各地原本就一样，而是因为手册把各地养成了一样。

这是一个很让人不安的结论：统一的路，起先是靠“土都一样”的假定走通的；走了几年，土真的变得一样了，于是那个假定看上去就成了发现。一个预设，在回写里把自己变成了事实。

三拍走完以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结果：连“反对手册”的方式，也被手册养过了。后来阿梅店里的老店员对手册不满，她们抱怨的话是“这条不合理，没有数据支持”，而不是“这条在咱们这条街不对”。抱怨用的语言，已经是手册的语言。土被回写得深了，连它的不满，都得借路的嘴说出来。

这里要分清两个说法，它们长得像，其实相反。一个说法是：“各地的土本来就一样，所以一套手册走遍天下。”这是发现学：把“一样”当成一个本来就在的事实，等人去发现。另一个说法是：“各地的土原来不一样，是被同一套手册一年一年养得越来越一样。”这是发生学：看见“一样”是怎样长出来的。手册的人相信的是前者，每年的数据却在悄悄讲后者——只不过数据不会自己开口，要有人肯问：“这个‘一样’，是不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

这正是形而上学的动作换了地方重演：形而上学把土的来历拿掉，得到一个恒定的样子。方法的回写，则是干脆把土改成恒定的样子，再来说它本来就是恒定的。

判词：起先是路假定土一样，后来是路把土养成一样；到那时，再没有人记得它曾是一个假定。

◆ 8.2　名字越响，回写越强

名字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么，围着名字的争夺，就不是小事了。

本书第1章讲过，1905年前后，皮尔斯因为“实用主义”这个词被越拉越宽，宣布给自己的学说另起一个名字，叫“实效主义”，并且说这个新名字太丑，不会有人想把它拐走。站上第133号书把这件事叫“为名字而战”，并看出它的代价：皮尔斯这样一改，等于主动切断了自己的思想与后来世界之间的一部分回写。

133号这个判断，本书同意，并且想沿着它再走半步：这场名字之争的另一面，是名字越响，回写越强。

先说皮尔斯那一边。他想护住的，是一个窄而准的东西：只有可以在实践里引出可检验后果的想法，才有清楚的意思。这个意思，要在小圈子里、在严格的探究者之间传，才能保持精度。名字一旦传得太宽，精度就会稀释。所以他把名字收回来。可名字收回来，他的学说在大众土里的通道也就变窄了：以后的人谈起“实用主义”，谈的多半是詹姆斯和杜威的版本，皮尔斯的版本要靠专门的研究者才找得到。

再说另一边。詹姆斯把“实用主义”一词带向大众，用的是一个顺口的、人人听得懂的说法：有用，好使，兑现。这个词越传，越多人拿它去用。用的人并不都读过《实用主义》——大部分人不需要读。他们要的是一个名字，可以拿来做事情的理由。“这个有没有用？”这一句，不需要谁授权，也不需要先读完一本书，就可以在任何饭桌、会议室、课堂上被说出来。

这里有一个很直观的对照：名字越响，进入土的通道越宽；通道越宽，回写越强。

青檐的手册也是这样。手册最早叫《操作规范》，没人记得它。后来总部起了一个名字，叫“黄金流程”，印在店门口的玻璃上，印在员工的工牌上，印在每月的评比榜上。名字一响，事情变了：店员开始用它评价自己——“我今天黄金流程做得怎么样”；顾客开始用它评价店——“你们这家黄金流程不行啊”；甚至连阿梅，也开始用它想事情，晚上睡不着时，想的是“我哪一条没做到位”，而不是“这条街的人今天需要什么”。

名字不只是管着做奶茶。它还让一种问法进入了所有的角落：这符合流程吗？这个问法一旦在土里扎根，就会长到流程之外的事上——店员排班、同事吵架、家里孩子的作业，都可能被拿来问一句“合不合流程”。一种方法的名字，像是一粒种子，落进去的不仅是它原本负责的那块地。

不过，回写并不是单向的，这一点要说公道。土也有名字，土的名字也会回写。

阿梅那八块钱的小杯，在手册里没有名字，在菜场边却很快有了：阿姨们管它叫“小杯子”，后来叫“阿梅的小杯”，再后来，隔壁摊位的人来买，也说“来一个阿梅小杯”。这个土名字一出来，就开始回写：新来的熟客一进门就点它；别的店员学着给客人推荐它；连小冯有一次来巡店，也顺口说了一句“小杯那个，今天备货够吗”。

这说明，土的这一头并非没有力量。问题在于两头的力量不对称：手册的名字，背后有督导、考核、培训、品牌、全国几十家店互相确认；土的名字，背后只有一条街和一个人的记性。阿梅的小杯，要靠她每天站在柜台后面，一杯一杯地卖，才能保住；手册的“黄金流程”，哪怕她一天不在，也在运转。回写的两头都在用力，但一头是一条街，另一头是一整套体制。

所以，这场力量对比，决定了最后的方向：不是谁对谁错，是谁的名字传得远。

回到实用主义。“有用”这个词，是一个比“黄金流程”响得多的名字。它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专利，也不是任何一个学派的招牌，它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张口说出的话。它的回写通道，宽到无法估量。

所以，133号看到的“切断回写”，在皮尔斯那里是一次局部的成功——他护住了精度，代价是退出了大众土；而在大众的“有用”那里，却是一次几乎完全的失控——没有人守着精度，回写却一刻不停。

皮尔斯的担心，是对的。他怕的就是这个：一个词越来越宽，越来越随便，最后变成谁都可以用的名义。只不过他当时以为，改个名字可以把自己护住。名字能护住自己的学说，护不住“有用”这粒种子；种子落进土里，早就不属于任何人了。

站在今天回头看，还有一层讽刺：皮尔斯怕“实用主义”被拉宽，所以改名保精度；而被拉宽的“有用”，恰恰没有保住精度——它越宽，越不需要精度，因为谁都可以往里放自己想放的东西：商人放利润，官员放政绩，家长放分数，老师放升学率。同一个名字，装进了一百种不同的“用”。名字响，是因为它够空，空到什么都装得下。

这里要补一句公道话：这不能算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的错。一个方法如果真的有用，被很多人拿去用，是它的荣誉，不是它的罪过。我们要问的，只是：当这么多的人都在用同一个名字、同一个问法，土会发生什么？

判词：名字是方法进入土的门；门越宽，土被改得越快；而当门宽到人人都在用的时候，没有人再觉得那是一扇门了。

◆ 8.3 “有用”进了大学、法院、学校、报纸

设想阿梅的一天。

早上，她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本地新闻：县里要改造老菜场，报道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讲改造方案“预计带动消费增长多少”“效果评估将以数据为准”。她点开评论区，有人说“先看有没有用再说”，有人回“有用没用，数据说话”。

中午，她读初中的外甥来店里写作业，摊开一份“项目学习”的任务单，上面印着：提出问题——形成假设——设计检验——得出结论。

下午，督导小冯来了。他是大学管理专业毕业的，三十岁不到，说话爱用“闭环”“迭代”“以结果为导向”。他在表上打勾的时候，嘴里说的是：“你看，我们不是不讲道理，我们是看数据。”

晚上，她跟住在楼上的老同学聊天。老同学在县法院工作，说如今判案讲究“社会效果”，不能光看条文，还要看判下去以后对这一家人、这一条街会怎样。

四个场合，四个角落，同一种问法：不问它本来是什么，问它会带来什么。阿梅自己没有读过哲学，可她一天里被这种问法碰了四次，而且四次都觉得理所当然。

那位初中的外甥，还有一件小事值得讲。他有一次对阿梅说，他最怕老师在课上突然问一句：“你觉得这个学了有什么用？”他其实不是怕答不上，是怕自己答“没什么用”，会被当作态度不好。于是他学会了一种很熟练的回答：随便找一个后果，哪怕是编的，说成“可以提高某某能力”。几年下来，他已经不太分得清，哪些东西是他真的觉得有用，哪些只是“听起来有用”。

这是后面几章会反复碰到的一个现象：当“有用”成了一切事情的入场券，人学会的第一件事，是把任何事都包装成有用。

这不是巧合。这条问法，是在一百多年里，一个场所一个场所走进来的。

先是大学。皮尔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过书，詹姆斯在哈佛，杜威先后在密歇根、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初，实用主义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更要紧的是，它不只留在哲学系：它教出了一批人，这批人去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系里，把“提出问题、形成假设、检验后果”带了过去，变成这些学科做研究的基本姿势。这个姿势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很多空话因此被挡在了门外。

再是学校。1896年，杜威在芝加哥办了一所实验学校，让孩子在做事情的过程里学东西。后来，以“从做中学”“以儿童为中心”为名的进步教育运动，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学校里留下了印记。站上第235号书讲得很详细，这里不重讲，只记一点：学校是把一种问法放进一代又一代孩子身体里的地方。一个孩子从六岁到十八岁，每天要被问许多次“你想怎么试一试”，十几年下来，这个问法就不再是别人教他的，而是他自己的。

再是法院。霍姆斯是形而上学俱乐部的成员之一，后来做了很多年法官。他在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这句话，把法官的目光从“条文的内在一贯”引向了“判下去以后社会里发生什么”。后来美国法学里有一支叫“法律现实主义”的潮流，更是把看后果推到了前台。这当中有许多真问题被照亮了：条文并不总是公平，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判决，也可能伤人。

最后是报纸，是日常的话。“务实”成了夸人的话，“pragmatic”在英语里成了一个中性偏褒的词，意思几乎就是“明智的”。一个公共讨论里，谁说“让我们看看效果”，谁就占了道德上的便宜；谁说“这件事本来就应该怎样”，倒要先自证一番。这样的变化，没有哪一天被宣布过，是慢慢发生的。

把这四个场所摆在一起看，有两件事。

第一件，每个场所都得到了好处。要公平地说，这套问法确实让大学少了一些空转，让学校多了一些活泼，让法院多了一些对人的关心，让公共讨论多了一些对实情的敏感。这是实用主义的功劳，不必否认。

第二件，才是本章要说的：四个场所互相背书。大学里教出来的人，去办学校、做法官、办报纸、管公司；学校里长大的孩子，进了大学、法院、报社、公司；报纸上的话，又回头成为大学课堂上要讨论的“现实”，成为法官判案时“社会效果”的参照。每个场所，都在别的场所那里，看到自己的做法被确认了一遍。

这就是E最典型的沉淀方式：不是靠某一个地方说了算，而是靠到处都是这样。一个人在大学里学了一遍，在学校里经历了一遍，在报纸上读了一遍，在单位里被考核了一遍，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对这套问法说：“且慢，我们先看看它是怎么来的。”

小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在手册上才学会看数据的。他十八岁以前，在学校里就被问了无数次“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结果怎样”；大学里，他学的是一套以此为本的管理方法；工作后，他的升迁和奖金，也靠“结果”来量。当他拿着打勾表站在阿梅的店里，他不是在执行总部的命令，他是在呼吸自己的土。

要说得公道一点：小冯这样的人，比从前那些靠资历、靠关系、靠“我说了算”的督导，要强出许多。这种问法让他有礼貌、有证据、愿意认错。本书无意把他当反面角色。本书只想指出：当一个人被这样的土养大，他的“问”，就只有一个入口。他会问“这有效吗”，却几乎想不起来问“这是怎么来的”。

阿梅的八块钱小杯，在小冯眼里，是“未经验证的个人做法”。他没有恶意，他只是没有另一个问法可用。

再看一层。这四个场所里的人，用同一套话互相打招呼。大学里的老师说“证据”，学校里的老师说“成果”，法官说“效果”，记者说“数据”，字面不同，骨子里是同一个动作：把一件事放到后果的秤上称一称。你若在其中任何一处说“这件事我说不出用处，但我觉得它该留着”，听的人会礼貌地等你往下说，等你说出一个用处来。你若说不出，这句话就没有地方可以落脚。

这不是谁在压制你。这是一块土里，没有给这句话留位置。

有时候，这种位置的缺失，在最小的地方露出来。阿梅的外甥想在学校办一个“什么也不做”的周五午休小组，几个同学坐在操场边聊天。老师问他：目标是什么？预期成果是什么？他答不上来，小组没有办成。没有人反对聊天，只是“聊天”没有地方登记。

判词：一个方法走进一个场所，只是多了一个用法；走进四个场所，互相背书，就成了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躲不开的空气。

◆ 8.4　常识是最牢的土

有一天，青檐的一个新店员问了一个问题。

她叫小琴，十九岁，上班第三周。培训的时候，督导反复说“出杯不得超过三分钟”，她认真记下了。可是上班后，她发现有些客人一杯奶茶要等四分钟，客人没有不高兴，反倒有一位阿姨说“慢一点没事，你们小姑娘别慌”。

小琴在晨会上举手问：“三分钟，是怎么定出来的呀？”

店里安静了一下。

阿梅愣了愣，说：“总部定的。”

小冯那天恰好在，笑了一下，说：“这个你不用想太多，行业里都这样。”

小琴“哦”了一声，坐下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晨会之后，小冯在表上给小琴记了一笔：“提问积极，但关注点偏离”。他没有恶意，甚至是想帮她——在他看来，一个新人把心思放在“三分钟怎么来的”上，不如放在“怎样做到三分钟”上。这句评语是善意的。可它让我们看见，常识怎样保护自己：不是靠堵住问题，而是靠把问题重新定义为“关注点偏离”。一个问来历的人，被温和地、体面地，请回到了路上。

这个场景里，没有人做错什么。可请看它的结构：小琴问的是来历，得到的回答是“大家都这样”。这个回答的意思是：三分钟不是一个需要解释的东西，它是常识。

什么叫常识？不是正确的知识，也不是大家都同意的知识。常识是不需要有人出来担保的知识。一个主张要成立，得有人站出来说“我认为”，有人反驳，有人论证；而常识没有这个过程，它是背景，是人们在讲道理之前就已经踩在脚下的东西。

方法走到常识这一步，就完成了最后一次变身。

最初，三分钟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自某一家样板店在某一个高峰时段的排队情况——它有来历，有人可以说清楚“为什么是三分钟，不是五分钟”。后来，它被写进手册，成了“条目”，还有人记得它是怎么来的。再后来，它成了培训课上的“标准”，记得来历的人离开了公司。最后，它成了店员们默认的时间感：到了三分钟，心里就发紧。从这一刻起，没有人需要知道它从哪里来，它本来就是这样。

请注意，这和本书导论讲的形而上学，是同一个动作：把来历拿掉，换来恒定。形而上学说“世界背后是水，是理念”，拿掉的是宇宙的来历；方法在常识里说“三分钟”，拿掉的是一个数字的来历。形式上一模一样。区别只在：形而上学是有人站出来宣布的，常识是没有人宣布而自己形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对本书的总判词补上一层。实用主义当年反形而上学，靠的是追问“它会带来什么”；可当“有用”这套问法回写成常识，它自己就变成了没有人再追问的东西。一个用来拆“本来如此”的工具，在土里待久了，自己长成了“本来如此”。

这里有一个很难绕开的圈。按实用主义的精神，一个方法也要接受检验：好，那我们来检验“有用”这个问法本身——它有用吗？可是检验用的是什么标准？还是“有用”。于是，这个问法给自己量了一下，量出来，永远合格。

站上第180号书里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尺子只有一把，量的是自由。本书同意这个说法的形式，只想补一句：尺子越是只有一把，越是量不了自己。一把只能量别人的尺子，量到最后，会被所有人当成“尺子本身”。

在SDE里，这件事有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土（E）是最容易被回写、沉淀、谱系化的维度。回写和沉淀，实用主义做得很好——一百多年里，它把一种问法沉进了千千万万人的日常。但谱系化，它没有做。谱系化，是在沉淀的同时，记下这层土是怎么一层层来的。实用主义的回写，是只沉淀，不谱系化：土越沉越厚，家谱却越来越薄。

这就是为什么常识是最牢的土。它不是靠“证据多”牢，也不是靠“说得对”牢，而是靠来历已经没有人记得牢。你想反驳它，找不到它主张了什么；你想考察它，找不到它的出生地。它像是自己长在那里的。

家里的碗柜，可以当一个小小的参照。你家的筷子为什么放在左边第二个抽屉？大概没有人说得出理由。也许是搬进新房那天，随手一放；也许是某个已经不住在一起的人定的。可是它一旦放在那里，一家人几年下来，闭着眼睛都伸得出手。有一天来了个新媳妇，想把筷子挪到右边，全家人齐声说：“放那儿不对。”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不对，可所有人都觉得不对。这个“觉得不对”，就是沉淀：习惯已经沉到了手上，来历却没有跟下来。

家里的抽屉，规模小，无伤大雅。可当同一种情形发生在一个社会的“有用”问法上，规模就大到足以左右很多人的命运。

请把导论里那座澡堂再想一想。镇里开会拆澡堂，理由是“已经没什么用了”。会上没有人需要为这句话提供论证，反对的老马反倒要先回答“凭什么还留着它”。这不是镇里的人冷酷，而是他们手里最顺手的问法，就是土里最牢的那一个。他们用最自然的方式，做了一件最自然的事。“没什么用了”是一个不需要担保的判断——这就是常识的力量，也是它的危险。

实用主义自己有一条很好的原则，叫“可错”：任何结论都要准备被推翻。可是请看，这条原则有一个盲区——它管得住结论，管不住问法。结论可以被新的证据推翻，而“用证据来推翻结论”这件事本身，却被默认为不用推翻。可错主义在问法面前停了脚。这不是它的疏漏，而是任何一把尺子的命：量得了别的，量不了自己。

这个判断是可以被推翻的，办法很简单：随便挑一位店员、一位法官、一位老师，问一条他每天都在遵守的规矩，它是怎么来的。如果多数人都能说出一段具体的来历，那么本章说的常识化，就还没有发生。你可以自己去试。

判词：常识，是来历被忘记了的方法。土里没有比它更牢的东西，因为你要拆它，就得先让它重新变成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 8.5　找回来历的一小步与三个征兆

一块土被某个方法养过之后，会留下痕迹。不用任何理论，凭三个很日常的征兆，就能看出来。

不过在讲征兆之前，有一件事要先说，因为它显示出：来历是可以找回来的，只是要花功夫。

小琴那天在晨会上的问题，阿梅没有忘。晨会散了以后，她心里一直有个小疙瘩：三分钟，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

过了几个月，趁一次区域培训，阿梅逮住一位在公司待了八年的老店长，问了这个问题。老店长想了半天，说他记得好像是最早大学城那家店，晚上高峰的时候，门口排队的人超过十个，一旦超过三分钟，就有人开始往外走。后来总部就把“三分钟”写进了手册。

阿梅又问：那是大学城晚上高峰时的事？

老店长说：对，大概是。

阿梅回到店里，没有说什么，她把这件事写在了柜台下面一个小本子上：三分钟，是大学城晚上十点排队的人扛不住的时间。她又接着写了一行：菜场早上七点，阿姨们扛得住的时间，可能是……她没有写完。她打算下个月起，每天记一记，客人从付钱到拿到杯子，什么时候开始不耐烦。

这件小事，没有任何宏大之处。可请看它做了什么：它给“三分钟”补上了地址和时间，一个“常识”重新变回了一个“有来历的做法”。变回来以后，它才第一次能被问：这个来历，对我这块土适用吗？

这就是后面几卷要讲的同一性谱系化的最小样子：不是把方法扔掉，而是给它一本家谱，让它重新有了出生地。

这一小步有一个限度，要诚实地说：阿梅记下了三分钟的来历，却没有办法记下所有的条目。手册有两百多条，她一个人，一个小本子，追不过来。要给一块土写完整的家谱，需要的信息和知识发生的能力，远超一个店长的笔记本。这一点，本书最后一卷会回来。

好，现在回到征兆。

青檐的故事，我们再往后讲几年。

阿梅的店开到了第六年。总部又出了第五版手册，这回加了“数字化门店”一章，要求每笔订单都录入系统，店员的动作要拍成短视频上传。阿梅有时候在收银台后面坐下来，想一想这六年，发现自己有一个变化：她已经不太会用别的话讲这家店了。

有一天，镇上来了一位做地方志的年轻人，想问问这条老菜场街的变化。他问：“你这家店开在这里，对街上的人有什么影响？”

阿梅张口就答：“我们的月销是多少，复购率是多少。”

说完，她自己停了一下。年轻人问的，不是这个。他问的是这条街。可她手里没有另一套话，来讲一家店和一条街的缠法。

从这个小场面里，可以认出三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说不出来历。问一条每天遵守的规矩从哪里来，答案是“本来就这样”或“总部定的”。如果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规矩都是这种答案，那里的土已经被养过了。

第二个征兆：失败只怪人。事情出了问题，解释只有一类：谁没做到位，谁不够努力，谁缺乏意识。因为路被默认是对的，所以土不会被问。土不会被问，土的消息就没有出口。

第三个征兆：别的问法听起来奇怪。有人问“这件事该不该有用”，或者“这件事如果没有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听的人觉得对方在说怪话，或者在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这是最深的征兆，因为它说明：土里连另一个问法的位置都没有了。

三个征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错误，都是习惯。没有人犯错，没有人存心，一切都在合理的、体面的、有礼貌的气氛里进行。这是回写最典型的样子：它不靠压迫，靠日常。

◆ 8.6　小结：养成，而不是论证

把第7章和第8章合起来看一遍。

第7章讲的是偷运：统一路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假定了土是一样的。三种律各有各的压法：创造律把土送去了将来，幸福律把土收进内心，自由律把土当成材料。三种压法都有同一个结果：土的来历不出场。随后，土的“不让说话”，使试错失去对照，使失败只能怪人，使路越走越窄。

第8章讲的是回写：方法一旦有了名字，就会落回土里，把土养成适合自己的样子。名字越响，回写越强；方法进入大学、学校、法院、报纸，互相背书，成了一个人从小到大躲不开的空气；最后成了常识，成了没有人再追问来历的东西。

这两章加起来，可以回答卷二最初的那个问题——实用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形而上学，而且是一种特别稳固的形而上学：

传统形而上学拿掉土的来历，得到恒定的样子，要靠一个人站出来宣布；实用主义统一了路，土的来历在日常里被一点点忘掉，不需要任何人宣布。它不是靠论证牢，是靠养成牢。

用三方程的话收尾：想要每一家店端出同一杯（S），能抓在手里的只有流程（D），于是土（E）被当作了常数。可这个常数不会自己保持常数——回写使它真的向流程靠拢。于是，一个起先需要假定的东西，被养成了事实。

有一点要说在前面，免得误会。本书讲的这一切，没有一句话在说“某个民族爱讲实用”“某个国家的人天生务实”。这样的话是另一种形而上学——把土的来历拿掉，换来一个恒定的“民族性”。本书只说发生：一种问法，是怎样靠名字、靠场所、靠互相背书，一年一年落进土里的。落进去以后，才有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种看上去自然的话。这种话，本身就是回写完成之后的产物。

最后，给读者留一个很小的练习，不需要任何工具。

挑你今天遇到的三条“本来就这样”的规矩：公司里的、学校里的、家里的都行。对每一条，问自己三句话：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在什么情形下定的？它原来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大多数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答不上第一句，勉强答上第二句，第三句已经和今天的情形对不上了。这不是你的疏忽，这就是常识的样子。你并不需要因此推翻它。你只需要知道：这一条规矩，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已经替你做过一次决定。

卷二要立的判词，到这里立住了：他们统一了路，土就被压平了；而土被压平，是靠回写，一年一年，慢慢压下去的。

还剩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它是卷三的门。

青檐的手册把各地的土养成了一样，那是一家公司几年里的功夫。可实用主义的“有用”，在美国是在一百多年里被养成常识的，规模大得多。为什么在那片土上，这套方法会长得这么牢、这么快、这么自然？是那片土原来就特别适合统一的路吗？如果是，那片土是什么样的？

换一个问法：一块土，要有什么样的来历，才会特别需要一条统一的路？

答案不在哲学家的书里，在一条街上、一个教堂里、一条铁路边、一个移民码头上。下一卷，我们从那里开始看。

◆

卷　三

根源卷：美国的土

卷　序

一个思想为什么会长成这样，要去看它的土。这一卷不谈民族性，只谈一片土怎样一层层长出来：多种来源缝在一起的土，只能共同遵守“路怎么走”；土先长出意义分家的倾向，实用主义把它写成方法，方法又沉回土里，越沉越牢。

09

第9章

缝起来的土

◆ 9.1　一条街，五个省

先请你设想一条街。这是一个构想的例子，不属于哪座真实的城市。

城里有一片老城中村，中间一条窄街，两边是三四层的自建楼，底下全是铺面。街口是做五金的福建老板，往里是卖米粉的湖南夫妻，再往里是河南人开的烩面馆，斜对面有个四川人专卖火锅底料，街尾是一家新疆人烤馕的铺子。五个铺子，五个省，十来年下来，谁也没想过要搬走。

这条街每天要办很多事。早晨谁扫门前那一块地，下雨天谁家的遮阳棚可以伸出去多远，赊账的本子怎么记、记多久，夏天一停电，谁家的冷柜先接上备用的线，货车半夜卸货能不能鸣喇叭，赶集日的摊子摆到哪条线为止。

这些事，街上都有“规矩”。可你要是挨家去问：“这规矩是为什么？”你会得到五种完全不同的回答。

五金店老板说，做生意讲的是信用，欠债不还就是坏了名声，名声坏了子孙都难做人。米粉店的老板娘说，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用讲那么多。烩面馆的老板说，规矩就是规矩，写下来，谁也别耍滑头。火锅底料的四川人说，各干各的，不碍着别人就行，我不管你信什么。烤馕的老师傅说，真主看着呢——也有一半是看着钱。

五种理由，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是街上的事照样办得好好的。

这样的街，在今天的任何一座大城市里都找得到，不必去美国。它说明的不是哪一国人的特点，而是一个朴素的结构：来历不同的人住进同一条街，公共的事要办，办得成；深处的事要说，说不拢。我们借它来看一片更大的土，是因为这个结构，放大了看，几乎一模一样。

这就是本书卷三要讲的第一个现象：**一片土，是由几块互不相干的来历缝起来的；块与块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为什么”，却可以有一套共同的“怎么办”**。

注意我们没有说这五个省的人“性格”如何，也没有说“某地人天生爱讲信用、某地人天生爱帮人”。那是一种我们这本书不做的说法，后面会专门讲为什么不做。我们只说一件可以看得见的事：这条街上的人，来历不同，到了同一条街，要一起过日子，于是有些东西能共享，有些东西共享不了。能共享的，是“早上谁扫地”；共享不了的，是“我为什么相信扫地是对的”。

用我们的话说，这条街的土，是缝起来的。

缝，不是熔。熔是把几块东西烧化了，混成一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缝是把几块布拼在一起，针脚还在，接缝还在，每一块布还保着它自己的花样。这条街上的五户人，各自的信仰、各自的老家、各自的过年方式都没有化掉。你从街上走过，看得见接缝：这家门口挂红灯笼，那家门楣上贴着另一种文字，傍晚有一家的后院飘出做礼拜的歌声。

这样一片缝起来的土，会长出什么样的“道理”？

上一卷末尾，我们说过一句话：常识是最牢的土，因为后来的人不再觉得它是一个主张。那一句说的是，一个方法被用久了，会落回土里，成为大家想都不用想的东西。现在要往回问一步：那片最先托住它的土，自己是怎么来的？

如果土是一整块长出来的——同一个祖宗、同一个神、同一套老规矩——那么人们谈“为什么”，大概可以一路谈到底，谈到某个人人都点头的地方。可是在一片缝起来的土上，谈“为什么”谈到某一层，就一定会碰上接缝：到了那里，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再往下没法谈了。

这时候人们会怎么办？

街上的人给了一个朴素的回答：那就别往下谈了，谈上面那一层——怎么办。早上谁扫地，赊账怎么记，这些事不需要先弄清楚“人为什么要讲信用”。只要大家对“怎么办”点了头，街就转得起来。

你看，这个回答里有一个很深的结构：接缝在底下，“怎么办”在上面；人们把全部的共识，都压在上面那一层。一条街这样，一个国家，会不会也这样？

美国，是一个特别适合拿来看这件事的地方。它不是唯一缝起来的土——世界上缝起来的土很多——但它缝得很晚、很快、缝痕很清楚，而且恰好在它缝得最紧的那几十年里，长出了一种哲学，叫实用主义。

所以这一章不讲哲学，先讲土。讲这片土的几块料子是什么，各自从哪里来，怎样被缝到一起。

不妨再想一层。假如这条街出了一件大事，比如整条街要被划进拆迁范围，这时候“怎么办”够不够？

不够，但它仍然是第一块被拿出来的东西。街上的人会先商量：谁去街道办问清楚补偿办法，谁去找懂行的人看合同，开会的时候一人一票还是一户一票。大家争的是办法。至于“这条街对我意味着什么”，每个人心里各有一本账，没人拿出来当众算。——这样的街，办起事来很利索；可是街没了以后，各人心里那本账，有多少是真的被听到了？

判词放在前面：**实用主义不是从一块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一件百衲衣上长出来的**。这件衣服的每一块料子，都有自己的来历，都说得出自己的“为什么”。可穿上这件衣服走路的人，说不出一个共同的“为什么”，只能说一个共同的“怎么办”。

◆ 9.2　几块料子

那条老街的尽头，有一面山墙，墙上贴过无数张招牌。年头久了，下雨剥落，最外一层是新近的手机维修，剥开一角，底下是十年前的“电话补卡”，再剥，是更早的“录像带出租”，最里层是一行褪了色的手写字，“收购废品”。你一眼看过去只是一面花墙，可每一层都是一段来历。

美国这片土，也是这样的一面墙。我们不可能把每一层都剥开，只挑几块最厚的，看它们各自从哪里来，各自留下了什么。下面只写大家公认的史事；拿不准的年份和数字，宁可不写。

第一块：教会的土。十七世纪，一批受不了英国国内宗教压力的新教徒渡海到了今天的新英格兰。1620年有“五月花”号上的分离派信徒，1630年前后有人数更多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一带建起了村镇。他们带来的东西，不只是一种信仰，还有一种办事的样子：村镇靠一份份“盟约”立起来；会众自己选牧师；识字被看得很重，因为要自己读《圣经》；1636年建的哈佛学院，最初就是为了培养牧师。

这块土里的“为什么”，是神。人是不是得救，要看神的拣选；可人又得在世上勤勉做事，把日子过得踏实，当作对神的回应。这块土长出来的东西，是“良心”和“自己对自己的审问”，是一种盯着自己内心的目光。

后来的故事并不单调。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十九世纪初，各地先后掀起大规模的宗教复兴，史家叫“大觉醒”。复兴把信仰从牧师手里拿到了一般人手里：人人都可以直接经验到神。教派越分越多，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公理会……谁也压不倒谁。1791年生效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设立国教，也不得禁止人们自由信教。这一条的意思并不是“不重视信仰”，恰恰相反：信仰太多、太杂，谁也没法让别人只信自己那一个，于是只好把它放在国家管辖之外。

这是第一道缝：神，每个人各有各的，国家不替任何一个说话。

第二块：学院与实验室的土。十九世纪，美国的年轻学者要做学问，常常得漂洋过海，去德国。德国的大学已经形成了一套新的样子：教授带着学生做研究，讲究实验、讲究专业、讲究论文。威廉·詹姆斯年轻时就到德国待过一阵，学习生理学。回国以后，这套样子慢慢嫁接到本土：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让联邦拨出土地，各州办起以农业与工程为重的“赠地学院”；187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办，被公认为美国第一所以德国式研究为模子的大学——皮尔斯后来在那里教过几年逻辑。

这块土里的“为什么”，是“做出新东西来”。它的味道是：知识不是背下来的，是做出来的；一个想法，要放进实验里，经得起检验。

要是在今天的日子里找个对照，大概就像一家老字号的后厨和隔壁新来的研发部。后厨相信几十年的火候，研发部相信数据和实验，两边都不傻，也都不觉得对方是敌人，可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个说“老师傅说了算”，一个说“拿试验结果来”。

这是第二道缝，和第一道缝的方向完全不同：一块土问“神怎么看”，另一块土问“实验怎么说”。它们之间并不必然吵架，却互相插不进话。

第三块：边疆的土。十九世纪的美国，不断向西扩。1862年的《宅地法》规定，成年人只要在一块公地上住满五年、耕种下去，就可以几乎免费地得到它。成千上万的人坐着马车、后来坐着火车，去了密西西比河以西。1893年，历史学家特纳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说美国人的许多特点，是在不断向西的边疆上养成的。他的说法后来受到了很多批评，我们也不必替它背书；但有一点是公认的：189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里，宣布“边疆线”已经不能再画出来了。向西可走的路，大体走完了。

要诚实地补一句：所谓“边疆”，在先到这里的原住民眼里不是“空地”。这些土地上本来就有人，有他们自己的几百年谱系。西进的故事，同时是一个土被夺走、被另一套土盖在上面的故事。我们不展开，但不能不让它在这里留一行字：这块土的“开阔”，是用另一块土的“被盖住”换来的。

边疆那块土的“为什么”，是“自己动手”。没有教会可靠，没有衙门可靠，没有邻居可靠，就只好自己干。它长出来的是一种对“手头能做成什么”的特别敏感。

第四块：移民的土。184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和德意志地区的动荡，让大批人来到美国。1850年代以后，更多的欧洲人、后来还有从南欧、东欧来的人，穿过大西洋。1892年，纽约港的埃利斯岛移民检查站开始运转。西海岸，另一股人潮来自太平洋对岸：大批华人劳工在1860年代参加了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的修筑；1882年，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把他们挡在门外。

还有一股人潮，必须分开写，因为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从十七世纪起，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被强行贩运到美洲，成为奴隶。他们的劳动撑起了南方的庄园经济，也让这片土上长出了一个深深的裂口。

这块“移民的土”里，没有一个共同的“为什么”。爱尔兰人的天主教堂，德国人的啤酒会馆，意大利人的街区，犹太人的会堂，华人的会馆……每一群人带着自己整套的老家，落在这里；老家的神、老家的祖宗、老家的方言，没有一样能直接变成“大家的”。

第五块：工业与铁路的土。1869年，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在犹他的一个地方接上了轨。往后几十年，钢铁、石油、铁路、电报，一夜之间造出了新的巨富，也造出了新的城市和新的工人。马克·吐温和一位合作者在1873年写过一本小说，书名叫《镀金时代》，这个词后来成了那几十年的名字。

铁路给这块土带来的，不光是速度，还有一整套“统一的办法”。以前各城镇各用各的太阳时，铁路一通，乱成一团；1883年，各大铁路公司约定，把全国划成几个标准时区，统一用同一套钟点。这一条没有任何政府命令，是铁路公司之间谈成的。

工厂里的工人，来自四面八方，说着不同的话，信着不同的神。厂房里没人有闲心去争谁的神更大，机器转起来，要靠一套大家都得听的哨声、班次和工序。工厂是缝起来的土最早学会“只谈办法”的地方之一。

这块土的“为什么”，是“能不能运转”。它长出来的，是“流程”和“标准”，是一种看不见的、人人必须服从的办事规程。

第六块：创伤的土。1861到1865年，内战。美国人自己打自己，死亡人数长期按六十二万上下计算；2011年有学者用人口普查数据重新估算，认为接近七十五万，学界至今有争论。战争的起点是奴隶制，战后接下来是一段重建，又接下来是漫长的、没有真正解决的裂痕。

这块土是一块沉在最底下的土，它不像前五块那样提供“为什么”，而是提供一种说不出来的警觉：绝对的“为什么”是危险的。一个人相信“神的旨意”、另一个人相信“自然的权利”，当两边都认定自己有一个最终的“为什么”，结果是战争。

战后的重建，本想把奴隶制留下的裂口缝上，让获得自由的人成为公民。可后来的几十年里，这道缝反复被撕开：投票的权利被各种办法限制，隔离在法律与习惯里被固定下来。这个故事的细节极多，不是这里能讲完的。我们只取其中一点：一道缝，如果只在程序上缝（宪法修正案、选举法），而不在来历上缝（谁的土、谁的苦、谁欠谁），它很容易在程序的内部再被撕开。这是整本书后面要反复回来的一个教训。

这块土里，有一个后来成为哲学家的青年，名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他在内战里当军官，多次受伤，几乎死去。我们下一节还会遇到他。

还要补一层：这六块料子，并不是均匀铺在地上的。十九世纪中叶，北方的城镇正在长出工厂和铁路，南方的大片土地上是种植园，西部则是刚刚划进版图的广阔地带。同一个“美国”，在波士顿的书房、在亚拉巴马的棉田、在堪萨斯的农场，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日子。缝，不但缝在人群之间，也缝在地区之间。1861年的那场战争，说到底，就是这条地区缝线崩开的时候。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说“美国的土是什么样”，而要说“哪里的土，哪一年的土”。同一块料子，在不同的地方，厚薄不同；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年头，料子的配比也不同。

这些料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来得快。一块土长成今天的样子，通常要几百年慢慢沉积；而美国这件百衲衣，大头的缝合，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几十年里：铁路几年铺成一条，移民几年涌进一批，战争几年打完一场。缝得快，线

头就露得多，针脚还很新。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对接缝的感觉特别尖锐，对“到底靠什么把大家缝在一起”的追问，也特别急。哲学在这样的年头出现，并不奇怪。

好，现在把六块料子摆在一起：

教会土——“为什么”是神，味道是良心；学院土——“为什么”是检验，味道是新东西；边疆土——“为什么”是手头能做成什么；移民土——没有共同的“为什么”，只有一个个老家；工业土——“为什么”是运转；创伤土——对一切绝对的“为什么”的警觉。

请你看，这六块料子里，没有一块可以代表全体，也没有一块能压倒其余各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来历，也就是自己的同一性谱系；而它们被缝在一起的那几十年，并不长。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是后面整本书要用的：**一块土有来历，缝起来的土，有的是好几个来历，而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更早的来历**。一个中国村庄，大体上是同一个祖宗的几百年繁衍，吵架时，吵到底可以吵到“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子孙”。美国这片土上，吵到最底，是接缝，没有“一个老祖宗”可回。

◆ 9.3　剑桥的一间屋子

那条老街每周一晚上，会有个“碰头会”。参加的是几家老板：开五金店的、开药铺的、修电器的、一个退了休的会计，还有一个大学毕业后跑来开书摊的年轻人。谁也说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也没有人主持。大家挤在米粉店打烊后的桌子上，吃着剩下的米粉，争一些很大的问题：到底做人是不是要讲良心？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肯吃苦？这条街以后会不会被拆？

争了几年，大家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争“为什么”的，永远争不出结果；凡是争“怎么办”的，一晚上就能定。久而久之，碰头会的话题越来越窄，越来越实在：这个月谁去跟街道办谈遮阳棚，下个月怎么凑钱修下水。

这个情形，很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剑桥镇上的一间屋子。

1872年初，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有一伙年轻人，开始不定期地聚会。他们讨论哲学、科学、法律，也争论达尔文刚刚搅动起来的大问题。这个聚会前后大约持续了一年。当时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聚会的名字也是多年以后才有的：是皮尔斯自己回忆说，这个聚会叫“形而上学俱乐部”，名字取得半是玩笑、半是挑衅——因为他们聚在一起，恰好是为了拿形而上学开刀。

参加者里，今天最有名的有三位：皮尔斯，詹姆斯，还有霍姆斯。此外还有几位：钱西·赖特，一位擅长数学与逻辑、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的学者；约翰·菲斯克，一位把进化论讲给大众听的作家；弗朗西斯·阿博特，一位受过神学训练的哲学家；尼古拉斯·圣约翰·格林，一位律师，后来在哈佛和波士顿大学教法律，皮尔斯称他为“实用主义的祖父”；约瑟夫·班斯·华纳，也是一位律师。名单上的几个人，后世的说法不尽相同；这里取最常见的一份。

站上第133号书给这间屋子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五行当”。它没有说这五行是哪五行，我们在这里按自己的理解把它数一数：

律师，面对的是具体的纷争——一桩纠纷，要在昨天的判例与今天的情势之间找一个说法。霍姆斯是其中最有名的。他在内战里受过重伤，回来读法律，1881年出版《普通法》，里面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大意是：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的态度很清楚：一条规则好不好，不是看它从一个什么原则推出来，而是看它在实际里能不能让事情办下去。

科学家，面对的是自然。皮尔斯本行是化学与测量，在海岸测量局工作了多年，对精确的数字有一种近乎洁癖的认真；赖特则是个数学与进化论的行家。他们相信，一个想法得靠检验才站得住。

心理学家兼医学出身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詹姆斯学医出身，后来转向生理学和心理学，晚年才主要谈哲学。他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怎样过日子、怎样信、怎样痛苦。

进化论的传播者，面对的是一个时代的大浪。菲斯克把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进化论，翻译成了大众听得进去的话。

神学背景者，面对的是信仰。阿博特受过神学训练，后来参与过一个叫“自由宗教协会”的团体，致力于让宗教摆脱教条。他的问题是：在科学兴起的时代，信还能不能立得住？

这五行，各有各的“为什么”：律师的“为什么”是判例，科学家的“为什么”是检验，医生的“为什么”是人的活法，传播者的“为什么”是进化，神学者的“为什么”是信。

皮尔斯也值得多说一句，因为他在这间屋子里是最“工业”的一位。他在美国海岸测量局干了三十多年（1859到1891年），这是一个靠精确数字吃饭的机构：量地，量重力，量长度。它要的不是一个人信什么，而是你量出来的数，换一个人、换一个地方，是不是还量得出同一个数。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标准”的土：只要程序对，结果就要一样，不问谁来量。他后来把“意思就是实践的效果”说得那么干脆，与这种土不无关系——在测量站里，一个说法的意思，本来就是“别人照着做，会量到什么”。

说一说霍姆斯，因为他在这五行里最能说明“土”。

他在战场上受过伤，也见过两边都认定自己绝对对的。后来的读者，常把他对“确定”的不信任，同这段经历连在一起。这是后人的读法，不是他自己的话，我们只借来用一用。

这一层意思，进了他的法律观。他不愿意把法律看成从几条大原则里一路推下来的逻辑体系，宁可把它看成许多代人在具体纠纷里一点点磨出来的东西：这条规则管用，就留着；不管用，就改。这就是所谓“法律经验主义”。

你把这个态度放回内战之后的美国，大概就明白它是从哪块料子里长出来的：创伤的料子。一个亲眼见过两边都以“绝对的为什么”开枪的人，很难再对任何“绝对的为什么”有热情。他剩下的，是一个很朴素的态度：先看后果，先看怎么让人在同一个法庭里继续说话。

请注意这不是在说霍姆斯“代表”了什么。是在说：同一间屋子里，五个人带着五块不同的料子进来；其中一块（创伤）让人对一切绝对的根基起疑，另一块（实验室）让人相信检验，第三块（信仰）让人想守住意义。三种倾向在一间屋里相遇，谈得下去的，只有“后果”。

这五个人之间，并非没有分歧，甚至吵得很厉害。有人看重进化论的宏大图景，有人更看重检验的细节；有人要给信仰留出位置，有人想把形而上学一扫而空。也正因为分歧真实，他们才找不到一个大家共同的“为什么”，不得不退到“后果”这一层来谈。屋子里的和气，不是来自一致，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退让。

请注意这个屋子的形势，和那条老街的碰头会几乎是一个版本：一屋子人，来历不同，行当不同，“为什么”不同，却都生活在同一个正在剧变的镇上。他们谁也没法替对方的行当做主，谁也说服不了谁。要让这个聚会继续有意思，唯

一能谈的，是“到底什么样的想法才算有意思”——也就是，不管你为什么相信它，咱们来看，相信它以后，会怎样。

回头看，这不奇怪。皮尔斯后来写下那条著名的准则：要弄清一个想法的意思，就看它在实践里会引出什么效果。这一条，换个角度看，就是一间屋子里的律师、科学家、医生、神学者都能同意的一个最低的公分母。它不要求你先接受我的神，不要求你先接受我的方法，只要求你把想法放到“会怎样”那一层来对话。

这里要小心，不要说过头。我们不是说，实用主义是这间屋子的“产物”，好像把这几个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就必然会生出一种哲学。事情要复杂得多：皮尔斯早年的家学、他在测量局的经验，詹姆斯的个人危机，霍姆斯的战场，都在这个哲学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这些我们已经在前几章讲过。我们要说的只是一件更小、更稳的事：

当这样一个行当混杂、“为什么”互不相通的圈子需要有话可谈的时候，“怎么办”“会怎样”成了最好用的话头。这个话头后来被三个人各自磨成了一种哲学；但它最先是一个屋子里的需要。

用我们的语言说：这间屋子是整片土的微缩。土是缝起来的，来历不通；在缝起来的土上，能共同谈的，只能是路。

◆ 9.4　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

走到这里，最容易出现一个误会。有人会说：好了，你已经讲了六块料子，那么“美国”究竟是哪一块？是清教的，是边疆的，还是工业的？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再回到那条老街。有个外地来的记者在街上走了一圈，写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这条街的人，都爱做生意》。街上的人看了报道，哭笑不得。五金店老板说：我是为了养家。米粉店老板娘说：我是为了让儿子上学。烤馕的师傅说：我做了三十年馕，是因为我爹就做这个。他们每个人的“做生意”，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原因；一句“都爱做生意”，把每个人自己的谱系，抹平了。

“美国是什么”这个问题，抹平的，也正是这个。

在美国史的研究里，“美国到底是什么”的各种回答，几乎和美国史一样长。有人说是清教，有人说是边疆，有人说是移民，有人说是资本主义，有人说是奴隶制与种族，有人说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每一个答案，都能抓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也都漏掉一大片。这并不是研究者无能，而是这个问题的设问方式有毛病：它假定了有一块“本质的土”，其他都是支流。

SDE的做法是反过来问。我们不问“美国的土是什么”，我们问：这片土是怎样一层一层缝起来的？每一块料子的来历是什么？它们之间的接缝在哪里？接缝处发生了什么？这本书从头到尾的态度就是这个：一件东西不是被“发现”的，是被“发生”出来的。同样，一片土不是一个有本质的东西，它是一个正在被缝着的东西。

用九宫的话说，这就是E的同一性谱系：一片纠缠的土，有它的来历，来历不止一条，各条之间有接缝。拿掉来历，只留一个“美国人是怎样的人”，就成了形而上学——一个对土的统一性预设。

所以本书不谈“美国民族性”，也不谈“美国文化的本质”。站上第291号书的附录，明确拒绝过“文明性格”之类的论断，我们同意，并且要说明为什么同意：**一旦说“某民族天生如何”，就是把一片缝起来的、有许多来历的土，说**

成了一块没有来历的、本来如此的石头。那是对土做的一个形而上学，而且是最不容易被觉察的一种。

有人会反驳：你说“不谈民族性”，可你谈来谈去，不还是在说“美国人”是怎样一种人吗？只是把“天性”换成了“土”。

这个反驳值得认真答。区别有三条，都是可以查的：

第一，民族性是一个性质，土是一个过程。说“天性务实”，是说人身上有一样固定的东西；说“土是缝起来的”，是说有一些可以查到年份的事先后发生了。前者无法被证伪——总能找到一个务实的例子；后者每一块料子都可以去核：某年有没有某法案，某地有没有某类人，某时有没有某场战争。

第二，民族性把人当作一个整体，土允许内部有裂。说“美国人如何”，就是在把内战前的庄园主、码头上的爱尔兰工人、边疆的农夫、剑桥的教授，当作同一种东西。土的说法恰恰相反：它要求你看清谁是哪一块，哪里是缝。

第三，民族性不回写，土会回写。说“本性”，就是说它不变；说“土”，就是说方法长出来以后，会改变土本身。这个要点，是第11章的主角。

再补一句：这三条区别，也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本书里说“土是缝的”，是一个对土的说法，它同样要接受检验。如果有人拿出证据，证明某一块料子在某个时期其实压过了其他各块、成了事实上的“唯一的土”，我们就要改口，改成“在那个时期，这片土上的缝线偏向了哪一边”。

所以本书的写法是：永远带着年份、地点和具体的人说话；一旦发现自己要写“美国人天生……”，就停下，改写成“在某一年某一块料子里，……”。

我们要做的，是回到接缝，看接缝处实际上长出了什么。

这里先给一个预告，免得读者在下一章里迷路。接缝处，大概会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各过各的。接缝两边互不干涉，各有各的会堂，各有各的节日。这在美国确实发生了：教堂林立，街区分明。

二是互相借。接缝两边偶尔借一点对方的东西，一道菜、一个词、一种办事的样子。

三是共守一个最低的程序。不要求信同样的东西，只要求在公共的事情上遵守同样的办法：开会按什么规则投票，合同按什么格式签，铁路按哪个钟点开。

这三种情形里，前两种是“土的内部的事”，第三种是“土与土之间的事”。而实用主义这种哲学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它把第三种情形，写成了一套哲学。

用老街的话说，这三种情形天天都在发生。烩面馆的老板各过各的年；米粉店老板娘学会了在烩面里加一点自己的辣；街上的人开会、记账、排班，则全按同一份写在墙上的“街规”办。三层事，每一层有每一层的样子，街却没有因此散掉。

这三种情形，有轻重之分。第一种和第二种，土可以自己消化，不需要哲学；第三种，是需要有人说一句“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否则人们会觉得，大家守的规矩，凭什么压在各自的信仰之上？实用主义，给了第三种情形一个说法：不用凭什么，只要有效。

街上的人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哲学，他们只觉得：话说到头疼的地方，就换一句——“那这事现在怎么办？”这一句换得顺口，几乎成了街上的口头禅。一个口头禅用了十年，就不再是口头禅，而是一种看事情的习惯。

◆ 9.5　小结：几块料子，没有共同的“为什么”

这一章讲的是土，还没有讲哲学。六块料子——教会、学院、边疆、移民、工业、创伤——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为什么”；它们被缝到一起的那几十年并不长，缝线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更早的来历。所以“美国是什么”这个问法问错了，该问的是：这片土怎样一层层缝起来，缝线处长出了什么。

判词：**一片缝起来的土，来历不止一条，条与条之间没有共同的“为什么”；它们之间能共守的，只有一套“怎么办”**。

这就是下一章要说的：在一片缝起来的土上，什么东西可以被统一，什么不能。答案已经有了预感：能统一的，只有路。

◆

10

第10章

只能统一路

◆ 10.1　共守程序

那条老街每个周末有“赶集日”。街中间划出一条白线，线内的摊位按先到先摆的次序，收摊要清地，不许占别人的门口。这套规矩，是怎么来的，已经没人说得清了。可凡是在这条街上摆过摊的人，都守它：福建的、湖南的、新疆的，无一例外。

有一回，一位新来的摊主占了线外一尺。旁边的人没吵没闹，只是默默地用脚把他的箱子往后踢了一尺，他自己就明白了。

你看这件事有多省力。没有人问：“你信不信这条线？”没有人说：“这条线凭什么是白色的？”也没有人要求这位摊主先承认全街人的共同价值。大家只是按“线”办事。

一片缝起来的土上，最省力的共识，是程序。

这个道理在美国史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前面讲过，1791年的第一修正案不设国教。这一条的深层含意不是“反宗教”，而是一个程序性的安排：国家不问你信什么，只管你在公共事务里怎么办事。你可以信神，也可以不信，可以信这个神，也可以信那个神；但你在法庭上要依法陈述，在选举里要依法投票，在合同里要依约履行。

宪法本身，也是一套“怎么办”。它很少讲“人应当是什么”，却用大量篇幅规定：国会怎么立法，总统怎么选出，法院怎么审案，修宪要几分之几的票。它是一份办事程序的说明书，不是一份价值观的宣言。（《独立宣言》有价值观的语言，那是另一份文件，而且它的“人人生而平等”，在当时同样被奴隶制所否定。）

学校也是一例。1837年起，霍勒斯·曼出任马萨诸塞教育委员会的首任秘书，推动“公共学校”，主张让不同家庭的孩子进同一类学校。这个主张里有一层很实际的盘算：这些孩子的父母信的神不同、说的话不同，但如果让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同一套读写算、同一套守规矩的办法，将来在同一个镇上办事，就能办到一块。学校，成了缝线的一种。当然，它的实际运转比这个理想要曲折得多，不同教派对学校里读哪一本《圣经》，还吵过很多年。可吵的方式也有意思：吵到最后，常常是各方退一步，把课堂上能教的“办事的东西”留下，把“信什么”还给家庭和教会。

再往下看，铁路的钟点是一例：1883年11月18日，各铁路公司实行标准时区，不是因为大家同意了“时间的本质”，而是因为再不统一，火车要撞车。商业上的合同法，度量衡，会计准则，后来的各种技术标准，一路延伸下去，形成了一张越来越密的“办事的网”。

法律的样子，也是同一个路数。美国沿用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很多规则不是由一部大法典从上往下规定的，而是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由法官按先前的判例一步一步判出来。每一个案子，只回答眼前这件事“怎么判”；一路判下来，规则像一条路那样被走出来。这一点我们在霍姆斯那里已经看到了苗头。

这张网的特点是：它不问你从哪来，只问你的事怎么办。对一片缝起来的土来说，这是几乎唯一的办法。

我们为什么说“几乎唯一”？

设想另外几条路。一是共信一个上帝。如果全国人都信同一个神，那神就是统一的底。可是这片土从一开始就有好几个教派，随后又来了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后来的佛教徒、穆斯林；谁也无法让别人改信。二是共守一个祖宗。如果全国人都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祖宗就是统一的底。可这片土上的人祖宗各异，还有一大批人被迫来到这里，祖宗的墓地在大洋另一边。三是共有一个故土。可边疆那块土，是从别人手里拿来的；移民的土，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

这三条路，都走不通——至少不能靠自然而然。因此，剩下的只有第四条：共守一套办事的办法。

程序对“有意义的事”，态度是客气的回避：它不说你的意义是错的，只说这里不处理。法庭不会判一个人信得对不对，只判他有没有违反合同；学校可以教数学，但对“人为什么活着”，各个教室里的老师通常闭口不谈。这种回避，在多源的土上是体面，是一种相互尊重。可日积月累，被回避的东西会自己找出口，后面的章节会看到它们找到了哪些出口。

程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值得说足：它能把吵架装进去。两个互不服气的人，如果有一套大家认的程序，吵架就有了出口：到法庭上去，按规则吵；到选票上去，按规则数。吵输了的人，可以回家继续骂对方，但不必拿刀去街上。对一片刚刚打过一场内战的土来说，这个好处是命根子。

可程序也有一个代价，现在先记下，后面会反复回来：程序里装得下“怎么办”，装不下“来历”。一个法庭可以判一桩土地纠纷，却没法在判决书里写进这块地对一个家族意味着什么。程序越精致，来历越难进场。

这里要小心，别把这个说成“美国人很务实”。我们不是在夸美国人，也不是在批评。我们只是在说：当土是缝起来的、没有共同的更深的“为什么”时，社会要想转得起来，被迫把全部的共识压在“怎么办”这一层。换一片土，在同样的处境下，大概也会这样。

用SDE的话说：S（显露出来的样子）是多样的，教堂各异、街区各异；E（土）是缝起来的，来历不通；那么能被统一的，只剩下 D（差异序列）——一件事怎样一步一步做下去。**统一的D，成了缝起来的土的“公共的骨架”**。

这里已经埋下了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线头。回头想想，皮尔斯、詹姆斯、杜威三个人的哲学，各自统一了D的哪个部分？统一了D1，也就是意义：创造、幸福、自由。这是在“怎么办”之上，又往里去了一层——不光是“怎么办”，而是“办事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他们的哲学为什么在这片土上，特别容易生根：因为土已经在等着一个“只谈路”的说法，而他们给了一个更精致的版本。

不妨把共识分成三层来看，看缝起来的土上，哪一层剩得下：

第一层，共同的“为什么”：我们信同一个神，认同一个祖宗，相信同一个终极的好。这一层，缝起来的土基本没有。

第二层，共同的“怎么办”：开会怎么表决，合同怎么签，钟点怎么对。这一层，缝起来的土上有，而且越来越密。

第三层，共同的“办成什么”：我们要把这条街、这座城、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一层介于两者之间：有时靠一场战争、一场危机、一个共同的敌人，暂时拧成一股；平常日子里，则吵得最凶。

实用主义要做的，恰好是在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架桥：用“怎么办”的方法，去回答“办成什么”。这座桥搭得好不好，是后面几卷的事；这里只需看到，第一层的缺席，是它整个出发点。

◆ 10.2　熔炉与拼盘

老街上每年春节前，有一次“联欢会”。每家出一道菜，摆在街口拼起来的长桌上。福建老板端来海蛎煎，米粉店老板娘端来酸辣的凉拌，河南的烩面馆端来一大盆羊肉汤，新疆师傅端来刚出炉的馕。大家边吃边夸，吃完收拾桌子，各回各家。

假如有人说：“咱们这条街，已经融成一家人了。”街上的人会笑。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每道菜还是原来的菜，每个人的年夜饭还是回家各吃各的。联欢，是联，不是融。街上的老人说，融掉了，就没有味道了。各家的菜，各有各的盐。这话朴素，却比许多理论说得准。

这也是为什么老街上的人，提到彼此时，从来不说“我们都一样”，而说“我们住在一条街”。前一句要求去掉差别，后一句只要求并肩；前一句很难做到，后一句每天都在做。

“大熔炉”这个词，在美国的历史里有它自己的来历。1908年，一位英国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写了一出戏，剧名就叫《熔炉》。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到美国的俄国犹太青年，他满怀热情地宣布：美国是上帝的熔炉，欧洲所有的种族都在这里被熔化、被重塑。这个词后来广为流行，成了美国人讲自己时最爱用的一个比方。

可是这个比方，从来没有真的做到过。熔炉里要熔的，不是所有人。非洲裔、原住民、亚洲移民，长时间被排在炉子外面。熔进去的，也不是对等的熔：新来的人被要求放弃自己的语言、饮食、名字，变成一个叫“美国人”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的模子，常常是先到者的模子。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有人提出另外的比喻：沙拉碗、拼图、马赛克——大家在同一只碗里，但各自保持自己的样子。

看看具体的事就明白了。十九世纪，德语区移民在中西部办了自己的报纸、教会和学校，一些地方的孩子从小用德语上学；爱尔兰人的教区、意大利人的互助会、犹太人的会堂，都是各自的圈子。后来，英语被越来越明确地当作公共生活的语言，学校里的教学语言也逐渐收紧。语言，成了公共那一层的“办事语言”；母语，则退回到家里和教堂。这是缝线怎样在日常里被拉紧的一个样子。

我们不去评判哪个比方更对。我们要抓住的是：“熔炉”这个说法本身，是一种愿望，而不是一种事实。它说的是：希望所有的料子都化成一块。实际发生的，更像是缝：公共事务上的程序是共同的，私人生活里的老家是各自的。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深的分工：公共的，是路；私人的，是土。

你在法院里、在选票上、在工厂里，遵守的是同一套办事规矩；你在家里、在教堂里、在年夜饭上，保留的是你自己那一块土。两边并行不悖，彼此不要求对方改变。这套分工的好处，是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不被打扰的土；坏处，是这块土和公共的路之间，没有一座桥。

回到实用主义。它的特点正在于：它只管公共的那一层。皮尔斯谈科学家共同体如何达成一致，詹姆斯谈个人如何在信念上做选择，杜威谈社会如何通过民主解决问题。三个人谈的，都是“怎么办”。至于每个人那块私人的土——他为什么信这个、他的祖宗是谁、他的老家有什么习俗——这是留在抽屉里的，哲学不管。

后来的罗蒂，在站上第178号书里，把这个分工说得最干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在两个抽屉里。本书在第四章已经讲过：这个抽屉，是三条意义律分家的制度化。现在我们可以再往下说一层：这两个抽屉的划分，不是罗蒂想出来的，而是缝起来的土长出来的。他只是把土里的事实，写成了一套理论。

这对我们有什么要紧？要紧在这里：如果公共层只谈路，私人层又被锁在抽屉里，那么土的深处——那些各自的来历——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公开谈论、被认真对待。它们不是被禁止，而是被放在了“不属于公共讨论”的那一格。

有人会说，这不是正好吗？各过各的，互不打扰，不正是自由吗？这话在公共层上成立，在深处不成立。因为深处的东西——来历——不只是用来“各自保留”的，它还是人与人之间能不能真正认识彼此的材料。一条街上五户人家，如果除了“早上谁扫地”以外，谁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那样过年、那样送别、那样教孩子，那么这条街虽然安静，却是一条互相陌生的街。

大熔炉想把它们熔掉，拼盘想把它们留住，但两者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都没有给“土的来历”一个公共的位置。熔炉把来历烧掉；拼盘把来历放在各自的格子里。能够让不同来历彼此认识、彼此翻译的“谱系的公共领域”，两种比喻里都没有。

举一个小处。老街街口的公告栏上，贴着一张街道办的通知，只有一种文字；而在各家铺子的门口，贴着的是五种不同的东西：红纸春联，某种经文的卷轴，写着老家地名的老照片，一张手绘的家谱，一个小小的神龛。公告栏是公共的，门口是私人的。两边都很认真，却没有哪一处，是专门让邻居们互相读一读对方门口的东西的。

这个缺口，是卷九要回来补的。现在先记住：缝起来的土，缝线在公共层，土还在私人层；两层之间，缺一座桥。

◆ 10.3　一条河，还是一件百衲衣

老街的下水道，是一段一段接起来的。靠街口那一段是二十年前的老水泥管，往里是十年前换的塑料管，街尾一截是去年才修的，管径还不一样，中间用接头硬接。每回大雨，水从街口往里灌，哪一个接头漏，哪一家的铺面先进水，街上人都清楚。

这条下水道，不是一条河。河有一个源头，水顺着一个河道流下来，越汇越大。下水道是一件百衲衣，是几个年代、几家施工队、几种材料硬接起来的。

站上第202号书讲詹姆斯，用过“四条河汇于一人”的比方：詹姆斯的哲学有好几个来处，在他一个人身上汇到了一起。（这里只借它的比方，哪几条河，请读者去看那本书。）这个比方很美，也很准，讲的是一个人的思想怎样有多个源头。

本书想把这个比方往前推一步：从“一个人身上的河”，走到“一片土上的缝”。

河与缝，有三点不同。

第一，河会越汇越融，缝却一直留着缝。四条河汇到一个人身上，水混到了一起，分不出哪一滴来自哪条河；这是个人心灵里的融合。可一片土上的几块料子，被缝在一起以后，针脚还在：教会还是教会，实验室还是实验室，边疆的拓荒者后代和后来的移民街区，到今天还是各有各的社群。

第二，河有一个共同的出口，缝却没有。四条河汇入一个人，那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一个方向。一片缝起来的土上，没有一个中心。没有“那个人”，没有“那颗心”来统一所有的料子。

第三，河的汇合发生在一个人的内部，缝的发生在许多人之间。一个人把几个源头消化成自己的东西，需要一辈子，但终究有一个“自己”可以消化。许多人之间的缝，没有“自己”：没有人替全体消化，只能靠约定。

打个比方。一个人学做菜，跟过三位师傅，一位教他炒，一位教他炖，一位教他调味。三家本事在他手上，终于长成了“他自己的做法”，这是河。可如果是一间食堂，里面三个师傅各管一个灶，同时给几百人做饭，三个灶之间永远是三个灶，要保证出菜顺利，只能约定几点开饭、哪个窗口出哪样菜——这是缝。

再换一个说法：河靠“流”汇合，缝靠“约”拼合。流，是水自己往低处走，不需要谁批准；约，是人一条一条商量出来的，每一条都可能被撕毁。靠流汇成的东西，一旦汇成，不容易散；靠约拼成的东西，每天都得有人去守。这是为什么缝起来的土上，“程序”显得格外要紧：它不是一种偏好，而是缝线本身。

所以，在个人身上看到的“多源”，和在整片土上看到的“多源”，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河”，后者是“百衲衣”。

这个差别，对理解实用主义至关重要。詹姆斯一个人可以把几条河汇在自己身上，长出一个有核心的哲学；而当他的哲学被拿到整片土上去用的时候，那里没有一个“自己”可以汇，只有一件缝着的衣服。他个人的“过得好”，一旦被当作公共的准则，就要面对一个他自己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一块料子的“过得好”，和那一块料子的“过得好”，不是一回事。

皮尔斯的情形也相似。他的“共同体”，是一个没有内部接缝的探究者共同体——大家用同一套方法，向同一个方向走。可真实的土上，科学家共同体本身就是缝起来的：它被经费、国别、学派、语言切成许多块。

杜威更是如此。他的民主，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可真实的社会，各块料子对“问题是什么”的看法，常常就不一样。

这一点值得停一停。皮尔斯讲共同体，讲的是“最终大家会同意”；詹姆斯讲个人，讲的是“我这样信，我才活得下去”；杜威讲社会，讲的是“我们一起把问题解决”。三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一个有中心的单位：一个共同体，一个个人，一个协作的社会。而真实的土上，这样有中心的单位总是少数，更多时候是几个单位挤在一起、谁也不服谁。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错位：三个人的哲学，都在个人尺度上讲得很好，一旦放大到“缝起来的土”，就都遇到了接缝。他们的办法，是把接缝看成“待解决的问题”，用“怎么办”去磨平它们。可是接缝并不都是问题——有的接缝是来历，是谱系，是一块土保有自己的方式。

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要继续往下看。

先把这一节的意思再收紧一下，免得有人听成别的话：我们没有说三个人“不懂”多元。恰恰相反，詹姆斯是美国哲学家里最爱谈多元的一位，杜威也一生都在谈共同体里的不同声音。我们说的是另一件事：他们的多元，是“路上”的多元，不是“土里”的多元。路上可以有很多办法、很多试验、很多声音；可是土里的接缝——为什么这样过年，为什么这样送别——他们的哲学没有给它们安排位置。这不是他们的疏忽，而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土，没有逼他们去想。

◆ 10.4　路管不了的事

老街上的一位老人去世了。是烩面馆老板的父亲，在街上住了二十多年。

街上马上动起来：有人去帮忙借桌椅，有人去通知殡仪的车，有人把门前让出来停车，街道办按规矩开了证明。这一套“怎么办”，转得极顺畅，几个钟头就办好了。

可到了“怎么送”这一步，街一下子安静了。老人的儿子要按老家的方式办，三天的仪式，有一整套讲究；街对面的邻居里，有人觉得吵，有人觉得不合规矩，有人悄悄塞来红包，有人念了一段自己信仰里的经文。街上没有一种“公共的送别”可以拿来用。每一家，都只能在自己的抽屉里找自己的办法。

这件事说明了路的边界：**路能办一切“事”，却办不了“事”对人意味着什么**。办丧事是事，送一个人走是意义。前者可以统一，后者统一不了，也不应该被统一。

用我们的话说：公共的程序是D这一层的东西，可是人活着，最要紧的那些时刻——生，老，病，死，婚，别——靠的是E的深处：祖宗，故乡，神，邻里几十年的脸。缝起来的土，会让公共层变得特别灵活，也会让深处变得特别孤独。

这里正是后面几卷的一个入口：公共的路越顺畅，深处的意义越没处安放。到那时，人们要么回到自己的抽屉里，要么把深处的事也拿到路上来办——后者就会出问题。因为路只会问“有什么用”，而一个人送别亲人的那三天，恰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换一个小例子看这个结构。一户人家想在老街上给孩子办满月酒。街上的“怎么办”一应俱全：包间怎么订，桌数怎么算，门口能不能摆摊位，邻居的音响要不要提前打招呼。可是满月酒“为什么要办”，办给谁看，请不请某位多年不来往的亲戚，这些话不在任何一份街规里。它们属于这家人几十年的来历，只能在这家人自己的饭桌上商量，商量不拢，街规一个字也帮不上。

会议桌是路的语言，家里的饭桌是土的语言。在一片习惯了只用路说话的土上，凡是只能用土说话的东西，都很难进场，也很难被人听见。这不是谁的恶意，而是语言本身的分工：路的语言擅长精确，土的语言擅长深，二者之间没有现成的翻译。

◆ 10.5　三个人各踩的一块

一个新来的外乡人，到老街开店的头一个星期，会问三件事。

第一件，这儿的货怎么走，哪家的进价便宜，哪样东西卖得动——他问的是，能做成什么新东西。

第二件，街坊处不处得来，吵架的时候谁会帮忙，生病了有没有人来看一眼——他问的是，日子过不过得下去。

第三件，街道办管得严不严，摊位能不能自己定，能不能自己说了算——他问的是，我还是不是自己的主人。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我们都知道，它不太离谱。任何一个刚刚落脚到缝起来的土上的人，大概都会在这三件事之间打转。

三件事不分先后，也谁都不会排在第一位太久。新来的人头一个月急着赚钱，第二个月会开始想心里踏不踏实，第三个月就会为了能不能自己做主而跟人吵起来。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三个主义，只觉得是日子。可如果有一个人，在这条街上专门替他想这三件事，并且告诉他“其实只有一件事最要紧”，他就会很容易地被说服，因为这三件事原本就在他的日子里等着。

回头看实用主义的三个人。他们各自踩的，恰好是这三件事里的一件。

皮尔斯面向将来，问的是“能长出什么”。他背靠的，是学院和实验室那块土——做研究的人，总是在问“下一步能得到什么新东西”。

詹姆斯面向自我，问的是“我怎么过得下去”。他背靠的，是教会与个人信仰的那块土——一个个具体的灵魂，在世上寻找安身之处。

杜威面向社会，问的是“我们怎样一起做”。他背靠的，是民主、集会、学校与边疆社区的那块土——一群互相不太熟的人，要一起把事办成。

在第四章里，我们提过一个问题：这三个方向，是否恰好对应着E的三界——理念、自我、现实？是巧合，还是土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猜想，只作猜想，不作结论：

也许不是巧合。缝起来的土，有几块料子各自擅长一件事：学院擅长“想”，教会擅长“信”，社区与边疆擅长“做”。这几块料子，在不同的人身上留下不同的深浅。皮尔斯是在学院里长大的人，詹姆斯是在信仰危机里长大的人，杜威是在小城社区与教育实践里长大的人。每个人从自己踩得最深的那一块土里，取出了一条律。

这个猜想如果成立，意味着一件更深的事：三个人的分家，不是他们三个人性格不合，而是土的接缝，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各自露了出来。他们各自统一的律，是他们各自脚下那块料子的律；他们三人合起来，恰好把整片土的几块主要料子，各占了一个角。

但这里必须设一道防线，免得读者把话听成别的意思。

第一，我们没有说，学院“就是”理念界，教会“就是”自我界，社区“就是”现实界。三界是纠缠的，每一块土里三界都有；我们只说，每一块土侧重让人在其中一界里用力。

第二，我们没有说，只有这三块土，也没有说这三个人只有这一块土。前面几章已经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另外两条律的痕迹。皮尔斯有他的爱与玩味，詹姆斯有他的新颖与冒险，杜威有他的艺术与满足。土是多源的，人也是多源的。

第三，这个猜想要靠具体的发生去检验，不是靠一个漂亮的对应。如果我们顺着这三个人的生平去查，发现皮尔斯关键的想法根本不来自学院那块土，詹姆斯的幸福律根本和教会的土无关，杜威的自由律根本与社区实践无涉，那这个猜想就错了。接下来的章节，会拿具体的事实去试。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问：为什么是“三个”？也许有人会说，第四个、第五个人也能被算进来。完全可以。这里的三个，只是在最有影响的人物里，看得最清楚的三个。一片缝起来的土，有多少块主要料子，就可能有多少种“统一的路”；只是其中三条，碰巧被三个才华极高的人写得最透。这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一个土的必然，两者缠在一起，拆不开。

同时还有一个更要紧的话要说明白。我们说“只能统一路”，并不等于说“路只能被统一成一条律”。在美国这片土上，路确实被统一了，但被统一成了三条——创造的、幸福的、自由的——三条各自把别的两条收在自己名下。三条路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第四章已经看到，三个人各守各的律，谁也不让谁）。

这就是缝起来的土长出来的东西：**公共层只剩下路，而路又分成了三条各自坚持的路**。土里有接缝，路上也有接缝；接缝在底下，分家在上面。

◆ 10.6　小结：缝在下，路在上

两章收成一句话：

美国的土是几块互不相通的料子缝起来的，料子之间没有共同的“为什么”，只有共同的“怎么办”；实用主义在这片土上，把共同的“怎么办”写成了一套哲学，而这套哲学又因为土的接缝，分成了三条各自坚持的路。

用三个方程的话，把这一章再说一遍：显露出来的样子（S）很多，教堂、街区、行当、口音，各不相同；纠缠着的土（E）是缝的，来历多条且互不相通；那么这片土上差异序列（D）的组织，就没有“从土里自然长出一条路”的条件，只好由人去约定一条路。约定出来的路，是被缝起来的土逼出来的路，不是土自己长出来的路。三个方程里没有哪一维是给定的，这里的 D 是被另外两维的“多”逼成了“一”。逼出来的一，和长出来的一，后果是不同的；这一点，要等到后面几卷才看得清。

这个判断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有人认真查了美国公共生活的历史，发现大多数重大的公共共识，其实是在“为什么”这一层达成的——比如全体人民在某个共同的终极理由上长期一致，而不是靠程序和后果——那么我们这一章就说错了。我们的看法是：即便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比如战争年代，那种一致也是暂时的，战争一过，又回到了“怎么办”。

请注意这句话里没有的东西：没有“美国人天生务实”，没有“美国文化的本质”，没有“这个民族如何如何”。我们只说了一件事——土是怎样缝起来的，缝起来的土上什么能共享、什么不能。

回到导论里那座澡堂。老马答不出“说话在哪儿不能说”，是因为澡堂里那段时间的用处，本来就长在一片有来历的土里：几十年的邻居，几十年的下午，一代人的脾气。拆掉它，不是拆掉一座建筑，是剪断了一条谱系。在一片统一“路”的土上，这样的东西最容易被问一句“有什么用”，而且最难答。

下一章要问的，是这片土与哲学之间的另一个方向：土长出了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又回头做了什么？方法写进了学校，写进了法庭，写进了报纸，然后一代一代的人在这个方法里长大，这片土就越来越牢地认定：只谈路，是正常的、自然的、本来就该如此的。

土长出了方法，方法又写回了土。这一圈转完，缝线就成了骨头。

在进入下一章之前，请先留着三句话，它们是这两章全部的意思：

第一，美国的土，是缝的，不是熔的；每一块料子都有自己的来历，料子之间没有共同的更深的“为什么”。

第二，在这样的土上，能共享的只有路：办事的程序，检验的办法，后果的账本。

第三，这不是一个民族的天性，是一段可以查年份、查地点的发生；它既然是发生的，就会被回写，也就可能被改写。

后面要问的是：路被统一之后，统一的力量往哪里去了？

◆

11

第11章

土、回写、沉淀：一片缝起来的土，怎样长出自己的办法

◆ 11.1　新城区：先有车，后有规矩

上一章说，一片由多种来源缝起来的土，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所以大家能共同遵守的只剩一件事：路怎么走。这句话读起来有点抽象。我们先不去美国，先到一个新城区的路口站一会儿。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座城市的真事，但谁都见过它的影子。

设想一座南方城市在城东开了一片新区，叫它东湖新区。路是先修好的，楼是陆续交的，人是一批一批搬进来的。头一年有个很普通的毛病：有几个路口，红绿灯还没装。不是谁偷懒，是审批、预算、施工队的档期各有各的节奏，灯排在后面。

可车不等灯。楼盘一交房，车就来了。

头几天的早高峰，路口上演的是一种很安静的僵持。两辆车同时开到路口，各自慢下来，停住。左边那位探探头，右边那位也探探头。有人抬手招一招，意思是“你先”；对面没看懂，也抬手招一招，意思是“不不，你先”。后面的车开始按喇叭。

一个星期以后，路口自己长出了一套土办法。谁的车头先过路口中线，谁先走；大车让小车；从支路出来的让主路上的。没人规定，也没人宣布，是一次次的僵持、一次次的碰头里，大家各退一点、各进一点，慢慢摸出来的。路口边上有个卖早点的摊子，摊主老赵每天天不亮就在那儿。他不是协警，可他站的位置

正好能看清四个方向，看见两辆车僵住了，他就随手一挥，“这边走”。久了，司机们竟然开始等他那一挥。

半年下来，这个路口出了十几次擦碰。其中最让人记住的一次，是两辆车都以为对方会让，同时往前一松刹车，撞在了一起。没人受伤，但从那天起，路口多了一道白线，后来又多了一盏灯。

再往后，事情就一层一层往上叠：交警队派了协警，灯装好了，转弯的地方画了导向线，附近开起了一家驾校。

驾校的教练姓樊，大家叫他老樊。他教科目三，头一堂课讲的不是怎么打方向盘，而是路口。他对学员说：“你们以为路口是教你怎么开，其实路口是教你怎么让。”

学员里有个爱较真的小伙子，问：“凭什么我要让？我先到的呢？”老樊答不上一个大道理。他只能说：“你不让，他也不让，咱们谁都动不了。你让了，大家才动得起来。”

小伙子想了想，没再说话。他把这句话记进了脑子里，后来考试，路口那一题他答对了。

让我们把这个路口的发生，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别看它小，三原理里最要紧的那件事，它全有了。

先看“规矩”是怎么露头的。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是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眼神和手势，然后是“车头过中线先走”的土办法，然后是早点摊老赵那一挥，然后是白线，然后是灯，然后是写进条文的“右转让直行”，最后是驾校教材里的一道考题。每一层都不是上一层的“完成版”，而是上一层又碰了几回壁以后，露出来的下一个样子。我们今天在路口看到的那盏灯，只是这条显露谱系此刻的一个截面。

再看是什么把它一层层推出来的。是一串很小的差异：这次僵住了，那次抢了道，上周擦了一下，昨天差点撞上。每一次碰撞的结果，都回头改了下一次进路口的人的做法——这就是回写。如果碰撞只是被当作“倒霉”，只是各自骂一句就算了，规矩是长不出来的。

最后看土。谁在这个路口开车？有从老城区搬来的，习惯窄巷里你让我让；有从外省来打工的，老家的路口根本没这么多车；有开网约车的，每一分钟都是钱；有刚拿驾照的新手，连方向盘都握得发抖。这些人和这些车、这个没有老街坊的新区、赶早高峰的那股急，缠在一起，才是这个路口真正的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这个路口就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办”，因为老家各不相同。

所以，能共守的只有一件事：路口怎么走。你从哪里来、信什么、为什么赶时间，路口不问。它只问：你的车头在哪儿，你的灯亮不亮。

这就是上一章那个判断在路口上的样子：**缝起来的土，只能统一路，不问土。**

可是故事还没有完。规矩长出来以后，它不会老老实实待在路口上。

几年以后，东湖新区来了第二批司机。他们买车的时候，路口早就有了线，有了灯，有了摄像头。他们去驾校学的，是条文：红灯停，绿灯行，右转让直行。对他们来说，这些不是“摸索出来的办法”，而是“开车的样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没有灯的路口，也想不到有一天，两个陌生人会在一片空白里，靠眼神一点点摸出彼此该怎样让。

老赵的早点摊也不在了。新的规定说，路口不该有摊，也确实该没有。路口越来越整齐，事故越来越少。这是好事，应当说清楚，这件事里没有谁做错了什么。

但你也可以看出，土变了。眼神、手势、一挥手、僵住以后的临场商量，这些东西不再被需要，也就不再被养。第二批司机如果有一天开到一个灯坏了的路口，他们中不少人会比第一批更慌——因为他们的土里，已经没有那一段“摸”。

把这一圈写成一句话：

规矩不是谁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司机天生就有的；它是路口上的碰撞一次次写出来的，写出来以后，又一次次写进了开车的人。

土长出办法，办法写成规矩，规矩又沉回土里，成为下一批人的“本来如此”。这一圈，本章叫它“土—回写—沉淀”。

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美国那片缝起来的土，有没有走过这样一圈？它沉下去的，是什么样的规矩？

要回答，得先看一件比“先到先走”更难的事。路口上要分的只是先后；而在一片缝起来的大土地上，要分的，是人活着“为了什么”。

◆ 11.2　路口上的三个念头：土先长出的倾向

东湖新区的路口，除了“先后”，其实还有第二层事情，只是平时不容易看出来。

设想早高峰，同一个路口，同一个司机，在一个早晨里，脑子里会先后冒出三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是：今天要开得有水平。他刚换了新车，想练练跟车的距离，想把一个总是蹭到的车位倒进去，想着哪天自己能像老樊那样，一伸手就知道前车要不要变道。他想把一件原来不会的事弄会。

第二个念头是：开得踏实就好。孩子在后座睡着了，他不想抢，不想争，只想平平稳稳把人送到，别出一身汗。

第三个念头是：我自己的车，我自己拿主意。导航说右转，他偏想走左边那条熟路；别人说“这时候别走高架”，他偏不听。

三个念头，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上午里轮流出现。我们不要给人贴标签——不是有三种司机，而是一个人身上本来就有三种“为了什么”。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它们叫做意义的三条律：为了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叫创造；为了自己做得了主，叫自由；为了舒坦高兴，叫幸福。

现在请注意路口的规矩对这三个念头说了什么。

它什么也没说。红灯只管你停不停，不管你是为了练技术，为了安心，还是为了赌一口气。路口只统一了“路怎么走”，三个念头怎么排，是你自己的事。

美国那片缝起来的土，在很早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下面只讲三块大家公认的、可查的场所，不夸大，也不求全。它们是教会、地方议事的场合和实验室，后文统称教会厅、社会厅、科技厅，合起来叫三厅。

一块是教会。美国立国以后，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设立国教，也不得禁止信教自由。这条规定的发生背景，是殖民地时期各块土地上的人来自不同的教派，有的是逃出来的，有的是被赶出来的，谁也不愿意被另一派管。结果是：教会不靠国家养，也不被国家管，各教派靠信众自愿来、自愿捐。托克维尔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访问美国，后来在书里留下了一个常被引用的观察：美国人特别爱结社，大事小事先成立一个会。教会就是这些会里最大的一类。

这个安排有一个后果，是顺着土长出来的，不是谁设计的：教会要留得住人，就得让人“在里面过得好”。讲道里的安慰、聚会里的暖意、遇上难处时有人来帮一把，渐渐成了教会的主要作为。教会这块地方，意义的重心慢慢落在了幸福律上。

第二块是地方上的自治和议事。殖民地时期，各殖民地各管各的，尤其在新英格兰一带，市镇上的事靠居民开会商量。这种商量的习惯，后来一直是美国公共生活的底子。在这块地方，意义的重心落在了自由律上：我们的事，我们自己说了算，谁都不能替我们定。

第三块是发明和工厂。美国宪法第一条里有一款，授权国会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技艺的进步”。条文里用了“有用”这个词。十九世纪后半叶，爱迪生在新泽西的门洛帕克办起一个实验室，后人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一群人在那里专门为了“做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上班。后来的大公司实验室、大学里的研究所，走的是同一条路。在这块地方，意义的重心落在了创造律上。

三块地方，各有各的来历，来历之间没有总指挥。教会的来历是躲避和自愿，议事的来历是殖民地各自为政，实验室的来历是专利和市场。它们是各自长起来的。

可它们都长在同一片土上。土是缝起来的，没有谁的祖宗能代表全体，所以三块地方互相之间有一个默契：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你那一套信什么、为什么，我不过问；我们只在“事情怎么走”上对一对。

于是，意义的三条律，在这片土里先是分了家：幸福住进教会厅，自由住进社会厅，创造住进科技厅。分家的好处很明显——教会不用听实验室的，实验室不用听教会的，大家各自能放开手脚。分家的代价，是以后的事，要等到后面几卷才慢慢显出来。

三块地方分家以后，各自还长出了各自的尺子，这一点也要停一下。

教会里量一件事好不好，问的是：人的心安了没有，难处里有没有人陪。实验室里量一件事好不好，问的是：做出了什么原来没有的东西，别人能不能重复出来。议事的场合量一件事好不好，问的是：程序走了没有，每个人的话有没有被听到，决定是不是大家自己做的。

这三把尺子，各自在各自的厅里都很好使。可是三把尺子之间，没有一把共同的尺子。拿实验室的尺子去量教会，教会“没有产出”；拿教会的尺子去量实验室，实验室“没有温度”；拿议事的尺子去量两边，两边都“不民主”。大家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不拿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也不把自己的尺子递给别人。

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有点像一个小区里的物业、业委会和施工队：各有各的账，各有各的验收标准，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只有出了事，才发现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整件事”的账。

美国路口上有一个很典型的办法，可以拿来对照。四个方向都有停车标志的路口，规矩只有一句：先到的先走，同时到的，右边的先走。这条规矩不问你开的是什么车、赶什么事、信什么教、从哪个州来。它是一片陌生人混在一起的土能想出的最省事的办法：只统一路，不问人。三条意义律在这片土里分家，用的是同一个思路——你们各自想要什么，是你们的事；在公共的路口，只看谁先到。

这里需要立一个规矩，因为这一段最容易被读错。

我们说“土先长出了D1分家的倾向”，说的是一种发生出来的倾向，不是一种“美国人天生如此”的本质。它有来历（上面三块地方各有各的），有范围（只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明显），也会被打破。下一章会专门花一整章讲清这条界线。

现在先记住一点：当路口只有“路怎么走”的规矩，意义就只好各回各家。而这个“各回各家”的倾向，在哲学家们手里，被写成了一套方法。

◆ 11.3　方法：把“各管各的”写成“只看效果”

回到路口。老樊教学员时，有一个办法让人印象很深：他从来不问学员“你为什么想考驾照”。

有人说是为了找工作，有人说是为了接送孩子，有人说就是想自己开一次。老樊都点点头，然后说：“不管为啥，路口的规矩是一样的。咱们看的是，你的车到了路口，能不能让、能不能停、能不能走。”

这是老樊的一个朴素方法：别管你为什么来，只看你在路上怎么走。它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理由，要是先把理由问清楚、排整齐，课就别想上了。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东部，几个人面对的是一个很像的局面，只是大了无数倍。

这些人里，有的在做测量和科学研究，天天跟数据、跟仪器打交道，受不了别人拿一个说不清的“本体”来跟他讲道理——这就是皮尔斯那一类人的处境。有的在研究心理学，兼着关心宗教经验，要面对的是：有人信得安稳，有人不信也活得好，怎么看待这件事——这是詹姆斯那一类人的处境。有的在办学校、谈民主，面对的是一群来历各异、想法各异的孩子和家长，怎样一起办学——这是杜威那一类人的处境。

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厅里，面对不同的人，可碰到的是同一个难题：大家的“为了什么”各不相同，没有一个共同的根可以让所有人都点头，那还怎么一起往前走？

他们给出的办法，很像老樊：别问根，别问为什么，看效果。一个想法有没有意思，看它引出什么做法和后果；一个信念是不是真，看它在生活里好不好使；一个主张好不好，看它能不能把一团乱的处境理顺。

我们要抓住的是这一步的结构。这不是三个聪明人坐在书房里，凭空想出了一套新哲学。是土里有一个张力在积累：

一边是三条律已经分了家，各自在各自的厅里往前走；另一边是这片土缝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的根，大家又不得不共处。这两样顶撞着。用三原理的话说，是D和E顶撞——路的方向各走各的，土却是缝成一块的——它推动的是S，也就是显露出来的样子：一种新的、不问根、只看效果的说话方式和做事方法，在这片土里显了出来。

注意，这一步用的是三原理的前两拍：张力一点点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第三维变了形。变形的结果，就是后来被叫做实用主义的那套东西。

这也解释了一个有意思的事：为什么三位奠基人，各自靠近一条律，但又能被放在同一个名字下面？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厅里，用的是同一个办法。皮尔斯靠近创造，站在科技厅一侧；詹姆斯靠近幸福，站在教会厅一侧；杜威靠近自由，站在社会厅一侧（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用他们自己的文字证明了）。他们三个，恰好各占了一间。这不是偶然。不是他们商量好了，而是分家的土，需要这样三种人，也长出了这样三种人。

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是在替“美国”说话。我们说的是：他们各自在土里的一个位置上，写下了土里本来已经在发生的一件事——各管各的，只看效果。

写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没有写下来之前，“各管各的”只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有点说不清的事实，大家做着，没有名字。写下来以后，它有了名字，有了道理，有了可以被教的样子。从这一刻起，它就从“土里发生的事”，变成了“可以拿来用的方法”。

◆ 11.4　先有土还是先有方法：同一圈上的两段路

写到这里，一个聪明的读者会提出一个问题：你一会儿说土先长出倾向，一会儿说方法回头加固土，到底谁先谁后？这像不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我们还是回到老樊。

老樊做教练二十多年。他一开始什么教材也没有。他是在一条条路、一个个学员、一次次吓出冷汗的经历里，慢慢知道了：学员在哪个动作上容易慌，哪句话说了管用，哪句话说了反而让人更紧张。他自己说不清，只是越带越熟，一个“门道”慢慢地在手上、嘴上长了出来。

这是一条路，叫沉淀型：先是泡在里面，泡到一定程度，门道清楚了，样子才稳住。泡在里面的时候，样子和门道其实也在，只是微弱，主导的是他和学员、车、路的那一团纠缠。

后来，驾校要扩大，要招新教练，老樊被要求“把你的办法写下来”。他花了一个冬天，写成了一本十几页的小册子：路口怎么讲，倒车怎么带，学员慌了怎么办。册子印出来，新教练照着教，教得很快。

这又是另一条路，叫再创型：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样子，这个样子被拿去改造新的做法，新的做法又生出一个新的场。册子（样子）改变了新教练的带法（路），带出来的第二批学员，又和老樊当年带的第一批很不一样（场）。

同一个老樊，两段路，合成一个圈：先沉淀出门道，再把门道写成样子，样子再去改造新的场。

对美国这片土，也是这样。

第一段路是沉淀型。三厅各管各的倾向，不是某一天有人宣布的，而是一代一代人在教会里、议事里、实验室里泡出来的。这里面，土是主导，路在慢慢铺，样子（那些后来被叫做实用主义的说法）在口头上、在生活里已经隐隐有了，只是没有人把它写下来，也没有名字。

第二段路是再创型。皮尔斯、詹姆斯、杜威把它写成了方法。方法一旦写成，就是一个现成的样子，它拿去改造学校怎么教、法院怎么判、报纸怎么说（路），而这些路一段一段走下来，又生出一片新的土——一片已经习惯了“只看效果”的土。

所以，“谁先谁后”这个问题，换成“哪一条路在主导”，就清楚了：

在方法诞生之前，是土在主导；方法诞生之后，是样子在主导。而且这两段路首尾相接：前一段路的终点（写成方法），正是后一段路的起点（拿方法去改造新的场）。这就是路径首尾相衔，汇成洪流。

这个说法有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地方，也该明明白白说出来。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应该能在实用主义被写下来之前，就在教会、议事、实验室这些地方，看到“各管各的、不问来历、看效果”这种做法的雏形。事实上，托克维尔对结社的观察，专利条款里的“有用”二字，早在这套哲学出现之前几十年就在那里。

反过来，如果我们发现，美国的三厅在实用主义被写下来之前根本不是各管各的，是一个统一的权威在管理一切，而分家是实用主义之后才发生的，那么本书这一章的说法就错了，土的先行就站不住。

我们认为这个检验是过得去的，不过它终究要靠历史学者去细核，这里只是把检验的办法摆出来。

还有一点要提醒。两段路合成一圈的时候，每一次回写，都会让第三维变形。这一圈走了一回以后，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土了。第二次再走，起点就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把土当作一次性给定的东西：它每一圈都被重新做过。

◆ 11.5　方法沉回土：厅与厅，越来越不用对话

东湖新区的驾校，十年以后变了样子。

最初，老樊一个人带着一辆教练车，一堂课一堂课地讲，讲路口怎么让，讲为什么要让。后来驾校做大了，有了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模拟题，每个科目有通过率，每个教练有排名。路口那一题，教材上是一道选择题，四个选项，选对的人拿分，选错的人补考。

没有人规定教练不许讲“为什么”。只是讲“为什么”不拿分，讲“怎么过考”拿分。久了，教练们讲的就越来越是后者。老樊自己也说：“现在孩子们学得快多了。”这是真的：通过率上去了，学员考一次就过的比从前多。

可是有一次，老樊带一个学员走到一个灯坏了的路口，学员停住了，手握着方向盘，说：“教练，这题我没见过。”

我们看到的是方法沉回土的一个很小的样子：方法起初是帮着土里的人解决问题的，后来成了土里的人想问题的方式。人不再从头想“这里该怎么办”，而是先问“这里的办法是什么”。

现在把这个小样子放回美国那片土上，看方法沉下去以后，土发生了什么变化。

前面说过，实用主义是在三厅各管各的土里写出来的方法。方法写下来以后，没有停在书里。它进了教室、实验室、法院、报纸，进了普通人的口头禅——“那有什么用？”“管用吗？”“试试看”。这一段怎样发生，第8章已经讲过，本章不重复。这里只问一个更小的问题：方法回到土里以后，三厅之间的关系变了没有？

变了，而且是朝着一个方向变的：三厅更放心地各管各的了。

教会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只谈安慰与幸福，因为“效果”是好的——信徒过得安心，这就够了，至于这些道理是不是被实验室或议事厅认可，不需要过问。实验室可以更放心地只谈创造与成果，因为“有用”就是理由，至于成果落到哪里，谁享受、谁承担，那是别的厅的事。议事的地方可以更专注地谈自由与权利，因为“程序”就是理由，至于这些程序是不是让人过得好、是不是让社会长出新东西，也是别的厅的事。

这不是谁在故意回避。方法本身就说：别问来历，别问为了什么，只看你这一厅里的效果。

三原理在这里走了第二轮。方法（S）一边说“各看各的效果”，一边三厅里的路（D）却越走越远，越来越需要彼此的东西——教会的人需要科学的成果，实验室的人需要议事的许可，议事的人需要创造的税收和幸福的稳定。方法与路顶撞着。它推动的是第三维，也就是土：土里慢慢长出一种“彼此不问”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沉下去，就成了土的一部分，不再被当作一个办法，而被当作“事情本来的样子”。

这里要立一条公平的话：这个习惯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一片由各种来源缝起来的土，要是每件事都得先追问“你的根是什么”才能合作，早就动弹不得了。“不问来历”让陌生人敢合作，让不同教派的人敢一起办学，让不同国家出

身的人敢在同一间实验室里上班。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社会成就，我们没有理由贬低它。

我们要看的只是它的另一面：什么东西被一起沉下去了？

被沉下去的，是“厅与厅之间怎么对话”这件事的来历。

就像驾校里的学员，只知道路口的答案，不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从一次次碰撞里长出来的。后来的人只知道教会厅管的是幸福，社会厅管的是自由，科技厅管的是创造，仿佛天经地义；他们看不见，这三个厅的分工曾经是一片缝起来的土在一次次僵持里摸出来的办法，不是天上掉下的分配表。

来历一沉，“办法”就变成了“本来如此”。而“本来如此”，恰好是第9章说的形而上学的样子。

◆ 11.6　为什么偏偏是E，最容易被回写、沉淀、谱系化

走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问一个问题：S、D、E三样，为什么偏偏是E承接了这一圈？

回到路口，慢慢看。

路口的灯，是S的一个样子，可以换：红灯换成绿灯，灯杆换成新的，旧线刮掉重画。D，也就是大家走路的办法，也可以换：今天走这条，明天绕那条，新来的导航把一半的车流引去了另一个出口。S和D都容易变。

最不容易变的是司机身上的东西：路口让不让的那股习惯，碰到黄灯时脚往哪儿放的那一下，看到老人过马路时的那一点迟疑。这些东西不在灯上，也不在导航上，它们是在司机和路、车、同行的人、整个新区的节奏缠在一起以后，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叫做土，也就是E。

E为什么会这样？三方程已经把答案放在那里了：E＝H(S,D)。土是由样子和路一起做出来的。每一次灯亮灯灭（S），每一次让路抢道（D），它们的结果最后都落进土里，一点一点地加深，加厚。S和D是前台，E是它们落脚的地方。所以E最容易被回写：任何一维走出的任何一步，最后都会沉进它里面。

举一个更小的例子。设想新区有个路口，黄灯只设了三秒。头几个月，人们看到黄灯，有的刹，有的冲。冲的人多了几回险，刹的人被后车追了几回尾，大家心里都留下了一笔账：这个路口，黄灯就是“快过”的信号。三秒的黄灯（样子），加上一次次险情（路的差异），慢慢把司机的脚养成了一个习惯：见黄就踩油门。

后来交警把黄灯延到五秒。灯变了，可是习惯没有马上变。头一个月里，还是有人见黄就冲，因为土里那一笔账还在。要等新的账一笔笔写进去，旧习惯才松动。

这个小例子里，三方程都在走：灯和险情一起做出了习惯（E＝H(S,D)），习惯又让人看灯、过灯的路数变了（D＝G(S,E)），而变了的路数又让灯的“意思”变了——同样一盏黄灯，在不同的土里，意思不一样（S＝F(D,E)）。三样一圈一圈地互相做，其中最后落脚、最难改的，是那个沉在脚底下的习惯。

E也最容易沉淀。因为土不显眼。灯是红是绿一眼就能看见，路线是左是右一说就明白，可一个司机的习惯是怎样来的，他自己都说不清。越是说不清的东西，越容易被当成“我本来就这样”。沉淀的意思，就是来历被盖在了上面。

但是——这是本书想指出的最要紧的一点——E也最容易被谱系化。

谱系化，就是把一块土的来历一层一层追问出来，写成一部家谱。为什么E最适合？因为E有来历。S和D变得太快，追不上；E虽然看不见，但它是一层一层积累的，每一层都留了痕迹。

过去，给一片土写家谱几乎做不到。原因很朴素：要写一部家谱，得把成千上万条线索——每一个人的经历，每一个机构的变迁，每一场争论的来龙去脉——一件一件收起来，对着看。一个人，一个研究所，一辈子也做不完几个路口。所以，过去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一个大标签代替一部大家谱：“海有脾气”“民族性”。标签不是因为人懒，而是因为当时只能这样。

这一点后面的章节还会回来。眼下只需记住：标签是家谱写不起时的替代品。如果有一天，家谱写得起了，标签的位置就会松动。

设想东湖新区的交警队有一个办法：把十年里每个路口的每一次擦碰，每一次改动，每一次整改的理由，都登记下来。哪一年为什么多画了一道线，哪一年为什么把灯的时间调长了几秒，哪一年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一个转弯。这本册子，就是这个路口的家谱。

有了这本家谱，再有人说“这个路口的灯怎么这么怪”，交警就不会简单一句“改掉”。他会翻出来看：这条看起来奇怪的规矩，是三年前一次事故长出来的；那一条，是两年前一次整改的结果；还有一条，是真正的多余，当初的原因早已不存在。他能分得清哪些是土里长出来的，哪些是可以松动的。

家谱在这里的作用，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知道什么能动，什么不能动。

这也是本书第九卷要走的方向：未来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要让三条意义律轮换运转，不被任何一条独占，靠的不是更多的方法，而是对土的来历有认知。方法可以拿来就用，土却不能。土有谱系，谱系需要去写。

◆ 11.7　小结

本章收成一句话：

一片缝起来的土，先长出了意义各回各家的倾向；实用主义把这个倾向写成了“只看效果”的方法；方法沉回土里，成了下一代人的“本来如此”。这一圈，是三原理的回写走了一遍；它转得最深的地方，是E。

现在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在等着我们。

我们刚才的整个讲法，听上去很像在说“美国人就是这样”：美国人务实，美国人不问来历，美国人各管各的。如果读者带着这种印象合上这一章，那么这本书就掉进了它自己要批评的东西里。

下一章，要专门把这条线划清楚。

◆

12

第12章

不是民族性，是E的发生

◆ 12.1　驾校茶水间里的一句话

驾校的教练休息室里有一把永远烧着水的大铁壶。下午学员少的时候，几个教练围着壶喝茶，说的多半是路上的事。

这天，教练老孙看着窗外一辆别了一路的车，摇摇头，说了一句话：“咱们这儿的人，就是不爱让。”

屋里没人反驳。这句话谁都听过，谁都说过。

新来的教练小陈是外地人，端着杯子笑了笑，说：“我老家那边可不这样。”

老孙说：“那是你们那儿的人素质高。”

小陈想了想，说：“也不是。我老家的人到了咱们这儿的老城区，一样抢。”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这样的对话，在无数个休息室里发生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有意思的。

老樊一直没吭声，这时候插了一句：“你们看那个小伙子——”

他指的是那个爱较真的学员。小伙子这几个月一直在驾校练车，下了课骑着电动车回老城区的家。老城区的巷子窄，两边停满了车，对面来车的时候，谁让谁、谁退谁，全靠眼神、靠喇叭、靠胆子，小伙子在那里是出了名的“不让

人”。可周末他跟着老樊的车去新区考场，一过了那几个有摄像头、有标线的路口，他立刻规规矩矩，该停停，该让让，连黄灯都不敢抢。

同一个人，同一个星期，两种开法。

老樊说：“你要说他是‘不爱让的人’，他在新区就不抢；你要说他是‘守规矩的人’，他在老城就不让。我看，不是人在变，是路口在变。”

他说的“路口在变”，还要再说准一点。不是路口像一只手，从外面把小伙子推成这样或那样。是小伙子和这个路口缠在一起：老城的窄巷里，他的眼神、喇叭、胆子和对面那辆车、两边的停车、街坊的脸熟，一起把“他”显出了一个样子；新区的标线和摄像头里，另一个“他”显了出来。拿走这条巷子，那个抢道的他也就不在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老孙又喝了口茶，说：“那还是路口的人不一样。”

“对，”老樊说，“所以我们得问的是，这个路口的人是怎么长成这样的，而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天生是什么样。”

这个小小的茶水间场景，其实就是本章要讲的事的缩影：**一种“爱抢”“爱让”的说法，如果只停在“这里的人就是这样”，那它说的不是人，而是一个名字**。

现在回到美国。

上一章我们说了一大串：缝起来的土，意义各回各家，实用主义写成方法，方法沉回土。读者很可能已经冒出一个念头：这不就是在说“美国人务实”吗？

这个念头必须当面处理，因为它离我们太近了。

站上第291号书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态度值得认真看。它在附录里明确地不下“美国文明性格”一类的论断——大意是，不拿一个国家的“性格”去解释一种哲学。本书认为，这一步拒绝是对的。说“美国人天性务实，所以有了实用主义”，是一种看起来什么都解释了、其实什么都没解释的说法。

但是，本书也认为，光拒绝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因为拒绝之后，问题还在那里：为什么这套哲学偏偏在这片土上长出来？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组人，在这样的几十年里，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不回答，常识里那个“民族性”的说法就会趁虚而入，像一只空着的杯子，谁路过都往里倒一勺——“美国人务实”“美国人爱自由”“美国人看重效率”。

所以，对于“民族性”，本书的态度是两步：**第一步，不接受它做答案；第二步，必须给出另一个答案**。另一个答案就是E的发生：这片土，是怎样一层一层长出来的；它长出来的东西，又怎样回头改写了它自己。

回到茶水间，这样做的好处是很具体的。

如果老孙的说法是“这里的人不爱让”，那么他要么什么也做不了（人是这样，没办法），要么只能去骂人。

如果老樊的说法是“这个路口的人是怎样长成这样的”，那他就能开始问问题：哪一年没了辅路？哪一年多了一个出口？哪个路口的灯，是不是黄灯时间太短，逼得人必须抢？问到哪里，改到哪里。

同样的道理，用在美国这片土上，就是：我们不问“美国人是什么”，我们问“这片土是怎样发生的”。前者是一个标签，后者是一份可以查、可以改、可以说“别处不同”的家谱。

下一节先讲清，为什么“民族性”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已经认识的东西。

◆ 12.2 “民族性”，是给土贴了一张“海有脾气”的标签

还记得导论里那个渔村吗？村里老人说：“海是有脾气的。”

那句话是怎么来的？翻船的原因有洋流、季风、鱼群、船龄、掌舵人的经验、谁前一晚喝了酒——成千上万根线缠在一起，人看不清也算不清。最省力的办法，是给它一个统一的说法：海有脾气。从此，一切不可解释的事都有了归处。

“民族性”这个词，做的是同一个动作。

美国发生了一场大萧条，人们说，美国人坚韧。美国发生了一场宗教复兴，人们说，美国人虔诚。美国发生了一场科技热，人们说，美国人务实、爱创新。美国发生了一场极端的政治撕裂，人们说，美国人天性爱争。无论发生什么，“民族性”都有话说，而且每一次说的都像是原来的话的正确延续。

这正是形而上学的三个特征，我们在导论里已经认识了：

第一，拿掉来历。“美国人务实”这句话，不告诉你这种务实是哪一年、因为什么、在哪个行当里长出来的，更不告诉你它在哪些地方根本没长出来。

第二，恒定。它说的是“一向如此”，不留变化的位置。

第三，统一。它把几亿个各不相同的人，收成一个“样子”。

所以，“民族性”是S维度的形而上学的一个小号版本。它把一片有来历、缠在一起的土，统一成了一个没有来历、恒定的样子。

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检验，能看出它是不是形而上学，叫作“什么情况下这话就错了”。

如果有人说：“美国人务实。”我们问他：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你就承认这话是错的？

美国历史上有过大规模的宗教复兴，史书里称为“大觉醒”，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灵魂得救聚在帐篷里；有过超验主义的一批作家，爱默生、梭罗，他们谈的是心灵与自然，而不是效果；有过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划算”而投身进去。这些事，一个坚持“民族性”的人，总能把它们收回来：“这也是务实的一种表现”“这是务实基础上的理想主义”。

一个说法，如果无论发生什么都能被收回去，那它说的就不是任何一件事了。它只是一个名字，像“海有脾气”一样。

人们为什么这么爱用这种标签？因为它省力，而且给人一点安全感。

省力，是说它让人不用去查。一个陌生国度的人，一个新来的邻居，一个没打过交道的对手，贴上一张标签，就好像先知道了他怎么想、怎么做。安全感，是说标签让混乱的事有了归处：为什么总出这种事？因为那里的人就是这样。从此不用再追问，也不必再改。

可这份省力和安全感是有账单的。标签一旦贴上，对“别人”，它变成一种轻视或一种崇拜，两者都不需要了解；对“自己”，它变成一种托词，“我们这儿就这样”，什么都不用动。老孙那句“咱们这儿的人就是不爱让”，听着是自嘲，其实是在替路口卸责。

家谱要费力得多。可它给出的东西，恰好是标签给不了的：知道从哪里下手。

本书也必须对自己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们说，美国这片土先长出了“意义各回各家”的倾向，教会管幸福、议事管自由、实验室管创造。读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换了一个说法的民族性吗？”

为了不掉进去，本书给自己立三条规矩，在全书里都要守。

第一条，倾向有来历。我们说教会管幸福，是因为宪法不设国教、各教派要靠自愿留住信众——来历是这个，可以查，也可以反驳。我们说实验室管创造，是因为专利条款和市场把“做出新东西”变成了一份可以谋生的职业——来历是这个。每一个说法，后面都带着一条“怎么来的”。说不出来历的说法，本书不写。

第二条，倾向有范围。“三厅各管各的”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明显的趋势，不是每个角落、每一年都如此。

第三条，倾向可以被打破，而且在这片土里已经被试着打破过。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有“社会福音”运动，一些教会的人走出礼拜堂，去管工厂里的工时、贫民区的住房，这是幸福厅和自由厅试着合在一起。同一时期，有一大批进步时代的改革者，想把科学的方法用到社会问题上，这是创造厅和议事厅试着合在一起。杜威本人，就是这样一批人里的一员。这些尝试，有成有败，但它们说明：分家是倾向，不是定数。

三条规矩加在一起，就把“倾向”和“本质”分开了。本质不问来历，不分范围，不容变化；倾向问来历，分范围，容变化。

用SDE的话说，**倾向是显露谱系上的一个截面**，它此刻是这个样子，前面有来处，后面还会变。而“民族性”，则是把这个截面当作了整个谱系。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会反复说：不谈民族性，只谈E的发生。这不是出于谨慎或客气，而是因为“民族性”这个词的用法，本身就是我们要批评的那一类动作——它把土的来历拿掉，换来一个恒定而统一的样子。

◆ 12.3　用一部家谱，代替一张标签

标签只有一句话。家谱要一层一层写。

老樊在驾校里有个习惯：学员说“这个路口真怪”，他不回答“就这样”，而是拿出一支笔，在纸上画。先画四条路，再标出哪一条是后来修的；先画灯，再标出哪一年装的；再标上那一年发生的那起事故。画完了，学员看着那张纸，嘴里的“怪”字就变成了“哦，原来是这样”。

这张纸，就是路口的同一性谱系：这个路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每一层是怎样来的，又怎样为下一层打了底。

现在我们给美国这片土，也试着画一张。每一层先放一个驾校或新区的小场景，再说这一层在美国的样子。场景是构想的，用来帮我们看清动作；美国的部分只写公认可查的大事，年份拿不准的宁可不写。细节在卷三前面几章和第8章已有，这里只点一句，为的是看清回写怎样一层一层把土叠起来。

第一层：多块来源，各自安排。

东湖新区刚入住的头一个月，新区一期、二期、三期沿街的商户各拉了一个微信群。一期的商户说，路口的事一期来管；三期的商户说，凭什么。三个群各自订了一套“让行公约”，互相不知道，也互相不服。有一回三个群的人碰到一块儿开会，谁也没法说“按我们那套来”，因为每套都只在自己群里算数。

美国的头一层，就是这样的样子。殖民地时期，从不同地方来的人，带着不同的教派和做法，在不同的殖民地各自安排事情。这一层给土留下的，是“没有一个共同的根”这件事本身，以及各自商量着办的习惯。

第二层：立国，把“不问根”写成条文。

后来三个群选了代表，合订了一份《新区路口通行办法》。有意思的是，办法里没有一条写“一期的习惯如何、三期的习惯如何”，它只写：先到先走，同时到右方先行，转弯让直行。根的问题，大家心照不宣地留了空。办法能订成，靠的正是这份留空。

美国的第二层是同一个动作放大了许多倍：联邦制，各州各有各的法律；宪法不设国教；还有前面说的专利条款。因为没有共同的根，条文里干脆把“根”留空，只写程序。一张驾照在这个州发、在那个州认，这种互相承认的办法，就是“统一路、不问土”的日常样子。

第三层：十九世纪，土被越拉越宽。

新区的办法订了两年，来了一件事：隔壁开发区的货运公司把总部搬了过来，大卡车天天走新区的路。办法里的“先到先走”，碰上十几吨的卡车，就不够用了；外地来的司机又带来了他们老家的做法。办法一条一条补，补了又补。每来一批新人，旧办法的边就被磨一次。

十九世纪的美国就是这样。向西的移民，一批又一批新来的人群，铁路、工厂、一场内战。每来一批，“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就更真一分；每一次大的震荡，也逼着人把“怎么一起往前走”的办法再磨一遍。这一层不是第二层的简单延长。它像驾校里的新手，一次次把路口的规矩用到了更多、更杂的人身上，也一次次发现旧规矩不够用。（这一层的细节，卷三前面已写，这里不展开。）

第四层：大学、实验室、职业的出现。

新区的驾校做大以后，出了一批“专业人”：专门编教材的，专门出考题的，专门研究事故数据的。老樊发现，这几拨人说话开始不一样了。编教材的人说“学员好不好懂”，出考题的人说“区分度”，研究数据的人说“事故率”。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各说各的，谁也不必听懂谁，因为各自的行当里，各有各的评判。

美国的第四层，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研究型大学出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1876年创立；实验室成了一种正式的工作地点；做科学、做学问，第一次成了一种可以靠它吃饭的行当。意义里“创造”这一格，从此有了专属的厅。这一层给土留下的，是各厅有了各自的内行、各自的规矩、各自的话术。

第五层：方法被写下来。

有一年，驾校请了一位外面的顾问，来帮着把三拨人的东西“合起来”。顾问没有去问谁对谁错，他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咱们别争“哪套教法本来更对”，看一年以后，哪套教出来的学员事故少。这话后来成了驾校的口头禅，还印在了墙上。

美国的第五层，是这个动作被写成了哲学。在剑桥一带，几位年轻人聚在一起议论、争论，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形而上学俱乐部。1878年，皮尔斯写下了那篇后来被当作实用主义出生证的文章；到了1907年，詹姆斯出版了《实用主义》；到了1916年，杜威出版了《民主与教育》。这一层是前面几层合起来的回写：既然各厅各管各的，既然没有共同的根，那么能写出来的，就是那条不问根的、看效果的路。

第六层：方法沉回土。

顾问走了很多年以后，驾校来了新校长。他在例会上说“这事得看效果”，没有人觉得这句话是个主张。新教练入职培训的第一天，墙上那句话早已不是“某位顾问说的”，而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再往后，连墙上的字都褪了色，没人去重刷，因为已经不需要看见它了。

美国的第六层是学校、法院、报纸、口头禅，“有用吗？”“管用吗？”“试试看”。这一层最难看见，因为它已经不再像一个主张，而像事情本来的样子。第8章讲过它怎样成了常识，这里只提一句。

把六个小场景连起来读，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新区的每一层，都是上一层碰壁以后的回写，没有哪一层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没有哪一层是某个人事先设计好的。三个微信群各订公约，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根；合订办法时把根留空，是因为不留空就订不成；卡车来了办法不够用，是因为留空的办法终究要面对更杂的人；专业人分出来，是因为办法越补越细，需要内行；顾问那句“看效果”，是因为内行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子；墙上的字褪了色，是因为话说得太久，已经成了空气。

美国这一串也是这样环环相扣，每一环都有可查的来历，每一环也都留着“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缝。

再补一个细节。上面每个场景里，都有一个“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岔口：如果三个群没有合订办法，新区也许会各路口各立规矩；如果顾问当年说的是“哪套教法本来更对”，驾校也许会陷进长年的路线之争。岔口没有走，不等于岔口不存在。家谱要记的，正是这些走过的路和没走的路。

所以读家谱，要学会两只眼睛一起用：一只看“怎么长成了这样”，一只看“当时还可能长成什么样”。只用前一只，容易读成宿命；只用后一只，容易读成空想。老樊画路口图的时候，两只眼睛都在用，所以他画出来的纸，既能解释现在，也给了改动留下位置。

这也是家谱和“大事年表”的区别：年表只列发生了什么，家谱还要问每一件事是被什么逼出来的。

写完这六层，把它和“美国人务实”这句话放在一起，看一看区别。

第一，每一层都能查。哪一年立的法，哪一年建的学校，哪一年出的书，可以一件一件对。如果某一层写错了，别人可以指出来，我们可以改。标签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每一层都能说“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初有国教，教会的位置就不同；如果当初没有专利条款，实验室的行当也许长得不一样。这些“如果”不是空想，它们让我们看出每一层的承重在哪里。标签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别的土，别的谱系。一片土如果来源不同、层次不同，长出来的倾向也不同。中国的土和美国的土，是两部不同的家谱，卷六会专门写。这不是比较谁好谁坏，而是写明：同一个词“有用”，在两片土里，来历不一样。标签最爱说“他们和我们不同”，家谱只会说“这一层不一样”。

还要补一句公平话。这部家谱不是一条必然的链条。每一层长出来的时候，都还有别的可能没有长出来：有的可能被另一种力量压住，有的可能后来才发生。画家谱不是为了证明“只能这样”，而是为了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还可能怎样”。

最后，说一说“回写”在这张家谱上的意思。

如果你只画了六层，看起来像是楼房，一层压着一层，底下的层决定上面的层。这样读，就把回写读漏了。

真正的情形是：上面的层，会回头改写下面的层。第五层的方法被写下来之后，第六层把它带进学校、法院，学校里长大的人，成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司机、法官、老板，他们走进的“土”，已经和第一层、第二层的土不同了——他们不再需要从头摸索“怎么一起往前走”，而是出生在一片已经写好了“怎么走”的土里。

换句话说，土不是只往上长，它也往回长。最早的那些来历，被后来的层一遍一遍重新解释、重新使用，甚至重新遗忘。这就是为什么谱系需要被写出来：不写，土里的来历就会被最近的一层盖住。

家谱的真正用处，是让人在做决定时知道：我现在碰到的这个“本来如此”，是第几层、什么时候长的、为了对付什么而长的。有了这个，才谈得上第九卷里要讲的事——不是一种意义压倒另两种，而是看着土来轮换。

这部家谱怎么用？老樊有一个小办法：碰到一条“看起来不合理”的规矩，先别急着骂，也别急着改，先问三句。它是哪一层长出来的？当时是为了对付什么？那个“什么”还在不在？

三句问完，规矩分成两类：一类是土里真正在承重的，动它要慎重；另一类是早就没人记得为什么的，可以松一松。多数时候，一条规矩不是“对”或“错”，而是“还在不在用”。

这三句问话，将来会放大成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看自己的办法。眼下它只是一个路口上的小习惯。

◆ 12.4　土不是命：别把家谱写成宿命

东湖新区的驾校里，还有一个人值得说一说：校长老葛。

老葛是个爱讲道理的人。他听老樊讲完“路口的家谱”，很高兴，立刻在年终会上总结出一句：新区的人，是什么样的路口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个地段，就这么回事。”他说，“路口不改，人就这样。”

老樊听了，没有马上接话。过了几天，他才对老葛说：“校长，您这个说法，和老孙那句‘这儿的人就是不爱让’，其实是一回事。”

老葛愣了：“怎么会？我说的是路口，他说的是人。”

老樊说：“他把‘不爱让’装在人身上，您把‘不爱让’装在路口里。装的地方不同，可都说是装好了、定死了、改不了。”

这一段对话，指出了一个更隐蔽的陷阱。

我们花了两章讲土，讲土长出倾向，倾向写成方法，方法沉回土。读到这里，读者最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土是命。

“我生在这样一片土上，所以我就是这样。”“这个国家的历史是这样，所以它只能这样。”这听上去比“民族性”更有学问，其实犯的是同一个毛病，只是把标签从“人”换到了“土”。

在SDE里，这个毛病有个很准确的名字：**把E当作给定的**。

三方程说得很清楚：E＝H(S,D)。土是由样子和路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在它们之前就有的、不变的底子。土被做出来，就可以被继续做。东湖新区的第二批司机，确实在一个写好规矩的路口里长大；可是只要路口上哪一天又出了新的僵持——灯坏了、改了单行、新开了一条地铁——路口就又进入一轮新的摸索，土又被改写一次。

所以，本书说土“沉淀”，要说得准：沉淀不是固定。沉淀是慢。

那么，本书对美国那片土，是怎么摆位置的？有三点。

第一，土的倾向是惯性，不是命令。惯性意思是：你想转弯，需要费力气。教会、议事厅、实验室习惯了各管各的，要让它们并起来谈一件事，需要专门做功夫，但并不是不可能。社会福音运动的那些年，就是有人做了这份功夫。

第二，土里不只有一种倾向。本书挑出来讲的是“意义各回各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实用主义怎样长成、又长成了什么样。美国的土里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地方上的互助，教会的慈善，志愿者团体，对陌生人的好奇，等等——它们同样有来历，也同样在回写。拿了其中一条，不等于说它是全部。

第三，土里的人不是土的复印件。同一片土上的人，有人顺着惯性走，有人逆着它走，有人干脆换一条路。皮尔斯一辈子在大学里不得志，詹姆斯一边写着“好使”一边挂念人的内心，杜威晚年仍在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补充——这些人

身上都有顺着的地方，也有逆着的地方。若他们是复印件，就不会有这些缝隙了。

有读者会替“民族性”说两句话，这两句值得认真回答。

第一句：你说了半天，不还是在概括一个国家吗？

是概括，但概括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国家的人是什么”，这是对人下断语，装不下任何例外。另一种是“这片土的这一层，是怎样长出来的”，这是对来历下断语，每一层都可以去核、去反驳，也允许例外。老樊对着路口画图，也是在概括，可他概括的是“这个路口的改动史”，不是“这个小区的人品”。前者可以拿着旧档案去对，后者对不出来。

第二句：那照你的说法，别的国家的土，也会长出一样的实用主义吗？

不一定，而且这正是用土来解释的好处。土不同，长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如果一片土里的“有用”，来历是生存、是家族、是一代代人在紧日子里省出来的，那么它的“有用”和一片多源缝合的土里的“有用”，哪怕用的是同一个词，里头装的东西也不一样。这个问题卷六会专门写，那时我们只讲发生，不讲谁高谁低。反过来，如果有人坚持说“某个民族天生就是实用的”，他就得解释，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人换了一片土，会长出不同的办法，这是标签最难回答的地方。

还要说一句关于本书自己的话。

在本书最后一卷，我们会提出一个试探性的猜想：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E维度的形而上学”？也就是，有人把土的来历又统一成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命运”“血统”“天生如此”，仿佛E本身就是最后的、不变的底。这个猜想只是猜想，我们到时候会写明它的危险。眼下要说的是：把土写成命，就是又犯了一次形而上学的错。

对E的态度，应当和对路口的态度一样：有来历，所以可以追问；有惯性，所以改起来费力；但它是被做出来的，所以也可以接着做。

◆ 12.5　小结：给土写家谱，不给土贴标签

这一章，我们把一件事做了两遍。

第一遍，是拆。我们看到，“美国人务实”这类说法，做的是和渔村“海有脾气”相同的动作：把一片有来历、缠在一起的土，收成一个没有来历、恒定而统一的样子。这个动作，就是形而上学。所以，民族性本身是一种S维度的形而上学。

第二遍，是立。我们用同一性谱系代替了标签：从多块来源各自安排，到立国把“不问根”写成条文，到十九世纪土被拉宽，到大学和实验室出现，到方法被写下来，再到方法沉回土。每一层都能查、能问“如果不是这样”、能说“别处不同”。

在这两遍之间，我们给自己立了三条规矩：倾向有来历，倾向有范围，倾向可以被打破。又在最后补了一条：不要把土写成命。

把整章收成一句话：

不是“美国人天性务实，所以有了实用主义”，而是“一片缝起来的土，先长出了意义各回各家的倾向，实用主义把它写成了方法，方法又沉回土里，使这个倾向越来越牢”；谈民族性是给土贴标签，谈E的发生是给土写家谱。

读到这里，读者可以拿三个问题，随手检验自己是不是又把家谱读回了标签：

一问，我说的这个倾向，能不能讲出它的来历？讲不出，就是标签。二问，它在哪些地方、哪些年份并不成立？答不上，就是标签。三问，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承认这话错了？说不出，就是标签。

三问过得去的话，才算家谱。

回头看整个卷三：第9章讲土是怎样缝起来的，第10章讲缝起来的土为什么只能统一路，第11章讲统一的路怎样回写成方法、沉回土里，第12章讲这一切为什么不是民族性。这是一个完整的圈。

可是，土里的东西不会永远只停在三厅里，各管各的。

一个国家总要做决定。一个县总要开年度会，总要在增长、民生和依法办事之间排一排座次。当三条意义律从三个厅里走出来，走进同一间会议室，它们不再是三种互不过问的“为了什么”，而变成了三种都想坐上主位的“治理的道理”。

那时，各管各的就不够用了。会发生什么？下一卷，我们要走进一个县的年度会。

◆

卷　四

治理与社会卷

卷　序

回写不停在哲学里。第13、14章看国家治理怎样在增长、福利、权利三种“务实”之间来回摆，每摆一次都是一次统一；第15章看一个星期天里的三个厅：教会讲幸福，社会讲民主与自由，科技讲创造。

13

第13章

三种治理形而上学：增长、福利、权利

◆ 13.1　一个县的年度财政会

前面一卷里，我们跟着东湖新区那个无灯路口，学会了一种看法：不给土贴“民族性”的标签，而是给土写一部家谱。家谱怎么检验？三问：这个倾向讲得出来历吗？它在哪些地方、哪些年份不成立？什么事发生了，我就承认这话错了？卷三收在一句判词上：不是“美国人天性务实”，而是一片缝起来的土，先长出意义各回各家的倾向，实用主义把它写成方法，方法又沉回土里。

可是卷三的结尾留了一个口子：教会厅、社会厅、科技厅习惯了各管各的，但一个国家总要做决定，一个县总要开年度会。当三条意义律从三个厅里走出来，走进同一间会议室，各管各的就不够用了。那时会发生什么？这一卷从会议室开始。

先设想一个县。不必说它在哪个国家，也不必当它是某个具体的县。凡是参加过年度财政会的人，大概都认得这间会议室：十二月，暖气开得不太足，长桌上摆着三份材料，每个人面前一杯凉了的茶。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我们拿它做一面镜子，照一照后面要讲的美国的事。

这个县今年有一笔不大的机动资金，设想是两千万。还有一块地，一百二十亩，在县城东边，三个村子的交界处。会议要定的，是这笔钱和这块地先给谁。

三个人各带了一份材料。

招商局的柳局长带来的是一家外地汽车零部件厂。厂方愿意落户，条件是这块地，加上通水通电修路，再加前三年的税收返还。柳局长说得很直：“我们县这几年，年轻人一茬一茬往外走，财政收入连着两年下滑。不把新东西引进来，明年的会议室里，我们连讨论的钱都没有。”

民政局的方局长带来的是养老服务中心的扩建。全县六十岁以上的人一年比一年多，养老床位要排两年。方局长说：“有的老人等不到床位。这笔钱，是救急的。工厂建好了，税收什么时候回来，谁说得准？可老人是今年冬天的事。”

法制办的邓主任带来的是一页纸，只有几行字。他说，那一百二十亩地牵涉三个村，补偿方案还没有走完公示和听证；材料里“补偿标准的依据”那一栏，写得含糊。他说：“钱花得再好，程序有缺口，将来都是官司，都是上访。这个口子不补上，招商也好、养老也好，都立不住。”

这三份材料背后，各有各的不安。

柳局长的不安，来自春节前后的汽车站。每年腊月，站里挤满了回乡的年轻人，过完年，又挤满了离开的人。他在站台上站过几次，看着一个个背着包的背影，心里想的是：这些人要是在县里有一份能养家的工作，何必走？

方局长的不安，来自一份名单。名单上是排队等床位的老人，有名字，有年纪，有家里的情况。每一个名字后面，是一个子女在外地、不敢请长假的家庭。她知道名单上有几个人，等不到这个冬天过去。

邓主任的不安，来自一摞旧案卷。那是几年前另一个乡的征地纠纷，当时的补偿说得过去，可程序上有一个环节没走完，后来拖了三年多，最后县里付出的，比当初多补偿的钱要多得多，更要紧的是，有些人再也不愿意相信县里的话了。

三个人的不安，都是真的。一个是对“留不住人”的不安，一个是对“等不及的人”的不安，一个是对“信不过的人”的不安。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三份材料里，没有一份在说“错”。柳局长没有说养老不重要，方局长没有说税收不重要，邓主任也没有说发展不重要。他们的分歧不在“要不要”，而在“先”和“后”。可偏偏是“先后”这两个字，最难商量，因为谁先谁后，等于在说：此刻哪一条意义，是整个县的路该听的那一条。

三个人说完，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三个人，在各自发言的最后，几乎同时说了同一句话：

“我们还是得务实一点。”

柳局长说的“务实”，是先把税基做大，有了钱才有一切。方局长说的“务实”，是先把眼前这些老人的事办了，难道等工厂建好再说？邓主任说的“务实”，是别今天省一道程序，明天赔三倍。

同一个词，三个意思。三个人都不是坏人，三个人说的也都有道理。主持会议的财政局长老祁，是三方都得罪不起的人。他听完，说：“那就按轻重缓急排。”

说完他自己停了一下。轻重缓急，拿什么尺子量？

这个问题，才是这间会议室里真正的问题。三份材料吵的是钱和地，三把尺子吵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县往前走，到底该听哪一条意义的话？**

柳局长的尺子量的是“多出了什么新东西”：新的厂，新的税，新的岗位。方局长的尺子量的是“人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床位，冬天暖不暖，老人心里踏不踏实。邓主任的尺子量的是“每个人有没有被当成一个有权利的人对待”：补偿有没有依据，说话有没有地方，吃了亏有没有处可去。

三把尺子，三条意义的路。用本书的话说，这就是创造、幸福、自由三条意义律，在一间会议室里各自站出来。

有人会说，把三把尺子加在一起量，不就行了？可是三把尺子的刻度不是一个单位：一个是多出多少，一个是好了多少人，一个是线有没有越。两个人各量出“三成”“五成”，这三成和五成不能加，也不能比。要排先后，得先有一把更大的尺子，而这把更大的尺子，就是三位哲学家各自偷偷用过的那一条律。会议室里没有人明说这件事，但每个人都在暗中把自己的尺子，当成那把更大的尺子。

这个县的会开完了，结果大概是个折中：地先批一部分，养老中心的钱拨一半，补偿方案补完程序再议。散会的时候没有人真正服气，只是都累了。明年十二月，同一间会议室，会有三份新材料，三把同样的尺子。

这个场景不属于哪个国家。可是把它放大一百倍，放大到一个国家、一百多年，同样的三把尺子就会出现，并且各自变成一整套治理的主张。那时候，它们就不再只是“尺子”，而是一种又一种的治理形而上学。

这一章要讲的，就是这个放大。

◆ 13.2　三个“务实”，三条意义律

会开完以后，走廊里有一段插曲。

柳局长和邓主任一起下楼，顺口聊了几句。柳局长说：“老邓，你们法制办的人，什么都要依法，可法律是保证一件事能做成的，不是保证它不做。”邓主任笑了笑，说：“你们招商的人，什么都要快，可快是要有底的，没有底就是赌。”

两句话，一句比一句客气，可是请注意：他们都不是在说钱，也不是在说地，他们在说什么才算一件事做对了。

把三个人的具体事务都抽掉，剩下的是三句话。

第一句：只要新东西做出来了，别的会跟上来。这是增长派的话。

第二句：只要人过得下去了，别的是后话。这是福利派的话。

第三句：只要权利守住了，结果交给每个人自己。这是权利派的话。

三句话里，其实还藏着三种不同的时间感。增长派的时间是“几年到几十年”：种树的人不指望明年乘凉。福利派的时间是“这个冬天”：有些事等不起。权利派的时间是“一代代”：今天开的先例，几十年后还在管着人。三种时间，让三派在同一张桌子上，天然地听不进对方的急或不急：福利派觉得增长派慢，增长派觉得福利派短视，权利派觉得两边都在拿未来的权利换眼前的方便。

这三句话一旦从一个县放大到一个国家，就成了三种治理的思路。这里先交代一个用词：本书说的“增长”“福利”“权利”，是三种思路，不是三个政党，更不是某个具体的人。美国现实里没有哪个政党只属于其中一种，这一点后面会专门讲。

先看每一种怎样“统一”。

增长派，统一在创造上。这里要交代一句用词：本书说的“创造律”，是指那种“原来没有的东西长出来，长出来的又成为下一轮的土”的运行方式（站上第133号书讲皮尔斯时把它叫作特征律一路运行）。增长派关心的，正是这个：

一个国家，一个县，要不断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岗位，新的财富。

增长派说过、做过的事，大体是这样一些：鼓励投资，支持创新，减轻企业负担，放松不必要的管制，修路修港口，培养能做新东西的人。他们常用的一个说法是：蛋糕做大了，每个人的那一份才会变大。他们担心的事是：还没分蛋糕，蛋糕先没了。

增长派并不是不管人。在他们看来，最好的民生是一份工作；最好的权利保障是一个自由的市场。也就是说，另外两条律在他们那里也在场，只是被收进了创造之下：幸福，是增长的成果；自由，是增长的条件。

福利派，统一在幸福上。福利派关心的，是人过得下去：生病有人管，失业有人托，老了有着落，孩子不至于因为出身在最差的一端而一辈子起不来。他们说过、做过的事，包括社会保险、医疗保障、救济和最低保障、公共住房、对弱者的各种托底安排。他们常用的说法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应该在一个人最坏的那一年把他丢下。他们担心的事是：只顾着往前跑，把跑不动的人撂在路边。

福利派也不是不管创造和自由。在他们看来，培养一个健康、受过教育的人，本身就是最大的投资，这是创造；一个人只有不必为明天的饭发愁，才谈得上真的选择，这是自由。另外两条律也在场，只是被收进了幸福之下：创造，是让更多人过得好的手段；自由，是免于匮乏之后才有的东西。

权利派，统一在自由上。权利派关心的，是每一个人都不被当成工具：说话的权利，信仰的权利，保有财产的权利，受到公正程序对待的权利，选择自己活法的权利。他们说过、做过的事，包括宪法里的权利条款、法院对政府行为的审查、对程序的坚持、对个人选择的保护。他们常用的说法是：一件事哪怕结果再

好，只要越过了权利的线，就不算好。他们担心的事是：打着“为大家好”的旗号，把个别人压在底下。

这里有一点很容易被误会，必须说清楚：**权利派不是某一边的专利**。要求保护言论自由的人，要求保护宗教自由的人，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不被随意征用的人，要求保护个人隐私的人，要求保护平等对待的人，要求保护持有枪支的权利的人，站在政治光谱上很不同的位置，吵起来也常常是针锋相对。可是在结构上，他们说的是同一类话：先问有没有越线，再问结果好不好。这就是自由律站到前面来的样子。

权利派同样没有丢掉另外两条律。在他们看来，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是增长的根基（创造），社会权利和基本保障也可以是一种权利（幸福）。另外两条律在场，被收进了自由之下。

到这里，三种思路的样子清楚了。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它们叫做“形而上学”？

回想一下第6章讲过的三个特征。D维度的形而上学，有三个标志：只问效果，只朝前看，只认一条意义律。

三种治理思路，三条全中。

只问效果。三派的争论里，没有一派在问“这样做本来是什么”，所有的话都在问“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增长派看产出，福利派看保障，权利派看有没有越线。三派都是实用主义的孩子——不是说他们读过皮尔斯、詹姆斯、杜威，没有证据说那个县的财政官读过任何一本哲学书，也没有一条从三位哲学家到三种治理的传承线可以画出来。本书的说法要谨慎得多：这片土（第9章到第12章讲过的那片土），同时长出了三位哲学家，也长出了三种治理的习惯。它们是同一片土上长出来的三簇东西，结构相像，不是谁生了谁。

只朝前看。增长派讲的是下一个产业，福利派讲的是明年冬天，权利派讲的是将来每一次权利被侵犯的先例。三派都在算“往后会怎样”。那一百二十亩地的过去，没有一份材料问过：它是哪一年分的，谁种过，种过什么。过去不在三份材料的账上，因为过去不会“带来”什么，它只是来历。

只认一条意义律。前面说了：每一派都收着另外两条律，却只让一条律发号施令。增长派遇到增长与保障冲突时，增长先走；福利派遇到保障与程序冲突时，保障先走；权利派遇到权利与结果冲突时，权利先走。**当两条律打架时，谁赢，就看出这是谁的形而上学。**

还有一件事，是这类形而上学最顺手、也最看不见的。回顾第7章：统一的D会偷运统一的E，把土压平。

增长派偷运的是这样一块土：各地都差不多，只要条件给到位，哪里都能长出一个工厂。福利派偷运的是另一块：需要是可以统一计量的，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低收入户”，都可以放进同一张表。权利派偷运的是第三块：权利的持有者是一个抽象的“个人”，不管他是哪个村的、哪家的、怎样一代代过来的。

这里还要补一句公道话：三派都有过自己最得意的年份，也都有过自己最难堪的年份。增长派可以指着某些年代的高速增长和新产业的诞生，福利派可以指着某些人群里贫困的下降和风险的分摊，权利派可以指着被推翻的歧视和被纠正的冤案。反过来，增长派要面对的是增长的成果没有落到所有人手里的年份，福利派要面对的是托底的东西变成依赖、或者钱不够用的年份，权利派要面对的是线守住了、结果却没人满意的年份。三派各有一本账，各有赚和赔。本书不翻这些账，只看账背后的共同动作。

三种治理，三种压平。这三种压平，在县里的会议室里都已经出现了：那块一百二十亩的地，在柳局长的材料里是“可用土地”，在方局长的材料里不存在，在邓主任的材料里是“三个村的补偿对象”。谁也没有问过：这块地上，原来有什么？

这个问题，要等到下一章才有机会回来。现在先把这三种思路放进美国一百多年的历史里，看看它们是怎样一次又一次被人当成“最务实的办法”推到台前的。

◆ 13.3　美国一百多年的来回摆动

县档案室里有个现象，细心的人能看出来。把这个县过去十年的年度会议纪要翻一遍，会发现排序是有规律的：前年的重点是招商和修路，去年的重点是养老和医疗，今年材料里“依法”两个字出现得特别多。每一年，大家都说自己在“统筹兼顾”，可翻开十年的纪要，每一年其实都有一个排在最前面的。

这是一个县里的小摆动。国家级的摆动，也是一样的结构，只是时间更长，声音更大。

下面讲的，是美国近一百多年里几个公认的大轮廓。这里只写各派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不判谁对谁错。每个阶段，都要把增长、福利、权利三个方向的声音等量地放出来。

– 第一段：进步时代，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铁路、钢铁、石油这些大产业迅速长起来，美国的工厂和城市在几十年里变了样。增长是实实在在的。同时有三种不安同时出现。有人担心大企业太大，把小企业和农民压垮，也就是担心自由（竞争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有人担心工人和消费者没有保障，工时长，食品不安全，也就是担心过得下去；也有人担心管得太多，把刚长出来的新企业管死，也就是担心创造。

这个阶段留下的东西，有的偏向这头，有的偏向那头：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后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因为推动拆分大企业而被称作“破托拉斯者”；1906年有食品药品方面的立法；1913年有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和联邦所得税的开征。有人看到的是对垄断的遏制，有人看到的是联邦权力的扩张，有人看到的是对普通人的保护。同一批法案，三种读法。

– 第二段：大萧条与新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经济崩溃，大量的人失业，银行倒闭。这个阶段最大的声音是“得把人救起来”：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失业保险，银行存款保险，1935年的《瓦格纳法》承认工人组织起来与资方谈判的权利。福利一面，权利一面（工人的权利），也有恢复增长的一面，几乎同时登场。

批评也是同时的，来自两个方向。一些人认为联邦政府伸得太长，侵蚀了企业的活力和地方、个人的自主，他们组成过专门的团体来反对；另一些人认为这些措施力度不够、不够彻底。罗斯福在1932年对奥格尔索普大学毕业生的演讲里，说国家需要“大胆而持续的试验”，又说，拿一个办法来试试是常识，要是不行，就坦率承认，再换一个。那是在他当选总统之前。这些话常被后人拿来说明：新政自己就自认是“务实”的，而且说得很有实用主义的味道，它不问这个办法“本来对不对”，只问试了以后“行不行”。

这一点值得停一停。新政时期的人，没有一个需要读过詹姆斯或杜威，才会这么说话。“行不行”三个字，那时已经是土里现成的话。后面要讲的“每一派都说自己务实”，源头就在这里。

1937年前后，最高法院对政府能管多少经济事务的态度也有了转变。这个转变，下一章讲法律领域时再细说。

新政留给后人的，是一堆各说各话的评价。有人把它读成一次及时的救援，有人把它读成联邦权力扩张的开端，有人把它读成一次未竟的改革，有人把它读成战争才真正结束了萧条的前奏。这些读法，本书都不评判。我们只留意一件事：几乎所有读法，用的都是同一种句式——“它有没有用，用在了谁身上，代价是什么”。这种句式，不是哪一派发明的，是土里现成的。

– 第三段：战后年代，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

二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为大批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支持；1956年《州际公路法》启动了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增长与福利在这些年里常常走在一起。

同一时期，权利的故事也走到了前台：1954年布朗案，最高法院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1964年《民权法》，1965年《投票权法》；法院也在刑事程序等方面扩展了个人的权利保障。1965年，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救助（Medicaid）建立，福利一面又添了新的支柱。

后人把这个阶段叫作“战后共识”。看起来三条路并行不悖。可是请记住，这里的“共识”是一个后来的说法。当时的人并没有觉得大家在共识，每一项立法都是在争吵中通过的，每一项都有反对的人。本书只提醒一件事：这段时间，三条律都有收成，不是因为它们被“平衡”了，而是因为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让几条路暂时都有地方走。这一点第14章再回来。

这一段里还有一个细节：同一个时期，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说的往往是同一条律的话。支持民权立法的人说，这是在兑现自由；一些反对联邦出手的人，说的也是自由，他们担心的是地方和个人的自主被联邦权力取代。两边都在讲自由，吵的是自由归谁、由谁来守。这提醒我们：三条律不是三个阵营，同一条律里面，也可以吵得很凶。

– 第四段：七十年代的困境与八十年代以后的转向

七十年代，物价上涨、经济停滞同时出现，还碰上石油危机。这个阶段，许多人开始怀疑：政府管得太多、税收太重、规矩太繁，是不是压住了经济的活力。有人主张放松监管、降低税率，让创造的力量释放出来；也有人提醒：保障在缩水，差距在拉大，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就拆掉托底的东西。

放松管制并不属于哪一个党：1978年卡特总统任内通过的《航空业放松管制法》，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81年里根总统任内，国会通过了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的法案；1986年又有一次税制改革，把税率进一步压低、把税基放宽。支持者说这释放了创造，批评者说这拉大了差距，各有各的账。

九十年代，另一个方向的调整出现了：1996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福利制度改革法案，加入了工作要求和领取期限；九十年代后期联邦预算一度出现盈余。有人说这是福利与责任的重新结合，有人说这削弱了托底的力度。

– 第五段：近二十年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里，几乎每一种思路都在不同的时点上台过。2001年和2003年有大规模的减税；2003年又通过了老年人处方药的联邦医保计划，扩大了福利。2008年金融危机，布什政府推出银行救助计划，2009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2010年有医保改革法和金融监管改革法。2017年又有一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2020年疫情期间，两党共同通过了规模空前的救济和支持法案。2021年和2022年，又有基础设施、半导体产业、气候与能源方面的大型立法。

与此同时，权利的战场并没有安静过。言论、宗教、持枪、隐私、选举权、平等对待，围绕这些的诉讼和立法，一直在不同方向上展开，吵的人站在光谱的各个位置，每一方都说自己是在捍卫权利。

2005年的一个案子，说明了这三种思路怎样在一件事上撞到一起。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为了一项经济发展计划，要征用一批私人住宅的土地。住户不服，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认定，为经济发展而征地，在宪法的“公共使用”之内。判决在2005年6月作出，一出来，左右两边的人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此后，美国绝大多数州以各种方式修改了本州的征地规则，其中不少州限制得相当严，也有一些州的修改只是形式上的。

这个案子在当时的新闻里引起的反应，要多说一句。支持这个判决的人说，城市要发展，需要有办法把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法院不应当替地方政府决定什么是好的发展计划。反对这个判决的人说，一个人的家不应该因为别人能让这块地产生更多税收就被拿走。两种说法，都不是在讲“这块地本来是什么”，都是在讲“这件事会带来什么、会不会越线”。吵的是尺子。

请看这个案子里的三方：一边是城市要增长，一边是住户要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权利，一边是——如果这些住宅里住的多是老人——一个本来可以讲福利的问题。同一块地，三条律各有各的说法。这和我们那个县里的一百二十亩地，是同一个结构。

在这五段里，每一段的“前面”都不同，可是每一段的“后面”，其实都是同样的结构：被推到前面的那条律，用自己的话把另外两条律重新讲了一遍。新政时期，创造被讲成“让人重新有活干”，权利被讲成“工人有权组织起来”，都是在幸福的话语里说话。战后增长期，福利被讲成“只要经济好，每个人的日子都会好”，权利的扩展被讲成“让更多的人加入这场增长”，是在创造的话语里说话。七十年代之后，创造的释放被讲成“还给人们自己做主的自由”，福利的收紧被讲成“让人们自己负起责任”，是在自由的话语里说话。你只要听一听一个时期的人怎样说话，就大致知道那时是哪条律在前面。

把五段合起来看，有几件事是看得出的：

第一，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排在最前面的方向。进步时代是权利与保护，新政是福利与恢复，战后是增长，同时权利走上前台，七十年代以后是创造的释放，九十年代以后是福利与责任的重新安排。

第二，摆动不是沿着一条直线，也不属于哪一个党。同一个党在不同年代说不同的话，两个党也会在同一个时刻做出相似的事。

第三，每一次摆动，主张的人都觉得自己在纠正上一次的偏。他们没有说谎。每一次，前一个阶段确实留下了真实的缺口。

有一个小小的检验，读者可以自己做：把上面五段里，每一段“排在最前面”的那条律说出来，再问自己，那一段的人，是不是真的觉得另外两条律“没被顾及”？答案多半是：没有。他们觉得自己顾及了，只是顾及的方式，是把另外两条律翻译成了前面那条律的语言。这正是“统一”最隐蔽的地方：它不是把别的律扔掉，而是让别的律改说同一种话。

这最后一点最重要。它提示我们：这三条线并不是在三个党之间分配，而是在同一片土上，一次又一次地轮流站到前面来。

◆ 13.4　每一派都说自己最务实

社区里的老菜场要改造。

这事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设想一个：老菜场建了四十年，棚子漏雨，地面湿滑，进出的路窄，旁边的小区一年比一年多。街道办出了改造方案，开了一场意见会，来了三拨人。

第一拨是做规划的和做生意的。他们的话是：要升级，要引进品牌，要提高租金收入和客流，改造完了，这里能多出几十个新的摊位、几百个新的岗位。他们说：“这是最务实的办法，老棚子再修十年也还是老棚子。”

第二拨是附近的老人。他们的话是：菜场离家近，走几步路就能买到菜，改造后如果摊位变少、价格变高、路变远，对我们就是个损失。他们说：“最务实的办法，是先保证我们买得到、买得起。”

第三拨是现有的摊贩。他们的话是：改造后租金按什么标准？现有的摊位有没有优先权？谁决定谁留下谁走？有没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他们说：“最务实的办法，是先把规矩讲清楚，不能想清退就清退。”

三拨人都说“务实”。三个“务实”，一个量增量，一个量过得好不好，一个量有没有被公平对待。

这个场景有一个很普通的特点：没有一方在撒谎，也没有一方在装。每一方的确都认为，自己看的才是实际效果。

这件事在国家一级也是一样的。回看上一节那五段历史，每一个阶段的主张者，都用过同类的话：要“实际有效”，要“拿证据说话”，要“别搞意识形态”，要“常识”。支持放松管制的人这么说，支持扩大保障的人这么说，坚持保护某项权利不容让步的人也这么说。三派对三派，都是一边指着自己的数据，一边说对方“理想化”“教条”。

对这个现象，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种解释说：有人在装，其中有一方是真的务实，另外两方打着务实的旗号。另一种解释说：务实是个好词，谁都想沾边。

本书的解释和这两种都不同。

本书认为：**在这片土上，“务实”是唯一一个所有人都用得上的词**。回想前面几章：这片土是多源缝合的，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宗，没有一种共同的“本来如此”，所有人能共同遵守的只有“路怎么走”。在这样的

土里，任何一个主张，要想被别人听进去，都必须穿上“有效”这件衣服。不穿，别人就不认。

所以每一派都说自己务实，不是虚伪，是土的规矩。

规矩有一个副作用，是前面说过的：它让三种形而上学都长得不像形而上学。增长派不说“我主张一种关于世界的看法”，只说“我们拿数据看”；福利派不说“我的信条是人人有保障”，只说“我们看谁真的需要帮助”；权利派不说“我有一个先验的原则”，只说“我们看程序有没有走对”。三派都披着“方法”的外衣，都不显得是在主张什么。这就是第6章讲的：D维度的形而上学，长得像方法，不像主张。

于是争论就有了一个怪样子：吵来吵去，吵的是“谁更有效”，可没有人停下来问一句：你说的“有效”，是按哪把尺子量的？

菜场里那三拨人，要是肯停下来想一想，会发现他们的分歧不是事实的分歧，而是尺子的分歧。一拨量的是“多出了什么”，一拨量的是“过得好不好”，一拨量的是“有没有被公平对待”。三个人拿三把尺子量同一个菜场，得出三个读数，各自都“有数据”。

而且，最务实的人，往往最怕被人说成“不务实”。所以每一派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尺子说成“唯一的尺子”。柳局长不会说“我只是在量增长”，他会说“这就是事实”；方局长不会说“我只是在量保障”，她会说“这就是现实”；邓主任不会说“我只是在量权利”，他会说“这就是规则”。事实、现实、规则，三个词都带着“不用再争”的口气。这口气，正是形而上学的口气：把自己统一出来的那个样子，说成了本来如此。

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既然这三把尺子都是真的，那么，三派在不同年代轮流坐庄，是不是就等于平衡了？这是第14章的事。

◆ 13.5　小结

回到开头那间会议室。老祁说“按轻重缓急排”，那一刻他问的，其实是整个国家一百多年来都在问的问题：拿哪一条律当尺子。会议室里没有答案，只有三种不安，和三种统一的冲动。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三种冲动怎样从一个县的桌子，长成一个国家的治理。

本章要留下的，是下面这句判词：

增长、福利、权利，不是三种政策，而是三种统一。每一派都让整个国家的路，只听一条意义律的话。

它们各自收着另外两条律：增长派把幸福和自由收进创造里，福利派把创造和自由收进幸福里，权利派把创造和幸福收进自由里。三派谁也不是只有一条律，而是只让一条律发号施令。

它们都只问效果，都只朝前看，都披着“务实”的外衣，所以都长得不像形而上学。它们各自偷运了一块被压平的土：增长派以为各地都一样，福利派以为需要可以统一计量，权利派以为权利的持有者是一个抽象的人。

这些并不是说哪一派不对。只是说，每一派都完成了一次统一。

最后补一个读法上的提醒。读这一章，容易冒出一个冲动：想知道“作者到底站哪一派”。本书的回答是：本书不站任何一派，也不认为“站在中间”就是出路。出路不是找一个位置，而是换一种问法。这个问法，下一章会给出来。

三派轮流站到前面来，来回摆了一百多年。那么，来回摆动，是不是就等于平衡？下一章，我们走进经济、法律、政治三个领域，看看同一场拉扯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发生的，并问一问：钟摆，到底是不是平衡。

◆

14

第14章

钟摆不是平衡

◆ 14.1　三个领域，三场同样的拉扯

设想县城西街有一家小面包房，老板姓陈，做了十几年。

这一个月里，老陈碰到三件事。

头一件是面粉涨价，加上店面租约到期，房东要涨租。老陈算了一笔账：要想撑住，只有把生意做大，多开一家分店，多雇两个人，多上几款新品。这是一件经济上的事，老陈想的是怎么长出一点原来没有的东西。

第二件是劳动监察上门，翻了翻他和两个学徒之间的约定，说工时、休息、加班的安排需要改。老陈有点不服气，学徒自己愿意多干，为什么不让？同时他又隐约觉得，三年前他自己当学徒的时候，要是有人这么管一管，他的腰也不至于那样。这是一件法律上的事，老陈夹在“保护”和“自愿”之间。

第三件是街道办在征求意见：这条街要不要改成步行街？老陈有一票。步行街会带来客流，可也会让一部分老街坊不方便。他想了想，投了票，也没想明白自己到底站哪一边。这是一件政治上的事。

老陈一个人，一个月里，在三个领域里各站了一次队，每次站的位置还不一样。

这个小场景，提示了本章的第一件事：增长、福利、权利三种思路，不是只在国会和法院里出现，它们在经济、法律、政治三个领域里各出现一次，而且同一个人可以在三个领域里站在不同的地方。下面分别看。

– 先看经济

经济领域的三派，名字比较清楚。

一派看重增长，也就是创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经济学家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这个说法来形容资本主义的核心：旧的东西不断被新的东西挤掉，新的东西不断长出来。这一派的人关心投资、创新、生产率、企业怎样才能把新东西做出来。

一派看重再分配与保障，也就是幸福。三十年代，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提出，经济衰退时需要靠政府的开支来托住需求；此后各国逐渐建立起累进税、社会保险等一整套办法，来平滑个人和家庭遇到的风险。这一派关心的，是增长的成果怎样分到更多人手里，以及人们在最坏的年份怎样撑过去。

一派看重市场的自由，也就是自由。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和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作。他们关心的是：个人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干什么、买什么、卖什么，而不被一个中央的计划替他决定。

请注意，增长派和市场自由派常常坐在同一张桌子边，说话的口气也相近，所以很容易被当成一派。可它们尺子不同。一项政策若是让总产出涨了，却压缩了个人的选择，增长派可能点头，自由派就会皱眉。反过来，一项政策若是让选择更多了，总产出却没涨，自由派满意，增长派未必。就像县里那条街：统一规划成一条整齐的商业街，租金和客流都会涨（增长），可摊贩失去了自己摆摊的自由（自由）；放任摊贩各自摆，选择最多，可整条街未必旺。同样是“支持市场”，其中的两条律是可以打架的。

– 再看法律

法律领域的三派，不像经济学那样有清楚的名字，但拉扯一直都在。

一种读法，把法律看成提高总体效益的工具。规则怎样定，才能让社会整体的财富更多、成本更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法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一部分法学家和法官开始用这种方式思考合同、侵权、财产。这是创造一头的读法。

一种读法，把法律看成保护弱者的工具。劳动保护、最低工资、消费者保护、反歧视的实质性安排，都是这一路的做法。它关心的是：这条规则实际上让谁过得下去。这是幸福一头的读法。

一种读法，把法律看成守住底线的工具：正当程序，平等保护，个人权利。它关心的是：无论结果怎样，这条规则有没有越线，当事人有没有被当人对待。这是自由一头的读法。

美国法律史上，有一个故事特别像老陈的面包房，它本身就发生在一家面包房。1895年，纽约州通过了一部法律，限制面包房工人每天不得超过十小时、每周不得超过六十小时。纽约州北部尤蒂卡的一位面包房老板约瑟夫·洛克纳，是德国移民，因为让工人超时干活被罚款，他不服，案子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1905年4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结果推翻了这部法律，理由是：这部法律不当地限制了雇主与工人订立合同的自由。这个判决后来被叫做洛克纳案，它之后的三十多年，被称作“洛克纳时代”。

三十多年后，1937年3月，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子里改变了方向。那是西海岸饭店诉帕里什案，同样是五比四，法院认可了华盛顿州一部为妇女规定最低工资的法律，理由大意是：州有权为保护工人的健康和维持生活的能力订立规则。这个判决推翻了1923年的一个旧先例，一般被认为结束了洛克纳时代。

这里要注意一个有趣的事实：两个判决里，两边都有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保护”。一边讲的是契约的自由，一边讲的是不被恶劣条件所迫的体面。吵的不是“要不要自由”，而是在这件事上哪一条律排在前头。老陈夹在保护和自愿之间，一百多年前，法庭上的人夹着的，是同一道缝。

回到县里，邓主任的那一页纸，也是这三种读法的缩影。他要的程序，在创造一头的人看来，是成本；在幸福一头的人看来，是弱者能被听见的唯一渠道；在自由一头的人看来，是线本身。同一道听证，三个读法，三种价值。邓主任自己未必意识到，他每次说“依法”，说的是其中哪一种。

– 最后看政治

政治领域，三种思路表现为三种承诺：一种说，我们会让盘子更大，给你更多机会；一种说，我们会让你有保障，不会被丢下；一种说，我们会守住你的权利，不让别人替你做主。

这时就要回答上一章留下的那个问题：三种思路跟现实里的政党是什么关系？

答案是：不是一一对应。每个大党的阵营里，装着不止一种声音，配比随着年代变。一边的阵营里，有重视工会和社会保障的人，有重视民权和公民自由的人，也有靠新技术、新产业吃饭的人。另一边的阵营里，有重视企业和投资的人，有重视个人自由和小政府的人，也有重视家庭和宗教社群、把宗教自由看得很重的人。三种声音，两个阵营里各有各的版本，各有各的配比。这里只是一幅粗略的素描：两边阵营里的人其实还要多样得多，同一阵营里也常常为了哪条律排前而争吵，而且配比在几十年里一直在移动。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问题上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有人在经济上主张少管、让市场决定，在言论和隐私上主张个人权利，在医疗上却希望有一个托底的安排。把这些人按党派分类，是分不进去的。这也是前面老陈的处境。

同一件事，在三个领域里也会被说成三个故事。就拿县里那一百二十亩地来说：在经济的领域里，它是一桩招商，问的是能带来多少产出和岗位；在法律的领域里，它是一桩征地补偿，问的是依据、程序和救济；在政治的领域里，它是三个村的人在县里代表联络会上的发言，问的是谁说了算、谁的话被听进去了。同一块地，三个领域，三个故事，每个故事里的“好”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看清这三场拉扯，不能只看党派的名字，要看具体一件事上，哪一条律走到了前面。名字会变，配比会变，站位会变。变不了的是：每一次，总有一条律走到前面，另两条被收到后面。

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事。

◆ 14.2　每一次摆动，都是一次统一

周末，老陈家里有三个孩子，轮流选去哪儿玩。这个周六老大选，去游乐场；下个周六老二选，去外婆家；再下个周六老三选，去看电影。三个孩子都满意了，一个月下来，家里谁也没吵。

这个办法，听上去像一个公平的办法：每个人都轮到了。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办法里没有哪一个周末，是“一家人都喜欢”的周末。每一个周末，都是某一个孩子的周末，另两个孩子是陪着。轮流，只是让每个人轮到当一次主人，不是让每个周末都兼顾三个人。

钟摆也是这样。

第13章讲了美国一百多年的摆动。人们习惯把这种来回，想成“钟摆”：摆过去一点，再摆回来一点，摆来摆去，总在中间附近，似乎暗示了一种平衡。

本书认为，这个比喻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会误导人。

对的一半是：确实存在来回。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条律站在前头，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另一条律被推到前面来，补上前一个阶段留下的缺口。

误导的一半是：**每一次摆动，都不是在“找中间”，而是在“换一个统一”**。

这话怎么讲?

回想那五段历史。每一次，当某一种思路获得了推动的力量（一场危机，一次选举，一次判决，一代人的共同感受），它做的事，不是“把三条律调匀”，而是把整个国家的路，重新统一在一条律上。新政时期，是把路统一到“人要先救起来”；战后增长期，是把路统一到“先把盘子做大”，同时让权利逐步扩展；七十年代以后，是把路统一到“让创造松开手脚”。每一次，另外两条律都被收到了后面，用前面这一条的话重新讲一遍。

所以，每一次摆动，都是一次完整的统一。就像老陈家的周末：每一周，都是一个孩子的周末。

那么，一次又一次摆动之后，国家是不是回到了原点，白忙一场?

也不是。这里要用到第11章讲过的“回写”。

每一次摆动，都在土里留下了东西。新政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障，没有因为后来的转向而消失，它已经变成了几代人计划自己一生时默认的前提；进步时代的反垄断，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在用，也都在争论怎么用；民权立法一旦写下，就成了每一代人维护或者重新解释的起点；放松管制留下的航空、通信、金融方面的

新格局，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2005年那场征地案之后，一些州收紧了征地的规定，这条规定成了后来的县官们在会议室里必须面对的一条线。

这些东西，不是“某一派的成果”，而是土。每一次摆动结束，摆过的那一派留下的东西，都沉入土里，成为下一轮摆动的起点。所以，钟摆其实不是钟摆，更像是一圈一圈的年轮：每一圈，都在上一圈的土上长，每一圈的结果都变成下一圈的土。

拿县里来说，这就像档案柜。第一年的纪要放在最下面，十年后最上面一层压着九年的东西。新来的局长想翻一个新方向，得先搬开上面那几层，每一层上面都贴着当年某个人的名字和某个村的期待。所以旧案卷越多的县，越难“一年一个新样子”，也越容易被人说成“保守”。其实那不是保守，是土厚了。

年轮越厚，下一次摆动就越难。这一点常常被忽略。早年的摆动，土还薄，一个方向的统一可以做得很彻底；后来的土里已经沉着好几层，任何一个方向的统一，都要绕开前面几层留下的东西。所以当代的治理看起来总是“拉扯不动”、“吵不出结果”，不全是人变坏了，也有一部分是土里的层数多了，每一层都有人靠着它过日子，每一层都有人把它当成“本来如此”。

还有一个现象要留意。三派对“上一派”的批评，往往都说中了要害；对“自己”的批评，往往都听不进去。增长派对福利派说，你们的托底养出了依赖，这话有它看到的东西；福利派对增长派说，你们的蛋糕没有落到所有人手里，这话也有它看到的东西；权利派对两边都说，你们为了结果越了线，这话同样有它看到的东西。每一派都是一面好镜子，照别人很清楚，照自己照不见，因为自己站的地方，正是自己统一的那条律，那是它的“本来如此”。

回写是真的，所以美国治理的土越来越厚。可是请记住：土越来越厚，并不等于三条律越来越平衡。因为每一圈，仍然是一条律站在前面。年轮在加，统一的动作并没有变。

还有一件事需要讲清楚：为什么会摆回来？

用第11章讲过的三原理来说：当一条律统一了整个路的时候，另外两条律并没有消失，它们被收在后面，默默地积累着张力。

增长走在前面的年月里，保障的缺口会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有些人没跟上，有些地方没跟上，有些风险没人托底。保障走在前面的年月里，另一种张力在积累：创造的活力被压住，办事的成本在上升。权利走在前面的年月里，也有另一种张力在积累：总有些结果，是单靠守住线得不到的。

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一个事件把它揭开：一场经济危机，一个丑闻，一次判决，一次选举。这时，被收在后面的那条律，借着这个事件被推到了前面。**摆动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是积累出来的**。没有人坐在那里决定“现在该轮到福利了”；是危机把它推出来的。

县里也是这样。老祁翻了十年的纪要，没有一年是有人提议“今年该轮到养老了”的。是某一年冬天，有位老人在排队等床位的时候出了事，被写进了信访材料，第二年的纪要里，养老才排到了第一位。是某一年，一场官司败诉，赔了一笔钱，第二年的“依法”才忽然多了起来。是某一年，连着两个季度收入下滑，招商才被摆到最前面。每一次排序的变化，背后都有一件事把积累的张力揭开了。

这个机制，让我们看出钟摆和“平衡”的根本区别：

钟摆是被迫的轮流，是等张力大到压不住了才换人。平衡则是一直在照看三条律，不等危机来了才换人。

更要紧的是，这个机制让每一次摆动都带着一种特别的急。每一条走到前面的律，都需要为自己的每一步提供意义：这一步为什么增长，这一步为什么保障，这一步为什么守住了权利。步步都要意义，步步都要证明有用。这个“步步要意义”的压力，正是卷七要讲的主题，这里只是先把线头放在这里。

用县里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的纪要读起来都像“解决了问题”，十年读下来却像“同一个问题在换衣服”。每年都有人对，每年也都有一条律被推迟了一年。推迟的那条律，没有被消灭，只是被存起来，利息照算。

回到老陈家的三个孩子。他们的轮流，从来没有让他们一起度过一个周末。这几个孩子要是能在一次出门之前，先坐下来商量：“这个周末，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三个都愿意去的？”那就不是轮流了，那是另一种做法。这个做法，需要一个条件：他们得先知道，各自想去的地方，是从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这就是下一节要讲的。

◆ 14.3　三派轮流坐庄，和三方程平衡

现在回到最初那个县的会议室。

设想明年十二月，同一间会议室。有一个变化：财政局长老祁在三份材料之外，多发了一张纸。纸上没有数字，也没有结论，只有三个村子的一些零碎信息。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我们只借它说明一种问法，不代表对任何一个真实县的做法有所评价。

纸上写的是：这一百二十亩地，是哪一年分到哪几户手里的；三个村里，现在种地的是什么年纪的人；年轻人出去以后，隔多久回来一次，回来干什么；养老床位排队的老人，有多少是这三个村里出去的年轻人的父母；以及，三年前县里上一次征地，当时的补偿后来有没有人反映过问题。

柳局长看着这张纸，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要招的这家厂，用工的主力，将来就是这几个村出去又愿意回来的年轻人。”

方局长接着说：“那么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就是我们要排队的那些老人。”

邓主任也开口了：“而三年前那次补偿，如果当时没处理好，这三个村对县里下一次的说法，还信多少？”

会议室里的空气和去年不一样了。去年是三份材料争一笔钱，今年，三份材料被一张纸串到了同一件事上：招商的成败，取决于年轻人愿不愿意回来；年轻人回不回来，取决于家里的老人有没有人管；老人有没有人管，取决于县里的话在村里还算不算数；县里的话算不算数，又取决于上一次、上上一次的征地是怎样办的。

一条链子，四个环，原来是一件事。

为了看清这两种会的差别，不妨再设想一个“轮流”的年份。

假设这个县在某一年，轮到“招商优先”。会开得很顺，地批了，厂签了，三个村的补偿方案按标准走完了流程，也公示了。柳局长拿到了他想要的，方局长的养老中心被排到了明年，邓主任的程序也没有违规。第二年开春，工厂开工，招工的时候发现，三个村里愿意来的年轻人，比预计的少得多。原因很具体：这几个年轻人的父母，正排在床位的名单上，他们得留在家里照顾。养老排在后面，招工就缺了人；招工缺了人，税收就回得慢；税收回得慢，养老的钱又拨不出来。

每一个环节单看都没出错，每一份材料都是合规的、合理的。出错的地方，是三份材料之间的那条缝——没有人看见三个环是连着的。

这就是“轮流”的特点：每一年，都有一个人说了算，三个人都没错，可是整件事不对。

这就是三方程平衡的样子，我们现在来说清楚它是什么。

三方程是这样讲的：一件事显露出来的样子（比如一个县的产业格局、一部政策、一项制度），是由它走的路（一连串的选择和调整）和它所在的土（这片土的来历、人、信任、旧账）一起生成的。它走的路，又是由已经显露出来的样子和土一起生成的。而土，又是由样子和路一起，一年一年写出来的。写成式子，就是 S＝F(D,E)，D＝G(S,E)，E＝H(S,D)。

没有哪一样是给定的。这是三方程最要紧的一点：不能把其中任何一样当成“本来就在那里”，只去管另外两样。

现在回头看三派轮流坐庄。

三派轮流，每一轮，都是把某一样当成了给定。

增长派把“土”当成给定：各地都差不多，条件给到位，就能长出来。福利派把“需要”当成给定：需要是现成的，可以量、可以排、可以按表去满足。权利派把“人”当成给定：每一个个人都是现成的，权利是现成的，守住线就行。三派都有一个不肯再追问的东西。

不再追问的东西，就是土被压平的地方。

三方程平衡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是把三派按比例凑在一起（三分之一增长，三分之一福利，三分之一权利，那只是把三个统一并排放着），也不是三派轮流（那是把统一一个一个换着做）。**它要求的是：每一次做决定，都把“土的来历”放进桌面。**

在老祁那张纸上，我们看到了这种做法的小样：一块地不再只是“一百二十亩可用土地”，而是“这三个村、这几代人、这几次旧账”；一个厂不再只是“税收和岗位”，而是“将来回乡的年轻人的去处”；一项补偿程序不再只是“合不合规”，而是“下一次的话还有没有人信”。

要把土的来历放进桌面，过去是很难的。一个县有几十个村、几万户人，每一户的来历都不同，没有哪个财政局长能把它们都记在脑子里。所以过去的治理只能依靠总量的数字：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床位多少，案件多少。数字是好的，可数字天然地把来历拿掉了。今天情形有了一点变化：信息的积累，使得“这块土上发生过什么”有可能被一层一层整理出来。这是后面第34章要讲的事，这里只是先记下：三方程平衡之所以过去讲不出口，不是因为想不到，是因为做不到。

三个人的三份材料，一旦被放到同一块土上，就不再是三个争一笔钱的口号，而是同一块土上互相生成的三条路。增长改变了村里的人口，人口改变了养老的需求，养老的安排改变了村里对县里的信任，信任又改变了下一次增长能不能落地。这就是三原理在起作用：当增长这条路和土之间出现了顶撞（村里的信任不够），这种顶撞推动的是样子的改变——工期分阶段，用地分批，用工优先本地，程序补齐——也就是第三维被推动着变了形，变了形的东西又写回下一年的起点。

这里需要说明：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里面的做法也只是举例，不是对任何真实政策的建议。本书不替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国家提政策。本书要说的是一种问法的区别：

三派轮流坐庄时，每一派问的是：“我这条律，能不能赢？”三方程平衡时，问的是：“这块土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在这块土上，三条路各自会把它写成什么样？”

第一种问法，只需要尺子。第二种问法，需要土的来历，也就是第1章里说的“家谱”，后面第34章会专门讲：给土写家谱，需要巨大的信息和知识发生的能力，过去的人做不到，现在才有了一点可能。

有人会说：你说的这一套，不就是平常说的“统筹兼顾”“综合考虑”吗？

不一样。“统筹兼顾”通常的意思是：三份材料都看一看，三个方面都照顾一点，各让一步。这样做，三份材料仍然是三份材料，三把尺子仍然是三把尺子，只是在分钱的时候各削掉一块。它是三种统一的并排，土仍然是被压平的。老祁那张纸做的事，是另一回事：它没有叫任何一方让步，它只是让三方看见，他们量的是同一块土的三个面。看见了这一点，很多“必须让步”的地方，就变成了“原来可以换一种走法”的地方。当然，也有变不成的地方，那里仍然要取舍。可取舍时的依据，已经不是谁的声音大，而是这块土的来历。

最后要补一个提醒，免得读者把“土的来历”当成又一个新的统一。

土的来历，不是一个“答案”，不能拿来替代三条律，更不能变成“这块土天生就该怎样”。一旦把来历说成“命里注定”，就又回到了形而上学，这一回统一的是E。本书最后一章会专门讲这个危险。这里只说一句：问来历，是为了让三条路在走之前知道自己踩在哪里，不是为了给路下一个定论。

还有一件事，要在这里留一个标记。

老祁那张纸上，有一栏是缺的。三个村里，原来有一个晒谷场，傍晚的时候，老人们爱聚在那里，什么也不干，聊聊天。这件事没有哪个局负责，没有一份材料提到，也没有任何一栏可以填它。它既不增长，也不是福利，也不是权利。

这种东西，在这三份材料里没有位置。三条律，不管谁走在前面，都装不下它。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的卷七要专门讲“无用”。

◆ 14.4　小结

整个第14章其实只在回答一个问题：来回摆动一百多年之后，我们是不是已经学会了平衡？答案是：学会了轮流，还没学会平衡。轮流是三个人各当一次主人，平衡是三个人坐在同一块土上，看见自己的路怎样互相写。

本章要留下的，是下面这句判词：

钟摆不是平衡。每一次摆动，都是把整个国家的路，重新统一在一条律上；平衡，是三方程都不把任何一样当成给定。

三个领域（经济、法律、政治）里，同一场拉扯在重复；摆动不属于哪个党，是土里一次次积累的张力，借着危机被推出来；每一次摆动在土里留下东西，所以年轮越来越厚，可是每一圈仍然只有一条律在前头。

这一章没有评判过任何一派。三派都是真的，都完成了真实的统一，都留下了真实的东西。要说的只是：**每一派都是一次统一，统一的次数再多，也不等于平衡。**

三派轮流坐庄，是被迫的轮流，三方程平衡，是一直照看。后者需要一样东西：土的来历。这个能力，是未来的知识经济要长的东西。

可是治理只是一个国家公共的账本。人真正过日子的地方，不在国会，不在法院，是在一个星期里的几间屋子。下一章，我们跟着一个家庭，过一个星期天：上午去教会，下午去镇上听一场听证会，晚上陪孩子去高中的机器人工坊。三条律，在这个家庭的一个星期天里，各占一间屋子，各讲各的话。他们之间的走廊，是怎样越来越窄的？

◆

15

第15章

三厅：一个星期天走过三间屋子

◆ 15.1　林家的星期天

上一章的结论是：钟摆不是平衡。三派轮流坐庄，每一次摆动，都是把整个国家的路重新统一在一条律上；轮流是被迫的，平衡需要一直照看，而照看需要土的来历。那一章停在国家的账本上，停在会议室和年表里。

可治理只是公共的账本。人真正过日子的地方，不在国会，不在法院，在一个星期里的那几间大厅。第11章曾经说过，这片土早早就把意义分了家：幸福住进教会厅，自由住进社会厅，创造住进科技厅。到了这一章，我们不再从年表上看这件事，而是跟着一个家庭，亲自走一遍。看看三条律，在一个普通星期天里，怎样各占一间屋子、各讲各的话；他们之间的走廊，又是怎样越来越窄的。

钟摆摆动的时候，人还得过日子。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家庭，不是哪一家的真事。姓林，住在美国东部一座大学城边上的郊区。男主人林建平，在一家做物流软件的公司写代码；妻子周敏，在附近医院当护士；女儿十五岁，上高中；这个月外婆从国内来探亲，住在家里。

星期天早上八点四十，一家四口出门。周敏开车，建平在副驾驶座上回最后一封工作邮件，外婆坐后排，女儿戴着耳机。

九点半，他们坐进一间华人基督教会的礼堂。这间教会很普通：中英文两场崇拜，楼下有中文学校，门口有人发周报。牧师那天讲的是一段人在困境里得安慰的经文，没有讲大道理，讲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最灰的日子里被另一个人陪着走

过。证道之后分小组，围成圈，每人讲讲这一周。周敏说自己上周值了两个夜班，累，有点怕自己对孩子没耐心。旁边一位阿姨握了握她的手，说：“我们为你祷告。”中午是聚餐，每家带一道菜，长桌上有红烧肉，有意大利面，有人带了一大盒切好的西瓜。外婆吃了两碗，说这里的人真热心。

下午两点，一家人换了一个地方。镇政府的会议室里有一场公开听证：镇公园旁边有一块空地，有人想建儿童游乐场，有人想留着当草地，有人想卖给开发商盖公寓。会议室前面坐着五位议员，旁边有一位书记员，桌上放着计时器。想发言的人在门口登记，每人三分钟，铃一响就得停。建平没有登记，只是坐在后排听。他听见一位住在公园对面的老先生讲，这些年孩子在草地上踢球的声音是他最舍不得的；听见一位年轻的爸爸讲，镇上七岁以下的孩子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可去；听见开发商的代表讲，镇上缺的是中小户型的房子。没有人问“这块地对人生有什么意义”，议员们说的是“感谢您的意见”，然后按程序讨论、表决，下一次会议再议。

晚上六点，女儿的机器人队在高中的工坊里开工。这是一个周日晚上的常规活动：几个孩子围着一台半成品的机器，有人焊线，有人调程序，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工程师蹲在地上看一个传动装置。白板上写着这周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最底下一行大字：“比赛前能不能让它自己把球投进去？”女儿的手上有一道新划的口子，她浑然不觉。

回家的车上，天已经黑了。外婆在后排坐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话：“你们今天去了三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挺好，可我听着，这三个地方没有一句话是互相有关的。”

车里静了一下。建平从副驾驶座回过头，想说点什么，没有说出来。

林家的人在车里没有再说话。可是那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外婆放进了她自己的秤里。她在国内住的那座小城，也有教堂，也有开会的地方，也有做新东西的人，可那些东西不是分在三个整块里的：同一个楼道里，你的邻居可能同时是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孩子学校的家长、你家里办白事时来帮忙端菜的人。她不懂这三间屋子的来历，但她看得见一件事：这里的人把“一个人”拆成了三份，各份在各自的屋子里被认真对待。

这句话是这一章的由头。外婆没有读过哲学，她只是第一次一天之内走过这三间屋子，像一个刚到某个城市的人，一天里换了三种口音。她听见的是：三间屋子各讲各的话，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好，可是没有一间屋子，管着这三种话怎么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选一个移民家庭来做这一天的向导？因为一个在这块土上长大的人，早已习惯了从一间屋子走进另一间屋子时自动换口音，像本地人不觉得自己在说方言。一个刚来不久的家庭还做不到，他们得一间一间地学规矩，学每一间屋子里“什么话算数”。他们是这三间屋子天然的测量员。林家在教会里学会了“先说难处”，在听证会上学会了“先说权利”，在工坊里学会了“先说做了什么”。三句“先说”，就是三间屋子各自的入场券。

本书把这三间屋子叫作“三厅”：教会厅，社会厅，科技厅。这里的“教会”取宽义，指各种信仰共同体，同一条街上，星期五有人去清真寺，星期六有人去犹太会堂，星期天有人去教堂，也有人去寺庙，这里借“教会厅”一个词来统称。

三厅各自讲一条意义律：教会厅讲的是幸福，社会厅讲的是民主与自由，科技厅讲的是创造。这三句话要小心说。它们不是说教会里没有创造、科技里没有幸福，也不是说哪个厅在撒谎。它们说的是：每个厅对外、对公众、对自己的正

式语言里，有一条律站在最前面，另外两条律即使在场，也是用这一条律的话说出来的。

这和前面第1至3章的结构是同一种。皮尔斯、詹姆斯、杜威各自把路统一在一条律上，另外两条被收在底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动作不只发生在三个人的笔下，它也发生在三间屋子的墙上。

还可以换一个更简单的办法认出三间屋子：看每间屋子进门时问的第一句话。教会厅问的是“你还好吗”。社会厅问的是“谁来决定，怎么决定”。科技厅问的是“能做出来吗”。三句话都是好问题，都出于好意。一个人若在一天之内连续被三句话问过，他的回答要随之换三次：对第一句，他讲自己的状态；对第二句，他讲自己的立场；对第三句，他讲自己的成果。三个答案，说的是同一个人，却几乎没有一句可以原样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

先说清楚这一章的判断在什么情况下是错的，好让读者有个检验的办法。如果发现，在这块土上，普通的教会、议会、科技社群，各自都习惯于在自己的正式语言里，把三条律平等地、不借用别人的话说出来，彼此听得懂，那么“三厅各讲一条律”这个判断就不成立。反过来，如果读者在自己见过的教会、会议室、实验室里，能数得出许多次“翻译”，那就是这个判断站得住的地方。

本章要做的，是一间一间地走进去，先看它真有的好，再看它讲话的方式，最后看三间屋子之间那条走廊为什么越来越窄。顺序不能反：如果一上来就挑毛病，我们会错过一件事，那就是三个厅都不是被谁设计出来的坏东西，每一间屋子，都是这块土一点一点长出来、而且确实解决了真问题的地方。

判词：三厅不是三种立场，是三种分工；分工越成功，越没有人管分工之后的那个人。

◆ 15.2　教会厅：幸福的屋子

先走进第一间屋子。

那天聚餐时，周敏的朋友老殷没有来。他的丈夫三个星期前去世了。教会里有一个妇女小组，在老殷丈夫走后的第二天就排好了一张表：周一到周五，每天一家人送一顿饭到她家门口，不进门，不多说，放下就走。这张表排了六个星期。老殷后来说，那六个星期里，她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每天傍晚，门口会有一个保温盒。

这是教会厅最真的好。不是讲道理，是有人在你最不想说话的时候，把饭放在你的门口。

后面所有的讨论，都要在这件事的旁边站着，不能绕过去。

– 这间屋子是怎么长成这个样子的?

美国没有国教。1791年批准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头一句就是国会不得制定设立国教的法律，也不得禁止信教自由。这是一个影响极深的安排：各教派之间没有谁能靠国家的力量把别人收进自己名下，一间教会能不能站得住，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每个星期天自己来。

这就是前面说的土：多种来源缝起来，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在这样的土上，信仰共同体的存在方式，是一个“自愿加入、可以离开”的聚会。研究美国的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他那本有名的《论美国的民主》里，写到美国人爱结社，也写到宗教在这里和政治分开站着，各自有力。

同时，美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宗教复兴，通常叫“大觉醒”，第一次在十八世纪，第二次在十九世纪初。这些复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个人的内心经历，一个人有没有被触动，有没有一个“我真的信了”的时刻。詹姆斯后来写《宗教

经验种种》，写的正是这种个人的、亲身的宗教经验，上一卷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用“带来了什么样的生活”来衡量它们的。

这样两样东西合在一起：一方面，教会要靠人自愿回来；另一方面，信仰的重心落在个人内心的安稳与更新上。教会厅对外说话的方式，就慢慢向一个方向倾斜：一个人来了，能不能得到安慰，得到归属，得到力量把下周过下去。这一条，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幸福律。

必须马上补一句：这是对教会厅在三厅分工里被分到的那份活的结构描述，不是对信仰内容的评判。信仰本身的内容，比“幸福”宽得多，也深得多：有赎罪，有末世，有苦难的意义，有对死亡的面对，有“人不是为幸福而活”的教导。这些在任何一个认真的教会里都有。我们谈的只是一件事：当这些内容走到公共的场合，走到周报、证道、小组、募款的语言里，它们倾向于用哪一条律的话来说。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常被人忽略。许多信仰传统里都有“安息”的日子：这一天不工作，不赶路，不做该做的事。它是三厅里难得的一块“明文规定的无所事事”，本身有着极深的内容。可是当这个日子被讲给外面的人听的时候，常见的说法是：休息了，才能更好地工作；歇一歇，人会更有力气。这当然是对的。只是我们要看到，一段本来不为什么的时间，一走到公共的语言里，就要先说出它“为了什么”。这一点，也留到后面再说。

同样的结构，并不只属于一种信仰。街上的犹太会堂、清真寺、寺庙、锡克教的谒师所，同样是自愿聚会的地方，同样承担着陪伴、接济、办学、办节的责任，有的还有免费的公共饭食。它们的教义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并不能互相替换，本书无意把它们压成一个模子。这里只说一个共同的结构位置：在这块没有国教的土上，所有信仰共同体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对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人

愿意回来，怎样在公共的话语里说明自己的价值。对这个问题，各家有各家的回答，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回答，都落在了“陪伴”和“安顿”上。

– 这种倾向有几种表现

一种比较显眼的是“成功神学”，也叫“繁荣福音”，在一部分大型教会里流行。大意是：信心与健康、顺利、财富有某种联系。它的支持者说，这是在教人有盼望、敢祈求、乐于给予；它的批评者，包括不少教会内部的神学家，说这样会让信仰变窄，因为经文里同样写着受苦和等待。双方都有认真的论证，本书不在这里裁判。我们只记一件事：这场争论本身，就发生在“幸福”这条律的内部，争的是“幸福该怎么理解”，几乎没有人争“要不要把幸福放在前面”。

更早的一个例子是195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诺曼·文森特·皮尔写的《积极思考的力量》，他是一位牧师，书里讲的是怎样用信仰的态度应对生活，卖得极好。读它的人从中得到了安慰和劲头，这是真的；它也让不少人注意到，“信仰对你有什么好处”这个问法，可以这样顺畅地进入公共的语言。

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种种》里的做法，正好是这种倾向的一个哲学版本。他不问各种宗教的教义谁对谁错，他问：这样信的人，生活变成了什么样子？以果子论根。他的这种问法值得敬重，因为它放下了争吵，换成了观察。可是它也让一件事变得很自然：一个信仰的价值，用它带来的生活改善去衡量。回到教会厅的周报上，我们读到的“见证”，大多是这样的故事：我原来很焦虑，后来平安了；我原来家庭破裂，后来和好了。这些故事是真的，也很动人。它们同时说明，这间屋子最流通的货币，是“我变好了”。

– 那创造与自由呢?

教会厅里从来没有缺过它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一批牧师和神学家讲“社会福音”，说基督徒的责任包括改造劳工的处境、改造城市的贫困，代表人物是沃尔特·劳申布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教会，尤其是黑人教会，是民权运动的中心，那时教会厅里讲的是自由与正义，讲得惊天动地。天主教有它自己的社会训导传统。各种宗教里，有的建学校，有的办医院，有的做慈善，有的搞艺术，都是创造。

第11章里已经提到，社会福音是幸福的厅和自由的厅试着合在一起的一次努力；它有成有败，也说明分家是倾向，不是定数。可请注意，当教会厅在这些时刻讲话，它往往是借用了别的厅的语言。讲社会福音和民权的时候，用的是权利、正义、公民的话，是社会厅的话；讲办学建院的时候，用的是项目、预算、成效，是科技厅或者说是组织的话。教会厅的“本语”，也就是它不借就能说的话，始终是那一句：你来了，你被接住了。

再看一个细节：小组里的“分享”。围成圈，每人轮到说一说，不打断，不评论，不争辩。这是一套极好的办法，让一个平日说不出口的人可以说出口。可它也有一个看不见的规矩：说出来的东西，要能被接住。一件能被接住的事，通常有这样的形状：有一个难处，有一个情绪，有一个盼望。一个人若是说“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还没想明白，不知道对不对”，这句话就很难在小组里找到位置，因为接不住。幸福律的屋子里，话是为了被接住而说的。

楼下的中文学校，是这间教会里另一块实在的地方。星期天上午，孩子们在教室里学拼音，学写“人”“大”“天”，家长们在走廊里互相交换哪家补习班靠谱、哪家的医生好。这是一块很特别的土：一个家庭在新地方最怕的，不是没有饭吃，而是孩子长大以后，听不懂自己父母的话。教会厅替这些家庭保住了一条路，让一种语言、一种饭菜、一些节日，有地方继续活着。

这些事，不是任何一间别的屋子愿意、也不是它们应该去做的。议会不负责教孩子认字，公司不负责做年夜饭。教会厅在这里，替整个社会做了一份没有人付钱、也没有人下命令的事。

– 这对一个来自别处的家庭，是一件很具体的事

外婆从国内来，在这间教会里吃了两碗红烧肉，感觉到的是热心、体贴、被欢迎。这是教会厅最先给的东西。周敏说，她刚搬来的头两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在这里认识的。一个新来的移民家庭，到了一块没有祖宗、没有亲戚的土上，教会厅替他们补上了一块“熟人社会”。这是它在这块土上做的最实在的事。

但也有它够不着的地方。

那天小组里，有一位年轻人说，他最近觉得没意思，说不上为什么，不痛苦，也不开心，就是什么都提不起兴致。立刻有人说：“我们为你祷告。”有人给他讲了一句经文。大家都很善意，也很快。

这里没有人做错什么。可一个人说“说不上来”的时候，那团说不上来的东西，其实还没有成形，它还不是痛苦，也不是快乐，更不是一个可以被安慰的问题。教会厅的话是为“有难处的人”备好的，他得先成为一个“有难处的人”，才有位置。一团还没有形状的东西，在幸福律的屋子里，常常被过早地认成了“难处”。

这一点我们现在只记下，不展开。到卷七讲混沌的时候，会回到这里。

还有一件事，周敏后来才想明白。那些保温盒，是教会厅里最好的东西，但它们几乎都靠熟人：知道老殷家住哪里，知道她不吃辣，知道哪一天适合送。这种知道，是一块块积累起来的土，不是哪一张表格能写出来的。幸福律的屋子里

最动人的部分，恰恰是它最深地扎进了具体的人的来历。这一点，在后面讲土的来历时，会变得很要紧。

判词：教会厅把“活得下去、活得安稳”讲到了头，也把创造和自由用这句话的口音讲了出来；它能接住一个痛的人，却很难接住一个还说不出自己是什么的人。

下一间屋子，换一种讲法。

◆ 15.3　社会厅：自由是脚下的地板

第二间屋子里，铃响了。

下午的听证会上，有一位女士正说到一半，书记员轻轻按了一下计时器，议员说：“谢谢您，时间到了。”她愣了一下，把没说完的半句咽了回去，坐下了。坐下之后她旁边的人悄悄说：“你应该先说最要紧的那句。”

这是社会厅里最不起眼、也最要紧的一个规矩：每个人都有三分钟，不多，也不少。

三分钟里，你可以说你对这块地的看法，可以说你小时候在这里踢过球，可以说你怕噪音，可以说你替没来的人说话。议员们不会反驳你，也不会追问你“这对人生有什么意义”。他们记下来，然后按另一套办法决定：怎么投票，怎么通过，什么时候再议。

那天坐在后排的建平，第一次觉得，这间屋子其实挺奇怪的。几十个人带着各自最看重的东西来，有的是怀念，有的是担忧，有的是生意，有的是孩子；屋子里没有人要求大家看重同样的东西。屋子要求的只是：谁能讲，讲多久，怎么算数。

– 这一套是怎么长出来的?

在清教的村镇会议里，在殖民地的议会里，在独立之后的各种宪法安排里，同一件事被一遍一遍地做：没有一个共同的上帝能裁判大家，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宗能压住大家，于是只能让大家按同一套程序来商量。托克维尔当年到美国，特别看重的，正是新英格兰的乡镇：居民自己开会，自己决定乡镇的事，他把这看作自由生活的学校。1791年增补的那几条宪法修正案，也就是通常说的权利法案，规定了言论、集会、宗教、出版这些自由，规定了没有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开会这件事还长出了一套大家通用的细则。亨利·马丁·罗伯特在1876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后来被叫作《罗伯特议事规则》，美国许多社团、协会、议事机构至今在用，大意就是：怎么提动议、怎么附议、怎么辩论、怎么表决，都有定规，保证每个人都能说，也保证多数能做出决定而少数的话不被吞掉。

用我们的话说，社会厅的核心语言是：权利，程序，公平，大家说了算。它讲的是民主，更深一层讲的是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不被强迫的自由。杜威后来把民主说成一种“生活方式”，说成一群人靠交流把各自的经验汇到一起，这一章我们不再重复，只指出，杜威的话在这间屋子里不是学说，是日常。

– 社会厅的好，也要先看足

这场听证会上，对面那位老先生是真的怕。他的屋子就在公园对面，已经住了三十年。如果没有这一套规矩，一块空地要建什么，也许是开发商和某些官员私下谈妥的事。有了这三分钟，有了公告，有了记录，老先生可以走到前面，站到话筒前面，让五位议员听见他的名字。他说什么，不一定会改变结果，可是他说了，结果是在他说过之后才有的。

这是一种很贵的东西。对一个移民家庭尤其如此。外婆坐在后排，听不懂英文，但她看见了一件让她吃惊的事：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先生和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着同一个话筒，彼此不同意，没有人推搡，没有人喊，铃一响就停。她后来说：“这件事我回去会讲给人听。”

– 那为什么说“自由是底层”？

这是本章要立住的第一个判断，值得放慢来讲。

回头看前面两间屋子，和后面那一间。

教会厅的门，是谁开的？是自由。一个人可以决定去哪间教会，可以换，可以不去，可以去清真寺、去会堂、去寺庙，也可以哪里都不去。教会厅之所以必须靠人自愿回来，是因为这块土没有国教。这扇门是自由律开的。

科技厅的门，是谁开的？也是自由。一个人可以辞职自己开公司，可以提出一个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想法，可以公开自己的代码，也可以和别人抢同一个市场。没有人规定谁有权去创造什么，也没有哪个机关能说“这个东西不许做出来”。（当然，法律管着安全和欺诈，那也是社会厅的事。）这扇门，同样是自由律开的。

而社会厅自己，它的功能，就是守住这些门不被锁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契约自由。

所以三个厅里，社会厅的位置有一点特殊。它不和另外两个厅并排站着，它站在它们脚下。教会讲幸福，科技讲创造，社会厅管的是“让你去讲幸福、去做创造这件事不被别人拦住”。自由律在这里的用法，不是“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而是“路都开着，你自己走”。

这和第3章讲杜威时说的是同一件事：路越多越好，路不能被关上。杜威统一于自由，而这块土的地板，正是一块自由的地板。这并不是巧合，是回写：土先长出了这样的地板，杜威把它写成了方法，方法又被铺回地板里，地板更牢。这条回写的线，第11章已经讲过，这里只露一个头。

外婆那天问了建平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愿意站起来说？”建平想了很久，说，大概是从小就被教过，一件事和你有关，你就有资格说。外婆没有再追问。但她后来跟周敏讲过一句话：“我们那边，有事是先找人，这边是先找规矩。”

这句话很朴素，却点中了一件事：社会厅里的信任，不是放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放在一套大家都能看见的规矩上。对一个新来的人，这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陌生：你不必认识谁，也能参与；可你也很难因为认识谁而被特别对待。规矩对所有人都一样，也对所有人都冷一点。

这就是自由律的地板的质感：平，稳，对谁都一样，不拐弯。

– 可是，地板有地板的限度

地板告诉你：每扇门都开着。地板不告诉你：该走进哪一扇。

听证会上，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她的丈夫去年去世了，那块空地以前是他们每天傍晚走过的地方，她希望那里不要变。议员们很客气，书记员记下了她的名字。可是这句话在那间屋子里的位置，和开发商代表手里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分量。数据可以被计算、被比较，“想念”没法被投票表决。

这不是谁的错。社会厅被造成这个样子，就是为了不去裁判“什么是好的生活”，因为一旦它去裁判，就会有一部分人被它压住，就是它要避免的那种事。所以它的话是：每个人的好，都是私人的事；公共的事，只管公平。

于是，创造和幸福在社会厅里，被分到了“私人”的那一侧。你可以去教会找幸福，可以去工作室里找创造，那是你的权利；社会厅管的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利。这和第4章讲的罗蒂那样的哲学家，把一个人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放进一个“私人的抽屉”里，是同一个形状。

这样安排，有一个我们之后会反复碰到的后果：那三条律怎样在同一个人身上合起来，不归任何一间屋子管。社会厅只管门，不管门里。

社会厅自己的内部，也有顶撞。民主是多数说了算，自由是少数不被碾过去，这两句话并不总是同向的。托克维尔当年就写下过他的担忧，叫“多数的暴政”，意思是多数人的意见一旦压倒一切，反而成了对个人的威胁。所以美国的制度里，除了投票，还有权利法案、独立的法院，用来在多数面前守住个人。上一章讲的政治、经济、法律三派的拉扯，有一部分就发生在这里：议会代表多数的意愿，法院守的是权利，而它们都站在自由律的这块地板上。

这给我们一个提醒：社会厅不是铁板一块，它内部也有自己的钟摆。只是无论往哪边摆，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谁说了算，谁被保护”，这个问题和“什么是好的生活”隔着一层。

那场听证会的结果，是“延期表决”。书记员念出来的时候，会议室里有人叹气，有人皱眉，有人收拾东西往外走。外婆问建平：“这么多人说了这么久，怎么没个结果？”建平想了想，说：“下次还会再说。”

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想的地方。慢，是社会厅的一项功能，不是它的缺点。一个事情要被许多人说一遍，才算被许多人认过。快的屋子是科技厅，慢的屋子是社会厅，一个让人敢于从零开始，另一个让人不被一脚踢开。两种速度，在同一个人身上要同时用，这也是三厅间那条走廊要接的东西之一。

社会厅里还有另一件事，要留意。

听证会上登记发言的，大多是退休的人、有时间的人、利益最直接相关的人。周敏所在的医院，夜班和白班轮着上，她的同事们几乎没有人能在星期天下午两点坐在会议室里。这扇门是开着的，只是进去要有时间、有语言、有胆量。社会厅为此设计了书面意见、网上提交、延期表决这些办法，也确实让更多人能参与。可是这里有一个深一层的事实：自由律保证的是“你可以”，不保证的是“你能”。一个人有没有说话的自由，和他有没有走到话筒前面的条件，是两回事。

这并不是社会厅的毛病，而是地板的性质。地板可以托住所有人，却不能替每个人迈步。托住，是自由律最大的好；不替人迈步，也是自由律最本分的样子。这一点我们在第3章已经看见过：路越多越好，可路上怎么走，不由路来管。

判词：社会厅把“路不被关上”讲到了头，所以另外两间屋子才能平安地各讲各的；也正因此，它不问任何一个人，走进去的是哪一扇门、为了什么。

接下来，是最热闹的一间。

◆ 15.4　科技厅：创造的屋子

晚上六点的工坊，和下午的会议室，像两个世界。

没有铃，没有三分钟。一个女孩趴在地上看一条传动皮带，旁边的男孩在笔记本上改一行代码，另一个孩子拿着焊枪，嘴里念念有词。退休的老工程师没有教他们该怎么做，他蹲在旁边，问了一句：“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卡？”女孩说不知道，他说：“那就先让它卡一次，看看。”

白板上那一行字，是整个屋子的律：“比赛前能不能让它自己把球投进去？”

这间屋子里没有“该不该”，只有“能不能”。一个想法如果能做出来，就留下，做不出来，就改。失败不丢人，丢人的是失败了没有改。女儿的手上有一道口子，她根本没注意。

外婆也来了，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了半个钟头。她小声问女儿：“这个做出来干什么用？”女儿想了一下，说：“比赛。”老工程师在旁边笑了，说：“也是想知道我们能不能。”

这就是科技厅的本语：能不能做出来，做出来以后能不能更好。

– 它是怎么长成这样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爱迪生在新泽西的门洛帕克建起一座实验室，常被后人称作“发明工厂”：一群人，各种设备，目标是源源不断地做出新东西。二十世纪里，大公司纷纷建起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把发明变成一件有组织、有预算、有周期的事。二战中和战后，国家大量投入科研，大学里的实验室和工业里的实验室一起长大。

在这块“多来源缝起来”的土上，这种安排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不需要大家先同意一个共同的信仰，就能一起做一件事。你信什么，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不问；只要这个装置能转，这行代码能跑，这个东西卖得出去，我们就能一起干下去。创造，在这里成了一种谁都能进来、谁都能被承认的货币。

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把这种安排推到了极致，也带来了一套自己的话：“改变世界”“颠覆”“迭代”“快速试错”。有一家社交网络公司早年把“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当作内部口号，创办人也公开讲过这句话，后来公司自己把它改掉了。这些话的口气，和皮尔斯笔下那个“习惯一路长出来”的宇宙，几乎一脉相承：好的东西，就是比昨天多长出一点点、而且还能继续长的东西。

— 科技厅的好，同样要看足

那个女孩的机器第一次把球投进去的时候，整个工坊安静了半秒，然后炸开了。女儿后来说，那半秒是她这一年里最开心的时候。这种开心不是被安慰，不是被接纳，是做出了一个原来不存在的东西。

创造律的快乐是真的。它让人愿意熬夜，愿意面对一次次失败，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相信自己的手能让世界上多一件东西。移民家庭尤其看重这一点：在一块陌生的土上，你的口音、你的出身都可能被打折，可是你能让一台机器转起来，这件事没有人能打折。

这份快乐有一个特点，值得说一句：它是被做出来的东西证明的。女儿那天晚上回家，没有说“我今天很开心”，她说的是“它投进去了”。创造律的快乐，不是向内看到的一种感受，而是向外看到的一件事实。所以它很稳，别人也能分享；可它也因此很难安放那些没有事实可摆出来的日子：做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做出来，那一个星期算什么？在这间屋子里，常常只能算“还没出来”。

— 那幸福和自由呢，在这间屋子里去哪了？

在科技厅里，它们也有，而且讲得很多，可是换了一种口音。

幸福在这里叫“用户体验”“让用户满意”“愉悦”，后来越来越多地被量成一些数字：留存率，使用时长，满意度打分。一个产品让人开心，是好事；可开心被收成一个读数以后，它就成了创造的信号灯，用来检验“这个东西是不是做对了”。这个动作，和皮尔斯把幸福当作“信号灯”是同一个动作：幸福在场，但替创造干活。

自由在这里叫“开放”“开源”“平台”“生态”。公开代码，让别人自由使用、修改，这是一种很美的做法，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可它在科技厅里通常被这样说明：开放能让更多人参与，参与多了，东西就长得更快。自由也在场，也替创造干活。

这不是指责。它只是在说：科技厅的语言有一条主线，就是“能不能让它长”，其他的话是从这条线上分出来的支线。

这一点，在那个晚上，有一个很小的瞬间显出来过。机器人队里有个孩子，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什么贡献，他对机械兴趣不大，只是喜欢待在工坊里，帮人拿拿螺丝，听大家说话。他从来没有被批评过，可是在白板上，没有他的名字，在“这周谁解决了什么”的列表里，也没有他。有一天，他没有再来。没有人觉得出了什么事，因为在这间屋子里，“来不来”的理由，只有“做出了什么”这一条。

这件事没有人做错，它也提醒我们：一间以创造为本语的屋子，对“不创造的在场”，没有现成的位置。

“改变世界”这四个字，也值得多看一眼。它的口气是宏大的，可落到工坊里，却是极具体的：一个传动装置的间隙，一行代码的边界，一块板子的接口。大话和小事，在这间屋子里是连着的，大话靠小事一件件兑现，小事靠大话保住意义。这大概是科技厅最动人的地方。

它的另一面是尺度：一件事如果“改变”不了什么，就容易被看成不值得做。一个做得很细、很好、只服务十几个人的小东西，在这间屋子的语言里，很难说得响。这不是这间屋子的错，它的尺子本来就是为“能不能长出来”造的。

说回那位退休的老工程师。他叫老胡，也是这个构想里的人物，是这座城里一家老公司早年的研发人员，如今退休了，每周日晚上来工坊。他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女儿一直记着：“你们做坏了十次，我做坏过一百次，没有一次是白坏的。”

这句话是科技厅最美的一句话之一，它给失败一个名分：每一次坏，都被记入下一次的起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的“回写”，创造律把回写做到了极致。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屋子里长大，会得到一种很结实的底气：我做不出来，不代表我不行，代表我还没试够。

可是老胡的这句话，也划出了一条界线：被记入下一次的坏，才有名分。不会长出下一次的东西，不在这个账本里。比如那个后来不再来的男孩，他在工坊里待着的那几个星期，对他自己可能很要紧，只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记进“下一次”里。

还要补一个要紧的观察：科技厅的语言，正在悄悄走出自己的屋子。

今天的教会，直播崇拜，有的发布“本周观看量”；镇上的听证会，开了网络直播，网上有留言区，有点赞；连林家的外婆，也把教会的聚餐照片发给了国内的亲戚，收到了一串“点赞”。这些都是科技厅做出来的东西，它们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不能到场的人，可以看见了。

可工具带着自己的尺子。当一场讲道有了“观看量”，当一次发言有了“点赞数”，另外两间屋子里的东西，就多了一个可以被数、可以被比、可以被优化的读数。这个读数不是教会厅的，也不是社会厅的，它是创造律的语言：能不能让它长。这件事不是谁的阴谋，是一件东西很自然地带着它出生的那间屋子的口音，走进别的屋子里。

用三原理的话说，这就是回写：科技厅做出来的东西，写进别的两个厅的日常，别的厅的土因此被改了一点点。久了，一种话会越说越多，另两种话越说越难。

这间屋子里的人，对时间的感觉也不同：它看的是下一次演示、下一场比赛、下一个版本。昨天做出来的东西，今天就是起点，所以这里的人很少回头，也很少停。这种向前的劲头，是创造律最大的好处，同时也让“停一停”没有位置。

判词：科技厅把“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讲到了头，所以它让人敢于失败、敢于从零开始；它的另一面，是不出东西的时间，不出东西的人，在这里没有名分。

三间屋子都走完了。可真正的问题不在每一间屋子里，在它们中间。

◆ 15.5　走廊为什么越来越窄

回到那辆车上。外婆说完那句话以后，车里安静了一会儿。周敏先开口：“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吧，教会里也有人做工程师。”建平说：“对，上个月小组里还有人讲怎么看人工智能。”

他们说的都对。可外婆的意思，并不是三间屋子里的人互不认识。她的意思是：这三间屋子说话的方式，彼此接不上。

让我们再看一个更具体的人。构想中的老彭，六十岁出头，是教会的执事，是镇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一家初创公司的顾问。他每个星期，都要在三种桌子之间坐一圈。

在教会的董事会上，他说话温和，先问大家近来可好，再谈预算。在规划委员会，他说话谨慎，每一句都要想想是不是符合程序，会不会有人说他偏袒。在初创公司的会议室里，他说话快，爱问“所以下一步怎么走”。三处的人，都觉得老彭是个靠谱的人。

老彭自己说，有时候走出一间屋子，他得在车里坐几分钟，才能把上一间屋子的口音放下来。他说：“我像个翻译，三种话我都会，可是翻来翻去，我自己的那一句，不知道放哪儿了。”

老彭是一座活的走廊，他之所以累，是因为走廊的功能没有人替他承担。从前的牧师兼博物学者，还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让三种话汇合；今天，汇合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白白花力气，而且这份力气没有任何一个厅给他记账。

– 先看三种“听不懂”

建平有一次在小组里说，他们团队这周迭代了三个版本，进度赶上了。小组里的人很友好，点头，说：“感谢主，愿你平安。”建平突然觉得，这句话和他说的那件事，像是隔着一层玻璃。他说的是“做出了东西”，对方回的是“你好好的”。幸福律的屋子，听见创造律的话，听出来的是辛苦，是压力，是一个需要被关心的人。

周敏在听证会上有一次想开口，替那些夜里要上班、没法来开会的人说句话，她想说的是“让大家日子好过一点”。会前有位熟人提醒她，这样说在这间屋子里不太算数，要说的是“这项提案影响了谁的权利、符合哪条规定”。社会厅听见幸福律的话，听出来的是情绪，是需要被转译成权利才能进入议程的东西。

女儿在教会的青年团契里，讲过机器人队怎么让一个球自己飞进框里。大家觉得很酷，有人问：“那你从中得到了什么感动？”她愣了一下。教会厅听见创造律的话，要问一句“它让你的心里有什么”。

三种听不懂，是一个形状：每个厅都有一个“翻译口”，别的厅的话必须先翻译成它自己的律，才进得来。创造的话要翻成“辛苦”才进教会，幸福的话要翻成“权利”才进议程，自由的话要翻成“产品功能”才进科技厅。翻译不是不诚恳，可翻译会漏。漏掉的，恰好是原话最独特的那一部分。

— 再看这条走廊从前是什么样子

美国早期的大学，哈佛（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耶鲁（十八世纪初）、普林斯顿（十八世纪中叶），都是教会背景的人办起来的，目的之一是培养有学问的牧师。可同一个校园里，也教自然哲学，也有辩论，也培养后来的公职人员。一个人可以在同一座学院里，同一个星期，念经文，做天文观测，参加一场关于殖民地事务的辩论。十九世纪的很多人物是“一身三任”的：牧师兼博物学者，律师兼发明家，医生兼议员。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人自己，就是一条走廊，三种话在他的身体里是接得上的。

后来这一切慢慢分开了。大学转向世俗，研究型大学和工业研究室各自长大；宗教组织有了自己的神学院、基金会和募款体系；议事、司法、竞选有了自己的职业；科技公司有了自己的融资、招聘和估值。每一个厅，都长出了自己的日程、自己的钱、自己的行话、自己的职业人。这是分工的成功。一间屋子越专业，它在自己的事情上就越强。

这里有一个很自然的原因，和卷三里讲的土一脉相承：这块土上，没有任何一个厅有权要求别的厅听它的。教会不能要求议会按教义办事，议会不能要求教会怎么布道，科技公司不能要求大学只教它想要的东西（当然，它会设法影

响）。这种互不管辖，是自由律的地板保证的，也是它的代价：各厅之间要想说话，只能靠自愿，而自愿，常常等于没有。

– 走廊变窄，还有一个更日常的原因：时间

林家那个星期天，三件事被排成了三个整块：上午的整块，下午的整块，晚上的整块。每一块之间，只有那辆车。车里的十五分钟，其实就是走廊，是三间屋子之间唯一没有被排进去的缝。

过去，镇上总有一些这样的缝：理发店、杂货铺、车站、饭桌、澡堂。还记得导论里那座被拆的澡堂吗？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厅。它没有幸福律的安慰，没有自由律的程序，没有创造律的目标。去的人，是三间屋子里的同一批人，他们在那里把各自屋子里的话混在一起说：一个人刚从教会出来，一个人刚吵完一个提案，一个人刚加完班。澡堂是走廊，走廊没有律，所以没有哪个厅会替它说话。拆它的时候，会上有人问老马“说话在哪儿不能说？公园不行吗？”，其实是在问：这块地能不能归到哪个厅的账上？归不上，就是“没用”。

还有一层，是我们讨论“土”时不能漏的。这三间屋子，每一间都有自己的年表：教会有教会的年历，议会有议会的会期，科技厅有产品发布和比赛日程。三套时间，各自转，各自有节奏。人要在三套时间里同时过，就像在三条各自走的传送带上同时迈步，每一条都对，合起来却总差半拍。

这半拍，是一个人的疲惫、焦虑、“总觉得没有一件事做得够好”的来处之一。当事人常把它理解成“我时间管理不好”“我没有平衡好”，于是去找一本讲时间管理的书，或者一个讲平衡的课程。我们这本书的看法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毛病，这是三厅各自精确、彼此无缝的结果。

遇到这种张力，人们常见的补救办法有两种，都有道理，也都有限度。

第一种，是在每个厅里加一点别的厅的话。教会开设创业课、职业辅导班，是把创造的话引进幸福的屋子；公司设了员工关怀计划、心理咨询热线，是把幸福的话引进创造的屋子；议会加了一轮“社区倾听会”，是想让情感的话也能入席。这些办法常常有用，帮到不少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用本厅的律去接住别厅的话。心理咨询热线的服务，仍然要用“满意度”来评估；创业课的成败，仍然用“孵化了几家公司”来衡量。别的话进来了，被翻译了一遍。

第二种，是让每个人自己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信仰与科学的和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界”，这些说法的背后，都是同一句话：这三种东西你自己想办法摆。这是自由律的标准回答，也是最体面的回答：每个人的好，由每个人自己来定。可当一个人面前摆着三把互不相通的尺子的时候，“自己来定”常常等于“自己来累”。

这两种补救，都是补丁。补丁不是错，但它和另一种东西不同：轮换。补丁是在一条律的屋子里加上别的律的话；轮换是承认三条律各有各的时候，让它们依次当家。后者要靠对一个人、一个家、一块地的土的了解才做得成，那是全书最后一卷的话题，这里先放一个标记。

– 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后果：张力无处安放

三原理说，动力来自两维之间的顶撞。三个厅各讲一条律，它们之间当然会顶撞：创造要快，幸福要稳；自由要选择，创造要专注；幸福要归属，自由要可以离开。这些顶撞，在大尺度上，是前一章讲的治理的钟摆。

可是钟摆摆得再大，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顶撞最后只落在一个地方：他自己身上。

那天晚上到家以后，一家人为了一件小事争了几句。下个月机器人队有一场区域赛，日子正好和教会青年团契的一次退修会撞在同一个周末。建平说，赛事一年一次，错过了就没了；周敏说，团契里的朋友是女儿最稳的依靠，这次退修会她特别期待；女儿说：“你们别替我决定，这是我自己的事。”外婆在一边说了半句，没有说下去。

这个场景是构想的，可它的形状大家都认得。你看：父亲讲的是科技厅的话，母亲讲的是教会厅的话，女儿讲的是社会厅的话。三个人，三种话，都对，谁也说服不了谁。厨房里没有铃，没有议员，没有牧师，也没有导师，没有哪一个人，手里握着能把三句话放在一起称一称的秤。

这时候，这家人要靠的是什么？靠一点没有名字的东西：对彼此的了解，对这个孩子的了解，对这个家过去怎么过来的了解。也就是说，靠这家人自己的来历，靠一点点只有这家人才有的土。三个厅都不掌握这一份。教会厅知道她在团契里怎样，社会厅知道她有什么权利，科技厅知道她在机器人队里有多好，可这三份了解，从来没有被放在同一张桌子上。

这就是“走廊变窄”的最后一层意思：走廊不仅是过道，它还是一个人的整块来历被读到的地方。走廊一窄，每个厅看到的都是这个人的一个切面，一份“在这里的他”。三份切面加起来，也不是他，因为他是三份缠在一起长成的。

用这本书的话说：三厅各自对着人，把人的“路”拆开了，而人的“土”，没有一个厅在管。

外婆在车里最后又说了一句话，那天晚上周敏在厨房里想了很久。外婆说：“我们那边什么都挤在一起，吵得人烦；你们这边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安静是安静，可是怎么觉得有点凉？”

她没有说哪一边好。她只是把两种土的手感，用一个“凉”字说了出来。凉，不是冷，不是坏，它是各间屋子都暖和，而屋子与屋子之间有一段没有人烧火的路。

这条没有人烧火的路，就是走廊。

判词：走廊窄，不是因为谁关了门，是因为每扇门都开着、每间屋子都忙得很；窄到最后，三条律的顶撞没有地方去，只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他并没有被任何一间屋子完整地看见过。

还要停一下，说几句公道话：把窄走廊写成“退步”，是一种容易的写法，也是不真实的写法。

外婆住的那座小城，走廊是宽的：同一个人，同一个楼道，同一张饭桌，教会的事、公家的事、手艺的事，常常是同一批人在办。这样的好处是，每个人被整块地看见。可她自己也说得出代价：在那样的地方，一个想换一种活法的人，几乎没有退路，所有人都认识他，所有的话都会传回他家；一个想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的人，往往要先过“别人怎么看”这一关。

这块土的三厅分家，恰好是把那些代价一项一项地卸掉：你可以不去这间教会，不被它的邻里管着；你可以在会议室里挑战一位邻居的提案，下了会仍然是邻居；你可以开一家别人没做过的公司，失败了换个地方再来。这个分家是用走廊的窄换来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回到宽走廊”是出路。宽走廊那头，自由律不够；窄走廊这头，整个人的了解不够。要问的是：能不能既保住这块地板，又重新有一条能够读到整个人的走廊？这是后面几卷慢慢要回答的事。这一章只负责把问题放到桌面上。

◆ 15.6　三厅从哪里来，又接着哪几本书

三间屋子都走完了。收尾之前，还有三件事要交代：三厅和三位哲学家是什么关系，三厅接着站上哪几本书，读者又怎样拿三厅去认自己的一个星期。

先说关系。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件事：皮尔斯统一于创造，科技厅讲创造；詹姆斯统一于幸福，教会厅讲幸福（他还专门写过宗教经验）；杜威统一于自由，社会厅讲民主与自由（他还专门写过民主）。是不是三个人造出了三个厅？

这个问题，第11章已经回答过一次，这里换到屋子里再答一遍。不是。三个厅在三个人动笔之前就在长了：教会的自愿聚会、乡镇的开会、工场与实验室的发明，都比他们早。也不是三个厅造出了三个人，土里并没有一台机器，能一对一地生出三位哲学家。

更准确的说法是：土先长出了“意义各自分家”的倾向，三个人各自把这个倾向写成了方法，方法又被带进教会、议会、实验室，成了它们说话的底气，倾向因此更牢。这条回写的线，是卷三的主题，第11章已经把它讲透了；三厅是它的现场。第11章说，三个人“各占一间”，不是商量好的，而是分家的土需要这样三种人，也长出了这样三种人。本章看到的，是同一件事从另一头看：三种人写下的话，今天仍在三间屋子里被人说着。“各占一间”说的是他们站得最靠近的那一条律，不是说他们只在那一间里住；他们三个，都写过另外两间屋子里的事。

屋子又往前走了一步：屋子把话变成了规矩，规矩又回头养出一批说这种话的人。这是一条从土到屋，从屋到人，又回到土的回写线。每转一圈，各厅的口音更清楚，三厅之间的缝也更细。要把这条线读成一条能够动的线，而不是一堵墙，需要对土的了解，也就是三厅各自、以及三厅之间，那些缠在一起的来历。后面几卷会一步一步走到那里。

再说和站上相邻几本书的接口。站上第178号讲罗蒂时，有一个“抽屉”的说法，把私人与公共分开安放。本章往前走了一步：这只抽屉不只是一位哲学家的设计，它是社会厅在地板上的实际形状，而且三条律分抽屉的方式，三间屋子都在做。

站上第180号说杜威的尺子“只有一把”，量的是自由。本章补上的是：这把尺子之所以只有一把，不单因为杜威这样想，还因为这块土的社会厅用的就是这一把，它量“路开着没有”，不量“路通向哪”。

站上第291号从“用”走到“实”，那是在结果的一侧看问题；本章站在结果出现的那几间屋子里看，三厅各自对什么算“有效”的回答不同，这正是“症状”之所以长成那个样子的屋子。这三处，都是引用，不是重述；本章不重做它们已经做过的论证。

最后是两句提醒，防止读偏。

一句：这一章不是在说，三个厅应该合并，或者其中某个厅应该退出。三个厅各自在做的事，都是真的好，门口的保温盒，三分钟的话筒，球飞进框的半秒，缺了哪一样，这块土都会少一块。

另一句：这一章也不是在说，美国人天然分成三种人。同一个林建平，早上是教会里的丈夫，下午是听证会后排的邻居，晚上是工坊里的家长。他没有变成三个人，他是同一个人被三次不同地“叫”出来。这里讲的是屋子的话怎么说，不是人的本性是什么。

读者可以拿自己的一个星期做个练习。数一数：这一周里，我走进了哪几间“厅”？每一间厅进门时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用哪一种口音回答？在三间屋子中间，我有没有一个地方，既不用说“我好不好”，也不用说“我有什么

权利”，也不用说“我做出了什么”？如果有，这个地方叫什么，是谁在维持它？如果一个都想不起来，那说明林家的那辆车，也是你的车。

◆ 15.7　小结

三间屋子放在一起，各把一条律讲到了头。教会厅站在最前面的是幸福：被接住，被陪伴，活得安。社会厅站在最前面的是自由与民主：门不被关，每个人都能说，规则对谁都一样。科技厅站在最前面的是创造：能不能做出原来没有的，能不能让它继续长。

	教会厅	社会厅	科技厅
本语	你被接住了	你有权利说	它能不能长出来
站在最前面的律	幸福	自由	创造
真有的好	门口的保温盒	三分钟的话筒	球飞进框的半秒
借来的语言	讲正义时借社会厅，办学校时借科技厅	讲私人的好时交给别的厅	讲用户时把幸福量成读数，讲开放时把自由算成生态
接不住的	一团还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	想念、怀念一类没法计票的东西	不出东西的在场

三个厅的门，都是自由律开的：去哪间教会可以自己选，办什么公司可以自己定，说什么话可以自己说。社会厅不在三个厅旁边，它在它们脚下。没有这块地板，另外两间屋子很可能被某一方的力量吞掉。但地板只告诉你路都开着，不告诉你路通向哪里，于是教会厅里的幸福、科技厅里的创造，都被当作“私人的好”，交给了每个人自己。

三厅分工成功之后，留下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位置：一个人的幸福、自由、创造，怎样在同一个人身上合起来。每个厅都有一份对这个人的切面，没有一个厅有这个人的整块。这个缺口最先出现在车里的十五分钟，出现在一家人为了一个

周末吵起来的厨房里。这个缺口不在哪一间屋子里，所以也不归哪一间屋子来补。外婆那句“有点凉”，说的就是这段没有人烧火的路。

用这本书的词再说一遍。三厅，是D1的三条意义律在制度上的分家：创造、幸福、自由，各住进一间屋子，各有一套显露的样子（S）：保温盒、话筒、会转的机器；各有一条差异序列往前走：陪伴的序列，表决的序列，迭代的序列；各缠着一块来历（E）：教会缠着移民的乡愁和邻里，议会缠着乡镇会议和权利法案的传统，科技厅缠着实验室和市场。三者拆不开，分开只是我们为了讲清楚而做的假想性切割。

要注意的是，三厅分的是路，不是土。土是一块：同一批人，同一块地，同一套历史。可三厅的话，只对着路，不对着土。所以一个人在三间屋子里，每一间都被对待得很好，却始终没有人问他：“你这块土，是怎么一层一层长成今天这样的？”这个问题，才是下一步要往哪里走的根据。

上一章说，平衡是“三方程都不把任何一样当成给定”。放到三厅上看，这句话有了很具体的样子：教会厅把“人需要被接住”当成了不必再问的起点；社会厅把“路必须开着”当成了不必再问的起点；科技厅把“东西应该继续长”当成了不必再问的起点。三个起点，都有道理，也都是好起点。可只要它们各自被当成给定，它们就不会去问：这个起点是在怎样的土里长出来的？它和另外两个起点是怎样互相写过的？

钟摆在国家的尺度上做的事，三厅在一个家庭的尺度上也在做：每一间屋子，都是一次小小的统一。统一得越成功，越不容易看见，那三个起点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同一块土里一层层长出、又一层层互相改写的东西。

一句话收这一章：三厅各把一条律讲到了头，三扇门都是自由律开的，却没有一间屋子，负责三条律怎样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下一卷，镜头从屋子转到人。一个人从六岁到七十岁，要穿过的不是三间屋子，而是更长的三条路：教育，健康，事业。在每一条路上，那三条律又会各自派出一把尺子，来量同一个人。我们先从小学门口的一家文具店说起，那里的老板娘，每天下午都能看见三种家长。那几把尺子之间同样没有共同的刻度，这和三间屋子之间的走廊，是同一种窄。

◆

卷　五

人生卷：九块碎片

卷　序

三条律分了家，最后落在一个人身上。教育、健康、事业各有三把尺子，一个人一生被量成九块，每一块都有专家、机构和话术，整块却没有人管。

16

第16章

教育：三把尺子量一个孩子

◆ 16.1　校门口的文具店

小学门口有一家文具店，老板娘姓柏，开了九年。（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下面的人和事都是为了讲道理设想的。）

她不卖书，只卖铅笔、橡皮、作业本、文件袋、胶水、彩纸，还有几样孩子下课就想摸一摸的小玩意。她最大的本事不是进货，而是看家长。家长一进门，她看一眼，就知道今天该把哪个货架让出来。

那天下午放学前，来了三位家长。

第一位径直走到最里面的货架，拿了一本印着“思维拓展”的练习册，又问有没有做模型用的小马达。“学校下个月科技节，每班要交一件原创作品，”她说，“得赶在别人前头。”她买东西的时候，眼睛看的是别人的孩子手里拿的是什么。

第二位在门口的玩具架前站了很久，挑了一块带水果香味的橡皮、一包会变色的贴纸。“她今天考得不好，不说她了，”他说，“买个高兴的。”他付钱的时候，嘴角是松的。

第三位拉着孩子进来，说的是：“你自己挑。想买什么买什么。”孩子在货架之间转了三圈，抓起一本空白的本子又放下，抓起一支荧光笔又放下，最后说：“妈，随便。”妈妈叹了口气：“你看，让她自己选，她又不选。”

老板娘站在柜台后面，一句话也没说。她这九年看过很多遍这样的下午，她心里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没跟任何人讲过：这三位家长，有时候会是同一个人。

上个月，第二位家长也来买过小马达，那次他说的是“别人家孩子都在做”。第一位家长也来买过香味橡皮，那回她说的是“孩子这周太累了”。第三位家长呢，上学期曾经一口气买了五套竞赛资料，那是她对孩子说“你该自己想清楚”之前的事。

一位家长，一个星期里要说三种话：要孩子“出息”，要孩子“高兴”，要孩子“自己选”。三句话都是真心的，三句话各管一半，谁也不比谁更假。

上一章收在林家车里的那十五分钟：一个人一天之内穿过教会、议事、实验室三间屋子，每间屋子对他都很好，却没有一间屋子负责“这三条律怎样落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一章还留了一句话：三厅分的是路，不是土。

现在，要把镜头从屋子转到人，从一个社会推到最小的尺度：一个人从六岁到七十岁，要穿过的不是三间屋子，而是更长的三条路，教育、健康、事业。每一条路上，三条律都会各自派出一把尺子，来量同一个人。走廊不是修在大楼里的，它最后会修进一个人身上。

而一个人身上最早装进走廊的地方，就是学校。

本章的判断可以先说在这里：**教育被三把尺子分着量。每一把尺子都只听一条意义律，每一把都量得准，可它们量的，不是同一个孩子。**

◆ 16.2　三把尺子，各有各的准

先说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三把尺子，没有哪一把是坏的。

第一把，创造的尺子。

它的读数是一个字：新。

学校的科技节、学科竞赛、“创新素养”评价、各种“原创作品”的征集，用的都是这把尺子。它问的问题是：这个孩子有没有做出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一个孩子把废旧的吸管和橡皮筋接成了一台会爬的小车，这把尺子会亮起来；一个孩子把课本上的方法抄得又对又整齐，这把尺子不亮。

我们必须站在它最强的立场上说话：这把尺子管着一件极其要紧的事。人类的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一个人“长出了原来没有的东西”积出来的。一个教育如果从来不问孩子有没有长出点什么，只问他记住了什么，这个教育就是在把孩子当成仓库。创造的尺子是整个教育里最不肯让孩子当仓库的那一把。

小罗在修车铺里听出了第一声“咔”，那一刻，他身上长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习惯。创造的尺子，就是要在学校里等这一刻。

我们设想一所小学的科技节。四年级一个叫阿峻的男孩，用家里淘汰的旧闹钟拆了个齿轮，装在一个纸盒上，让纸盒里的小球每过一分钟滚下来一次，他管它叫“分钟雨”。评委老师蹲下来看了很久，问他：“这个球为什么不是每秒掉一个？”他说：“每秒掉，就听不见雨了。”

评委在评分表上写了一个字：新。

这一个字，对阿峻是什么？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拆开东西、再装成另一样东西，是一件被人认真对待的事。创造的尺子在这里做了它最好的工作：它把一个孩子身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从一堆杂物里认出来了。

可你也看见了，这把尺子的刻度是单向的：它只认“原来没有”。阿峻的同桌把闹钟拆开又原样装了回去，学会了每一个零件叫什么、怎么咬合，没有做出任何“新”的东西。创造的尺子在他面前，是不亮的。

第二把，幸福的尺子。

它的读数是：笑。

近些年“快乐教育”的说法在家长和老师嘴里越来越多，“幸福感”“获得感”成了学校评价里的词，心理老师在期末发一张表，问孩子“你这周开不开心”。这把尺子问的是：这个孩子在学校里过得好不好？

同样要站在最强的立场上：一个孩子每天早上走进校门，肚子疼、不想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把学习当成一场只许吃苦的修行，没有任何依据能说明苦就是有用的。幸福的尺子管的是一个底线：教育不能把人变成一个不会高兴的人。

站上第202号书讲詹姆斯时，已经把这条律的样子讲得很清楚——舒坦、能过得下去、少震荡。放在学校里，它的样子就是：不让孩子哭着回家。

设想另一所学校的一个班。班主任每天放学前留五分钟，让孩子们在黑板上画一个表情：笑脸、平脸，或者哭脸。一个学期下来，她发现一个叫小满的女孩，周三的脸总是平的。她查了课表，周三下午是奥数班的公共课。她没有去追问数学，她去找了教务老师，把小满那个班的座位挪到了窗边。下一个周三，小满画了一张笑脸。

这一件小事，做得对不对？当然对。孩子的肚子不疼了，这比任何东西都要紧。幸福的尺子在这里做了它最好的工作：它在“学得怎么样”之外，另外守着一个“过得怎么样”。

可也要看见它的刻度：它只认“舒服”。如果小满的周三是因为奥数里有一道她怎么也解不出的题，那种又急又不甘的难受，正是一个孩子被卡在门口、快要推门进去之前的样子，这把尺子的指针，同样会落在“平脸”和“哭脸”之间。它分得出舒服和难受，分不出难受里哪一种是故障，哪一种是门。

第三把，自由的尺子。

它的读数是：选项。

选修课、走班制、个性化学习路径、“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尊重兴趣、尊重差异——这些词放在一起，量的是一个东西：这个孩子面前有几条路，他能不能自己挑。

站上第180号书把杜威的尺子判成“只有一把，量的是自由”，那是对杜威的判语。在学校现场，这把尺子的样子是最现代的：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到大每一步都是别人替他定好的，他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自由的尺子管的是这件事——教育不能把人变成一个不会选的人。

再设想一所有“走班选修”的初中。学生每周有两个下午，可以在二十几门课里自己选：木工、编程、合唱、戏剧、桌游设计、校园气象站。开学第一周，教务系统的页面上，每个孩子面前有二十几个格子。

一个叫小宇的男孩，选了木工。选完以后，他得意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是他“自己选的”，不是爸妈替他选的，也不是老师指派的。他把这个“自己选的”说了很多遍，说得很认真。

这是自由的尺子最动人的时刻：一个人第一次发现，路是可以由自己来挑的。

但同样要看见它的刻度：它只认“路有几条”和“我选没选”。至于挑了以后，这条路通向哪里，走着走着是不是通向了一个更窄的地方，这把尺子，不量。

三把尺子，都是对的。三把尺子管的，也都是教育里真正要紧的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一件事上：每一把尺子，在它自己的地盘上，会悄悄地把另外两条律收到自己的名下。

创造的尺子看见快乐，它说：“快乐是好的，是做出新东西以后的奖赏。”它看见自由，它说：“自由也是好的，孩子得有选择的空间，才有可能做出新东西。”快乐被它当成奖品，自由被它当成苗圃——这个说法，读者在第1章里已经见过，皮尔斯就是这样对待另外两条律的。

幸福的尺子看见创造，它说：“有新东西做出来，孩子会高兴。”它看见自由，它说：“让孩子自己选，他才舒服。”创造成了让孩子开心的节目，自由成了让孩子舒服的办法。

自由的尺子看见创造，它说：“孩子自己想做点什么，就会去创造。”它看见快乐，它说：“自己选的路，走起来当然高兴。”创造和快乐，都成了“自己选”的副产品。

三把尺子都不否认另外两条律，只是都把它们安排在自己的下面。这和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三位哲学家的统一，在学校里被分成了三个科室，每个科室各管一摊，每个科室都觉得自己管的是全部。

麻烦在于，一个孩子只有一个。

下一节，我们让一个孩子同时站在三把尺子前面。

◆ 16.3　一个孩子，三张诊断书

上一节里，三把尺子各量了一个孩子：阿峻、小满、小宇。三个孩子，三所学校，三个场景，每一把尺子都量得很好。

现在我们把它们并到一起，设想同一所学校里有这么一个孩子，叫小禾，三年级。三把尺子，同一个星期，各量她一遍。

周一。科技节的评委看了她的作品：一个用硬纸板和皮筋做的“会开门的小房子”。评委翻着评分表说：“结构是对的，但这个思路，往年的作品里出现过，原创度不够。”评语栏里写了四个字：缺乏新意。

小禾站在旁边，听见了这四个字。

周三。班里的心理老师发了一张“本周心情”小问卷，十道题，每道题五个格子，从“很不开心”到“很开心”。小禾每一道题都选了中间那一格。老师把全班的表收上来汇总，在班级群里发了一份“快乐指数”，指数低于平均线的孩子，名字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黄点。小禾的名字旁边，有一个黄点。

班主任私下给小禾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孩子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您留意一下。”

周五。选课系统开放。小禾的班主任带着全班在教室里一起点。轮到小禾，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二十几门课，每门课下面有一行小字介绍。她看完以后，转头对老师说：“随便。”老师鼓励她：“你想一想，你自己最喜欢什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老师在登记表上写：“主见不足，需引导。”

一个星期，三份评语：

缺乏新意。

情绪偏低。

主见不足。

三份评语，各自都有依据，各自都不是瞎说。现在请把这三份评语放在一起看，看看会发生什么。

第一，三份诊断书开出了三种药方，而且这三种药方互相顶着。

“缺乏新意”的药方是：加量。多接触一些前沿的东西，多做几个项目，多参加几次竞赛。创造需要材料，需要练习，需要有人推一把。

“情绪偏低”的药方是：减量。别逼她，别比较，周末多玩一玩，少排课。

“主见不足”的药方是：放手。别替她定，让她多选，哪怕选错了也不要紧。

加量、减量、放手。三种药方如果同时开给一个孩子，会把小禾的周末撕成三片：周六上午是创客营，周六下午是“什么也不排”的放松时间，周日全天是“你自己决定今天做什么”。而最后这一条，如果她回答“不知道”，前面两条就会立刻补进来——因为“不知道”本身，被解读成了需要更多刺激（创造的尺子）和更多安抚（幸福的尺子）。

第二，三份诊断书，量的不是同一个小禾。

创造的尺子量到的小禾，是“做出来的东西有多新的那个小禾”。她那只会开门的小房子，在这把尺子里只有一个读数。至于她为什么要做一扇会开的门，做的时候她想起了什么，这把尺子不问。

幸福的尺子量到的小禾，是“表情停在中间那一格的那个小禾”。至于那一格是“没什么感觉”，是“累了”，是“正在想事情”，还是“不想让老师知道”，这把尺子也不问。

自由的尺子量到的小禾，是“面对二十几个格子说不出话的那个小禾”。至于她看着二十几个格子的时候，心里是空的，是慌的，还是正在想“我喜欢的东西，这里面一个都没有”，这把尺子仍然不问。

三把尺子，三个读数，三个不同的小禾。**没有一把尺子量的是那个把小房子做出了一扇会开的门、又在每道题上选了中间那一格、又在二十几门课面前说“随便”的小禾。**

这就是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被分块的方式。

我们不是在说老师不好、学校不好。恰恰相反，我们设想的这三位老师，每一位都认真、都善意、都在做自己职责内最该做的事。**问题不出在某个人身上，出在尺子的结构上：每一把尺子只听一条律，它没有办法读出另外两条律在同一个孩子身上交织成什么样子。**

用SDE的话说，这是三个“显露”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发生：创造的一面在作品里显露，幸福的一面在表情里显露，自由的一面在选择里显露。这三个显露本来是同一条差异序列上的三个截面，缠在同一个孩子、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家的土里。可三把尺子各自只记录一个截面，三个截面再也拼不回一个孩子。

第三，读数会回写。

这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步。

“缺乏新意”这四个字，小禾听见了。她下一次做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件事和上次不一样：她会先在心里问一句“这个会不会又被说不新”。这一问，她的手慢了半拍。

黄点那个小小的标记，班里的孩子也看见了。小禾下一次填问卷的时候，她大概率还是会选中间那一格，因为她已经知道，选两头的话，两头都会引来关注。

“主见不足”那句话，不会被她看见，可它会通过老师说话的口气、通过妈妈在家里的追问、通过选课时多出来的那几双眼睛，一点一点沉到她的做法里。她下次站在二十几个格子前，会更小心，而更小心的人，更说不出“我要这个”。

尺子量出的读数，不会停在纸上。它会回写进孩子的土里，变成她下一步的起点。**一个被说成“缺乏新意”的孩子，不是更有新意了，是更小心了；一个被标上黄点的孩子，不是更快乐了，是更会表演中间那一格了；一个被说成“主见不足”的孩子，不是更有主见了，是更不敢说“我要”了。**

三把尺子，量完以后，把各自的读数，种进了同一块土里。

我们并不是说读数不该有。读数是人在复杂世界里给自己找方向的办法。只是，读数一旦变成孩子身上的东西，就不再是读数，而是土。而土一旦被三个方向的读数同时种上，就会长出一个孩子都说不清的东西：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边使劲。

下一节，我们把镜头从小禾身上拉远，看这三把尺子在学校里各有各的“家”。

◆ 16.4　三把尺子，各有各的家

三把尺子不是飘在空中的。每一把，都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创造的尺子，住在竞赛办。

在许多学校里，都有一个负责各类竞赛、科技活动、创新项目的老师或者办公室。他的墙上贴着获奖名单，他的日历上排着报名的截止日。他每年要完成的指标里，有一项叫“创新人才培养”。这一项的数据，就是读数：参赛人次、获奖层级、专利或作品数量。

一个孩子进入这间办公室的方式，是被“看见”。一次作品展示、一次老师的推荐，他的名字就进入了这条通道。通道里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比较，可以被写成一行字。

这对于创造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新东西之所以需要被看见，是因为它要成为别人的起点；但创造最早的那一下，往往不是被看见的，是在某个下午，一个孩子一个人在角落里摆弄，没人注意，也不指向任何展示。这一下，竞赛办看不见。

幸福的尺子，住在心理辅导室和班级群。

心理老师、班主任、学校的“幸福感”调查、家长群里每天发的“今天的小红花”，是这一把尺子落脚的地方。它的数据，是问卷、是指数、是黄点和红点。

一个孩子进入这里的方式，是被“关心”。关心是对的，需要的时候一个孩子要有人在，这一点谁也不该否认。但是关心有一个自带的方向：它朝着缓解去。一个孩子难受，关心的人想的是怎样让这份难受过去。

这对于幸福来说，也是双刃剑。一份难受如果是病灶，缓解它是对的；一份难受如果是一扇正在推开的门——比如一个孩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擅长一件事，又恼火又不服——缓解它就是把这扇门关上了。

自由的尺子，住在选课系统和“个性化方案”里。

教务处的选课平台、走班制的排课表、学校给每个学生出的“个性化发展方案”，是这一把尺子落脚的地方。它的数据，是选了哪些课、换了几次、自主填写了多少项。

一个孩子进入这里的方式，是被“询问”。老师问：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问得越多越好，因为每一次询问都是一次“把选择权交给你”的动作。

这对于自由来说，仍然是双刃剑。一个孩子如果真有一样东西想要，询问是一束光；一个孩子如果还没有长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在小学三年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询问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你为什么没有”。

三把尺子，三个家，三套数据。这三套数据，今天几乎从来不放在一张桌子上。竞赛办有竞赛办的表，心理老师有心理老师的表，教务处有教务处的表。一个孩子的名字，在三张表上各出现一次，三张表之间没有一条线。

设想一次家长会。小禾的妈妈坐在教室里，听班主任讲了二十分钟。班主任讲得很用心：这个学期孩子的科技作品怎么样，心理老师那边有什么反馈，选课的时候她的倾向是什么。每一句话，都来自一张不同的表，班主任手里有三张纸，她一张一张地念。

妈妈一边听，一边点头，到最后，她举手问了一个问题：“老师，您觉得，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班主任愣了一下。她手里的三张纸，没有一张能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说：“她……挺安静的。”

这句“挺安静的”，是整场家长会里最接近那个整块的小禾的一句话，可它不在任何一张表上，它是班主任凭三年里每天看见她的印象说出来的。三张纸讲了二十分钟，一句凭印象的话，只用了三秒钟，却说得最多。

读者可以回想上一章：三个厅之间的走廊越来越窄。放在学校里，走廊就是三张表之间那条没有人负责的缝。

这条缝不是疏忽造成的。它是被尺子的性质决定的。创造的尺子要求“新”，要求可比较，所以必须量产出；幸福的尺子要求“舒”，要求可缓解，所以必须量状态；自由的尺子要求“选”，要求可记录，所以必须量动作。三种读数，天然属于三种不同的东西，没有办法塞进同一张表格。而没有人能管那一条缝，因为那条缝在制度里不是任何人的岗位。

所以这里不找该怪谁，只看一个孩子是怎样被三把各自合理的尺子，分成了三个各自合理的读数。

这里可以把三方程摆出来看一眼：S=F(D,E)，D=G(S,E)，E=H(S,D)。小禾的作品、表情、选择，是显露出来的样子（S）。它不是孩子身上早就有的东西，是她一次次做、一次次被看见的差异序列（D）和她那块缠着家、班级、老师目光的土（E）一起生成的。反过来，她下一步怎么走（D），也是已经显露

的读数（S）和她的土（E）一起生成的；而她的土（E），又是读数（S）和日复一日的走法（D）一点点缠出来的。三把尺子的麻烦在于：它们把S当成了给定的，当成“孩子本来的样子”去量，忘了S是被另外两维生成的。量的时候不问生成，量完的读数就以“孩子本来如此”的口气回写下去。

◆ 16.5　为什么偏偏是学校，最先分家

有人会问：三把尺子在哪儿都有，为什么这一章先讲学校?

因为学校是三个厅碰头的地方。

上一章讲过，教会厅管幸福，社会厅管民主和自由，科技厅管创造。成年人可以挑自己去哪个厅：周日上午去教会，下午去社区议事，晚上泡在实验室。孩子不能挑。他每天早上走进的那一个门，三个厅的灯同时亮着：老师要他“有出息”，心理老师要他“别难受”，教务系统要他“自己选”。一个成年人可以在三个厅之间走动，走累了回家关上门；孩子在学校里，三盏灯同时照着他，连关门的地方都没有。

第二个原因，是孩子的土软。

我们在第8章里讲过，读数会回写，会沉淀成土。可是不同的人，土的软硬不一样。一个五十岁的人，被说一句“你缺乏新意”，他有很多层别的经历垫在下面，这句话落下来，只是一粒灰。一个三年级的孩子，这句话落下来，是落在一块刚刚翻过的新土上。她还没有别的经历可以拿来和它对照。越是年纪小，E越容易被回写、被沉淀。本书前面说过，E是三维里最容易被回写的一维；在孩子身上，这一条表现得最明显。

把这两点放在一起，就明白为什么分家在学校里最先被看见：三盏灯同时照着，土又最软。

我们可以用三原理再看一遍小禾。她身上有两样东西在顶撞：一样是被尺子量出来的三个读数（缺乏新意、情绪偏低、主见不足），也就是她被显露出来的样子；另一样是她整个人，整个家，整间教室，缠在一起的那块土。读数是切开的，土是连着的。读数和土顶撞，推动的不是读数本身，而是小禾下一步怎么走。她的走法变了：做东西前先在心里问一遍“会不会不新”，填问卷时先看看别人选哪格，面对选项时先问“选哪个不会错”。这三种新走法，又回写进土里，成了小禾下一次被量时的起点。

这个过程里，没有一个人做错了什么。每个读数都是善意的，每次回写都是自然的。坏事不是由坏人做出来的，是由三把好尺子的结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出来的。

还有一个细节。孩子的家长，也是在这三盏灯下长大的。文具店里那三位家长，他们小时候也被量过三遍。第一位家长，可能是被创造的尺子量过，所以格外怕“落在别人后面”；第二位家长，可能小时候吃过苦，所以格外想让孩子“高兴一点”；第三位家长，可能小时候什么事都被人定好了，所以格外想让孩子“自己做主”。

三位家长，三种尺子，三种补偿。他们给孩子的，是自己当年缺的那一块。可孩子缺的，往往是另外两块。

这样，一代人的分家，通过孩子，传给了下一代人。土在一代一代地回写。

◆ 16.6　再加一把“综合”的尺子行不行

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会提一个很自然的建议：既然三把尺子各量一面，那就再造第四把，叫“综合素质”，把三面合起来量，不就行了？

许多学校确实这么做过。“综合素质评价”、“成长档案”、“全面发展指数”，名字很多，做法大同小异：把创新、情绪、自主这几项各打一个分，加权汇总，出一个总分，或者一份写满了的评语。

我们认真看一下，这第四把尺子是怎么工作的。

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三个读数放到同一个刻度上，才能相加。创新的“新”、情绪的“笑”、自主的“选”，本来是三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要加起来，必须先各自折成分数。折成分数的那一刻，每一个读数里最具体的东西就丢了：阿峻那个“每分钟下一颗球的雨”，变成了“创新：8分”；小满周三的平脸，变成了“情绪：6分”；小宇选木工的得意，变成了“自主：9分”。

它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给三个分数分配权重。创新占多少，情绪占多少，自主占多少？这个权重怎么定？一旦要定，就得有人先回答：这三样东西里，哪一样更重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它恰恰是三条律之间没有答案的老问题。于是，权重通常由一种办法来定：看现实里哪一把尺子的嗓门最大。哪一年创新的声音大，创新的权重就高；哪一年情绪的声音大，情绪的权重就高。

于是，第四把尺子，不是站在三把尺子上面的裁判，它只是第四个读数，而且是一个把另外三个读数的差别抹平了的读数。

更要紧的是，它在做另一件事：它让“整块的孩子”看起来已经被量过了。只要有一个“综合”的分数摆在那里，就没有人再有理由去问：那条缝里还有什么。缝被一个数字盖住了。

这是一种很熟悉的动作：用一个统一的读数，盖住土的复杂。本书第7章讲过，统一的D偷运统一的E，路统一了，土就被压平了。第四把尺子，是这个动作在学校里最温和、最善意的样子。

那么，什么才叫“量整块的孩子”？

我们不给答案，因为答案不是一把尺子。我们只指出一个方向：整块的孩子，只能被一个认识他的人，在一段时间里，用话语去理解，不能被一个量表一次量出来。小禾的班主任，如果愿意花十分钟，听她讲讲那个会开门的小房子里，门后面住的是谁，她可能比任何量表都更靠近那个整块的小禾。

这样的十分钟，不进任何表格，不留下任何读数。

它是学校里最贵、也最难被制度保护的东西。

◆ 16.7　杜威留下的，和没留下的

说到学校的尺子，绕不开杜威。

站上已经有两本专门讲杜威教育的书。第180号书判杜威的尺子“只有一把，量自由”；第170号书看见杜威的“三格站着同一个“生长”的影子”。本书不重讲，只在它们的基础上往前走一步，把这两本书放到学校这个具体的地方来看。

第3章已经把这个分歧裁定过：杜威统一于自由律，“生长”就是自由律的读数。现在请看这个裁定，在一所今天的学校里，是怎样被验证的。

杜威在世的时候，“生长”是一个词，一个人说出来，听的人会把创造、快乐、自由一起听进去。他一个人，把三条律合在了一个词里。

杜威去世以后，这个词开始散。

有一部分人，把“生长”理解成“做中学”——让孩子动手，做项目，解决真实问题。这是“生长”里最像创造的一半。他们今天做的是项目式学习、创客教育、竞赛培养。

有一部分人，把“生长”理解成“学习要让人高兴”——杜威批评过死记硬背的教育，批评过把学习变成苦役。这是“生长”里最像幸福的一半。他们今天做的是快乐教育、游戏化学习、情绪关怀。

还有一部分人，把“生长”理解成“孩子要有自己的路”——杜威反对把孩子当成被灌输的容器，主张教育要从孩子的经验出发。这是“生长”里最像自由的一半。他们今天做的是选课、走班、个性化学习。

这三个部分，每一个都可以引用杜威，每一个都引得对。可三个人加起来，凑不回杜威。因为杜威那个词里，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三条律在同一个生长里互相托着的方式。词一旦散开，托着的方式就丢了。

为什么会丢？回头看第3章的裁定：杜威统一于自由。统一者在的时候，另外两条律是被他拢在自己手里的；统一者一走，被拢着的东西就各自找各自的主人。创造回到了竞赛办，幸福回到了辅导室，自由回到了选课系统。这不是后人背叛了杜威，是统一本来就靠一个人的手在拢着。手一松，土里原有的分家倾向就又冒了出来。

第235号书里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判断：杜威教的是做中学，他自己最好的东西，却是靠书桌长出来的。放在这里就是：他的教育，需要的是他那样一个人——一个在书桌前酝酿了很多年、才把三条律合进一个词的人。这样的合，今天的学校，不是靠制度能够量产的。

于是，今天的学校里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每个人都在引用杜威，每个人都在用杜威之名做不同的事，每个人做的事，对杜威来说都有一半是对的。

这不是杜威的失败。这是任何一位统一者的命运：他把一条路走通了，他身后的人在这条路上分家。

◆ 16.8　小结：量不出整块的人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教育被创造、幸福、自由三把尺子分着量。每一把都准，每一把都只量一面，量出的读数又回写进孩子，把一个孩子变成三个互相打架的读数。

这一章没有说哪把尺子该扔。创造的尺子，守着教育不让孩子变成仓库；幸福的尺子，守着教育不让孩子变成一个不会高兴的人；自由的尺子，守着教育不让孩子变成一个不会选的人。三个底线，缺一个，教育都会出事。

我们说的只是：这三个底线，今天是三个科室在守，而小禾只有一个。

还有一句话要留给后面的章节。三条律在一个孩子的成长里，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该同时开着。有的季节，创造该走在前面；有的季节，该让幸福先垫底；有的季节，该把选择交给孩子。它们的轮换，像田地的轮作和休耕。可轮换需要有人看得见整块地，而今天，三个科室各看一垄，没有人站在地头。这是卷九要讲的话，这里只先放一个记号。

小禾在这三个科室之间走完一个星期，回到家。晚上她有些咳嗽，妈妈给她量了体温，又拿起手机查了一下，然后说：“明天先别去学校了，我们去镇上的卫生院看一看。”

她的身体，将在另一个门口，被另外三把尺子，再量一遍。

◆

17

第17章

健康：三把尺子量一副身体

先交代一句：本章只做结构分析，不提供任何医疗建议。书里出现的病情和做法，是为了看清“一个人对自己身体说的话”是怎样分成三种声音的，不是教谁该怎么治、怎么养。身体的事，请和你信得过的医生当面谈。

◆ 17.1　卫生院的一天

镇上卫生院的岳医生，四十七岁，在这里干了二十二年。（又是一个构想的场景。）

他上午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拿他每个月都拿的药。老人把袖子卷起来让他量血压，一边量一边说：“岳医生，我儿子在城里给我买了个手环，说要盯着数字。他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数字有没有好看一点。”

岳医生听着，没有急着回答。

第二个病人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外地工厂干了几年，回来休养。他说睡不踏实，白天没精神，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舒服点”。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揉自己的后颈。

第三个病人是一位带着孩子的妈妈，孩子有些咳嗽。她问了几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开头都是“我看网上说”。岳医生回答完，她又问：“那我可不可以不给她用那个药？我想先试试别的办法。我自己的孩子，我想自己拿主意。”

下午，来了第四位病人，是镇上一个做了一辈子木工的老人，姓韦。他说他的手腕近来使不上劲，想让岳医生看看。岳医生问他：“你想让它恢复到什么程度？”他想了很久，说：“能拿得住刨子就行。”岳医生又问：“那你现在最难受的是什么？”他说：“也不是难受，就是不顺手。”岳医生再问：“要不要我把几种做法都给你讲讲，你自己定？”老人摆了摆手：“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

这个老人，三种话里，一种也没有说。他没有要“更强”，没有要“更舒服”，也没有要“我做主”。他要的是“顺手”。

“顺手”是什么？它不在创造的尺子上，不在幸福的尺子上，也不在自由的尺子上。它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手、自己的刨子缠了几十年，缠出来的一种合拍。岳医生没有为这个词找到合适的刻度，只是在病历上写下：“主诉：不顺手。”

这条小小的记录，提醒我们一件事：三把尺子能量到的，并不是身体的全部；它们量到的，恰好是当代人最习惯说出口的三种话。有些身体上的事，还没有被任何一种话收走。

中午吃饭的时候，岳医生一边扒饭，一边在心里理了理上午的三位病人。

他没有把这三位病人分成“病重”和“病轻”。他注意到的是另一件事：**三个人对“身体”这件事，说的是三种不同的话。为了好记，后面把这三种话分别叫做性能、舒适、自主：性能这一派对应创造律，舒适对应幸福律，自主对应自由律。**

老人的儿子在说：身体是一台机器，数字能看出它跑得怎么样，数字要往好的方向走。

年轻人在说：身体是用来过日子的，过得舒不舒服，才是最要紧的。

妈妈在说：这是我的身体（或者我孩子的身体），我有权决定怎么对待它。

这三句话，分别住着创造律、幸福律和自由律。

从第16章走过来的读者，会觉得这个结构很熟悉。是的，它和学校里的三把尺子，是同一个构造，换了一个地方。区别只有一点：学校里的尺子量的是“孩子长成什么样”，卫生院里的尺子量的是“身体处在什么状态”。

卫生院是一个特别适合观察这件事的地方。大医院里分科太细，每个科室只看一个器官、一种病，三种声音被分到了不同的楼层；而在乡镇卫生院，同一个医生、同一张桌子，一天之内，要接待所有三种声音。岳医生每天都夹在三种话中间，他自己不一定说得出这叫什么。

他有一次对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说过一句话，实习生记在了本子上：“病人来了，你要先听清楚，今天是哪一个在说话。”

这句话，岳医生没有想过它有多深。我们可以替他把它展开：同一个病人，同一副身体，同一天之内，会说出三种不同的“我要”。一个人今天说“我想好起来、强起来”（性能），明天说“我只想不难受”（舒适），后天说“别管我，我自己定”（自主）。三句话是同一个人说的，没有一句是假话。

而卫生院的墙上，贴着的却是三张不同的表。

◆ 17.2　健康的三种说法

健康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

我们不去查词典，去看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怎样用这个词。

第一种说法：健康是性能。

这一派的人，看身体像看一台可以被调校的机器。他们的口头禅是：指标、体能、年龄、抗衰、恢复、峰值、训练。健身房、运动手环、年度体检里的数据对比、各种“管理你的身体”的软件，都住在这一派里。

这一派的意思是：身体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它是可以被练出来、被管出来的。你今年比去年强，你的数据比同龄人好，你把身体“用”得更好了——这就是健康。

放在三条意义律里，这是创造律在身体上的样子：长出一个原来没有的、更强的身体。竞技医学、运动科学、各种“优化”和“提升”的说法，都是这一派。它的刻度是：比之前强多少。

要站在它最强的立场上：这一派是对的。人确实可以通过训练和管理，让身体比放任不管时更能干。一个人多年无人看管的身体，和一个人认真对待的身体，往往大不一样。性能派让人不再把身体当作一个只能听天由命的东西。

第二种说法：健康是舒适。

这一派的人，看身体像看一个要被好好对待的伙伴。他们的口头禅是：舒服、放松、疗愈、睡得香、吃得下、心情好、不遭罪。康养、按摩、温和的调理、陪伴式的护理，以及晚期病人的舒缓照护，都住在这一派里。

这一派的意思是：健康的最终读数，不在化验单上，在一个人“过得怎么样”。就算数字不漂亮，一个人睡得着、吃得下、少受罪，他就是过得好。

放在三条意义律里，这是幸福律在身体上的样子。世界卫生组织的章程（1946年通过，1948年生效）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健康定义，大意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这个定义，是幸福律在制度里最宏大的一次书写。它的刻度是：难受少了多少。

同样要站在它最强的立场上：这一派也是对的。一个人如果只被当作一组数据，每天被追着“改善”，却从来没有人问过他难不难受，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舒适派让医学记得，被治疗的是一个活人，不是一张单子。

第三种说法：健康是自主。

这一派的人，看身体像看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的口头禅是：知情、同意、选择、隐私、尊重、我说了算。医学伦理里常讲的“尊重自主”，医院里的知情同意书，患者的“拒绝治疗权”，以及各种“让病人参与决策”的做法，都住在这一派里。

这一派的意思是：身体不管有多少人在关心它，最终拍板的人只能是它的主人。再好的方案，如果是别人替你定的，哪怕结果是好的，也少了一样东西。

放在三条意义律里，这是自由律在身体上的样子。它的刻度是：多少事是我自己定的。

最强的立场也要说：这一派同样是对的。历史上，把人的身体当作可以被随意摆布的对象，造成过多少伤害，今天的人们记得很清楚。自主派让医学不再把病人当成一个“被处理的案例”。

三种说法，三种对，三个底线：

性能派守着：身体不能被放任到没有人管。

舒适派守着：身体不能被管到没有人疼。

自主派守着：身体不能被疼到没有人问。

这三句话读起来有点绕口，可它们恰好拼成一个完整的圈。

和第16章的结构一模一样：每一派都会把另外两条律收到自己的名下。

性能派看见舒适，它说：“睡得好、心情好，是身体状态好的表现，也是恢复的条件。”舒适成了性能的指标。性能派看见自主，它说：“自己管理自己的身体，才能坚持。”自主成了性能的手段。

舒适派看见性能，它说：“身体强一点，当然更舒服。”看见自主，它说：“让病人自己拿主意，他心里才踏实。”

自主派看见性能，它说：“身体好了，才有资格谈选择。”看见舒适，它说：“不难受，才有力气选。”

三派，都不否认另外两派，只是把对方安排在自己下面。

这和三位哲学家的构造，完全是同一个：每一派都是“一条律统一了另外两条”。这一点，我们在第1章到第3章里已经看了三次，到了第16章、第17章，终于看见它从书里走进了卫生院。

◆ 17.3　一个睡不着的老人，和三个“为你好”

现在，我们设想一个更完整的病例，让三派同时站到一个人面前。（再强调：这是一个用来分析“声音结构”的构想，不涉及任何诊断或建议。）

秋芳婶，六十八岁，一个人住在镇子边上。最近几个月，她夜里睡得不好，常常凌晨三四点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

她的儿子在城里，听说以后很着急。他给母亲寄了一个能测睡眠的手环，每周看一次报告，报告里有“深睡眠时长”、“入睡时间”、“夜间觉醒次数”。他每个周末打电话：“妈，这周你的深睡又少了二十分钟。你得把睡眠“做”上去。”

他说的是性能派的话。他是爱母亲的，他的爱，用了一种他最熟悉的语言：数字。

隔壁的邻居是一位老姐妹，知道了以后，劝她：“别想那么多，晚上喝点热的，吃点安神的东西，睡个踏实觉最要紧。你看你，一天比一天愁。”她还给秋芳婶带了一包她自己常喝的茶。

她说的是舒适派的话。她也是爱秋芳婶的，她的爱，用的是她最熟悉的语言：舒服。

秋芳婶自己是怎么想的？她跟岳医生说：“我睡不着就爬起来，纳两双鞋底。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天亮前干点活，反而踏实。我儿子要我盯着那个数字，我邻居要我喝茶，他们都是好意。可我就想自己弄明白，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别替我定。”

她说的是自主派的话。

三个人，都是真心的。三种话，都有道理。可是，三种话落到同一个秋芳婶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件事，手环的数字，开始回写。

秋芳婶本来夜里醒了，会爬起来纳鞋底，天亮前打个盹。现在她每次醒来，心里多了一件事：这个数字又要难看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躺在床上，开始盯着天花板“争取睡着”。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睡眠，第一次变得“瞄准”。而睡眠恰好是一样越瞄准越溜走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有这样一类情况：一个人越想用力把睡眠做出来，越是睡不着。

你看，性能派的尺子，量出了一个读数，这个读数一回写，改变了被量的东西。

第二件事，茶，变成了另一种压力。

邻居的茶是好意，可秋芳婶喝着喝着，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靠喝东西才能睡？邻居的“为你舒服”，在她心里翻成了“你看，你需要被安抚”。

舒适派的尺子，也在回写。它量出的是“不舒服”，被量的人听到的是“我有问题”。

第三件事，“自己拿主意”，变得孤单。

秋芳婶说“你们别替我定”，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可当她把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儿子沉默了，邻居叹了口气，她突然发现：自己拿主意，意味着，今晚三点醒来的那个时刻，只有她一个人面对。

自主派的尺子量出的是“我可以定”，可没有人量“定了以后，谁来陪我”。

我们看到，三种“为你好”，各自都说得对，可它们加在一个人身上，把睡眠这件本来只是睡眠的事，变成了一场三面夹击。

岳医生看着这三个人，他没有作任何判断，因为他知道，不是他该替谁判断。他做了一件很小的事：他请秋芳婶把这三个人对她说的话，一句一句讲给他听，讲完以后，他对她说：“你听这三句话，其实都是在说，他们关心你。”

这句话没有解决睡眠的问题，也不该宣称解决了睡眠的问题。可秋芳婶那天走出卫生院的时候，肩膀松了一点。

为什么这一句话有用？用本书的语言说：**他没有再添第四把尺子，他把三把尺子放回了同一张桌子上，让一个人看见，自己身上同时站着三种话**。三种话只要在同一张桌子上摆着，就还是三个关心她的人；一旦各自对着她量，就成了三面墙。

用三原理再看一遍秋芳婶，会更清楚。

她身上顶撞着的两样东西，一样是三种“为你好”给她的新读数——深睡多少分钟、是不是需要安抚、是不是在自己拿主意——也就是她的夜晚现在被显露出来的样子；另一样是她几十年养成的夜里的活法：醒了就起来纳鞋底、天亮前打个盹，那是她和自己身体、和这间屋子缠在一起的老办法。新读数和老办法一

顶撞，被推动的是她“夜里怎么做”这一步：她开始躺着争取，开始怀疑自己，开始一个人硬撑。这三种新做法，又回写进她的夜晚，成了第二天夜里的起点。

要注意，这里的张力不是秋芳婶心里的“焦虑”。焦虑只是读数落在她身上的样子。张力是更靠前的一件事：几十年的老办法，和一套突然从三个方向涌来的新读数，不在一个频道上。

岳医生那句“他们三个人都是在关心你”，为什么有一点用？因为它没有消除这个张力，而是给了它一个出口：三种读数被还原成了三个人的心意，读数就不再直接压在她的夜晚上，而是先落回了人和人之间。这一步，本身不解决睡眠。但它让秋芳婶有可能自己走到下一步，而不是被三面夹着走。

先防一个误读：这不是在说“数字没用”“茶没用”“自己定没用”。三样都有用。我们说的只是，**当三样东西各自统一一条律，而且谁都不肯让出位置，它们加起来就挤成了一堵墙，把本来该留着的空隙挤没了**。睡眠需要的，恰恰是一块空隙——这个话题，我们要到卷七才会专门讲。

◆ 17.4　同一张桌子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岳医生的诊桌，看一个更小的问题：为什么乡镇卫生院，比大医院更容易让人看见这三种声音？

不是因为乡镇卫生院更高明，而是因为它的桌子小。

大医院里，一个病人从挂号到出院，会经过很多张桌子：门诊医生、检验科、影像科、药房、护士站、缴费窗口、康复科。每张桌子管一个环节，每张桌子都有自己的表格。性能的读数（检验、影像）在一张桌子上，舒适的照护（护理、疼痛管理）在另一张桌子上，自主的手续（知情同意、签字）在第三张桌子上。病人在这几张桌子之间走，像一个包裹，被一站一站地传下去。

乡镇卫生院的桌子少。岳医生既要看检验结果，又要问你睡得好不好，还要亲自解释为什么需要你签这张同意书。三种声音在同一张桌子上碰到一起。他的活法，经常是三种声音之间的当面翻译：对老人的儿子，他用数字说话；对年轻人，他用“你最难受的是哪里”说话；对那位妈妈，他用“你的想法我们一起看”说话。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本事，这是他二十二年坐在同一张桌子后面磨出来的。

我们再看小禾。第16章末尾，她在学校被三把尺子量了一个星期，晚上咳嗽，妈妈带她来卫生院。

岳医生看了看，说了几句，开了该开的东西，这些不是本书的事。本书要看的是他在这个过程里，没有说的话。

他没有说“你家孩子这周压力大，可能跟学习有关”，因为这等于把学校的三把尺子又带进了卫生院，再加一个“压力指数”。他也没有说“孩子要多锻炼增强体质”，因为这又是性能派的一句话。他还没有说“孩子想怎么治，让她自己决定”，因为三年级的孩子没法单独承担这样的决定。

他只问了妈妈一个问题：“她平时怎么说自己难受的？”

妈妈想了想，说：“她会说“肚子里有一只小虫在爬”。”

岳医生在本子上记下了那句话，没有评论。

这个小细节里有一件事：他让孩子用自己的话，把自己的身体说了一遍。这是三把尺子都没有留位置的东西。性能派要读数，舒适派要等级，自主派要选项，没有一把尺子接收“肚子里有一只小虫在爬”这样的话。可一个人和自己的身体最早打的交道，恰恰就是这样说出来的。

用本书的话说，这是身体的介生态：说不清是什么，样子刚刚露头，一问就可能散。它还没有长成“症状”或“指标”，也没有变成“选项”。岳医生没有立刻把它翻译成任何一把尺子上的刻度。（介生这个词，要到卷八才会专门讲，这里只是先留一个记号。）

我们必须再提醒一次，这不是教谁怎么看病。我们只是说：一张桌子上要同时放得下三种声音，还要留得下一个三把尺子都量不到的角落。

同样的三方程，放在一副身体上也成立。化验单上的数字、夜里醒来的次数、一个人说“我不舒服”，是身体此刻显露出来的样子（S）；它是这个人日复一日的做法与过法（D），和他的年龄、住处、家人、行当缠在一起的土（E）共同生成的。“性能”这一派常常把数字当成身体本来的样子；“舒适”这一派常常把感受当成身体本来的样子；“自主”这一派常常把意愿当成身体本来的样子。三派都在量S，都没有回头问：这个S是从哪两维里长出来的？这个问题，不是医生一个人能答的，也不是一张表能答的，它需要对一个人的来历有所了解。后面第34章讲“给土写家谱”，说的就是这件事。

◆ 17.5　钟摆搬进了身体

读者如果还记得第13章，会发现秋芳婶身上发生的事，和一个县的年度财政会，有着相同的形状。

一个县里，要增长、要民生、要依法，三种声音拉扯，三个派别轮流坐庄。那是国家治理里的三种形而上学：增长（创造）、福利（幸福）、权利（自由）。

放到一副身体里，就是性能、舒适、自主：

性能是身体的增长派：要更强，要更好，要指标往上走。

舒适是身体的福利派：要少受罪，要被照顾，要过得去。

自主是身体的权利派：要说了算，要被问，要被尊重。

一个社会在这三派之间摆来摆去，一个人的身体，也在这三派之间摆来摆去。

年轻的时候，性能派的声音大：加班、健身、拼数据，身体被当成资源。中年以后，开始有了“舒服要紧”的想法：不能再这么熬了。生了一场病以后，自主派的声音忽然响起来：我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糊里糊涂地被摆布。

三种声音轮流占上风，每一种占上风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之前的那一段才是错的。年轻时的拼命，后来被叫做“透支”；中年以后的“放松”，又被叫做“放弃管理”；病后的“我自己要弄清楚”，又被叫做“不信任专业”。

这就是我们在治理里看到的钟摆，缩小成了一副身体的一辈子。

要单独说一句：身体比国家更容易被钟摆甩得难受。因为国家有很多人，一派被压下去，别的派还在；而身体只有一副。一个人在性能派那里把身体用到极限，没有另一副身体替他缓冲。

每一派走到极端，也各有各的样子，这里只做结构上的描述。

性能派走到极端，身体变成一张永远在考试的卷子。每一次睡眠、每一步路、每一餐饭，都有一个读数等在后面，人开始为读数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这时候，管理身体的动作，反过来吃掉了身体本来要服务的那件事——过日子。

舒适派走到极端，人开始躲着一切不舒服。可身体的很多变化，恰恰是从一点不舒服里开始的：爬坡时的喘、学新东西时的累、受伤后恢复时的痒和酸。一个只许舒服的人，把这些信号一概当成故障去消除，最后连身体正在长出什么，也一并消除了。

自主派走到极端，人开始把每一个决定都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他不再相信任何人的判断，也不再接受任何人的陪伴，因为“接受”两个字，听起来像是放弃了做主。可一个人面对自己身体里的未知，最需要的，往往是有一个人愿意在旁边坐着。

三个极端，没有一个是坏人干出来的，每一个都是把一条本来正确的律走到了头。第27章会专门讲这件事：完全的某一条律，最后杀死的，是它自己想守护的那样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要留一笔。我们看到，三派各有各的机构：性能派有体检中心、健身房、运动科学；舒适派有康养机构、保健服务、舒缓照护；自主派有伦理委员会、患者权益、知情同意书。**每一个机构都有一张不同的表，三张表上都有这个人的名字，三张表之间没有一条线。**

第16章的小禾，在学校里遇见的是这个结构；第17章的秋芳婶，在卫生院里遇见的是同一个结构。

这不是巧合，这是同一片土长出来的同一种东西。第9章到第12章讲过：美国的土壤里本来就有“创造归一处、幸福归一处、自由归一处”的倾向，实用主义把它写成了方法，方法又沉回土里。到了今天，这套分家的方法已经进入了每一个孩子的书包和每一个老人的药盒。

◆ 17.6　小结：量不出整副的身体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健康被性能、舒适、自主三把尺子分着量。每一把都在守一条底线，每一把都把另外两条收在自己名下，三把尺子加在同一副身体上，把本来该留着的空隙挤没了。

岳医生那句话，其实可以挪到学校去：“你要先听清楚，今天是哪一个在说话。”小禾的老师、秋芳婶的儿子、文具店里的三位家长，都不是在说谎，也不是在争权。他们只是各自站在一条律的位置上，把这条律说成了全部。把这件事看清楚，不会让问题消失，但会让人少一点怨气：被量的人不必再怪量的人，量的人也不必再怪自己量错了。

连起来看第16章和第17章，我们得到的是：同一个人，在学校被分成三份，在卫生院又被分成三份。教育三份，健康三份，加起来六份。

而一个人的一生，还有第三个大门：他要靠什么活下去。

读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大概又想到了同样的建议：为什么不干脆给健康也造一个“综合指标”？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那个有名的定义，已经是这样一种努力：把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放在同一个“完好状态”里。这个努力是值得尊敬的。它的方向对，它想说的是：别把人切开。

但我们在第16章里已经看到，一个综合读数，通常有两个命运：要么被压成一个分数，把差别抹平；要么在落到地面的时候，被其中一条律吸走。“完好状态”听起来是三条律平分，可一旦要在卫生院里操作，到底是用化验单来证明“完好”，还是用病人的感受来证明“完好”，还是用病人的签字来证明“完好”？这三种证明，各自属于性能、舒适、自主。操作的那一天，综合又散了。

所以，这里要说的不是“综合不对”。要说的是：综合不能靠再造一把尺子，只能靠让三把尺子坐到同一张桌子上，并且让桌子上留着一块三把尺子都不占的空地。

至此，我们已经有了六块：教育里的创造、幸福、自由，健康里的性能、舒适、自主。每一块都有专家，每一块都有机构，每一块都有一套自己的话。

这六块，还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这个判断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有一天，学校里的竞赛办、辅导室、教务处，卫生院里的体检、照护、知情同意，真的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各自的读数摆在一起看了，孩子和病人身上的这种“三面夹击”依然原样不动，那么本章说的“结构性的分家”就是错的，问题应该另寻出处。反过来，如果合桌之后，那条缝真的变窄了，那就说明，缝，才是要紧的地方。

下一章，我们离开学校和卫生院，走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正在盖楼的工地。工头老蒋手下有三种工人，一种想学手艺，一种图个安稳，一种要自己说了算。三种工人，三句话，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

18

第18章

事业：一班人，三把尺子

◆ 18.1　老蒋的楼梯口

上一章结尾，岳医生那句话——“你要先听清楚，今天是哪一个在说话”——可以挪到学校，也可以挪到任何一张桌子上。教育里三把尺子，健康里三把尺子，我们已经有了六块。第三个大门，是一个人靠什么活下去。现在从卫生院走出来，往县城新区的工地走。那里也有一班人，同样被三把尺子同时量着；只不过这里没有老师和医生，只有工友，和一个叫老蒋的包工头。

先说明：下面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人物是编的，但工地上的事，很多人见过。

老蒋四十八岁，在新区包一个小区的外墙抹灰和室内砌筑。他不是老板，只是包工头：从分包手里接一块活，自己带一班人去干。班上常年十来个人，旺季二十多个。他十七岁做小工，抹了三十年灰，没读过多少书，但有一本记工本，每年年底，谁干了几天、谁家里有什么事、谁和谁说得拢，都在这个本子和他的脑子里。

这一班人，老蒋心里有一张分类。不是他想出来的，是干久了，自己长出来的。

头一类，是想学手艺的。比如小郑，二十出头，职校出来，不想一辈子扛料。他整天盯着老师傅的手腕看：一刀灰抹上去，怎么抹平；阳角上怎么收出一条直线。老师傅用瓦刀柄在墙上轻轻敲，敲一遍，说“这儿空了”，小郑什么也

听不出来，只听见“咚咚”一团。他宁可这个月少拿几百块，也要跟着师傅做细活。他急的不是钱，是：我什么时候能自己上墙。

第二类，是图安稳的。比如老刘，五十出头，儿子在外地读大专，老婆在老家带孙子。他不想学新东西，也不想换地方。他想的是：工钱别拖，年底能拿着钱回家，活别太重，腰别累坏。老蒋给他派的活，这些年几乎没变过，他说这样他心里踏实。对老刘来说，一个包工头好不好，只有一条：他的钱到不到账。

第三类，是要自己说了算的。比如阿东，三十出头，手艺不错，嘴也不饶人。他受不了“今天你去三楼”“这块你抹得不对”。他想的是：给我一块活，整块包给我，我自己定几点上工、几点收工，干完拿钱，别管我怎么干。

这三个人，每天早上七点站在同一个楼梯口，戴着同样颜色的安全帽，听老蒋同一句话：“今天三栋，二楼往上。”

三个人听到的，不是同一句话。小郑听到的是：今天能不能跟师傅上二楼的阳角。老刘听到的是：二楼往上，活不重吧，不会拖到天黑吧。阿东听到的是：二楼哪一段是我的。

同一句话，三种耳朵。这就是第4章里那个网吧的另一个版本：一群人用同一个词，各听各的。

这里不要把三个人当成三种“人格”。说小郑“是”创造型、老刘“是”幸福型、阿东“是”自由型”，那是给人贴标签，是错的。小郑自己也有想安稳的夜晚，老刘也有想自己做一回主的时候。更准确地说：同一个楼梯口上，三条路同时在走，只是每个人此刻走在前面的那一条不同。

走在前面的那一条，在每个人身上也不是一天定下来的。小郑刚入行的头一个月，想的只是“别被骂”；是半年以后，在一个雨后的早晨，他第一次用瓦刀柄敲出了一声“空”，师傅点点头，他心里忽然亮了一下——从那天起，“学手

艺”才从一句话变成了他走路的方向。他的方向，是在一次次敲墙、一次次被师傅纠正里，一点点显出来的。手艺这个样子，在他身上也是一层一层显的：先是分得出“空”和“实”，再是分得出“空在哪一块”，再是知道“为什么会空”——灰浆的稀稠、墙面的湿度、前一天的雨，都缠在这一声里。他敲的不是一堵墙，是这一堵墙、这一个季节、这一个师傅教他的手。换一堵墙，换一个师傅，他的耳朵就是另一副耳朵。

老刘的“稳”也是长出来的。他年轻时被拖欠过一年的工钱，这件事一直压在他后来的每一个选择里：他选老蒋，不是因为老蒋手艺最好，是因为老蒋的本子上，年年腊月前清账。“稳”在他身上，不是天性，是一次欠薪缠出来的样子。

阿东要“说了算”，也有来历：他在大工地上做过流水线般的计件活，天天被人盯，干得好也没有说话的份，后来才一门心思想自己拿一块。

这三个来历提醒我们：**三条意义律不是三种人，而是同一片工地上三条同时走着的路；每个人身上，哪一条走在前，是被他自己的经历一层一层缠出来的。**

◆ 18.2　三把尺子，量的是同一份活

现在把“事业”这两个字拆开来看。一个人说“我的事业”，到底在量什么？

在老蒋的班里，三种耳朵，其实是三把尺子，量的是同一份活。

第一把尺子，量“长出了什么”。这个人干了三年，手上多了什么原来没有的本事？他能不能从扛料到抹灰，从抹灰到带班，从带班到自己拿一块？这把尺子的刻度是“新”，是“长”。皮尔斯那条路，在工地上就是这把尺子：意思在路上，本事也在路上。一个人的事业有没有意义，看他有没有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

第二把尺子，量“过得怎么样”。这个人干了三年，账有没有清？腰有没有坏？晚上睡得着不着？家里人心里踏不踏实？这把尺子的刻度是“稳”，是“安”。詹姆斯那条路，在工地上就是这把尺子：好使就是好，过得下去就是真。

第三把尺子，量“谁说了算”。这个人干了三年，活是谁派的，法子是谁定的，时间是谁的？他能不能说“不”，能不能说“这块我来”？这把尺子的刻度是“自己”，是“开”。杜威那条路，在工地上就是这把尺子：多一个路口，多一分自由。

先要看到：三把尺子，每一把都是对的。不能说小郑的尺子比老刘的尺子高级。一个工地要是只有小郑，没人愿意扛料、守夜、做重复的活，墙起不来；只有老刘，手艺断代，十年后没有人会敲那一声“空”；只有阿东，大家各干各的，墙缝对不上。

也不能说，三把尺子可以简单加起来：成长五分，幸福五分，自主五分。因为三把尺子量的东西会互相抵。让小郑跟着师傅做细活，进度就慢，慢就会拖到老刘的结账日；给阿东整块包出去，他一个人干得快，师傅教徒弟的那一层就没了；老刘要求准时发钱，老蒋就得先赶出可结算的进度，小郑想慢慢磨的那面墙，就得让位。

这就是第三原理说的那种情形：两样东西在顶撞，就会推动第三样东西变形。这里顶撞的是活的进度（一条往前走的差异序列：今天抹了几面、明天验收哪一层）和这一班人的土（谁家里急着用钱、谁想学、谁不爱被管，这些缠在一起，拆不开）。两者一顶，被推动变形的，是这班活到底怎么排。所以老蒋每个季节都在重排：谁先结账，谁跟谁一组，哪一块让谁整包。排出来的每一版“样子”，回头又写进下一个季节的起点：去年夏天缩了午休，今年他就不敢再缩了。

再说三把尺子各自的特有死法。每一把尺子，若是一直只用它，会把别的两条路压没，最后连自己也压没。

只用第一把：每个人都在“长”，没有人可以停。小郑到了三十岁，还是“学徒”的心态，每一天都要“进步”，一旦有一周没长出新东西就觉得自己在退步。手艺从乐趣变成了鞭子。

只用第二把：每个人都求稳，连最小的变动也怕。老刘的“稳”到了五十五岁，变成了“不能变”。工地上换了新的材料、新的做法，他一概不学，结果被一项更省人工的做法替掉，他的“稳”反而成了最不稳的东西。

只用第三把：人人都自己拿，没人托底。阿东单干到第三年，生了一场病，没有班组，没有工友，没有一个人替他顶一天，他才发现，“我说了算”的另一半，是“我一个人扛”。

这三种死法，卷七会再回到一个更大的题目上去：完全地实用，会杀死实用。这里先记下：每一把尺子，单用时都会把自己用成相反的东西。

◆ 18.3　老蒋不统一，老蒋轮着来

按说，这三种人，三把尺子，三种死法，这班人应该早就散了。可老蒋这一班，已经一起干了好几年。

他靠的是什么？我们替他看一遍他一年里的做法，能看出一个节奏。不过先说好，这是一个构想的节奏，不是什么真人真事的记录。

春天，开工头两个月，天气合适，料新，人也没累。老蒋总是先把活分得细：外墙的大面给老刘这样稳当的人，抹平，不求花样；阳角、门窗套这类要手上功夫的地方，他让小郑跟着老师傅做。这一段，是创造走在前面——春天是学手艺的季节。

夏天最热的那两个月，老蒋不太讲手艺。他把上工时间挪到清晨和傍晚，中午让大家歇到三点，凉茶和盐备足，进度不排太紧。这一段，是幸福走在前面——先让人熬过去，手艺的事秋天再说。

秋天赶工期，老蒋会把一整段活，整块包给阿东这类人，说清楚验收的日子和质量，其余不管。这一段，是自由走在前面：交出整块，让会干的人按自己的法子干，快。

腊月，一进腊月，老蒋把本子翻出来，先结老刘这类人的账，再说其他。这一段，幸福又回到前面——年关就是年关，钱要到家。

没有哪一条律是一年里一直在前头的。老蒋没有把三个人统一成“一种人”，没有给这班人立一句“我们的宗旨”，也没有开过一次关于“手艺与幸福与自主的平衡”的会。他只是看季节、看活、看人，让三条路轮着走在前头。

我们不要把老蒋夸成圣人。这套轮着来，有三处不稳。

第一，它全靠老蒋一个人的脑子和那本记工本。他生病那一个月，班里就乱了。

第二，它靠班小。十来个人，他认得全；到了几百人的大工地，他就认不过来了。

第三，它会出错。有一年夏天，赶一个节点，他把午休缩短了，把夏天硬当作秋天来过。老刘腰疼了半个月，小郑累得没心思看师傅的手，阿东倒还自在。这一年，只有自由走在前面，另外两条路上的人几乎断了。年底，这班人走了三个。第二年开春，老蒋把本子翻到那一页，没说话。

这件事要看清：不是老蒋“做错了某件事”，而是他在该让幸福走前面的季节，让自由走了前面。这个错，是“节奏”上的错，不是“价值”上的错。三条路没有一条是错的，错的是它们的先后。

把这件事和第三原理放在一起：夏天，进度（D）要往前赶，人的身体和一班人的情绪（E）在发烫，这两样顶在一起，被顶的是“这一季的排法”（S）。老蒋缩短午休，等于说：我不让它顶，我把身体那一头压下去。压下去的结果不是消除了顶撞，而是顶撞换了一种出口：人走了。走了的人，又把“这个班夏天不能赶”写回了下一年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反过来的判断：**如果有一个工地，三年里没有人走，也没有出过一次“夏天赶坏人”的事，而老蒋从头到尾只用一条律管他们（比如只发奖金、只管手艺、或只放任自主），那么这一节的判断就错了。**工地上的这一点经验，是可以被推翻的，也还没有被证明得多严。它只是一个信号：有一种做法叫“轮着来”，它在小地方偶尔长出来过。

◆ 18.4　另一个工地：把三条路统一成一条

要看清老蒋的“轮着来”值多少，不妨再构想一个工地，看看“统一”是什么样子。

老简是老蒋的同行，也包活，也带一班人。他的想法和老蒋不同。他觉得老蒋太费心：一个人要记谁想学、谁要稳、谁要自己干，累不累？他的办法是一把尺子量到底：全班按件计酬。抹一平方多少钱，砌一立方多少钱，写在墙上，月底按量结算。

老简说，这样最公平：多干多得，谁也不吃亏。而且三种人都照顾到了——想学的人可以多接细活多拿钱，想稳的人按月算清楚，想自己说了算的人爱怎么干怎么干。

头半年，确实很顺。阿东这样的人如鱼得水：没人管，干得快，钱也多。老刘也满意：账一清二楚，每月月底准时拿钱，没有拖欠。

出问题是从小郑这样的人开始的。

老师傅带徒弟，是要耽误工时的。教一个徒弟敲墙听空鼓，要停下手里的活，要让徒弟在一块墙上反复试，试错了还得返工。在按件计酬的班里，师傅每教一次，就少挣一次。老师傅不傻，他很快发现：不带徒弟，月底多拿几百。于是，小郑被分到了最简单的活，扛料、抹大面，再没有人让他碰阳角。一年以后，小郑走了，去了一个愿意教的班。

第二年，老刘的腰出了问题。按件计酬，快就是钱，他以前稳稳的节奏被打破了：旁边的人都在抢量，他不抢，月底拿得少；他抢，腰扛不住。“稳”这条路，在这套尺子里没有位置。他最后咬着牙抢了一个夏天，腰病了，休了两个月，那两个月没有一分钱。

第三年，阿东遇上了一件事：一堵墙返工，责任说不清是谁的。因为没有人负责看整面墙。每人只管自己那一块的量，谁抹的灰浆稠了、谁没等干透就上了下一层，没有人说得清。阿东吵了一架，也走了。

老简的班，三年后留下来的，是一批干活很快、互相不太说话的人。墙的数量没少，可是老师傅走了一半，没有人会敲那一声“空”，返工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构想的故事。我们借它说三件事。

第一，老简的尺子，不是错的，是“一把”。按件计酬量的是创造和自由的某种混合：多做、自己做，多得。它对阿东这样的人是最好的尺子，对老刘就是一把压迫的尺子，对小郑，它把学手艺量成了“亏本”。

第二，统一的路，偷运了统一的土。按件计酬假定了：所有人都是“一个干活的人”，所有的活都可以论件。可师傅教徒弟的那一段，是不可论件的——它是土，是一班人互相缠出来的东西。路统一了，土被压平，手艺的断代，是几年以后才显出来的账。

第三，这个故事里，没有一个人是坏人。老简是想省心，老师傅是想多挣，阿东是想自己干。每一步都是合理的，合起来，把一个能传手艺的班变成了一个只能干快活的班。

这和卷二里讲的那个奶茶店的加盟手册，是同一个结构：一切按流程，各地的土被当成一样，后来才发现，有些东西流程装不进去。

有人会说：那就是老简没设计好，加一个“带徒弟补贴”不就行了？

这是个很好的补丁。老蒋也许就是这么做的：他常常私下给老师傅多算几天工，说是“带徒弟的辛苦”。补丁有用，但请看补丁的性质：它是在承认三把尺子不能只用一把之后，用钱的形式把第二把、第三把尺子偷偷补回来。补丁越打越多，最后就成了一套说不清的规矩，要靠某个人的脑子才记得住。老蒋那本记工本，就是这样一件越补越厚的东西。

这一点可以放进更大的画面里：**事业的三分裂，不是某个公司的设计失误，而是任何一个只拿一把尺子的人，迟早要面对的事**。老简用一把，三年后就有三个缺口。大公司里，每个部门各用一把，缺口没有消失，只是被分摊到了不同的人身上，由当事人自己去补。

◆ 18.5　下雨天：三把尺子都量不了的下午

老蒋的记工本上，每年有那么十几天，是空着的。

那是下雨天。外墙抹灰遇雨不能干，砌筑也得停。工人们全挤在工棚里：打牌的，睡觉的，刷手机的，蹲在门口抽烟看雨的。老蒋是不喜欢下雨天的，一天停工，就是一天的工期往后压。

可有一件事，他很晚才察觉：这些下雨天里，班里的事，有不少是在这时候“办”了的。

小郑问老师傅：“您当年是怎么学上墙的？”老师傅原本在打盹，睁开眼，讲了一个下午他自己做小工的事：怎么被师傅骂，怎么半夜偷偷练，怎么在一次返工里学会了看灰浆的稠度。这些话，没有一句是“教学内容”，在晴天的工地上，没有人会讲，也没有人有空听。

老刘和阿东平时说话不多，雨天蹲在门口，不知怎么聊起各自老家的事。阿东说他老家那边新修了条路，老刘说他儿子想考公。聊完以后，第二天上工，两个人之间多了一点说不清的默契，老刘有一次主动帮阿东扶了一下脚手架上的板。

老蒋自己，也是在这样的下午，听到了一件事：老刘的老婆那段时间身体不好，他一直没说。老蒋没说什么，那个月的账，悄悄提前结了。

这些下午，用三把尺子去量，都量不出什么：没有长出新手艺（创造的尺子读数是零），没有让谁更舒服（幸福的尺子读数是零，甚至因为停工还有点烦），没有谁多了一分自主（自由的尺子读数也是零）。三把尺子，都说这是浪费。

可是请回想前面：小郑的手艺里有师傅的口气，老刘的稳里有老蒋年年清账的信用，阿东的自主里有班组替他兜着的底。这些“缠”，是怎么缠上的？大部分，不是在干活的时候，是在这些没用的下午。

这就是卷七要正面讲的东西。这里先记下一个小小的发现：一班人的土，常常不是在“有用”的时间里长的，而是在有用时间之间的空隙里长的。如果有一个老板，把这些雨天都算成成本，用工棚里的时间去排班、去培训、去搞团建，让每一个下午都“有成果”，这一班人也许能多出一点东西，可也许，下一次小郑想问“您当年是怎么学上墙的”的时候，就再没有那个雨天了。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下雨天越多越好”。老蒋自己就为这些停工的日子发愁。但我们可以承认：三把尺子，哪一把都量不到这些下午，而这些下午，是土在长。

这也预示着一件事：九块碎片里，每一块都有尺子，每把尺子都量“有没有”；而土的生长，常常发生在尺子量不到的地方。

◆ 18.6　大地方：三套话，三个部门，一个人

现在把镜头从工地拉开。

小郑、老刘、阿东这三种路，在大公司里一样存在。只是，老蒋一个人看着的这三种路，在大地方被分开管了。

大公司里，常见有三套话，往往由不同的部门来说。

一套是成长的话。培训、晋升通道、能力模型、职业发展规划、“走出舒适区”。这是创造律的话：事业是把一个人长成更厉害的人。小郑这样的人，进了这套话，能找到路。

一套是幸福感的话。员工关怀、福利、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我们关心你的身心健康”、心理咨询热线。这是幸福律的话：事业是让人过得下去、过得舒服。老刘这样的人，进了这套话，能松一口气。

一套是自主的话。弹性办公、“赋能”、内部创业、合伙人、自由职业与斜杠。这是自由律的话：事业是我说了算的那一块地。阿东这样的人，听了这套话，会有劲。

这三套话，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人。不要小看这一点：分工本身是一种进步。一个几万人的公司，不可能靠一个像老蒋那样的包工头记着每个人的家事。把“成长”交给懂培训的人，把“关怀”交给懂福利的人，把“自主”交给

懂流程的人，每一块都做得比老蒋精细得多。这是最强的立场，我们该先把它站足。

可是，请看这三套话落在一个人头上的那一天。

构想一个年轻人，小聂，在一家大公司做了三年。

早上开会，上司说：“你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主动去承担更有挑战的工作。”（成长）

中午，人事发来问卷：“你最近的工作压力大吗？请给你的幸福感打分。”（幸福）

下午，项目群里有人说：“这个事你自己决定，别什么都来问我。”（自主）

三句话，每一句都没错，每一句背后都站着一个好人。可对小聂来说，这三句话互相拆台：为了成长，他要接更难的活，这会拉低他的幸福感打分；为了幸福感，他想守住下班时间，这会让他在上司眼里缺少“主动承担”；为了自主，他想自己定做事的法子，却发现“成长”的评价表早已替他定好了该长成什么样。

他的三项指标都不差：成长项拿过高分，幸福问卷填得不低，也有弹性上班。可有一天他跟朋友说：“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他不是抱怨。他只是发现：这三条路，各有路牌，没有一张地图。成长那条，指向一个职位；幸福那条，指向一种生活；自主那条，指向一块自己的地。这三个方向会不会在某一点相交，没有哪一个部门替他看过。因为每个部门只管自己的那一把尺子。

对照老蒋：他的优点，不是懂得多，而是守着一整块——这一班人，一年到头，三条路的信号，他都在手里。分工给了大公司精细，也同时把“整块”拆散了。就像一碗汤，被分装成三个杯子，各贴标签，每个杯子都满，却没有一碗汤了。

所以，我们下的判语是：**事业的三分裂，不是因为人心乱了，也不是因为哪个部门做错了，而是因为三条意义律各自长出了自己的话、自己的人、自己的机构，而一个人的事业，只有一个。**

这一点，和教育那一章（第16章）、健康那一章（第17章）完全是同一个结构。教育里，创造型、幸福型、自由型的教育各有专家；健康里，性能、舒适、自主各有一派；事业里，成长、幸福感、自主各有一套话。三块，是同一件事在三个地方的重演。

这里补一句防止误会：本书不是说“大公司不该分工”，更不是说“应该回到包工头时代”。我们看的是：当三套话同时说给一个人听，谁来做轮换？老蒋的办法靠一本记工本和一个人的脑子，不能搬到大地方。但他至少告诉我们，轮换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需要，而且在大地方，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做。

◆ 18.7　一个反驳：那就都去做自己的老板

读到这里，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力的反驳：三套话互相拆台，不就是因为人被“雇”着吗？要是每个人都做自己的老板，成长、幸福、自主，全由自己安排，问题不就没了？

这个反驳值得认真对待，因为阿东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想得有道理。

我们顺着阿东的路，往后构想几年。阿东离开了班组，自己接活，成了一个小小的“个体户”。头两年，他很痛快：想干就干，想歇就歇，活源有老蒋偶尔介绍的，也有自己找的。他的自由律，走得前所未有地靠前。

可到第三年，他发现自己在做一件从前不用做的事：他得同时做三个人。

他得是那个“创造的人”：自己找新的活法、学新的工艺，没有人会安排他去培训，不学就没有新活源。他得是那个“幸福的人”：自己管自己的休息，自己给自己买保险，自己咬牙在淡季过日子，没有人会发一份员工关怀手册。他还得是那个“自由的人”：自己判断哪个活接、哪个活不接。

三条路，在一个人身上，原来是由一个班、一个老蒋、一个公司分着扛的。现在它们全压在阿东一个人肩上。他没有变得更自由，他只是把三个部门搬进了自己的脑子里。

于是阿东开始失眠。不是因为活太多，是因为每天晚上，他心里有三个声音在开会：该不该学点新的？该不该歇一歇？该不该把那个小活推掉？没有人替他主持这个会。

这不是说做自己的老板不好。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过得很好，那是因为他们的土里，恰好有托住这三条路的东西：有家人的支撑，有行业里的朋友圈，有攒下的底子，有一两个愿意长期给活的老主顾。阿东后来也找到了：他和两个同行合伙，三个人互相替班、互相介绍活，这个小小的“三人班”，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老蒋的工地。

你看，兜了一圈，他回到了“一班人”。

所以，对这个反驳的回答是：自己当老板，并没有消除三分裂，只是把三分裂从机构里搬进了一个人的脑子里。机构里的三个部门，至少还有三个人在说话；脑子里的三个声音，只有一个人在听。能撑住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土托着；撑不住的人，会把“自由”过成“孤立”，这是18.2里自由律的特有死法。

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微妙的地方。“自己决定”这句话，在九块里属于自由那一竖。它说得很美，也确实该有。可当它被当作“整块”的答案时，它就越界了：它把整块的责任，全部交给了当事人，同时把当事人身边那团土，当成了“外部条件”。可土不是外部条件，土是他的一部分。

回到老蒋的工地，我们可以说一句公道话：老蒋的班之所以让阿东、老刘、小郑都能待下来，不是因为老蒋比谁都懂他们要什么，而是因为这个班是一块共同的土，三个人各自的路，都能靠在这块土上。

当我们说“事业”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想到一个人和一份工作。其实，一份事业能不能走得下去，要看他背后有没有一块土：同行、师傅、老主顾、家里的底。这块土，不在任何一个部门的话里。三套话，没有一套在说它。

◆ 18.8　话说得越好，路越看不清

最后看一个细节。

按理说，三套话说得越好，应该越能帮到人。可有一种情况，恰恰是话说得越好，人越糊涂。

成长的话说得好，会让人觉得：不长，就是浪费。幸福的话说得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是出了毛病。自主的话说得好，会让人觉得：被安排，就是被剥夺。

三种“觉得”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没有一个能安心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学，怕不够“自主”；停下来歇，怕不够“成长”；停下来听别人的，怕不够“自由”。每一种停，都能被另外两套话判成“错”。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职场里，有那么多人，条件不差，却总觉得“哪里不对”。他们并不缺东西，缺的是一个能把三条路摆在一起看的位置。

还要看一个更深的地方，也就是E，土。老蒋的班之所以能轮着走，是因为那一班人是一块土：同乡带同乡，师傅带徒弟，谁欠谁一顿饭，谁替谁顶过一天班。三条路在这块土里，不是三条互相隔开的路，而是缠在一起的，拆开任何一条，另外两条都站不住。

而到了大地方，用“岗位”“职级”“绩效”把人标准化，土就被压平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员工”，每个员工有“成长需求、幸福需求、自主需求”三栏。三个人，三种来历，被填成了三栏表格里的三个格子。统一的路，偷运了统一的土。这是卷二第7章讲过的事，在公司里的小号版本。

所以，面对“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答案不会是再来一套更好的话。答案得是：有一个位置，能看见这个人身上三条路各走到了哪里，该让谁先走。这个位置，在老蒋的工地上，是一本记工本；在大地方，还没有人去建。

◆ 18.9　钟摆搬进了事业

读过第13章的读者，会认出这一章里的一个老熟人。

一个县的年度会上，要增长、要民生、要依法，三派轮流坐庄。第17章里，这个钟摆搬进了一副身体：性能、舒适、自主。现在它又搬进了一份事业。

年轻人刚入行，成长派的声音大：多学，多接，多拼，吃苦是本钱。老蒋手下的小郑，二十出头，一个月少拿几百块也要跟师傅上阳角，没有人觉得他傻。过了三十五，幸福派的声音渐渐大起来：别太拼，家里要人，腰要紧，稳当比什么都强。老刘就是这样。再过几年，一场变故，一次被人当成零件对待的经历，自主派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不能再被人安排了，我要自己说了算。阿东就是这样。

三种声音轮流占上风，每一次占上风，都觉得之前那一段是错的。年轻时的拼，后来叫“被剥削了青春”；中年的稳，后来叫“躺平”；后来的单干，又被叫做“不合群”。

和身体一样，事业这副钟摆，比国家的钟摆更难受。国家有很多人，一派被压下去，别的派还在；一份事业只有一个人在走，没有另一个自己替他缓冲。

三派走到头，也各有各的样子。成长派走到头，人成了一台永远在升级的机器，停下来一周都觉得是罪过。幸福派走到头，人成了一个只许舒服的人，把每一点挑战都当成故障。自主派走到头，人成了一座孤岛，把每一次托底都当成束缚。

这里要记下一点：事业里的钟摆，还比身体里的多一层。身体的三派，靠的多半是同一个人自己的前后变化；事业的三派，常常是同一个时代把一种说法抬得很高。哪几年“奋斗”是最响的词，哪几年“松弛”是最响的词，哪几年“自己做主”是最响的词，一个人的路，被时代的这一阵风推着走，却常常以为是自己选的。每个人身上的钟摆，其实是被一个更大的钟摆带着摇的。

老蒋的班之所以没被这样带跑，不是他懂这些，而是那本记工本摆在那里，提醒他：这个人今年需要什么，不是这一年的时髦词说了算。

所以，三分裂的事业里，最难的一件事不是挑哪一派，而是认出：现在是哪一阵风，在替我说话。认出来了，也许仍然免不了跟着摇，这没有办法，不过至少知道自己在摇；知道自己在摇，才谈得上回头去看那团土，看它到底想要什么。

◆ 18.10　小结

事业不是一条路，而是三条意义律在同一个人身上轮着走；它被分裂，不是因为三条路互相打架，而是因为三条路各自有了自己的话、自己的人、自己的机构，只剩下那个人，一个人，面对三套话。

可事业只是一个人一生里的一块。他还有教育，还有身体。下一章，我们把三块摆在一起，看一个人从六岁到七十岁，他的一生是怎样被切成了九块——而每一块都有人管，唯独那一整块，没有人管。

◆

19

第19章

九块碎片：一个人的一生

◆ 19.1　阿远，从六岁到七十岁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人，叫阿远。他不是谁，他是很多人的样子拼出来的。

阿远六岁那年，在县城一所小学门口，被妈妈牵着手。入学前那个暑假，妈妈听了三种话。邻居说：“现在不早点学点东西，上了小学就跟不上了。”隔壁班的老师说：“这个年纪最要紧是开心，别把孩子逼坏了。”阿远的姨妈说：“让他自己挑，他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三句话，妈妈全听进去了。结果是：阿远周六上午去了一个数学启蒙班（创造），周六下午被带去河边捡石子，不许问成绩（幸福），周日由他自己选，他选了在家里拆一台旧收音机（自由）。

妈妈当时没觉得这三件事有什么冲突。一个星期，三个半天，各占一块，挺好。

十五岁，阿远面临中考。三句话又来了，换了衣服。学校说：“你要冲一冲重点高中，这是人生的关键一步。”（创造：往上长）家里说：“别太拼，身体要紧，考不上也有别的路。”（幸福：守住）班主任私下说：“你自己想想你想要什么样的路，不要被别人推着走。”（自由：自己定）阿远那个晚上睡不着。三句话他都信，三句话互相拧着。

二十二岁，阿远进了一家公司。入职第一周，他听到了“成长”（带教的师兄说你要多接活）、“关怀”（人事发了一张员工福利手册）、“自主”（上司说这个项目你自己想办法）。

三十五岁，阿远有了孩子，腰也开始不舒服，公司要他带一个小组。三件事同一个月到：孩子要上学（教育），他的身体在发出信号（健康），他被推到一个新位置（事业）。每一件事上，三种话又各来了一遍。

五十五岁，阿远所在的部门做了调整，他被要求学一套新系统，他的父母那一年住进了医院，他的孩子在外地考研，不知道要不要考。

七十岁，阿远退休已经十年。社区的老年大学问他要不要学画画（创造），养老机构发来宣传册说“让晚年舒适安心”（幸福），子女提醒他“医院的事你自己要想清楚”（自由）。

从六岁到七十岁，阿远每一个年纪，都碰到同样的三把尺子，各自说着同一句话（下文简称“三句话”）：你还能更好，你值得舒服，你自己决定。三句话换着衣服，在教育里说，在健康里说，在事业里说。

注意这里发生的不是“三句话碰巧一直跟着他”。更准确地说，是这三句话各自有一套人、一套机构、一套办法，在人生的每一站，都在门口等着：教育有教育的三扇门，健康有健康的三扇门，事业有事业的三扇门。

阿远不是一个被规划好的人。他的路，是一站一站走出来的：六岁的收音机，十五岁的失眠，二十二岁的第一个项目，三十五岁的第一次腰疼——每一站，他的选择都回头改了下一站的起点。可是，他每一站面对的，不是一个“整个的阿远”该怎么走，而是三扇门里选一扇、或者三扇门轮着进。

没有人在门外站着，替他看这九扇门是怎样缠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细节，要在这里停一下。

阿远六岁时拆的那台旧收音机，后来怎么样了？没有怎么样。它被他拆成一堆零件，装不回去，妈妈第二天收走了。在九块的账里，这件事没有一栏可以登记：它不是竞赛，不算快乐教育的成果，也不是什么“自主选择”的案例。三十年后，阿远做了一名设备维修的技术员，有人问他怎么入的行，他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小时候拆过一台收音机。

这样的一件事，在三套话里都说不通，可它偏偏在阿远的来历里占着一个位置。九块碎片的体制，擅长处理“可以登记的事”，却不擅长处理这种事：当时看不出用处，过很多年才显出一点来历的东西。这一点，卷七会再回来。

◆ 19.2　九块是怎样排出来的

把阿远一生碰到的门排一排。横着是三块人生：教育、健康、事业；竖着是三条意义律：创造、幸福、自由。三乘三，九块。

下面这张表，是本章唯一的一张表。表里的话是常见说法的概括，不是哪一家机构的原话。

	创造（你还能更好）	幸福（你值得舒服）	自由（你自己决定）
教育	竞赛、拔尖、创新班：“不要停在会做题”	快乐教育、心理陪伴：“童年不能被抢走”	择校择课、个性化：“让孩子自己选”
健康	运动训练、体能提升：“练出更强的身体”	舒适养护、放松调养：“别太累，对自己好一点”	自我管理、知情选择：“我的身体我做主”
事业	培训晋升、职业发展：“走出舒适区”	员工关怀、工作生活平衡：“幸福感”	弹性办公、自由职业、内部创业：“自己说了算”

这九块，每一块里，都有人在做事。

教育×创造那一块，有竞赛教练、拔尖班的老师、培养尖子的学校。他们说的话是真诚的：一个孩子有潜力，不去推他，就是浪费。

教育×幸福那一块，有心理老师、倡导快乐成长的家长社群。他们说的也是真诚的：一个孩子被逼到失去笑，什么潜力也没用。

教育×自由那一块，有允许孩子自选课程的学校，有强调“尊重孩子意愿”的教育观。同样真诚：不是自己要的东西，学得再好也是别人的。

健康里，三块同样是三拨人：想让身体变强的，想让身体舒服的，想让身体由自己说了算的。事业里，一样。

看着这张表，容易冒出一个想法：这是一个三行三列的网格，每一格是独立的一块地。

其实不是。这张表看上去是九块，实际上是三句话在三个地方各说了一遍。

你看每一竖。“创造”那一竖：教育里的“你还能更好”，健康里的“练出更强的身体”，事业里的“走出舒适区”，是同一句话，只是衣服不同。“幸福”那一竖：“童年不能被抢走”“别太累”“幸福感”，也是同一句话。“自由”那一竖：“让孩子自己选”“我的身体我做主”“自己说了算”，仍是同一句话。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一个人的一生，被三把尺子的三句话切成三条竖，再被教育、健康、事业三个领域切成三条横，剩下九个小格**。九个小格各自有了专家，是因为这三句话各自长进了这三个领域。

这解释了一件常见的怪事：为什么教育界的“创造派”和事业界的“成长派”常常一个腔调，为什么健康里的“舒适派”和教育里的“快乐派”常常互相点头，为什么“自己决定”这句话，换到哪个领域，都有人拥护。三个领域并不互相了解，可三句话在三个领域里是认亲的。

这三句话正是卷一里那三个人各自统一出来的东西：皮尔斯说路要长，詹姆斯说路要好使，杜威说路要多。到了阿远的一生里，三个人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三句话，各自长成了三套体制，在每一个年龄段、每一个领域里站着。

再看一个细节。这九块，每一块都有自己的“话术”。话术不是骗人的话，它是一块地上长出来的说话的方式。“赋能”“舒适圈”“心流”“选择权”“内耗”……这些词，每个都对应着一块地，也是那块地的人互相认识的暗号。外面的人听着，常常半懂不懂。

最后还要问一句：这九块，每一块自己做得好吗？

多数时候，做得不差。教练真的能把一个孩子带到更高的地方，心理老师真的能让一个孩子重新笑起来，健康管理师真的能帮一个人改掉坏习惯。我们不是在说这九块是错的。我们在说另一件事：每一块都对，合起来，却没有人对。

还要说清楚这一节的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会是错的。

如果九块碎片的说法成立，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人，在不同领域里遇到的“好心建议”，会按三句话归成三堆，而且三堆之间互相拆台。反过来，如果我们去找一批人，发现他们在教育、健康、事业里听到的建议，早已被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统一过、互相对得上，没有人听到“没做够”的两遍话，那么这个判断就错了。

我们没有做过统计，不敢说这样的人没有。但可以说，在老蒋的班里，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因为老蒋一个人在看。在九块都分了家的大地方，这样的人，需要运气，或者需要一个像老蒋那样的人刚好在身边。

这也是九块碎片这件事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它不是谁的错，也不是哪个机构的恶意，而是每个部门都在认真做自己的事，合起来却没有人为整个人负责。就像一座桥，每一段桥墩都经过了严格验收，可没有人验收桥面上走的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 19.3　没有人管整块

要看清这一点，得先看看“整块”原来是谁管的。

构想一个旧一点的镇子。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有几个人管他的“整块”：祖母知道他怕什么，隔壁的师傅知道他手巧，村里的老人知道他家的底细，族里的长辈在他十几岁时说一句“这孩子该学门手艺”。这些人不是专家。他们不懂什么创造、幸福、自由。可他们把这个孩子的教育、身体、前程，当成一件事在看。

他们看得不一定对。旧的整块管理，有很多毛病：偏心、固执、压人、把一个人困在出身里。这些我们不应该怀念。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占着一个位置：**那个位置上的人，看的是一个整个的人，而不是一个“学生”“患者”“员工”**。

现代社会把教育、健康、事业分给了专门的机构：学校管教育，医院管健康，单位管事业。每一个机构做得比从前精细。可那个“看整块的位置”，没有人接。祖母老了，师傅退了，街坊搬进了楼房，各过各的。

导读里写过夜市老周。他一晚上被三个问题问了三遍，创造、幸福、自由，他一个人，一边炒粉一边答。他能摆十一年摊，就是因为那三个问题，一直是同一个人在答。老周的整块，在他自己手里。

可大多数人，没有一个这样的摊子。阿远的三个问题，是三个窗口在问：教育窗口问他“你要不要更拔尖”，健康窗口问他“你要不要更舒服”，事业窗口问他“你要不要更自主”。三个窗口，不通气。

构想一个具体的星期。老蒋五十三岁那一年，同一个星期里碰上三件事。

星期一，儿子学校开家长会。班主任说：“孩子现在要学会自己做决定，家长不要替他选专业。”老蒋回家路上想：可我不替他想，谁替他想？

星期三，他去卫生院看腰。医生说：腰是干重活干的，要歇一歇，别硬扛。老蒋点头，心里算的是：歇一个月，这个月的账怎么办。

星期五，工地上来了新规矩，说以后某些工种要持证上岗，培训要花时间和钱。他想：我这个岁数，还学吗？

三件事，在三个地方，被三种话说了。班主任说的是自由，医生说的是幸福（舒适、歇），公司说的是创造（成长，持证）。三个人都好心，都说对了。

可老蒋一个人坐在回家的电瓶车上，三件事叠在一起：儿子的前程要钱，他的腰不能干重活，新规矩要他花钱学。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我这个五十三岁的人，往后几年怎么办”。可没有一个窗口替他看这一件事。班主任不管他的腰，医生不管他的证，培训不管他儿子的专业。

最后，老蒋做的还是他最熟的事：回到那本记工本，翻开，把这几年的账算了一遍。他算出来了一个办法，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坏，只是他自己的。

这是整块的位置还在运转的最后一点余温——老蒋自己，在做自己的整块管理者。但多数人，连一本记工本也没有。

这里面有一个要紧的道理：整块，不是“各块相加”。九块相加，得不到一个人。因为每一块里的“创造”“幸福”“自由”，是按那一块的刻度定义的；而一个人身上，创造、幸福、自由是缠在一起的：教育里的挫折，改变了他对事

业的看法；健康里的一次住院，改变了他对“成长”的耐心；事业里的一次失败，改变了他对“自己决定”的信心。这些缠，发生在块与块之间，发生在九块的缝里。而缝，恰恰是没有人管的地方。

用本书的话说：**九块是三条意义律在人生三个领域里各自的显露；整块，是这些显露缠在同一个人身上的那团土。显露有专家，土没有。**

◆ 19.4　缝里的三件事

九块之间的缝，不是抽象的。它们长在日常里，有名有姓。下面选三条最常见的缝，看看缝里发生什么。这些都是构想的场景，用来说明结构，不是在给谁做诊断或出主意。

第一条缝，在教育和健康之间。构想一位妈妈，孩子初二，在一个竞赛班里。竞赛班的老师说，现在是关键期，要加练，周末也别放松（创造）。学校的心理老师发了一份通知，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的睡眠和情绪（幸福）。孩子自己有一天说：我想退出，我想去学画画（自由）。

三个声音，哪个都有道理。竞赛班的老师不是想害孩子，心理老师不是想拖后腿，孩子也不是任性。但妈妈夹在中间，要拿的主意是：这个孩子，这个阶段，该让谁的话走在前面。这个问题，竞赛班答不了，因为它只管创造；心理老师答不了，因为它只管幸福；孩子答不好，因为他此刻只有一条路在眼前。这个主意，本来该由一个“看整块的位置”来拿，现在只能由妈妈在一个晚上拿。

这个妈妈在哪个窗口也找不到答案。她只能去翻手机，看别的妈妈怎么选，看了一晚上，每个人说的都是“我家孩子”的事，没有一个和她的孩子对得上。别人家的答案，是别人家的土长出来的。

第二条缝，在健康和事业之间。构想一个人，四十岁，在公司里是个骨干。他最近睡不好，肩颈总不舒服。他面前有三种说法：同事说“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升了，咬咬牙”（创造）；公司的关怀邮件说“请适当休息，你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幸福）；朋友劝他“你可以试试自由职业，时间自己安排”（自由）。

注意，三个说法都在讲他的身体，可没有一个是在问他身体“现在怎么样”。咬牙的说法，把身体看成成长的成本；关怀的说法，把身体看成需要被呵护的对象；自由职业的说法，把身体看成需要拿回控制权的领地。

这里尤其要说明一句：本书不涉及任何医疗建议。身体出了信号，该去看医生，这是医生的事。我们只指出：就算他去了医院，医生管的是身体这一块；至于身体这一块和事业这一块怎么摆，医生管不了，公司管不了，朋友管不了。缝在那里，没有人。

第三条缝，在事业和教育之间。构想一对夫妻，孩子刚上小学。母亲在公司刚被提到一个更要紧的位置，要加班，要出差。父亲的工作相对灵活。学校的家长群里，天天有人说“家长要多陪伴”“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事业说：“现在是你往上走的好时候。”教育说：“现在是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这两句话，一句来自事业的创造，一句来自教育的幸福（陪伴），在同一个晚上，对同一个母亲说。她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不想上进。她被两把尺子同时量着，每一把量出来的都是她“没做够”。

这三条缝，有一个共同的样子：两块地的专家，各自说得都对，缝里的那个人，听了两遍“没做够”。

把三条缝并起来看，能看出九块碎片的另一个样子：它不仅是“没人管整块”，还是“在缝里，人同时被两把尺子量”。一把尺子量一个人，他还能说“我做到了”；两把尺子同时量，总有一把量出“不够”。碎片越多，缝越多，“不够”也越多。

还有一件事，必须在这里说，因为它最容易被忽略：缝里的人，在两把尺子之间做的每一次取舍，都会回头改写他下一次的起点。妈妈那天晚上选了让孩子继续上竞赛班，三个月后孩子的情绪出了变化；她再做下一个主意的时候，起点已经不是原来的起点了。这些取舍，一次一次叠在这个人身上，叠成了他的来历。可是这个来历，没有一个地方记。竞赛班记孩子的名次，学校记孩子的出勤，妈妈记在心里。

也就是说，九块的缝，既是现在没人管的地方，也是将来没人记的地方。

用三方程的话说，S=F(D,E)：一个人身上显出来的样子（S），是由他一路走来的差异序列（D）和他那团缠在一起的土（E）一起生成的；可现在，D 被三套话各自写成了成绩、病历和履历，E 干脆没有账本。显露有记录，路有记录，唯独土，没有。

◆ 19.5　碎片的代价

九块没有人管整块，会怎样？

第一个代价：块块成功，整块失败。

阿远二十五岁时，在教育上，他拿到了很好的学历（创造的成功）；在健康上，他按时运动、体检结果都正常（健康的成功）；在事业上，他得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安稳的成功）。三块各自的指标，都亮绿灯。

可他有一个晚上对自己说：“我怎么觉得，这些都不是我。”

这句话在人生的九块里，没有一块能听懂。教育的指标里没有“是不是我”；健康的指标里没有“是不是我”；事业的指标里也没有。“是不是我”，是整块才有的问题。

第二个代价：块与块之间互相偷。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钱，是一份。九块各自要，就互相抢。为了事业的成长，牺牲教育里陪孩子的时间；为了健康的舒适，推掉事业里一次难得的机会；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家长延后了自己的自主。这些抢来抢去的账，没有人记。

要小心这里的说法：我们不是说“应该平均分配”。平均分，本身就是一种统一，是一把新的尺子。我们说的是：**这些取舍，现在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自己做的，而且往往是用其中一块的尺子，去量另一块的得失**。用事业的尺子量健康，健康永远是“成本”；用健康的尺子量事业，事业永远是“风险”。

第三个代价：轮换没有人做。

回想老蒋的工地：春天创造先走，夏天幸福先走，秋天自由先走，腊月幸福回来。一个人的一生，也有它的季节。但现在，九块里的三句话，不分季节，同时在说。一个十八岁的人，该不该多尝试（创造）？一个四十五岁的人，该不该守一守（幸福）？一个六十岁的人，该不该为自己做一回主（自由）？这些，不是一刀切的答案。但没有人替他看他在哪一个季节，每一句话，都对他说一遍。

老蒋那个夏天缩了午休，把一个“该歇的季节”过成了“该赶的季节”，走了三个人。放到一个人的一生里，这样的错，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提醒：二十岁被逼着“稳”，四十岁被逼着“闯”，六十岁被逼着“拼”。每一句话都对，只是说错了季节。

第四个代价：土没有人记。

一个人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人的？他的来历，一层一层，有多少是教育缠进去的，多少是身体缠进去的，多少是事业缠进去的？这个来历，在九块里，每一块只记自己的那一段：成绩单记学业，病历记身体，履历记工作。三份记录，三种格式，三个保管处。没有人把它们合成一个人的家谱。

本书后面会说，这本家谱，就是E的同一性谱系。眼下先记住：九块碎片的最深的代价，是一个人的来历被切成了九份，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读到完整的一份。

有人会说：既然问题是整块没人管，那让每个人自己整合就好了。自己的一生，自己负责。

这是自由律的回答，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它有它的道理：整块最终只有当事人才能走完，别人替不了。

但这个回答，本身就是九块里的一块。“自己管自己”是自由，而自由这句话，已经在九块里占了一整竖。让一个被三句话同时说了几十年的人，“自己整合”，等于让他在三套话里，只用其中一套，去管另外两套。这和老蒋把夏天过成秋天，是同一种错。

也有人会说：那就设一个新部门，叫“生涯规划”或“全人发展”，专门管整块。

这样的部门有，也有用。但请看它的话是怎么说的：它很可能说“帮你找到最好的自己”（创造），或者“帮你找到内心的平静”（幸福），或者“帮你找到属于你的选择”（自由）。它多半会长成第十块，用一条律去管另外九块。

整块不能靠第十块管，因为整块不是第十块，整块是九块之间的那团土。

◆ 19.6　一生也有季节吗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既然老蒋的工地有春夏秋冬，一个人的一生，是不是也该有“哪个阶段该让哪条律走前面”的规矩？比如少年多创造，中年多稳，老年多自由？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也是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要慢慢走。

先说它的道理。人在不同的年纪，确实有不同的重心。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每天只被告知“要稳，要安全”，他会错过很多试错的机会；一个六十岁的人，如果还被要求“每年都要突破自己”，他会累垮。不同的季节，三条律的轻重，确实会不同。

再说它的危险。一旦把“少年创造、中年幸福、老年自由”写成一条规矩，它就立刻成了一把新的尺子，成了第十块。而且是一把非常强的尺子：因为它拿“年龄”做了依据，听起来像天经地义。

再设想阿远的另一种走法：他十五岁那年，不想“冲重点”，想学一门手艺，他的创造，走得比同龄人更靠前，却不是在书本里；他三十五岁那年，不想“稳”，想去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他的自由，走得比同龄人更靠前。这些，没有一条是“该”出现在那个年纪的。

所以，本书不会给“某个年纪该做什么”开方子。我们能说的，只有一句更朴素的话：季节是有的，但季节要看土，不能看日历。老蒋判断夏天该歇，不是因为日历写着六月，是因为他看见了人的脸色、听见了工地上的喘气声。那是在读土。

一个人一生的季节，也只有他自己的土能读出来：他的身体现在怎么样，他的家现在需要什么，他手上正在长的东西有多深，他心里那一点还说不清的东西，是在冒头还是在退。这些，要有人读。可九块碎片的体制里，没有这个读法，只有九套各自的量表。

这就回到了前面那个最深的缺口：读土，需要一本家谱。不是一份简历，不是一份病历，不是一张成绩单，是一本把这些都放进去、并且知道它们之间怎么缠的账。这本账现在没有，因为过去没有办法做：需要的信息太多，需要的理解太细。今天，有了新的可能，这是本书最后一卷要讲的事。

在那之前，先把一个更近的问题摆出来：如果一个人的一生被切成九块，这种切法，是美国那片土上长出来的，还是别的地方也一样？

◆ 19.7　小结：一块一块都对，一生却没有人对

一个人的一生，被“你还能更好、你值得舒服、你自己决定”三句话，在教育、健康、事业三个地方各说一遍，切成了九块；每一块都有专家、有机构、有话术，而九块之间的那团土——一个人真正的来历——没有人管。

这个判断，是本卷的终点，也是整本书到这里要落下的一颗钉子。前面四卷，我们从三个人的书桌，走到美国的土，再走到治理、走到社会，最后走到一个人的一生，发现是同一个结构在各个尺度上的重演：路被统一了，土被压平了；每一条路各自精细，没有人问土。

回头看老蒋的楼梯口，再看阿远的一生，它们像同一幅画的大小两个版本。小的那幅里，三条路并排走在一个楼梯口，有人拿着一本记工本，轮着来；大的那幅里，三条路被切成九块，各有各的门，没有人拿本子。差别不在人心，在有没有一个位置，能同时看见三条路。这个位置，不是第十块，而是三条路共同站着的那团土。

还有一层，要在这一章的末尾补上。老蒋的记工本，其实是一份最小的“谱系”：谁什么时候来的，谁家里有过什么事，哪一年谁走了，为什么走。它不好看，也不规范，却是这班人的来历。九块碎片的体制里，每一块都有漂亮的记录，唯独没有这样一本丑的、杂的、却把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记的本子。

我们没有说，只要有了这样一本本子，问题就解决了。本子会记错，会偏心，会被写本子的人的尺子悄悄改写。但没有本子，连改的东西都没有。读它的人，也得是懂这一班人的人。

可是这一切，说的都是一块土上的事。当这套话——“有用”“好使”“长出来”——被带到另一块土上，会发生什么？

1919年，一位美国哲学家坐船来到了中国，在这里待了两年多。他带来的是一套话，他遇到的是一片完全不同的土：这片土上，早就有一句人人挂在嘴边的话，叫“这有什么用”。

下一卷，我们去看，那句话是怎样遇上这片土的。

◆

卷　六

中国卷：
同一句“有用”，落在另一片土里

卷　序

杜威来过中国，胡适把他变成了方法。“这有什么用”这句话，在中国的土上又被统一了一次。可中国的土里也有另一样东西：庄子的“无用之用”，老子那只空着的碗。

20

第20章

杜威来华：有用在中国被再统一了一次

◆ 20.1　候车厅里的人，和一艘船

上一卷的末尾，那位六岁走到七十岁的人身上挂着九块碎片，各有各的专家，没有人管整块；而最后一页，一位美国哲学家坐着船，正驶向另一片土。这一卷就从那艘船讲起。不过在上船之前，我们先在今天的一个地方站一会儿，看看这艘船的货，最后落在了怎样的地面上。

先去高铁站的候车厅。

周六下午，大厅里坐满了人。头顶的大屏幕上，车次一行一行地跳：G字头的，D字头的，检票口、晚点分钟数，红的黄的绿的。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抱着睡着的孩子，有个年轻人坐在靠柱子的位置，一只手刷手机，屏幕上是各种招工信息，另一只手搭在背包上。

你要是在这里站十分钟，会听见两种话。一种是关于路的：这趟车几点到、要不要换乘、哪个口检票。另一种是关于“值不值”的：这趟回去划不划算，那份工做不做得，孩子这个暑假的班报不报。第一种话有答案，屏幕上就写着。第二种话没有答案，可每个人说起来，都用同一种口气——好像“有用”两个字，是一块谁也不必解释的地板。

我们要问的是：这块地板是什么时候铺上的？

一百多年前，有一艘船靠了上海的岸。1919年4月底，美国哲学家杜威到达上海。他原本是在日本讲学，应几位中国学生的邀请，顺路来中国看看，打算停留的时间不长。结果他在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直到1921年夏天才离开。他去了北京，去了好几个省，作了许多场讲演，主题有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的派别、伦理、实验逻辑等等。

他到达几天之后，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

你再回到候车厅想一想。那些屏幕上的车次，几乎每一趟都是一个“为了到达”的东西：车为了到站，人为了到家，工为了到厂。整座大厅是一台精密的“到达机器”。它运转得极好，好到让人忘了问另一件事：人在大厅里坐着的这一两个钟头，算不算“在路上”？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闲。可是把它放在心里，往下读，你会发现它一直在场。

这是一次说起来太容易说得夸张的相遇。一个六十岁的美国人，带着一套关于“经验”“探究”“生长”的哲学，来到一个正在被巨大的焦虑推着走的国家。后人写这段历史，常常写成“杜威把实用主义带进了中国”，好像一粒种子被播进了一块空地。

本章要说的不是这个。

判词：杜威带来的，不是一粒种子，而是一把水壶——他浇下去的那块地，早就长着东西了。

这句话怎么讲，要分三步。第一步，看那位乘船而来的老师，把他的哲学交到了哪些学生手里，学生又把它变成了什么。第二步，看变成的东西，在中国这片土里被统一在了哪里。第三步，看当时最有名的一场争论，“问题与主义”，两边其实站在同一个地方。

关于胡适和陶行知，站上已经有了好几本书写过。第235号写杜威的生平，说他“教的是做中学，靠的是书桌长”，也把胡适“给了一个方法”这件事点了出来；第180号和第170号两本讲杜威教育的书，各自读到了胡适的影子和杜威的“生长”。这些我们不重讲，只借来用。本章只问一个它们没有问过的问题：这些东西到了中国，是被统一在哪一条律上的?

◆ 20.2　两个学生，两种拿法

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生发生的。胡适和陶行知，是其中最响的两位，两人都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听过他的课。胡适在美国读书时受教于杜威，回国后成了新文化运动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陶行知也在那里学习，回国后把大半辈子放在了教育上。

两个人都真心尊敬老师，可是他们拿走的东西，不一样。

先看胡适。胡适把杜威讲成了一种“方法”。1919年，杜威还没到中国，胡适就在《新青年》上写了介绍实验主义的文章；杜威来了以后，他当翻译，也当推销员。后来他自己总结的几句话，流传最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还有他在1919年末写的《新思潮的意义》里那四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你看这几句话，有一种清清爽爽的味道：遇事不要先问“主义”是什么，先问“问题”是什么；不要靠权威，要靠证据；一件一件地解决。这是杜威的味道，也是胡适自己的味道。

说胡适只有“方法”这一面，是不公平的。本书给每个人派一条律，必须说出他也写过另外两条的地方。胡适1918年为《新青年》编“易卜生号”，写了《易卜生主义》，大意是：社会要进步，先得有一个个独立的、敢说“不”的人。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自由律的文章，热烈，有温度。所以，胡适不是只有方

法的人；只是他最后留给后人的东西，成了方法。一个人身上的三条律都在，可传下去的，是最容易传的那一条。

可是请注意，杜威哲学里最重的一样东西，在这个过程里变轻了。杜威讲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民主不是一套制度，是人与人在共同的事里不断扩大“能做什么”的方式；教育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它自己就是生长。这种“自由”，在胡适手里被压成了一个方法：假设、求证、解决问题。站上第235号把这个动作叫做“胡适给了一个方法”，我们接着往前说一步：自由律在这里没有消失，它被压成了一套可以教、可以学、可以马上用的步骤。

压成步骤，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一样东西。

“大胆的假设”这句话里，其实藏着一个很重的许可：你可以暂时不知道。一个人面对一团乱麻，不必立刻有答案，可以先猜，猜错了再改。这个许可，在杜威那里，是自由律的核心——人有权在不确定里走一段。可是当这句话变成口号，变成“假设—求证—结论”三步的时候，那个许可里“暂时不知道”的部分，慢慢被挤掉了。步骤的每一格都要求有一个产出：假设要写出来，求证要拿出证据，结论要能交差。一个可以暂时不知道的人，被换成了一个必须按步骤出结果的人。

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方法这种东西自己的性格：它越容易传，就越要求每一步都能验收。验收，需要一把尺子；而这把尺子，恰恰是那片土早就备好的。

压成步骤，就能传开：一个人不懂什么是“生长”，也能学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180号书把胡适读得近于“内卷”，我们的读法是：一条自由律被压成方法，方法又被拿去干别的事，它自己的“向”就越来越模糊——这一点到20.5再说。

再看陶行知。陶行知拿走的，是另一半。杜威说“学校即社会”，陶行知回国后做的是倒过来：把学校搬到社会里去。他说“社会即学校”，说“生活即教育”，说“教学做合一”。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他不再待在大学的讲台上，而是走到农村，去教那里的孩子、教那里的先生。

你可以看出，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长”也拿走了，可他把生长放进了一个很具体的地方：乡村，一个要被改造的中国。他后来给自己改名，从“知行”改成“行知”，意思是“行是知之始”。这又是一次回写：连名字都被他放进了“做”这条路里。

这里有一个很细的地方。陶行知的整套做法里，幸福、创造、自由都在——孩子们快乐，学校很有创意，农民有了自己的学习空间。可是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是被放在一个目的底下的。那个目的，他有一句名言流传很广：“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说的是无私；可一颗心，总要捧到一个地方去。陶行知捧去的地方，是一个要被救起来的国家，一个要被改造的乡村。

两个学生，两种拿法：一个把杜威压成了方法，一个把杜威放进了乡村。但是他们两个，在一件事上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他们都没有让杜威的“生长”留在它原来的样子，也就是“生长本身就是目的”。他们都给它配了一个更大的、早就定好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什么？

◆ 20.3　带得走的，和带不走的

回到候车厅。一个人出远门，行李是要挑的：衣服带得走，证件带得走，奶奶腌的那一罐辣椒酱，带得走，可是奶奶厨房里的那股味道，带不走。罐子能装下酱，装不下那间厨房。

思想漂洋过海，也是这样。杜威的东西到了中国，能装进箱子的，很快就铺开了。

方法带得走。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中学生也能背。制度带得走。1922年，中国公布了新的学制，改成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样子，普遍认为是向美国学制靠拢。教育行政的办法也带得走。杜威的另一位中国学生蒋梦麟，五四前后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来也在教育行政的位置上做事；一个学生坐到办公桌后面，老师的话就变成了公文和章程。课程办法带得走。二十年代，“设计教学法”一类来自美国进步教育圈的做法，在不少学校里试过。口号带得走。“教学做合一”，七个字，小学老师一听就记住。

可是有一样东西没有装进箱子。

站上第235号书给过一句判词：杜威“教的是做中学，靠的是书桌长”。意思是，那位先生自己最好的东西，不是在课堂上做出来的，是在书桌前慢慢酝酿出来的，一个问题放在心里很多年，一遍一遍地想。杜威在芝加哥办实验学校，是1896年的事；他的《民主与教育》，1916年才出版。中间隔着二十年的试、错、想。一个讲“做中学”的人，自己靠的是长年的无所用心的沉淀。这一点，卷一里已经有过类似的影子：皮尔斯穷困的晚年，留下了大量没有发表的手稿。

这一点，装不进箱子。

还有第二样带不走的，是问题本身。杜威的“生长”，是在一个具体的处境里问出来的：美国的城市里，有一屋子来历各异的孩子，说着不同的话，带着不同的家规，怎么让他们在一间教室里一起长？这是一个“缝合”的问题。（这片土是怎么缝起来的，卷三会细讲。）

中国二十年代的学堂，在问另一个问题：怎样让更多的孩子，尽快读上书、识上字？同一个时期，平民教育的运动，陶行知也是其中的一员，正在往这个方向用力。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错位：答案走得比问题快。杜威的答案——“生长”“做中学”“民主的生活”——漂洋过海了，可是当初问出这个答案的那个问题，留在了美国。答案到了新的地方，就要去找新的问题接它。在中国，接它的问题是：怎样快一点，让国家强起来。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答案去接了另一个问题，会发生什么？

◆ 20.4　一个听众的两只耳朵

为了看清“再统一”是怎样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我们再设想一个场景（构想的，不是某一场讲演的实录）。

1919年或1920年，北京。一间挤满了人的讲堂。后排坐着一位从外地赶来的小学教员，三十出头，带着一个本子。台上是那位美国先生，旁边的翻译，也许是胡适，也许是别的学生，一句一句地译。先生在讲，教育不是为将来做准备，教育就是生活本身，孩子在学校里就是在生活，生活里自然有生长。

这位教员的耳朵，是两只。

左耳听到的，是先生的话：教育就是生活，孩子现在就在生长，不必等到将来。他心里一动：自己班上那几个总被他呵斥“不专心”的孩子，也许不是不专心，是在长别的东西。

右耳听到的，是另一句话。那句话不在讲堂里，它从他一路上看到的东西里来：他的县城里有多少孩子没有书读，村里的先生一个月拿多少钱，城里的报纸上又写了什么。右耳在问：这些话，能不能让更多的孩子读上书？能不能让这个国家快一点站起来？

两只耳朵听同一场讲演，翻译成了两种东西。

左耳的“生活”，到右耳那里，变成了“生计”。教育就是生活——生活里要有用，要能谋生，要能养家。先生说的“现在就在生活”，被听成了“要对生计有用”。

左耳的“生长”，到右耳那里，变成了“进步”。生长是没有终点的一直长；进步是朝着一个方向、一格一格地往前挪，挪到一个叫“强”的地方。

他回到县里，在本子上记下的，多半是右耳听到的那一部分：具体的办法，能用的做法，可以向校董说明的理由。因为左耳听到的那些，没有一条是校董会批准的。

这不是这位教员的过错。他的两只耳朵，各自都很诚实。只是土在右边。

左耳的东西没有消失，它们被收进了本子的空白处，收进了他某个夜里的一个念头里，收进了他对那几个“不专心”的孩子比从前多忍了一分钟的耐心里。这些东西没有被统一进去，所以也没有被取消，只是留在了没有名字的地方。这个“没有名字的地方”，是我们后面几卷要反复回去看的地方。

◆ 20.5　再统一一次：统一在“强”上

在美国的土里，杜威的“生长”是没有终点的。一个人今天学会了一样东西，明天有了更多可以做的事，后天又有更多——杜威的路，是一条越走越宽、没有尽头的路。第170号书为这件事写过一句判词，说杜威让学习在路上长出来，却“望见被挪到终点”。这句话读起来有点绕，大意是：路上本该一路望见的东西，被挪到了路的尽头。

杜威来到中国以后，这个“终点”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要讲清楚这件事，要先回到更早的年头。1840年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处在一种压倒一切的焦虑里：怎样才能不被打垮？“自强”是晚清洋务运动里最响的词之一，“富强”是后来的人念了几十年的词。从洋务到维新，从辛亥到新文化，每一代人换了不同的办法，可是问的还是同一个问题。到了1919年，这个问题又被巴黎和会上的消息顶到了最前面，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喊的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杜威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到的。

你想想一个中国听众的位置。他坐在讲堂里，听这位美国先生讲教育、讲民主、讲探究，每一句都很有道理，可他心里同时压着另一句话：这对中国有什么用？能不能让中国强起来？杜威讲的“创造”（艺术、探究、新的经验）和“自由”（个人的成长、民主的生活），在他听来，都得先过这一关。过得去的，是好东西；过不去的，先放着。

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这片土里的第二次统一：

在美国，实用主义把路统一在一条意义律上；在中国，这些东西进来以后，又被统一了一次——统一在了一个读数上：强。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这个“强”，是哪一条律？

它最靠近创造律。因为“强”是要靠造出来的：造工厂，造学校，造人才，造新文化。胡适说“再造文明”，一个“造”字，说得再明白不过。创造律是这样运行的：不断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中国的听众，一听就懂。

可它又不是皮尔斯那一种创造律。皮尔斯的创造，没有终点：规律一直长，合理性一直长，永远在路上。中国这里的创造，有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点站不是理论家定的，是土定的：国家的处境逼出来的。创造被要求朝着一个具体的方向长，长到“够强”为止。

那么，自由律和幸福律呢？它们也在，可是各自被安排了位置。

自由，被收进了“强”：个人的解放，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成为有用的国民。新文化运动里，个人从旧家庭、旧礼教里解放出来，这是一场真实的解放；可是解放之后的路，常常被说成“为了国家需要新人”。自由不是被取消了，是被放在了“强”的底下，成了强的前提。

幸福，被放在了更后面。“苟安”在那些年里是一个很重的贬义词，“安乐”成了需要警惕的东西。不是说中国人不要幸福，而是幸福被说成“强了以后再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次序：先强，后福。

旗帜上少了一位先生。再看一眼那几年的旗帜。1919年前后，新文化运动打出了两面大旗：一面写着“德先生”，就是民主；一面写着“赛先生”，就是科学（这两个称呼出自陈独秀1919年初的文章）。民主，靠近自由律：人人有权说话，有权选择。科学，靠近创造律：不断弄清原来不清楚的东西，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两位先生，各自都有一条律站在背后。

旗帜上没有“福先生”。

这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人不要日子过得好。恰恰相反，几乎每一个举旗的人，心里都装着一个“让大家过得好些”的念头。可是在旗帜上，幸福没有位置。它是旗帜下面的东西，是旗帜举起来之后要兑现的东西。创造和自由被写在了前头，幸福被写在了后头。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说明，那次再统一不是靠谁的命令完成的。它是靠一种写法完成的：什么字上旗，什么字不上旗。

用我们的话说：**皮尔斯的创造律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中国的“强”是给这条路装上了一个终点。杜威的自由律在美国土里是一片越开越宽的原野，在中国土里变成了通向终点的一条引水渠。**

注意，这里一个字也没有说“中国人有什么性格”。我们说的是：同一把水壶，浇在两块不同的地上。一块地是各种来源缝在一起的，没有哪个共同的“向”；另一块地压着一个所有人都感受得到的“向”。水壶是一样的，浇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一间小学里的三条律。为了不让这些话悬在空中，我们设想一个场景（这是构想的，不是某一所学校的实录）。

二十年代，某个县城的小学。新来的校长读了几份教育杂志，决定在高年级试一试“设计教学法”：不再一课一课地讲，而是让学生围着一个题目做——比如全班一起编一份“本县物产调查”。

他很快遇到三拨人。

县里管教育的先生来看了，点头：这个好，让孩子们知道本地有什么，将来可以兴实业。他喜欢这个办法，因为它有助于强。

一位家长来了，站在教室后面看了半天，问先生：孩子这样做了半学期，能不能比别人多认几个字、多会算几笔账？他不反对这个办法，只是想知道它用在哪里。

教这个班的年轻老师最高兴。他觉得这是一件新鲜事，学生们的眼睛亮了，有人为了一个数据争得脸红。可他发现，这份高兴，没有哪一拨人来问。

这里面，创造——新办法、新题目——被县里的先生欢迎，因为它通向“强”。自由——学生自己选题、自己争论——被容忍，因为它没有闹出课堂的秩序。幸福——孩子们眼睛亮了、老师高兴——被当成一种“调剂”，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当作理由。

三条律都在教室里，可它们被安排了座次：强坐在上首，能用坐在中间，快乐坐在边上。

这就是“再统一一次”的样子：它不是谁下的命令，是一间小学里三拨人各自很合理的问题，加起来形成的格局。

◆ 20.6 “问题与主义”：两边站在同一个地方

1919年夏天，在刚刚发生了五四的北京，爆发了一场有名的争论。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随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回应（1919年夏秋之间）。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写得最多的争论之一，参与的人后来还有很多。

通常的读法是：胡适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一边是实验主义，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这些，历史书都写满了。我们不评价哪一方的立场，也不做任何现实的表态，只做一件事：用本书的眼睛，重新读一遍这场争论。

站上第170号书对杜威有一种读法，说杜威的方法里，“怎么走”和“为了什么”要接得上。借用这个框架看“问题与主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出来了：胡适那一边说的是怎么走——先看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地研究，不要被大名词拐跑；李大钊那一边说的是为了什么——问题不能一件件地零碎解决，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根本的办法。

这两句话，各自都有道理。可是请看：两边其实站在同一个地方。

第一，两边都要一个统一的东西。胡适一边统一的是路：一套方法，遇到什么问题都用得上。李大钊一边统一的是向：一个主义，所有的问题都往那里去。一个把“怎么走”统一了，一个把“往哪走”统一了。两边都不愿意让路和向各自零散着。

第二，两边都想要同一个终点。你读两个人的文章，会发现，他们吵的不是“要不要国家强起来”，而是“哪一条路才是通往强的路”。上一节说的那个“强”，是他们共同的地板。争论发生在地板上面，没有人在问地板本身。

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两边其实都碰到了土，又都把土压平了。

李大钊说的“根本解决”，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感觉：问题和问题之间是缠在一起的，今天解决这一件，明天那一件又冒出来，因为它们底下是同一片土。这是一个对“纠缠”的直觉。可是他随后把答案统一了：有一个办法，可以从根上解开。

胡适说的“研究具体的问题”，也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的来历，不能拿一个大名词盖过去。这是一个对“来历”的直觉。可是他随后也把答案统一了：一套方法，对所有问题通用。

所以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是：**两边各自看见了土的一部分——一个看见了问题缠在一起，一个看见了问题各有来历——却都没有停下来问：这片土，到底是怎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再想想“根本解决”这四个字。它在今天听来像一句口号，可在当年，它是对“纠缠”的一次朴素的触摸：一个问题拔起来，根上带着泥，泥里连着别的问题。若是肯多问一步，问到“这片泥是怎么积成的”，就走到了本书所说的“来历”。可是，一旦答案是“一个根本的办法”，来历又被统一成了一个解。同样，“研究具体的问题”若是肯多问一步，问到“这个问题的来历是什么”，也会走到同一个地方。两边都走到了门口，都没有推门。

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没有急着要结果的人来问。而在1919年的夏天，没有人有这个余裕。国家的处境在催，每一个人都在抢时间。

一个高铁站里的比喻，也许可以帮我们记住这件事。

你要坐高铁，进站之前，要先买票。买票的时候，系统第一句话问的是：去哪儿？这是“主义”。进了站，你要看屏幕，找检票口，算换乘，这是“问题”。两件事都不能少，一件也不能替代另一件。可是，站里没有一块屏幕告诉你：这一趟，你为什么要去？这一块不在系统里。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是在系统里争：是先问去哪，还是先看检票口。而那个“为什么要出发”的问题，一直在屏幕之外。

争论之后，两边各自把自己的统一做成了东西。一边做成了大学里的方法训练、杂志、学社，一边做成了组织与运动。这不是评价，只是一个观察：当一个“统一”被做成了机构，它就从一个主张变成了一块土。后来的人进到机构里，不再是在“选择”一个主张，而是在“长进”一块土里。这一点卷二已经讲过：方法一旦有了名字、有了机构，就会回写成土。

◆ 20.7　小结：第二次统一，和它留下的东西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杜威带着一套没有终点的“生长”来到中国，被他的学生们压成了方法（胡适）和乡村实践（陶行知），又被所有人压在了同一个“强”字底下——有用，在中国被再统一了一次。

这一次统一，有四个后果，后面几卷还会碰到：

一，“有用”有了一个公认的受益者：国家。从此，一件事有没有用，常常是拿“对大局有没有用”来量的。这和美国土里那种“各方各取所需”的有用，是两回事。

二，方法成了最容易传的东西。因为方法可以脱离土，哪里都能教。这是胡适式的传播的力量，也是它的局限。

三，那个“为什么出发”的问题，被留在了屏幕之外。

第四个后果，是前面那位小学教员的左耳留给我们的：被统一进去的，只是说得出用处的那一半；说不出用处的那一半，没有被反对，也没有被收下，只是没有地方放。

回头看，这一章里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杜威真诚，胡适真诚，陶行知真诚，那位小学教员的两只耳朵也真诚；县里的先生要强，家长要能用，校长要新办法，每一方的问题都问得合情合理。我们看到的，不是谁做错了事，而是许多合理的问题叠在同一片土上，叠出了一个没有人事先设计的格局。这正是“统一”最难被看见的地方：它不是被谁宣布的，是被一件件合理的事累积出来的。

下一章，我们离开历史，回到眼前，回到候车厅外面墙上的那些纸。那里有一句话，每个人都听过，可没有人问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有什么用？

◆

21

第21章

“这有什么用”：一句口头禅，怎样长成一片土

◆ 21.1　站前广场上的那面墙

出了高铁站，穿过站前广场，靠近公交站台的那面围墙上，常年贴着招工的纸。红的、黄的、白的，一层盖一层，有的被雨水泡卷了边。

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你多半在哪个车站见过类似的一面墙。纸上的字，大同小异：

“招普工，男女不限，包吃住，能吃苦。”

“招电焊工，要有证，马上上岗。”

“招仓库理货员，有经验优先，不培训。”

“招学徒，勤快，手脚麻利，一个月后看表现。”

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纸里的哪一张，而是它们共同不问的东西。

不问你喜欢什么。不问你想学什么。不问你五年后想做什么。不问你从哪里学来的手艺——只问你有没有证、能不能马上上手。“不培训”三个字，说得最干脆：我不付钱让你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我只付钱给已经有用的人。

站在老板的位置上想一想，这完全合理。一家小厂，订单赶着交，一个月的工资压着，哪里有余裕去培养一个“将来可能很棒”的人？招工启事是一种极其精密的筛子，筛掉所有“现在还不能用”的东西。

这里不批评任何一个贴纸的人。我们只是借这面墙，看清“有用”在这片土里是怎样被使用的：

第一，它是现在时的。“马上”“即刻”“有经验优先”，时间尺度是以天计的。皮尔斯的创造律，时间尺度是“无限长”；这里的“有用”，时间尺度是“这个月”。

第二，它是别人手里的尺子。“有没有用”不是你自己判断的，是看启事的人判断的。你可以觉得自己很有潜力，可是尺子在对方手里。

第三，它不问来历。你在哪里学的、学了多久、为什么学，一概不问，只看结果能不能兑现。这和詹姆斯式的“兑现”很像，可是又不是：詹姆斯的兑现，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说，这个想法“在我这里起作用”；这里的兑现，是对一个陌生人的承诺。

再看一个细节。“不培训”三个字，把一笔账悄悄转移了：一个人从“不能用”变成“能用”，中间要花时间、花钱、花力气，这笔账谁出？启事不出，它只在入口处收人。那么这笔账只能由别的地方出：一个家，一所学校，或者这个年轻人自己。

于是我们看到：整座社会里，“成为有用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启事之外；而启事之内，只有“已经有用”。有用是在别处长出来的，启事只负责挑。这一点以后会反复碰到：每一个用“有用”做筛子的地方，都靠别处替它养着那些尚未有用的人。

一个年轻人站在墙前，读了十几张纸，拿出手机拍了两张。他背包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挂件，是个手工编的结，不知道是谁送的。这个挂件，在这面墙上，没有一张启事认得它。

筛子的另一头，也在被筛子塑造。

一个想找工作的人，读了十几张启事，自然会学着用启事的语言介绍自己：能吃苦，肯干，上手快，服从安排。简历上不会写“我喜欢看人修东西，一看就是一下午”，哪怕这恰恰是他身上最特别的地方。他也许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在

拿这把尺子给自己“裁剪”：有用的部分留下，写出来；暂时看不出用处的部分，收起来。

这种裁剪做久了，人会慢慢相信：收起来的那一部分，大概真的没有什么用。

我们这一章要问的，不是“招工启事该怎么写”，而是这样一面墙，是怎样成为一个社会里的常识的。一个人从小到大，要听多少遍“这有什么用”，才会在读启事的时候，觉得这是天经地义。

◆ 21.2　一句口头禅，怎样长成土

先看一句话的诞生。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在家里，一位母亲在帮儿子整理行李。儿子十九岁，第一次出远门去外地打工。包里有换洗衣服，有充电器，有妈妈煮的鸡蛋。母亲翻到最底下，摸出一把口琴。

“带这个干啥？”她把口琴扔回床上，“这有什么用？”

口琴被留在了家里。

这一幕太普通了，普通到没有人觉得它是一个事件。可是我们换一个眼光，看这句话是怎么在一个家里、一个镇上、一个社会里一遍遍发生的：

母亲说这话，不是一时脾气。她小时候，她的母亲对她说过同样的话；她的邻居、她的老师、她的领导也都对她说过。这句话对她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把用惯了的手：遇到一样东西，伸手一比，用得上，留；用不上，扔。

这把手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省。家里的包只有那么大，口袋里的钱只有那么多，一年的收成只有那么些。每一样东西都得“挣”一个位置。一个人如果每次遇到一样东西都要从头慢慢思量它的意义，他一天也活不下去。所以“这有什么用”是一句聪明的话，它把无数次的权衡压缩成了一句话。

好。现在，让我们看这句话怎样一步一步长成土。用我们熟悉的“三拍”来看：

第一拍，张力积累。一边是“想要的东西很多”，一边是“能放的地方很少”。这两样东西一直在顶撞：想留，又没处放。这个张力，在一个资源紧的家里，是每天都有的。

第二拍，形状改变。顶撞积累到一定程度，家里的“说话方式”变了形。人们发现，与其每次把这个顶撞重新吵一遍，不如把它压成一句口头禅。这句话成了一个固定的问法：先问用处，再问别的。

第三拍，回写。这个固定的问法，回头改写了下一代人的起点。孩子从小听这句话长大，到他自己当了父母，他开口，就是这一句。更要紧的是，他不但学会了说这句话，还学会了用它看自己：他不再问“我喜欢什么”，而是先问“这个喜欢有什么用”。

一个口头禅，就这样沉淀成了一片土：不再是一句话，而是一种事先就在那里的筛子。

口头禅沉淀得最牢的地方，是学校。

一句话在家里说，是一个母亲的口气；同样的话在学校里说，就有了制度的分量。“这个考不考？”几乎是每个学生都问过、每个老师都答过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和“这有什么用”是一回事，只是换了一个更具体的尺子：分数。

在这里，三拍转得特别快。张力是现成的：学生的时间有限，要学的东西很多。形状改变，也是现成的：于是出现了“考的”和“不考的”两个类别。回写更是清清楚楚：考的得到时间，不考的被挤掉；被挤掉的东西，下一年就更没有人记得它为什么存在。

一个学生在这里学到的，除了知识，还有一种分辨东西的方式：先看它考不考，再看它是什么。这种方式，他会带着走进厂房、办公室、家里的饭桌。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免得读者误会。站上第180号书写过孩子问“这有什么用”的场景，那是一个孩子在课堂上、在作业前，怀着疑问问出来的问题。我们这里说的不是那个。我们说的是问到最后，不再是问题：一个人听了一万遍，说了一万遍，它就不再是一个疑问，而是一个前提。你不是在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在用它来给所有东西排队。

这时候，我们再回头想想前一章：杜威的东西，是浇在了这样一片土上。

一片土里本来就长着“这有什么用”，这时候来了一位名声很大的外国先生，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思想要在实践里检验，观念是行动的工具。这几句话落在这片土上，不是种下，而是浇水。它没有让这个家里的口头禅出生，但它给了这句口头禅一件体面的外衣：原来“有用”不只是穷人的算计，而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来自大学讲堂的态度。

所以，实用主义和中国的“这有什么用”，是一种互相加固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实用主义造出了这句口头禅，而是这句口头禅因为实用主义，更站得住脚了。

◆ 21.3　筛子的两面

“这有什么用”既然是一把筛子，我们就该公平地看看它筛住了什么，又漏掉了什么。

它筛住的，是真实的东西。一个家，钱就那么多，空间就那么大，每一样东西都要挣自己的位置；一个厂，订单就那么多，工位就那么多。筛子替人挡掉了无数的消耗：不该买的没买，不该学的没学，不该熬的夜没熬。很多人靠着这把筛子，才在艰难的年头里把日子过稳了。不理解这一层，就没有资格谈后面的话。

它漏掉的，也是真实的东西。筛子是现在时的，它只认得现在能认出的用处。而世上有一类东西，在它刚露头的时候，看起来是没有用的。

回想一下第1章里小罗耳朵里的“咔”。那一声“咔”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有什么用？在那一天之前，谁能说得出？它是一个习惯的雏形，一个说不清的感觉，用筛子一筛，大概率是漏出去的。如果谭师傅是一个对“有用”要求极严的人，每天问小罗：“你听这个有什么用？”小罗大概会比现在晚很多年才听出那声“咔”，甚至听不出来。

这就是筛子的第二个特点：它只能筛已经长成的，筛不了正在长的。

再说一个更日常的例子（构想的）。高铁站里有一位年轻的保洁员，每天推着车来回走。活干完的间隙，他喜欢站在大厅边上看人：看哪一家人的孩子坐不住，看哪个老人拎着东西东张西望，看谁的脚步突然慢下来。没有人叫他这样看，也没有任何用处，岗位说明上没有这一条。可是三年以后，站里谁家孩子走丢了，往往是他第一个发现；站长遇到拿不准的事，也会顺口问他一句。那一堆看似无用的“看人”，后来成了他最大的本事。

问题是：如果当初他的班组长看见他站着发呆，问了一句“你看这个有什么用”，会怎样？他可能不好意思地笑笑，从此不再看了。

这不是说筛子是坏的。筛子在保护这个人今天的饭碗，这一点是真的。可是，**一把筛子只要是唯一的筛子，它挡住的就不只是废物，还有那些尚未成形的、将来可能很有用的东西。**

在我们的口径里，这叫做：有用的东西，大多是从看起来没用的地方“介”出来的；而“介”出来的那个时刻，正是最不经筛的时刻。这个话题，我们要到卷八才正式讲，现在只是先在这里埋一个记号。

◆ 21.4　一句话里的三条律

口头禅还有一个特点，与全书的主线直接相关。

同样一句“这有什么用”，在不同人的嘴里，说的其实是不同的事。

母亲说这句话，多半是在说：我怕你日子过不好。她把口琴留在家里，并不是真的觉得口琴一文不值，而是她的心里，有一个很具体的担心：外面不容易，包里的东西，每一样都应该让你更好过一点。这是幸福律在说话：过得下去，过得安稳。

老板说这句话，多半是在说：你得出活。他看启事、看人，问的是你能不能造出东西：焊出一条缝，理出一批货，赶出一单活。这是创造律在说话：拿出一个原来没有的结果来。

年轻人对自己说这句话，多半是在说：我有没有路可选？他站在那面墙前，读那些启事，心里问的是：我把自己放进这里，还出得来吗？一个选项会不会堵死另一些选项？这是自由律在说话：别让我失去了别的路。

三条律，三种口气，三个不同的人，却在说同一句话。

这件事非常关键。我们在前几章里，看到美国的三个哲学家，各自把路统一在一条律上：一个统一在创造，一个统一在幸福，一个统一在自由，于是出现了三种分家的倾向。而在中国这片土里，是另一幅画面：三条律不是分家，而是共用一个口头禅。一句话，同时装着三种意思，大家各取所需，所以听上去是统一的。

这样的统一有它的好处：它让一个社会在没有商量的时候，也能互相听懂。母亲、老板、年轻人，虽然各想各的，可是一说“有用”，三个人都知道在说什么。

可它的代价是：三条律的区别被盖住了。母亲怕你受苦，老板要你出活，你自己想要路，这三件事，其实常常是互相顶撞的。母亲说“有用的才带”，你想带的恰恰是会让你多一条路的东西；老板说“有用的才留”，你想学的恰恰是慢慢才有用的东西。因为用了同一句话，顶撞就被说成了“你不懂事”，没有人去问：我们说的“有用”，是不是一回事？

回到第4章那个网吧的情景，三个人用三种方言，却靠同一局游戏沟通。这里正好倒过来：三个人说同一句话，却在说三件事。

◆ 21.5 “有用的人”：当尺子量到人身上

口头禅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变化：它从量“东西”，慢慢变成了量“人”。

你问一个人：“这口琴有什么用？”这是问东西。可是在同一个口气里，早晚会出现另一句：“他这个人，有什么用？”或者倒过来：一个人受挫以后，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真是没用。”

这两句话，我们都很熟。招工启事里“只要有用的人”（构想的措辞，但你多半在别处听到过相似的），把这个变化写得最干脆：用处，不再是一样东西的属性，而成了一个人的身份。

这里的发生，同样可以用三拍来看。

第一拍，张力。一边是“人人都想被需要”，一边是“位置有限”。位置少，人多，每个人都在竞争被选中的那一个。

第二拍，形状改变。在这种竞争里，被选中的理由必须说得出来：我会这个，我能做那个，我可以马上上手。说不出来的部分，很难被看见。于是人们开始用“用处”来介绍自己，也用“用处”来判断别人。久而久之，“一个人是谁”，被缩成了“一个人能做什么”。

第三拍，回写。这个缩小了的“我”，回头写进了下一次的起点。一个孩子在家里听到的评语，不再是“你喜欢什么”，而是“你将来能干什么”；一个失业的人，在家里最难受的，常常不是没有收入，而是在别人和自己的眼里，忽然变成了“没用的人”。

要小心的是，这里说的不是“功利”二字能概括的。一个母亲对孩子说“你要有用”，很多时候是最深的爱：她知道这个世界对“没用的人”有多不留情，所以她要孩子先站稳。这份爱，是真的。

可是一种爱，一旦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就会漏掉其余的。**当“有用”成了一个人的身份，被排在外面的，不只是一些东西，还有一个人的另一部分——那部分暂时说不出用处、却构成了他整个人的东西。**

那个年轻人背包上的手工编结，就是这样一部分。它不在启事里，不在简历里，不在任何一个“有用”的名单上。可是你要是问他，他会说，那是他妹妹编的。这一句话，没有任何用处，可是他整个人，几乎都在这句话里。

◆ 21.6　两种“有用”，两种来历

接下来这一节，要小心。

把美国的“有用”和中国的“有用”摆在一起，很容易滑向一种说法：美国人务实，中国人也务实；或者，一边的务实是开放的，另一边是功利的。这些说法都不是我们的。站上第291号书在附录里已经明确拒绝了那种“文化本质”的论断，我们完全同意。

我们要做的，是看这两种“有用”各自是怎样长出来的。因为来历不同，味道就不同。

美国的“有用”，从缝合里来。

卷三会细讲：美国那片土，是教会、边疆、移民、工厂这些来源不同的东西缝在一起的。这些东西各自有各自的“该”：教会说该怎样，乡村说该怎样，新来的移民说该怎样。它们互相不服。

在这样一片土上，“有用”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它是少数几个不必先让别人改信就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祖宗，我们都不让对方改信，但是，这座桥修得结实不结实，我们都看得见。所以，“有用”成了缝合处的针脚。

它的特征是：先没有共同的“为了谁”，所以只能共同遵守“怎样走”。受益者是不统一的，路是统一的。

中国的“有用”，从家和国里来。

另一片土的历史，是另一个样子。把时间拉得很长看，一个家，是一个共同承担的单位：一块地，一口灶，一屋子老小。田里的收成要养活一整个家族，灾年来了，是一整个家一起扛。在这样的单位里，每一样东西都要问：“对这个家有什么用？”这里的“用”，有一个早就在那里的受益者：家。

近代以后，这个受益者又被放大了一层：从“家”放大到“国”。上一章讲过，1840年以后的焦虑，给每一个人的肩上都放了一个更大的单位。于是“这有什么用”，在很多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像是“对大局有什么用”。

它的特征正好和美国的相反：先有了共同的“为了谁”，所以不太需要去商量“怎样走”。受益者是统一的（家、国），路反而可以是多样的，甚至是各显神通的。

用我们的话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统一方式：

在美国，土是缝合的，所以路被统一了，向是多元的。

在中国，土里压着一个共同的家国，所以向被统一了，路是灵活的。

还有一层来历，藏在“用”这个字本身。

“用”在中国的思想里，从来不是一个新字。很早就有“体”和“用”这一对词，体是根本，用是作用。到了晚清，面对西方的冲击，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出自张之洞的《劝学篇》）。这句话的意思，是把外来的东西安放在“用”的位置上：技术、器物、办法，可以学；根本的东西，守住。

这个安排，在杜威到来之前，已经在这片土里铺好了。它给“用”划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位置：用，是可以从别处借的；体，是要守住的。于是，当杜威的东西到来，它自然被放进了“用”的格子——方法，可以借；至于它背后的“体”（生长是目的，自由是根），则不太有人问。

这个格子，使“用”在这里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它既是尺子，又是通行证。凡是能被放进“用”的格子里的东西，就可以放心地进来；放不进去的，就得小心。

这又是土在起作用：不是杜威的哲学选择了“方法”，而是这片土里本来就有一个格子，叫“用”，等着装方法。

这样看，杜威的东西落在中国，就好理解了。杜威的方法——“路”——被胡适他们很顺利地接了过来，因为这片土本来就乐意在“路”上灵活；可杜威的“向”——生长本身是目的——被改成了“为强”，因为这片土里，“向”早就有主了。

如果把这一节的话换成三方程的写法，意思会更清楚。三方程说，每一维都由另外两维一起生成：S=F(D,E)，D=G(S,E)，E=H(S,D)。拿“有用”来说，这里最要紧的是中间那一条：**路怎么走（D），是由已经显露出来的做法（S）和脚下的土（E）一起生成的**。

在美国，土是缝合的，没有现成的“为了谁”，于是路这一维必须自己站稳，成为大家共守的东西；在中国，土里本来就压着家和国，于是路这一维不必自己站稳，可以随土灵活，而“向”反倒成了被土预先定好的东西。两个地方的“路”和“向”，不是各自的选择，是同一条方程在两片不同的土上解出来的两个不同的解。

这也提醒我们，不要把任何一方的做法说成“更高明”。解不同，是因为土不同。要改变解，不能只劝人换一种想法，要看土里的哪一层在起作用，哪一层已经松动。一个家变小了，一座城变大了，一份工作不再需要守三十年，这些都是土在变。土一变，同一句“有用”的意思就会跟着变。

两种统一方式，各有各的脆弱处。

在美国那种土里，向是多元的，路是统一的，所以最怕的是路变窄：所有人都只会用同一把尺子，别的办法没有人会了。这是后面几卷要细看的东西。

在中国这种土里，向是统一的，路是灵活的，所以最怕的是向松动：一旦“为了谁”变得不再那么清楚，比如一个家变小了，一个国家的处境变了，一个人忽然不知道自己是为了谁在“有用”，那把尺子还握在手里，量出来的东西却失了准。一个年轻人干了一整年的活，攒了钱，月底忽然问自己：我这么有用，到底是替谁有用？这个问题，在一套“向”已经统一好的土里，是没有现成答案的。

这两种脆弱，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两种不同的缺口。认清缺口在哪里，是下一步的事。

读者可能会问：你们说得这么肯定，这难道不是在说一种“国民性”吗？

不是。区别在这里：民族性的说法，是说某一群人“生来如此”，像一件抹不掉的底色。我们的说法是，这是一块土怎样一层层长成的故事——小农的灾荒与互助，家族的合并资源，科举把读书和出路牵在一起，近代的救亡把家国的单位放大。每一层都有来历，每一层也都可能被改写。证据就在眼前：同样是这一片土上的人，换了一种生计，有了更多的余裕，那句“这有什么用”的口气就会松动；同样的一句话，换到一个孩子口中，意思又不一样了。土变，话就变。如果它是“天生”的，就不会变。

所以我们只谈E的发生，不谈谁的性格。这一点，后面每一章都会守住。

◆ 21.7　换一种问法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有一种冲动：既然“这有什么用”是一片土，那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大家，别再问这句话了？

不是的。上一节已经说过，这把筛子替人挡掉了许多真实的消耗，不能轻易扔。我们想做的，不是把这句话换掉，而是在它旁边，再放一句话。

回到那位母亲和那把口琴。设想一个不同的结局（这是构想的）。

母亲翻到那把口琴，照例要说“带这个干啥”。可是儿子抢在前面，说了一句：“妈，这是爸给我买的。”

母亲愣了一下。她想起来了：那是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爸去镇上办事，回来时揣在怀里，说是路过一个小摊，看见了，就买了。那天晚上，爸坐在门口，听儿子一首曲子也吹不成调，笑了很久。

母亲没有再说“这有什么用”。她把口琴拿起来，看了看，擦了擦，放回包里。

这里发生了一件小事：问题换了。从“这有什么用”，换成了“这是从哪来的”。一问“从哪来的”，口琴就不再是一件孤零零的东西，它背后有一个父亲、一个晚上、一阵笑声。用处没有变：它依然不能当饭吃。可是它的分量变了，因为它有了来历。

这两种问法，不是谁替代谁。“有什么用”问的是往前：它能带来什么？“从哪来”问的是往后：它是怎样走到这里的？一个东西既有往前的用处，又有往后的来历，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前面说的那面招工墙，只问了一半。

要紧的是，往后问的这一半，不会自己冒出来。它需要有人在某个时候，停一下，问出来。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听到前一半的问法，他自己看待自己的时候，也只会问前一半：我有什么用？而他的来历——妹妹编的结，父亲买的口琴，老家的灶台——就被当成“没用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留在了家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只是个人的口味，它关系到一整片土怎样长。后面的几卷，会反复回到“来历”这个词。它的正式名字，叫“同一性谱系”。现在，你只要记住那把口琴。

◆ 21.8　站里的那一个钟头

回到候车厅。

我们讲了这么久“有用”，现在可以反过来看一件事：这座最讲究效率的建筑，里面有一个最没有用的地方。

候车厅。

想想看：一座高铁站，为什么需要一个大厅，让几百人坐着等？从纯粹“有用”的角度看，等待是浪费。最完美的设计，应该是人刚好踩点进站，刚好上车，没有一分钟的闲置。可是没有一个车站这样建。因为列车会晚点，人会迟

到，检票会排队，换乘会赶不上。候车厅是为那些“可能出的岔子”留的冗余——一块多出来的时间和空间。

这块冗余看上去没有用，可是整个系统离了它就运转不了。如果把候车厅压到只够站着的宽度，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没有开水，一旦晚点，整座站就乱了。

好，现在看看这个大厅里的人，他们在这“无用的钟头”里干什么。

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打盹，有人给陌生人让座，有人在找孩子，一个老人和邻座的聊起了自己的老家。刚才那个看招工信息的年轻人，把手机放下，看着一个小孩子在地上玩一只会翻跟头的塑料青蛙。他的脸上有一种松下来的表情。

我们不能说这一个钟头“出产”了什么——它不是为了出产什么。可是，你想想，有多少事，是在这样的钟头里发生的？一次搭话，一个念头，一个忽然想通的主意，一段后来成了朋友的缘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能写进招工启事。

这就是本章的最后一个观察：**“有用”在这片土里，占了几乎所有的墙面；可是系统运转得好的地方，恰恰都留着一块“没有用”的冗余——只是我们没有给它一个名字，也没有人认为那是它的功劳。**

也别把候车厅想得太浪漫。里面的人并不是在“享受无用”：多数人在焦虑，怕误了车，怕赶不上换乘，怕孩子哭闹。可恰恰是这种带着焦虑的闲，最像我们日常的样子：我们很少拥有真正放松的无用，更多的是被夹在两件“有用的事”之间的一小段空白。这段空白是被动留下来的，没有人设计它，也没有人为它负责。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容易被下一轮“优化”一笔勾销。

还有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一套只算“用”的账本里，这块冗余永远是最先被划掉的。大厅的座位少一排，省了地，省了钱；等待的时间缩短几分钟，提高了准点率的数字。每一笔账都算得对，每一次划掉都有理由。直到某一天，大

面积晚点，大厅里挤满了无处可坐的人，大家才发现：原来那一排排看上去“没用”的座位，是整个系统里最耐用的一个部件。

这块冗余，是下一章的主角。因为中国的土里，其实不只是“这有什么用”。几千年前，有一个人，站在一棵没用的大树底下，说过另一种话。

◆ 21.9　对一对账：这一卷在站上几本书的肩上多走了哪一步

写到这里，应当把账对清楚。本卷借用了站上的几本书，每一处都只是引用，没有重述；每一处也都想说明，往前多走了哪一步。

站上第235号书说杜威“靠的是书桌长”，又说胡适“给了一个方法”。本卷接着问：方法给出去以后，是哪一条律被压成了方法？答案是自由律；而且压成方法之后，那个“可以暂时不知道”的许可被挤掉了。这是往前的一步。

站上第180号书把杜威的尺子读成“只有一把，量自由”，又写过孩子问“这有什么用”。本卷接着问：当尺子到了中国，量的还是自由吗？答案是：它被换成了另一个读数——强；而那句“有什么用”，在这里不是一个孩子的疑问，而是土里的前提。这是往前的一步。

站上第170号书说杜威让学习长出来，却“望见被挪到终点”。本卷接着问：这个终点在中国是被谁挪到的？答案是：不是杜威，也不是他的学生，是一片压着家国的土，在一间间教室、一场场讲演里，一点一点把终点挪了过去。这是往前的一步。

站上第202号书说詹姆斯“暗里选了幸福”。放在中国，同样有一个“暗里选”，只是选的不是哪一条律，而是哪一个受益者：家，国。律是后来才分配的。

对完账，我们可以明白本卷在全书里的位置：卷一到卷五，讲的是“有用”在美国怎样被统一，又怎样一路分裂成教育、健康、事业的碎片；本卷要说的是，在另一片土里，同一个词，走的是另一条发生的路，所以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这一点，不能拿“哪边更好”来量。

◆ 21.10　小结：口头禅是土，土里还有别的

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这有什么用”在中国，不是一句哲学，是一片土：它从家和国里长出来，先有了共同的受益者，所以向被统一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没有造出这片土，只是给它浇了水、披了一件现代的外衣。

这一章留下三样东西：

一，同一个词，两种来历。美国的“有用”是缝合处的针脚，中国的“有用”是家国的一把尺子。我们说的是土，不是人。

二，口头禅会沉淀。一句话被说了一万遍，就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前提；它按三拍的方式，从一个家，传到下一个家。

三，系统里总藏着一块“无用”。候车厅就是。没有它，系统自己也跑不动。

那么，这片土里，除了“这有什么用”，还有什么？它是不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另一种声音？下一章，我们去集市上，看一个老人编的一只竹鸟。

◆

22

第22章

一只没用的竹鸟：实用理性与无用之用

◆ 22.1　集市上的一只竹鸟

下面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不过在乡镇的集市上，这样的人并不少见。

逢五逢十是赶集的日子。镇东头的老街从清早就挤满了人：卖鸡苗的纸箱里叽叽喳喳，卖咸菜的坛子敞着口，修鞋的、配钥匙的、磨剪子的，各占一小块地。

街尾有个老人，姓符，七十出头，摆一个竹器摊。摊上是他一年四季编的东西：淘米的竹箩，晒菜的簸箕，装鸡蛋的小篮，还有几顶斗笠。价钱是老价钱，篮子八块，簸箕十五块，斗笠二十。买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塑料筐又轻又便宜，五块钱一个，坏了再买一个，谁还会为一只筐专门走一趟竹器摊。老符自己心里有数：编一只篮子，花去半个上午，卖八块钱。

不过摊子最里头的角落，常年蹲着一只鸟。

那是一只竹篾编的小鸟，巴掌大，尾巴翘着，脖子微微往后仰，像是刚要叫出声。它没有标价，也不是为卖才编的。每天的活干完，剩下些竹篾头，老符就坐在小马扎上，不紧不慢地往那只鸟身上添一道，或者拆掉重来一道。这只鸟他编了不知多少只，编好的，有的送了人，有的被孩子拿走，摊上永远留着一只在编的。

老符的手艺，是年轻时跟邻村一位老师傅学的。竹子要在冬天砍，那时候竹子里的水分少，不容易蛀；砍回来要晾，要剖，剖成篾，粗篾打底，细篾收边，青皮留着编面，黄篾编里子。哪一步省了，篮子用三个月就开裂。这些活，没有一样是书上学来的，都是手和竹子打了几十年交道，打出来的。竹子的脾气，和他的手之间，早就谁也离不开谁：同一根竹子，换一个人来剖，剖出来的篾就不是这样的篾。

可这套手艺的出路，却一年窄过一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没有一个愿意接。他自己也说，这行当，到他这辈就差不多了。

那天，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路过，孩子蹲下来，指着鸟不肯走。

“这个多少钱？”

“不卖，”老符说，“你喜欢就拿去。”

年轻妈妈有点不好意思，掏出十块钱买了一只竹箩，算是还礼。走出几步，她又回头问了一句，问得很随意，是集市上每个人每天都在问的那种问法：

“师傅，这个鸟……有什么用呢？”

老符笑了笑：“没什么用。”

隔壁卖菜的大嫂听见了，插嘴：“符师傅，你要有这个工夫，多编两只箩，一个月也能多卖百来块。”

老符没有接话。

这一幕里有三个人，说了三种话。孩子的意思是“我要它”，这不是用处，是别的什么。妈妈的话是“有什么用”，大嫂的话是“那还不如去做有用的”。后两句话一个客气，一个直爽，背后是同一把尺子：一件东西，要有用，才值得花工夫。

这把尺子并不坏。老符自己就是靠它活了一辈子：竹箩要沥得出水，簸箕要簸得出糠，斗笠要挡得住雨。手艺人不讲“有用”，手艺就不成手艺。

可有一件事，老符自己也答不上来。

有一年秋天，他编一只特别难收口的篮子，那一回收得出奇地顺，手指像是自己知道往哪儿走。他后来想：是不是编鸟编出来的？编鸟的时候，脖子那一道要把篾弯到很小的弧度，又不能折，不能断，手上要学会“到哪儿为止”。这个劲，会不会悄悄带进了篮子？

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不对。编鸟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在练手”。他要是想着练手，大概反而编不好那只鸟——手上一有了“要练出点什么”的念头，劲就紧了。鸟之所以是那只鸟，恰恰因为编它的时候，他没有为什么。

不妨看一看，那只鸟是怎样一层层出来的。

他的手指每添一道篾，鸟身上就多一个小小的差别：脖子又仰了一点，翅膀又收了一点，尾巴的弧度又紧了一点。这些差别一个接一个，排成一条路，鸟的样子就沿着这条路，一层一层地显出来。中途停下来看，看到的是“半只鸟”，可那不是一只没编完的鸟，是这条路上的一个截面。而这一切，又是和那一捆竹篾、那双干了一辈子活的手、街尾那个不被人打扰的角落缠在一起的：换一个人，换一把竹子，换一个吵闹的位置，出来的就不是这一只。鸟的样子、手的动作、竹子的脾气，是同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这就让人为难了。

如果我们说：“看，无用的鸟，最后帮了有用的篮子。”这话好像替鸟说了句公道话，可是仔细听，是在替鸟补办一张用处的证明。鸟还是得有用，才算有了存在的理由，只是这个用处绕了个弯，在将来。第1章里皮尔斯的“玩味”，

就是这样被安放的：混沌被允许存在，因为它将来会长出东西。鸟被这样安放了，它也就不再是鸟了，变成了练手的靶子。

反过来，如果我们说：“不，鸟就是没用，就让它没用着。”那个卖菜大嫂的账也算得没错：一个月百来块，是实打实的。一个靠手艺糊口的老人，凭什么要把有限的工夫花在一只不卖钱的鸟上？

所以老符的角落里，其实蹲着一个很难的问题：在一个满街都问“有什么用”的地方，一件说不出用处的东西，凭什么有它的位置？既不能靠“将来有用”来保它，又不能靠“随它去吧”来放它。

这个问题，不是老符一个人的。它是前面几章所说的那片“有用”之土里，一个很深的坑。本章先去看这片土是怎样一层层铺成的，再去看土里原来是不是早就有一只鸟蹲着，最后问：它是怎样被一点点挤到角落里的。

判词：说不出用处的东西，用“将来有用”去保它，保住的是用处，保不住它。

◆ 22.2　两层土：耕与读

要看懂集市上那把尺子，先得看一看集市本身。

赶集的人都知道，集上的东西，有一种账是算得清的，另一种账是算不清的。

算得清的，是秤。买菜的人要看秤，卖菜的人也盯着秤，一斤差二两，当场就要说。可算不清的账，往往也在同一个摊子上发生。买菜的老太太称完了葱，伸手再抓一把，说一句“搭一把”，卖菜的并不拦，因为明天她还来。这一把葱不在价钱里，却在整个买卖里：它是多年老主顾、一块地方的人、“明天还要见

面”这几样东西缠在一起的结果。你拿掉这一把葱，下回老太太可能就换一个摊子。

可见集市上的“实用”，并不是一把冷冰冰的秤。里面有人情，有往后的日子，有“这一回吃点亏，下一回有的赚”的算计。这种算计，不是狭窄的。它宽得很，宽到把“讲交情”也算进了账里。

学者们给这种东西起过名字。哲学家李泽厚在谈孔子的文章里，较早用“实践理性”一词谈这件事，后来改称“实用理性”，以免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混淆。大意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不太喜欢在抽象的玄想里久留，它更愿意问“怎么办”“有没有效”“行得通吗”，把经验和实效看得很重；这种看重又不是随便的功利，而是一种讲道理、讲历史经验的合理性。他把这样的特点，追溯到很古老的巫史传统，追溯到农业生活的日常经验里去。

这个说法很有影响，也引起过许多讨论。本书对它的态度，要说清楚，因为它很容易被读歪。

很容易被读成这样：中国人天生是务实的民族，所以才有“有用”这个口头禅，所以实用主义一到这里就如鱼得水。这种读法，本书不取。它把“实用理性”当成一种藏在人身上、本来就有的本质，和老渔村的“海有脾气”是一个动作：把一团有来历的土，收成一个没有来历的样子。导论里说过，这样的统一，本身就是一种S维度的形而上学。民族性，是个说得太快的词。

本书的做法是倒过来：不问“中国人是什么”，问“这片土是怎样一层层铺成的，铺成以后又长出了什么习惯”。从这个问法看，“实用理性”这个词，不是原因，是结果的名字——它给一片土里长出来的一大堆习惯起了一个总称。要看懂它，就得看土。

这片土，大致可以看成两层。

最底下一层，是生计。这片土上的大多数人，几千年来靠种地、靠手艺、靠小买卖过日子。靠天吃饭，意味着一年的收成容错很低：一场旱，一场涝，一次虫灾，一户人家的积蓄就见底。手上的每一分力气、每一粒种子，都得花在刀刃上。老符这样的手艺人也是一样，竹子要挑，工夫要算，一样东西做出来，得有人要。这样的日子里，“有什么用”不是一种理论，是一天三顿饭的算术。

压在上面的一层，是功名。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老话，叫“耕读传家”。耕是底下一层，读是上面一层。读书靠什么？科举。从隋唐一路到清末，科举考试在漫长的年月里，是普通人家改变处境最主要的一架梯子。一个孩子读书读出名堂，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往往是一个家、一个宗族的事：全族凑钱供他，他考中了，全族沾光。《论语》里有一句“学而优则仕”，子夏说的，后来越传越像是一条通行的路。

这两层土叠在一起，作用是怎样的?

下层让人不敢有闲：日子太薄，余地太小。上层让人读书也要有用：读书不是为了读书，是为了上去。两层的合力，把一个朴素的问题——“这个有什么用”——长年累月地写进了人的手里、嘴里、家法里。老人对孩子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旧时劝学的话里常有这一句；街坊对读不出书的人说，“总得学门手艺，饿不死”。两句话听上去不同，其实都在说：活着，要靠有用的本事。

等到这样的说法被说了几百年，它就不再是一个主张了，它成了空气。小孩没出生，他的嘴里已经有了这句话。这正是本书一路在讲的“回写”：土长出了习惯，习惯写成了话，话又沉回土里，土就更牢。

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讲究有用”，本书的回答不是“因为中国人务实”，而是：因为这片土有这两层，这两层又被几百年的话反复压实。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本性，是一块土的来历。

这样看，“实用理性”这个词也就有了它该有的位置。它是一个描述，说的是这片土长出的一大堆习惯的样子；它不是一个解释，不能拿它去回答“为什么”。拿一个描述去当解释，等于说“鸟会飞，因为它有飞行的本性”。

还有一点，要多说一句。这块土里的“有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底下那层生计的“有用”，是饭碗的有用；上面那层功名的“有用”，是出人头地的有用。还有一层，在两层之间，是人情的“有用”——刚才那一把葱。三种“有用”，一直缠在一起，谁也没真的赢过谁。

这个事实，和前面几章讲的美国那条线，是有一点对不上的。实用主义在美国，是三位哲学家各自把三条意义律中的一条统一成了“路”。可在这片土上，“有用”早早就是一团混着的东西，它从没有被统一到一个干净的方向上去。这一点，后面几章还会回来。现在只需记住：集市上的那把尺子，不是一把，是几把绞在一起的绳子。

绞在一起的绳子，有一个好处：绳子之间会有空隙。那只竹鸟，要找到它的位置，就得去这些空隙里找。

判词：实用理性不是一个民族的本性，是耕与读两层土反复回写出来的习惯的总名。

◆ 22.3　大樗、栎社树和一只空碗

现在去问：这片土里，原来有没有那只鸟的位置？

有。而且有得很早，很认真。《庄子》里有几处，几乎像是专门为老符的角落写的。

先看《逍遥游》里的大樗。庄子的朋友惠子有一天发牢骚，说他家有一棵大树，叫樗。树干臃肿，疙里疙瘩，墨线弹上去弹不直；树枝弯弯曲曲，圆规角尺都用不上。它长在路边，木匠走过，看都不看。惠子说，你讲的那些道理，就像这棵树，“大而无用”，大家都要躲开它。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市口吻。大，是大；可有什么用呢？

庄子的回答很有意思。他没有替树辩护说它有用，也没有安慰惠子说“大器晚成”。他说：你为什么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的空旷之地，广阔无边的野地里，你自己在旁边走走，在树下躺一躺，睡一觉呢？斧头砍不到它，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害它——“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没有什么可用的地方，哪里会有什么苦恼呢？

请注意这句话把问题挪了地方。惠子问的是：这棵树对我们有什么用？庄子问的是：这棵树和你，可以是什么关系？一个躺在树下的人，不是在“使用”这棵树。他和树之间，没有一个“用”字夹在中间。

庄子在同一章里还讲了一对反例，让这个意思更清楚。一只野猫，身手极好，窜高伏低，捉老鼠、捉小虫样样在行，可最后踩中了机关，死在网里。另一头是一头大牛，大得像天边垂下来的云，却连一只老鼠也捉不住。庄子的意思大约是：有用的本事，不一定保你平安；没有那样的本事，也未必就是废物。

再看《人间世》里的栎社树。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石的木匠，到了齐国，在一处土地庙旁边看见一棵巨大的栎树，大得能遮住几千头牛，树干要一百个人合抱，高到山顶上才长枝。围观的人像赶集一样多，木匠却看都不看，径直走了。徒弟追上去问：我从没见过这样好的木料，师傅您为什么不看一眼？

师傅说，算了吧，别提了。那是没用的散木。拿它做船，会沉；做棺材，很快烂；做器具，很快坏；做门窗，会流汁；做柱子，会生虫。是个什么也做不成的木头，所以才能活到这么老。

夜里，栎树托梦给木匠，把话说回来了：你要拿我去比什么？比那些有用的“文木”吗？柤、梨、橘、柚这些结果子的树，果子一熟，就被人打下来、扯下来，大枝被折，小枝被扯。它们是因为自己有“能耐”，才苦了一辈子，活不到老，半路就夭折了，是自己把自己送到世俗的打击里的。万物都是这样。我求“无所可用”已经很久了，差点被砍死好几回，到今天才求到，这对我，才是“大用”。

同一篇的末尾，还有一句更直白的话。它说，山里的树木，是自己招来砍伐的；油脂能点灯，所以自己被煎熬；桂树可以吃，所以被砍；漆树有用，所以被割。然后是那句后来被人引了无数遍的话：“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句话值得一读再读，因为它说的不是“有用不好”。它说的是一种看不见：人都看得见有用的那种用，看不见无用的那种用。看不见，不等于没有。老符的那只鸟，在摊子上不起眼，也是这个道理：它的用，不在账上，也不在鸟身上，在一个老人的手、一段安静的时间和一个角落之间。

这个故事里有一句话，要停下来想一想：那棵栎树，是不是在说，它自己有一个“用”，只不过这个用，不是别人派给它的用，而是它自己活下去的用？

是的。庄子在这里没有把“无用”说成“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是：用，是由谁来定的。木匠的尺子上写的是“能做什么器物”，所以栎树不合格；栎树自己的尺子上写的是“我能不能活到老”，所以它得了满分。同一棵树，一个看是废料，一个看是大寿。

还要看到，惠子那棵树被嫌弃的理由，是“不中绳墨”“不中规矩”。绳墨是木匠弹线用的墨线，规矩是画圆画方的工具。那是一把统一的尺子，全天下的木头都要拿它来量。这和本书前面几章讲的是同一个动作：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东西。只不过皮尔斯、詹姆斯、杜威手里的尺子，量的是创造、幸福、自由；木匠手里的尺子，量的是能不能做成器物。尺子换了，动作没换。庄子的大樗和栎社树，是被这样一把尺子量了，量不上去，却因此活下来的东西。

读到这里，容易有一种很舒服的误会：庄子是在劝人躺平，有用的人受累，没用的人享福。庄子自己很清楚这个误会，所以他在另一处专门把它堵上了。

这一处在《山木》里。说是庄子带着弟子在山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茂盛，伐木的人站在旁边，却不去砍它。问为什么，说，没有什么用。庄子对弟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才能终其天年。出了山，到了朋友家，朋友很高兴，叫仆人杀鹅招待客人。仆人问：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主人说，杀不会叫的。

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天山里的树，因为没用，活下来了；今天主人的鹅，因为没用，被杀了。先生您到底站哪一边？

庄子笑着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随即又补了一句，大意是：可这个位置，看上去像是对的，其实也不是，所以还是免不了拖累。

这段话非常诚实。它等于说：“无用”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躲灾的位置。树因为无用而活，鹅因为无用而死，同样的“无用”，在不同的地方，结果相反。所以，它不是一条可以直接照着走的路。它是一个提醒：当你被一把尺子量的时候，别忘了还有另一把。

还有一处，也许是最扎实的，在《外物》里。惠子对庄子说，你讲的话都没有用。庄子回答，大意是：先懂得什么是没用，才可以和你谈什么是有用。接着他打了一个很朴素的比方：天地很大，可人用得着的，只是脚下容得下一只脚的那一小块地；假如把脚四周的地，都一直挖到黄泉，你脚下站着的那一小块，还有用吗？惠子说，没有用了。庄子说，那么，无用的用处，也就很清楚了。

这个比方里没有玄学，只有一块立足之地和它四周的地。有用的那一小块，是靠着没被“用”的一大片才站得住的。把四周都“用”掉了，脚下就没地方站了。

这时候再去读《道德经》第十一章，意思就连起来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三十根辐条汇到一个轮毂上，正因为轮毂中间是空的，才有车的用处。接下来是同样的句式：把黏土捏成器皿，正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有器皿的用处；开凿门窗盖房子，正因为里面是空的，才有房子的用处。最后一句总结，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的东西，带来便利；没有的地方，才让它能用。

一只空碗，最能说明这件事。碗的“有”是那圈陶土，碗的“用”却在中间那块空处。你不会说空处是“没用”，也不会说陶土是“没用”，两样缺一样，碗就不是碗。

把这几处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轮廓。在这片土里，早就有人看见：一件东西的用，靠的是它周围、里面那些没被派上用场的空处。这些空处，不是故障，不是浪费，是“用”得以发生的条件。

用我们这本书的话说得朴素一点：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的“用”，不是靠把所有的地方都排满、都派上用场撑起来的；它要靠一些不被安排的地方。这些地方，在土里。拿掉它们，土就压平了。

不过，也别急着给庄子戴高帽。有两件事需要老实说。

第一，庄子的“无用之用”，还是用了一个“用”字。那棵栎树说，无用对它是“大用”。这就留下了一个口子：后人很容易把“无用之用”读成“绕远的有用”。无用，就是为了更大的用；闲着，就是为了更长久地干。这正是第22.1节里那个坑：鸟，一旦被说成“为了练手”，它就不是鸟了。这个口子，本书后面要用两卷的篇幅，一点一点去补。

第二，庄子讲这些，是在讲给会被尺子量的人听的。他看见的是一棵树在木匠面前的处境，是一个人在世道面前的处境。他讲了“无用”的好处，却没有讲清楚：那些不被安排的时间、不被派上用场的地方，自己里头在发生什么。树在野地里站着，树底下的人在睡觉，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在发生，可庄子没有往里看。他只告诉你它是安全的、自在的。至于里面，是一团什么，怎样变成别的东西，不是他要回答的问题。

这个“里头”，就是后面几卷要走进去的地方。现在只需先记下：这片土里，早就有一只鸟的位置，是一棵树、一只空碗、一块容足之地。它不是外来的。问题只是：它后来怎么了。

判词：用靠没被用的地方站得住——这句话，这片土里早就有人说过。

这句话，和本书后面要走的路，有一个衔接。我们一直说，一件事要长出来，需要三样东西一起走：它显出来的样子，一步接一步的差别，以及缠着它的那片土。老子的空碗，说的正是那片土里有一块没有被排进去的地方。一旦所有的地方都被排进去了——每一步都有目的，每一个样子都有用处，每一块土都有名分——那么，这件事就只能照着排好的路走，不会再长出排好的路以外的东西。这个意思，会在后面一卷里讲到最清楚。

◆ 22.4　无用的几个住处

在讲无用怎样被挤走之前，先看它原来住在哪里。因为如果它只住在庄子的书里，那么它被挤走，也不过是书的事。可它不是。它在这片土上，有过好几个真实的住处。

第一个住处，是茶馆。在不少地方，茶馆是人们一天里最没有用处的去处。一杯茶，一把竹椅，一坐半天。有人下棋，有人听书，有人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街上的人走过去。四川一带管这种闲谈叫“摆龙门阵”，天南地北，东拉西扯，谁也不为了说成什么事。它们不在账本里，却养着一个地方的气。

第二个住处，是节庆和庙会。一年里有那么几天，所有的“有用”都停下来：不下地，不开张，不算账。人们走亲戚，看戏，赶会，在那几天里“浪费”。这种“浪费”，是被土允许的，甚至是被土要求的。

第三个住处，是读书人的园子和画。中国的园林讲究留白，山水画讲究空处，一幅画里不是每一寸都要有东西。这些做法，和老子那只空碗，是同一个道理的另一副面孔。

第四个住处，出人意料，在孔子那里。我们常把孔子想成最讲“用世”的人，可他有两句话，常常被人忽略。一句是“君子不器”，出自《论语·为政》：君子不是一件器具。器具是为一种用处而造的，锅是煮的，刀是切的；孔子说的君子，不要被造成一件只管一种用的东西。另一句是“游于艺”，出自《论语·述而》：在六艺里“游”。“游”字用得好，它不是“练”，不是“学”，是在里面遛一遛。

这么一看，这片土上，原来是既有“耕与读”的紧，也有茶馆、庙会、留白和“游”的松。紧和松是搭配着的。紧的那一头，让人活下来；松的那一头，让人活得下去。

所以，不能说这片土天生是“有用”的，也不能说它天生是“无用”的。这两样东西，一开始就在一起，像一个人的一呼一吸。

后来的事情，是呼与吸的比例，慢慢变了。

◆ 22.5　无用是怎样被挤到墙角的

既然这片土里早就有无用的位置，为什么在集市上，它只剩一个蹲在角落的小鸟？

这不是因为后人变笨了，也不是因为谁忘了庄子。它是被一点一点挤过去的。土一共挤了四次。每一次，都是土在变，不是人心在变。

第一次挤压：余地太薄。

“无用之用”这样的话，要有人还能想到“留一块地不用”的时候，才听得进去。对于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户来说，“把树种在广莫之野，躺在树下睡觉”，是一句奢侈的话。一块地一年的收成，连交租带吃饭，恰好够，一个劳力，两只手，每一天都要排满。有余地的人，才能欣赏无用。这并不是说穷人不懂得欣赏，而是说，土薄到一定程度，“留一块不用的地”这种事，连想都不能想。

这层挤压，在老符这样的手艺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他能留下那一只鸟，是因为他七十多了，孩子都成了家，自己一个人，一天挣几十块够用；换成三十岁的竹匠，上有老下有小，那只鸟早就没地方放了。他甚至不是不喜欢，是连“喜欢”也要排队：先给孩子交学费，先还房贷的利息，先把这个月的货赶出来。喜欢排在最后一位，往往就排不到。

第二次挤压：一架梯子。

科举把读书这件事，几乎变成了唯一的一件事。从隋唐开始，一直到清末取消科举，漫长的年月里，普通人家上升的通道，窄而醒目：读书，考试，做官。通道一旦窄而醒目，所有的东西都会朝它靠拢。读书是为了考，学问是为了用，连琴棋书画，也成了“士”的体面。旧时流传过一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论它出自哪里，它说出了一个事实：别的出路，都被降了一格。

这一次的挤压很微妙。它挤的不是“无用”，是“别的有用”。手艺的有用、买卖的有用，都被排在读书的有用后面。有了这样一个高低，“有用”就成了一条单行线，上面挤满了人。无用的位置，在单行线两旁，只能是荒地。

第三次挤压：把庄子安放在“失意”的格子里。

这一次最有意思，因为它不是外面挤进来的，是这片土自己安排的。

读书人讲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孟子》里的话。得意的时候，去干一番事业；不得意的时候，退回来修身养性。庄子，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放在了后一种情形的格子里。民间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得意时儒，失意时道。”得意的时候学儒家，失意的时候读庄子。

乍一听，这是庄子的福分，读书人的失意有了安慰。可是仔细一想，这是把庄子的位置，从“土的一部分”挪成了“土的备胎”。无用不再是用得以发生的条件，它变成了有用失败之后的退路：考不中，就去写山水，做隐士；官场受了挫，就回家种菊花。庄子于是成了安慰失败者的书。

这样一来，“无用”在整个社会的口碑里，就变成了失败的别名。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无用，因为一无用，就像是认了输。老符那只鸟，在别人眼里，其实就带着一点“他老了，没人要他的篮子了，于是自己玩玩”的味道。他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个味道，所以每回有人问，他都说“没什么用”，而不说“我喜欢”。

第四次挤压：一个孩子，扛起许多人的账。

近几十年里，土又变了几回。1977年恢复高考，读书这条梯子重新亮了起来。八十年代起，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的常态，一对夫妻往往只有一个孩子，以前分摊在几个孩子身上的期待，现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九十年代末，高校开始扩招，念大学的人多了，竞争的台阶也跟着抬高了。再加上城镇化，房子、学区、户口，一件一件地系在一起。

于是，旧时那个“一族供一个”的账，换成了“两个家庭供一个”的账。一个孩子，要扛起两家三代的指望。这样的账，哪里还有给“无用”留位置的余地？

把四次挤压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结论：无用的位置，不是被“人们不再相信庄子”这样的观念变化挤掉的，是被土的变化挤掉的：薄的生计、窄的梯子、被改写的格子、集中的账。每一次，都有它真实的、不得不然的理由。没有一次，是谁存心要消灭无用。

因此，今天再想把“无用”请回来，光靠读读《庄子》是不够的，光靠喊一句“孩子要快乐、要闲一点”也不够。土不变，话再好听，也会被土吞掉。这一点，在下一章里，会用一个更具体的场面看到。

◆ 22.6　无用被摆上货架

故事到这里，似乎该收尾了：土挤薄了无用，我们要把无用请回来。可是，还有一种相反的危险，同样值得提前看一眼。

接着往下想：几年以后，老符的那只竹鸟，出了名。

这同样是一个构想，但并不难想。镇上修了新街，周末来了一批外地游客，旁边开起了一个“手作市集”。有人看见老符的鸟，拍了照，发到网上。再来的人，就专门走到街尾，问他：

“师傅，这个能不能多做一些？放在我们民宿里。”

“这个多少钱？六十八？可以，我们要二十只。”

还有一位在县城办培训班的年轻人找上门来，想请老符去开一门课，课名都起好了：《无用之用：周末手作营》，一人三百块，包材料。

老符一开始高兴。二十只鸟，六十八块一只，顶得上他编一个月的箩。他也忍不住想：这手艺总算有人认了。

可是做到第五只，他发觉不对劲了。

从前那只鸟，是每天剩下的竹篾头，坐着、不紧不慢地添一道，拆了重来，也没有谁催。现在要一天出四只，要一模一样，尾巴要翘到同一个角度，脖子要仰到同一个弧度——否则民宿老板要退货。他开始对着样子编，手上那种“到哪儿为止”的劲，不见了。

更微妙的是，从前人家问“这个有什么用”，他可以说“没什么用”，那个“没什么用”里带着一点自在。现在人家问：“这个能让我们的客人放松吗？”他得回答“能”。鸟还是那只鸟，可它有了用处：减压，治愈，打卡，氛围。

没有人欺负老符。游客是真心喜欢，老板是真心要付钱，培训班的年轻人也是真心觉得这是件好事。可是，这件事的结果，是无用有了价码。无用一旦被明码标价，它就站到了“过得好”这把尺子底下。它不再是“没有为什么”，它是“为了让人舒服”。

这并不是说老符不该收这笔钱。老人晚年有一点进项，是真实的好事，没有人有资格指责。这里要看的只是一个机制：原来被“有用”挤出去的东西，可以被换一张脸，重新请回来，请回来的时候，它已经带着一个用处。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一直小心，不愿意把“无用之用”讲成一个窍门。窍门，教给人一个怎样用“无用”来得到什么的办法；可无用一旦成了窍门，它又回到了“有用”这个大门里。

那么，真正的出路是什么？是不是干脆不要让无用被看见、被听说、被喜欢？当然不是。喜欢是真的，价格也是真的。问题不在被喜欢，在于无用的那一段，有没有被留下来。那只被卖出去的鸟，和那一个下午坐着添一道的时间，是两样东西。前者可以卖，后者不能卖——卖了，就不是后者了。

这个差别，在下面几章里会变得越来越要紧。现在先放在这里。

不过有一个小细节，值得补上。老符后来跟邻摊的人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卖出去的那几只，他再看一眼，都觉得“不是那只”。同样的竹子，同样的手，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了。因为那只在角落里的鸟，是在没有人等着要它的时候，一道一道长出来的；而订单上的鸟，是在有人等着要的时候编的。手没有变，变的是缠着手的那一整片东西：催货的电话、样品的尺寸、一天四只的数目。这些东西一进来，鸟的每一道篾，就都带上了别的意思。

◆ 22.7　小结：一只鸟和一块脚底的地

这一章走了一个小圈：从集市上一只没有用处的竹鸟出发，经过两层土（耕与读），到了庄子的大樗、栎社树和老子的空碗，最后回到无用被挤向墙角的四次挤压。

收成一句话：

这片土不缺“无用之用”的说法，缺的是让这个说法站得住的余地：用，靠没被用的地方站着，可土一层层变窄，就把那些地方挤没了。

回头看老符的角落，可以再说一遍这一章守住的两条线。第一条：无用不能靠“将来有用”来保，那样保住的是用处，鸟就变成了练手的靶子。第二条：无用也不能靠“明码标价”来保，那样保住的是价钱，下午就变成了订单。两条线之间，是一块窄窄的地方：那里有一只鸟，一个坐着添一道篾的下午，没有人问它有什么用，也没有人替它回答。

这块地方，这片土原本就有，也曾经被好好地留着。它能不能再被留住，要看接下来的几章，我们是不是能把它里面的东西，看得比“安全、自在”更清楚一些。

还留着一件没解决的事：当土里的各种“用”，像三根绳子一样同时拧在一个孩子身上，会是什么样子？下一章，我们到一间棋牌室的门口去站一会儿。

◆

23

第23章

三句话一起说：棋牌室门口的家长

◆ 23.1　楼下打牌，楼上补课

这又是一个构想的场景。镇上的人看了，大概会说：这不就是我们这儿吗。

镇子南头有一栋三层的老楼，一楼是一间棋牌室，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里面常年哗啦哗啦地响着麻将。如果你还记得导论里那座被拆掉的澡堂，像老马那样的老人，下午的日子有一部分就挪到了这样的地方。两块钱一杯茶，坐一下午，输赢不大，更多的是说话。

二楼和三楼不是棋牌室。房东把它们租了出去，分成几间小教室：一间是“数学思维班”，一间是“作文提升班”，周六还有一间英语启蒙班。孩子们从周六早上八点开始，一间一间地上。

于是，每个周六的上午，棋牌室门口就多了一群人。

他们是家长。有的坐在楼梯口的塑料凳上，有的靠着门框，有的干脆蹲在台阶上刷手机。楼下的麻将声从背后传出来，楼上隐约传来老师讲题的声音。他们夹在两种声音中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等孩子下课。

这天上午，凑在一起聊天的有三个人。

宋姐，四十出头，在镇上开着一间做衣服改样的小店，一个儿子，读四年级。老孟，在附近的厂里做班组长，女儿读六年级。还有小芹，年轻一些，前几年在外地打工，今年为了孩子回了镇上，女儿才上一年级。

话是从老孟起的头。

“现在不抓紧，将来怎么办？”老孟说得斩钉截铁，“你看那些考上好学校的，哪个不是小学就打的底子？我这辈子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我女儿不能再这样。人总得有点出息。”

宋姐点头：“是这个理。不过我也看得出来，逼得太狠也不行。我家这个，上周数学考砸了，回来一句话不说，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我跟他说，考不好没关系，妈不要你样样第一，你开心就好。”

“开心也得有个度。”老孟说。

“我知道，我知道，”宋姐说，“所以昨天我又跟他说，你自己想想，英语班还上不上？上，就好好上；不想上，妈也不勉强，你自己选。”

“那他怎么说？”小芹问。

“他想了半天，说，上吧。”宋姐叹了口气，“你说，这到底是他自己选的，还是被我逼出来的？我也说不清。”

小芹一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说：“我在外地打工那几年，最怕的就是孩子见不着。回来了，天天守在跟前，倒不知道该要她什么了。要她考第一吧，舍不得；不要吧，又怕她将来怪我。”

宋姐和老孟都没有接话。这句话没有答案，大家都听得懂。

这时，楼上下课的铃响了。孩子们稀稀拉拉地从楼梯上下来。宋姐的儿子小冉背着书包，走到门口。

“今天学得怎么样？有没有听懂？”宋姐头一个问的是这个。

“嗯。”

“饿不饿？想吃什么，妈带你去吃，吃你最爱的那家。”

小冉的眼睛亮了一下。

“下午还有英语。你要是实在不想去，就跟妈说，妈不逼你。”

小冉的眼睛又暗了下去。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过了一小会儿，小声说：

“……去吧。”

宋姐没有再说什么。她牵着儿子往街那头走，背影有点着急，又有点心软。老孟在后面看着，摇摇头，也去楼上接自己的女儿了。

这段对话，如果拿去给一位教育专家看，专家大概会指出一堆问题：不要施压，要尊重孩子，要给选择权，要关注情绪。每一条都对。可是这里面有一件事，用这样的角度是看不出来的：

宋姐在一刻钟之内，说了三句话，三句话互相有一点冲突，可她自己并不觉得冲突。她说“考不好没关系，开心就好”，两分钟之前，她和老孟一起点头，说“总得有点出息”；一分钟之后，她又对儿子说“你自己选”，而这个“选”的背后，明明有一个她期待的答案。

她不是在撒谎，也不是糊涂。她在认认真真地说三句真话。这三句真话，是三种不同的东西在她嘴里同时出声。

判词：这位母亲没有摇摆，她是被三层土同时写着。

有一点要提前说明。本书说“三层土”，说“三条律”，并不是要给宋姐、老孟这样的家长贴一个标签，更不是说镇上的家长“就是这样的”。下面的分析只是想弄清：一句话从哪里来，压在孩子身上时是什么样子。它既不拿去给家长打分，也不拿去评判哪一家教得好。

◆ 23.2　三句话，三层来历

这三句话，各自从哪里来？

第一句：“人总得有点出息。”

这是三句里最老的一句。上一章已经说过，它的根扎在两层土里：底下是生计的薄，上面是功名的窄。一个人要是没有本事，就要吃苦；要有本事，最稳当的路是读书；读书读出来，才算有“出息”。老孟说，他这辈子吃了没读书的亏，这是一个亲身的账，也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账。

“出息”这个词，在这里说的是将来能长出点东西来——有成绩，有本事，有立得住脚的位置。在本书的分法里，它站在“创造”那一边：要孩子往前长，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它的尺子是将来的读数：分数、名次、学校、工作。

第二句：“开心就好。”

这句话比第一句年轻得多。它是在上一辈、上上辈吃过苦以后，日子慢慢宽裕起来，才变得说得出口的。

这里有几样东西缠在一起。一样是亏欠：许多今天的家长，自己小时候读书苦、活干得多、想要的东西没有，当了父母，就不想让孩子再来一遍。一样是独生子女：一个孩子，是家里唯一的心头肉，舍不得他受委屈。还有一样，是反思：这些年，各种声音在说“不要把孩子逼坏了”，说抑郁、焦虑、厌学，家长们听得多了，心里自然有一根弦。

“开心”这个词，在这里是孩子现在过得好——舒服，笑得出来，不受苦。它站在“幸福”那一边。它的尺子是眼前的读数：脸上的表情，吃饭的胃口，回家的脚步。

第三句：“你自己选。”

这是三句里最新的一句，大致是近二三十年才进到日常话里的。它背后，是城镇生活里“选择”越来越多：学校可以选，班可以选，课外可以选，将来做什么也可以选。同时，还有一套关于“个性”“天性”“尊重孩子的想法”的说法，通过书、网络、公众号，一点点流进了家长的耳朵里。

“自己选”，说的是路要由孩子自己来定。它站在“自由”那一边。它的尺子是主体的读数：这是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把三句话排在一起，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它们不是在同一个时候说的，也不是在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的。第一句是几百年的土，第二句是几十年的土，第三句是近二三十年的土。三句话，三层土，三种年纪，现在都住在宋姐一个人的嘴里。

这不是宋姐的毛病，也不是镇上家长的毛病。它是这片土的历史，一层一层，铺到了今天。每一层铺下来的时候，前一层并没有消失。新来的话，不是把旧话换掉，而是叠在旧话上面。于是，一个当代的家长，要同时回答三个时代的问题：我要不要让孩子有出息？我要不要让他开心？我要不要让他自己做主？

在每一个时代里，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大概都是清楚的。可它们挤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人身上，就没有清楚的答案了。

更要紧的是，这三句话之间不是并排的，它们会互相收编。

看宋姐说的“开心就好”。她是在儿子数学考砸之后说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大约是：“这次没考好，你别难过，下次努力。”这个“开心”，其实站在“出息”的后面——孩子的开心，是为了让他有力气再去追分数。

再看“你自己选”。宋姐问儿子英语班上不上，她心里有一个答案：上。她的“选”，是在“上”和“不上”之间，给了一个不是真的两边平等的“选”。小冉能感觉到，所以他说“去吧”。他的选择，并不是“自由”，是“读出了妈

妈想要的答案，并且说出来”。这个“自己选”，反过来又变成了他的担子：你自己选的，就别抱怨。

回头再看“出息”。老孟说“人总得有点出息”，可他的真实心愿，大约也是希望女儿将来过得好——这是“幸福”。出息，在这个家庭里，也不过是幸福的一个保险。

三句话，各自收着另外两句。在不同的时候，谁站在最上面，谁说了算，由当下的场合决定：考试前，出息说了算；考砸后，开心说了算；做决定时，自己选说了算——可“自己选”，往往被另外两句话悄悄定了范围。

用本书前面几卷的话说，这就是三条意义律，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各自想当统一的那一条。美国的实用主义，是三位哲学家各自把路统一在一条律上；在这间棋牌室门口，是一个家长，三条律在她身上轮流想当统一者，谁也没有赢。

要注意，这样说，不是在给宋姐们“诊断”，也不是说三句话里哪一句是错的。每一句，在它那块土里，都是正当的、有道理的，是一代人用日子换来的经验。有问题的不是某一句话，而是三句话没有秩序地同时压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看。

◆ 23.3　三把尺子一起量，和三个季节轮着来

小冉在门口说“去吧”，说的是一句什么？

我们不知道。也许他真的想去，也许他累了，不想让妈妈失望。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听到了三句话。第一句话问他有没有听懂，问的是成绩。第二句话问他饿不饿，问的是心情。第三句话问他想不想去，问的是决定。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一分钟之内，要同时回答三道题：学得好不好、高不高兴、是不是自愿。

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同时回答了三道题：我听懂了（成绩），我没事（心情），我自己愿意（决定）。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回答，聪明得让人心里有点发紧。

当三把尺子同时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会学到一件事：怎样同时交出三份令人满意的读数。成绩要好，脸上要有笑容，嘴里要说“是我自己愿意的”。三份读数，哪一份缺了，大人都会不安。久而久之，孩子就学会了把这三样“演”出来。这不是孩子的坏，是孩子的聪明：尺子是什么，就交什么。

这是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判断：如果在三句话同时说的家里，孩子并没有学会这样“交读数”，这个说法就错了。

怎样才算不“演”？要有一种可能：三样东西，不必同时交。

这让我们想起这片土上，原来有过的一种安排。

这里要特别小心，不能写成“老时候真好”。老时候的乡下孩子，有的上不了学，有的早早下地，有的饿肚子，没有哪一件是令人羡慕的。不过，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种东西，是土自己带来的：季节。

农忙的时候，全家上阵，割稻的割稻，晒谷的晒谷，十来岁的孩子也要递水、拾穗、看场。这时候，家里只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干活？”这是“有用”的季节。农闲了，到了年节，亲戚来往，赶庙会，看戏，一家人吃点好的，这时候的问题是：“热闹不热闹？”这是“过得好”的季节。再往外，是放牛、割猪草、河边抓鱼的那些空档，大人管不着，孩子满山遍野地跑，这时候的问题，既不是有用，也不是热闹，是“随他去”。

三个季节，三套尺子，轮着来。哪一套都没有永远坐在最上面。一年里，每一个孩子大致都过过这三种日子。

这套安排，不是谁设计的，是土自己的节奏。它也有它的残酷：该干活的时候没得选，该读书的孩子可能没书读。但它有一个我们今天很难复制的好处：三种尺子不在同一时刻量同一个孩子。

今天，土变了。农忙农闲的节奏，在镇上大多数家庭里已经退场，换成了学校的日历。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尺子，周六是另一个尺子，暑假又是一个尺子——可这三个尺子并不对应三个季节，它们是同时存在的：周六上午在学数学，下午要开心，晚上还得自己想想明天选什么。每一个时辰，都有可能被任何一句话打断。

很多家长其实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想靠自己的努力，把“轮换”重新搭起来。有的家庭定了规矩：平时听话，周末放松；有的说，寒暑假随你自己安排。这些办法，都不坏。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难处：按钟点排出来的轮换，孩子是能嗅出来的。周六下午的“放松”，是为了周一的“冲刺”；暑假的“自己安排”，是要在开学前交一份作业。没有一块空地，是真的“没有为什么”的。

我们再看一个细节。宋姐等孩子的时候，注意到另一个孩子——老孟的女儿，在楼梯口的转角里，把一根橡皮筋套在手指上，绕过来，绕过去，绕了二十多分钟。老孟下楼，一眼看见，说了一句：“别玩那个了，回去把作业写了。”

女儿把橡皮筋收了起来。

在这个场景里，三句话没有一句是为那根橡皮筋准备的。“出息”嫌它耽误时间，“开心”并不用得着它（她又不是不开心），“自己选”更用不着（没有谁在逼她）。橡皮筋这二十分钟，是那三个尺子都量不到的时间。它在三句话的缝隙里，没有名字，也没有位置。

如果要问，一个孩子的“空地”在乡镇是什么样子，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大多是些再平常不过的地方：放学后绕远的那条小巷，外婆家后院的一堆旧木板，河堤上一段没人管的坡。这些地方没有谁规划过，也没有谁评过分，它们的好处，恰恰是没有哪个大人知道它们有什么用。现在，随着家长的时间表一格一格排满，这些角落正在一个一个地被安排掉，换成接送、托管和兴趣班。

楼下的老人们，倒是有这样的时间。麻将桌上说来说去，输赢不大，没有人问：你今天打牌，有什么用。可是这份“无用”，只允许大人有。大人坐在楼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孩子坐在楼上，每一分钟都被一把尺子量着。一栋楼，两层，两个规则：楼下是土里还留着的无用，楼上是土里挤出来的有用。

这里要说明，打麻将不等于庄子的“无用”，也不是我们要推荐的什么东西。它有它的输赢、人情、烟味，里面同样有它的“有用”。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轮换真的发生了，会是什么样子？不是周六上午变成“放松时间”，而是有那么一些日子，一个孩子可以整个下午什么都不是：不是学生，不是要交出成绩的人，不是要笑的人，也不是在“自己选”的人。大人不问他今天学到了什么，不问他开不开心，也不问他想要什么。他只是在那里，把一根橡皮筋绕来绕去。那一段时间之所以有用，恰恰因为没有人替它找用处。这听起来像一句绕口令，却是这片土里老人们早就懂得的事，只是到了今天，要有意识地、费力地去留。

我们只是借这栋楼，看一个事实：无用在这片土上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孩子的日程里退了出去。

第22章说过，“用”要靠没被用的地方站住。一个孩子的成长，也一样。三句话说得再好，如果三句话把每一块空地都占满了，这个孩子脚下的地，就和庄子那个比方里一样——被一直挖到了黄泉。

那么该怎么办？这里不是给出做法的地方。本书最后一卷会专门讲三条意义律怎样“轮着来”，像山上的茶园，一年有采、有养、有歇。在这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一件事：那些被三句话漏掉的时间，究竟是什么状态；它们为什么不能被问“为了什么”。

◆ 23.4　墙上的横幅

回到棋牌室那栋楼。

如果你抬头看看二楼窗外挂的那条红底白字的横幅，上面写着三个短语：

“名师提分　快乐学习　因材施教”

这是一个构想的横幅，但是只要你在任何一个乡镇的街上走一圈，类似的话，你多半见过。

仔细看，这三个短语，恰好是宋姐那三句话：提分，是“出息”；快乐，是“开心就好”；因材施教，是“你自己选”的另一种说法。

这不是巧合。辅导班的老板也不是什么哲学家，他只是个会看家长脸色的生意人。他知道，家长心里有这三句话，缺了哪一句，家长都不放心：光说提分，家长心里发紧，怕孩子苦；光说快乐，家长心里发虚，怕误了前程；光说因材施教，家长觉得空，不知道到底教什么。于是他把三句话都写上去，每一句都分到一个短语，一个招牌，把三层土收在了一起。

这就是回写。土里长出了三句话，三句话被家长带进了市场，市场把三句话包成了一个商品，商品又挂在墙上，天天对着来来往往的家长说：你的担心，我们三样都能解决。家长看了，更加相信这三样东西是应当同时拥有的，三句话的联盟，就被这块横幅加固了一圈。

这里没有谁是坏人。老板要做生意，家长要找可靠的班，孩子要有地方去。每个环节上的人，都在做一件在他那个位置上合情合理的事。可合在一起，结果是：三句话被写得越发牢固，而且越发像一个整体的要求：你不能只要一样，三样都要。

换句话说，三句话原本是三层土里长出来的，现在它们被市场缝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件衣服，所有的家长都被要求穿上。

三句话为什么没有被任何一方统一掉？这里有一个和美国那条线很不同的地方，值得停下来看一眼。

在美国的故事里，三条意义律被三个人各自统一成了一个方向，土被压平，路越走越窄。在这间棋牌室门口，没有人把三句话统一成一句。每一句都还活着，每一句都还有人真心说。这是这片土的复杂，也是它的一线余地：三条律都在场，就还有轮着来的可能。真正的难处，不是缺少哪一句，而是三句话抢同一个时辰。

衣服穿得进去的，是极少数的孩子。大部分孩子的情形，是第23.3节里的那个：为了同时交出三份读数，学会了演。

这里留下一个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既然三句话各自都有它的道理，也都有它的来历，我们能不能从中删掉一句？删掉“出息”，孩子将来怎么办？删掉“开心”，孩子现在受苦怎么办？删掉“自己选”，孩子岂不是任人摆布？每一句，都删不得。

所以，办法不是删，而是轮换：让三句话各自有各自的时候，不再同时坐在最上面。这是最后一卷的事。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去弄清另一件事：那条橡皮筋、那二十分钟——也就是三句话里都没有位置的那个空白，里面到底有什么，为什么一问“为了什么”它就碎了。

◆ 23.5　第四种声音：爷爷奶奶

棋牌室门口，其实还有一类人，常常被忽略。

他们不坐在楼梯口，他们站在街对面，或者推着一辆电动三轮，来接孩子。他们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乡镇，很多孩子是隔代带大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在县城忙生意，孩子的一日三餐、接送、作业，落在老人手上。

另一个周六，老孟上班，来接他女儿的是老孟的母亲。她不识字，也不懂什么是“数学思维”。她只知道儿子忙的时候，要她来接孙女。她站在街对面，等了一个钟头，女儿一出来，她第一句话说的是：

“饿了吧？奶奶带了馒头。”

对她来说，孩子的事，头一件是吃饱穿暖。她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孩子挨饿受冻。孙女在学什么，她不问，也不懂；孙女成绩如何，她不过问，只是听儿子说“还行”，就安心了。

这是第四种声音。它比“出息”更老，比耕读还老，是土的最底层：活下来。

四种声音，四层土，从最老到最新，叠在这个镇子上：活下来，有出息，开心就好，自己选。奶奶对小孙女说的，是第一层；老孟说的，是第二层；宋姐说的，是第二、三、四层混着；而学校里的老师、手机里的育儿号，说的又多半是第三、四层。

一个孩子夹在这些声音中间，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实际的情形：同一天里，同一个孩子，要对四个人用四种方式交代。对奶奶，要多吃一口饭；对爸爸，要说“我在好好学”；对妈妈，要笑一笑；对老师，要显得“有主见”。他很小就学会了切换。

这里也要小心，别把它写成悲剧。对孩子来说，这些声音里每一种，都意味着有人在爱他。奶奶的馒头是爱，爸爸的催是爱，妈妈的心软是爱，老师的鼓励也是爱。问题不在于有人爱，而在于爱的语言是四套，没有哪一套能管整个孩子。孩子每天都在做翻译。

这一点，是前面几卷谈过的碎片问题的家庭版：当爱的语言分成了几套，每一套都有各自的话术、各自的评价标准时，一个孩子的整块生活，由谁来看管？

◆ 23.6　小结：三层土，一个孩子

先说清楚，这一章的判断站在什么地方，免得说得太满。

它有几处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在这样的镇上做一次耐心的观察，发现多数家长其实只说一句话，不存在三句话并存，这一章的主线就错了。如果发现孩子在三句话同时说的家里，并没有学会“交读数”，而是一样发呆、一样玩耍、一样无所用心，那么“三把尺子一起量”的说法就太重了。如果发现三句话的来历并不是这样分层，而是同一个时代同时长出来的，那么“三层土”也要改写。这些，都要靠比这本书更细致的田野去验证。

再补一句：棋牌室楼上楼下，两种声音，并不是谁对谁错。楼下的松与楼上的紧，在一个镇子里本来是配着用的，只是如今，松的那一头只给了大人，紧的那一头全压给了孩子。把这个配比重新摆正，不是哪一位家长一个人能办到的事，它要靠整片土慢慢改。

这一章看了一间棋牌室的门口。

宋姐的三句话，各有来历：一句来自耕读的老土，一句来自吃过苦之后的新土，一句来自选择变多之后的更新的土。它们不是三个主张，是三层土各自说话。三句话互相收编，同时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孩子学会的，是怎样同时交出三份令人满意的读数。老时候的季节，曾经让三套尺子轮着来；现在季节退了场，

这个轮换，要靠人工去重新搭，而搭出来的轮换，又很容易被“为了什么”重新占满。

把第22章和第23章合起来，是一句话：

无用之用的位置，在这片土里原本有，后来被挤薄、被收编、被排满；今天的家长不是不爱无用，而是三条意义律同时压在身上，没有一块地可以让他们说“这一段，不为什么”。

橡皮筋绕了二十分钟的那一段时间，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一问“有什么用”就坏了？它既不是学习，也不是休息，更不是选择，它是一种什么都还没有成形的状态。

这就是下一卷的门。门里面，是一锅还没有熬成任何东西的粥。

◆

卷　七

无用卷：混沌与反意义

卷　序

D 在一锅粥的时候，根本谈不上意义；逼它每一步都有意义，就把一锅粥熬干了。这一卷讲混沌态，讲步步要意义的三种杀法，讲溜达、坐过站、休止符，讲完全的实用主义为什么最后杀死实用。

24

第24章

混沌态：问它“为了什么”，是问错了时候

◆ 24.1　打烊以后的那一锅

晚上十点半，县城这家饭馆的最后一桌客人走了。

前厅的灯关了一半，服务员在扫地，洗碗间里水声哗哗。后厨的灶火只留了一眼，大厨老何把围裙往肩上一甩，靠在不锈钢台子边上，点了一支烟。这是一天里后厨最松的时候：油烟机停了，耳朵里一下子空出来，能听见冷库压缩机嗡嗡的声音。

接下来的事，每天都差不多。

帮厨小艾拎出一个盆，里面是今天没卖完的东西：半个鱼头，两把酸菜，一块切剩的老豆腐，一小碗炒过的肉末，几根蔫了的青椒，还有昨天剩下的一锅冷饭。面案的阿强凑过来，往盆里看了一眼，说：“我那儿还有点小米辣。”洗碗的陈姨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探头说：“鱼头别扔，熬汤。”

没有人说“今天我们做什么”。小艾先把冷饭倒进大锅，加水，开火。阿强把小米辣剁了一把扔进去。老何抽完烟，走过来，尝了一口汤底，说了句“酸菜太咸了”，又去翻了半块豆腐出来。豆腐切了，鱼头劈了，肉末拨进去，青椒撕成条。有人往里加了点胡椒，有人说加了不对，又有人说试试看。

锅里的东西咕嘟咕嘟地翻着，说不清是粥，是汤，还是泡饭。

十一点，一锅东西端上了员工桌。没有名字，没有谁敢说“这是我做的”。大家各自拿个碗，蹲的蹲，坐的坐，呼噜呼噜地吃。有人说“今天这个酸得有点怪”，有人说“怪是怪，再来一碗”。吃完，碗一放，各自散了。

这就是后厨每天夜里的“员工餐”。（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开过饭馆的人，大概都在后厨见过类似的一锅。）

现在请注意几件事。

第一，这锅东西里什么都在。有手：小艾的手在搅，阿强的手在剁，老何的手去翻豆腐。有一条一步接一步往前走的路：先倒冷饭，再加水，再扔辣椒，再尝，再嫌咸，再加豆腐……每一步都和上一步不一样，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排成了序列。有一锅东西一层一层显出样子来：先是一锅水，然后是一锅粥，然后酸味出来了，然后鱼头的鲜味把酸压了一压——到最后端上桌的那个样子，是一步步显出来的，没有谁在开火之前就知道它会是这个样子。还有一团拆不开的东西缠在里头：这口锅、这个钟点、今天剩下的这几样料、小艾刚学会的手法、阿强嘴里的辣、老何嫌酸菜咸的那个口味、大家都累了一天想吃口热的那份劲。你想把“今天的酸菜鱼头泡饭”从这团东西里单独拿出来，端到另一个后厨去重做，做出来的就不是它了。

第二，这锅东西没有“为了什么”。小艾倒冷饭的时候，不是为了“做一道新菜”；阿强扔辣椒，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得开心”；老何翻豆腐，也不是为了“每个人都能按自己的口味来”。你要是在他们动手的时候凑上去问一句：“你做这个是为了什么？”他们大概会愣一下，然后说：“不为什么，就是剩的东西，弄了吃呗。”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第二天，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一道菜要是没有“为了什么”——没有人要吃，没有人要买，没有人要出新——在前厅是不可想象的，那叫失败的菜。可在员工餐这里，没有目的恰恰是它的样子。

第四，这一锅里，谁的话都能进去。白天，后厨有它清清楚楚的次序：大厨说了算，帮厨听着，洗碗的在最后一个窗口。可夜里这一锅，陈姨一句“鱼头别扔”，和老何一句“酸菜太咸”，分量差不多。陈姨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有掌过勺，她不是“提了一条建议”，她就是在往锅里放东西，和放进去的那把小米辣一样。

这是混沌态的一个小特点：在它里面，“谁有资格说话”这个问题还没有被问出来。白天的次序，是因为有一个现成的目标——把今天的菜做对、做快——才排出来的；没有这个目标，排次序的依据也就先松开了。等到方向一长出来，次序会重新长回来：哪一道菜上了菜单，它就有了“正宗的做法”，就有了“该由谁来炒”。但在那之前，这一锅是个难得的、人人都能伸手的地方。

上一卷最后，棋牌室楼上的楼梯口转角，有一个孩子把橡皮筋绕在手指上，一绕就是二十分钟。大人走过去，问：“你在干什么？”孩子答不上来。再问一句“这有什么用”，那一段时间就坏了。当时我们只留下一句话：门里面，是一锅还没有熬成任何东西的粥。

现在，我们推开这扇门。门里不是橡皮筋，是后厨夜里这一锅。

上一卷还看见，中国的家长把“有出息”“开心就好”“自己选”三句话同时压在孩子身上，也说了出路大概是轮换，不是同时压。可轮换这个办法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前提：它假定了每一刻，三条意义律里总有一条该上场。橡皮筋和这一锅一起提醒我们，有一种状态，三条律谁也排不上班。不是它们都不重要，而

是这一刻，问“为了什么”根本问不进去，三句话里不论哪一句，递过去都是递错了地方。

橡皮筋是一个孩子一个人的。后厨这一锅是一群大人的。一个在楼梯口，一个在灶台边，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里头的东西却是同一种。孩子手指上的橡皮筋，一圈一圈绕出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小差别；那段时间的“样子”，是随着绕的动作一层一层显的；而楼梯口的灰光、楼下隐隐的麻将声、孩子刚做完一页题的那口气，缠在他那一刻里，拆不开。没有人在这一刻“为了什么”。

这一种状态，本书叫它混沌态。口头上，就是“一锅粥”。

◆ 24.2　一锅粥：什么都在，只是还没有“往哪走”

先把话说准。“混沌态”不是“乱”，也不是“空”，更不是“什么都没发生”。

上面那一锅东西里，该有的都有：显露在发生，差异序列在走，纠缠在缠。三个字母都在场，一个也没少。少的是别的一样东西：差异序列还没有长出方向。

我们在导论里说过，差异序列往哪里走，叫意义目标，也就是“创造、自由、幸福”三条律管的事。在做生意的前厅里，这个方向是一早就写在墙上的：今天要卖多少，客人要吃得满意，菜要做得稳。在夜里的后厨，这个方向没有。每一步的差别照样一个接一个地来——加水、放辣、尝一口、嫌咸——可这些差别并没有朝着某一个“那里”排队。它们只是在互相碰：辣碰了酸，酸碰了鲜，今天的累碰了明天的早班。

用一个说法就是：手在动，路在走，但路还没有认出自己要去哪儿。

要把这一点说得扎实，我们回到三个方程。三个方程说的是：显露（S）由差异序列（D）和纠缠（E）一起生成；差异序列（D）由显露（S）和纠缠（E）一起生成；纠缠（E）由显露（S）和差异序列（D）一起生成。没有哪一维是现成给定的。

这里有一个很不起眼、却很要紧的推论：意义目标（D1）也是被生成的。它是差异序列的一层，而差异序列是由已经显出来的样子和已经缠在一起的土一起生成的。换句话说，一个“为了什么”，要等“已经有了点什么样子”和“已经缠出了点什么土”，才有东西去生成它。

放回锅里看。小艾倒冷饭的那一刻，锅里还只是一锅水和饭。这时候的“样子”太淡，土也才刚刚凑到一起——今天的料、今天的人、今天的心情，还没有彼此缠出什么来。要问这个时候的差异序列“为了什么”，等于去一个还没有长出来的地方，找一个还没有被生成的东西。

等到锅里酸味出来了，鱼头的鲜味顶了一下，老何说“有点意思”，阿强说“再来点辣”——这时候，样子和土才一起，慢慢往外逼出一点方向：嗯，这是往“酸辣泡饭”去的。这个方向不是谁事先定的，是锅里的东西和锅边的人一起长出来的。

所以，混沌态不是“D没有”，而是D1还没有被生成。D在走，D1在后头。

这里要小心一个很容易写错的地方。有人会说：这就是说，目标其实一直藏在锅里，只是还没有露出来，等它露出来就好了。这是错的。这等于偷偷给后厨配了一台先在的机器，一个早就设定好的终点，大家只是“发现”它。事实正相反：酸菜鱼头泡饭这个“方向”，在今晚之前不存在；换一个晚上，换几样剩

料，换一个心情，同样的人会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向。方向是长出来的，不是找出来的。

怎么检验这一条？很简单：假如有一天，你把后厨夜里每一锅东西的最后方向都提前记在小本上，再把当晚的料和人换一遍，结果每一次都和小本上写的一模一样，那说明我们错了，方向确实早就定在那里。可后厨的人都知道，不会这样。

在这里先埋一个伏笔。上面说的“酸味出来了，鱼头的鲜味顶了一下，老何说‘有点意思’”，那一刻的锅，已经不是纯粹的一锅粥了：方向有了一点点苗头，可还说不清，也禁不起一碰。它既不是混沌，也还没有定型。这一段，本书后面叫它介生，到卷八再认真讲。这里先记住一点：混沌态是方向还没有出生，介生是方向刚刚露头，两者前后相邻，却不是一回事。把后者的规矩搬到前者身上，或者把前者当成后者，都会出错。

— 老何的手指：一块豆腐里的三样东西

要看清“什么都在，只是方向没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妨只盯住老何的一只手。

他从盆里捏起那半块老豆腐，在掌心里掂了掂，拇指往边上一按，豆腐软软地陷下去一点，又慢慢弹回来。他的手指往下摸，摸到一个已经有点发黏的边——这块豆腐放了一天，边上不新鲜了。他把那一角掰掉，剩下的在指腹下是实的，微微有些凉。

这一捏一摸里，手指每一次的动作都是一个差别：软与硬，凉与不凉，黏与不黏，实与不实。一个差别接着一个差别，排成了一串。这块豆腐的“样子”，也是在这一串里一层一层显出来的：先是“一块豆腐”，再是“放了一天的豆腐”，再是“能用三分之二的豆腐”。你让别人来捏，捏出来的又不一样。而且

手和豆腐是贴在一起的：豆腐的凉，进了老何的手；老何手上的温度，也焐进了豆腐。他的手早在三十年里学会了怎样捏，这个“怎样捏”，缠着他对“今天这块还能不能用”的全部经验。

这一串动作里，有显露，有差别，有纠缠。三样东西同在一个动作里，拆不开。

可是，这一捏，不指向任何“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做一道新菜”捏，也不是为了“让大家满意”捏。他捏，是因为手边有一块豆腐，他想知道它怎么样。

这只手，最真切地说明了混沌态是什么：显露在发生，差别在排队，土在缠，而方向还没有生出来。方向要等这块豆腐和那一盆酸菜、那一碗肉末、今晚那几个人的口味，彼此磕碰一阵之后，才会慢慢生出来。

– 锅的声音：耳朵里的一锅粥

如果说老何的手指让我们看见混沌里的“摸”，那么陈姨的耳朵，让我们听见混沌里的“听”。

洗碗间离大灶有一段距离，隔着水声，陈姨听不清锅里在说什么。可她干了十几年，耳朵里有一种很细的本事：锅里的咕嘟声，从“咕——嘟，咕——嘟”变成“咕嘟咕嘟咕嘟”，再变成一种发闷的、有点黏的“噗、噗”，她不用回头就知道：汤收稠了，该有人去搅了。

这里面，每一次声音的变化都是一个差别：疏与密，清与闷，高与低。差别一个接一个，排成一串。“这锅东西现在是什么样”，是随着这一串声音一层一层在她耳朵里显出来的：先是“在开”，再是“开得急”，再是“稠了、要糊”。而且，她的耳朵不是一对孤零零的接收器：它缠着她站在洗碗间里的那个

位置，缠着她知道今天锅里有豆腐和肉末，缠着她对这家后厨三年里每一锅声音的记忆。换一个新来的人坐在她的位置上，听到的只是一团“噗噗噗”。

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听觉。里面三样东西同时在，没有哪一样是“附带”的。

可是这一回，仍然没有谁在问“这是为了什么”。陈姨听见“稠了”，喊了一声“要糊啦”，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是因为她听到了，她的耳朵忍不住。

放在一起看：老何的手、陈姨的耳朵、小艾的眼睛、阿强的舌头，同在一口锅里，各自用各自的感觉去碰这一锅，每一种感觉里，都有完整的显露、差别、纠缠。这一团东西，比任何一份“员工餐管理办法”都厚实，因为它不是按一个目的组织起来的，而是四种感觉同时在一口锅上缠着长。

– 一锅粥不是三级台阶

说到这里，我们要借站上第170号书的一个说法。它把一件东西的发生分成三种状态：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并且特别叮嘱，这三个是“三副面孔”，不是“三级台阶”。

这个叮嘱很重要。台阶的意思是，你爬完第一级才上第二级，上了第三级就不会再回头。可看后厨就知道，不是这样。

同一个后厨，同一个晚上，三副面孔同时在。大灶上那一锅是一锅粥；小艾手边那块刚切的豆腐，正在往“要不要放进去”的方向成形；而前厅菜单上的“剁椒鱼头”，早已定型，不容任何人夜里乱改。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道菜，可以从定型走回一锅粥。老何三十年前学会的那套炒法，早已定型成了手势，不用想。可是有一天，酸菜断了货，他不得不用别的东西顶，手上那套定型的动作忽然散了，他得重新摸索——那一小会儿，他又回到了一锅粥。

所以，混沌态不是一个人生阶段，不是“小孩子才有”的东西；它是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回到的一种面孔。只是，大多数时候，这副面孔被其他两副压在下面，没有人看它。

– 两个相邻的说法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想起另外两个相近的词：一个是“乱”，一个是“没想法”。

乱，是在已经有方向的地方，东西偏离了方向。前厅里菜上错了桌，叫乱。混沌态里没有“偏离”，因为还没有方向可偏。

没想法，是脑子里空着。可后厨那一锅里，每个人脑子里并不空，阿强想着辣，陈姨想着鱼头，老何想着酸菜咸。它们都在，只是还没有被收成一个“想法”。

所以，混沌态最准确的说法，是：什么都已经在场，只有方向还没出生。

◆ 24.3　为什么不能在这时候问“为了什么”

有一天，饭馆换了个管事的。新来的店长姓乔，三十出头，干过连锁，做事讲究“每件事都要有产出”。

他第一次在夜里走进后厨，看见一锅乱炖，大家蹲着吃，觉得很有意思，又觉得有点浪费。他问了一句：“你们这个，是为了什么？”

注意，他问得很客气，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他是真的好奇，也是真的想帮忙。

老何愣了一下，抽了口烟，说：“就是……吃个饭。”

乔店长点点头，没再说话。可那天夜里，后厨的气氛有一点变了。小艾倒冷饭的时候，多看了他一眼；阿强往锅里扔辣椒之前，犹豫了半秒。那一锅东西最后也熬出来了，味道一般。第二天晚上，有人问：“今天还做吗？”

乔店长什么也没做错。他只是在一个D1还没有被生成的地方，问了一个只有D1出生以后才答得了的问题。

这就是本章要说的判词：**在混沌态里问“为了什么”，不是问得太严，而是问错了时候**。

一 问错的三种问法

乔店长那一句“为了什么”，其实是三个问题合成的。拆开看，每一个都对应一条意义律。

第一种问法是创造律的：“它能长出点新东西吗？”意思是，这锅乱炖能不能变成一道新菜，哪怕不上菜单，也该有点“成果”。

第二种问法是幸福律的：“大家吃着高兴吗？”意思是，这一顿对员工有没有好处，值不值得花这些料和这些时间。

第三种问法是自由律的：“这是你们自己想做的吗？”意思是，是不是被安排的，有没有人被迫，每个人有没有自己说了算。

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是好问题。放在前厅，放在白天，放在有方向的地方，它们是正当的、该问的。老周在夜市上一晚上被问三遍，靠的就是这三问。

可是放进混沌态，这三问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它们都要求答案是现成的。创造问的是“长出了什么”，可东西才刚开始长；幸福问的是“高不高兴”，可高兴要等味道出来才知道；自由问的是“是不是你自己要的”，可“自己要什么”，恰恰是要在做的过程里才弄清楚。

换句话说，这三个问题，都是在向一个还没有被生成的东西要答案。

– 三个方程怎么说

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三个方程，把这件事说得更硬一点。

D1是被S和E一起生成的。一道菜的“方向”，要等锅里的样子显出几分、锅边的人缠出几分，才有东西去生成它。这是时间上的“要等”吗？不完全是。它不是外面有一只钟在催，而是三维缠着长，D1是缠着长的结果，不是缠着长的前提。

现在，一个人在这时候问“为了什么”，会发生什么？

他要的是一个答案。大家都是有礼貌的人，不愿意让他白问，于是就得现编一个。老何说“吃个饭”，已经算是诚实。换成一个爱面子的人，大概会说：“我们是想试试把剩货用起来，减少浪费，顺便看看有没有新味道。”这话听起来非常合理。问题是，它不是锅里长出来的方向，而是为了回答问题，从外面贴上去的方向。

一旦贴上去，三维之间的关系就变了：本来是S和E在长着D1，现在是一个现成的D1从上头压下来，要求S和E照它的样子长。三个方程里，D被写成了“给定的”，S和E不得不去配合它。

这就是前面说的：D1被当成了前提。而三个方程的整个意思是，没有哪一维可以当前提。

– 那个半秒的犹豫

还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多看一眼：乔店长问完以后，阿强往锅里扔辣椒之前，犹豫了半秒。

这半秒，是整件事里最小、也最要紧的一个动作。

之前，阿强扔辣椒，靠的是手边有辣椒，和一种说不清的“应该再来点劲”。他的手和他的口味、和这口锅，是一个动作。现在，在手伸出去的半秒钟里，多了一个声音：我这么扔，算是为了什么？它不需要有人说出口，只要那个问题存在于空气里，就够了。

用我们的话讲：一个问题被问出来，它就不再只是一句话，它进了土。大家的手、眼睛、口味、对彼此的预期，是缠在一起的；往这团缠着的东西里放进一个“为了什么”，整团东西的纹路就变了。以前阿强的手只听锅；现在，阿强的手既听锅，也听着一个看不见的评委。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问题问错了时候，不是问得凶不凶的事。再温和的“为了什么”，也是一件放进土里的东西，而土里的东西，是要回写的。第二晚，阿强的犹豫会是一秒；第十晚，他会自己在心里先答一遍，才动手。

– 一道可以检验的判断

说到这里，读者有权问一句：这话能不能被推翻？

能。判断是这样的：在后厨的员工餐上，如果事先规定了“这一锅是为了什么”，那一锅的东西，会比没规定的时候更窄、更像已知的菜，而不是更新、更怪、更有意思。

怎样验证它错？很容易：找十家饭馆，一半在员工餐前宣布“今晚做一道能上菜单的新菜”，另一半什么也不说。过两个月，把两边做出来的东西摆在一起，请不知情的厨师来评。如果事先规定了目的的那一边，做出的东西更出人意料，那这话就错了。

我们当然没有做这个实验。但后厨的人大多知道答案。一个干了二十年的厨师说过一类很朴素的话（这是常见的行话，不是某个人的原话）：想出新菜的时候，越想越想不出来；吃员工餐的时候，随手一放，反而有。这不是玄学，是上面的方程在厨房里的样子。

— “事后明明说得出用处”

读者还会说：可是，后来这锅东西确实成了好菜啊。你看，酸菜鱼头泡饭，后来不是上了夜宵菜单，卖得不错吗？这不就是说，当初那一锅是“有用”的？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事后说得出用处，是真的。可那个“用处”，是后来才长出来的，而且是一路被回写出来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仍是构想）：那一锅东西好吃，第二天有人又想吃；第三天，前厅一个熟客留下来看见了，说：“你们吃的什么？给我也来一碗。”老何本来不肯，说是员工餐。熟客坚持，最后端了一小碗出去。熟客吃了，说好，下次又来。就这样，一碗一碗，才有了夜宵菜单上的一行字。

你看，“这锅东西可以卖”这个意义，是在熟客的一口、老何的松口、菜单上的一行字这一路上，一步一步长出来的。它是被后来的人和后来的事一起生成的。

如果把这个“可以卖”当成是当初那一锅的目的，倒着往回贴，就成了典型的“发现学的发生”：好像当年那一锅，早就是为了今天的夜宵菜单。这是把后来才长出来的东西，说成是一直藏在里头的。

所以，诚实的说法是：那一锅在当晚，没有用处；它后来有用处，是因为后来有了许多别的事发生。当晚的“没用”，不是后来“有用”的反面，而是后来“有用”的一个地基。

– 为什么这一点那么难被看见

还有一个原因，让混沌态特别容易被误伤：它在事后总是看起来有用。

一个人回头看自己的经历，几乎总能讲出一个顺畅的故事：那一年我在后厨打杂，看着看着学会了火候；那一晚我们瞎炒了一锅，后来成了招牌。故事讲得越顺，听的人越觉得：你看，当时的“没用”，其实是在为后来做准备。

这个故事听上去温暖，也有一点点真，可它悄悄做了一件事：把当时的混沌，改写成了“早有安排的铺垫”。一旦它是铺垫，它就欠了一个交代，也就可以被提前审问：“你这个铺垫，现在铺得怎么样了？”

所以我们必须守住一个很朴素的区分：事后说得出用处，不等于当时是为了那个用处。当时没有用处，后来有了用处，这两句话可以同时成立，而且大多数时候，正是同时成立。把它们捏成一句“当时就是为了后来”，是最容易、也最危险的一步。

这一步错了，后面所有的审问就都有了理由。

– 小结：一个很小的纪律

回到乔店长。这件事不怪他。他是在一个有方向的世界里长大的，每件事都有产出，每次开会都要有结论。他的问题是对的，他只是把问题带进了一个不该带的地方。

如果我们要给这个纪律起个名字，大概是：先看这一刻有没有方向，再决定问不问“为了什么”。

有方向的地方，问。该问，必须问。没方向的地方，不问；让手去走，让锅去熬，让方向自己长出来。这不是偷懒，是尊重三个方程。

有人可能会担心：那是不是什么都不问，就会糊里糊涂？不会。后厨有它自己的规矩——锅要刷，火要关，鱼头不能放过夜。这些规矩管的是别的事，不是“为了什么”。

◆ 24.4　两个对话，三个反驳

本章写到这里，需要和站上两本书当面碰一碰。

– 碰一：133号的“受保护的混沌”

站上第133号书读皮尔斯那篇讲“玩味”的文章，把玩味读成“受保护的混沌”。我们前面（第1章）引过：一个人不带目的，让心思在花园里随便走。133号看得很准。

本书与它的分歧在于：它保护的混沌，已经带着一个方向。

在皮尔斯那里，玩味不是白白玩的。他是要让一个假设从里面自然浮上来，要让一个信念长出来。花园，是苗圃。换句话说，皮尔斯保护混沌，是为了混沌将来能产出。这是创造律在保护它。

而后厨夜里的这一锅，不是苗圃。小艾倒冷饭的时候，不是在育一个新菜的苗；就算后来真的长出了一道新菜，那是后来的事，是一路回写出来的，不是当初的目的。

这个分别不是咬文嚼字。苗圃式的混沌，一旦发现长不出东西，就会被判“没用”，拔掉，改种别的。你若是对皮尔斯式的“玩味”问：“你这么玩了一个月，长出什么了？”他是有话可答的，也有义务答。而夜里的这一锅，不欠任何人一个“长出了什么”。

133号看见了混沌，也守护了它，这是很了不起的。只是它守护的理由，仍然是一个D1的理由。本书想往前走的一步是：有一种混沌，连“将来能产出”这个理由也不欠。

这样一来，我们在第1章说过的一句话要补上：皮尔斯的自由，是为了长出新信念的自由；而这里要讲的，是一种连“为了长出什么”都先放下的状态。至于这种状态到底怎样被保护、怎样识别，是后面两卷的事。

– 碰二：170号的“一锅粥”和180号的“先做起来”

170号书讲杜威的教育，把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当作三副面孔，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借用了。本书往前走的一步，是把“一锅粥”那副面孔单独拎出来，问：它的特殊之处，是D1尚未出生。在170号里，一锅粥主要是学习的一个起点；在本书里，它成了一个“不能被审问意义”的地方。

站上第180号书也有一个相近的提醒：一团乱麻的时候，先做起来，再说别的。这句话非常好，也非常实用。本书想补一点：先做起来，没有错；但“做起来”不能马上就被要求“做出点什么”。做起来是D2的动作，是路上的一步；“做出点什么”是D1的要求，是方向的问话。两者之间有一段，该留给那一锅东西自己熬。

这三本书都看见了混沌，也都没有把它当敌人。这一点让人安心。但它们都还把混沌当作“一个起点”或“一个要保护的苗圃”。本书想说的是：混沌态本身，是一个不能用D1来衡量的存在。不是它不重要，是它的重要性，不在D1的账本上。

– 三个常见的反驳

说到这里，读者心里大概有几句话压着。我们把它们摆出来，一句一句回。

第一句：这不就是偷懒吗？后厨的人下了班，随便炒一锅，不就是摸鱼？

不是。偷懒是在有方向的地方，不往方向上走。一个人本该刷锅，他躲在后门抽烟，这是偷懒，因为刷锅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为了什么”。而夜里的那一锅，没有一个现成的“该做的事”被它挤掉。小艾倒冷饭的手，一点也不松，她在认真地做、认真地尝、认真地改。认真，和有没有目的，是两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认真”和“有目的”绑在一起，以为一个人要是认真，就一定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认真。后厨夜里的这一锅，正好把这两样拆开了。

第二句：没有目的，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办？鱼头放坏了，火没关，谁来负责？

这是一句很实在的话，应当好好回答。安全、卫生、火和刀，这些事有它们自己的目的，而且目的清清楚楚：不能中毒，不能起火，不能伤人。夜里的这一锅，从来没有取消这些。老何再放松，也不会把过夜的鱼头扔进汤里。混沌态不是没有任何边界，它只是在“为了什么”这一层上没有边界。如何区分哪些地方该有目的、哪些地方不该，我们在后面讲边界的时候，会专门花一章来说。这里只提醒一句：不问“为了什么”，不等于什么都不管。

第三句：你说方向是长出来的，那它长出来以后呢？总得有人去管它吧？

当然要管。酸菜鱼头泡饭被熟客点了名，被写上菜单，那一刻，它就从一锅粥走向了定型，从这一刻起，“为了什么”就有了现成的答案：为了卖，为了让客人满意，为了成本合理。这时候，开表、打分、核成本，都是对的。乔店长那一套，放在这一刻，没有毛病。

毛病只出在时间错了：把定型之后才合适的做法，搬到了一锅粥的时候。这就好比刚点了卤的豆腐脑，要等它凝住了，才能上板压成豆腐；没凝住就压，压出来的是一滩水。

所以，本章反对的，从来不是表、不是评分、不是核成本。反对的是一刀切的时间感，以为所有的事，都可以在同一个钟点上被同一把尺子量。

◆ 24.5　小结：判词和交棒

这一章，从后厨夜里那一锅东西说起，讲了三件事。

第一，混沌态不是乱，也不是空。S、D、E都在场，只是差异序列还没有长出方向。方向（D1）是被生成的，它要等已经显出的样子和已经缠出的土一起把它逼出来。

第二，混沌态的三副面孔不是三级台阶。同一个后厨、同一个晚上，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同时在。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从定型走回一锅粥。

第三，在混沌态里问“为了什么”，是问错了时候。不是问得太严，也不是问得没礼貌，而是向一个还没出生的东西要答案。要不到，就现编；现编的方向贴上去，就会把原本正在长的东西压回已知的样子。

本章的判词：**混沌态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还没有出生；在它出生以前去审问它，审问出来的，只会是别处借来的意义。**

判词里的“别处借来的意义”，在后厨里是看得见的东西：研发会上的方向是从网上借的，点菜制的方向是从福利制度里借的，自选台的方向是从“个人权利”的话语里借的。借来的方向不是假的，它们在原来的地方都是真方向。只是搬到这一锅里，它们不再是锅里长出来的东西了。借来的方向，能让锅看起来有方向，却不能让锅真的有方向。

还有三个问题，这一章没有答，留给后面。

第一，既然混沌态里不能问“为了什么”，那它到底靠什么保持住？是靠时间，靠地方，靠人，还是靠别的什么？

第二，后厨夜里的这一锅，和一个人的一段“没有目的”的时间，是不是同一种东西？一个人独自坐过了站，走了远路回家，那一段路上，他的混沌是怎么回事？

第三，混沌态之后呢？那一锅东西酸味出来、鲜味顶上去、老何说“有点意思”的那个时刻，既不是一锅粥，也不是定型，介乎两者之间：样子刚露头，说不清是什么，一碰就散。这个中间的状态，本书叫它介生。它和混沌态是邻居，规矩却不一样：混沌态欠缺的是方向，介生欠缺的是力气。怎样认出它，怎样不碰坏它，是卷八要做的事。

那么，如果真的有人审问，或者更常见的是，有人好心地想帮它、改善它、让它更“有价值”，会发生什么？下一章，我们回到那家饭馆。乔店长不会只问一句话就走；他是个认真的人，他会开会。

◆

25

第25章

步步要意义，怎样把一锅粥熬干

◆ 25.1　周三的“新品研发会”

乔店长是个认真的人。

他在夜里的后厨站了几晚，看着那一锅乱炖，越看越觉得可惜。他的想法很朴素：这么好的一口锅，每天晚上都有料，有手艺，有一群懂吃的人，却只是“吃完就散”，浪费了。要是能把这个时间用起来，说不定能出几道新菜，既省了研发费，还能让大家有成就感。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下一周的周三，在员工餐的时间，开一个“新品研发会”。

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他都想得很周到（这仍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但在不少单位里，类似的事情大概每年都在发生）。

他在后厨门口贴了一张表：日期、参与人、本周食材、创意方向、试吃评价、是否进入菜单评估。他让小艾做记录员。他买了一次性小碗，每个人每次试吃一口，在表上打勾，从一到五分。他定了规则：每个人每周至少带一个想法；三周以后，从所有想法里选两道，做正式的试菜，请前厅的几位老员工、两位熟客一起评。

他也没有省钱。那个周三，他特意买了几样“好料”：新鲜的鱼头，进口的柠檬，一小块黑松露酱。他说：“今天我们不吃剩的，认真做。”

老何看了一眼那张表，没说话，抽了口烟。陈姨在洗碗间里嘀咕了一句：“吃个饭还要打分。”阿强倒是兴致勃勃，说：“行啊，我早就想试试。”

头一次研发会，开得热闹。大家围着那几样好料，你一言我一语，提了十几个创意。小艾记了满满两页纸。乔店长很高兴，觉得这件事走对了。

那个周三，还发生了一件很小的事，当时没有人注意。研发会散了以后，大家照旧去吃员工餐，锅里是正经的好料，鱼头新鲜，柠檬很香。可吃到一半，陈姨忽然说了一句：“今天这锅，怎么吃着像在吃饭馆的菜？”

没有人接话。陈姨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只是那天的碗，很快就见了底，也很快就被收走了。没有人说“再来一碗”，也没有人嫌它怪。它很好，好得像前厅端出去的东西。

我们得承认：这一切，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是坏的。表是有用的，评分是有用的，好料是好意，三周后选两道是合理的流程。乔店长没有任何恶意，每一步也都有道理。

可是三周以后，那一锅东西没有了。员工餐照样每晚都在，锅照样是那口锅，人照样是那些人，可那种“什么都在，只是不为什么”的东西，不在了。

它是怎么没的？

◆ 25.2　三种杀法

乔店长那一套里，其实混着三种不同的力。每一种，对应着一条意义律。它们有时单独出手，有时同时来；但拆开看，每一种杀法都有自己的脾气。

– 第一种：创造律的杀法，逼它出新

先说表上最显眼的那一栏：“是否进入菜单评估”。

这一栏的意思是，每一次做，都要问：这次出了什么新东西？

第一周，大家还有点新鲜劲，创意提了很多。第二周，小艾发现一件事：她要是在员工餐上“随便弄弄”，到了表上就是一片空白，乔店长看了会不高兴。于是她开始在家里提前想。她刷手机，看别的饭馆的菜，记下几个“听起来新”的搭配，周三带来。

阿强也变了。他以前随手往锅里扔辣椒，是因为今天手边有辣椒。现在他得“有话题”。他做了一道“榴莲小米辣泡饭”，端上桌，所有人都愣了。乔店长说：“有想法！”在表上打了五分。后来这道菜被试吃的几个人尝过一口，没有人说好吃，也没有人说难吃，只是笑，然后放下了。

老何什么也没带。他说：“我不是这个路子。”乔店长很尊重地点点头，在他那一栏写了“待观察”。

第三周，试菜日。两道菜入选：一道是小艾从网上学来的“柠檬鱼头粥”，一道是阿强的“榴莲小米辣泡饭”。前厅试吃，反应平平。后来柠檬鱼头粥放进了夜宵菜单，被客人点了两次，下架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请注意，“新”这个东西，还在，而且被逼得很勤。每周都有新创意，每周都有新试吃。若光看数字，乔店长大概会说：新品产出，比以前多多了。

可是这个“新”和以前不是一回事。夜里的那一锅，以前也会“新”：酸菜鱼头泡饭就是这么来的。但那种新，是几样剩料、几个人、一个钟点、一份累，缠在一起，自己磕碰出来的，事先谁也不知道。现在的新，是为了交差而去找的新。小艾在家里想的，是“有什么听起来新”；阿强做的，是“有什么能让人愣一下”。他们要的是新的样子，而不是新的发生。

这两样东西的差别，用上一章的话讲，一个是从缠着的土里长出来的，一个是从外面找来贴上去的。贴上去的新，往往只是已经见过的“新”的样子：网上看过的，别人做过的，听起来有话题的。真正的新，往往“看起来不像新”，因为它还没有名字，还没有被人说过。

所以创造律的杀法有一个很妙的结果：越逼它出新，出来的越像已有的新。因为一个人被要求“出新”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去找最安全的“新”，也就是已经被认可过的那种新。

三原理的话说起来是这样：本来，今晚的料、今晚的人、今晚的累，缠在一起，和锅里已经显出来的样子彼此顶着，这一顶一顶，推着下一步怎么走。而现在，有一个提前钉死的“出新”，从上面压下来，它和锅里的实际情形也顶，但这一顶，推动的不再是“这一锅往哪里走”，而是“怎样让锅看起来出了新”。顶撞还在，可顶撞的结果被换了方向。

这件事还有一个后面。三个月后，乔店长要小艾自己带一次研发会，她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手机，有点发慌。她说：“店长，我好像……不太会了。”

乔店长很吃惊：“你以前不是挺会弄的吗？”

小艾想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以前我不知道自己会，弄着弄着就有了。现在我先得知道要弄什么，才敢动手。”

这是一句很准的话。创造律的杀法，杀死的不是创造，而是“弄着弄着就有了”的那个顺序。原来是手先走，东西后显；现在是东西先定，手再去凑。顺序一倒，手就慌了。

– 第二种：幸福律的杀法，逼它舒服

乔店长这套办法，几周后遇到了一个人的反对：老板娘。

老板娘姓俞，四十出头，是店里真正的管事人。她倒不反对研发会，她心疼的是另一件事。那天她看见小艾蹲在后厨吃那个榴莲泡饭，吃了两口放下了，没说什么，把碗端去倒了。

她跟乔店长说：“员工餐是员工的福利，不是你们拿来试验的。人家一天站十个钟头，晚上还要拿自己的饭去试你的菜？”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人情。

于是，她改了规矩：员工餐以后不吃剩的，也不做试验，每个人点一个自己想吃的菜，小艾记单，轮流由厨师炒。炒好了，每个人端自己的。

这个办法开始得很顺。大家都高兴。阿强点了自己最爱的辣子鸡，陈姨点了她的清蒸鱼，小艾点了葱油拌面（她从小吃到大）。老何呢，他说：“我吃什么都行。”于是大家给他点了一个青椒肉丝。

每个人吃得很好，饭点准时，没有人再吃到怪味道。俞老板娘看着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觉得这件事做对了。

可是，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后厨夜里有一样东西悄悄没了：怪。

以前一锅乱炖，里面有好吃的，也有不太好吃的。有一次，阿强不小心放多了胡椒，整锅都冲，大家一边咳一边笑，边咳边吃。又有一次，豆腐煮得太久，碎了，变成一锅絮，陈姨说“这像小时候吃的”，一下子有人想起家里的饭。这些“不对劲”，后来都成了大家嘴边的话，成了某种共同的记忆。

现在，每个人只吃自己点的。点的是自己爱吃的，当然不会出意外。如果某一天辣子鸡炒咸了，阿强会说一句“今天没做好”，厨师会道歉。在以前，咸了是一锅东西的脾气；现在，咸了是一个失误。

幸福律杀法的特点，就在这里：它把不舒服，当成了故障。一锅粥的特点之一，正是里面有不顺的东西，酸得怪，咸得冲，煮过了头。这些不顺不是缺陷，而是东西在彼此磕碰。可当“让每个人吃得满意”变成唯一的读数时，所有不顺都要被消除。

消除的结果，是一个人人满意、人人安稳的饭桌。也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发生的饭桌。

– 第三种：自由律的杀法，逼它多开选项

自由律的杀法最不容易看出来，因为它看起来最不像杀法，它看起来像尊重。

点菜制实行了三个月，有一天阿强提了个建议。他说：“要不这样，别让厨师炒了，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灶就这几眼，轮着用，料随便拿。谁想吃什么，自己弄。”

乔店长听了很赞同。这个办法省了厨师的力气，更重要的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他说，不要让别人来决定你吃什么。于是后厨设了一个“员工自选台”：米饭、面条、粥底、几种配菜、几种酱，应有尽有。每个人领一份料，轮着用灶，各做各的。

选项越来越多。后来有人提议加一个“素食区”，有人提议加一个“低脂区”，还有人提议每人领固定的份额，免得有人多拿。表上的栏目也更长了。

这时候的后厨，看上去极其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吃自己想吃的，没有人被安排，没有人被迫尝别人的东西。选择权很大。

可是，那一锅，没有了。

没有一锅，就没有谁要搭谁的手。小艾倒冷饭、阿强扔辣椒、老何尝一口说咸，这一串，原来是一个人的动作碰上另一个人的动作，一个人的口味碰上另一个人的口味，碰出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东西。现在，每个人守着自己的灶，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的，谁也碰不到谁。

选项是多了，可选项之间没有磕碰，也就没有东西从磕碰里长出来。

这里的道理，和第3章讲的“路越多越好”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搬到了一口锅上：自由律如果成为唯一的读数，它最终要的，是每个人都不被另一个人的东西打扰。可一锅粥偏偏是靠打扰长出来的。

– 三种杀法的共同点

拆完这三种，请注意它们的共同点。

它们都没有“禁止”什么。没有人说“不许乱炒”。每一种做法都是在加东西：加一张表，加一个点菜单，加一个自选台。每一种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它们也都有一个很具体的读数：创造律看“出了几道新品”，幸福律看“大家满不满意”，自由律看“选项够不够多”。一旦读数立起来，所有的人都会下意识去朝读数走。读数好看，事情就算做对了。

最后，它们杀的是同一样东西：那个D1还没有出生的地方。它们不是把一锅粥杀死，而是在它还没长出方向的时候，提前从外面给它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把这个共同点，说成这一章的第一句判词：**杀死混沌的，不是对它的反对，而是对它的“帮助”**。

– 一个小小的自测

读到这里，读者也许想对着自己的生活照一照。这里有一个不打分的问法，只是看看。

你所在的地方，比如你的家，你的单位，你带的班，有没有这样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做着一点什么，没有人问“这是为了什么”？如果有，它现在还在吗？如果不在了，它是在哪一天不在的？是不是在某一天，有人带着好意，说了一句“我们不如……”？

请注意，这个问法里没有“该不该”。我们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应该有一锅粥，也不是说一旦没有就是失败。只是请你看一看，那一锅在你那里，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人想过要帮它。

◆ 25.3　混沌被杀的征兆

混沌被杀，一般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时刻。没有谁宣布“从今天起，这锅粥不再是粥了”。它是慢慢变的。可是有几样征兆，很具体，在后厨里一看就知道。（要提醒一句：征兆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评的。不能拿它给哪个人、哪个店打分排名，那样做，就又成了新的读数。）

第一，开口的第一句话变了。以前是“今天有什么”，现在是“今天吃什么”。以前是“这个酸得怪”，现在是“这个能上菜单吗”、“这个好吃吗”、“随你”。一句话里，有没有出现一个“能不能、好不好、行不行”的判断，是最容易听出来的征兆。在混沌里，人说话是描述，是玩笑，是嘀咕；一旦进入审问，人说话就开始打分。

第二，没有人再被吓一跳。一锅粥里总会有一两样让人“啊？”的东西，放多了的胡椒，煮碎了的豆腐。这个“啊？”是混沌活着的声音。若是连着两三个月，后厨夜里没有一个人说过“啊？”，那大概说明，所有的东西都在预期里了。

第三，剩料没人碰了。这是最实在的一条。原来的员工餐，是因为有剩料才有的；剩料是一个“不得不用”的约束，也是混沌的原料。现在每个人点自己的菜，每个人领自己的份，剩料就慢慢没有人管了，有时被直接倒掉。没有剩料，就没有“不得不”，没有“不得不”，就没有逼出来的奇怪搭配。

第四，人开始“准备”了。小艾提前在家里刷手机想点子，阿强提前一天想好周三做什么。这不是坏事，准备本身很好。但当混沌里出现了“准备”，说明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等着被填的格子。

第五，记不住了。以前的员工餐，大家会隔了几个月还提起：“那回那个豆腐絮，你们还记得吗？”现在，每个人吃的是自己点的，每一顿都符合预期，每一顿都平平稳稳，没有一顿特别。一件事如果每一次都在预期之内，它就没有办法被记住。记得住的，都是出过一点“岔子”的。

第六，吃饭的样子变了。以前是蹲着、站着、靠着，三三两两，碗拿在手里就吃，谁的碗里有什么、谁尝了谁的，都乱着。后来是坐下来，按座位，各吃各的，吃完碗一放，起身就走。坐姿本身没有错，可它是一种“这顿饭已经有了章法”的姿势。章法一多，磕碰就少。

这六样，合起来是一幅图画：大家规规矩矩地吃饭，吃得很好，吃得很舒服，没有一个人不满意，而这顿饭，已经不是那一顿饭了。

– 这些征兆，怎样才算看错了

既然是征兆，就要留一个办法，让它能被推翻。

假如一家后厨，开了研发会、做了点菜制、设了自选台，三样都有，而夜里的员工餐，大家照样说“今天这个怪”，照样有人被吓一跳，照样有人隔了半年还念叨某一锅，照样有人在剩料面前自发地动手——那说明上面这些征兆没有看对，也说明这家后厨的混沌，比我们想的要结实，表和读数并没有渗进土里。

这种后厨是有的。有的老厨子，对任何表都能一笑置之，该乱炖的时候照样乱炖。但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人，是在表和读数之外，靠自己的定力守住了一块地方，还是这块地方本来就有别的什么保护着它？守地的力气，是个人的，还是土的？

本书的看法是：不要指望每个人都有这种定力。一个好制度，不应该靠少数人的倔强来保留混沌。这一点，会在后面讲保护的两章里再回来。

◆ 25.4　为什么每一步看起来都有道理

写到这里，我们要回答一个最难受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觉得自己做错了？

乔店长没有错，老板娘没有错，阿强的自选台也没有错。他们每一个人，在自己那一步上，都有充分的理由。这不是一个“有坏人”的故事，而是一个“全是好人”的故事。

这正是本章第二句判词要说的：**每一步都要有意义，意义就被杀死了**。为什么？

让我们用三原理的话来重看一遍后厨夜里的那一锅。

混沌态里，不是没有矛盾。酸碰着咸，累碰着饿，剩料的不够碰着人的想吃，老何的老路子碰着小艾的新手法。这些矛盾一直在顶着。三原理讲，两维相矛盾，会推动第三维改变：每晚，那一锅的样子（S），正是被这些顶撞一次一次推着变的。

注意，这些矛盾不是毛病，是燃料。后厨夜里的一锅东西之所以会“长”，靠的就是这些没有被调和的顶撞。

现在，来了一个“意义的审问”。它用一个固定的读数——新不新，满不满意，自由不自由——去衡量每一次顶撞的结果。读数一出来，顶撞的结果就变成了“合格”或“不合格”。合格的保留，不合格的修正。

这个动作的结果是：矛盾被当成了毛病来处理。酸碰着咸，评分评出“咸了”，下次少放盐。矛盾消除了，锅里的东西更稳，更像样。可以说，一锅粥的燃料，被一点一点收走了。

这就是“步步要意义”的真正机制：它不是在禁止什么，而是在每一个矛盾上盖一个章。章盖得越多，燃料越少；燃料越少，锅里越不会长出什么。

这里还有一个回写。读数用久了，它会沉淀进人的习惯里：小艾回到家里，看一个菜谱，下意识想的是“这个能不能带去周三”；阿强走进市场，看见一样新鲜东西，想的是“拿这个能出什么新品”。读数不再待在表上，进了人的手和眼睛。到这时候，就算把表撕掉，把研发会取消，那一锅东西也回不来了，因为被杀的不只是那一锅，还有那一群人对“不为什么”的耐心。

站上第180号书和第170号书都提醒过，路一旦被意义填满，就没有空地，也就没有地方长新的路。本书想补上的是：路上没有空地，不是因为路太多，而是因为每一寸都被问过了“为了什么”。

再往深说一层。乔店长之所以会这样做，不是因为他个人偏爱数字，而是他长在一种土里：在那片土里，一件事不说出它的用处，就仿佛不存在。这个“用处”的土，是怎么一层层长出来的，是前面几卷我们一直在追的东西。而这里想让读者注意的是，当这片土已经铺满了整个社会，一个好心的店长，连在员工餐里都能听见它的声音。

– 三个方程，再看一遍

最后，把三个方程拿回来，看看乔店长他们动手以后，方程里的东西是怎样换了位的。

夜里没有审问的时候，三维是互相生成的：锅里已有的样子（S）和人与料缠出的土（E），一起逼出这一晚往哪边走（D）；走了一步，样子又变了；样子变了，土里的东西也变了；土变了，下一步的走法又不同。三维像三个人互相扶着走路，谁也不是起点。

审问进来以后，D被抽了出来，当成了起点。“要出新”“要舒服”“要自由”，都是在锅还没有显出样子之前，先把D1定好了。于是方程变成了：S和E去适应D，而不是D跟着S和E长。三个方程的整个意思，被倒了过来。

倒过来的后果，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表现：S变窄了。前面说过，贴上去的新、贴上去的舒服、贴上去的自由，都是已有的样子。当D1被钉死，显露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能被这个D1认出来的东西。认不出来的，就没有地方显露。一锅粥里原本会冒出来的那些“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因为没有读数能认出它们，所以就没有机会被看见，也没有机会被长大。

这也是本书反复要说的：统一了路，土就被压平；而压平的土上，长不出原来能长出的东西。

– 熬干，和只是歇着，不是一回事

还要补一句，免得读者把“熬干”理解得太绝对。

一锅粥被熬干，不等于这群人再也不会有混沌。人是活的，几个月以后，也许乔店长调走了，也许老板娘换了主意，也许某一天停了煤气，所有人只能蹲在后门口吃一碗泡面——那一刻，混沌又回来了。

被熬干的，是那一口锅里的那一种耐心。它能回来，但回来要靠别的东西，不是靠撤掉表。因为那份耐心，是回写进土里的；土里的东西，不会因为表撤了就自动退出去。要让它回来，需要新的一轮顶撞、新的一轮磕碰、新的一轮“不为什么”，重新慢慢养出来。这个过程，本书后面会把它叫做保护。

在没有保护的地方，最常见的结局不是混沌被消灭，而是混沌搬了家：搬到了后门口的烟头堆里，搬到了几个人私下的闲聊里，搬到了下班路上的某一段。它没有死，但它不再长在锅里，也就不再长在这个店里。

— 隔壁街的老馆子

为了不让读者以为“员工餐”是个只有坏结局的故事，说一说另一家饭馆（也是构想的）。

隔壁街有一家开了很多年的老馆子，老板姓罗，不识几个字。他的后厨，夜里也有一锅。他没有开过一次会，没有贴过一张表，也不点菜、不设自选台。他只做过一件事，说起来甚至有点不像“做”：每天打烊以后，他把灶台中间那一眼大灶留着，不让人在上面洗东西、堆东西，让它空着。

谁要是想在上面架口锅，随便。谁今天累了，直接回家，也没人问。

有一年，馆子里新来了个年轻学徒，很勤快，每天夜里都要在大灶上“练点什么”，今天练刀工，明天练炒饭。罗老板路过看一眼，什么也不说。有一回学徒忍不住问他：“老板，我这样练，行不行？”

罗老板说：“灶是空着的。”

学徒没听懂，回去琢磨了好几天。

这个故事我们不打算替它加什么结论。只想让读者注意一点：罗老板没有给那一锅任何东西——没有目的，没有读数，没有鼓励，甚至没有一句夸奖。他给的是一眼空着的灶。至于一眼空灶，是不是就足够了，罗老板的办法能不能搬到别的地方，是后面讲“保护”的时候要认真对待的题目，这里先按下不表。

– 三个好人，吵不起来的一架

再回到后厨，设想一个场景。有一天，三个人在后门口碰巧撞在一起：乔店长抱着一摞表，老板娘端着一盘刚点的菜，阿强拿着自选台的新规则。三个人心里都有点别扭，其实是想把话说开。

乔店长说：“员工餐是难得的创造机会，不能浪费。”

老板娘说：“员工餐首先是福利，吃得舒服比什么都重要。”

阿强说：“员工餐是大家自己的事，别安排我们。”

你会发现，这三句话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说服不了另外两个人。因为三个人用的是三把不同的尺子，量的是三种东西：新不新，舒不舒服，自不自由。尺子不同，没有办法比较，也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心服另一个人。

这不是三个人脾气不好，是一个结构：每一个人都把自己那条意义律，当成了判断这一锅的唯一读数。三个人谁也错得不多，谁也不能让这件事走下去，因为他们三个都站在“这一锅该有一个方向”这个共同的前提上，只是对“哪个方向”有分歧。

那个被三个人同时忘记了的前提是：这一锅现在也许根本没有方向。

这和卷一里三位哲学家的处境很像。皮尔斯、詹姆斯、杜威三个人，也是各自把一条意义律当作唯一的路标，三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他们共享了同一个动作：让路只听一条律。区别在于，那三位站在哲学的高处，说的是整个世界的路；后厨里这三位，说的是一口锅。可两边的动作是同一种动作，所以后果也是

同一种后果：被统一的那一条路上，没有地方留给“现在还不知道往哪走”的东西。

◆ 25.5　小结：判词和交棒

这一章讲了一件事：一锅粥是怎么被熬干的。

乔店长的新品研发会，老板娘的点菜制，阿强的自选台，三个办法，分别来自创造、幸福、自由三条意义律。每一个办法都是好意，每一个办法都有读数，每一个办法都在一个D1还没有出生的地方，提前给了它一个方向。

方向一给，一锅粥里的矛盾就变成了毛病；毛病一处理，燃料就少了；燃料一少，锅里就不再长东西。这个过程里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次禁止。

本章的判词：**每一步都要意义的地方，意义反而没有地方长；一锅粥不是死于被反对，而是死于被善意地帮助。**

后厨夜里的这个故事，没有讲完。乔店长后来是怎么想明白的，老何后来是不是又蹲回了那个台子边上，那一锅东西能不能回来，这些我们留到后面几卷再说。

不过，在往下走之前，要先走一段别的路。后厨的人至少知道自己在做饭，在吃饭。可如果有一种“没有目的”，不是发生在饭桌上，而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在他坐过了站、走了远路回家的那一段时间里呢？下一章，我们先下车。

◆

26

第26章

坐过了站

◆ 26.1　末班车前一班：多出来的四十分钟

上一章，后厨夜里那锅员工餐的故事停在半路：粥不是死于被反对，而是死于被善意地帮助。后厨的人，至少知道自己是在做饭、在吃饭。可有一种“没有目的”，不发生在饭桌上，而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在他坐过了站、绕了远路回家的那一段时间里。这一章，我们下车。

先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满脑子都是“这有什么用”，他怎样才能得到一段不问用处的路？谁来给他这段路？

答案常常很不体面：靠一次失误。

下面这一章里的小钱、老程和几位主管，都是构想的人物。小钱在县城一家电商仓库做打包，计件，一单几毛钱。有个周五，货多，他加班到九点半，下班时人已经散了架。他赶上了回出租屋的7路公交，车上暖气开得足，他靠着窗，眼睛一闭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车厢里只剩两三个人，窗外是一片他不认识的黑。他看了一眼报站的屏幕，坐过了五站。

他下了车，7路的尾灯刚好拐过路口。站牌上写着，周五晚上这个点，下一班要等四十分钟。风很冷。他摸了摸手机，打车软件上显示十八块。十八块，是他打包一百多单的钱。他把手机放回了兜里，决定走回去。

这一段路，他走了差不多五十分钟。

坐车的时候，街是窗框里的街，一格一格地往后掠，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停下来被他看的。走路的时候，街变成了脚下的街。人行道的地砖有一块是松的，踩上去“咔”地一响；一个修鞋的老头正在收摊，小马扎叠了三叠；一所中学的围墙里传出夜自习下课的铃声，铃声一落，墙头上亮了一整排窗；他经过一座桥，一直以为那是“城北”的桥，离自己住的城南隔着十万八千里，走到桥头才发现，从桥上往南望，竟然看得见自己出租屋那一片楼的灯光。

他站在桥上愣了一下。两块在他脑子里分得清清楚楚的地方——“城北”和“我住的地方”——忽然接在了一起。

到家的时候十一点十分，脚疼，一件事也没办成，比平常晚了四十分钟。他洗了把脸就睡了。

如果让一个只认“有用”的人来算这笔账，这个晚上是纯亏损：多走了路，丢了睡眠，什么也没挣到。

可是，故事还有后半截。

过了一个多月，7路因为修路改了道，站台上的人乱成一团，有人打电话问朋友，有人刷手机找替代线。小钱想都没想，转身钻进了一条巷子——那是他那天晚上走回家时经过的一条小巷，穿过去，正好能接上另一条线的站。他比别人早到家二十分钟。

这很容易让人下一个结论：你看，坐过站也是有用的。

但请先停一下。这个结论里有一个小小的偷换。那天晚上，小钱一边走一边冻得直哆嗦，他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倒霉”“明天还要上班”，没有一秒钟是在想“我正在积累一份关于这座城市的地理知识”。那条巷子、那座桥，都不是他“为了”什么而记住的。它们只是在脚底下一块砖一块砖地走过的时候，自己显露出来、自己接在了一起。后来碰上了修路，它们才碰巧被用上。

事后有用，和事前为了有用，是两回事。前者是路上长出来的东西，后来被用到了；后者是先有一个“用”，再按着它去走路。把前者说成后者，就是倒着写历史：看见一棵树结了果，就说这棵树当初“是为了结果”才长的。

坐过站的这段路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先记下来：它是意外腾出来的。小钱没有计划它，也没有人批准它。平时他的每一分钟都有主：上班的钟点归仓库，坐车的钟点归7路，回家以后的钟点归睡觉和明天。偏偏这四十分钟，哪一个主也没有。7路开走了，下一班没来，这中间的一块时间，没人管，也没有哪一把尺子能量它。

平时，小钱的每一分钟都有主，而且主人把账算得很细。在仓库里，他打一单包裹的时间，系统记到秒；上厕所的次数，组长心里有数；就连吃饭，也是掐着十五分钟。出了仓库，他的钟点归7路的时刻表；回了出租屋，归睡觉和明天的闹钟。这样一个人，要想得到一块没有主的时间，几乎不可能靠自己安排。能给他的，只有一次出轨。

大多数人的情形和小钱差不多。无主的时间，在我们的日子里不是常态，而是裂缝；只有在车坏了、航班晚了、会议提前散了的时候，才会漏进来一点。

再往深里看一层。小钱那天晚上之所以“接得上”，还有一个条件：他身体里是累的，心里是空的。如果那天他走回去的时候，一路在看手机上的新闻、回同事的消息、刷短视频，那座桥、那条巷子，就是从他眼角余光里漏过去的东西，一样也显不出来。所以，无主的时间，不光要“有”，还要“空”：不能刚腾出来，就被别的东西补上。今天的人，手里有一件很容易补缝的东西，一有空隙，就掏出来填满。裂缝漏进来的，常常还没落到地上，就被一块屏幕接走了。

这不是说手机有罪。想一想，同样是坐过站，二十年前的人没有手机可看，只能看窗外、看人、看自己的脚；今天的人有了手机，坐过站这件事的“无主”程度，就大不相同了。同一段时间，装进去的东西不一样，显露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

这一节的判词是：**一个人的路上，常常只有被意外腾出来的那一小段，才不归任何一把尺子管；而恰恰在那一段里，两块原本分开的地方，自己接上了。**

可是，意外毕竟靠不住。下一节要问：有没有人是主动走这样一段路的？他走的时候，到底在发生什么？

◆ 26.2　老程绕的路：一段没有意义目标的差异序列

县城东边的菜市场旁边，有个老程。他退休前在水泥厂管过仓库，如今六十出头，每天上午十点来钟去菜市场买菜。

买完菜，他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走过去十分钟；另一条是穿过两条老巷子，再从一家已经关门的粮站后墙边绕出来，要走二十五分钟。他几乎每天都走第二条。

邻居问过他，是不是大路上车多。他说也不是。问他是不是巷子里有熟人。他说也没有。问他是不是为了锻炼。他笑了，说锻炼的话他早上在小区里就做过了。再问下去，他就答不上来，只说：“走着走着就到了。”

我们不去猜老程“其实”是为了什么。我们要认真对待他的回答——他真的没有为了什么——然后问一个SDE的问题：这二十五分钟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先看路。老程的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每一步和上一步都不一样：这一块地是水泥的，下一块是青石的，拐过一个弯，风从巷子口吹过来，菜篮子的重量在右手，换到左手。一个差异接着一个差异，排成一条序列。这条序列是实实在在

地走着的，并不是“停着”。我们说它是差异序列在走——可是它没有一个“为了”：没有哪个终点在前面拉着它，也没有哪把尺子在旁边量它。

再看样子。巷子是怎样显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全在那里。先是一堵墙，墙上有一块被雨水泡出来的深色；再是墙根下一只趴着的猫；再是某家窗台上晒着的一排萝卜干；再往前，粮站后墙上有一行褪了色的大字。每一步，眼前的巷子都多显出一层，它是随着脚的前进一层一层显露的。老程若是坐在车里一晃而过，这些层，一层也不会显出来。

再看缠着的东西。老程的脚、他穿了十年的布鞋、鞋底磨偏了的那一边、他对这几条巷子几十年的熟悉、今天上午的天色、篮子里的豆腐——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拆不开。换了另一个人来走，同一条巷子，显出来的就是另一条巷子：一个刚搬来的外地人，看到的只是“一条脏兮兮的小路”；一个在这里长大的人，看到的是“我爸当年在这堵墙上写过名字”。

所以，溜达并不是“什么也没发生”。路在走，样子在显，土在缠，三样东西一样不少。它缺的只有一样：意义目标。没有一个“为了创造什么”“为了自己做主”“为了高兴”挂在这条路的前头。

我们得把这一点说准，因为它很容易被误认成别的东西。

它不是休息。休息是为了恢复，恢复了好接着干，那是有目的的，挂在“明天能更好地上班”上。老程不是在恢复，他每天都走，走完也没有觉得自己“充好了电”。

它也不是休闲。休闲这个词，在今天常常是“让自己舒服”的一种办法。你去按摩、去泡温泉、去看一场电影，为的是感觉好一点。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它属于幸福律的地盘：它有一个“我要舒服”的尺子在量着，量不到，就要换一家按摩店。老程绕路，不一定舒服——巷子里有风，有时还有狗。

它也不是自己做主。老程不是在练习“我可以选择我自己的路”，他没把绕路当成一次自由的宣言。

三条意义律——创造、自由、幸福——都不在他这二十五分钟的前头站岗。这是它跟小钱坐过站的唯一区别，也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两个人走的，都是一段没有意义目标的差异序列。小钱是被意外送进去的，老程是自己走进去的；小钱走得发抖，老程走得悠然。但在这一点上，两段路是一类的。

拿老程和小钱对比，还能看出一件事。小钱的那段路，是“被腾出来的”，所以它的无是干净的——他没有力气、没有念头去给它安一个目的。老程的这段路，是“自己留的”，所以他要费一点功夫守住它：有一阵子，邻居夸他“每天坚持走，身体好”，他听了高兴，又过了半个月，他发现自己开始数步数了。数到第三天，他把手机放回了抽屉，那条巷子重新变回一条巷子。

这个小小的插曲说明：主动留出来的无，有一种从内部被收编的危险。别人一句夸奖、自己一次计数，都可能让它悄悄挂上一把尺子。守着它，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件要时时留心的事。这一点，和后面第31章讲的“假溜达”是连着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对本书至关重要的问题：既然这段路里什么也没有“为了”，为什么我们说它重要？

因为老程每天走完这条路，有一些东西悄悄变了。他对这一片的熟悉，不再是“从A到B的最短路线”，而是一张越来越细的地图：哪家的墙根晒不到太阳，哪个路口午后会起穿堂风，哪户的小孩放学以后喜欢蹲在粮站墙边。这张地图不是他“画”的，是走出来的。有一回，菜市场里有个摊主急着找人给他爹送一包药，找不到跑腿的，老程说，我知道他家，从后巷过去，十分钟。他没有数过自己存了多少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在那里。

我们不能因此说“所以溜达是有用的”，否则就又走回了上一节那个偷换。这里想说的是另一件事：这类差异序列所显露出来的东西，当时没有被任何一把尺子打过分，所以它们才能长成尺子量不到的样子。一旦有尺子在前头量，路就会朝着尺子能量的方向走，别的就都被略过去了。

最后补一个小细节，是关于“没有尺子”的另一种读法。老程绕路的巷子里，有一家早年的杂货铺，如今只剩半扇门板，门板上还留着当年用粉笔写的价目，早已模糊不清。老程每次路过，都会看一眼，从来没想过要去查那家铺子是哪年关的、老板姓什么。这个“看一眼”，对他是没有后续的。可是，一条巷子的历史，就是靠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看一眼”，才没有彻底掉进水里。没有一个人需要为它负责，也没有一个人把它记在账上，但它在这些路过的眼睛里，被留住了一点点。

这一节的判词是：**溜达不是没有路，而是没有“为了”的路；因为没有“为了”，路上显出来的东西，才不会提前被削成某一把尺子的形状。**

接下来的问题就更尖了：既然这样的路这么要紧，那我们能不能把它设计出来，保证每个人每周都有一段？

◆ 26.3　瞄不准：意义的升维，为什么需要一段反意义

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有的经验。

晚上想睡觉，躺下了，却睡不着。你开始跟自己说：我得赶紧睡着，明天还有事。你越这么想，越清醒。你数羊，你调呼吸，你看一眼手机，发现已经十二点半，心里一紧——更睡不着了。

睡着这件事，有一个特别古怪的性质：你越是瞄准它，它越是离你而去。睡着，是在你不再盯着它的时候发生的。

反意义的那一段路，和睡着是同一类事。

先说什么叫意义的升维。我们平时说的“有意义”，是拿一把现成的尺子去量：这事能不能挣钱，能不能让孩子更好，能不能让自己活得舒坦。这些尺子都有。可是，有时候，一个人心里的尺子本身会换——不是量得更准了，而是换了一种量法。

回到小钱。坐过站之前，他对“回家”这件事的尺子是一把：越快越好，越省钱越好。路，就是成本。最好的路，是成本最小的那条。坐过站以后，走了五十分钟，他心里多了另一把尺子：这座城，我是能一路走出来的，它不是一格一格的窗框，而是我脚底下的东西。这第二把尺子，并没有取代第一把，可它给“回家的路”加了一层原来没有的意思：路，除了是成本，也是住所的一部分。

这就是升维。它不是在原来的尺子上多拿了几分，而是长出了一把原来没有的尺子。

现在问：这把新尺子，能不能用旧尺子的办法造出来？

不能。旧尺子只认旧尺子认得的东西。你拿“省时间”这把尺子，去量坐过站的四十分钟，它只会说：亏了。你拿“创造”去量，说不出这段路创造了什么；拿“舒服”去量，脚都冻疼了。三把现成的尺子，一把也量不出这段路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恰恰是还没有尺子。

所以新尺子要长出来，必须有一段路，是旧尺子暂时失灵的。这就是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而是意义的尺子暂时不工作的一段时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所有的路都在被旧尺子量着，走出来的东西，就只能是旧尺子认得的东西。

好，现在问题回到开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安排这样的一段吧——每周三下午，空出两个小时，不干正事，去溜达。

很多人会这样想，也有很多人真的这样做了。他们买了“留白”的日程表，下载了“放空”的软件。结果呢？常常是，两个小时坐在那里，心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现在到底放空了没有？我怎么还是没想到什么好点子？”

一旦你为了得到点子而去溜达，这个溜达就已经挂上了一把尺子：产出多少。它不再是反意义，它是一个换了衣服的创造律的任务。你把一段本来没有主的时间，重新认了一个主。

这就是“瞄不准”。反意义这件事，一瞄就不是了。

这里要提防一个反驳，它站得很有力。反驳者说：你的意思是，不能计划，只能碰运气？那岂不是把一切都交给偶然，任何人想要得到这种东西，只能等着坐过站？

不是这个意思。不能瞄准的，是它的“产出”；能够安排的，是它的“地”。

想想修车铺里谭师傅和徒弟小罗。谭师傅从没有“计划”过小罗在哪一天听出那一声“咔”。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小罗一辆一辆地听，听的时候不要求他说出什么。他给的是一块“地”，没有给“收成”的指标。如果他每天晚上都问小罗“今天听出了什么新东西没有”，小罗大概到现在也听不出来，只会学会编几句漂亮话来交差。

所以，安排的办法只有一条：留地，不下任务。留出一段没有主的时间、一块没有主的地方，而且守住这块地的“无主”——不检查，不打分，不追问产出。至于这块地里什么时候长出东西、长出什么，不去管。

这条办法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极难。难就难在：只要有人“留地”，就会有人想知道这块地的“产出率”。一旦有人开始算，这块地就从反意义变成了意义的一个附属部门。

再说一个小细节。小钱坐过站走回去，如果当天晚上，他在桥头想的是“哇，我发现了一条新路，明天可以告诉同事”，那么这条路对他就已经不是脚底下的东西，而是一件要拿去交差的东西了。那天晚上的好处，就在于他累得没有力气把它变成一件交差的东西。

再从三条意义律的角度补一句。为什么旧尺子量不出这段路？因为现成的三把尺子，正好各管一头：创造律问“长出了什么新东西”，自由律问“我多了哪些可选的路”，幸福律问“我现在感觉好不好”。小钱那天晚上的四十分钟，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创造，没有多出选择（他本来就只能走回去），一点也不舒服。三把尺子一起报“零”。可是，那座桥头的一愣，那条巷子，那种“城是我走得出来的”的感觉，确实发生了。三把尺子一起报零的地方，恰恰可能是第四把尺子开始长的地方。这是“反意义”最不好理解的一点：它在已有的意义账本上是一片空白，而空白，是新的一页能够写上去的前提。

那么，反意义和前两章讲的混沌，以及提过一笔的介生，是什么关系？

混沌是一锅粥，介生是正在成形。它们都是事情本身所处的状态：粥在锅里，样子在露头。反意义说的是人对待它们的姿势：不拿尺子去量。事情处在混沌的时候，才需要人用“反意义”的姿势去陪；事情已经定型，就可以也应该用尺子去量了。姿势要合着状态来。拿对待定型的姿势去对待一锅粥，就是上一章写的那种“杀”。

回头把睡不着的例子再想一遍，就能看清“瞄不准”的结构。睡觉这件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的条件和它的目标是同一个东西。睡着的条件是放松，放松的目标也是睡着；你为了睡着去放松，放松就变成了一个任务，任务一出现，就不放松了。反意义的结构，和它一模一样：要让意义升维，条件是尺子暂时不工作；可你为了升维去让尺子不工作，尺子就又上岗了。

遇到这种“条件和目标缠在一起”的事，直攻是攻不下来的，只能绕：不盯目标，去管条件的边缘。睡不着的人，不去想“睡着”，只去想“今晚把灯关掉、不看手机”。这两件事，都是边缘上的事，是可以安排的；而目标本身，只能自己来。

这一节的判词是：**意义要升一层，必须有一段尺子不工作的路；而这段路只能被“留”出来，不能被“瞄”出来——一瞄准，它就变回了又一个意义。**

那么，这段“留出来的无”，在整条路里到底站在什么位置？是路的敌人，还是路的一部分？最好的回答，不在哲学里，在一首歌里。

◆ 26.4　旋律与休止：歌里最长的那个“无”

找一首你最熟的歌，哼一遍。

哼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在哪里换气？哪一句和哪一句之间，有一个不发声的空隙？

如果你把所有的空隙都填满——每句尾巴都拖长，直到接上下一句的第一个字——你会发现歌变味了。不是难听，是不成其为歌了。它变成了一条不断的声音，像一根拉长的橡皮筋。旋律之所以是旋律，是因为音和音之间有长有短，有连有断，而最要紧的那几处“断”，是空的。

音乐里管这个叫休止。休止不是“没有音”的失误，它是谱子上被认真写下来的东西，有符号，有长短，要唱的人数着拍子不出声。一个新手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休止唱短——嘴巴停不住，怕冷场。老手把休止守满。他唱的休止那一拍，听的人是听得见的。

注意这一点：休止是听得见的无。它不是一块空白被两边的音夹着，而是两边的音因为它才有了形状。前一个音为什么听起来是“收住了”，是因为后面接了一个休止；下一个音为什么听起来是“新起的”，也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休止。

放回我们的论题：路上的每一步如果都被意义填满，就是一首没有休止的歌。

再说得细一点。把前面几章的东西，放进这首歌里来听：

- 音，是有意义的一步。它朝着某个创造、某种自由、某份舒坦。
- 休止，是意义不工作的一段。它不朝着任何地方，它只是等着。
- 旋律，是音和休止交织出来的整条路。

现在，看一个构想的场景。

某个城市的公交公司，调度室里来了一个新主管，精通算账。他看了一遍7路的运行表，发现一个“漏洞”：每辆车到了终点站，要停十分钟才发车。这十分钟里，司机下车透透气，喝口水，跟另一个司机说两句话，车厢里空着，一分钱不挣。他算了一笔账：把十分钟缩成三分钟，全线每天能多发十几个班次，运力提升一大截。

账算得没有错。每一个数字都是对的。

这是一个构想的例子，但这种算账，在任何一个讲效率的地方都有。我们不去说后果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想看这笔账的形状：它把终点站的十分钟，当成了一个“没有产出的空档”，打算用音把它填满。

可终点站的十分钟，是整条线路里的休止。司机在那十分钟里下车，喘一口气，检查一下轮胎，看一眼今天的天，跟同事交换一句“前面那段路在修”。这些事，没有一件写在运行表上，也没有一件算在“产出”里。可是整条线路

的“一天”，因为这十分钟，才有了起落——一趟一趟地跑下来，每一趟都是一首完整的小曲，而不是一根拉到天黑的橡皮筋。

把休止压成三分钟，头几天看不出问题。司机还是那个司机，车还是那辆车。可是慢慢地，一些东西开始松动：上一趟的疲劳带进了下一趟，两个司机之间不再有“前面在修路”那样的交换，那种不写在表上、却让整条线路活着的东西一点点薄了。几个月以后，发车晚点反而多了，因为每一趟的误差不再有地方被吸收。

我们不要把这个构想当作预言，只看它说明的一件事：休止不是旋律的浪费，是旋律的一部分。把它当浪费去压缩，是用一把量音的尺子，去量一个本来就不是音的东西。

还有一层，很容易被忽略：休止也不能想放多少放多少。

一首歌里，休止放得太多，歌就散了。休止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前后都有音，是被音“圈”出来的。老子说“当其无，有器之用”，碗中间的空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四周有壁。这个意思，到卷八再细讲。这里只取其中一半：无，是被有圈出来的无。所以反意义不是“整天什么都不干”，那样的无，既不成为休止，也不会升出新尺子。反意义是一整条有音的路里，那几处被守住的空。

为什么说“守”？因为在一个处处讲效率的地方，空，总是第一个被盯上的东西。每一个终点站的十分钟，都要靠有人守着，才不被压成三分钟。每一块谁也不管的空地，都要靠有人说“先别动”，才不被划成停车位。

不过，休止守得住守不住，还要看另一件事：能不能把它“安排”好？这一点，要借旅游团来看。

◆ 26.5　旅游团的“自由活动”：被安排的无，为什么不灵

前面说，反意义只能“留地”，不能“瞄准”。这个区别，在一个人人都见过的场面里最清楚：旅游团的“自由活动”。

大巴开到古镇，导游举着小旗说：“大家自由活动一个半小时，四点半准时回到这里集合。”

团里有一位阿姨，一进古镇就掏出手机，打开一个软件，搜“必打卡的十个点”。她看了看地图，算了算：一个半小时，走完十个点，每个点停七分钟，拍照，发朋友圈，配文字“古镇自由行，岁月静好”。她走得很快，回到集合点的时候，十个点都“到过”了，脚上起了泡，也说不出古镇的巷子里到底是什么味道。

团里还有一位大叔，一进古镇就钻进了一条没人去的窄巷，因为他看见一只猫蹲在门槛上。猫走了，他沿着猫走的方向拐了两个弯，在一个修伞的摊子前站了二十分钟，看那个师傅怎么把一根断了的伞骨接上。四点半，他差两分钟赶回集合点，空着手，什么也没拍。

两个人，都拿到了同一个“一个半小时”。这个一个半小时，在合同上、在导游嘴里，叫“自由活动”。但是看一看里面的东西：

阿姨那一个半小时，每一分钟都挂了一把尺子——到了几个点、拍了几张、发了几条。它从头到尾是一条被量着的路，名字叫自由，骨子里是一份完成度。大叔那一个半小时，没有任何一把尺子，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自由”。

这里的区别，不在于大叔比阿姨更高明、更有品位。阿姨有她的快乐，这份快乐是真的，属于幸福律那一片地，没有任何不对。要说的是：同样的一块“无”，被一个人拿去填满，被另一个人守住了。

再往前想一步：如果有一家旅行社，听了这个故事，决定“改进服务”——把自由活动的时间，设计成“沉浸式发现之旅”，给每位游客发一张“随机探索卡”，上面写着“请在巷子里找到三样让你意外的东西”。

那么，这块地就彻底没有了。“意外”被要求了，就不再是意外。游客们会低着头，对着卡片，找那三样“意外”。

所以，被安排的无，之所以不灵，不是因为“安排”本身有错，而是因为它在无里偷偷放进了一个任务。安排只能做到一件事：把时间和地方留出来，然后转过身去，什么也不问。导游那句“四点半准时回到这里”，其实是整个安排里最聪明的一句——它只守边界，不管里面。

这一节的判词是：**能被安排的，只有无的边界；一旦连里面也被安排了，无就变成了另一种有。**

◆ 26.6　小结：留下来的那一拍

这一章走了四段路：小钱被意外腾出来的四十分钟，老程自己留的二十五分钟，谭师傅那条“留地不下任务”的规矩，还有歌里的那一拍休止。四段路合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意义要升一层，需要一段尺子不工作的路；这段路只能被留，不能被瞄；它又不在意义之外，是被有圈出来的无。

反意义不是意义的敌人，而是意义的休止；没有休止的路，不是更有意义的路，而是一首唱不下去的歌。

可是，如果有人偏要把所有休止都填满，不是一个主管、一个旅行社，而是一整套哲学、一整个时代，会发生什么？下一章，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最坏结局：一种把“有用”推到底的思想，最后连“有用”本身，也杀死了。

◆

27

第27章

把有用推到底

◆ 27.1　只留有客的站：完全的实用主义怎样杀死实用

还是公交。这一回不是终点站的十分钟，而是整张线路图。

设想一个城市，叫它老城吧。老城有一套公交网，用了二十多年。有一年，公交公司请人做了一次“线路优化”：把全市每个站每天上下车的人数统计出来，客流最少的站，一律撤掉；腾出来的车次，加在客流最大的站上。

账面上，这是一次无可挑剔的优化。每一个被撤掉的站，都是“没有用”的站——一天上不了十个人，车每次进站出站还要耗时间。撤掉它们，整条线更快、更准点、更省油。第一年的报表非常好看。

两年以后，有一件事开始显出来：客流大的那几个站，客流越来越大；而全城的客流总量，却几乎没有增长。第五年，总量开始往下掉。

为什么？因为那些被撤掉的小站，不是一直是小站。城东一片刚建起来的新小区，头两年入住的人家没有几户，站牌底下一天确实只有七八个人，它被撤了。没有站，下班晚的人就不肯搬来；不肯搬来，人就更少；人更少，更没有理由恢复这个站。另一个方向，一条老街边的站，因为有一家小诊所，老人们一周来三次，客流不大却稳定，也被撤了。老人们不再来了，诊所关了门，那条街的店铺一家一家地换成了仓库。

把这件事讲成一个论证，一共四步。

第一步：说一样东西“有用”，永远是说它对某个“为了什么”有用。没有“为了什么”，“有用”这个词说不通。一个站有用，是因为有人要从这里上车去某个地方；这个“要去某个地方”，就是“为了什么”。有用是一个挂在目的上的词。

第二步：一个只认“有用”的做法，只能在已经存在的目的之内活动。每一步都要有用，意思就是每一步都要挂在一个现成的目的上。线路优化量的是“现在有多少人要从这里上车”，这是现成的目的。它量得非常准，但它只能量已经长出来的东西。

第三步：新的目的，不会从现成的目的里长出来。新小区的居民，在站建起来之前，还没有“要从这里上车”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站有了以后、人搬进来以后、日子一天一天过出来以后，才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新的“为了什么”，总是在一段还看不出用处的日子里先冒头的——那是一锅粥，是正在成形。一个每一步都要有用的做法，把这段日子当作损耗，一律砍掉。

第四步：砍掉以后，被量的东西本身会被改写。注意那个最要紧的转折：客流大的站为什么客流大？一半是因为人本来就多，另一半是因为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人才会往这里聚、往这里开店、往这里搬。量客流，量的是土已经长成的样子；可量完以后，又按量出来的样子把土压实了：大的更大，小的消失。这就是三原理里的回写，只不过这一次，回写的方向是把土变窄。

四步合起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把“有用”推到底的做法，会不停地消耗现成的目的，却不再让新的目的发生。现成的“用”，一件一件被用完、被压实；新的“为了什么”，没有地方长出来。到最后，有用的东西还摆在那里，可没有什么事需要它了。

这就是本书说的：完全的实用主义，杀死实用。不是一刀杀死，而是慢慢杀死——像这座老城的客流，先是升，然后平，然后降。杀死它的，不是别的什么敌人，恰恰是它自己最勤勉的那个动作：每一步都问“有什么用”。

这里要排除一个很自然的反驳。反驳者说：你描述的这种做法太蠢了，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不会这么干。聪明的人会知道，有些站要保留，有些时间要留白。

对，聪明人会。但请看这个“会”从哪里来。他之所以知道要保留，是因为他在用一把不是“有用”的尺子——他凭的是一种“这个地方将来可能长出点什么”的直觉，或者“这个站虽然没客，但它是个念想”的感觉。一旦他依据的是这一类东西，他就已经不是在“完全地”实用了。这样的人没有证伪本章的论证，他恰恰证明了：实用要想活下去，必须借着一些不属于实用的东西。

第一章里我们看到，皮尔斯的一生比他的理论更懂无用之用；这一章说的是同一个意思的另一面：实用主义的实用，靠的是它没有承认的那一部分。

再看这个杀法最后的样子，会有一点荒诞。设想二十年后，老城的公交网运行得极其顺畅：车准点，站整齐，司机训练有素，调度系统每天自动优化。只是有一天，人们发现，坐公交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公交不好，而是因为这座城的人，已经习惯了往那几个客流大的地方去，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理由去了。公交作为一件工具，毫发无损；可是它所服务的那些“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地缩小了。

一把扳手没有坏，只是再没有螺丝需要拧。这就是“杀死实用”的具体样子：用具还在，用处没了。

而且，这时候想救，会发现手里的办法也是旧的。想把客流找回来，只能再去量客流，再去加密班次，再去优化，用的还是同一把尺子。尺子越用，土越窄，土越窄，尺子越有理由继续用。这个圈，从里面是转不出来的，要转出来，

必须有一点不属于这把尺子的东西进来：有人愿意在一个“没客”的地方先立一个站，不问回报，等着。

这一节的判词是：**“有用”只能量已经长出来的目的，却把长出新目的的那一段日子砍成损耗；砍到最后，有用的东西还在，却没有什么事需要它了。**

可这样一种“死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死？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站上第178号书给它起过一个名字。

◆ 27.2　站名消失的那天：无死法死

老城的公交站，有不少老名字：磨刀巷站、铁匠铺站、油坊口站。这些名字，是几十年前那些行当还在的时候留下的，如今巷子里早就没有磨刀的了。

线路优化之后，站名也被“统一梳理”了一遍。新的站名，要“便于识别”“符合城市形象”：磨刀巷站改成了“文昌路北站”，铁匠铺站改成了“万和广场东站”，油坊口站并给了隔壁一个站。

没有人宣布“磨刀巷站”这个名字是错的。没有开会，没有投票，没有谁站出来说这个词不对。报站器里换了新录音，站牌上换了新字，一代年轻人上了车，只听见“文昌路北站到了”。

过了十年，老城里的人只剩一小半还记得“磨刀巷”。又过了十年，再没有人说起它。

请注意这种消失的方式：它没有被反驳，没有被判错，甚至没有被批评过一句。它只是没有人再用了。

站上第178号书讲罗蒂时，把这样一种死法记了下来，叫“无死法死”：一套说法，在只认“用不用得上”的世界里，不会被判成错的，只会被慢慢“过时”。过时，是一个很温和的词。它不带判决，不需要理由，也无法申诉。你不能去反驳“过时”，因为没有人说你错，只是没人再用。

这个观察和本章的论证是接在一起的。一个把“有用”当唯一尺子的世界，天然是这样一个世界：

它只有两种状态——用着，和没人用了。没有第三种叫“错了”。没有“错了”，就没有“为什么错了”；没有“为什么错了”，就没有人需要回头去查它是怎样来的、它当时在回答什么问题。一个说法、一个站名、一种做法，一旦“没人用”，它的来历就整个沉进水里，连同它曾经回答过的那个问题，一起消失。

换成SDE的话说：一样东西的同一性谱系，就是它“怎样一步步长成今天这样”的来历。在这样一个只有“用着/没人用了”的世界里，谱系是不需要被保存的——反正有用就用，没用就扔，谁去管它是怎么来的？于是，谱系的断裂成了日常：不是被谁砍断的，是没有人觉得需要接着。

站名的例子很小，可它是个干净的样本，因为它暴露了“无死法死”的三个特征：

第一，没有凶手。谁都没有做错事，每个环节都合理：统一站名是为了便于识别，便于识别是为了方便乘客，方便乘客是有用。

第二，没有尸体。磨刀巷站没有留下一个“死掉”的时刻。你找不到哪一天它死了。

第三，没有申诉的门。因为从来没有人说它错，所以也没有人需要为它辩护。它被拿走的时候，连一个辩护的位置都没有留。

这第三点，是最要紧的。一种东西被判错了，至少还有一个“我不服”的出口：你可以去证明那个判决不对。可是“没人再用了”，是一个没有出口的状态。

还要补一句：站上第178号书把这种死法放在罗蒂的语言论上说，我们这里把它拿到一个公交站名上来，不是要说两者一样，而是要借它认出一种形状——死得没有声响，也没有理由，只留下一片越来越窄的“还在被用着的东西”。

回到上一节的结论。完全的实用主义杀死实用，用的就是这种死法：它不批判，不禁止，甚至不反对，只是不再给没有立刻用处的东西以“用”。于是，混沌不被反对，介生不被反对，它们只是“没有人再来了”。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死法为什么特别难防。

一般的错误，会留下痕迹：做错的事，有人受伤，有人抱怨，有人要追责，于是事情被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大家争论，最后改。可是“无死法死”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受伤，因为它从来没有“为谁”而存在过。磨刀巷站改名那天，没有一位乘客因此耽误了行程，没有一个人为此打电话投诉。它的损失是一种不在账上的损失：下一代人少了一个可以问“为什么叫磨刀巷”的机会。问这个问题的那个孩子，也许就是将来对这座城的来历着迷、去做地方史、去做老街保护的人。他的“问”，被一块新站牌悄悄拿走了。可谁也不会知道，因为一个没被问出来的问题，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所以，对这种死法，光靠“出了事再改”是来不及的。它要求人在事情还没出的时候，就记得有些东西是不在账上的。

这一节的判词是：**在一个只认“用不用”的世界里，东西不会被判错，只会被遗忘；而被遗忘，是一种无处申诉的死。**

那这种死法，是不是有几种不同的样子？三条意义律——创造、自由、幸福——各自走到极端，会怎么死？

◆ 27.3　三条路的三种死法

把前面的线路图换成三个构想的场景。每个场景里，我们只让一条意义律走到底，看它杀死什么。

场景一：创造律走到极端——线路天天改。

设想有一个主管，他信奉的是“创新”。他认为，线路最怕的就是一成不变。于是，每个月，他都推出一版“新线路”：站点调一调，走向拐一拐，号码换一换，说是要“持续优化”“保持活力”。

第一个月，市民觉得新鲜。第三个月，有人开始迷路。到了半年，老年人彻底不坐公交了，因为“今天的7路还是不是昨天的7路”，谁也说不准。每一版新线路，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一条线路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不变——正因为它不变，人才能把自己的日子挂在上面：我每天七点二十在这个站上车，上车的时候和几个熟脸点点头。

创造律的极端，杀死的是“存量”。一切都要新，新就变成了一次性的东西。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活过一个月，也就没有什么能够积累起来，没有积累，新就没有可以站立的地方。最后，什么都是新的，什么也没有被创造出来。

场景二：幸福律走到极端——一路舒服。

设想另一个主管，他信奉的是“让乘客满意”。他把所有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一项一项地消掉：太挤，加车；等得久，加密；要换乘，开直达；站多了嫌慢，减站；座位硬了，换软座。他的满意度调查，一年比一年高。

问题出在最后一步。直达、不换乘、不拥挤、不等待——这样一条线路的极限是什么？是每个人一辆专车。而每个人一辆专车的城市，是一个堵死的城市。舒服到极致的那一刻，路也走不动了。

在堵死之前，还有另一种更隐蔽的死：乘客渐渐忘了“到了”是什么感觉。一个从来没有等过车的人，不会知道车来的那一刻的轻松；一个从来没有挤过的人，不会知道座位空出来时的小小欢喜。幸福里有一部分，是靠不舒服衬出来的。把不舒服全部消掉，幸福被自己的尺子磨平了。

幸福律的极端，杀死的是“落差”。没有落差，舒服就没有读数。

场景三：自由律走到极端——招手即停。

再设想第三个主管，他信奉的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他想，为什么乘客一定要在固定的站上车？应该全线“招手即停”，想在哪儿下就在哪儿下，每个人的行程都不应被站点捆住。

于是，司机每隔五十米就要停一次。一趟车，原来四十分钟，现在要一个半小时。更糟的是，车厢里的人开始互相抱怨：我要赶时间，你们怎么都在半路下？每一个人的自由，成了另一个人的障碍。

一个“站”之所以是站，正是因为大家愿意放弃随处上下的自由。这个放弃，不是自由的损失，而是公共的路能存在的条件。自由律走到极端，就会把所有这样的“放弃”一概看作限制，一个一个拆掉。拆到最后，没有人真正能走到想去的地方，因为路已经不再是一条路了。

自由律的极端，杀死的是“承诺”。一个什么都不用承诺的世界，什么也无法托付。

三个场景放在一起看。

创造走到极端，杀的是存量；幸福走到极端，杀的是落差；自由走到极端，杀的是承诺。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任何一条律自己能够长出来的。存量是时间攒出来的，落差是不舒服衬出来的，承诺是放弃了一部分自由换来的。每一条律领头的时候，都在花另一条律替它存着的东西。

三个主管错在哪里？不是他们信的东西不好，而是他们让一条律一年四季领头，不肯让位。创造在该让位的时候不让，就吃掉了存量；幸福不让，就吃掉了落差；自由不让，就吃掉了承诺。后面第九卷用一座茶园讲这件事：一年里采、养、歇轮着来，三条律也该轮着领头，该让位时让位。三条律是轮着领头的邻居，不是可以各自一路冲到底的三辆车。轮着，才有存量、有落差、有承诺；谁霸着不放，吃掉的就是它自己明年的口粮。

也许有人会说，这三个场景太夸张了，现实里没有哪个主管会走到这一步。确实，现实里谁也没有走到底，大多是走了一半，被一个什么东西拉了回来：或者是老司机一句“这样不行”，或者是市民的一通投诉，或者是预算不够。注意，这些拉回来的力量，没有一个是“更高明的有用”。它们是另外几条律、另外几种土，在旁边顶了一下。这恰好说明本书后面的主张：不是靠一条律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刹车，而是靠三条律互相拉着。哪一天旁边没有人顶了——比如某个地方的所有人都信了同一条律——那就是真正危险的时候。

还有一个提醒：三个场景里的主管，没有一个是坏人。他们每个人信奉的东西，单拿出来看，都是好东西：创新、满意、尊重选择。杀死一件事的，往往不是坏念头，而是一个好念头不受拉扯地走到了头。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死法最难防：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在做坏事。

这一节的判词是：**任何一条意义律被推到底，都会吃掉另一条律为它守着的东西：创造吃掉存量，幸福吃掉落差，自由吃掉承诺；最后吃掉的，是它自己。**

有人读到这里，也许会急着下一个结论：那是不是该反对实用？

◆ 27.4　反实用主义不是反对实用

先说清楚一件事：没有人要把公交线路的客流统计表撕掉。

线路优化是有价值的。把一个客流稳定、运力不够的站加密班次，把一条绕得不合理的线路拉直，这些都是对的。一个城市如果不算账，它的公交会烂成一团。街口炒粉摊要算每天卖几份才不赔本，修车铺要算零件的进价。这些账都不能不算。

再多说一句，免得误会：本书没有说“无用比有用高级”。把无用供起来，当成一种新的高贵，同样是一种统一，只是把尺子倒过来用。有用与无用不是上下两层，而是同一条路上的两种季节。该量的时候量，该留的时候留，两样都不可少。

所以，反实用主义，如果被读成了“别算账”“别问有什么用”，那就是把本书读反了。

本书的立场，是三层意思。

第一层：实用是真的，有用就是有用。一把能拧紧螺丝的扳手，就是有用的扳手。一条能把人安全送到的线路，就是有用的线路。这些判断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来撑腰，它们有它们自己的地面。三位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而且对得很了不起：他们把哲学从空中拉下来，让它对着扳手和线路说话。

第二层：实用有一个适用的地盘。这个地盘，是那些已经定型的事——目的清楚、路径清楚、可以量结果的事。在这个地盘里，“有什么用”是最好的问题。

第三层：实用的地盘之外，还有两片地。一片是混沌，一片是介生。这两片地里，“有什么用”是一个问错了时候的问题。问错时候的问题，不是一个“不够好”的问题，而是一个会造成伤害的问题，像你对一粒刚埋下的种子问“什么时候结果”，它回答不了，你还会因此忍不住去刨开土看。

所以，反实用主义不是“反对在实用的地盘里讲实用”。它反对的是另一件事：把实用的地盘，当成了整个世界。

用我们的公交来说：线路优化可以做，但得有一条规矩——每次撤站之前，先分清它是“老站”还是“新站”。一个已经跑了二十年、客流稳定的小站，量它的客流，是公平的。一个刚建的小区门口的站，量它的客流，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的“用”还没有长出来。两种站，用同一把尺子，这就是错。

那么，实际做事时，怎么分辨眼前这件事在哪一片地上？这里不给公式，只给三个朴素的问法，都是日常里随手可用的。

第一问：这件事有没有人说得清“它是什么”？街口那个炒粉摊，每天卖多少份、成本多少，说得清，那是定型的地盘，算账天经地义。可摊子旁边那几个晚上聚在一起、不点菜只坐着聊天的老主顾，他们聚在一起算是什么？说不清。说不清，不是说坏了，是说还在成形。

第二问：这件事一问“为了什么”，它是回答得出来，还是一问就散？回答得出来的，可以量。一问就散的，别急着问。

第三问：如果现在把它拆了，拆的理由里，有没有一条是“它没产出”？如果拆它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一条，而它又处在说不清、一问就散的状态，那就该停下来，多看一眼。

这三问不是检验标准，而是一种提醒：在一个处处讲效率的地方，需要有人在撤站之前，先停一下。

还有一个小心眼，需要拆掉。有人可能想：那我就把“反意义”也算作一种“有用”好了——溜达有助于创新，休止有助于旋律，混沌有助于将来的秩序。这样一来，大家就都心安理得了。

这个想法的毛病，我们在26.3节已经遇到过。把无用说成“间接的有用”，是又一次统一：所有东西，不管直接还是间接，都挂在“有用”这根线上。这和皮尔斯把混沌收进“将来会长出来的东西”里，是同一个动作。它保住了无用，也同时取消了无用。

本书说的无用，是一个更硬的说法：有一些东西，它的价值，根本不是靠“将来的用”来给的。澡堂里的几个钟头，不是为了镇上的修路意见而存在；修路意见只是它偶然长出来的一枚果子。如果有一年，这些老头一句有用的话也没有说，那几个钟头，仍然是澡堂的几个钟头。

那么，一个实用的人，怎样与这样的东西相处？

办法很朴素：给它留地，不问它的用。并且，要随时能分清，眼下这件事是在哪一片地上。这个分辨，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一遍一遍地练，像听惯了发动机的人那样：听多了，才会分辨“这是一团正在成形的东西，别碰”和“这已经定型，该量一量了”。

至于怎样识别，怎样保护，边界又在哪里——哪些时候，反意义必须让位给意义，比如救一个落水的人，不能先溜达一会儿——这些，要留到后面的卷里细讲。这里只立一条：反对的不是实用，反对的是只有实用。

这一节的判词是：**实用有它的地盘，本书不反对地盘里的实用；它反对的是把地盘当成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把所有尚未长出用处的东西，当作损耗。**

◆ 27.5　放进三个方程里看：谁把谁压平了

把前面的故事，放进三个方程里再看一遍，会看得更清楚。

老城的公交网，有三样东西：站和线路摆出来的样子（显露，S）；一天一天的上下车、撤站、加班次（差异序列，D）；以及这座城的人怎样住、怎样做买卖、怎样往哪里聚（纠缠，E）。

第一个方程说，样子是路和土一起做出来的（S=F(D,E)）。站点的分布，不是线路优化师一个人画出来的，是历年的客流（路）和这座城里人的居住、店铺、日子（土）合起来做的。

第二个方程说，路是样子和土一起推着的（D=G(S,E)）。今年往哪里加车、往哪里撤站，是由现有的站点分布（样子）和这座城的聚集方式（土）共同推着的。

第三个方程说，土本身也被样子和路一次次改写（E=H(S,D)）。这最要紧。一个站撤了，附近的人家搬走，店铺换成仓库——这座城的“土”变了。土变了，下一年的客流（路）、站点的分布（样子）都跟着变。

现在，把线路优化放进去：它是一个把第二个方程里的一小格——客流这个读数——统一了的做法。它只让“路”听客流的，让“样子”（站点）和“土”（居住和店铺）都听客流的。三个方程里，两个被压住了。

压住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见了：第三个方程里土的改写，完全听了路的读数，于是大的更大、小的消失。这是一个自己加速自己的圈：量得越准，土被压得越实；土被压得越实，下一轮量出来的就越像上一轮。圈转几圈，剩下的是一个极其整齐、极其高效、也极其窄的城市。

这和第三卷讲过的美国土的故事，是同一个形状的小号版本：一个统一的路，借着回写，把多样的土压成一样。

而“平衡”的意思，在这里也就清楚了：不是在三个方程里选一个当裁判，而是让三个方程互相拉着。量客流可以，但客流不能单独决定站点；站点可以引导客流，但不能不管这座城的居住和日子；土的变化要被看见，被当作下一轮的起点，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外部因素”。

具体到撤站，一个平衡的做法，大概会这样想：这个站，客流低，是因为它本来就是死站，还是因为它是个新站、土还没长？问得出这个问题，要有对这座城土的来历的认识——这个小区是哪年建的，入住率多少，规划里还有多少房子没交付。这就是后面要讲的同一性谱系：看清一片土一步步怎样长成今天这样。

这一节想说的是：公交的例子看上去小，其实它用三个方程做了一次完整的验证。一把尺子，只要不被另外两个方程拉住，就会借着回写，把自己量的东西变成唯一的东西。

换到个人身上，同一个形状也看得见。一个人若只按“这对我有什么用”来交朋友，起初很高效：每一个来往的人，都挂在一个具体的好处上。可几年下来，他会发现，能叫得出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因为那些“现在还看不出用处”的熟人，一个接一个被他放掉了。真到了需要人的那一天，他翻遍通讯录，找不到一个可以不讲理由就打电话的人。尺子量的是已有的往来，量完以后，又把往来压成了尺子的形状。小到一个人，大到一座城，圈的样子是一样的。

这一节的判词是：**统一了一把尺子的做法，会通过回写把土压成这把尺子的形状；平衡的意思不是少用尺子，而是让尺子被另外两个方程拉着。**

◆ 27.6　这个论证怎么才算错

最后，按照这本书一以贯之的规矩，我们要问：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就说明本章是错的？

第一，如果能找到一座城市，几十年只按“有没有用”这把尺子来安排公交站，而且整体客流一直在稳步增长，新小区、新街区也一直在被带起来，同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借用了“这里将来也许会长出点什么”的判断——那么，“有用只能量已长成的东西”这个论点就站不住了。

第二，如果有人长期坚持每一刻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活，从不留一段没有主的时间，而他的尺子，却一次次地被更新——他不断地长出了原来没有的新尺子，而这些新尺子的来历，查下来全是他事先设定的目标的延长——那么，“升维需要一段反意义”也就错了。

第三，如果一首歌里去掉了所有休止，听的人仍然认为它是旋律，而且比原来更好听——那么“休止是旋律的一部分”就错了。（这个很容易试：把一首熟歌的间隙拿掉，哼给身边的人听。）

第四，如果有人拿到一块“留给无用”的地之后，在里面不问用处、不打分、不追问，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十年二十年过去，他的尺子一把也没有换，他的世界一点也没有宽——那么，“无用的地对升维是必要的”这个判断，至少在这个人身上，就不成立。我们不怕这样的反例，只怕没人去找。

这四个检验，有的需要很长时间，有的一分钟就能做。写在这里，并不是要谦虚，而是要让这个判断留下一扇可以被推翻的门。一个没有这扇门的判断，本身就是又一个统一。

◆ 27.7　小结：第二刀，与一扇门

把第26、27两章的故事收起来。

小钱因为坐过站，被意外送进了一段没有主的路；老程每天主动绕一段没有“为了”的路。这两段路里，路在走，样子在显，土在缠，只缺意义目标。意义要升一层，需要这样一段尺子不工作的路，但它只能被留，不能被瞄。休止是旋律的一部分，终点站的十分钟是整条线的呼吸。

然后，我们走到了另一头：把有用推到底的做法，会只在现成的目的里打转，砍掉新目的赖以长出来的日子，并且借着“无死法死”的方式悄悄完成。三条意义律各自走到极端，吃掉的恰是邻居为它守着的东西。

回头看这两章，有一个容易漏掉的要点：小钱和老程走的路，一个是意外，一个是日常，却都没有谁来表扬。这很重要。无主的时间，往往得不到任何奖励：没有人给坐过站的人发奖状，也没有人给绕远路的老人记工分。在一个处处讲“产出”的地方，没有奖励的东西，很容易被当作不存在。所以，守住这类时间，常常是一件孤单的事，需要有人在没有掌声的地方，仍然愿意让它在那里。

所以本章的判词，也是本书的第二刀：

完全的实用主义，不是更彻底的实用，而是实用的自杀；因为“用”需要不断有新的“为了什么”，而新的“为了什么”，只能从尚无用处的日子里长出来。

第一刀（第1章）砍的是：实用主义拆掉了S维度的形而上学，却立起了D维度的形而上学。第二刀砍的是：这个D维度的形而上学，一旦彻底，会连自己的根一起拔掉。

到这里，读者会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我们一直在说“混沌”“介生”“正在成形”，说它们脆弱，说它们不能被问用处。那么，这两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它们是同一回事吗？古人看见过吗？

导论里，我们提到老子和庄子早就看见了“无用之用”。但他们看见的，是整锅粥的那一头。海边渔村里的老人说“海是有脾气的”，他看见了海的混沌，却没有看见——或者说，没有单独讲——混沌之后、定型之前，那一段刚刚露头、一碰就散的东西。

下一卷，我们回到老子和庄子，去读他们的“无”，也去看他们的“无”里，缺了什么。

◆

卷　八

介生卷

卷　序

混沌和定型之间，有一段“正在成形”的日子：样子刚露头，说不清，一碰就散。老子讲了混沌，没有讲介生。这一卷试着把它讲出来，讲怎样认出它、护住它，也讲清楚它的边界：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

28

第28章

老子见到了混沌，没有讲介生

◆ 28.1　陶坯阴干时最怕碰

县城西边有一家陶器作坊，老板姓蔡，做了三十来年的缸、盆、罐。（这是一个构想的作坊，用来讲一件很多手艺人都懂的事。）

作坊后院有一排木架子，架子上摆着刚拉出来的坯：腌菜的坛子，装米的小缸，花盆，还有几只蔡师傅给孙女做的、歪歪扭扭的小碗。它们不是泥了——泥是软的，一捏就变形；它们也不是陶——陶要进窑，烧过才叫陶，烧过才敲得响、盛得住水。它们在中间，叫“坯”。

坯在架子上要阴干。这个“阴”字很要紧：不能晒，不能吹，不能放在风口，要放在背阴通风的地方，让水分慢慢地、均匀地走。快了不行。一边干得快，一边干得慢，坯就会歪，会裂，有时候你早上看还好好的，下午去看，口沿上裂了一道细缝，那一窑里的这一只，就算废了。

新来的学徒总是忍不住去碰。

刚拉出来的坯，墙还软，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学徒知道不能按，可他忍不住想看看：“是不是干了？”于是用指甲轻轻点一点，留下一个小小的月牙印。又或者想把歪了一点的口沿“扶正”，用手指一抹。蔡师傅从不骂，只是说：“你让它自己待着。”

有一年，一个年轻的学徒问他：“师傅，那它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好？我总得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吧？”

蔡师傅想了想，说：“它现在不算怎么样。”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糊弄人，其实是老实话。**一只阴干中的坯，没法回答“它现在怎么样”**。说它是泥，不对，它已经有了形；说它是陶，不对，它离能用还差一把火；说它“半成品”，也不准——“半成品”好像是说，它已经成了一半，只要再加上另一半就行，可坯不是这样，它的每一刻都在变：水在走，墙在缩，整个坯在悄悄收紧，收紧的方式一半由泥性决定，一半由这几天的天气决定，还有一半由它放在架子上的哪个位置决定。这几样东西不是排着队、一样一样起作用的，它们是缠在一起的，谁也拆不开。

可蔡师傅也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每天早晚各绕架子走一圈，只用眼睛看：坯的颜色从深变浅，是水在走；口沿有没有起一道发丝似的线；哪一只离窗口近了、受了风。看出一点苗头，他才动手——不是去碰那只坯，而是把它连同底下的板子一起，往里挪一挪，或者拿一张旧报纸，松松地搭在风口那一侧。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手艺：看得很仔细，手伸得很少。新手以为“保护”就是不管，老手知道“保护”是另一种管。

有一回，一个学徒问他：“师傅，你每天绕两圈，到底在看什么？”他说：“看它有没有话要说。”学徒笑了，以为是玩笑。其实这是实话：一只坯在变坏之前，总会先露一点小小的信号，只是你得肯一连几天站在那里看。

上一章的最后留下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路说“混沌”，说“介生”，说“正在成形”，混沌和介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古人看见过吗？古人看见了混沌，可混沌之后、定型之前，那一段刚刚露头、一碰就散的东西，有没有人单独讲过？这一卷，就从这个问题接着走。

前面几章讲过一种需要暂时不被问“有什么用”的东西：一锅粥似的混沌。还有一种，要在这一卷才正面去讲。

它不是一锅粥。蔡师傅院子里的泥巴堆，才是一锅粥——一堆泥，怎么揉、怎么摔、怎么拍，它都还是一堆泥，没有谁会为它的“样子”担心。它也不是定型。窑里出来的陶，你随便敲，随便搬，磕一下也不会散。

阴干中的坯，是第三种东西：**样子刚刚露头，说不清它是什么，一碰就散**。

这一种东西，本书叫它**介生态**。“介”是“介于其间”的介，也是“介入”的介——它正好卡在混沌和秩序之间，也最怕被人介入。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放在蔡师傅的架子上，不去动它。因为接下来要看的是一件让人有点意外的事：中国思想里最会谈“混沌”和“无”的两位老人，老子和庄子，几乎把这架子上的每一样东西都摸到了——泥、器、空、凿——唯独没有把这个架子本身，当成一个值得单独说的地方。

这一章就是要看清：他们看见了什么，漏掉了什么，又为什么偏偏漏掉这一段。

为什么要在两位老人身上花这么大力气？因为本书一路走来，已经几次借过他们的话。导论借过“当其无，有器之用”，第22章讲过庄子的“无用之用”。他们是中国思想里替“没用”说话最早、也最好的人。如果连他们都没有把“正在成形”单独讲出来，那就说明这块地方不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而是一块很难站上去的地方。弄清楚难在哪里，比单单宣布“这里有一块空白”要有用得多。

◆ 28.2　老子：混成、朴，和“当其无”

作坊里有一口泥池。新运来的黄泥倒进去，加水泡开，学徒要光着脚下去踩，踩匀了捞出来，再用手一块一块地揉，把里面的气泡和沙粒赶出去。

这个时候的泥，没有名字。它不叫缸，也不叫盆。你问蔡师傅这团泥是干什么的，他会说：“还没说呢，看它。”

如果要在中国思想里找一个站在这口泥池旁边的人，那一定是老子。

老子看混沌，是看得非常准的。《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开头一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后面接着说，它寂静，空旷，独自立着不变，到处运行不停，可以作为天下的母亲；然后是一句“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只好勉强叫它一声“道”。

这几句里有两样东西，是要看清的。

第一样：混成。不是“空”，不是“没有”，是一团东西，混着，还没有分开。就像池子里那团泥，里面有沙，有水，有气，有黄的有灰的，可你没法说它是哪一样。

第二样：不知其名。他不是说“这东西很神秘”，他是说“我没法叫它”。凡是有名字的东西，已经是定了型的东西——叫“缸”的，是已经有了缸的样子；叫“盆”的，已经有了盆的用处。混成的东西，名字还没有来，叫它什么都是勉强。

第二十一章里，他又写了一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然后接着一句我们应该停下来看的话：“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在恍惚里面，有“象”，有“物”。

这几乎已经走到了架子旁边。“象”，不就是刚刚露头的一点样子吗？可是请注意老子接下来干什么——他没有停在这个“象”上，他继续往上说，说这个恍惚的东西“其精甚真”，说他是靠它来看“众甫”，也就是万物开始的样子。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往根上看的：这个恍惚的东西是万物的老根、总源头。“象”在他这里，是道的面貌，不是某一件正在成形的东西的面貌。一只坯

在架子上露头的那一点样子，和“道中有象”，不是一回事。前者是这只坯此刻的事，后者是宇宙的老根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老子不是也讲“生”吗？《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不正是一个发生的次序吗？

是发生的次序，但它是层次的次序：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万物，说的是“多”怎样从“一”里分出来，像一棵树怎样分杈。它回答的是“万物从哪里来”，没有回答“一件东西刚冒头的时候，它是什么样、怕什么”。再看第十六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万物一齐生长起来，他说，我是用来看它们回头的——看它们怎样各自回到根上。他的眼睛盯着的是根，是来处，也是归处，不是路上。

再看第二十八章。这一章里有一个字，是他的心头好：朴。

“朴”，本来是没有加工过的原木。他说，要“复归于朴”，回到那块没雕过的木头；然后一句：“朴散则为器。”

这一句让人想起那口泥池，也想起泥池之后的事。朴散而为器：整块的、没有分开的东西，散开了，一件一件的器就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发生图景：从浑然一团，到一件一件。

可是这一句里，老子的态度，是值得细读的。“散”——这个字不是好字。散是散掉，是不再完整。他接着在三十二章里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一开始制作、分别，才有了名字；名字有了，就要懂得止步。他看这个“从朴到器”的过程，看的是一次让人警惕的离开：离开了完整，离开了不分，离开了没有名字的状态。所以他的方向，是要人“复归”——回去。

这里要对老子公道一点，因为他看得太准了，他不是漏看了这条路，他是把这条路看成了一条下坡路。从朴到器，是往下的；人的功夫，是往回走。

最后，才是第十一章。这一章导论里已经引过：“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埏埴”就是和泥。）整章三个例子：车轮的中间是空的，所以车能用；泥揉成器，中间是空的，所以器能用；房子开了门窗，中间是空的，所以房子能用。最后一句收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一章是老子给“无用之用”这个思想打的地基，下一代的庄子在它上面盖房子（那是第22章讲过的事，这里不重说）。我们只借它看一件事：第十一章里每一个例子，都是已经成了形的东西。车是成形的车，器是成形的器，室是成形的室。他问的是：成了形的东西，它的用处到底在哪里？答案很美：在它的“无”里，在中间那一块空。

可是请想想：那只在架子上阴干的坯，也有“中间那块空”。它的“用”，会不会已经在那里了？不会。因为它的中间，今天是空的，明天可能收缩、变形、塌口——这块“无”本身也还在成形，它还不能被当成“用”来使。

把老子这四个地方排在一起，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图：

一头是混成，是朴，是泥池里那团没有名字的东西——他看得极准，写得极好。另一头是器，是成了形的东西——他对这一头的分析，也极精彩：器的用，在它的“无”里。中间那一步，他用的字是散，是制，是始有名——他把它看成一个必要却需要警惕的转折，一个人要懂得“知止”的地方。

他有一个混沌，有一个器，有从混沌到器的一条路；但那条路他当成转折，不当成一个地方。他没有说：在这条路中间，有一个东西，它自己的脾气是怎样的，它怕什么，它需要什么。

《道德经》里还有一处，离这个地方很近。第十五章里，他问了两个问题，大意是：谁能让浑浊的东西，在静下来之后慢慢变清？谁能让安稳的东西，在长久的动之后慢慢生出新来？问的都是一个“慢慢”。这是老子书里少有的、

对“慢慢成形”的关心。但这一章的收尾，落在“保此道者不欲盈”上，是让人少欲，守住。他关心的是一个人的修养——怎样让自己慢慢清、慢慢生，而不是那个正在慢慢成形的东西本身需要什么。

所以，老子见到了混沌，也见到了器，甚至在恍惚里嗅到了“象”、在“徐生”里碰到了慢。但他没有把介生态，单独地、当作一个地方，讲出来。

这里有一个值得多想一下的地方：老子漏掉介生，不只是疏忽，也是方向使然。他的路是“复归”——从器回到朴，从有名回到无名，从多回到一。一个一心往回走的人，路过那只架子时，自然只会看见“这是一个正在离开朴的东西”，不会看见“这是一个正在长向什么的东西”。他的眼睛朝后，而介生的头，是朝前冒的。

他看得很准，只是朝着另一个方向。

下一步，我们去看庄子。因为庄子写过一个故事，那里面恰好有“七天”。

◆ 28.3　庄子：七天里发生了什么

有一年，蔡师傅的一个远房亲戚来作坊玩，是在外面做设计的，看见架子上那排坯，满心欢喜，又觉得可惜。

“这么好的坯，怎么就光溜溜的？”他说，“我给你们画个花样，刻几道纹，卖相好多了，也卖得上价。”

他是真心的。他拿起一根竹签，就要往一只半干的罐子肩上划。蔡师傅伸手拦住了，笑着说：“现在不行，它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呢。”

亲戚没听懂，也没生气，只是觉得师傅守旧。

这个场景，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写过，写得比我们狠得多。《庄子·应帝王》的最后，是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大意是这样：南海的帝叫儵，北海的帝叫忽，中央的帝叫浑沌。儵和忽常常在浑沌的地界上相会，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商量着怎么报答，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喘气，唯独浑沌没有，我们试着给它凿出来吧。于是一天凿一窍，到了第七天——“七日而浑沌死”。

故事很短，值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第一，凿的人不是恶人。儵和忽是两个“迅疾”的帝（“儵忽”就是转眼的意思）；浑沌待他们很好，他们想报答。动机是善的，是感恩，是替对方着想。后来的人读这个故事，常常记住的是“死”，忘了前面是“好意”。浑沌不是被仇人害死的，是被恩人救死的。

第二，他们凿的理由是“有用”。人都有七窍，是用来看、听、吃、喘气的。这几个窍，就是“用”。别人都有“用”，你没有，那怎么行？这个想法，和“这个罐子不刻个花卖不上价”是同一个想法：一样东西，要有明确的功能，才算完整。

第三，他们太快。这一点常被略过。“儵忽”两个字，本来就是“转眼之间”的意思，是两位出了名的快手。更要命的是那一句“日凿一窍”：一天一个，每天不落。他们的好意，是用一个定好的节奏来办的。而蔡师傅的坯，要的是“阴”，是慢，是看着天气和泥性再说。好意加上快，才是致命的。如果儵和忽肯等，肯三天只看不凿，故事也许是另一个故事。

第四，他们是拿“别人”当尺子。“人皆有……此独无有”——大家都有，你没有。浑沌的毛病，只在于它不像他们。一个已经定了型的世界（人，有七窍），拿自己当标准，来看一个还没分出来的东西。

庄子把这四层写在不多的几句话里。这就是他的高明。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庄子没有问的问题。

“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七天里，每一天，那东西是什么？

第一天，凿了一窍。那个东西有一个孔，别的地方还是浑然一团。你说它是浑沌吗？它已经被开了一个口。你说它是一个人吗？它连脸都没有。

第三天，有三窍。第五天，有五窍。到了第六天，只差最后一个窍，眼、耳、口、鼻几乎都有了，它长得快像个人了——可它还是死的，或者说，正在死。

请停在第四天。这一天，凿了四窍，还剩三窍没凿。你要是在这一天走进浑沌的地界，看到的是什么？不是原来那个浑然一团、待客甚善的浑沌，也不是将来那个七窍俱全的“人”。它有了几个口，有了一点听和看的能力，却还没有学会怎样用，也没有谁问过它愿不愿意。它正处在最不稳的地方：既失去了原来的安稳，又没有得到后来的完整。

在庄子笔下，这七天只有一个意思：倒计时。每过一天，浑沌就离死近一步。这七天里的任何一刻，都不被看成是一个“东西”，只是“浑沌+几个窍”，也就是“没死透的浑沌”。

这就是问题所在。

庄子看出了一件极重要的事：你不能用外来的、现成的、“有用”的模子，去一点一点地改造一个还没成形的东西——越改，它越死。这个判断，我们完全同意，它也是整本书的底色。

但庄子只能用两个字去说这七天里的东西：浑沌（还活着），死（已经没了）。他没有第三个字。在他的语言里，要么是混沌，要么是被凿死的混沌。这中间每一天的东西，他看见了，但没有名字，也没有位置。

这不是批评。这是准确地指出，一个思想的边界在哪里。

为了公平，应该看看庄子在别处有没有走近这个地方。有。《养生主》里的庖丁，给文惠君解牛，说起自己的功夫：“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刚学的时候，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三年后，眼里看到的是牛身上的缝。这是一个关于慢慢成形的故事——一个人的眼睛、手，怎样在一年又一年里，从笨拙变成通透。

庖丁说的这个过程，是庄子对“长出来”最细致的一次描述。可你看他的落脚点：他讲的是庖丁的“技”如何进到“道”，讲的是人的修养怎样到顶。成形的是那位解牛的人。他没有回过头来，替那个正在成形的“东西”本身，想一想：那个三年里，既不是新手、也不是庖丁的庖丁，那段日子，他怕什么，需要什么，被谁碰了会散。

这样，我们就能把两位老人放在一起看了。

老子看见了混沌，也看见了器，把中间那一步当成了转折，叫它“散”，叫它“制”。庄子看见了混沌，也看见了混沌被开窍的过程，把这个过程当成了死亡，叫它“七日”。

两个人都走到了架子旁边。老子从泥这一头走过来，说：“当心，一散开就有名字了，就离道远了。”庄子从器那一头走过来，说：“当心，一凿开就有用了，就把浑沌杀了。”

也许有人会问：庄子不是早就替没用的东西撑腰了吗？“无用之用”，不是正好把这一块护住了吗？

没有护住，因为“无用”和“还没有用”不是一回事。“无用之用”说的是：一样东西被判定为没用，所以不被砍、不被取，反倒活了下来。这个“无用”是一个结论，是拿定型的眼光量过之后得出来的。而架子上的坯，不是“没有用”，是“用还没有长出来”；它头上顶着的不是一个结论，是一个还没到的

时间。把“还没有”当成“没有”，保护就保护错了地方：你会去护它的“无”，护不了它的“生”。

老子和庄子警告的方向正好相反，可警告的都是同一件事：别太早把它变成“有名有用”的东西。

他们没有说的，是：如果不凿，也不散，那么，在混沌和器之间，有一个什么，需要我们怎样对它？

◆ 28.4　为什么这一段，最难被看见

回到导读里那位卖炒粉的老周。他回家试酸笋炒粉，试了三个晚上。下面的细节，是顺着导读往下设想的。

第一个晚上，他把酸笋切碎了丢进锅里，味道冲，粉也炒散了，他倒掉了。第二个晚上，酸笋先焯了水，味道柔了一点，可又太淡，没有“那股劲”。第三个晚上，他把酸笋汁收进炒粉的最后一步，粉上了色，香气出来了。他端给老婆尝。老婆说：“这回有点意思了。”

现在请问：第二个晚上那一盘，是什么？

它不是“酸笋炒粉”，因为还不是——真正的酸笋炒粉是第三个晚上才有的。它也不是“失败品”，因为第三个晚上的做法，是从它里面长出来的；没有这盘淡的，就不会知道要把酸笋汁留到最后。它不是一团混沌，因为已经有了方向——酸笋，炒粉，那个“劲”。

老周自己也说不出它是什么。要是那天晚上有熟客问他“这是什么新菜”，他只能说：“还在弄。”

这一盘东西，在他心里占着一个非常实在的位置。可是，它在任何一份“菜单”里，没有位置。

为什么这一段，最难被看见？至少有四层原因。我们一层一层说，因为这四层原因合起来，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老子、庄子这样的眼光，都在这里停了脚。

第一层：它没有名字，而语言偏爱已经定型的东西。

名字总是给那些站得住的东西起的。“缸”是给缸起的，“盆”是给盆起的。一样东西在站稳之前，没有谁会给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因为它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

老子说“吾不知其名”，这是他对混成之物的诚实。可对于介生的东西，连“勉强叫它一声”都很难。因为你一给它起了名字，比如叫它“酸笋炒粉”，它就被你的名字拉着往那个方向走了——名字是一只手，把它从半空里拽了下来。我们的语言里有很多词形容混沌（“乱”“糊涂”“一团”），有很多词形容定型（所有的名词），形容“刚刚露头”的词，少得可怜：“苗头”“端倪”“雏形”“有点意思”，都是些靠近的、偏边的词，而且全带着一个“等着长成什么”的意思。

再看作坊里的窑口。一个学徒跟着看火，连着几天，总觉得火“有点飘”，可又说不出哪里飘。师傅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因为他确实说不出来。师傅没有追问“怎么个飘法”，只说：“你再看。”（这也是一个构想的场景。）

那几天，学徒眼睛里的东西，没有名字，也没有用处，却是后来他能一眼看出“火色不对”的前身。他没有词来说它，别人也没有词来问它。这种时候，沉默不是没有东西，是没有词。

第二层：它一旦长成，就把自己的来历藏起来了。

买一口缸的人，看到的是一口缸。他不会想：这口缸，三天前是一只在架子上随时会裂的坯。缸一烧成，它的“成形”就被忘了，剩下一口“本来就是缸”的缸。

蔡师傅自己也是这样。你问他当年是怎么学会看坯色的，他会摇头：“看着看着就会了。”那几年里无数次的“好像不对”“好像有点意思”，一旦会了，就全忘了，只剩下一句“看着看着就会了”。

这是一种很深的遗忘。回头看的人，总是从“结果”往后看，于是所有的路都显得是直的，所有的东西都显得是本来就要长成这样的。这正是前面说过的“发现学”的毛病：把一样被生成出来的东西，当成本来就在那里。长成之后再看，介生期的那一段，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你没法回忆一段自己当时也说不出是什么的时间。

第三层：看它，本身就是碰它。

蔡师傅的徒弟想知道坯干没干，用指甲点了一下，坯上留了一道印。这就是介生态的难处：它要被认出来，却不能被碰；可我们认识一样东西的所有办法——问它、测它、评它、给它起名——全都是碰。

认识混沌，用不着多少精细的办法：一锅粥就在那里，你搅不坏它。认识定型的东西，各种办法都使得上：敲、量、称、试。只有介生，你一用平时的办法，它就变了，就不是你想认识的那个东西了。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困难：认识的方式，和被认识的东西，天生有点冲突。

第四层：价值的尺子，两头都够不着它。

“有用”这把尺子，量的是定型的东西：这口缸能腌多少菜，这盘粉能卖多少钱。它量不到介生，因为介生还没有“用”可量。

另一把尺子，是“无用之用”这把尺子，量的是混沌：那团泥，那个澡堂，那段闲聊，没有目的，却养人。这把尺子也量不到介生，因为介生已经有了方向——老周的第二盘粉，已经朝着“酸笋炒粉”去了，它不是毫无目的的闲聊，它只是目的还没长出来。

所以，在“有用”的世界里，它是一盘失败的炒粉；在“无用”的世界里，它又不够闲散、不够纯粹。它既没有“用”可以被夸奖，也没有“无”可以被供起来。一件东西两头都没人替它说话，它就很容易被丢掉。

四层原因叠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局面：中国思想里最会讲“无”的两位老人，走到了这个地方，各自留下一句警告，就继续赶路了。

这不是他们的失职。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最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

那么，今天为什么能把它讲出来？不是我们比两位老人高明，而是手里多了一样东西：把一件事看成“显露、差异、土”同时在走的眼光。有了它，就不必一定要等到一样东西有了名字、有了用处才看见它；可以在它显露了一两层、差异才连起几个、土才刚缠上的时候，就认出这是另一副面孔。老子、庄子手里没有这副眼光，他们只有“混”和“器”、“无”和“有”这样两头的词。他们到得了的地方，比我们想的要远得多。

◆ 28.5　小结：架子上的东西没有名字

老子给了我们泥和器，给了“当其无”。庄子给了我们凿子，给了“七日而浑沌死”。他们之间，那只在架子上的坯，没有人给过它一个名字。

判词：老子见到了混沌，庄子见到了混沌之死，而在两者之间，那段样子刚露头、说不清是什么的“正在成形”，他们都看见了，却没有谁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地方，单独讲出来。

这一段难讲，是因为它没有名字、会被忘记、一碰就变，而且两头的价值尺子都量不到它。

还要说一句，这一章在全书里的位置。前面说过，混沌里谈不了意义，因为方向还没有；而“步步要意义”的手，会把混沌熬干。这里的介生，是同一个故事的更脆弱的一段：方向已经冒了头，却还没长实，这个时候最容易被一个现成的、借来的方向顶替。越是靠近成形，越容易被“有用”的尺子看见，也就越容易被它改写。完全的实用主义，不仅杀死混沌，它杀得更多的，也许是这一段。

下一章，我们就在这里，把这个地方指出来，给它一个名字——介生态——并且问：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几副面孔，又需要什么样的保护。

◆

29

第29章

介生态：样子刚露头的那一段

◆ 29.1　一只碗的墙，往上长到哪一圈算数

蔡师傅教新学徒拉第一只碗，从来不讲道理，只讲手。

一团揉好的泥放在转盘中央，转盘转起来，学徒两手蘸水，拇指往泥团中间按下去，按出一个窝，再用两只手一里一外，托着泥壁往上提。泥壁一圈一圈地长高、变薄。

整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可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时刻。

在泥壁长到某一圈的时候，学徒会忽然觉得，手底下的东西“像碗了”。不是碗，只是像。壁还软，口沿还在抖，厚薄不匀，高矮也没定。这个时候，学徒的手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这东西在往上走，可它一点力气也没有，全靠手在两边托着。你再多提半分，它塌了；你手一抖，它歪了；你想改一下它的弧度，它就整个坐了下去，成了一团软泥。

学徒第一次塌了，会很懊恼，赶紧把那团软泥抓起来，重新揉一揉，再放到盘上。

这个动作，其实包含了一个非常好的区分。

那团软泥，被你抓起来再揉，它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它是混沌：怎么摔、怎么砸、怎么拍，都还是一团泥，没有谁会为它“可惜”。

窑里出来的碗，是定型：你磕一下，它不会散；你拿去装饭，它不会塌。要毁它，得用力砸。

唯有手底下那一圈、那一刻的东西，是第三种。它不是泥团，因为它有了往上走的方向，有了“像碗”的样子；它也不是碗，因为这个样子没有自己的支撑，全靠当下这一串细细的手上的动作——不停地提、托、收，一个小差异接着一个小差异——才撑住。一停，一抖，一碰，它就散。

散的时候，它不会“掉一块”，它会整个回到泥团。可那个回去的泥团，已经不是你刚放上盘子时的那个泥团了——那一刻的手感、那一圈的壁厚、那一个“差一点就成”的弧度，没了。你可以重来，但重来的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介生态的样子。我们可以把它的三个特点说清楚：

一、样子刚露头。不是没有样子（那是混沌），也不是样子稳了（那是定型），是刚刚显出来一点。它的“形”，是随着手的每一个动作，一层一层往外显的，每一层都只是一个截面，后面还要变。

二、说不清它是什么。你问学徒：“手里这个是什么？”他会说“在拉碗”，可这只“碗”究竟会是一只深碗、浅碗、还是一只钵，要等最后几圈才知道。老周的第二盘粉，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不知道会长成酸笋炒粉，还是长成别的什么。“说不清”不是它在躲，是它自己还不知道。

三、一碰就散。因为它的形没有自己的力。定型的东西，形是自己撑着自己的；混沌的东西，没有形，不存在“散”；唯有介生，形已经有了，却要靠外面的力和里面的差异，一拍一拍地撑。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半成品”吗？

不是。**“半成品”这个词，里面藏着一台先装好的机器**：它假定有一个已经定好的终点——成品，现在走了一半。可手底下那只碗，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成一只碗。它也许最后是一只钵，也许因为口沿起了裂纹，被学徒一拍，回到

了泥团。老周的第二盘粉，也不是“一半的酸笋炒粉”，因为酸笋炒粉是第三个晚上才被发生出来的；第二个晚上的时候，它还不存在。

把介生态看成“没做完的定型”，是把一个正在发生的东西，写成了本来就有答案的东西。这一点，本书不能让步。

如果用本书的话来说，手底下那一刻是这样的：显露的样子，只显了最前面的一两层；差异序列，才连起了几个差异，后面还是空的；土，也才刚刚缠上，泥性、水分、手劲、转盘的速度，每一样都还在试探对方。三样东西都在，哪一样也没有站稳。**介生，就是三样东西同时“刚刚”的时候。**

还有一点也要说清。站上第170号书讲过，一锅粥的混沌、正在成形、定型，是同一件事的三副面孔，不是三级台阶。这个提醒很重要，本书全部接着用：介生态不是混沌和定型之间一个必然的中转站。手底下那只碗，可以塌回泥团，那就是由介生退回了混沌；也可以停在“像碗”的那一圈上很久很久，永远不被烧成什么；也可以一口气跳过去，直接烧成。三副面孔，可以交替出现在同一件事上。

同一个动作——“用手按一下”——落在三副面孔上，结果完全不同。按在泥团上，泥团多了个坑，揉一揉，什么事也没有。按在烧好的碗上，碗纹丝不动，你的手指倒是红了。按在刚拉起来的湿坯上，一个指印留在那里，坯的整个弧线都变了，那个指印以后会一直待在这只坯里，烧成了陶也不会消失。

一个动作，三样后果：没后果，没反应，改写一生。越是靠近“刚露头”，越是一碰就留下痕迹，而且这个痕迹会被后来的一切接着往下写。这是介生与另外两副面孔最根本的不同，也是后面所有“保护”的由头。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副面孔单独拿出来说？

因为三副面孔里，只有这一副，**怕人**。

混沌不怕人。你可以搅它，它还是一锅粥。定型也不怕人。你可以用它，它还是那口缸。介生怕：你不小心的一句话、一个问题、一次想当然的“帮忙”，就把它推回了混沌，或者逼成一个它本来不会长成的定型。

所以，要想知道什么叫保护，首先要知道，被保护的东西，到底长什么样。

◆ 29.2　介生的三副脸：露在样子上、露在路上、露在土上

介生态不是只有一个样子。同一只坯，你站在不同的地方看，它露出的“刚露头”是不一样的。

我们仍然在蔡师傅的作坊里找例子，各找一个。要事先说清：这三个例子，不是把一件事拆成三块，各讲一块；而是同一类事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各露出它最明显的一面。每一例里，另外两面也都在。

– 露在样子上：口沿上那一点点外翻

作坊里有个学徒，来了半年，拉出来的碗都中规中矩。有一天，蔡师傅在架子上看到一只碗，口沿比别的碗多出了一点点极小的外翻，像人说话时嘴角微微一撇。他蹲下来看了很久。

学徒自己没觉得有什么。他说：“是我手滑了。”

可蔡师傅又看了他下一批碗，发现那一撇出现了第二次、第三次。不是手滑，是手腕在提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他自己不知道的习惯性动作。这个动作一次一次留下来，那一点外翻就一次比一次明显一点。

这就是露在样子上的介生：一个新的轮廓，刚刚冒出一个角。

它有三个标志。第一，很淡——淡到当事人自己都没看出来，旁人要蹲下来才看得见。第二，说不清这是毛病还是风格——这一点外翻，如果再多一分，是歪了；少一分，是没有；刚好在这里，是“有点东西”。第三，它是靠一串动作

撑着的：不是学徒“决定”要做外翻，而是他每一次提到最后一圈，手腕的一个小差异，加上泥的软硬、转盘的快慢、那天的湿度，一次一次地把它“托”出来。

有人会顺口说：这是这孩子的“天赋”，手上有灵气。这句话听着是夸，其实有一个暗处的毛病：它把那一撇说成了一样早就装在学徒身上、只等冒出来的东西。可那一撇不是“本来有”，是在这半年的提、托、收里，一次一次长出来的；换一个师傅，换一种泥，它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冒头。说它是天赋，就看不见它是怎么长的，也就不知道该怎样不去碰它。

这个时候最怕什么？怕有人说：“口沿应该是圆的，你这个不标准，改过来。”标准的圆口沿是现成的、定型的样子，你拿它去比，这一点点外翻立刻变成了“错”。再有人好心地说：“这个很特别，你要保持啊！”学徒一紧张，手腕反而僵了，下一只碗，外翻没了。

被夸，也会散。这一点，后面还要再说。

– 露在路上：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小动作

蔡师傅的儿子在外地读了几年书，回来后在作坊角落占了一块小地方，开始捏一些小东西。一只鸟，一个小罐，一块不规则的、中间挖了个洞的泥片。

捏了半个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蔡师傅的老伴忍不住问：“这些东西，卖得出去吗？”儿子说：“不知道。”又问：“你捏它干什么？”儿子也答不上来，只说：“捏着舒服。”

后来有一天，他在那只鸟的肚子里留了个孔，对着孔一吹，发出一声很清的“嘟”。第二天，他开始琢磨怎样让孔的位置、大小各变一点，会出什么声音。再过几个月，作坊里多了一种小哨子，赶集时摆在摊子上，孩子们很爱买。

这就是露在路上的介生：差异序列刚起了个头。

请注意它在什么地方“介”。最开始的半个月，是一串很小的差异：今天捏鸟，明天捏罐，后天捏有洞的片。这些差异连成了一条细线，但这条线还没有方向。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没有谁在拉着谁走。方向——也就是“为了什么”、也就是前面一直在说的意义——还没有长出来。

这是一个关键的地方。“这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个方向。方向没长出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不是难回答，而是根本无从回答。

更糟的是，被逼着回答的时候，人总能找到一个答案。“我想做点好卖的东西。”（创造？）“我想让作坊多个收入。”（幸福？）“我想自己说了算，别老做缸。”（自由？）——这些答案都是现成的、体面的、从三条意义律里随手拣来的。可是，这些意义是借来的，不是这串小动作自己长出来的。儿子一旦把借来的意义当成方向，往后捏的每一只鸟，都会朝着“好卖”去捏，那个哨子的孔就不会被发现。

被问“有什么用”，不会让一条路走歪；它让一条还没有方向的路，被迫接过一个别人的方向。

借来的方向和长出来的方向，差别在哪里？长出来的方向，是这串小动作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步的结果都回头改了下一步：那个孔吹出了“嘟”，他才想到换孔的位置。借来的方向，是先有了目标，再让动作去凑：想“好卖”，就去捏好卖的样子。前者有回写，后者只有执行。有回写的路会遇见意料之外的东西，只有执行的路，只能遇见它预先想到的。

还有一层，值得在这里说穿。回头看儿子捏的那些东西，你想问：他是在创造吗？他捏着舒服，是在追求幸福吗？他占一块角落、不肯照父亲的路做缸，是在争自由吗？三种说法都说得通，没有一种说得死。在介生的这一段，创造、幸福、自由三条意义律还没有分家，它们混在这串小动作里，像一团还没拧开的

线。你急着问“他到底是哪一种”，就是逼着他从三条里挑一条——哪怕你是出于好奇。他一挑，那条线就被拧向了一边，另外两条被收进去当配角。这就是前面说的“借来的方向”：不只是借别人的，也是借现成的三条律中的某一条。介生要的，是在分家之前，先让它自己长。

— 露在土上：新土还没有跟窑认识

去年，作坊从山里挖来了一批新土，颜色比平时用的深一点。蔡师傅试着做了几只，装进窑里。

第一窑出来，有的发灰，有的开了细裂。他说，是烧得急了。第二窑，他把火压了压，裂的少了，可颜色不对。第三窑，他又换了一个装窑的位置，这回颜色有了，可有几只底下起了小泡。

徒弟问：“师傅，是土的问题还是窑的问题？”

蔡师傅摇摇头：“不好说。这土，还没有跟咱们的窑认识。”

这一句话，说得极好。它说的是露在土上的介生：纠缠刚刚结起来。

这批新土，单拿出来化验，能说出很多数据；这座窑，单拿出来也有它的脾气。可是“这土在这窑里会是什么样”，在两者第一次碰面之前，谁也不知道，碰了几回之后，也只知道一点点。土的特点里，已经含着窑的火；窑的脾气里，已经含着这批土的水分。你没法把“土的毛病”和“窑的毛病”拆开来，因为在它们刚缠在一起的时候，毛病本来就不是任何一方单独的。

这就是为什么蔡师傅说“还没认识”。不是谁出了错，是两样东西正在彼此长进对方的特征里去。

蔡师傅说，要烧过四五窑，才算“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他把土弄懂了，是土和窑一起有了一个双方都认得的样子：火该压到哪里，装窑该放在哪一层，这批土该多加一成沙。这些做法，既不写在土的说明书里，也不写在窑的使用手册里，它们是在四五窑里，一点一点长在土和窑的“之间”的。

这类介生，最难在于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对象，所以也就没人认领。土的供应商说：“我的土没问题。”窑工说：“我的窑一直这样。”两句话都对，那批发灰的坯偏偏没人负责。

人和人之间，也有这样的时候。一对新搬进一个家的人，过了半年，家里有一种“气氛”在慢慢成形：说不上是谁的功劳，更说不上它好不好，只是有一天孩子放学回来，书包一放，肩膀松了下来。你要是在那个时候问：“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家？”一句话就把它问假了。（导论里留着的那一格“尚未发生”，说的就是这一类：我们还没有办法把这种场的介生，显露成可以讲的样子。本书在这里只指一个方向，不替它下结论。）

– 三副脸，是同一只坯

把三个例子合起来看：

口沿上的外翻，样子在露头，可那是手腕一串动作留下来的（路），也是泥、转盘、湿度一起托出来的（土）。儿子的鸟，路在起头，可那只鸟的轮廓一天天出现在泥里（样子），也是在这间作坊、这堆泥、这个想捏点东西的人身上缠出来的（土）。新土与窑，土在结起来，可它每天以一只发灰的坯、一个小泡的样子露出来（样子），是蔡师傅一窑换一个办法试出来的（路）。

三副脸不是三种东西。是一只坯，从三个方向看，各有各的“刚露头”。认出介生的时候，常常是先从某一副脸上看出苗头——这就是下一章要讲的“征兆”。而要保护它的时候，三副脸各自怕的东西，又略有不同：样子怕被拿去比标准，路怕被逼着交代用处，土怕被拆开去追究责任。

这一点，我们放到下一章去细讲。现在，要先问一个更前面的问题：既然这一段这么宝贵，为什么我们早就听到过“正在成形最宝贵”这样的话，却还是没有见到一套专门保护它的办法？

◆ 29.3　“宝贵”还不够：介生要的是另一种护法

去年秋天，县里文化站的人来了作坊，说这是一门老手艺，很宝贵，要挂一块牌子，叫“手作体验点”。（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牌子挂上去，隔三差五就有学校组织孩子来参观。

来的人都很客气，都说好。每一批孩子来，带队老师总希望他们“看到最精彩的”，于是对蔡师傅说：“能不能让学徒当场拉一只碗？孩子们最想看这个。”

学徒被二十几双眼睛围着，手心出汗，泥壁一圈一圈地提上去，提到那个“像碗了”的时候，有孩子“哇”了一声，学徒手一抖，壁塌了。孩子们笑了，老师说没关系，再来一次。

第二次，学徒拉得很稳，稳得谨慎，每一圈都不出错。那只碗很标准，很端正，没有任何毛病。

也没有任何东西。

蔡师傅事后感慨了一句：“这一年，咱们院子里没出过一只新样子。”

注意，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坏心。挂牌子的人觉得它宝贵，来参观的人觉得它美，学徒想把活儿拿出来见人。每一个人都在重视它。可是，这种重视，一次一次地，把一个正在成形的东西，拉到了灯底下。

这就带出了这一章最重要的问题。

— 站上第133号书说过一句：正在成形最宝贵

站上第133号书读皮尔斯时，读出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一个纯粹的秩序也是死的，而“正在成形最宝贵”。这个判断完全对，本书也一路接着用。皮尔斯晚年所写的“玩味”，被那本书看作一种“受保护的混沌”——一个人不带目的地游荡，让一些念头慢慢浮上来。

本书在这个判断上，往前走三步。

第一步：宝贵，不等于被保护。

人对宝贵的东西，第一个反应往往是：拿出来。夸它，展示它，评价它，推广它。这些都是爱，也都是碰。蔡师傅院子里那一年，就是证明：重视来得越勤，新样子出得越少。

所以，“正在成形最宝贵”是一句价值判断；而介生需要的，是一套动作。有了判断，没有动作，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最顺手的动作，就是把宝贝端出来。

第二步：混沌的保护办法，和定型的保护办法，都救不了介生。

混沌的保护，主要靠“留白”。给它一块地方，一段时间，不要求出东西，就是玩味，就是澡堂，就是溜达。这对一锅粥有用，因为一锅粥不怕放着。

定型的保护，主要靠“规矩”。给它一个规格，一套制度，一份保养手册。这对一口缸有用，因为缸是自己撑着自己的。

可介生既不能光放着，也不能照规矩办。

光放着，会怎样？坯不转向，靠风的那一面干得快，就会裂。蔡师傅每天早晚绕着架子走两圈，正是因为“放着不管”也会死。介生不是自己在安安静静长大，它每一刻都在向两边偏。

照规矩办，又会怎样？再设想一个场景：作坊来了一个讲究的管理员，主张“所有的坯一律阴干七天，才许入窑”，贴在墙上。结果夏天的坯一律提前干透了，冬天的坯一律没干透，裂的、潮的一起来。规矩是定型的东西，它对每一只坯一视同仁；可每一只坯的此刻，都是不一样的。这又回到了本书从头到尾反对的那个错：只统一路，不问土。

所以，介生需要一种既不是留白、也不是规矩的保护：**看得很仔细，手伸得很少**。蔡师傅挪一挪板子、搭一张报纸，就是这种保护。

第三步：为什么偏偏是这样？因为介生靠的是一口还没有喘完的气。

用我们的话来说，介生态是一种“两样东西正在顶撞”的状态。口沿外翻的那只碗：学徒手腕的那个小习惯，和泥、转盘、湿度一起，在顶着、磨着，顶出了一点新的轮廓。这股顶撞一天一天积着，一旦成了形，这个新的轮廓就会被写进下一只碗的起点。这是它发生的过程：张力积累，形状改变，回写进下一次。

现在看看，各种“好意”都在干什么。

有人说：“这个口沿不标准，改过来。”——这是用一个外来的、现成的样子，把那股顶撞压掉。张力没有了，新轮廓没有长成，下一只碗的起点没有改变，这件事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像水撤了火，不是沸腾，是凉回去了。

有人说：“这个很特别，你保持住！”——这是把一个正在变的轮廓钉死。它不再被顶撞推着走，成了一个要被“维持”的东西，也就成了新的标准。

有人说：“你这个做来干什么用的？”——这是逼它在顶撞完成之前，先交出一个用途，让一个还没长出的方向被一个借来的方向顶替。

如今这样的“好意”比从前多得多，也方便得多。一个人刚有一点想法，手机一举，发出去，几分钟之内就有人点赞，有人评论，有人问“这是什么”。点赞是打分，评论是评价，那句“这是什么”是追问用处，三样东西一次性到齐。从前要隔着一道院墙才能做到的“端出去”，现在是一个动作。

压掉、钉死、顶替，三种都是在顶撞走完之前，拿走了它。介生的保护，说穿了，就是让这股顶撞，能走完它的路。

还有一个陷阱要提前说破：保护，千万不能变成一套新的监管。有人听说介生宝贵，第一反应是建一个“孵化区”，设一个评审，给在里面的东西按期打分，看谁“孵”得好。这样一来，评审的目光比参观的孩子还要重，分数比点赞还要硬。介生的护法，是尽量少地出现在它身边，而不是多派几个人守着。

前面读《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时，我们碰到过“知止”二字，知道止步，才不会陷入危险。老子说的是人面对名字、面对制作时的克制。放到作坊里，这句话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样子：知止，是看护的人，在手想伸出去的那一刻，把手收回来。蔡师傅挪板子之前，要先在心里数一数，这一下是帮它，还是帮自己安心。这样的“知止”，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做得恰好。

— 所以，需要的是“专门的护法”

到这里可以说清楚了：为什么“正在成形最宝贵”这句话，还不够。

一、因为宝贵的东西，天然会被重视，而重视会变成碰。二、因为现成的两种保护——留白和规矩——都对不上它：它既不能放，又不能规定。三、因为它靠的是一股还没走完的顶撞，任何在中途拿走这股顶撞的好意，都是伤害。

所以介生需要的是一套专门的保护动作：认得出它，不去问它用处，不去给它打分，给它时间，给它一块不会被打扰的地方，而且看得仔细。

先用蔡师傅的院子，把这几个动作的样子大概描一描，细节留给下一章。

不问用。架子上的坯，没有人问它“你将来装什么”。装什么，是出窑以后的事。

不打分。没有人对哪只坯说“这只最好”“那只不行”。连夸也尽量少，因为夸也是分数。

给时间。阴干就是阴干，三天不够，五天；天气不好，再等。急不得。

给场地。架子放在背阴通风的角落，不是放在门口。不是藏起来，是放在一个不会被人随手拿起来看的地方。

这四样，没有一样是“做”了什么，全是“不做”什么。可它们又不是什么都不做：蔡师傅早晚各绕一圈、挪一块板子，也是这套办法的一部分。看护的手，一半在收，一半在伸。站上第291号书里有一章，对介生的保护有一笔提示，只是点到为止；下一章，我们把它一条一条展开。

在展开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但容易被忽略的提醒：

这一套保护，不是为了让介生永远“介”在那里。好的坯，最终要进窑，该成形的要成形。保护它，是为了让它按自己的路走到该定的时候，而不是被人在半路上拉出来、拍扁、或者端到灯底下。

保护的目标，从来不是留住“正在成形”，而是留住“成形”这件事。

◆ 29.4　介生的时候，“谁带的头”还没有答案

外翻的口沿，后来怎么样了？

设想它活了下来。半年以后，作坊里有了一种口沿微微外翻的碗，吃饭的人说拿着顺手，一个镇上的饭馆还订了一批。有人问蔡师傅，这个样子是怎么来的?

蔡师傅可能会说：“是那孩子的手腕先带出来的。”

也可能说：“是那批泥软，才托得住那一撇。”

还可能说：“他在邻县的集上看过一只类似的，回来手上就有了。”

三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当那一撇还在架子上的时候，三种说法都说不准。

如果是手腕先带的，那么这是差异序列在领头，样子是跟着出来的；如果是泥软托出来的，那么是土在领头；如果是看了别人的碗，那是一个现成的样子先进了脑子，手才跟上。这三种，就是前面说过的几条不同的路：哪一维先被点亮，哪一维先领头，发生的路就不同。

可介生态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在它里面，本来就没有答案。三样东西都在，都很弱，谁也没有真正领头。手腕的习惯是微弱的，泥的软硬是微弱的，对那只邻县的碗的记忆也是微弱的。三样东西互相托着，哪一个撤了，那一撇都不会出现。

直到那一撇被烧进了窑、被人拿在手里、成了“这个镇上的碗的样子”，回头去看的人，才会挑出一条线，说“是这样来的”。

这条线是真的，但它是被定型选出来的。定型之后的眼睛，会从无数条可能的线里，拣出一条通向今天的，说它就是来路。别的线，都被忘了。

这对认识介生态非常要紧，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在介生里问“谁带的头”，和问“有什么用”一样，问早了。你要是追着学徒问“你为什么这么提最后一圈”，他只能编一个理由出来。编出来的理由，会反过来塑造他下一次的手腕，那一撇就从“托出来的”变成了“有意做的”。他是在为你的问题服务了。

第二层，回头讲出来的路径，不要当成当时的样子。本书后面会讲三方程、六路径，那是回头看时可以用的地图；可是对于一件此刻正在介生的事，地图上的路线是空的，要等它走过去，才能画。现在能做的，是看着三样东西都在，哪一样都别拿走。

蔡师傅不是理论家，他的做法正符合这一点：他从不去问学徒那一撇是怎么来的。他只是等第二只、第三只，看它们还在不在。一次是偶然，三次才成了苗头。他不拿第一次当结论，也不拿第一次当笑话，只是让它再出现一回。这个“等第三次”的耐心，是介生期最朴素的办法，也是最难的办法。

还有一点：介生没有固定的长度。蔡师傅的坯，一般三五天；那一撇外翻，也许三五周；一对新家的气氛，也许是一两年；一种新手艺在一个行当里站稳，也许要一代人。尺度不同，“一碰就散”的道理没有变——变的只是什么叫“碰”，什么叫“等”。

◆ 29.5　三种长得像的东西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躲不开：这么多“说不清”、这么多“不要问”，那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说不清，就可以叫它“正在成形”？

当然不是。有三样东西，长得和介生很像，必须分开。

第一，一锅粥。混沌也说不清，也没有用处。区别在哪里？蔡师傅院子里的那堆泥，今天是一堆泥，明天还是一堆泥，没有哪一块泥比另一块“有点意思”。而架子上的那只外翻的碗，有一个方向正在露头：它虽然说不清，但已经有了一点“朝着哪里”。混沌是没有头，介生是头刚冒出来。

回到导论里那座被拆掉的澡堂。老马他们一个下午的闲话，绝大部分是粥：天气，球赛，谁家的狗丢了。可偶尔有一句话，旁边的人接了一下，再接了一下——比如有人随口说“镇上修路，别把菜市场口堵了”，另一个人说“他们上回就是这样堵的”，第三个人说“得有人跟镇里说一声”。这三句话，还不是一个主意，更不是一个提案，可它已经有了一点往哪里去的样子。粥里冒了一个头。

所以问一句：“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往某个地方去的苗头？”有，可能是介生；一点也没有，多半还是一锅粥——那一锅粥当然也值得保护，只是保护的办法是上一卷讲过的留白。

第二，失败品。老周的第二盘粉，如果用“好不好吃、能不能卖”来量，是一盘不及格的东西。失败品是用定型的尺子量出来的。但同一盘东西，换一个眼光，它是第三盘粉的来路。

这里的难处是：同一个东西，用一把尺子量是失败，用另一把尺子看是介生。不能说所有的失败品都是介生——很多失败品就是失败，裂了的坯就是裂了，没有第二层意思。但也不能说，凡是量出不及格的，就可以扔。判断它是哪一种，要看它里面有没有那个“往哪里去的苗头”，也要看它有没有被接着做下去的机会。一只裂的坯，没有后续；老周的第二盘粉，有后续。

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区别：怎么分辨一只坯是在“裂”，还是在“长”？蔡师傅的办法是看有没有继续。一道裂缝，今天比昨天长一点，明天比今天更深，是在坏；一个轮廓，今天比昨天清楚一点，后天又稳了一点，是在长。坏是

越来越确定地坏下去，长是越来越清楚地变下去。这一条还不够精确，可是它已经把“说不清”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越看越没希望，一种是越看越有点意思。

第三，借口。这一样最麻烦。一个人拖着不交报告，说“我还在酝酿”；一个人什么也没做，说“这叫无用之用”。“正在成形”这个词，用得太顺手，就成了挡箭牌。

真的介生，常常不好意思开口。学徒的那一撇，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提，怕被人说成“手不稳”。老周的第二盘粉，他是悄悄倒进了自己碗里。相反，拿“我这是在介生”来挡所有追问的，反而多半不是——因为真的介生，不会这么理直气壮，也不会这么急着给自己起名字。

这一点，第31章的“假溜达”一节，还要专门讲。这里先记住：一件东西是不是介生，不看它自己怎么说，看它里面有没有一串在继续的、很小的、方向还没定的差异。这串差异停了，它就不是介生了。

还有一句要补：保护，不是保证。被好好保护的介生，也可能什么都长不成。外翻的那一撇，也许第四只、第五只就消失了；老周的第二盘粉，也许试到最后，还是做不出一盘好吃的。这是介生的本分。蔡师傅每一窑出来，总有几只坯是废的，他从不因此就说阴干这套办法没用。废的那几只，教给他的东西，往往比成了的那些还多。这一章要说的，不是“保护了就会成”，而是：如果不保护，成的可能就根本没有机会出现。

◆ 29.6　小结：一只坯，三样没有喘完的气

这一章可以收成一句话：

判词：介生，不是半个定型，也不是混沌的延长；它是样子刚露头、说不清是什么、一碰就散的那一段——样子上有，路上有，土上也有；它不怕放着，怕的是被拿来问、拿来比、拿来端出去。

它需要的保护，不是留白，也不是规矩，而是另一种护法。

这一章带走三样东西就够了。第一，介生不是半成品，因为半成品假定了终点，而介生自己还不知道要成什么。第二，介生有三副脸，露在样子上，露在路上，露在土上，同一只坯，各有各的苗头，各有各的怕。第三，对它的保护不是“宝贵”二字，而是一套看得多、伸手少的动作：不问用，不打分。

老子路过这里，说：“当心，一散开就有名字了。”庄子路过这里，说：“当心，一凿就有用了。”他们都对。但他们的话，都只是对着这只坯说“别动”，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认得出这只坯，怎样在它周围走路，什么时候该把手伸出去、什么时候不该。

这就是下一章的事。

在走进下一章之前，不妨先拿这一章的东西，对一对自己的生活。你手边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怎么也答不上“这有什么用”，又不肯把它丢掉；一问就不想说了，不问它又好像在往什么地方走？

那件事，也许就是你自己架子上的一只坯。

下一章，我们要走进另一间屋子：县剧团的排练厅。那里的导演，在排一出新戏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先别定。”

◆

30

第30章

介生的识别与保护

◆ 30.1　导演说：先别定

上一章在陶坯旁边停住，留下三个问题：怎样认得出一只坯，怎样在它周围走路，什么时候该把手伸出去、什么时候不该。陶器作坊的蔡师傅，用手回答过这些问题。现在换一间屋子，看另一个行当怎么回答。

县剧团在排一出新戏。这出戏是团里的人自己编的，讲老码头搬迁前最后一个夏天，一家人守着一条快要被填掉的河埠头。（这是一个构想的剧团，下面的人名也是构想的。）

导演姓凌，五十出头，在团里干了三十年。演女主角的是小桂，二十三岁，进团四年，一直演丫鬟、侍女、跑龙套的姐妹，这是她第一次挑大梁。

排到第三场，有一段戏：女主角收到远在外地的弟弟寄来的一封信。剧本上写得清楚：看信，落泪。

一连排了十几遍，小桂都是这样演的：接信，拆开，看，肩膀一抖，眼泪下来，用袖口去擦。台下坐着的几位老师傅看了，都说“不错，到位”。这是一个哭戏该有的样子，也是观众期待的样子。

可是那天下午，出了一件事。

小桂拆开信，看了两行，没有哭。她把信纸折了一下，又展开，又折，又展开。手指停在折痕上，来回捋。这样捋了大约十几秒，她抬起头，往窗外的方向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练功房里静了一下。弹月琴的老宗，手指本来要接过门，不知为什么慢了半拍，那个过门拖得长长的。

凌导演说：“停。”

所有人都以为他要纠正小桂：“剧本上是哭，你怎么折起信来了？”

他没有。他说：“先别定。”

团长在后排站着，他是来问灯光位置的：这一场灯往哪儿打，明天要给灯光师傅交底。听见这话，他有些着急：“老凌，到底哭不哭？哭，我们灯就打脸；不哭，那灯打哪儿？”

凌导演说：“灯位先按两个都留着。明天再说。”

小桂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她小声问：“导演，我刚才……是不是乱来了？”

凌导演说：“我也不知道。你刚才那个，我说不上来是什么。”

停一下。这一句话很值得停下来看。一位三十年的老导演，面对一个年轻演员做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动作，没有评、没有改、没有定，而是说“先别定”。

他是不是犹豫？是不是不负责任？

都不是。他在做一件事，这件事的名字，上一章已经给了：他在保护一样正在成形的东西。

陶坯拉好了，还没有干透，不能烧，也不能随便碰：碰重了变形，碰轻了也会留下指印。它既不是一团泥，也不是一只碗，而是从泥到碗之间的那一段。这一段，叫“介生”。

小桂那十几秒的折信，就是一块刚拉出来的坯。

我们按这本书一直用的办法，把这块坯上发生的事掰开了看一看（不过在现场，这些事是同一件事）。

那一刻，有一串差异在往前走：前十几遍都是“接信，拆开，哭”，今天头一次，手指在信纸上多停了一下；这一停，下一个动作就变了，不是擦泪，是折信；折信又带出了往窗外看的那一眼。差异一个接一个。

随着这一串差异，有一样东西在一层一层地露头：先是“今天这手有点不一样”，然后是“她好像不想让人看见她哭”，再后是“也许这个女人是那种把话都折进信纸里的人”。每一层都不是定论，是露出来一点点，又露出来一点点。导演和她对着看，看到的是一条正在显出来的路，不是一个已经站住的人物。

而这些东西，是缠在一起的：小桂的手，那张被她排了十几遍、已经被揉得有点软的道具信纸，老宗那拖长的一拍过门，窗外下午的光，她这四年里一直演“配角”、从来不敢占台上位置的那份习惯，和她今天忽然不想再按“标准哭法”演的那一点点别扭。换一个人来演这一段，换一张新的硬纸，换成晚上的灯光，这个动作很可能就没有了。它不是小桂“身上带着的某种本事”，是这一个下午、这间房、这些人缠出来的东西。

所以，导演不是在犹豫。他知道，只要他此刻说一个字，不管是“好”还是“不对”，这块坯就会定下来：

说“好”，明天小桂会把这个动作原样复制，折信的手会变成一个“设计”，每一遍都完整，每一遍都比今天僵；

说“不对，剧本写的是哭”，这个动作就被擦掉，小桂回到安全的“标准哭”，而且从此在台上更不敢动。

两种说法，都是“定”。定了，就没有“这一段”了。

有人会觉得这个导演太奢侈。戏要演出，经费有限，排练时间一天都是钱，他怎么能这么慢？现代的做事方法不是常说“尽快把东西拿出来试，早试早改，错得越早越便宜”吗？

这个想法有它的道理，而且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一场戏的灯光、走位、台词，大部分都应该早试早改。导演自己排别的戏，也是这样做的。

但“早试早改”有一个前提：被试的东西，已经有了可以被评价的样子。你试一个走位，能量出它到不了位；你试一句台词，能听出它拗口。试的意思，是拿一个站得住的东西去碰现实，看它哪里要改。可介生的东西，还没有站住。它的样子还在露，你拿尺子去量，量到的是尺子压下去的那一下，不是它。

所以导演说“先别定”，并不是说“不要看”。他看了，而且看得比谁都专注。他只是不下判决。

这一章要回答上一章留下的那三个问题，也就是：这样的“先别定”，怎么做才不是糊涂，不是偷懒，才能真的把一样正在成形的东西护到它自己站住的那一天？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也就是怎么认：怎么知道眼前这一小段，是一块坯，而不是一团泥，或一只已经烧好的碗？

◆ 30.2　怎么认出一块坯：说不清，舍不得，一问就散

凌导演后来跟副导演聊起那天下午，说了一句话：“我不是看出来她演得好。我是看出来我说不出她演得好在哪儿，可我又舍不得让她改回去。”

这一句话里，其实藏着认介生的三个记号。

第一个记号：说不清。

注意，不是“没人看明白”，而是“明白一半”。如果小桂那天只是胡乱抖了抖手、走神了，旁边的人会说“你刚才怎么了”，那是一团泥。可那天不一样：在场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有东西，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老宗的过门慢了半拍，是他的手先于他的脑子认出来的。

这和混沌不同。混沌是一锅粥，谁也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东西，没有哪一勺比另一勺更像什么。介生是粥里忽然浮出一块东西的形，能指着说“那儿”，却叫不出名字。

也和定型不同。定型的东西，你一眼就能说出它是什么、有什么用：“哭戏”“标准的丫鬟步”“一个好看的亮相”。这些有名字，名字背后是一整套人人认得的东西。

说不清，是名字还没有长出来。这是认介生的第一道门。

第二个记号：舍不得。

凌导演为什么舍不得？这个“舍不得”不是对小桂的偏爱。他说不出这个动作好在哪里，可他心里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要是这一段丢了，戏里会少一样东西，而且以后再也找不回来。

舍不得是一个很可靠的信号，因为它是有成本的。要保一个动作，导演得在团长面前顶一句“灯位留两个”，得在副导演面前担一份“你怎么不管了”的嫌，得给小桂多留一个下午。没有谁会为一团泥付这些钱。愿意付钱的那一份舍不得，说明有人的手比嘴先认出了它的分量。

不过要小心：舍不得有真有假。有的人舍不得，是舍不得自己的面子——这是我设计的，不能改。那样的舍不得，一碰就硬，有人说它半个字不好，他就护着。真正舍不得介生的人，往往护不出理由。你问他“这儿到底好在哪”，他答不上，只会说“再看看”。

第三个记号：一问就散。

这是最重要，也最容易看出来的一个。

那天下午过了一个钟头，小桂又来找凌导演：“导演，我想再来一遍，我记着刚才怎么折的。”

她又演了一遍。折，展，折，展。手在信纸上停。窗外看一眼。

这一遍，凌导演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动作都是对的，一个不差，可是那个东西没了。信纸折得更整齐了，停得更久了，眼睛往窗外看的角度也更准了——它变成了一个“设计好的折信动作”。台下的人看了，会觉得这是一个编排过的小心思。而上一遍那个，没人觉得是小心思，大家只觉得“这个女人有点不对”。

小桂自己也知道。她站在那里，有点委屈：“我就是照刚才那样来的。”

是的，她就是照刚才那样来的。问题就出在“照”字上。一旦她要“照着来”，她脑子里就有了一个要照着的样子；一旦脑子里有了一个样子，手就不再是被那个下午、那张纸、那段过门牵着的手，而是被一个“图”牵着的手。介生那一层一层露出来的东西，只在它自己露的时候才露；你一回头去叫它，它就缩回去了。

这就是“一问就散”：你拿“这是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再来一遍”去问它，它就变成了你问的那个样子，不是它本来的样子。

于是三个记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判法，不是公式，只是个手感：

如果一样东西，有人看得出“里面有东西”，说不出是什么（说不清）；有人愿意为它付一点代价（舍不得）；一追问、一复制、一打分，它就走样（一问就散）——这三样同时在场，它多半是一块坯。

三样缺一样，都要小心。

只有说不清，没有舍不得——那可能是一团泥，没人在意；只有舍不得，不是说不清——那是定型了的东西，你是舍不得它的名声；只有一问就散，没有前两样——那可能只是脆弱，不一定是介生。

再给这个判法加一条“保险”，因为介生最容易被冒充。

介生有一个别的东西冒充不了的特点：它会“自己回来”。小桂那天的折信，过了两个星期，在联排的时候，没有人叫她，她又折了——不是照着，而是在另一场戏里，她拿起一件衣服，手指在衣角上停了一下。那是同一块坯，长出来了另一个形。凌导演看见了，才对副导演说：“你看，不是巧合。”

假的“说不清”不会这样。一个人为了躲开某件事而说“我在找感觉”，找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有长出来，也没有哪一个下午被人舍不得过。

所以认介生，除了前面三个记号，还要给它一点时间。有些东西不是一眼认出来的，是过一阵子，发现它还在、它换了形、它从别处冒出来，才认得出。

这种“各说各的，却都往一处去”，在别的行当里也一样。第1章里，修车铺的小罗在听出那声“咔”之前，设想有过这样几天：他对谭师傅说“这台车的声音好像有点不一样”，说不出哪里不一样。谭师傅没有追问“哪里不一样”，也没有立刻告诉他答案，只说了一句和以前一样的话：“你再听。”

那几天里的小罗，就是一块坯。师傅做对的事，就是不去替那个“不一样”起名字。要是他当场说“那是皮带松了”，小罗这辈子只会背一个答案，而不会长出一对耳朵。

现在可以回答那个问题了：凌导演怎么在一个下午就敢说“先别定”？

他其实不是认得，是不敢不留。他承认自己认不出，但也承认自己认不出的东西不等于没有。这种态度，是保护介生的第一步。

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地方：认介生，不能只靠导演一个人。那天下午在场的，有弹月琴的老宗，有拿着本子的场记，有隔着窗看了一眼的炊事员（他是在送盒饭）。事后凌导演问了好几个人：“你看到她折信的时候，心里有什么？”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有人说“我想起我妈”，有人说“我觉得她有话没说”，有人说“我什么也没想，就是不想打断她”。这些回答没有一个是“标准答案”，可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这块坯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碰到了，碰到的都是同一块。这样一种“各说各的，却都往一处去”，是介生真实存在的一个旁证。

认出来了，接下来是保护。而保护的办法，比认还要难，因为所有的“保护”几乎都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碰。

◆ 30.3　四条护坯的规矩：不问用，不打分，给时间，给场地

回到那间练功房。

那天晚上，凌导演一个人在房里坐了一会儿。他在想：明天开排，我怎么保证没有人把小桂那一下弄丢？

他有三个担心。

第一个担心是团长。团长不是坏人，他得对上级、对票房、对全团二十几口人的饭碗负责。明天他还会来问：“老凌，那个折信，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得有个说法，演出前要写节目单。”

第二个担心是副导演。副导演是个认真人，爱记笔记，爱总结。他很可能会当着全组人说：“小桂昨天那个折信的处理很好，大家都向她学习，每个人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动作。”

第三个担心是小桂自己。这个丫头太想演好了。她昨天回去多半会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那个折信，练一百遍，练到每一次都一样漂亮。

三个担心，三种碰。第一种是问用，第二种是打分，第三种是自己把自己钉死。导演最后总结出来，要护这块坯，大约要守四条规矩。

第一条：不问用。

别人问“这有什么用”，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自然的碰。团长问，是因为他要写节目单；观众问，是因为他想弄懂；连小桂自己都会问：“导演，我这个折信是想表达什么？”

不问用，并不是说“永远没有用”。它说的是：此刻不问。就像不能拿着尺子去量一块还没有成形的坯。

凌导演第二天早上对团长说的话很朴素：“节目单上这一场，你先写‘第三场’，别写内容。灯位两个都留。我答应你，到联排之前，我一定给你一个答案。但今天别问我。”

团长不太情愿，可他也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导演给了他一个期限——联排之前。这个期限很重要。“不问用”不是无限期的挡，是“此刻不问，到那一天一定回答”。有了这句承诺，团长的焦虑有了去处，不会转头去找别人要说法。

还有一种问用最难防：好心的问。副导演会说：“小桂，你是不是在表现她对弟弟的思念？”这是一个看上去很专业的问题，其实把小桂那一下翻译成了一句话。一翻成一句话，那一下就只剩这一句话那么大了。小桂会说“对对对”，然后以后每一遍都“表现思念”。

所以导演的做法是：谁要问，他先替小桂挡下来；小桂自己要问，他说“你先别想它是什么，你只管做”。

第二条：不打分。

打分不只是打一个数。夸，也是打分；叹一口气，也是打分；甚至在笔记本上记一笔“此处亮点”，也是打分。

为什么夸也不行？因为夸了，小桂就知道了“这样是对的”，她会往这个方向做。而介生的东西，不是往一个“对”的方向走的，它是在没有对错的地方，自己露头。

有一回，剧团里另一位老师傅看了折信的那一遍，忍不住说了一句“哎呀，这个好”。凌导演事后没有批评他，只是对他说：“下回，你想说好的时候，说‘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这四个字，是这间练功房里的一个规矩。它说的是：你的眼睛落到了这块坯上，可你没有拿尺子。

打分的另一种形式，是拿它去比较。“小桂这一下，比小周的强”“这比去年那出戏的更新”。比较要有一把共同的尺子，而介生的东西恰恰没有尺子，它自己的尺子还没有长出来。

有人会说，那这样怎么提高质量？不是要有评价才有进步吗？

评价是需要的，到后面。但评价和保护的次序不一样：先让它长出一个可以被评的样子，再评。如果它还没有样子就开始评，评出来的，是你已有的尺子的样子。一把现成的尺子，量不出一样新东西；它只会把新东西往旧尺子的刻度上压。

第三条：给时间。

时间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无限。要给的，是够它自己换一次形的时间。

小桂的折信，那天下午露了头，凌导演让它放着，过了两个星期，它才在另一场戏里换了个形，出现在衣角上。如果导演在第三天就催“那个折信你给我稳定下来”，他得到的是一个稳定的折信，失去的是后面那件衣服的衣角。

时间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作用：它让构成它的土的那些东西也跟着变。这两个星期里，那张软了的信纸被换成了新的，小桂在排其他场次时对这个女人有了新的理解，老宗的琴音也悄悄跟着改了。介生的东西不是自己孤零零长，是和它周围的东西一起长。给时间，也是给周围的东西一个跟上来的机会。

给时间要小心一件事：别用截止日期去压它。只要有一个“必须到某天稳定”的死线压着，每个人的手都会提前去“定”。到后面我们会说，有些截止是躲不开的，但那些是另一种时候，要分开对待。

第四条：给场地。

介生要有一个不用交账的地方。

小桂的折信是在练功房里长出来的。这间房有几样东西是对的：门是关着的，外面的人不会随便闯进来；下午四点以后阳光照在地板的老位置；弹月琴的老宗在，他不会评，只会跟着；道具是她用熟了的那张旧信纸。

后来联排挪到了小剧场，条件好多了：灯光亮、座位齐、有观众席。小桂再演那个折信的时候，手有点紧。凌导演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又悄悄把早上的一段排练挪回了练功房。

这里要看清：场地不是“一个地方”，是一整套缠在一起的东西，包括人、物、光线、气氛、以及一句没有人说出口的“在这儿，不会有人笑话我”。导论里那座被拆掉的澡堂，老人们每天下午在里头泡一泡、说说话，没有哪个议程，也没有哪个人要对谁交账。那是一块场地，不是一间屋子。

给场地的难处，是它很贵：占用一个房间，占用一批人，占用别人本来可以拿去排正戏的时间。所以每一个团都会在某个时候，把这块地“合理利用”掉。

好心的手，比坏心的手更难挡。

坏心的手好认：嫌你慢的，要你出业绩的，看你不顺眼的。好心的手却是笑着伸过来的。

有人来团里参观，看了小桂的折信，说：“这个太好了，能不能录下来，放到我们那边的培训班去当教材？”有人说：“这个动作要不要请老师傅帮你再打磨打磨，提提档次？”还有一位热心的老观众，散场后拉着小桂的手说：“闺女，你就照这个演，一辈子都不会错。”

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恶意。录下来，是想让更多人看见；打磨，是想让它更好；“照这个演”，是想让她安心。可三样做法的后果，都是把一块还在长的坯，提前变成一件可以复制的成品。录像一放，它就成了“标准动作”；打磨一做，它就往现成的好看上靠；“一辈子都不会错”一说，小桂再也不敢动它了。

凌导演挡这样的手，比挡团长难得多。团长的手伸过来，他可以顶回去；老观众的手伸过来，他只能笑着说“谢谢您，她还在摸索”，然后找个机会把小桂带开。守门人不但要挡手，还要挡得不伤人。所以说，守门人的功夫，一半在眼睛，一半在脸皮。

四条规矩合起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在“做”什么，而是在“不做”什么。不问、不评、不催、不挪。导演在这件事里的全部工作，是把别人的手挡在外面。

这其中有一个很深的矛盾。守门的人要做的事很多，可他做得越好，外人看到的越是“他什么也没干”。团长不满意，因为“这个导演怎么什么也不管”；副导演不满意，因为“我们不是应该总结吗”。守门人的贡献是看不见的：坯没有碎，就没有人知道它差点碎了。

最后一个提醒：这四条护的是一块坯，不是一种活法。

坯会干。哪一天，它自己站住了，有名字了，有样子了，这四条规矩就要撤。折信变成了这出戏里一个有名的、稳定的、每场都要出现的“小桂的折信”——到那一天，导演就该开始量它了：灯位怎么打，节奏怎么卡，观众反应怎么样，该问用、该打分、该催、该排练就都得上。介生不是一直被保护的东西，它是被保护到站住为止的东西。

那么，什么叫“站住”？谁来判断？这个问题，站上的前辈已经碰到过。

◆ 30.4　前人只点了一笔：把介生保护展开

站上第291号《实非实》，是这本书最近的邻居。它把“有用”读成“实”，看真善美怎样聚在一起才算有效。它在第34章里，专门谈过介生的保护，给了一条判据，用来分辨什么时候一样东西该被护着、什么时候可以放手去验。

这一笔很有分量，因为大多数讲“有用”的书，根本没想过还有一段东西需要护。但它只有这一笔。篇幅不长，点到为止。

本书在它上面，往前走三步。

第一步：讲清楚被护的究竟是什么。

291号站在价值那一层看事情：一样东西有没有“实”，要看真、善、美聚没聚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介生的东西是“还没聚起来”的，所以暂时不用拿“实”的标准去验它。这个说法对。

本书往下挖一层。小桂那一下折信，不只是“真善美还没聚起来”，更是它还没有一个意义的方向。你说它是创造，也说得通：这是她头一次演出自己的处理。说它是自由，也说得通：她终于不按“标准哭法”演。说它是幸福，也说得通：那天练功房里的人都觉得舒服。三种说法都对，没有一种说得死。

这就是介生的一个特点：三条意义律在这里还没有分家。一旦问“它到底属于哪一条”，就是问早了。

这也呼应291号自己的一条提醒：不能把三性硬套在混沌、介生、秩序三态上，一态配一性。本书同意这条提醒，而且做得更彻底：不但不给三态分派三条律，还要说——在介生那一段，分派本身就是一种碰。你一说“它是创造”，坯就朝创造那边定了；你一说“它是自由”，坯就朝自由那边定了。守门人最好什么也不分。

所以，本书讲的保护，保护的是一段还没有意义方向的差异。291号看到的是症状（价值聚不聚得起来），这里要找的是根（意义的方向还没生出来的那一段）。

第二步：从一条判据，扩成一套做法。

判据告诉你“该不该护”，没有告诉你“怎么护”。小桂那天下午的事，如果只有一条判据，导演知道该护，但他仍然不知道怎么对团长说、怎么对副导演说、怎么对小桂自己说。

上一节那四条规矩——不问用、不打分、给时间、给场地——是本书的补充。它们每一条都有一个具体的反面：问用的是谁、打分的是谁、催的是谁、挤占场地的是谁。守门人要做的，是认出这些“善意的手”。

第三步：说清楚护的边界，和护的代价。

任何一套保护，如果不讲边界，就会变成新的教条。“无用之用”这四个字，已经有人拿它当过借口：拿它不交作业，拿它不上班，拿它推掉一切要付钱的责任。

所以下一章，要用一整章来回答：什么时候不能护？什么时候一定要用意义？怎么分辨真保护和假保护？

最后补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要紧的一段，平时没有人专门去护？

因为护介生，需要一种很特别的耐心，而我们身边的土，正在把这种耐心一点点磨掉。账期越来越短，月月要报，季季要评；尺子越来越现成，什么都能打个分，什么都能排个名；“有什么用”这句话，已经成了开会时最顺口的一句。每一个环节单看都合理，合在一起，就没有哪一个环节愿意替一块没有名字的坯付一个下午。

这正是前面几卷一直在讲的那件事：路被统一在“有用”上之后，土就被压平了；土被压平，介生就没有地方落脚。所以保护介生，不只是导演个人的好心，更要看这片土，肯不肯给他留出那一间不交账的练功房。

◆ 30.5　小结：挡手的人

这一章讲的是认和护。

怎么认？看三样：说得出里面有东西，却说不清（名字还没长出来）；有人愿意为它付一点代价，舍不得；一追问、一复制、一打分，它就走样。三样同在，再给它一点时间，看它会不会换一个形、自己回来。

怎么护？守四条：不问用，不打分，给时间，给场地。守这四条的人，做的是“挡手”的事，所以外人看来像什么也没干。

护到什么时候？到它自己站住、有了名字、有了样子，守门人就该撤，开始验它。

这一章的判断有一个能被推翻的地方：如果一样东西被这样护了很久，仍然没有一次自己换形、自己回来，那它不是介生，是一团泥，保护就该停。如果守了这四条，介生的东西却死得比不守还快，那这一章的做法就错了。

一句话收：

介生不是没有成形，而是成到一半，还没有人能替它说话；护它的办法不是替它说，而是挡开所有急着替它说的嘴。

但是，凌导演不是只会说“先别定”的人。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月里，还说过另一句话，口气硬得多。那句话是在演出前三天说的，说给全团听：

“从今天起，谁都不许再试新东西了。”

这两句话，怎么会出自同一张嘴？答案在下一章。

◆

31

第31章

反意义的边界

◆ 31.1　五个必须问“有什么用”的时候

演出前三天，凌导演站在练功房中间，把全团的人叫齐了。

他说：“从今天起，谁都不许再试新东西了。动作定了的，不许改；走位定了的，不许动；折信就按联排那一遍。谁有新想法，演完这一轮再说。”

小桂站在人群后面，没有出声。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导演不是说要“先别定”吗？

她错怪了他。半个月前说“先别定”的人，和今天说“全部定死”的人，是同一个人，看的是同一块坯。区别只在：半个月前，坯在练功房里，没有人等着它；今天，三天后的晚上，台下有三百张票。

这一节要把话说硬。上一章讲了怎么护介生，听上去，好像有用的事是俗的，无用的事是雅的，应该多护着无用。如果读者走到这一步就停下来，这本书就会变成一本替偷懒辩护的书。

所以必须马上划一条线：有些时候，反意义是错的。此刻就是要问“这有什么用”，就是要每一步算账。我们挑五个时候，一个一个看，仍然在这间剧团里。（场面都是构想的。）

第一个：急救。

演出那晚，第二幕刚开，台下第三排一位老人忽然歪向一边。附近的观众喊了起来。台上的人停了，台下的人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说：“让我们先不问用，看看这件事会自己长出什么形。”

团里的场务一个箭步冲下台，去找随队的人，有人去开后门，有人去叫车，一个演员把水袖一甩，蹲下来托住老人的头。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目的，每一秒都在算：这一步能不能让他先缓过来，那一步能不能让车早一分钟到。

急救的特点是：有一条命在等，而且一秒钟一秒钟地在耗。此刻所有的“可以再看看”“先别定”，都是在用别人的命换我的从容。

第二个：截止。

下乡汇演，大车早晨六点从县里发。前一晚，服装箱还没装完，缺了两件戏服的腰带。

这不是一个“让它自己长”的时候。得有人清点，得有人排班，得有人在六点前把腰带找出来，找不到就想法子替代。

截止的特点是：时间窗口是别人定的，不是自己定的。车不会因为你的“还没成形”而晚开，山那头的观众不会因为你的坯还没干而晚来。窗口一关，这件事就没了。

注意这和上一章的“给时间”不矛盾。给时间，是在一块没有人等的地里，给坯一个不被截止日压着的下午。截止，是已经有人在等了。同样是时间，一个是给自己的，一个是欠别人的。

第三个：承诺。

团里答应了县里，元旦那天在广场演一场。票早已经卖了一部分。又比如，团里答应过一位退休的老艺人，今年一定把他的那出老戏重新排出来，让他在世的时候看一眼。

承诺的特点是：一句话说出去，别人的计划就建在了它上面。你可以后悔，但你不能不管。不管，别人的计划就塌了，而且这一次塌了，下一次别人就不再信你。

设想那位老艺人姓董，八十出头，腿脚已经不太方便，每个月托人带话来问一次：我那出戏，什么时候排？

排这出戏，对年轻演员来说是个苦差事：老戏的规矩多，唱腔的转折细，一个字的口型都不能含糊。有的年轻演员心里嘀咕：这出戏几乎没有观众，排它“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问得老实，答案也很老实：有用，用在一个人的等待上。董老一天比一天老，时间是别人给他的，不是团里给的。团里一句话答应了他，他便把这件事当成了剩下的日子里的一个盼头。这个时候，团里再来一句“我们先看看这出戏能不能长出点新东西”，是拿一个老人的盼头去做实验。

所以在这件事上，排练的节奏是被答应过的那一天倒着排出来的：哪天对词，哪天上身段，哪天请董老来看，一天都不能空。这里不是不能有新的处理，只是新的处理要先过董老的眼，不能为了“新”，把答应他的那出戏改得他认不出来。

有人会说，承诺不也是自己定的吗？是。可它一旦出口，就成了别人的土的一部分。你不能再把它当作自己的坯，随便揉。

第四个：分配。

一年的经费，只够排一出新戏。可是摆在桌上的有三个提案：一出是追求新写法的实验小戏，一出是老观众最爱看的传统折子戏，一出是给年轻演员练手的轻松小品。

这个时候，不能说“都先试一试”，因为试不起。必须有人说：我们选这个，不选那个，理由是什么。

分配的特点是：资源有限，选了甲就没有乙。在这个时刻，任何“先别定”都是把选择权让给了别人——让给最会吵的人，或者让给运气。而一旦要选，就必须有一把尺子，哪怕这把尺子不完美，也得摆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是怎么量的。

设想桌上的争论是这样的。写实验小戏的编剧说：不排新的，团就没有下一个十年。管票房的说：老观众一年不来，团就没有下一个明年。带年轻人的老师说：没有一出戏让年轻人练手，三年后台上就没有人。三个人说得都对，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候最糟的做法，是谁嗓门大听谁的，或者干脆抓阄。比抓阄好的做法，是把尺子摆到桌面上：这一年的钱，按什么算？按观众人数，按演员成长，还是按剧目的新旧？尺子一摆出来，吵架就从“谁对”变成了“这一年先量哪一样”，输的一方也知道自己输在哪把尺子上，明年可以换一把再来。分配这个时刻要的，正是这样一把摆在明处、允许明年更换的尺子。

这里有一个很难的地方：三个提案，各自站在一条不同的意义律上——一个为了“出新”，一个为了“观众高兴”，一个为了“演员自己能练出本事”。三条律在这张桌子上直接碰面了。怎么选，不是一道算术题。这件事，卷九会专门谈。这里只先记住一点：分配的时候，不能装作三条律不存在，也不能让其中一条单独说了算。

第五个：危机。

假设县里要把剧团撤并，只给团里三个月，要拿出一份能证明自己“有用”的材料：演出场次、观众人数、下乡次数。

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咱们先练练内功，把戏磨好了再说”，会被所有人的眼神压回去。

危机的特点是：活下去本身成了前提。没有团，就没有练功房，没有练功房，就没有下午四点的光，也没有小桂的折信。这时候讲“无用之用”，是拿自己的命赌一个说不准的东西。

五个时候，看上去不一样：急救、截止、承诺、分配、危机。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在这五个时刻，你的路和别人的土缠在了一起。有人在台下等，有人在山那头等，有人把计划建在你的话上，有人要从你的选择里分到一份，有人的饭碗系在你的存活上。

介生为什么可以不问用？因为它还在你自己的土里，在一间关着门的练功房里，没有别人的事压在上面。一旦别人的土压上来，“不问用”就从一种保护，变成了一种推卸。

我们可以把这个判断写成四个问题，遇到拿不准的时候，问一问：

有没有人在等？晚一天，谁会受损？这件事做出去，能不能收回？这里的资源，是不是有限，非选不可？

四个问题里，只要有两个以上答“是”，就不是反意义的时候，就是该算账的时候。

这个判断是能被推翻的。假如有人在一场急救中，坚持“不问用”，反而救回了人，或者在一次分配里，拒绝设尺子，反而分得比谁都公平，这一节的判断就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情形恰恰相反。

再举一个拿不准的例子，看这四个问题怎么用。

联排前一天夜里，有演员想改一句词，觉得原来那句有点拗口。这算不算该“算账”的时候？

问：有没有人在等？有，明晚演出，台下有人。晚一天谁受损？改了没磨合，同台的搭档接不上，会受损。能不能收回？一句词，今晚改了，明早还能改回来，可以收。资源是不是非选不可？不是。前两问答“是”，后两问答“否”：到了该算账的时候，但这笔账可以算得轻。于是答案是：可以改，但今夜改完当场对一遍，明早再对一遍，不留到上台。

这个例子想说的是：四个问题不是用来给“能不能试”下判决的，是用来定一个试的分寸。五个时候里，也有小事，也有可以松一松的地方；只是松的方式变了——从“放着不管”，变成“当场验证、随时能收”。

不过有两件事要补上，防止读者走到另一个极端。

第一，这五个时候，不是说“无用”就该消失。急救完了，演员们会坐在后台，很久不说话；汇演回来，大家会在车上睡成一片；危机过后，团里会有一个长长的、什么也不排的假期。这些时候，反意义回来了。它没有被取消，只是让了路。

第二，这五个时候，也最容易被拿来当借口。一个团如果一年到头都在“危机”“截止”“承诺”里转，那不是真有这么多危机，而是它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了五个时候中的一个。这样的团，练功房的下午四点就不会再有光了。凌导演那句“谁都不许试新东西”，他只说三天。三天后演完，他会说另一句话。

那一句话，是什么？下一节说。

◆ 31.2　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给意义换季

演出那一晚过去了。三百张票，一张不差，那位晕倒的老人在医院里躺了半天，当晚就回了家。

第二天早上，凌导演在团里的黑板上写了一行字：今天休息，练功房不开。

团长看见，愣了一下。昨天刚演完，今天按理应该开总结会，该总结的总结，该整改的整改。导演摇摇头：“开会，明天。今天谁也不许来。”

第三天，练功房开了。凌导演把小桂叫到一边，说：“你那个折信，还记得吗？”

小桂说：“记得。联排的时候演的。”

“不是联排那一遍。是我说‘先别定’那一天，你折的那个。”

小桂想了想，说：“我不太记得清了。”

导演说：“好。我也不太记得清了。那今天下午，你自己在这间房里待一会儿，不用演给谁看。”

这三天里发生的事，就是这一节要讲的东西：意义换季。

先说清楚一个常见的误会。

读到这里，有的人会觉得：这本书说“步步要意义会杀死混沌”，说“要有一段反意义”，那是不是说，意义是坏东西，越少越好？

不是。

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反对意义，是把尺子扔掉，从此不再问“这有什么用”，不再算账，不再对任何人负责。那是另一种形而上学——把“无用”统一成唯一的路。实用主义者把路统一在有用上，另一些人若把路统一在无用上，犯的是同一个错，只是方向反了。

反意义，是把尺子暂时放下。放下，是为了让一段差异在没有方向的地方走一走；走完了，把尺子捡回来。捡回来的时候，尺子往往已经不是原来那把。

打个比方。庄稼地一年有几个季节：春天翻土下种，夏天除草浇水，秋天收割，冬天歇地。没有人会说冬天“反对庄稼”。冬天是庄稼的一个季节，是让地缓过来的季节。这本书最后一卷会把这件事说得更细（那是三条意义律的轮换）。这里只借这个意思：意义不是一年四季都当班的，它有它的季节。

凌导演这三天，就是一次小小的换季。

第一季，演出前三天，是“收成”的季节。所有人都问用：这一个动作要不要，那一句词能不能删，这个灯位能不能撑住。每一步都算账，算得很紧，这是对的。

第二季，演完后的一天，是“歇地”的季节。谁也不排，谁也不练，谁也不总结。这一天里，大家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有人在家睡了一整天，有人带孩子去了河边，有人逛了半天菜市场，有人什么也没干，坐在门口晒太阳。

第三季，第三天，是“下种”的季节。导演把小桂叫回来，让她一个人在房里待着，不演给谁看。

这里我们要看一看，意义是怎样回来的。

小桂一个人在练功房里，信纸还在。她拿起来，随手折了一下，展开，又折。她已经不记得那天下午是怎么折的了。这一次，折出来的和那天不一样。那天是“手停在折痕上”，这一次她把信纸折成了一个很小的方块，捏在手心里，看了一会儿，又轻轻放回桌上。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午凌导演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看见了。他没有走进去，也没有说话。

又过了几天，他在例会上对团长说：“节目单上，第三场可以写了。”

团长问：“写什么？”

导演说：“写‘一封折起来的信’。”

团长愣了愣，说：“听着好。这是什么意思？”

导演说，这个女人收到弟弟的信，不肯在人前哭。她把话折进信里。折来折去，是她不肯说的那些话。

这时候小桂在旁边，听见这话，眼睛忽然一亮。她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导演也从来没有跟她说过。可是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她心里有什么东西对上了——那个她折了又折、自己也说不清的动作，有了一个说法。

看清这件事。这里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意义回来了。节目单要写，观众要看，团长要对上级交账。“这是什么意思”的问题，终于可以问了，也终于有了答案。尺子被捡回来了。

第二件，更要紧：回来的意义，和出发的意义不一样。出发时，剧本上的意义是“看信，落泪”，也就是“表现她思念弟弟”。这个意义很平：谁都懂，谁都演得出，可也谁都忘得掉。回来的意义是“一个把话折进信里的人”。这个意义比原来深：它不只告诉你她在思念，还告诉你她是怎样思念的、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一层变化，不是导演靠想出来的，是靠中间那一段“没有意义”的时间换来的。如果当初在第三场就逼着小桂“你说清楚这个动作表现什么”，她只能回答“表现思念”，因为那是剧本给的唯一意义。是那十几秒的折信、那几天的空白、那个人在房里的独处，让一个更深的意义有了生出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意义的升维，需要一段反意义**。反意义不是意义的敌人，是意义换一个更深的形之前，要经过的那一个季节。

第26章第4节（26.4）讲过音乐里的休止，这里是同一个道理：休止是谱子上被认真写下来的一笔，不是失误。休止符不是不要音乐，而是让下一个音有它的分量。

换季也会出错，出错有两种样子。

一种是该收不收。设想另一个团，演出前一周，导演还在说“再等等，感觉还没到”，台词不背，走位不定，灯光师傅追着问位置，他摆摆手。到了演出那晚，台上一片慌乱，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没熟的东西。这位导演的毛病，是把歇地的季节，拖进了收成的季节。

另一种是该放不放。再设想一个团，演完一场马上排下一场，一年排十二出，每出都有指标，每个月都有总结。三年下来，戏路越来越窄，演员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像。这个团的毛病，是把收成的季节，铺满了一整年。

这两种错，有一个共同的根：把季节当成了立场。第一位导演把“不急”当成了立场，第二个团把“要产出”当成了立场。立场是不用看土的，季节要看。

有两件事要说清，免得读者走偏。

第一，换季的转换，要有信号。

凌导演为什么能说“休息一天”“第三天回来”？因为他心里有一个信号：演出结束了，那五个必须问用的时候过去了。他知道，没有人在台下等着，没有一辆车在门口发动。换季的信号，是别人的土从你的路上挪开了。

所以换季不是任意的。你不能在一场急救的中途宣布“我要进入歇地的季节”。也不能在歇地的日子里，因为团长一句“总觉得浪费”，就把尺子重新拿出来。

第二，守门人要既会护，也会收。

凌导演在这件事里的位置最难：他既要在需要的时候说“先别定”，也要在需要的时候说“全部定死”。这两句话，说给不同的人，对着不同的时候。一个只会护的守门人，会变成一个不问世事的老好人；一个只会收的，会变成一个只认账的官。

夜市上的老周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夏天回家试了三个晚上，把本地的酸笋和自己的炒法混在一起。那三个晚上，没有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也没有熟客皱眉头。第四天他把“酸笋炒粉”摆出来，才有了老太太那一句“还是原来那个好吃”。三个晚上是歇地，第四天是下种，老太太那句话是尺子回来了。他能把摊子摆十一年，靠的也是这几个季节他心里有数：什么时候该关起门来试，什么时候该拿出来给人吃。

换季换得好，反意义与意义就不是两个阵营，而是同一个人的两种姿势。

◆ 31.3　假溜达：拿“无用”当遮羞布

团里还有一个年轻人，叫阿昊，二十五岁，演武生。（同样是构想的人物。）

阿昊有一个口头禅：我在找感觉。

早上压腿的时候，别人在咬牙，他说他在找感觉。练翻身的时候，他翻了两遍，坐在地上不动了，说他要找找感觉。联排前，别人在一遍一遍抠那个最难的转身，他在旁边的台阶上坐着，说这个转身他心里还没“通”，不能硬练，硬练会练死。

有人劝他，他就摆手：“你们不懂，凌导演都说了，有些东西不能逼。”

这句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从小桂那件事。那件事在团里传开了，传成了一个“典故”：导演说“先别定”，一个丫头就折出了好东西。年轻人听了，各有各的领会。有人领会到的是“要用心看一块坯”，阿昊领会到的是：原来不练也是一种练。

这一节要讲的，就是这个“领会”。它是介生保护最大的一个风险：无用，很容易被假冒。

先说一个让人为难的事实：从外面看，真溜达和假溜达，几乎一模一样。

小桂在练功房里折信，十几秒不说话，往窗外看。阿昊坐在台阶上发呆，两只眼睛看着远处。旁观者站在门口，分不出哪个是在孵一块坯，哪个是在躲一场硬功夫。

所以分辨真假，不能看姿势，要看别的东西。我们给四个看法。

第一，看它出现在哪里。

真溜达的出现是没有规律的，也不挑场合。小桂的折信出现在她练得最投入的那个下午，不是出现在她最怕的那个环节前面。

假溜达却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它总是出现在难处前面。阿昊的“找感觉”，每回都落在最难的一个翻身、最累的一个段落、最容易被人看出差距的地方。越是该咬牙的时候，越需要“感觉”。

难处是个试金石，因为难处是最容易被评价的地方。躲开难处，其实就是躲开尺子。真正的介生保护，保护的是一块没有尺子的地方；假溜达却借这块地方，躲开了本来就该有的尺子。

第二，看它回来的时候带了什么。

小桂折完信，过了两周，在另一场戏里，在一件衣服的衣角上，那个东西又出现了，换了个形。它回来了，而且长了。

阿昊“找”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他的翻身还是那个翻身，而且因为一个月没练，比从前慢了半拍。

真溜达有回写：走出去的人，回来时手里多少带了一点什么——哪怕是一点说不清的新东西，一个以前没有的念头，一个身体里新的松动。假溜达没有回写：去的时候是什么样，回来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

当然，回写需要时间，不能看一两天。但是看一个月、看一个季度，还是什么也没有，就该问一问了。

第三，看是谁在付账。

小桂的折信占了一个下午的练功房，占了导演的一点心力，占了老宗一个过门的时间。这些成本不大，而且是导演自己决定付的，他知道自己在付什么，也愿意付。

阿昊的“找感觉”，成本却落在别人身上：他空出来的位置，要有人替他补；联排缺了一个人，要有人替他跑；他拖慢的节奏，要全组人等。这些成本，没有人问过别人愿不愿意付。

真保护的账，有人明明白白认下了；假溜达的账，是悄悄转嫁给别人的。

第四，看它敢不敢被“看见”。

这一条最微妙。真正的介生，可以被人看着，只要看的人守“我看见了”的规矩。小桂当着全组人折信，没有躲。

假溜达，往往不让人看。你要走近，他就换话题；你问他“让我看一眼”，他说“现在还不行，没到时候”。没到时候，永远没到时候。

四个看法，不是一条规则，只是四个手感。它们没有一个能一眼定生死，合起来，时间长了，是能分辨的。

不过要承认，这件事有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结论：守门人会被骗，也会护错。

护错了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不对称值得想一想。护错一块泥，损失的是一点时间、一个下午、一点别人的忍耐，这些是可以补的。碰碎一块真的坯，损失的是一个再也长不回来的东西。如果两种错只能选一种，宁可偶尔护错，也不能偶尔碰碎。

但这个不对称是有限度的。因为护错的成本，常常不是护的人自己出，而是别人替他出。所以限度的办法不是“不护”，而是把护的份额限住：一个团里，同一时间护几块坯，每块护多久，不能一个人占满，也不能没完没了。这个份额，是前面那五个时候和这一节的看法一起定出来的。

还有两种假，也要点出来。

一种是假保护：管事的人拿“无用之用”当挡箭牌。

一个团长，面对该做的决定拖着不做，被问起来就说“这个事不能急，要给它时间”。一个老板，面对该给的钱拖着不给，被问起来就说“搞艺术的不要太看重钱”。

这些话，字面上和凌导演说的差不多，实质上完全相反。凌导演的“先别定”，他自己付了代价：他顶了团长，担了副导演的嫌，守了一个下午。假保护的人，却把代价推给了被护的人：你的工资晚点发，你的名分晚点定，你的位置晚点给，因为“你在做的是无用之用，不能用俗事来污染”。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识破、却又常常得手的把戏。识破的办法，也是前面问的那个问题：谁在付账？

另一种是用无用换名声。

有的人把“我不为有用”挂在嘴上，当一种姿态、一种身份。他不是真的在孵什么，是在用“不为有用”来换“清高”这个名。

这又是一种有用，是用无用去换的有用。他的“无用”，不是介生保护，是一种买卖。

这里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如果有人要“规定”无用，比如要求每个人每周拿出两个小时“自由创作”，写进制度里，列进考核里，这个时间多半也不会长出什么。因为无用是瞄不准的，一瞄就不是了。规定能做的，是留一块地，不去管它；规定做不到的，是要求这块地交出东西。

守门人自己，也该常常问自己三句话。

第一句：我护的这块东西，我能不能说出一个“最迟什么时候回来看它”的日子？说不出，多半是我自己也没想清。

第二句：我护它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付出什么？一点也没付，只是让别人等，那我护的可能不是它，是我的省事。

第三句：我心里，是不是已经悄悄给它定好了一个样子，只等着它长成那个样子？如果是，那我护的就不是介生，是我的预设，这块坯迟早会被我自己的手捏变形。

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对外说的。它们是守门人对自己的账。介生保护做得好不好，外人看不出来，只有守门人自己的良心和他事后的记录看得出来。

所以，回到阿昊。

凌导演没有骂他，也没有说“你这是装的”。他只是在一次排练后，对阿昊说了一句话：“你那个转身，下礼拜三下午，我陪你练。你想怎么找感觉，找；找不到，我们练到找到为止。”

下礼拜三下午，两个人在练功房里，不开灯，不放音乐，反复转了三十几遍。阿昊练到最后一遍，忽然笑了，说：“导演，我好像摸到一点什么了。”

这一点什么，是真的。可它是在咬牙的三十几遍之后摸到的，不是在台阶上坐着摸到的。

真溜达和硬功夫，不是对头，是搭档。小桂的折信，也是建立在她四年每天早起压腿、吊嗓、背词的底子上；没有这些，她不会有那一下。介生长在土里，土是要有人天天翻的。

所以“拿无用当遮羞布”的人，和“把有用当唯一”的人，其实犯的是同一个错：把路统一了。一个统一在“无用”上，一个统一在“有用”上。真正的路是季节：该咬牙时咬牙，该放下时放下，该问用时问用，该不问时不问，而且心里有数。

这就是下一节要收起来的话。

◆ 31.4　小结：两句话出自一张嘴

回头看凌导演说过的两句话。

半个月前，在练功房里，他说：“先别定。”

演出前三天，在全团面前，他说：“从今天起，谁都不许再试新东西。”

读到这里，这两句话已经不再矛盾了。它们是同一个人，看着同一个团，在不同的季节里说的话。前一句，是土里没有别人的事，一块坯刚露头，要挡开所有急着替它说话的嘴；后一句，是三百张票压在台上，一个动作的对错牵着很多人的夜晚，要把每一步都算清楚。

把这两章合起来，可以收成几件事。

第一，介生要认。说不清，舍不得，一问就散，再加上它会自己回来。

第二，介生要护。不问用，不打分，给时间，给场地。守门人做的是挡手的事，外人看来像什么都没干。

第三，护有边界。有人在等、晚一天有人受损、做出去收不回、资源有限非选不可——这样的时候，不问用不是保护，是推卸。急救、截止、承诺、分配、危机，是五个典型。

第四，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是给意义换季。尺子放下，是为了让一段没有方向的差异走一走；尺子捡回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一把更深的尺子。小桂的折信，从“表现思念”变成“一个把话折进信里的人”，靠的就是中间那几天的空白。

第五，无用会被假冒。看它是不是躲在难处前面，回来有没有带东西，账是谁在付，敢不敢被看见。守门人会护错，所以要限住份额，而不是不护。

把它们叠在一起，大约就是这一卷想说的：

介生要护，护的是一小段路，不是一种活法；该用意义的时候用到底，该放下的时候放下干净，两头都靠季节，不靠站队。

这句话有它能被推翻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团，一年到头只问用、不留一块不问用的地，却仍然年年长出新的戏路和新的演员，这句话就错了；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团，只讲无用、不设任何期限与账目，却仍然把每一场戏都演得稳当、把每一个承诺都守住，这句话也错了。我们到目前看到的，两头都做不到。

那出戏后来演了二十几场。第三场那一下折信，每场都在，每场都稍有不同：有一场她折得很快，有一场她干脆没折，只是捏着信纸的一角，捏了很久。凌导演在台侧看着，不再说“先别定”了，也不去纠正。它已经是一块烧过的坯，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分量，可是它里面，还留着一点当初没有被量过的活气。

这大概是介生被护好的样子：它长成了一样站得住的东西，而它的每一次站立，仍然带着一点“还可以不一样”。

再把这一章放回这本书的大线上看一下。

前面几卷讲的是：实用主义把意义统一在一条律上，土被压平，每一步都要意义。第七卷讲混沌：一锅粥里谈不上意义，逼它步步有用，就把它熬干。这一卷讲介生：一块坯刚露头，说不清，一碰就散，得有人挡手。而现在，这一章把话说圆了：无用不是用的对头，是用的前一个季节。

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用三个方程来看这件事。显露由差异和土一起生成，S=F(D,E)；差异由显露和土一起生成，D=G(S,E)；土由显露和差异一起生成，E=H(S,D)。小桂的折信，是三个方程同时在转：手的一停是新差异，折信的样子随之露头，练功房里的人和物被这一下重新缠了一遍，而被重新缠过的土，又改变了她下一次的手。介生保护，护的就是这三个方程还没被谁抢先定死的那一小段。导演一说“先别定”，是不让任何一个方程被提前代入一个现成的值。到了五个必须问用的时候，反过来，有人把某个值给定了：台下有人在等，时间窗口是别人定的。方程没有变，只是其中一项被别人的土按住了。

可是这里留下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凌导演靠的是什么，才知道哪一天该说“先别定”，哪一天该说“全部定死”？他靠的是三十年的经验，靠的是对这个团、这间房、这些人的熟悉。换一个导演，换一个团，这种判断还靠得住吗？

再往前一步：如果不只是一个团，而是一个孩子的一生、一座城的一年、一个国家的几十年呢？什么时候以创造为先？什么时候以幸福为先？什么时候以自由为先？什么时候三条都不为？这些季节，由谁来排，凭什么排？

下一卷的回答，从一个山上的茶园开始：春天采，夏秋养，冬天歇。茶农不问“歇有什么用”，也不问“采是不是太累”，他只看土。三条意义律怎样像茶园的四季一样轮换，三个方程怎样在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身上，各自保持平衡，是最后一卷要讲的东西。

◆

卷　九

发生卷

卷　序

不统一意义，人照着什么做事？准则不是实现某一条意义律，而是三个方程平衡着长。三条律轮着跑，像茶园里的采、养、歇；要轮换，就得看清土的来历——给土写一本家谱，这是未来知识经济的主场。

32

第32章

三条律轮着跑：茶园里的一年

◆ 32.1　采、养、歇

上一卷最后，县剧团的凌导演说过两句话。半个月前，他说“先别定”；演出前三天，他说“谁都不许再试新东西”。两句话出自一张嘴，不矛盾，是两个季节。

可是留下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什么时候该说前一句，什么时候该说后一句？凌导演靠三十年的经验，换一个人，换一个团，还靠得住吗？再往大处想，一个孩子的一生、一座城的一年、一个国家的几十年，什么时候以创造为先，什么时候以幸福为先，什么时候以自由为先，什么时候三条都不为？这些季节由谁来排，凭什么排？

上一卷收尾的那句话，是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是给意义换季。

“换季”这两个字，种茶的人最懂。他们不问“歇有什么用”，也不问“采是不是太累”，只看土。这一卷，就从一座茶园开始。

我们来设想一座茶园。这是一个构想的场景，人名也是构想的：南方山区，半坡上一片老茶园，主人姓戴，大家叫他老戴。茶树是他父亲那一辈种下的，有几块地比老戴岁数还大。

老戴一年的日子，大致是这样走的。

清明前后，山上还裹着雾，他和请来的几位婶子天不亮就上山。这是采春茶的时候，也是一年里最忙、最紧、最像“赚钱”的几天。新芽一天一个样，今天采正好，隔两天就老了。人手不够，天气还要作对：一场倒春寒，芽头就僵在那里不动；一阵连阴雨，采下来的叶子来不及杀青。婶子们的腰一直弯着，老戴嘴里只有一句话：“快，趁嫩。”

春茶采完，茶树像被掏空了一回。上一茬芽采走了，树要重新发。接下来的夏天，老戴上山的样子完全不同了：他不再背着采茶篓，而是拿着一把镰刀，一把剪子，在垄间走来走去。看哪一棵长得歪，看哪一块地的杂草压住了茶苗，看树冠的叶面够不够厚。夏茶不是不采，可他采得很少，有时候干脆整块地都不动。他说，树要自己把亏欠补回来。这一段，从外头看，园里几乎没有“产出”。

秋天，最后一茬茶采过，山上渐渐静了。入冬以后，老戴才真正闲下来，可闲的是手，不是人。他要修剪，要在垄间开沟施肥，要把板结的土翻松，要看哪块地的树该动大手术，哪块只需轻轻理一理。山上空空的，没有一片能卖的叶子。

采、养、歇——一年三段。

如果拿“有用”这把尺子去量，答案很干脆：春天有用，夏秋半有用，冬天没用。春天是收成，夏秋是准备，冬天是闲着。一年的账，似乎全落在春天那十几天里。

可是老戴不这样看。有一年，外地来的一位年轻人在园子里住了几天，临走时问他：“戴叔，你们是不是春天赚钱，其他时候都在等？”

老戴想了想，说：“春天不是赚钱。春天是把一年的账收到手里。”

这句话，是这一节的判词：**一座茶园的收成不是在春天长出来的，春天只是把一年里长出来的东西收了。**

请看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春天那一刀（采摘），是一条差异序列走出去的一步：这一芽采，那一芽留；这一天采，那一天等。采下去的每一步，都在改变茶树明年的样子。夏天看起来“没有产出”的日子，树冠一层层把叶面撑开，根往深处扎，这是树的样子在一层层显露，显露给来年的春天用。冬天翻松的土、埋下去的肥，是在改写土本身：明年春天的芽，长在什么样的土里，就由这个冬天定了一大半。

三段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一棵树怎样年复一年地活下去、还能发芽——被日历切成了三截。采，是把长出来的东西取走一部分；养，是让树自己把样子再撑回来；歇，是让土重新变成能长东西的土。三样缠在一起，拿掉任何一截，另外两截都不成立。春天采得再狠，若夏秋不养、冬天不歇，第三年春天的芽就瘦了。

这里有一个很朴素的回写：今年怎么采，决定了明年采什么。一次采摘不是一次终结，是下一次的起点。老戴那几块最老的地为什么还在出茶，不是因为它们“天生好”，而是因为几十年来，每一年的采、每一年的养、每一年的歇，都一层层写进了树和土里。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更大的问题。

这三段日子，是不是也恰好对应着人做事的三种“为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长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创造）；有的时候，是为了日子过得踏实舒坦（幸福）；有的时候，是为了自己的事自己做得了主（自由）；还有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为，让地歇着。

如果是这样，那么前面几卷所批评的那件事——把三条意义律统一成一条——放在茶园里，会是什么样子？

老戴有一年差点就走上了这条路。

◆ 32.2　谁来领头：三条律的轮换

那年春茶行情特别好。收茶的老板打电话来，价钱比往年高出一截，还说“有多少要多少”。

老戴心动了。他心想：夏天为什么不采？秋天为什么不采？价钱摆在这里，树又不会说话。他把婶子们多留了两个月，夏茶、秋茶一茬接一茬地采，一直采到十月。

那一年，账面很好看。

第二年春天，他上山，心里咯噔了一下：芽头比往年瘦，出芽也晚了几天，几块老地上有的枝条干脆没发出来。他请来的婶子们站在地头，一个个不吭声。

第三年更差。

这件事在山里并不稀奇，每隔几年总有人重蹈覆辙。我们先别说他“贪”，因为这样说，等于把一个出在做法上的问题收成了人品问题。我们要看的是：老戴那一年，到底犯了什么错？

用本书前面的话说：他把一条意义律，摆在了一年四季的领头位置上，而且不让位。那一年他只问一个问题：“这块地还能不能再长出点东西来换钱？”这是创造律的问法（长出原来没有的、可以拿出去的东西），只不过披上了行情的外衣。这个问题在春天问，是对的；在夏秋冬接着问，就是错的。茶树有自己的节律，土有自己的账，不管你问几遍，它们不会改口。

请注意，我们并不是说创造律不好。恰恰相反：没有春天那一轮拼命地采，茶园就没有收成，就没有婶子们的工钱，就没有来年的肥和苗。问题是，只有它一个人在领头。

现在把话说回夜市上的老周。他一晚上被三个问题问过：能不能长出新东西，吃的人高不高兴，你还是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之所以摆了十一年摊子，是因为这三个问题“谁也没被统一”。这一点，在茶园里看得更清楚——三个问题不是同时问的，是轮着问的。

春天，创造律领头。这个时候，问题是：今年的芽怎么采、采多少、做成什么样、能不能试一款没做过的？老戴这些年每个春天，总要挑一小块地试新做法：用夏天的叶子试做红茶，或者把春芽按另一种火候炒一炒。创造问的是“能不能长出原来没有的”，春天正是它最理直气壮的季节，因为新芽自己就在往外冒。

夏末初秋，幸福律往前站了一步。这个时候的问题变成了：婶子们这一季累不累，一家人有没有喘口气，老主顾拿到的茶合不合口，今年有没有哪个人觉得“这样干下去不值”。老戴会在这个时候请婶子们吃一顿像样的饭，会把头一批夏茶留下一点，送给常年来买茶的老人，看他们喝了怎么说。幸福律问的是“踏实不踏实、舒坦不舒坦”，这是一座园子能留住人的原因。如果春天的账收了，人却散了，来年再好的芽也没人采。

秋天，自由律领头的时候最多。哪块地今年不动？哪个渠道不卖了？要不要把一部分茶留着自己卖，不再全交给收茶的老板？老戴有几年的秋天，是整座山最安静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地头，盘算的不是“能赚多少”，也不是“谁高兴”，而是“这座园子，到底我说了算，还是行情说了算”。自由律问的是“我还握不握得住方向”。一个茶农若把全部收成都押给一个收茶老板，他的自由其实早就交出去了，不管那年价钱好不好。

冬天，什么都不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任何一条律领头。没有“要长出什么”，没有“谁要高兴”，也没有“该做什么选择”。有的只是剪、翻、埋、看。

冬天这一段，要多说几句，因为它最容易被误会。

有人会说：冬天老戴不是还在修剪、施肥、翻土吗？这怎么能叫“什么都不为”？修剪是为了来年的芽，施肥是为了来年的叶，不都是“为了创造”吗？

这个反驳有力量，我们得认真对付它。它说得对的地方是：冬天的每一个动作，确实都和来年有关。可它漏掉了一件事：老戴在冬天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个“要长出什么”的问题。他剪的时候，问的是“这根枝条还有没有劲”，不是“明年要出多少”；他翻土的时候，问的是“这块地累不累”，不是“这块地能不能再多榨一点”。他的手在干活，他的意义在歇着。

这正是上一卷说的“给意义换季”：冬天的活是活，可它不是“为了”什么的活。它更像是一种照看。你照看一个睡着的孩子，不是为了让他明天考出好成绩；你照看一块歇着的地，也不是为了让它明年多交一成。如果硬要问“为了什么”，答案只能是“让它按它自己的样子歇好”。而问出这个问题的一瞬间，其实就已经不是冬天的问法了。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冬天那一段“什么都不为”，不是在三条律之外，而是三条律共同让出来的。创造把“再长出点什么”的催促按下去，幸福把“得有个交代”的心思按下去，自由把“我得再多一个选项”的盘算按下去。三条律一起退到后面，才有一个季节，是只剩下样子、路和土三样东西自己在说话。老戴在冬天读到的东西，常常比其他三个季节加起来都多，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哪个问题在抢着说话。

如果把一年当成一首曲子，冬天就是那个最长的休止。第26章说过，休止不是没有声音，是下一个乐句得以成形的地方。

请注意“领头”这个词。轮换，不是让一条律上台，其他两条律下台。春天创造领头，幸福和自由并没有消失：婶子们的工钱要算得让人心里踏实（幸福在场），哪块地先采、哪块地让开，最后还是老戴定（自由在场）。夏末幸福领头，创造也没停：他还在悄悄琢磨新的炒法。三条律始终在场，只是谁来问第一个问题、谁的问题先被听见，在换。

这一点，我们可以用本书的话再说准一点：三条律是D1的三个侧面，不是三个部门。三个部门可以各管各的、互不打扰；三个侧面是同一块东西的三面，一面转到前头，另外两面不是被扔掉，而是退到了后面。

再来看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凭什么说是该轮换了？是老戴的心情？是日历？是老板的电话？

都不是。茶园自己会告诉他。

想一想老戴第二年春天看到的那一幕：芽瘦了，出得晚了。这不是“创造”出了问题，也不是“他的意愿”出了问题，而是树显露出来的样子（芽瘦、叶薄），和土里实际能给的东西（肥力、水分、根的深度）顶撞了。树的样子是一年一年采出来的，土是一年一年积累的；采得太狠，两者就对不上了。

这个顶撞，在本书的三原理里有一个位置：样子和土顶撞，推动的是路往哪里走。换成茶园的话：芽瘦了，土乏了，这就逼着老戴改变他“今年为了什么”。他不是“决定”去养树，是树和土逼着他把意义的领头位置让给别的东西。

所以，轮换不是人心血来潮发明的规矩，是显露和土顶撞时，对意义目标发出的一道换位的命令。人的本事，不在于发明轮换，而在于读懂这道命令。

这里有一个可以被推翻的判断：如果老戴连续三年全年采摘，树势、芽头、土力都没有往下走，这一节说的话就错了。山里人知道，它不会错。

这一节的判词是：**轮换不是三条律轮流坐庄，而是同一棵树在一年里先后让不同的问题站到前面；换位的命令不来自人，来自样子与土的顶撞。**

下一节，我们要问：这道命令是怎样被人读出来的？

◆ 32.3　轮换的信号：看土

立秋前后的一个早上，老戴一个人上山，什么也没带。

他不是去采茶，也不是去干活，只是沿着垄间走。走到第三块地的时候，他蹲下来，用手捻起一撮土，在手心里搓了搓，又凑近闻了闻。接着他站起来，翻开几片叶子，看叶背，看新梢的节间，看芽头顶上那一点绒毛是不是还饱满。

旁边跟着他的女儿阿芸（同样是构想的人物，在城里做过几年事，这年春天回了山）问他：“爸，你在看什么？”

老戴说：“看它让不让。”

阿芸没听懂。老戴也不急着解释，只是指着脚下：“你闻，这块地的土，今年有点发酸，比去年紧。你再看这边这棵，芽还没起，叶子倒先厚了——它在自己往回收。这块地，今年就不要再动了。”

阿芸后来跟人讲起这一幕，说她爸“像在听一个不说话的人说话”。

这就是轮换的信号。它们不在日历上，也不在收茶老板的电话里，它们在树和土正在显露的那些细小的样子里。老戴蹲下来的那几分钟，读的是三类东西。

第一类，读树的样子。芽瘦不瘦，节间长不长，新叶厚不厚，叶色匀不匀，发芽的间隔是缩短了还是拉长了。这些东西是树这一年一层一层显出来的。一棵树在被采得太紧的时候，会把“样子”收小：芽变细，梢变短，叶面变薄。这不是树在抗议，是它把有限的东西分给了活命，不再分给长新芽。

第二类，读土的状态。土松还是紧，湿还是干，有没有被雨水冲出沟，翻开以后有没有细细的根须、有没有虫在动。土的这些读数，说的是这块地的“底子”——它能不能继续接住一轮新的取走。

第三类，读人手和路子。这一类最容易被忽略。采茶的婶子们这几天上山，是不是越来越赶、越来越躁？分地的时候有没有人嘟囔“这块地不好采”？采的路线是不是越来越固定，只走容易走的几条垄，把边角留着不管？采摘的这条路本身，也会“显出”某种紧张：太紧的路，人的动作会变形，叶子被扯坏的比例会升高。

三类读数摆在一起，才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只看树，不看土，你分不清芽瘦是因为刚采过，还是因为土乏了；只看土，不看人手，你不知道这块地被采的方式合不合它的性子；只看人手，不看树和土，那就成了“管理问题”，换个更严的管理者就以为解决了。

换一个角度，把这一年的顶撞走完一遍，可以看到三拍。

第一拍，张力积累。春天采得狠，树的样子（芽、叶）一点点往回收，土里能给的东西也在一点点见底。这个时候从外面看一切正常，采下来的茶还是好茶，婶子们的工钱照发。张力在悄悄攒，谁也看不见。

第二拍，形状改变。攒到了某个点，树的样子先变了：芽瘦了，叶薄了，发芽的间隔拉长了。这就是形状变了。要是老戴在这一刻读到了，他会让位，让意义的领头从“再取”转到“养”。要是没读到，或者读到了装没读到，树会替他把意义改掉：第二年春天，他想创造也没得创造，因为没有芽。

第三拍，回写。不管是老戴主动让位，还是树逼着他让位，换了位的意义都会写进下一年的起点。读懂的那一年，下一个春天从一棵养好了的树开始；没读懂的那一年，下一个春天从一棵瘦了的树开始。两种起点，是同一场顶撞留下的两种回写。

这里要单独说一点：顶撞并不是毛病。如果没有这个顶撞，老戴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位。是树和土对“再取”的那一下顶，才使得轮换有了依据。一个从来顶不起来的茶园，要么是树太弱，要么是人从不去试它的边，两种情形都不是好事。

注意，老戴读到的这些读数，不是顶撞本身，而是顶撞留下的痕迹。就像孩子脸红，是紧张的读数，不是紧张本身；紧张是他心里两样东西在顶着。同样，芽瘦是“采的路”和“土的底子”互相顶着之后，在树身上显出来的样子。读数能提醒你，但它不能代替你去弄清到底是哪两样在顶。

老戴那一年的错，恰恰是只看了行情这个读数。行情是外头的数字，它不会告诉你树和土在说什么。他把一个本来应该和树势、土力并排着看的读数，当成了唯一的读数。

读数读得对不对，还要靠一样东西：来历。

阿芸那天蹲在同一块地上，同一撮土，同一片叶子，她看不出什么。她只觉得土是一块黑的、湿的、有点酸味的东西。可老戴看到的是一段历史：这块地三年前遇过一个特别旱的夏天，那一年他重剪过一批枝条，之后两年没怎么采；去

年开始恢复采摘，今年就该收一收了。土发酸，是去年多下了一场雨之后留的痕。他不用想，那些事自己就浮上来了。

这就是同一性谱系的最朴素的样子：一样东西不是现在这样子，而是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样子。读信号，其实是在读来历。同一撮土，在有来历的人手里是一份病历，在没有来历的人手里只是一把土。

所以，轮换的信号，不是一张可以交给任何人的“检查清单”。清单上可以写“芽头瘦、叶色浅、土发紧”，可这几条放在不同的地块上，意思是不同的。一块新开垦的地芽头瘦是常事，一块老地芽头瘦就是警告。同一个读数，在不同的来历里，是不同的话。这件事，要到第34章才展开：当人们要为很多地块、很多人、很多国家去读信号的时候，来历从哪里来？现在先记住这一点：看土，是看有来历的土。

再讲一个相反的方向。

很多人听到“歇”，第一反应是：那不就是偷懒？

老戴有个邻居，也有一片茶园。这家的茶园有一年也“歇”了——没人去，没人管，杂草长到齐腰，几棵树病了没人剪，最后一场大雨冲垮了一道坎，也没人修。到第二年，邻居说：我这是让地休息。

这不是休息，这是荒废。

老戴的歇，和邻居的“歇”，从远处看一模一样：都没有采摘，都没有收成，都有一整块地空在那里。可近处看是两回事。老戴的歇，是有人看着的歇：他知道哪块地为什么歇，歇多久，什么时候该翻土，什么时候该下肥，什么样的读数出现了才能再动。邻居的歇，是没有人看着的歇：它不是为了让土恢复，而是因为没有人想管。

这个差别，上一卷已经谈过——“假溜达”是拿“无用”当偷懒或逃避。到了茶园，这件事有一个判别方法：真正的歇，仍然留着读数。休耕的田有人去看，有人记，有人到时候回来。荒废没有。

回到导论那座被拆掉的澡堂。老马他们在里头那几个钟头，其实是镇上的一块“歇着的地”。它之所以有用，不是因为它歇着，而是因为它是有人看着的歇：谁家有难处，谁的脸色不对，老马他们几个都在眼里。拆它的人只看了一个读数——一张票八块钱，一天卖不到三十张——而没有读另外两类：这块地上长着什么，人在那里怎样彼此照应。读一个读数就动手，和老戴那年只看行情就连采到十月，是同一种错。

这一节的判词：**轮换的信号不在表上，在有来历的土里；真正的歇不是没人管，而是有人看着它歇。**

可这里还有一个麻烦。有人会说：既然这么难读，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张表，让大家照着来——春天创造，夏秋幸福，秋末自由，冬天空着？

茶园里真有人这样做过。

◆ 32.4　补丁与轮换：给一张表行不行

县里来过一位农技员，人很好，也很用心。他看了老戴那几年的起落，回去花了两个晚上，给全乡的茶农做了一张表。

表很清楚：横着是十二个月，竖着是四行。三月到五月，“以创造为先：试新品、试新工艺”；六月到八月，“以幸福为先：用工、福利、客户回访”；九月到十一月，“以自主为先：渠道、定价、地块规划”；十二月到二月，“休整：修剪、施肥、翻土”。每一格后面还附了几条要点。

这张表发下去，大家都说好。它简单，好记，贴在墙上也好看。有几户照着做了一年，确实比从前少犯错。

第二年出了事。

那年开春，一场晚霜落在了清明前后。芽头刚冒出来，一夜之间全僵了。按表，三月到五月是“创造”的季节，该试新品、试新工艺。可是这个时候山上的芽根本没有长出来，试什么？有户人家硬是照表去试，结果把本该留着养的几根新枝也折腾坏了。

反过来，同一年的秋天雨水特别足，几块地的土反而松软肥厚，树势恢复得比往年都好。按表，九月到十一月是“自主”的季节，该考虑渠道和定价。可是老戴看着满山的好叶子，心里冒出来的是另一个问题：这些树这么有劲，我能不能再试点别的？——创造的问题，在一张表认定“该轮到自主”的时候，又冒了出来。他没有按表走，他试了，那年秋天他多做了一批新茶，第二年卖得最好。

表错了吗？也不全错。表里的顺序，大体上是这片山这些年的平均样子。它错在把“平均”当成了“每一年”，把“通常”当成了“信号”。

这件事，可以说得更准一些：一张表，是把轮换的结果固定下来，把轮换的原因丢掉了。表上写着“三月创造”，因为过去很多年，三月是新芽冒头的时候，样子和土刚好支持“长出新东西”的问题。可是当晚霜把芽冻僵，样子和土已经在说“别动，等”，表上那句“三月创造”就成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命令。

这样的表，在本书的话里叫做补丁。

补丁不是坏东西。它帮人少犯错，它把别人读土读出来的经验，浓缩成一条条容易记的规则。站上有两本书，替杜威补过类似的东西。我们先把它们各自是什么说准，再问它们补的是什么、补不了什么。

第180号书判断：杜威的《逻辑》只给修路记账，记账在做之后，指引在做之前，所以他写不出一条“什么时候放下修补、为了什么、往哪里另开一条路”的换挡规则。这本书替他补了一页，叫“开路五句”：先立目标，先在理念界走一遍，不必等卡住，认出换挡的信号，问新路能不能活。其中第四句说，同一处连续修补都失败、修好的路越修越窄、承受的人一次次被耗尽，就是该从修路换到开路的时候。

第170号书有一张“三格纸”，是给家长用的：孩子问“为什么要学”，别只给一个答案，把这件事分成三格写，我想弄懂什么，我想自己说了算的是什么，我想和谁一起开心。哪一格空着，就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补。

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和茶园里的事很近。“连续修补都失败、承受的人被耗尽”，就是老戴读到的“芽瘦了、婶子们躁了”；“哪一格空着”，就是看哪一条律被默默吞掉了。本书不重讲它们，只指出它们各自站在哪里。

开路五句帮人从一条路换到另一条路，换的时候要先立目标。它回答的是“该不该换、换去哪里”。本书多问两件事：第一，立下的目标管多久？春天立的目标，到了冬天还管不管？第二，换挡之后，车总是还在走；可有一个季节，是整辆车都该停下。五句里没有写这一句，因为它的问题本来就是“怎样开路”，不是“怎样歇”。

三格纸帮人看见哪一格空着，空着就补。本书多问一件事：空着的格子，有时不是该补的，是该歇的。冬天的茶园，三格全空，没有一格有“产出”，可你不能因此去补。纸上的“空”，分不出是荒废还是休整；分得出，要靠有人看着，也就是要有土的来历。

说到底，这两样东西都是补丁：长在“人要往前走”这条路里面，帮这条路少出错。轮换要的，是这条路自己让位。

再说“并排”的一点。三格纸把创造、自由、幸福三样并排放在一张纸上，已经比只认一条律的做法进了一步；第170号书又判定三格里站着的是同一个影子，叫生长。本书在卷一已经裁定，这个影子是自由律的读数。如果这个裁定成立，三格纸的三格，就不是三条同样重的律，而是同一条律的三个说法。这一点，第3章已讲，这里只提醒：纸上并排，不等于三条律真的轮着领头。

所以，补丁和轮换的差别，可以放在三个问题里：

第一，谁来决定换？补丁里，换是规则决定的；轮换里，换是样子和土的顶撞决定的。

第二，换的是什么？补丁换的是同一条律里的做法（挡位、格子、步骤）；轮换换的是哪一条律领头，包括哪一条都不领头。

第三，换错了怎么办？补丁错了，换一个补丁；轮换错了，是土在回话，今年的芽瘦了，明年的土乏了。

这不是说补丁没用。相反，在一个已经被统一了的世界里，补丁是人们手里最现实的东西。一个从来没学过看土的人，先有一张表，总比什么都没有强。第180号书里还有一个提醒：目标立不起来、一团乱麻的时候，硬逼出一个目标只会立错，先做起来，在做里找方向。表就是这样的“先做起来”。

只是，我们得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什么。一张表，用得好，是别人读土的结果交给你；用得不好，是你不再读土。老戴那位邻居，照表走了三年，第四年连山都懒得上了，因为“表上有”。他不是被表害的，他是被“有了表就不用看”害的。

老戴后来对那张表做了一件事，值得记下来。他没有扔，也没有照着用，而是在每个月的格子旁边，多画了一栏，叫“去年此时”。

三月那一格，他写：去年三月初八开始发芽，晚霜没来，头茬采了四天。今年三月，他再写：初十才见芽，夜里还有霜，头茬等了六天。四月的格子，他写：东头那块地今年比去年晚了一周。年复一年，这张表从一张“该做什么”的表，变成了一张“这一天通常是什么样、这一年是什么样”的账。

这个小小的变化，把表的性质改了。原来的表是一道命令：三月，创造。现在的表是一份记录：三月，通常如此，今年如此。命令不会随土变，记录却一年一年地积累成土的家谱。一张表的好坏，不在表上写了什么，而在它是不是还留着读数和来历。

所以，对“给不给表”这个问题，茶园的回答是：可以给，但要给一张会被土改写的表。一张不会被改写的表，是补丁；一张年年被改写的表，已经成了轮换的账本。这个差别，从格子外面看不出来，要看格子里的字每年一样不一样。

这一节的判词：**补丁帮人在一条路上少出错，轮换是让不同的问题轮着领头、也轮着都不领头；表、五句、三格纸都可以帮人，但它们自己不会看土。**

那么，轮换到底在为谁服务？它的准则是什么？是让每条律都轮到一次吗？是让三条律各占三分之一吗？

下一章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在这之前，先把这一章收成一句话。

◆ 32.5　小结：换季

茶园的一年，采、养、歇，不是有用、半有用、没用，而是同一件事——一棵树、一片土、一群人如何年复一年活下去、还能发芽——的三个季节。

三条意义律不是要选一条，而是要轮着领头；领头的换位不来自人的偏好，来自样子与土的顶撞；读得懂这个顶撞，要靠有来历的土；而最后总有一个季节，三条律都不领头。

上一卷说的“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而是给意义换季”，到这里有了落点：换季不是一个比喻，是茶园每年都在做的事。

回头看老戴那年的错，现在可以说得更清楚。他不是不懂创造，也不是不爱钱，他错在把一个只配在春天问的问题，问了一整年；错在把行情这一个读数，当成了树和土的全部话语；错在以为歇着的季节是白白浪费的季节。三个错放在一起，其实是同一个错：他想让一条律永远领头。

而茶树的回答很朴素，它不骂人，只是第二年春天，把芽长得瘦一点。这是土对统一的回话，不带情绪，也不留情面。

只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使三条律轮着跑，它们也是在跑——要跑，就得有个准则，说明轮换是为了什么。如果准则是“让三条律都实现”，我们就又回到了那个“每一步都要意义”的老路上。

下一章，我们要把轮换的准则说出来：不是实现任何一条意义律，而是三个方程一起平衡着发展。

◆

33

第33章

准则：三个方程平衡着长

◆ 33.1　评哪个奖

乡里的茶叶合作社，每年冬天开一次总结会，会后评几个奖。

我们接着构想下去：合作社里有十来户人家，老戴是其中一户。这一年评了三个奖。头一个叫“增产奖”，奖给一年里出茶最多、品种试得最多的一户。第二个叫“口碑奖”，奖给老主顾回头率最高、婶子们干得最安心的一户。第三个叫“自主奖”，奖给不靠收茶老板、自己闯出渠道、自己说了算的一户。

三个奖，三户人家上台领。台下的议论很有意思。

有人说：“增产奖该是头一个，没有收成，别的都是空的。”有人说：“口碑奖才是根本，人心散了，茶就没人采。”还有人说：“自主奖最难得，你看那些被收茶老板捏着的，今年好，明年一压价就垮。”

三个说法，每个都有道理，每个都说得很用力。眼看就要吵起来，一位年纪最大的茶农开口了。他问了一句话，台下一下子静了：

“你们把这三个奖加起来，是想把茶园变成什么？”

没有人答得上来。

这个场景是构想的，但里头的问题是真实的：如果三条律都有道理，那做事的准则到底是什么？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把三条律都做到最好。创造要，幸福要，自由也要，一个都不能少。

还有一个更温和的答案：折中。三条律各让一步，取个中间，不偏不倚。很多合作社的会议，最后都落在这个答案上。

折中有它的好处：吵不起来，大家都能接受。可它有一个看不见的毛病：折中取的是三个读数之间的中点，而中点不是任何一块地的实际样子。老戴那两块冷地，春初总比别处晚发，要是拿三条律的“中间值”去决定怎么采，既不是最适合那块地的采法，也不是最适合那块地的歇法，只是一个谁也不得罪的数字。折中让三方都满意，却可能让土不满意。

回头看头一个答案，也就是把三条律都做到最好，听上去无懈可击，可它有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它仍然是在实现D1。它把意义的三条律当成三个终点，要求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把它们全部“达到”。如果达不到，就是不够努力；如果达到了，就算完成。

本书走到这里，要对这个答案说：不。准则不是实现D1，而是三个方程平衡着发展。

为什么不是实现D1？有三层理由，一层比一层深。

第一层理由：D1本来就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前几卷反复说过，实用主义的毛病，是把一条意义律当成了“路本来该为了什么”。三方程里写得明白：D=G(S,E)——路往哪里走，是显露出来的样子和土一起推出来的。意义目标不是挂在远处等你走过去的旗杆，而是在样子和土的变化里一点一点长出来、一次一次被改写的。老戴年轻时想的是“多出茶多挣钱”，三十年后他想的是“让这座园子再活三十年”，两个“为了什么”之间没有一份文件把它们连起来，是树和土、婶子们和收茶老板、一次次晚霜和一场场丰年，把他的“为了什么”一点点

推成了今天这样。所以“实现D1”本身是一个发现学的说法——它假定D1早就在那里。

第二层理由：把任何一条律推到底，就是前几卷讲过的死法。创造推到底，是要求每一茬都出新，最后茶园里没有一棵老树让人记得；幸福推到底，是每一步都要舒服，最后谁也不敢动那棵该动的老树；自由推到底，是选项永远要多一个，最后没有一个选项被真正走完。这三种死法，卷七已经细讲。这里只提醒一句：“三个都做到最好”并不比“只做一个到最好”安全，它只是把三种死法排成了队。

第三层理由：当D1成了准则，E就被压扁了。如果准则是“实现创造、幸福、自由”，那么土的不同、来历的不同，都只是实现过程中的“条件”。一块土壤酸一点，是条件；一片山雾大一点，是条件；一户人家人手少，是条件。条件，就是要被克服的东西。可是在第1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土不是条件，土是纠缠，是事情不可分的一半。一旦把土当成条件，我们就又回到了“统一的D偷运统一的E”。

那么，用什么做准则？

答案要回到老戴那天早晨在地头做的事。

他蹲下来，捻起土，翻看叶子，闻，看。他不是在问“我今天要实现什么”。他在问的是一件更朴素的事：这棵树，这片土，我这一年的做法，三者之间还接得上吗？

用三个方程的话说，就是：

茶叶长成什么样（S），是他这一年的采法（D）和这片山的土（E）一起做出来的。

他这一年怎么采、为了什么采（D），是树现在的样子（S）和这片山的土（E）一起推着的。

这片山的土（E），又被树的样子（S）和他一年年的采法（D）一点一点改写着。

三句话转了一圈。没有哪一句是“起点”，没有哪一句是“最终目的”。采法改了，树的样子会变，土会变，下一年的采法又被改了的样子和土推着变；土改了，树和采法也要跟着变。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圈。

这个圈为什么会转，而不是转两下就停？因为圈上每一处都有一对顶撞在推。

采法和土顶撞的时候，推动的是树的样子：采得急、土里供不上，叶子就薄下来。树的样子和土顶撞的时候，推动的是路：芽瘦了，土乏了，老戴今年为了什么，就得换一个答案。采法和树的样子顶撞的时候，推动的是土：这一年的采摘在树身上留了伤，冬天的肥和翻土，就是土对这个伤的回应。

三对顶撞，各推一处。哪一处都不是“发动机”，哪一对都不是“毛病”。老戴要做的，不是让顶撞消失，而是别让任何一对顶撞没有出口。采法与土顶着，他得给它出口（让位、养树）；样子与土顶着，他得给它出口（改今年的问法）；采法与样子顶着，他得给它出口（冬天的肥与歇）。出口堵死的地方，圈就开始卡。

平衡，就是这个圈还转得动。

这个定义需要说得更细一点，因为“平衡”这个词太容易被误解成“三者各占三分之一”。

不是的。茶园里不可能春夏秋冬各占四分之一的收成，也不可能创造、幸福、自由各出三分之一的力。平衡不是分量上的均分，而是每一个方程里被生成的那一维，仍然在被另外两维生成。

换句话说，平衡的反面，是某一维变成了“给定”：它不再被另外两维推动，反而反过来压着另外两维。比如：

茶叶的样子（S）被钉死了——市场有一个“明前茶”的统一标准，所有人都得往这个样子上做。样子不再由采法和土一起做出来，土只好迁就样子。

路（D）被钉死了——上头定了一个全乡的增产计划，每块地都得照着这个数去采。路不再由样子和土一起推，样子和土只好迁就路。

土（E）被钉死了——“咱们这座山的土就是好，几辈子都这样，不用管”。土不再被样子和路改写，它也就不再被看、被养，最后在没人看着的时候，悄悄坏掉。

三种钉死，都是在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出现的。第一种是S被统一，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第二种是D被统一，实用主义的新路；第三种是E被统一——第35章会把它当作一个只作猜想的问题提出来。

所以，当台下的老茶农问“你们把这三个奖加起来，想把茶园变成什么”，最好的回答，大概就是老戴后来说的那句：

“想让它明年还发芽。”

这句话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实现”。它只是在说：三个方程，明年还转得动。

这一节的判词：**准则不是把某一条意义律做到头，而是让“样子、路、土”这三者互相生成的圈明年还转得动；平衡不是均分，而是没有哪一样被钉成了给定。**

可是“转得动”在不同的大小上，样子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圈，一个合作社的圈，一个国家的圈，怎么个转法?

◆ 33.2　三个尺度上的圈

先说一个人。

阿芸回山的头一个春天，耳边有三个声音。

城里的老同学劝她：“现在做茶，要做就做大，开直播、做品牌，一年翻几倍。”这是创造的声音，也有一点行情的味道。

妈妈说：“你一个女孩子，回来守着这几亩茶，图个安稳就行，别折腾。”这是幸福的声音，朴素，但分量很重。

阿芸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声音，说得最轻，却最固执：这回我要自己说了算，不再给任何人打工，也不看任何人脸色。这是自由的声音。

三个声音都对。阿芸要是只听其中一个，就是前面几卷里描写过的那些人：只听第一个，三年后可能累垮；只听第二个，五年后可能觉得人生被锁住；只听第三个，可能一个人守着一座山，谁也靠不上。

她做了一件看上去很笨的事：什么也没决定。

第一年，她基本跟着爸爸走。爸爸采哪块地，她跟着采；爸爸歇哪块地，她跟着看。她多做了一件事：买了个本子，把每一天的雾、雨、气温、哪块地采了多少、芽怎么样，全记下来。她爸笑她：“记这个干什么？”她说：“我不懂，先记着。”

第二年，她在一块最边上的小地试了一款新做法。不是什么大动作，就是把一部分春芽按不同火候炒了几锅，分别记下来，送给常来买茶的几位老人喝。

第三年，她翻开前两年的本子，忽然读懂了爸爸说的“让不让”。有两块地，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同一个时间段芽头都发得慢，原来不是偶然，是那一片的土在春初总比别处冷。她开始知道，哪一个声音在哪个季节应该先听。

到了第四年，她拿定了一个主意：做一款只用那两块冷地的春芽做的茶，量很少，不扩大，价钱定得稍高，只卖给回头客。这个决定，三个声音都听见了——有一点新（创造），老主顾喜欢（幸福），渠道和价钱是自己定的（自由）。可是它并不是“三个声音各让一步的折中”。它是从那两块冷地的土里长出来的。

我们用三个方程看这个过程。

阿芸的样子——她做的茶、她在山上的位置、她在乡里被看成什么人——是她这几年的做法和这座山的土一起做出来的。

她的做法——先记、再试、再定——是她当时的样子（一个刚回来、什么都不懂的人）和这座山的土（爸爸的老园、冷地、老主顾）一起推出来的。

而山的土，也被她改写了：那两块冷地原来只是“晚发的地”，现在成了一款茶的来处；那几位老人原来只是主顾，现在成了她第一批试喝的人；爸爸那本只存在脑子里的账，现在有了纸面上的一份。

这就是一个人的圈。它的标志不是“她实现了什么”，而是：三件事还互相带着走，没有一件被钉死。如果有一天阿芸在本子的第一页写下“五年做到多少产值”，然后每年按这个数倒推，她的圈就开始被钉死了：路不再听样子和土的话，山上哪块地不愿意，她会觉得是山“不配合”。

再说一个组织。

我们的构想中，合作社是十来户人家凑在一起的。它的圈，大一点，也复杂一点。

合作社有个章程：统一的品牌，统一的包装，统一的收购标准。这些东西，本质上是一种样子——合作社“显露”给外头的那个样子。有了它，十来户的茶才能一起卖出去。

合作社有一套做法：怎么分工，怎么记工分，怎么在春忙时互相借人，怎么在价格波动的时候谈判。这是路。

合作社当然还有一片土：这十来户人家各自的地，各自的家史，谁和谁沾亲，谁和谁早年为一道坎闹过，哪一年谁家遭了灾大家凑过钱。这些东西写不进章程，可没有它们，章程是一页纸。

一个转得动的合作社，样子、路、土三者互相带着走：章程不是一次定死的，每年冬天开会，有户人家发现标准里有一条逼着他们把边角的老树砍掉，大家讨论后改了这一条（路和土改写了样子）；开春以后，因为这条改了，借人的办法也跟着调（样子推动了路）；一户人家遭了灾，大家第二年自觉多出点工，土里这份“互相有账”的东西又厚了一层（样子和路改写了土）。

一个转不动的合作社，不是一下坏的。它是慢慢滑下去的：先是有一年为了“品牌统一”，把一条标准写得很死，各户的地不管土性如何都得照做（样子被钉死）；然后为了“把量做上去”，定了增产计划（路被钉死）；再然后，没有人再去问这十来户的土有什么不同，因为“章程上没有这一栏”（土被忽略）。三个方程都没有明确被反对，可它们慢慢地不再互相生成，而是变成了三个各管各的部门。

这里有个很具体的检验：在这个合作社里，一个新发现，能不能改写章程？如果十年里没有一条章程是被某户的做法改过的，那说明它的样子已经被钉死，不再被路和土推动了。

最后说一个国家。

国家这么大，只能说得粗一点，也要说得公道一点。

一个国家的治理，也有它的样子（制度、标准、统计数字）、路（政策、改革、各种计划）和土（人口、产业、地方的差异、几代人的记忆）。前几章讲过，国家治理常常像钟摆：一个时期着重增长，一个时期着重民生，一个时期着重权利。每一次摆动，都可以说得出一堆道理，每一边也都自称“务实”。

三个方程的看法，是这样的：钟摆不是平衡，钟摆是轮流坐庄。每一次摆到一头，那一头的律就被统一成“唯一的准则”，另外两条被收到下面当补丁。摆到另一头，则反过来。每一次摆动都像老戴那年全年采茶——一律领头，不让位。

平衡的样子，不是摆得小一点，而是每一次摆动都留下了读数，下一次摆动读得懂这些读数。比如，上一个时期着重增长，留下了某些地方的土力乏了、某些行业的人手散了、某些人觉得自己的话没处说了；下一个时期着重民生时，这些留下的痕迹成不成为推它的因素？如果成，那这一摆不是钟摆的回荡，而是一个圈在转。如果不成，那只是又一个统一替换了上一个统一。

我们不评价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时期做得对不对。这样的评价不属于这本书，也容易变成另一种统一。这里只给出一个检验的问法：一个国家的制度，是不是被它自己的政策留下的痕迹改写过？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不是被它自己土里的差异推动过？如果两个问题都能找到很多例子，圈在转。如果一个也找不到，三个方程已经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的部门。

三个尺度，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也有一个容易忽视的关系。

共同的地方是：每个尺度都是同一组方程，只是大小不同。

容易忽视的关系是：尺度之间也在互相回写。阿芸那本本子，被爸爸翻过，被合作社的会计借去看过，后来冬天开会，有人提议每户都记一本，这就成了章程里的一行字。个人的圈写进了组织的土，组织的圈又在国家尺度上成了某个地方的一个做法。反过来，国家定的一条政策，到了合作社是一条章程要改，到了阿芸是一件她得在本子里新添一栏的事。

所以，平衡不是只在某个尺度上“管理好”。一个国家若只在国家尺度上说平衡，而不管个人和组织的圈是不是还在转，这个平衡是悬空的。同样，一个人若只守着自己的圈，却看不见自己所在的合作社、所在的国家已经被钉死，他的圈迟早也会被带着变形。

这里同样可以问：什么情况下这一节的话就错了？如果一个合作社十年里章程一字未改，各户的地却越来越好，人心越来越齐，那就说明它的样子和土本来就长得很对，不需要被改写；那它的圈也在转，只是转得很稳。山里确实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检验的不是“改没改”，而是“遇到了不合的地方，改得动不动”。能改而没有遇到要改的，和想改而改不动，是两回事。

这一节的判词：**平衡在个人、组织、国家三个尺度上是同一件事——样子、路、土三者还互相带着走；尺度之间互相回写，所以平衡不是在某一层管好，而是各层的圈都还转得动。**

可是平衡难以被看见，坏的东西却往往是先出现的。我们怎样知道，圈快转不动了？

◆ 33.3　不平衡的三种征兆

圈转不动，不会一下子停。它先发出一些小的声音，像老戴听树，像小罗听发动机。

这一节讲三种。它们都是读数，不是病因本身，所以每一种后面，都要附上一个“怎么确认”和一个“什么情况下这话就错了”。

– 第一种征兆：口头禅里，有一维变成了“本来如此”

茶园里最危险的话，是下面这几句：

“茶叶不就是这个样子嘛。”

“这么多年都是这么采的，没得选。”

“咱这座山，命里就是这样。”

三句话，各自钉死了一维。第一句钉死了样子（S），第二句钉死了路（D），第三句钉死了土（E）。

回想导论里那座渔村。“海是有脾气的”，这句话把一团缠着的线收成了一个看得见的样子。那是一个小号的形而上学：它说得很有力，说完之后，人就不再问洋流、季风、船和那天早上谁喝了酒。海成了一个本来如此的东西。

茶园里这三句话，和那句“海有脾气”是一回事，只是钉死的位置不同。

怎么确认？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对这句话追问一句“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看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愿意讲出一段来历：“以前这块地是荒坡，我爷爷……”“这种采法是哪一年因为什么改的……”，那句口头禅只是一句习惯用语，底下的来历还在，圈还转着。如果对方回答是不耐烦，或者一句“问这个干什么”，或者干脆想不起来，说明这一维已经没有来历了。来历没了，就只剩恒定了——这正是本书开头给形而上学下的定义。

什么情况下这话就错了？如果在一个口头禅满天飞的地方，你追问下去，每一句后面都有一段完整、可核对、愿意被改写的来历，那么这不是征兆，只是语言上的习惯。山里人说“命里”，常常只是说话的方式。区别只在：追问之后，有没有来历冒出来。

– 第二种征兆：回写，要么断了，要么太猛

回写，是结果回头改下一次的起点。它出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样子。

断了。老戴那位邻居，采了，卖了，下一年接着采，什么也不记，什么也不改。春天采完不看树，冬天不翻土，今年的芽是什么样、去年为什么是那样，没有一个人问。他每一年都在重新开始，好像前一年什么也没发生过。这种断了回写的人，表面上最“轻松”，实际上每一年都在用同一个起点重复同一个动作，土却在悄悄地变，他不知道。

太猛。隔壁山头另有一户，恰好相反。他几乎年年换：今年改品种，明年换工艺，后年换渠道，第四年又换了一个包装。每一次改，都有理由，都是听了别人一句话、看了一个新行情。结果是：没有一样东西来得及在土里沉下去。树刚适应一种修剪，又换了一种；老主顾刚喜欢一种味道，味道又变了；新工艺的好处还没有被记下来，就被下一个新工艺盖掉。这一户看上去最“有创造力”，可他每一次回写，都是在上一次回写还没落稳的时候。

两种看似相反，其实是一个毛病的两个面：回写的节奏，和土记住东西的节奏，对不上。

土是最会记的东西。一旦把什么写进去了——一种采法留下的伤、一种肥留下的酸、一种信任留下的默契——它记得很牢，也不容易擦掉。这正是前面说的，E最容易被回写、被沉淀。可是正因为它记得牢，写错了就会很久以后才发

现，等发现时已经很难改。所以，回写不能断，也不能比土记东西的速度快太多。断了，土在变，人不知道；太猛，土记不下来，人也不知道记下了什么。

怎么确认？看“账”。一家人家、一个合作社、一个国家，能不能拿出这样一份东西：哪一年改了什么，改的理由是什么，改了之后树和土怎么回应。有这份账，说明回写在落地；没有，或者账里每一年都是新的一页，没有一页接着前一页，就是征兆。

什么情况下这话就错了？如果一户人家年年大改，而他的树势、老主顾、渠道一年比一年稳，这一条征兆就不成立。山里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大改”是在一个很深的不变上做的——比如他从不换自家的老树，也从不换对待老主顾的方式。在不变处扎得深的人，改起来才不显得猛。这提醒我们：判断回写是不是太猛，要看沉淀的地方有没有被碰。

– 第三种征兆：平衡自己，成了新的统一

这一种最微妙，也是本书自己最容易犯的。

设想合作社的会计，读到了“三个方程平衡”这个说法，觉得很好，当年就做了一件事：设计一个“平衡指数”。创造占三成，幸福占三成，自由占三成，剩下一成是休整，每个月打一次分，年底公布排名。

排名公布的那一天，会开得特别热闹。几户人家为了让自己的“自由分”高一点，开始在账面上做文章；有户人家为了让“休整”那一栏不丢分，把一块本来该去看的歇地，真的当成一块不管的地，因为“歇”得越彻底分越高。

平衡就这样被统一成了一个读数。

这和前几章里批评过的那些事，是同一个动作：把三个互相生成的东西，收成一把尺子。只是这一次，这把尺子叫“平衡”。

怎么确认？很简单：如果有人能用一个数字、一张表、一个排名说清楚你们平衡不平衡，那你们量的多半不是平衡。平衡不能被一次读完，因为它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一个圈在不在转。你可以看一个圈转得快不快、顺不顺、会不会卡，可你没办法给它一个“分”。

茶园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老戴从不给自己的园子“打分”。他有一个习惯：每年冬天，他会把当年所有记下的东西摊开来，看三样：这一年最让他意外的是什么；有哪块地和他的预期不一样；有哪件事做了一半被他停了，为什么停。这三问没有分数，只有三个答案，而答案每年都不同。这是看圈转不转的办法，不是量平衡的办法。

什么情况下这话就错了？如果有一个办法能把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平衡压成一个数，而这个数连续几年和其他一切的读数——树势、人心、渠道、土力——都一致，并且不因为有人想改善这个数而失去意义，那么平衡是可以量的。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数。人们一旦盯着一个数，就会为了它去改变其他东西，这个数也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数了。

– 三种征兆的共同点

三种征兆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事：它们都是“圈上有一处不动了”。第一种，是某一维不动了（钉死）；第二种，是回写这条线不通了（断）或者失控了（猛）；第三种，是整个圈被收成一个读数，圈本身反而没人看了。

这也是为什么，不平衡常常在“一切看上去都很好”的时候出现：产量在增，满意度在高，选项在多，账面上每一个读数都漂亮。可是圈已经开始不转了。就像老戴那年的账，漂亮得很，只是第二年春天，芽头瘦了。

一个提醒：看到征兆，不要立刻动手。征兆是读数，不是诊断。先追问来历，先翻账，先蹲下来，捻一捻那撮土。读了才改，这是茶园里一条很朴素的规矩，也是本书一路讲下来的那件事：先有来历，后有判断。

最后补一句，免得误会：这三种征兆，一个人身上也会同时出现。一位忙到顾不上抬头的人，嘴上挂着“没办法，就这样”，手里的计划表一年年照抄，年底又拿一个“满意度”给自己打分。三样加在一起，他的圈其实早就不转了，只是日子还在过。能听见这几声小响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偶尔肯蹲下来看一眼土的人。

这一节的判词：**不平衡的征兆，是圈上有一处不动了：要么一维被说成了本来如此，要么回写断了或猛了，要么平衡本身被收成了一个分数。**

◆ 33.4　小结：明年还发芽

这一章的话，收成两句。

第一句：准则不是实现任何一条意义律，而是样子、路、土三者互相生成的圈明年还转得动。

第二句：这个圈在个人、组织、国家上是同一组方程，它不平衡的时候，先在口头禅、回写和分数里露出痕迹。

回到那位年纪最大的老茶农问的那个问题：“你们把这三个奖加起来，是想把茶园变成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一章，听到这个问题，大概会想：三个奖没有错，错在把它们当成了三个要达到的终点。它们可以是三条读数，可以是三个季节的领头问题，可以是三种需要时时问一问的东西，可是它们不是准则。

准则是明年还发芽。

如果要把这条准则带下山，带到自己的日子里，大概只需要记住三个朴素的问法。

头一问：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谁在领头？创造、幸福、自由，哪一个正在抢着说话，另两个是不是被我按下去了？

二问：我有没有哪一样东西，已经被我说成了“本来如此”？是它的样子，我走的路，还是我所在的那片土？

三问：我最近一次让结果改我的起点，是什么时候？

这三问没有分数，也不要求一次答完。它们更像老戴蹲在地头的那一下：捻起一撮土，闻一闻。

不过，还有一个麻烦没有解决，而且是最大的一个。

整整两章，我们不停地在说“读土”“看来历”“有账”“有人看着”。老戴能读土，因为他有一座园子、一辈子的记忆、一个会写的女儿。可是，一个合作社有十来户，一个乡有几十个合作社，一个国家有数不清的地块、行业、人群、几代人的记忆。谁来读那么多的土？谁来记那么多的来历？老戴要是不在了，那些脑子里的账怎么办？一座老园子的“谁家的坎为什么垮过、哪块地为什么酸”，如果没有被写下来，下一个人上山，捻起那撮土，看到的只是一把土。

要平衡，就得认得土。要认得土，就得给土写家谱。这件事，过去几乎做不到。

下一章，我们去一座老酱园的后院，看一口换不得的缸。

◆

34

第34章

E的同一性谱系：给土写一本家谱

◆ 34.1　酱园里换不得的缸

上一章说，准则不是实现哪一条意义律，而是三个方程平衡着走。平衡听上去很美，可一动手就碰到一个朴素的问题：你得先知道自己脚下是什么土。这一章从一个后院讲起。

我们来设想一家开了一百多年的酱园。这是构想的场景，不是哪一家的实录。南方一座小城，临河，门脸不大，后院摆着一排大陶缸，黄豆在里面慢慢变成酱。夏天开盖日晒，夜里盖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

有一年，其中一口缸裂了缝，渗了。老板的儿子在外面学过食品，回来说：换吧，换成不锈钢的发酵罐，温度可控，出酱稳定，产量能翻一倍，检验指标也漂亮。

试做了一批。酱确实好看，干净，咸淡均匀，什么指标都过得去。老主顾尝了一口，说：“不对，少了点什么。”问少了什么，说不上来。

老师傅在旁边说：“缸没养过。”

这句话听上去像迷信。可是再往下问，老师傅能说出一长串：这口缸是祖上哪一代挑的，靠着后墙第三个位置，挨着那棵老桂花；它泡过一回水，补过一回缝；有一年换了豆源，酱偏酸，大家以为坏了，那一年却卖得最好；前年有个徒弟开耙手重，那一批后劲苦。每一口缸，都有这么一本说不清也没写下的账。

这里有两个人，两句话，各对一半，也各错一半。

儿子的话里有一个假定：缸是缸，罐是罐，只要温度、盐度、时间对了，装什么都一样。陈年的缸壁、后院的风、晒场的位置、老卤里一代代留下来的东西，在他眼里都是“杂质”，是要被指标过滤掉的。这个假定就是我们在卷二说的“压平”：把一块块不同的土，当成同一种土。

老师傅的话里也有一个假定：缸不能碰，一碰就坏。可他说不出缸里到底哪些东西承重，哪些不承重。于是只能一概说“换不得”。这是另一种毛病：把来历封起来，当成不可碰的恒定。要是他一直这么说，这个酱园永远试不了任何新办法，直到最后一口老缸也裂了，什么都没有了。

酱园真正的难处在这里：**缸换不得，不是因为缸神圣，而是因为缸里装的不只是酱，还有酱的来历；可来历到底是哪几样，没有人说得清。**

说不清，就只能在“全换”和“全不换”之间二选一。而一个能让人不再二选一的东西，是把这些来历一样一样说出来、排出来、分出轻重来。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给土写一本家谱。

◆ 34.2　同一性谱系：土是怎样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

先把话说白。

一样东西“怎样一步步长成今天这样”的来历，SDE 叫它同一性谱系。同一性，意思是：它之所以是“这一口缸”而不是“另一口缸”，靠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条前后接得上的来历。

回到老师傅那一长串话。仔细听，里面有三类东西。

一类是一步接一步的差异：泡过水，补过缝，换过豆，换过开耙的手。这是路。

一类是这些差异当时碰上了什么：那一年雨水多，那一年老桂花被砍了，晒场边上新盖了楼挡了风，那一年老主顾的口味刚好在变。这是土。路总是在土里走的，同一件事放在另一年，就是另一件事。

还有一类最容易被漏掉：哪几次变动真的改写了这口缸，哪几次只是过去了。换豆源那一年，酱偏酸，第二年恢复了，看上去什么也没留下；可老师傅说，从那年起，这口缸的酸味里多了一层，后来的酱都带着。而补缝那一次，什么也没变。同样是“出过事”，一个改写了土，一个没有。

这三类放在一起，才是谱系。它不是流水账：流水账记所有发生过的事，谱系要分得出，哪几件事把土改了，改成了什么样，后来又怎样让别的事变得容易发生或不容易发生。

这里要把两种知识分开。

“黄豆发酵，盐度太低会坏酱”，这是一条通则，任何一口缸都适用，写在书上谁都能用。这类知识，我们叫它统一性知识，它的好处是搬到哪里都能用，所以便宜、好卖、好教。

“这口缸，每到第三天翻开耙就偏酸，因为它挨着后墙、见不到午后的风，而前年那场水又让缸壁的某些东西变了”，这是谱系知识，只对这一口缸成立，搬走就不成立。它的好处是准，坏处是搬不走。

两种知识并不打架，可它们的分量在不同的时代不一样。过去的时代，通则是稀缺的，谁手里有一条通则，就能走遍天下；今天通则越来越容易得，谱系反而成了稀缺的东西。这个变化，留到下一章讲。

回头再看形而上学。导论里说过，形而上学是对 E 的隐藏性所做的宇宙级别的统一性预设，拿掉了谱系，换来了恒定。渔村的老人说“海有脾气”，就是把洋流、季风、船的新旧、掌舵人的经验这一大团来历，统统拿掉，换成一个“脾

气”。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形而上学拿走来历，换一个恒定；谱系把来历还回去，换一个可以改的土。恒定好用，因为简单；可它封死了“怎么改”的入口。谱系难写，因为复杂；可它把入口开着。

还有一点要紧：谱系不只是往后看。老师傅那口缸，今年怎样开耙，明年换不换豆，这些事一做出来，就写进了它的谱系里，成为下一年的来历。谱系是一本还在继续被写的书，不是一座已经立好的碑。所以它和“传统”“老规矩”“祖宗之法”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把某一页盖上章，说从此不许再写；前者是一直往下写，只是每写一笔都知道前面是什么。

谱系和三个方程是什么关系？可以用酱园的一口缸说清楚。

三个方程是：S=F(D,E)，D=G(S,E)，E=H(S,D)。前两个，人们最熟悉：酱的样子（S），是这一年的操作序列（D）和缸的状态（E）一起做出来的；操作往哪里走（D），是酱的样子（S）和缸的状态（E）一起推着的。第三个最容易被忘记：缸的状态（E）本身，也是酱的样子（S）和操作序列（D）一年一年写出来的。

这第三个方程，就是家谱要记的账。每一年酱出了什么样子，手怎么动的，这两样合起来，把缸改成了什么——这一笔，写进缸的来历。明年的酱，就是在这个被改过的缸里做的。

通则只管前两个方程里“一般的那部分”：盐度够不够，温度合不合适。谱系管的是第三个方程里“这一口缸的那部分”。如果一个酱园只有通则，没有谱系，它的第三个方程就是空的：它不知道每年的操作把缸改成了什么，只知道每年的酱好不好。缸在悄悄变，它看不见，直到有一天酱突然不对了，才发现缸早就不是三年前的缸。

这样看，谱系不是一个附加的东西，而是三个方程里最容易缺席的那一个方程，被人老老实实写下来。

◆ 34.3　为什么谱系过去写不出来

酱园的老师傅有一年摔了一跤，住了三个星期的院。

那三个星期里，园子里的人才发现一件事：他们不知道今年的头一道酱该哪一天开盖。老师傅从来不看日历，他看的是早上推开后院门时，空气里有没有一股说不出的湿味；他摸一摸缸沿，凭手上的感觉判断今天晒不晒。三十年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写下来过。不是他藏私，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更没想过要写。

这个小插曲，说明了谱系为什么在过去几乎写不出来。至少有四道门槛。

第一道，路不留痕。人天生记的是结果，不是过程。酱好了，记住“好”；酱坏了，记住“坏”。是哪一天、哪一手、哪一阵风把它从这边推到那边的，当时没人当回事，过后就忘了。可谱系偏偏要的是路。

第二道，纠缠太多，记不全。一口缸的酱，缠着天气、豆、盐、水、缸、晒场、开耙的手、那一年的主顾口味。哪几样当时算“相关”，只有事后才知道。当时全记，记不动；当时只记几样，事后发现漏了关键的。

第三道，理不清。老卤会分出去，旧缸的醅会接到新缸里，一口缸的谱系和另一口缸的谱系是交叉的，像两棵根缠在一起的树。人的脑子很难同时读好几条交叉的线。

第四道，比不了。一家酱园有一家的谱系，可是一百家酱园有一百本，没有任何一个人读得完。谱系的真正用处，往往要在对照里才显出来：这口缸偏酸，是因为它挨着后墙，还是因为这一年的豆？只有拿别的缸来对照才知道。一个人一辈子，对照不了几口缸。

所以在过去，土的来历只能靠两样东西保存。一样是师徒口传：老师傅带徒弟，三年五年，让徒弟在旁边闻、摸、看，慢慢把“感觉”传下去。这条路的长度，最多三代人。另一样是族谱、账本一类的东西：它们记的是血脉、进出的数目，不是路，也不是土。

由于写不出谱系，过去的知识经济只能卖另一样东西：写得下一页纸的东西。配方、流程、手册、标准、课程。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一页就能装下；它们的前提，是把土当成一样的。一页纸装得下通则，装不下一口缸的来历。于是，经济的主流自然落在统一性知识上，谱系知识只能留在老师傅的手上，变成“手艺”“感觉”“祖传”。

这并不是谁的错。是门槛太高。

今天，这几道门槛都在往下降，但降的方式需要说准确。

记录变便宜了：一台手机拍一张照，一个温度计连一根线，老师傅边干活边说两句，都能留下来。读杂乱材料变便宜了：账本上的潦草字，师傅的口述，照片，天气记录，顾客的抱怨，这些混在一起、格式不一的东西，现在有东西能一起读。对照变便宜了：一百口缸的记录放在一起，可以问“挨着后墙的缸，是不是都偏酸”。

可是请注意，**降下来的是门槛，不是答案**。能记不等于记对；能读不等于读懂；对照出来的相关，也不等于真是原因。更麻烦的是，记录本身会回写：酱园的人知道自己在被记，开耙的手就会变——可能变得更小心，也可能变得更表演。这些问题，下一节讲智能体时还要再碰。

这一节有一个可以被检验的说法：如果酱园真的开始系统地记录了，三年之后，人们对“这口缸为什么这样”的判断并没有比从前更准，那就说明门槛并没有被跨过，只是多了一堆表格。

◆ 34.4　一个智能体怎样给土写家谱

还是那家酱园。老板的儿子听说有一种 SDE 智能体，可以帮人整理“一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就拿来试了试。以下仍是构想。

智能体第一天做的事，让老师傅有点意外：它没有给出任何配方，也没有说“最佳发酵温度是多少度”。它只是问。

它问老师傅：这口缸，出过哪些事？老师傅说起补缝，说起换豆，说起那个手重的徒弟。它问：那一年酱偏酸，你们当时是怎么发现的？谁先尝出来的？后来怎么处理的？它把老师傅的口述、账本上的潦草记录、后院的照片、几年来的天气和顾客的抱怨，一样一样摆到一起，排成这口缸的差异序列：哪一年变了什么，接着又变了什么。

然后它做第二件事：在序列上标记，哪几次变动改写了土。比如，它指出换豆那一年之后，这口缸的酸味多了一层，并且至今没有消失；而补缝之后什么也没变。它不说这是“原因”，只说“从记录上看，这两次变动之后的走向不一样”，请老师傅判断对不对。老师傅看了一眼，说：“补缝那回，其实后来也有一点变化，只是你们没记。”于是又补了一笔。

第一份产物，不是方案，是一口缸的家谱。

有了家谱，原来说不清的事变得可以讨论了。这批酱怎么偏酸？智能体不去找一个单一的“原因”，而是问三个问题：这批酱的样子，是这一年的操作序列和这口缸的来历一起做出来的，哪一边变了？是操作变了，还是缸的状态变了？还是顾客的口味变了、于是“偏酸”这个读数换了意思？三个方程同时在场，缺哪个都不能下结论。

最能显出家谱用处的，是那只不锈钢罐的争论。

老师傅说换不得，儿子说该换。有了家谱以后，问题变了：不是“换不换”，而是“这口缸的来历里，哪几样是承重的，罐里缺哪几样，能不能补回去”。对照几口缸的记录之后，大家发现，酱味里那一层特别的酸，几乎只出现在与老卤接过的缸里，不一定和缸壁有关。于是一个新的办法出现了：把老缸的醅按一定比例接到罐里，同时在罐边记下新缸谱系的第一页。“换”从二选一，变成了接谱。

请注意，这个办法既不在老师傅的话里，也不在儿子的话里。老师傅没有想过罐可以接，儿子没有想过“杂质”里有承重的东西。它是两条各自在发生的路，在家谱这个点上碰撞出来的。（这个办法灵不灵，是要用几年的酱来回答的；如果三年后罐里的酱始终学不到那一层酸，接谱这条路就要重新想。）

回到第1章最后说的那件事：皮尔斯给了钻石一张未来的身份证——去划它，它会划不动——却没有给它一本家谱。身份证只告诉你它将来会怎样，家谱才告诉你它是怎样来的。酱园里这本家谱，补的就是这一页。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家谱写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很能说明“知识的发生”和“知识的存放”是两回事。

那天智能体问老师傅：“你说这口缸‘有点闷’，闷是怎么个闷法？”老师傅愣了一下，说不上来。智能体没有追问，换了个办法：它把两口缸的开盖记录并排放着，问：“这两口里，哪一口你觉得更闷？”老师傅指了一口。智能体再问：“这口和那口，开盖那天的天气、晒的时辰，有什么不同？”老师傅看了一会儿记录，忽然说：“那天风是从北边来的。”

“闷”这个词，从此在这个酱园里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它跟北风、跟后墙、跟某个时辰的晒场挂上了钩。它还不是一个定义，只是一个有了来路的说法。老师傅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这话我说了三十年，今天才知道它是什么。

这就是智能体在这里的位置：它不是把老师傅脑子里的东西“取出来”，而是用对照和提问，让一个原来只存在于手和鼻子里的感觉，长成了可以说出来、可以被别人接着说的东西。感觉原来就有，说法是此刻长出来的。

这里要把智能体的位置说清楚，以免读者把它想成一个新的神谕。

它不是答案机器。它做的是知识的发生：把一个人说不清的“感觉”，通过提问、排序、对照，一点一点逼成说得出来的东西。老师傅的“说不清”没有被取代，而是被搭上了一条梯子。

它会错。它会把没有记录的事当成没发生；会把常见的当成承重的；会因为问话方式不同，把酱园人的看法带向一边。所以家谱必须是一本能被反驳的书：老师傅可以划掉，学徒可以补充，儿子可以质疑，每一次改动本身也写进谱系里。

它本身也是一片新的土。酱园人被它问过一轮之后，看自己的缸的眼光就变了；这种变化会回写进开耙的手里。好的智能体要做的，是让这种回写朝着“看得更清”的方向去，而不是朝着“依赖它”的方向去。

给土写家谱，是一件刚刚开始能做的事。它能不能做好，要看一个朴素的标准：酱园里的人，是不是比以前更知道自己的缸。

◆ 34.5　谱系不是历史，也不是档案

有人会问：这不就是写历史吗？酱园里翻出一本老账本，不也是在“记来历”？

差别在三处，而且每一处都要紧。

先说历史。历史讲究的是“发生过什么”，要尽量全、尽量真。谱系讲究的是“哪些发生过的事，改写了今天的土”，它是有选择的，选择的标准不是重要不重要，而是有没有留下痕迹。酱园老账本里，三十年前一场大火烧了半个晒场，是一件大事；可是对今天这口缸的酱味，这场火可能毫无影响。而一个徒弟某个夏天少翻了一次缸，是一件小事，却可能让这口缸的某一层味道从此少了一点。谱系记的是后者那种事。

再说档案。档案是死的，放在柜子里，等人去查。谱系是活的，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都被拿出来读，读完要回头改。一本从来不被读、不被改的家谱，就是档案。

还有一处最细：谱系要分类。一口缸的来历里，有的变动是改了“酱的样子”的，有的是改了“操作的路”的，有的是改了“缸和风、水、手的纠缠”的。这三类变动，对今后的影响完全不同。第一类，可以靠调整操作把它纠回来；第二类，可以靠换个做法绕过去；第三类最难，因为土变了，往往只能顺着新的土再走。一本不分类的家谱，是一堆故事；分了类、而且能说清“这几样特征是怎样组合起来的”，才是能用的家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老师傅的“说不清”不能被简单地翻译成“录下来”。录下来是档案；要从录音里分出“哪些是改了土的”，再把它们按类别排好，是知识的发生。这一步，才是智能体真正出力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做偏的地方。

要检验一本家谱是不是家谱，有一个很土的办法：拿一件没有写进去的新事去问它。比如，明年后院那棵老桂花要被砍掉，晒场会多一些风。如果这本家谱能让老师傅说出“那这几口缸大概会往哪边变、哪些要提前留意”，哪怕说得不准，它就是活的；如果它只能回答“过去发生了什么”，那它只是一份档案。

◆ 34.6　谱系读错的时候

家谱写出来了，并不保证读对。酱园后来出过一次小小的误会，值得讲一讲，因为它说明谱系的毛病长在哪里。

第二年夏天，智能体对照几口缸的记录，发现一个现象：凡是老师傅请假的那几周开的缸，酱味都偏淡。它据此提醒园里：老师傅亲手开耙的缸，味道更厚，建议所有关键批次由他经手。

这个结论看上去很有道理，园里也差一点照办了。可是年轻的学徒阿旺提出了一个疑问：老师傅请假的那几周，是不是刚好都在六月中旬？六月中旬梅雨最重，不管谁开耙，酱味都会偏淡。

翻回去一对，果然。老师傅请假，和梅雨撞在了一起。智能体在记录里看到的“相关”，一半是人，一半是天。

这个例子里有三个教训。

第一，缺了一个维度的谱系，会把别的东西读成原因。记录里有“谁开耙”，天气记得不细，于是人的作用被放大了。一本家谱的质量，不只看它记了什么，更要看它没记什么。

第二，读家谱的人，要有足够的“外行”。提出疑问的不是老师傅，也不是智能体，是一个刚来的学徒，他还没学会“本来如此”，所以敢问。谱系需要这样的读者：不替它辩护，只拿它去撞日子。

第三，读错本身是谱系的一部分。这一次误会，后来被写进了这口缸的家谱：某年某月，曾把梅雨误读成人手，原因是天气记录粗，改进办法是给晒场加一个更细的记录。家谱里有了自己的错，才更像家谱。下一章会说，真谱系和假谱系的一个分别，是肯不肯写自己的错，就是这个意思。

这也给前面那个可检验的说法加上一个补充：家谱管不管用，不看它从来不错，而看它错了以后，园里是不是能更快发现、更诚实地改。三年下来，如果酱园的错误越来越少地被发现，只是因为越来越少有人去查，那家谱就在往档案的方向走了。

◆ 34.7　小结

同一性谱系，是土的来历。形而上学拿走来历，换一个恒定；谱系把来历还回去，换一个可以改的土。过去写不出谱系，是因为路不留痕、纠缠太多、交叉太乱、对照太难；今天门槛在降，但降下来的只是门槛。

家谱写出来了，然后呢？一本家谱放在柜子里，仍然是一堆纸。它的用处，要到经济里、到每一次“该听谁的”的决定里才显出来。下一章，我们看它怎样成为一整片新的领地。

◆

35

第35章

知识经济的主流领地

◆ 35.1　从方法经济到谱系经济

设想有一位做食品电商的年轻人，听说了这家酱园，专程来请教。老师傅没有藏，把配方一项一项给了他：豆多少，面多少，盐水几度，晒几天。年轻人回去，在自己的院子里摆了二十口缸，一板一眼照做。

三个月后，他打电话来，口气很客气：“味道不对。”

老师傅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那儿的风不一样。年轻人没听进去，他把这个归为“执行不到位”，又找了几位技术员，把流程再抠一遍。半年以后，酱仍然不对，缸也闲置了一半。

这个小故事里有一种经济的全部逻辑，我们可以叫它方法经济。

方法经济卖的是“怎么做”：配方、手册、标准、课程、方法论。它的好处是可以复制——一页纸，一套培训，一个模板，就能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它成立有一个前提，我们在卷二说过：土是一样的。只有土一样，方法才能原样搬。过去一百多年里，工业化、连锁、教材、咨询，几乎都建立在这个前提上，而且确实做成了很多事，这一点必须承认。

它的天花板也在这里：土不一样的地方，它失灵。而失灵的时候，它只会说一句话——“执行不到位”。土的差异被翻译成了人的毛病。年轻人的酱不对，不是他不用心，是风不一样、水不一样、缸没养过。

与之相对的，是谱系经济。它卖的不是“怎么做”，而是：“在你这片土上，下一步该怎么做，以及为什么”。它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土，而是这一块具体的土；它交付的不是一页纸，而是一本不断长的家谱，加上读这本家谱的能力。

两种经济，判词是这样一句：**方法能复制，因为它不问土；土不能复制，所以谱系值钱。**

这句话要放稳，不能说过头。

不是说方法没用。方法是谱系在某一个截面上抄下来的东西，抄下来就脱了土，所以它好搬；它仍然是宝贵的，只是不再是唯一值钱的。

也不是说谱系经济已经成了气候。今天它还很小，大部分还停在老师傅的手上，停在“手艺”“经验”这些说不清的词里。把它说成“主流领地”，是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不是对现在的描述。判断的理由有三层：通则越来越容易得，所以稀缺的东西往另一边挪；记录和读杂乱材料的成本在降，所以谱系开始写得出；而人和组织面对的土，一年比一年更杂、更变，一页纸越来越不够用。

谱系经济里到底卖什么？说得具体一点，大概是三样东西。一是问法：怎样问一口缸、一个班、一家店，才能把说不清的来历问出来。二是读法：拿到一本家谱，怎样分出哪些变动改了土，哪些只是路过。三是接谱的手艺：当一块土要换、要并、要搬的时候，怎样把承重的来历接过去，而不是一刀切断。这三样都不能装进一页纸，都要在具体的土上，一次一次做出来。所以它不像卖货，更像医生看诊和老匠人带徒弟，只不过今天有了更好的笔和更长的眼睛。

这个判断可以被推翻。如果十年之后，真正赚钱、真正稀缺的，仍然只是通则和规模，而没有人为一本“这块土的家谱”付费，这一节就错了。

也许有读者会说：这听上去很美，可是谁来为一本家谱付钱？

酱园里的账其实很朴素。老师傅摔跤的那三个星期，如果园里有一本家谱，今年头一道酱照样能开盖；老主顾说“少了点什么”的时候，园里能指着家谱说出少的是哪一层；儿子想换罐的时候，不必在“全换”和“全不换”之间赌一把。这些省下来的，是试错的成本、失传的成本、争吵的成本。它们平时不在账上，出了事才一下子冒出来。谱系经济的第一批客户，大概就是这些“出了事才知道自己丢了什么”的人：老字号、家族企业、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他们买的不是知识，是不再被自己的土突然吓一跳。

◆ 35.2　轮换需要谱系

回到酱园。每年快到伏天，老板面前总有三个声音。

儿子说：今年出一款新口味吧，别的酱园都出了，我们再不动，年轻人就不认了。——这是要长出新东西。

老主顾们说：别折腾，还是那个味。——这是要舒坦。

老师傅说：我的缸，我说了算，谁来指手画脚都没用。——这是要自己做主。

三个声音，各有各的道理。第32章说，三条意义律要像轮作一样轮换着跑。可是轮换最难的地方是：今年到底轮到谁？

没有谱系的酱园，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谁的嗓门大听谁的：儿子强势那几年出新品，老主顾投诉多了就收回来，老师傅发火就关门——这就是卷四说的钟摆，今天往这边摆，明天往那边摆，摆动本身成了一种新的统一。另一种是排班表：今年创造，明年幸福，后年自由。可土不会按排班表走。

有谱系的酱园，办法不一样。它翻开缸的家谱，看见这几件事：

近五年，酱园一直听“还是那个味”的话，酱的方子一个字没动，老客很稳，但新客几乎不进门，缸里也再没出过新东西。这说明幸福律已经在位很久，创造这条线在土里快要荒了。

可是前年的新豆试验，让一半的老客流失过一季，那一季的账很难看。这说明土里关于“新”的承受力还很薄，贸然加码，会伤着幸福这条线。

再往前看，老师傅最得意的几个年份，都是他自己拿主意、不受任何人干扰的年份。这说明自由律在这口缸上有真实的产出，不能总是压着。

把这三条读完，答案不再是“听谁的”，而是：今年先让创造小范围地动一动，只动一口缸，不动招牌那几口；同时，让老师傅自己挑一口缸，做一款不为任何人、不计成本的试验；其余的缸，守住老客。而且，到了秋天，家谱上要有一页专门写：这一季创造在位，它改了土的什么地方，下一季该把谁请上台。

还有一件事，是排班表想不到的：有一季，什么都不动。缸歇着，人也歇着，不为新、不为稳、不为谁说了算。谱系会告诉你，哪口缸已经被用得太狠，该歇了。

看出区别了吗？排班表告诉你“轮到谁”，谱系告诉你“土现在是什么样，所以该轮谁”。前者是一张日历，后者是一次读土。

这一节的判词是：**轮换不是排班表，是读土；读土，要有来历。**

三个方程在这里是具体的：酱的样子（S）是这一年的操作（D）和缸的状态（E）一起做出来的；操作（D）要听哪条律，由酱的样子（S）和缸的状态（E）一起推着；而缸的状态（E）本身，又被酱的样子和操作一年一年改写。平衡，就是三个方程没有哪一个被压住。谱系的作用，是给 E 这一个方程配上一本能读的账——因为在三个方程里，它是最看不见、最容易被压平、也最容易被回写的一个。

谱系并不替人做决定。它只让决定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哪天老师傅看完家谱，说“我不同意”，而且说得出理由，那这本家谱就又长了一页。

有人会担心：有了谱系，轮换会不会变成另一种钟摆，只不过摆得更精细？

区别在于“谁在摆”。钟摆是被力推着的：今天某一派占上风，就往这边摆；明天另一派占上风，就往那边摆。摆动的原因在外面，在嗓门的大小、风向的变化里。轮换是读出来的：摆不摆、往哪边摆，由土自己的状态说话，而且每一次轮换之后，都要回头问一句——这一季，土变成了什么样？有没有因为这次轮换，把别的什么挤掉了？

还有一个更朴素的检验：钟摆摆过去以后，通常没有人记得上一次摆过什么，每一次都像头一回。轮换则有账：上一季谁在位，留下了什么，没做完什么，写得清清楚楚。有账的轮换，会越转越准；没账的钟摆，只会越摆越大。

所以谱系的一个日常用处，就是给“该听谁的”一个不依赖嗓门的依据。当老师傅、儿子、老主顾三方各执一词的时候，家谱不替任何一方说话，只把三方各自的话对照到土上：这句话，在这口缸的哪一段来历里站得住？站不住的话，也不是错，只是现在不是它的季节。

轮换的信号，到底怎么读？酱园的经验大致有三类读数，分别对应三条律。

创造律的读数，是土里还有没有新的差异在冒头。一口缸连续几年出的酱几乎一个样，连失败都是同一种失败，说明这条线已经静了。偶尔出一批怪味的酱，家里人说不清好坏，但有人愿意多尝一口，这就是创造律的苗。苗出来时不能急着打分。

幸福律的读数，是老主顾回来的方式。不是销量，销量会被很多别的事搅乱；而是熟客是不是还自然地带着别人来，是不是还在说“还是那个味”。如果熟客开始沉默，礼貌地买、不再多说，这是舒坦这条线在松。

自由律的读数，是做事的人还认不认这口缸是自己的。老师傅是不是还主动去后院转一圈，学徒是不是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大家只是照单操作，没有人再对缸有一点私心，这条线就在枯。

三类读数，没有一个是数字，也都不是一次就能读出来的。它们要靠几年的记录互相对照。这也是为什么谱系比报表更适合做轮换的依据：报表给你结果，谱系给你结果之前的走向。

有一点要说明：这里的三类读数是酱园这一块土上的读法，别的土，读数会不一样。一间小学的班级，创造律的读数可能是孩子们课间自己发明的新玩法；一家诊所的读数，可能是医生和病人之间还有没有一句不在流程里的闲话。读数本身，也要由各自的谱系去长出来，而不是从这里抄过去。

◆ 35.3　一个家、一个班、一座镇：谱系在三个尺度上

酱园是一个小组织。谱系的读法，换到别的尺度上也一样。

一个家。设想一家人翻修祖上留下的老屋。设计师带来了漂亮的图纸，要把房间打通，做成敞亮的大客厅。爷爷只提了一个要求：堂屋那根中梁别动。设计师觉得莫名其妙，那是一根没有任何功能的梁。爷爷也说不出理由，只说，小时候家里办过的每件事——满月、丧事、分家——都是在那根梁底下办的。这根梁在结构上“没有用”，在这个家的谱系里，却是多年来所有重大时刻的见证。有谱系的翻修，会先问：这个家的来历里，有哪几样是承重的？梁是不是承重的？不是在结构上，是在这家人彼此接起来的方式上。答案不一定是“别动”，也可能是“动，但把那一段留在别处”。重要的是，决定是读过来历之后做的。

一个班。一位班主任接手一个新班，最大的诱惑是套用上一届带得好的办法。有谱系的班主任，会先花几周时间，不做任何“措施”，只是看：这个班的座位是怎么自己长成这样的？哪几个孩子之间有过什么事？前任老师留下了什么

没说出口的规矩？这个班的土，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看完再动手。这不是拖延，是读土。

一座镇。一座镇要决定老街怎么改。有谱系的镇，不会只拿一份通用的规划模板，而会问：这条街上的每一个铺面，是在哪年、因为什么、被谁养成了今天这个功能的？哪一间铺子看上去“没用”，其实是整条街的消息站？拆之前，如果有人把一个地方的谱系写一遍，会写出什么？

三个尺度上，同一个动作：先读来历，再动手。动作不难，难的是肯在动手之前停下来。而肯停下来这件事，恰好需要前面几章讲的那份对“无用”的耐心。

读来历也有它的限度。一个家、一个班、一座镇，都不可能把来历读尽。读不尽怎么办？不是等读尽了再动，而是动得小一点，留得多一点，让每一步都带着“我可能读漏了”的自觉。这一点和前面说的“谱系是一本还在继续被写的书”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往后读不尽，所以往前要留余地。

◆ 35.4　谱系经济的三个坑

说谱系经济是主流领地，不等于说它是一条安全的路。至少有三个坑，从一开始就挖在路边。

第一个坑：把家谱做成新的手册。酱园有了家谱，旁边的酱园来问：能不能把你们的家谱格式给我们？这个请求听上去很合理。可是想一想，一份拿去就能填的“家谱模板”，里面的栏目是谁定的？是这一家酱园的土定的。别的酱园照着这些栏目填，就是用一家的来历去套另一家的土，等于又回到了方法经济，把土压平了。模板可以给，但要附一句：栏目是用来被改的。真正可以搬走的，只有“怎样问”，没有“问到什么”。

第二个坑：来历归谁。谱系是最私人的东西。一口缸的家谱，写的是这家人的血汗和判断；一个孩子成长的谱系，写的是一个人最软的那些地方。谁来保存？谁有权读？读了能不能拿去卖？如果一个平台把几万家酱园的家谱收进去，它手里就握着几万块土的来历，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本书不在这里下制度上的结论，只指出一点：谱系写得越细，越需要先问它属于谁。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谱系经济就可能先变成一种新的垄断。

第三个坑：编出来的谱系。现在很多老字号都有一段“百年传承”的故事，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后来编的。编出来的故事能卖货，因为人们愿意为“来历”付钱。可是编出来的来历，恰恰是把谱系做成了广告：它只留下好看的几页，把改写过土的那些难看的事——换过豆、断过档、关过门——都擦掉了。擦掉的那些，正是真正有用的部分。真谱系和假谱系的区别，一个很实用的判断是：看它肯不肯写自己的错。

这三个坑，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谱系一旦值钱，就有人想把它变成别的东西——手册、资产、广告。而本书的主张一直是，谱系的价值在于它是这一块土自己的、向前开着口的、能被反驳的。它越像一件商品，越要小心。

◆ 35.5　一个只作猜想的猜想：E 维度的形而上学

酱园老板娘有时会这样介绍自己家的酱：“我们这是祖传秘方，传了好几辈，改不得。”

这句话在中国的老字号里太常见了，常见到没有人觉得它是一个哲学主张。可仔细看它在做什么。

它没有拿走来历——它恰恰强调来历，“传了好几辈”。可它做了另一件事：把来历锁死了。来历被写成一个已经完成的、不可再写的东西。“祖传”不是一条还在延长的线，而是一道门，门一关，里面的东西就成了恒定。

这就让我们想起本书一直在追的那个结构。传统的形而上学，统一的是 S：拿走土的来历，换来一个恒定的样子。实用主义，统一的是 D：让路只听一条意义律。那么按这个排下来，是不是还应该有第三种：统一的是 E？

本书提出一个猜想，只作猜想：**也许存在一种 E 维度的形而上学**。它不拿走来历，而是把来历封成“命”——命运、八字、血统、出身、门第。它们的共同动作是：把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土，说成一件先于一切、不可更改的事实。“你就是这种命。”“这是我们这一支的血脉。”“出身决定了一切。”

为什么说它是猜想，而不是结论？

因为我们只有三条理由，没有一条是证明。第一，结构上的空位：三个维度，两个已经有了形而上学，第三个按理也应该有。第二，现象上的相似：这些说法确实有共同的动作，都在把土的来历说成一个不可改的恒定。第三，它们恰好是谱系的“邻居”——最靠近的东西，最容易被混淆。

这个猜想可以被推翻。如果有人能证明，所有这些“命”的说法，实际上都可以还原成对 S 的恒定预设，或者对 D 的统一，根本没有独立于这两者的 E 型动作，那猜想就不成立。另外，本书没有也不打算把任何一个民族或文化说成“有”这种形而上学；类似的说法在各个社会、各种时代的民间里都有，它们是怎样一层层长出来的，是以后的人要用谱系去回答的问题，不是这一节能下的断语。

然后说危险。这个猜想对本书自己是一面镜子。

我们这两章一直在说“给土写家谱”。家谱最容易滑成的东西，正是“命中注定”。一本家谱写完，有人会说：“看，你们家就是这个来历，所以你就是这种人。”一个孩子被谱系“读”出来，贴上“某型”“某类”，被分配到某条路上去。这时候，谱系就从“把来历还给土”，变成了“把来历又统一成命”。

要防住这一点，至少有三条纪律。

第一，谱系向前开口。家谱的最后一页永远是空的，今天做的事就是明天的来历。一本被写成“到此为止”的谱系，已经不是谱系了。

第二，谱系可以被反驳。它是证据的排列，不是判决。任何人都可以拿新的事实去改它。

第三，谱系不分配人。它读的是一口缸、一个班级、一家小店的来历，用来看清下一步怎么走，不是用来给一个人打分、排队、贴标签。

判词：**谱系把来历还给土；命运把来历锁进土**。前者留着门，后者焊死门。

◆ 35.6　小结

未来的知识经济，主场不在更多的通则，而在每一块具体的土的谱系。轮换需要它，因为读土要有来历；它也最危险，因为来历最容易被锁成命。

家谱、轮换、猜想，都说完了。该回到那座被拆掉的澡堂了。

◆

结语

从无用到有用

◆ 一　澡堂那笔没人算的账

镇上的老澡堂被拆之后半年，卫生院的医生发现说“睡不好”“心里闷”的老人多了一些。没有人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现在，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试着把它们连一连。不是下定论，只是看一看：如果把这件事当成一次发生，它是怎么走的？

澡堂里那几个钟头，是一锅粥。东一句西一句，谁也不为什么。可是在这锅粥里，有些东西在慢慢成形：谁家儿子在城里遇到了难处，先是一句抱怨，后来变成几个人凑的一点主意；谁的老伴脸色不好，先是一句闲话，后来变成一句“去查查吧”；镇上那条路该怎么修，先是几个老头的牢骚，后来变成递到镇里的一条意见。这些后来“有用”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计划出来的。它们是从没有计划的时间里，介生出来的。

拆澡堂的人用的是一把很公平的尺子：来的人少了，花的钱多了，“没什么用了”。这把尺子没有错，它量的是定型了的有用。它量不到的，是定型之前那一段。尺子不坏，坏在它是唯一的一把。

这就是全书的三句话落到一座澡堂上的样子。

第一句：实用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却在“有用”里发生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它统一的是路。澡堂的账，就是一本只记“路上办成了什么事”的账。

第二句：路被统一了，土就被压平了。拆澡堂的会上，没有人问这个镇子的土是什么样的：老人们怎样靠一个下午连在一起，镇子里的消息怎样走，卫生院的病人从哪里来。那一个下午被当成“在哪儿都能说话”的下午，土的来历被拿掉了。

第三句：每一步都要有意义，意义就被杀死了。老马答不上“说话在哪儿不能说”，不是因为他笨，而是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时候——它拿定型的问法，去问一锅粥。

还有一件事，渔村的老人其实早就替我们说过。他们说“海是有脾气的”，这句话我们在导论里把它当作小号的形而上学。读到这里，该公道一点：当一团来历太长、太杂、没有人记得住、更没有地方可以写的时候，“海有脾气”几乎是人手里唯一的一本家谱。它拿走了来历，但在没有别的办法的年代，它至少让人知道出海前要小心。形而上学不是愚蠢，是没有家谱时代的家谱替代品。

今天，门槛在降。我们第一次有可能不靠“脾气”，而靠真正的来历，去跟土打交道。这是好事，也是新的危险——我们在上一章看到了，来历最容易被锁成命。

◆ 二　夜市上的三个问题，修车铺里的两年

再看两个老熟人。

夜市老周，那天晚上被问了三个问题：能不能弄出新东西，吃的人高不高兴，你是不是自己的主人。他之所以能把摊子摆十一年，是因为这三个问题从来没有被统一成一个。现在我们能更精确地说出他靠的是什么：不是“平衡”这个好听的词，而是他每年、每个月，都在悄悄读自己摊子的土。我们不妨设想：上个月试新品，老客皱眉，他就缩回去；这个月熟客高兴，他再动一动；有一阵

子，他谁也不理，守着自己的锅，让那口锅歇一歇。他没有写下过一页家谱，可他的脑子里，有一本。

酱园的老师傅也是这样。差别只在，老周的家谱在脑子里，只有一个人读；酱园现在试着让它走到纸上、走到别人眼前，这样老师傅摔一跤的时候，园子不会一下子失明。

再说修车铺里的小罗。

他在耳朵里长出那一声“咔”之前，谭师傅对他说的只有一句话：“你再听，再听。”那两年，小罗什么也没听出来。如果用任何一把尺子量，那两年都是“没用”的：他不会修，不会判断，多半还拖慢了师傅的活。可是“咔”就是从那两年里出来的。

这里藏着本书最想说的一个对比。第1章说过，皮尔斯的哲学是“路统一在长出来上”；小罗的耳朵长出来，当然是创造。但在创造发生之前，有一段不能谈创造的日子，有一段不能被问“你长出什么了”的日子。**长出来，是从没有长出来之前的那一段里长出来的。**一个只认“长出来”的思想，会把那一段当成损耗。这是皮尔斯自己的一生早就演示过的——他那些没发表的手稿，那些穷困的年月。

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可以说清一句：**有用不是无用的反面，而是无用的一个后来。**

还可以再多说一句关于家谱和“无用”的关系，这也是全书一直绕着走的一个问题。

写家谱会不会反过来杀死无用？毕竟，把一切都记下来、分类、对照，听上去是最彻底的“步步要意义”。酱园里的经验是：看记什么、怎么记。如果家谱把每一次试验都要求写明“目的、结果、有无价值”，那它确实会杀死试验；如

果家谱只记“发生了什么”，不逼人为每件事交代理由，它反而替无用保住了一个位置。

老师傅有一回一连三个下午，什么活也没干，就坐在后院看晒场。园里人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后来家谱里有了这一笔：“某月，老师傅连坐三日，未动手。其后，晒场边的架子挪了半尺。”没有人规定过这半尺为什么要挪，也没有人要求他说明那三天的用处。但这一笔留下来了，日后翻看，大家才知道那半尺和第二年酱味里的一层变化是连着的。

家谱记下无用，不是给它算账，是给它留一个以后可以被认出来的位置。这是谱系和报表最大的区别：报表只认已经有用的，谱系肯认还没有用的。

◆ 三　九格里留着的两块空地

导论给过一张九格的纠缠谱，写的是“无用怎样变成有用”在九个地方发生的样子。当时标出了两格“尚未发生”：一格是家庭气氛的场（S2×E1），一格是无用的善的谱系（S3×E3）。读完全书，可以把这两格再说一次，说得比导论里更具体一点。

仍然不填满它们。一张九格表填满了，就成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可“没发生”也不是一句“说不清”就能带过的，要问：为什么至今没发生？什么矛盾会让它发生？

第一块空地：家庭气氛。孩子说不出家里哪里好，只觉得一回来就松下来。这种东西是一个“场”——弥漫的，不属于某个人，也不属于某一件事。为什么没发生？因为“场”要成为可讲的东西，需要差异序列把它一层层显露出来；可是气氛有一个性格：你一去量它，它就变了。你问孩子“家里的气氛怎么样”，孩子一紧张，气氛就换了；你在饭桌上说“我们来营造一下气氛”，那顿饭就不再是那顿饭。显露的要求（场要被看见）和路的要求（要一步一步记）在这里互

相顶撞，三原理里这是“显露和差异序列相矛盾”的情形，按理应该推动第三维——纠缠——发生改变。也就是说，要等到一个家里的人愿意把“一起松下来”当成一件要共同守护的事，而不是只当成运气，这一格才可能开始发生。这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结论。

第二块空地：无用的善的谱系。一个人不图回报、也不图被看见地帮了另一个人，这样的善，它的能量从哪里来，怎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现在还不会给它写家谱。为什么？因为谱系要的是记录，而这种善一被记下来，就变成了一笔账——“我帮过他”——它就不再是那种善了。谱系对来历的要求，和善对“不被记账”的要求，是互相顶撞的。能量（E3）想往下传，显露（S3）想保持纯粹，中间卡着。什么会让这一格发生？也许是找到一种写家谱的办法，记下的不是“谁给了谁”，而是“这种善是在什么样的土里，一次一次被接住的”。这依然是猜想。

两块空地，都和本书的主题同一个性格：它们不能被直接瞄准。

◆ 四　九卷走了一圈

把全书的路回头看一遍，不是为了总结，而是看这条路自己是怎么走的。

卷一，我们从三个人身上各拆出一条律：皮尔斯的路统一于创造，詹姆斯的路统一于幸福，杜威的路统一于自由。拆的方法，不是说他们只有一条，而是在文本里找到另外两条律被收着的地方，证明它们在场，却不发号施令。这一步，是一次“认人”。

卷二，我们认出了他们共有的动作，和渔村老人的“海有脾气”是同一个动作，只是统一的维度从 S 换成了 D。统一得越干净，越有一个看不见的副作用：把土一起压平。

卷三，我们去看那片土。没有哪一块能代表全体，所以只剩下路怎么走可以共同遵守。路被写成方法，方法沉回土里，土越来越牢。这里我们守住了一条界线：不谈民族的本性，只谈这片土一层一层的来历。

卷四和卷五，我们看到这条回写的线，怎样在国家治理里变成钟摆，在社会里变成三个厅，在一个人的一生里变成九块碎片。

卷六，我们把同一套眼光带到中国。杜威来过，胡适把他变成方法，“这有什么用”成了一句口头禅。可中国的土里，也早就有庄子的“无用之用”，只是被挤到了角落。

卷七和卷八，我们回到最难的地方：一锅粥里不能谈意义，正在成形的东西一碰就散。每一步都要意义，意义就被杀死。老子见了混沌，没有讲介生。

卷九，我们才开始讲怎么办。准则不是实现某一条意义律，而是三个方程平衡着走；三条律像轮作一样轮换；轮换要读土；读土要有来历。

回头看这条路，有一个特点：**它几乎每一步，都是被前一步的缝隙推着走的**。认人，才看见动作；看见动作，才看见土；看见土，才看见土被回写；看见回写，才看见被杀死的无用；看见无用，才需要介生；需要介生，才需要轮换；需要轮换，才需要谱系。这一串，不是先设计好的目录，是写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冒出来的。它自己就是一次“沉淀型”的发生：先泡在里面，慢慢有了门道，最后才成了样子。

写书的人没有一开始就知道最后一章要写酱园。

◆ 五　最后：用一句话分三种土来说

全书到这里，可以把总判断写成一种更像 SDE 的样子，不再只是一句“A 不是 B，而是 Z”。

在理念界（想法与说法）里，无用不是没用，而是尚未被说出的有用：它在话里还没有名字，所以尺子量不到它。

在现实界（人与物）里，无用不是浪费，而是土的休耕：澡堂、溜达、没有议程的下午，让一块地不被用到枯竭，才有下一季。

在自我界（“我”的感受）里，无用不是空虚，而是一个人和自己待在一起的那一段：小罗的两年，皮尔斯的乡下，詹姆斯最黑的日子，杜威的漫长案头岁月。

三句话是同一件事的三个侧面，并不互相替代。它们各自成立的条件，要靠谱系去看：这块土上，无用此刻在说什么？是该保护，还是该收回？反意义不是反对意义，是给意义换季。这一点，卷八已经划过边界。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要老实说：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风险。它主张“平衡”“轮换”“谱系”，这些词用不好，同样能变成一个新的、统一的、恒定的东西，一个“本来该如此”的标准。要防住它，唯一的办法，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家谱的第一页，而不是一座碑：写得不对的地方，被后来的土改写。

◆ 六　留给读者的三件小事

书到这里，该放手了。如果一定要留下几件可以动手的事，只有三件，而且都很小。

第一件：下回听见“这有什么用”，先别急着回答，先问一句：它是在问一个定了型的东西，还是在问一锅粥？前者可以答，后者答了就杀了它。

第二件：挑一个你身边“没什么用了”的东西——一间老铺子、一条老规矩、一段没有目的的下午——不急着救，也不急着拆，只是把它的来历问一遍，写下三五行。写的时候注意，哪几件事改写了它，哪几件只是路过。这就是你自己的第一页家谱。

第三件：给自己的生活留一块不算账的地。不必很大，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段回家的路。它没有指标，不会被考核，也不必“有收获”。如果有人问它有什么用，你可以说，不知道，等它长出来再说。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承诺你“变得更好”。它们只是让你在一个只认有用的世界里，保住一点能让有用长出来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路过一个快要拆掉的、“没什么用了”的地方，不妨停一停，问一句：它是真的没有用了，还是正在一锅粥里？如果还有机会，不妨把它的来历问一遍，写下来，再决定拆不拆。

当然，这也说不准。

附录一

与站上七本书的对账表

本书与站上七本相邻专著的关系是：它们多半写“症状”，本书找“根”。下表每本书列三项：它的判词；本书在哪几卷引用它；本书往前走的一步。原文引用均不超过二十字，不复述其论证。

— A.1　第133号《皮尔斯》

它的判词。把皮尔斯的“三”读成一件事的三个阶段：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意思在路上”；纯秩序也是死；正在成形最宝贵。

本书引用处。第1章（“意思在路上”、玩味、钻石）；第2章（2.2）；第4章（4.7）；第8章（8.2，“为名字而战”与切断回写）；第9章（9.3，形而上学俱乐部的“五行当”）；第13章（13.2）；第24章（24.4，玩味作为受保护的混沌）；第29章（29.3，“正在成形最宝贵”）；第34章（钻石的“会”，补上家谱）。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第一，指出皮尔斯这条路统一于创造，并交代“创造即特征律运行”（133号的“特征律”指差异给感觉，本书不改它，只说创造是它的一路运行）。第二，133号看见了混沌的价值，本书追问混沌被安放的位置：它在皮尔斯那里是“预备”，因此被取消了独立价值。第三，钻石的“会”藏在土里，本书补上：土只被留在将来，缺了来历。第四，改名之战被读成方法回写成土的一例。

– A.2　第202号《詹姆斯》

它的判词。詹姆斯的河只流在自我界；三个核心是自我创造、自我幸福、自我自由；“自由＝创造×幸福”；“暗里选了幸福”；死法是耗散。

本书引用处。第2章（2.1至2.5，“暗里选了幸福”、仪表盘、1870年危机只点一句）；第4章（4.3、4.4、4.7）；第7章（7.2、7.3，“四条河汇于一人”）；第10章（10.3，对照多源缝合的土）；第16章（16.2）；第21章（21.9，“暗里选了幸福”）。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202号判断詹姆斯“暗里”选了幸福；本书说这不是暗里，而是一种D维度形而上学的统一：路只听一条律。仪表盘修补仍是“步步要意义”，所以补不回混沌。另一步在土：四条河汇于一个人，本书改问——为什么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班、一座城——答案在美国多源缝合的土里。

– A.3　第235号《杜威》（做中学）

它的判词。杜威教的是做中学，自己靠的是书桌长；动手中心，落在 D2 与 E1 现实界；旁观者理论。

本书引用处。第3章（3.5，漫长的案头岁月）；第4章（4.2、4.7，旁观者理论）；第8章（8.3，“给了方法”、方法回写成常识）；第16章（16.7）；第20章（20.1至20.3，胡适一线）；第21章（21.9）。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235号把“书桌长”当作一个有趣的反差；本书把它当作证据：杜威最好的东西，长在没有用处的酝酿期里，一个问题磨了很多年——这正是混沌与介生。他的理论不谈这一段，因为自由律统一的路，容不下一段不为任何事的日子。

– A.4　第180号《杜威》（高鹏）

它的判词。一生开路，逻辑只给修路记账；四格账（修路、暂停、换题、开路）；并账；一扇门；“尺子只有一把”，量的是自由；保底：一团乱麻先做起来。

本书引用处。第3章（3.1至3.3、3.5、3.8，尺子、路重，裁定与170号的分歧）；第4章（4.3、4.7，并账）；第8章（8.4）；第15章（15.6）；第16章（16.2、16.7）；第20章（20.1、20.2）；第21章（21.2、21.9）；第24章（24.4，“一团乱麻先做起来”）；第25章（25.4）；第32章（32.4，换挡规则、开路五句，与轮换对照）。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180号看到了尺子只有一把；本书回答：为什么只有一把，而且是量自由的那一把——因为杜威是统一于自由律的，缺格不是疏忽，是统一的结果。另外，换挡规则是补丁，轮换是读土：补丁仍在一条律之内，轮换才让三条律上台。

– A.5　第170号《杜威教育》

它的判词。看见学习在路上长出来，却让每条路回到同一个整体；望见被挪到终点；“合拢”；三格一个影子。

本书引用处。第3章（3.1至3.5、3.8，“合拢”、“三格一个影子”、“路满”）；第4章（4.7）；第16章（16.7）；第20章（20.1、20.5、20.6）；第21章（21.9）；第24章（24.2、24.4，一锅粥三种面孔）；第25章（25.4）；第29章（29.1）；第32章（32.4，三格纸与轮换对照）。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170号发现创造、自由、幸福并成了“生长”一个影子；本书判：那个影子的本体是自由律，“生长”是它的读数，不是三者的并集。另外，170号疑有缺失的“留余地”，在本书里成了介生保护和休耕的论据。

– A.6　第178号《罗蒂》

它的判词。把世界请出判词之外；三梁——门（理由与原因）、骰子（偶然）、抽屉（私与公）；“无死法死”；兰花作为说不出用处的热爱。

本书引用处。第4章（4.5、4.7，门、骰子、抽屉重读为三律分家的制度化；兰花被锁进私人抽屉）；第10章（10.2）；第15章（15.6）；第27章（27.1、27.2，“无死法死”作完全实用主义杀死实用的语言形式）。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178号写出了实用主义砸镜子之后的样子；本书说：抽屉不是中立的整理术，而是创造与自由被分到私人、团结与幸福被分到公共的一次制度化。“无死法死”，是这个思想在语言里的死法——只过时，不被判错。又补一句：把世界请出门外，等于把土请出门外；那个“判”仍是统一性的判官。

– A.7　第291号《实非实》

它的判词。从“用”到“实”；实践是 SDE 洪流序列的交合体；有效是 S3 真善美的聚合，而不是总分；承重三问；拒谈美国文明性格。

本书引用处。第7章（7.3，压平在症状层）；第9章（9.4，拒谈“文明性格”）；第12章（12.1，作为论敌回应）；第15章（15.6，
从“用”到“实”）；第21章（21.6）；第29章（29.3，介生保护）；第30章（30.4，介生保护判据，本书展开）。

本书往前走的一步。291号只用 S3，并明说 D1 意义目标是“另一组问题”，本书正好接这一组：291号是症状层，本书是根层。关于“美国文明性格”，本书同意不能谈本质，但不是拒谈，而是改谈：这片土一层一层怎样长出来，又怎样被回写。

参考资料

参考书目

只列本书确知的作品与年份。年份为首次发表或出版年；拿不准的不列。

◆ 一、皮尔斯

《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1877。

《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1878。

《理论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ories），1891。

《必然论的检验》（The Doctrine of Necessity Examined），1892。

《心的法则》（The Law of Mind），1892。

《进化之爱》（Evolutionary Love），1893。

《实用主义是什么》（What Pragmatism Is），1905。

《一个被忽视的上帝存在论证》（A Neglected Argument for the Reality of God），1908。

《皮尔斯文集》（Collected Papers），1931–1958，八卷，由他人编辑出版。

◆ 二、詹姆斯

《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90。

《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896年演讲与文章，1897年结集。

《宗教经验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

《实用主义》（Pragmatism），1907。

《多元的宇宙》（A Pluralistic Universe），1909。

《真理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ruth），1909。

◆ 三、杜威

《民主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

《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

《人性与行为》（Human Nature and Conduct），1922。

《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1925。

《确定性的寻求》（The Quest for Certainty），1929。

《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

《共同的信仰》（A Common Faith），1934。

《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

《自由与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1939。

◆ 四、罗蒂

《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1979。

《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1982。

《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1989。

◆ 五、相关研究与中国思想

路易斯·梅南德：《形而上学俱乐部》（The Metaphysical Club），200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985（“实用理性”之说所在）。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

《老子》第十一章（“当其无，有器之用”）；《庄子》内篇《逍遥游》《人间世》《应帝王》。

◆ 六、站上相邻专著

第133号（皮尔斯）、第202号（詹姆斯）、第235号（杜威，做中学）、第180号（杜威，高鹏）、第170号（杜威教育）、第178号（罗蒂）、第291号（《实非实》）。

版本说明

本版字数、版本与交付

本版为 2026 年 11 月第 1 版（逐页校订本），统稿三审、逐页纠错后按第 220、302 号版式成书。德麦国际专著第 548 号，ISBN 979-8-90690-550-5，定价 US$40.00。

正文字数：导论、三十五章与结语共 320,814 个汉字（章题、节题、表格不计入）。

本书同时是一个出版单元：全文阅读（在线翻页、全文网页、PDF 与 Word）、学习包（九个学习单元，每卷一个）、专属智能体的问对。三者入口见书籍详情页 sdeuniverses.com/books/m/548/。

勘误与意见，请在书籍详情页留言。

核 心 问 题

完全的实用主义，最后会杀死实用。

——王德生

实用主义说，别问一样东西本来是什么，看它会带来什么。本书说，它并没有离开形而上学：皮尔斯把路统一在创造上，詹姆斯统一在幸福上，杜威统一在自由上。传统形而上学统一的是“世界是什么”，实用主义统一的是“路为了什么”——一种 D 维度的形而上学。

统一的路长在一片多源缝合的土里，又被写成方法沉回土里：治理在增长、福利、权利之间来回摆，社会分成三个厅，一个人的一生碎成九块。到了中国，“这有什么用”又把它统一了一次。

可路并不总能谈意义。一锅粥的时候不能，正在成形的时候也不能。每一步都要有用，就把这两段日子拆掉了；后来所有的有用，偏偏都从那里来。老子见了混沌，没讲介生。全书九卷三十五章与结语，从一座被拆的澡堂讲起，讲到三条意义律轮着跑、三个方程平衡着长，讲到给土写一本家谱。

这是一部研究性专著：核心思想由王德生口述提出，正文由 AI（Claude）协作撰写并经三审回改；书中人物与场景是构想，可被推翻的条件尚待检验，没有独立学术评审。

有用，是从无用里长出来的。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548 号 · 导论九卷三十五章结语 · 约 38 万字
ISBN 979-8-90690-550-5 · 定价 US$40.00

